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 B·A·崔可夫（1900—1982）是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两次苏联英雄。1918 年参加苏军，毕业于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伏龙芝军事学院等。1929—1932 年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8 年任步兵第五军军长和第四集团军司令员，指挥集团军参加了白俄罗斯西部的解放进军。苏芬战争中任第九集团军司令。1940 年 12 月至 1942 年 3 月任驻华武官、军事总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内任职，从 1942 年 5 月起，曾任预备队第一集团军司令员、第 64 集团军战役群司令、第 62 集团军（1943 年改称近卫第 8 集团军）司令员，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特别是率部从斯大林格勒一直打到柏林，战功卓著，他的部队先后 17 次受到最高统帅部通令嘉奖，他本人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战后，他先后任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副司令、第一副总司令、总司令，并兼任苏驻德军管局总指挥和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1953 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0 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61 年兼苏联民防司令。1972 年任苏联国防部总监。从 1952 年起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 年起为中央委员。著有《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战火中的 180 天》、《本世纪之战》、《第三帝国的末日》、《时代的文件》等书。

作者在这本战争回忆录中，以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具体地叙述了他自 1942 年 9 月受命指挥第 62 集团军（后改称近卫第 8 集团军）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起，直到攻克柏林的整个战斗历程；生动地从一个侧面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百万大军鏖战的壮观场面，以及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彻底覆灭前垂死挣扎的情况；满怀激情地赞颂了苏联军队从将军到士兵以至人民群众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抒发了作者作为战役指挥员在战场上的感受，内容丰富，情深意切。

本书共分四篇。作者重点地在第一、四篇里描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柏林进攻战两大战役。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战役中，他是在战役进入极其艰巨和严峻的时刻，肩负防御斯大林格勒中部和工厂区的重任。率领集团军与其它大部队一起，坚持在伏尔加河两岸和斯大林格勒市里，浴血奋战，遏止了优势敌人的狂猛攻势，粉碎了希特勒妄图一举占领斯大林格勒的罪恶计划。以斯大林格勒会战为转折，苏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他的集团军和其它大部队乘胜西进。作者在第二、三篇里记述了解放顿巴斯、扎波罗热、敖德萨以及强渡维斯瓦河和奥德河等几个在现代战争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战役。然后，较全面地描述了 1945 年 4 月攻打柏林的战役。在卫国战争中这个规模最大的城市进攻战中，他的集团军身负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主要方向实施主攻的重托，历尽艰辛，突破了德军在塞洛高地的坚固防御，在攻克柏林的决战中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对我们了解苏联卫国战争的史实很有帮助。

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从战役指挥员的角度，对如何实现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如何洞察敌人的奸计，如何在方面军编成内组织和实施

大城市的防御战和攻坚战，指挥部队创造性地运用推广种种有效的作战方法，克敌制胜，都有所叙述或详细地总结，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军的战役指挥和作战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蒋素琴、杨林同志。

另外，本书在译文的编辑过程中，得到韩桂莲、吴德如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1988 年 11 月

作者序

回忆……它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你既不能对它发号施令，也不能拒之不理。它时常会在你脑海里重现你曾目睹过的、曾经历过的、简直会使你心头紧缩、冷汗淋漓的情景。

这种情形白天或晚上都会出现。有时，你会因为回忆到某些往事而深深地自责，虽说现实距那些经历已经很遥远了。是很遥远了，但回忆却使你重返过去，遥远的事情又一幕一幕的掠过眼前。

……城市上空，数百架轰炸机盘旋俯冲，炸弹倾泻、炮弹横飞；城市里，一片片房屋烧成灰烬，一座座厂房化为瓦砾，大地掀翻了个，空气中充满了子弹和弹片的唿哨声；在你脚下，折断的钢筋、扭曲的电车钢轨、碎石和残砖、弹坑和陷阱比比皆是；在你前方，在目力所达之处，是集团军指挥所，它设在一个小丘顶上。去那里，要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你去吧，去接受指挥中央防御和城市厂区防御的命令；你去吧，忘掉一切危险，去思考怎样才能阻止和消灭潮水般涌向城市的一个个德军师。

这是 1942 年 9 月 12 日。这一天，我被任命为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那时，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一起挑起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重担。

……柏林的大街和广场，正是在这里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凶险的火焰，如今就象堆满废金属和残砖碎瓦的垃圾场。到处是折皱的头盔、翻倒的火炮、没有炮塔的坦克。空无一物的房屋露着烧焦的窗户，烟熏火燎过的墙壁上挂满厚厚的灰尘，空气中充满呛鼻的梯恩梯炸药味。我的指挥所里，光线昏暗，更衬托出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那张惨白的面孔。他是前来就柏林停火条件进行谈判的。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谈，只能无条件投降……”这是 1945 年 5 月 1 日前夜。在柏林，在我近卫第 8 集团军指挥所里发生的事情。

……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路程，按今天的概念来看并不算长，乘坐现代化的涡轮喷气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但是，如果要冒着枪林弹雨，闯过无数的地雷场，穿过敌人构筑的一个个防御区，越过一条条江河障碍，用你的双脚徒步走完这段路程，那么你会为那些经历过无数次浴血战斗、用两年多的时间走完这段路程的苏联的神奇的勇士们而感自豪。

我已经 80 岁了，在这个年纪里，忘记一点什么，或是因为年代久远而遗漏些什么细节，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的事件，与近卫第 8 集团军从伏尔加河到施普雷河的战斗道路有关的事件，与攻

打柏林有关的事件，都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就象发生在昨天，而不是发生在 50 年以前。

当然，我着手写《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这本书时，是凭借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献。我也总结了在历次的防御和进攻战斗中、我所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各师、团的战斗经验。没有文献作靠山，没有目击者的证词，我就不可能进行这项工作，就象不能建造没有基础的楼房一样。

但是，应该着重指出，除了记载在文献上和学术专著上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以外，今天的读者应当了解，在过去那个非凡的年代里。那些曾参与各种事件的人的思想、情感、感受、疑虑和喜悦。为此，依我的想法，这本书不仅应该有助于提高读者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而且应该帮助读者形成坚强的意志，帮助读者锤炼世界观。如果卫国战争中的目击者、有战斗经验的人和在各种条件下都经受住了考验的人，能用生动的语言将所回忆起的鲜为人知的事实都描述出来，那么，这样的坦率态度应该受到鼓励，他们的回忆应该收藏到社会的精神宝库中。

我思考的主线，是第 62 集团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改编为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战斗道路。我将尽可能详细地叙述这支部队所经历过的、包括攻打柏林在内的光荣的战斗经历。我思考的基础，是我的活生生的记忆，它使我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从今天的立场来理解那些曾经历过、曾目睹过的种种事件。

我们国家的铜墙铁壁是人。令人信服的证据是，我们的军人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几乎毫无求生希望、处处都是死神影子的时候，仍然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这一点，对于希特勒的战略家们来说始终是个不解之谜。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正如那些意识到自己对时代、对人民担负着责任的人的智慧一样，是不能用普通尺度衡量的。只能以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来评介。望眼欲穿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经受住了一切，我们开始向西挺进，我们打到了柏林！

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里，人民早已当家做主，正是对这样的人民所具有的无限创造力的列宁式的信任，成为并将永远成为我军的战斗力，成为我军创造性地完成各项任务的能力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切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注定不能理解的。

我们为此自豪，我们为此感激我们的共产党。是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日子里，就开始在每个人心中建造这样一座精神堡垒，就开始培养锻炼我们去为我们的后代而经受严峻的考验。

伟大的列宁曾经预言：懂得为什么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懂得为什么而战，所以我们胜利了！让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家、敌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人懂得这一点吧：谁去策划新的狂妄的战争冒险计划，谁就将遭到第三帝国的罪魁祸首的 1945 年 5 月所遭到的命运！

在我的回忆和思考中所要谈的，就是从伏尔加河打到施普雷河的近卫军军人在炮火中战斗与生存的本领，就是他们在炮火中形成的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

远接近地

每一个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在达到勇敢无畏和坚韧顽强的崇高境界之前，都有自己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儿女，条条道路都可以建立伟大的战斗功勋。

我 1900 年 2 月 12 日出生在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那时，这个村子属于图拉省，现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地区中心。

我 12 岁那年，就背着背囊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告别家乡就意味着我告别了童年。我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经常回忆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这个工厂当时制造响声清脆的马刺，很有些名气。

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 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工人们被硬性派到前线，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们从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来。你还没来得及加工头一批锻件，另一捆就叮当作响地扔到了你的脚边。你要钳起烧成雪青色的带角的毛胚，再放进张开大口的台钳里……身边到处都是铁制品、铸铁和钢材。你要想对付得了它们，就得加油干，别想休息。

你不想买劲，就别想拿到工资。

中午时分，工厂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中飞扬着稠密的金属粉末，搞得人人嗓子里发痒。双手又沉又重，脊背和双肩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想喘口气吗，那可不行，领班就在身后。只有上厕所，他才允许你暂时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我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两个 14 和 15 岁小伙子。我们相互使眼色。一会儿，领班发现了，气得大喊起来：

“你们要是出废品的话”，他在我们眼前来回挥舞着双拳说，“小崽子，我可要教训你们。”

而我们，没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动也不动地呆着，望着大声吆喝的领班。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

就这样，我们给他上了一课，后来，又教训过他一次……几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们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双拳了。但活儿并未因此而轻松些。

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亚在那儿工作）的水兵，经常来我们这里。

“要坚持住”他们常鼓励我们。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团结，我们当时并不懂。我们的天地只限于窄小的、闷热的工厂。有时，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余波传到这里。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时的河水，喧闹、沸腾起来了。我们的工厂也开始骚动起来。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里，传单、禁书、政治小册子都开始出现了。我们贪禁地读着这些东西，并转述给不识字的同志。因此，后来发生的 2 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进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也许，正是这个时刻，正是在告别万尼亚·济明的时候，我也彻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时代……1917年9月，我们那生产马刺的工厂，由于需要量下降，关闭了。我们失业了。

我闲了下来，便开始经常到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那里去。他们和伊里亚一样，都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正是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列宁的事。在他们那里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逐渐开始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穷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战争”的具体涵义。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们。但没看见伊里亚，他去放哨了。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干脆躺到他的铺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跃起身来。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小兵。

“崔可夫，你为什么离开哨位？”

他肯定看错了人，我与我哥哥长得很象。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亚是我哥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兵是支队委员会成员。他马上详细地询问起我来：“你有什么事，为什么在这里？”

我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什么也没隐瞒，甚至对他坦白了我想打机会搞到武器。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伦斯基复仇。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坦率态度。他请我抽空儿到委员会去一趟。

我哥哥回来后，我把同那个小兵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

“他是库兹明同志，”伊里亚说：“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不久，我又来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亚，刚刚告诉他，我依然还没找到工作的事，库兹明就来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导队。

17岁就当一名小兵，而且还在喀琅施塔得。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太好了，谢谢你！”

从这时起，穿上一身小兵装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

过了两天，我把装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带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库兹明所允诺的我作为一个小兵被编入了水雷教导队。

于是，我的新生活、军人的生涯开始了。

在十月起义以前，我两次去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库兹明派我带着党的任务去那里找工人同乡，了解他们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奥布霍夫的工人们已在积极地准备着，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出发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队伍开始编队。几乎所有人都被编入队伍。一支队伍要去海军第2支队，另一支队伍去波罗的海造船厂。但是，不知为什么哪支队伍里都没有我，大概这是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心。他自己带

一队伍去彼得堡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堪——要知道我同样可以消灭士官生。但我所受的这种委屈并未持续多久，一天以后，好消息从天而降：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啦！……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二哥伊万的命运。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失踪了。原来，他在7月就被抓进了监狱，囚禁于死牢中。伊万怒斥克伦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法院判决伊万死刑，但狱吏没来得及执行这个判决。

冬天来了。芬兰湾和涅瓦河都封冻了。许多水兵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在那里执行着苏维埃政府的各种任务。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使人忧虑的事件。革命的敌人开始抬头的。

他们不断地暗中破坏人民政权各项决议的实施，接连地组织反革命暴乱。党把最可靠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队伍投入到与他们的斗争中去。这一次，伊里亚把我带上了。我们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列车。列车从萨拉托夫将粮食运送到俄国中部地区。整个1月和2月，我们都在粮食专列的取暖货车上度过。

2月份，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富农、商人、官吏煽动人们起来反对苏维埃。因为你们，他们向我报复。前几天，他们放火烧了我的谷仓，整个棚子都烧光了。家里已无粮草，盼你们回来帮助我……”

在这一天，伊里亚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亲！”他对我说。

“时间很长吗？”

“咱们看情况。”

……谢列布里亚普鲁德村散布在奥谢特尔河河谷里。村庄的中心部分在右岸。笔直的街道两旁是木板或铁皮屋顶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围墙。在中心区的广场周围，布满了贸易货栈和石头房屋——商店、小铺、仓库等等。在中心区居住着富裕的农民、商人、牲口贩子和工人。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洼处，乱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残破围墙围着小木屋。河彼岸的这部分村子被称为“鳄鱼壕”。这里住着贫农。只有我父亲伊万·伊万诺维奇·崔可夫的房子夹在这一带都是两个窗子的木屋中间显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个窗，大门安装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亲是个身强力壮、性格刚毅的人。他养活着一个有8个儿子和4个女儿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水平虽然还不能摆脱贫困的威胁，但还能维持下去。他用尽最后的心血，建设了这个还算是坚固耐用的家。林里人都叫他“大力士约内奇”。当村里进行角力时——这是常有的事，父亲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间，无论谁也别想在他身上讨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头，打得又猛又准，谁也招架不住。但是，现在他顾不上拳斗了，谷仓被烧光了，春天播种用的种子一口袋也没有剩下，用于磨粉的谷粒一俄斗也不到。

我们晚上回到家。父亲坐在桌子旁，满脸阴云，忧虑重重：拿什么来喂饱从长凳这头到那头的一张张饥饿的嘴呢？离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获还早着呢。

在这个星期里，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结婚。妻子和孩子在父亲家里生活。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几口袋留种用的谷粒。粮食有了，除此而外，还在已逃到国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园里，弄到了牲畜饲料。

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

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

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 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亚是我的亲兄弟。”

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

在敦刻尔克，当英国远征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成功地撤退之后，英国的危机状况明显地改善了。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没有使英国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对比也在逐渐拉平。船队不断地把飞机从美国运到英国。美国的工业体系虽然缓慢地发展，但最终还是转移到各种武器的生产中去了。

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正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

那时，我在中国工作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海港城市。另外，我还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如果继续执行以前的军国主义政策，它会继续扩大它的侵略范围。

向什么方向扩张？这就是问题所在。

苏联政府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必需赢得一年、两年的时间，来完成重新装备我们的军队的工作。

我们的航空工业有新式飞机的试验样机，它们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德国飞机。试验样机已经投入成批生产。我们在红军中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军。我国的工业已有能力成批生产T—34型和KB型坦克，这些坦克在战斗性能方面也比德军坦克强。各种新型轻武器也开始批量生产。

现在，人所共知，我们有足够多的确凿情报，说明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在靠近我们边境的地方集结。斯大林和我国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战争

的爆发。我们避免任何轻率的举动，不给敌人的入侵提供口实。我们还迫不得已在远东边境保持强大的掩护部队。

这时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游戏。他用各种手段，甚至通过私人来试探英国的态度：英国政府是否想讲和？英国政府是否让德军放开手脚去进攻苏联？希特勒到底还是决定入侵苏联。于是，德军开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战争。在入侵苏联以后，英国是否还有任何一点讲和的愿望？不管怎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的这种试探是有的。

战争爆发了。

我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飞回了祖国，与誓死捍卫祖国的同志们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国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1941年夏季，前线形势变得极为困难。明斯克陷落了，敌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围困了列宁格勒，攻陷了基辅。

日本出兵的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过任何入侵我国远东地区的有利时机的。但就在快入秋时，新的征兆出现了：日本准备向南进攻，矛头对准了美国。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中，还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证实。日本从背后攻进我远东地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准备向美国开战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这就使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战役最艰难的日子里，有可能从远东抽出部分战斗师来保卫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这里，在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里，决定了我终生的使命。

刚到训练班，不用说，我还不能马上适应制度严格的军队生活。

“起床！”

值班员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声把我们从清晨香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像被开水浇了似地跳了起来。两、三分钟后，学员们列队集合。然后是早操，洗漱，早点名，然后又是集合。不管干什么都要列队进行：去餐厅，上课堂，到野外，去射击场和练兵场，无一例外。

在队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齐。

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锻炼。要使你自已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官和士兵、与

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 15 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进。走 20 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 1 俄磅。但是，大家在行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 年 7 月 2 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呼喊声连成一片，变为愈来愈强烈的轰鸣声。

“列宁同志万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讲台，他举起手，请大家安静。我觉得，他似乎很急没有时间等待这阵喧哗声停下来。大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

他的话里充满信任，似乎这不是伟大领袖开始演讲，而是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就象在忠诚的老朋友中间大声地谈论着人们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是啊！在大厅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赖的忠实的朋友。大概，他的伟大正是表现在这里，他的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人们靠拢他，然后开始平等的谈话。他使人们把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当成自己的崇高责任。在结束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如果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红军能牢牢记住：他们代表着并且捍卫着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话。”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 469—470 页。

当我听列宁讲话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用语言恐怕是难以表达的。我只能说，我用整个身心在听，全神贯注地看，除了列宁，我谁也没看见。他的话象警钟一样在我的耳边回响，它号召我们去建立功勋，去忘我奋斗。由于激动，我感到胸中紧缩、呼吸急促。

列宁在讲话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芬兰时说，一个芬兰老农妇在月台上看见红军战士时说，过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树林里去拾柴火，因为地主派人带枪看守着林子。而现在，世道变了，到树林去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人保护她、帮助她。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束了讲话。他很快离开了讲台，迈步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停了一下，向我们转过身来，笑了笑，挥了挥手。

列宁同志走了，可学员们迟迟没有离开室内运动场。大家回味着列宁的每一句话。记得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辈子不放下手中的枪。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劳动人民……

7月初，我们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营——谢列布里亚内松树林里，我们在这里进行野外作业。严禁请假外出。

7月6日，天还没亮，就响起了战斗警报。学员们立即起床，集合。每人发了60颗子弹。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代表来到军营。训练班政委马斯连尼科夫在队前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他们妄图破坏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暴动者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拘禁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成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设在三圣徒巷。政委马斯连尼科夫说，列宁亲自领导这次镇压暴乱的斗争。瓦采蒂斯同志指挥部队……。政委宣读了列宁同志的命令：训练班和拉脱维亚部队一起占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动。

过了一会，支队在政委带领下向莫斯科进发。我们连队由学员连连长（旧军官安德列耶夫）指挥。我随学员连1排前进。指挥这个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选择了一条通往三圣徒巷最近的路。

我们排配属了1门3英寸口径炮，炮手们用双手推着炮前进。我们采取短距离跃进方式沿着墙边向前运动。接近三圣徒巷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一个横穿街道的学员中弹倒下了。

作为对敌人机枪火力的回答，我们的大炮开火了。一声，两声……，但我没听见第三声。大炮就在跟前，看来我被震聋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外界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同志们手中的枪在颤动，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药的烟雾，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射击。同志们张着嘴向前跑去，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冲锋了。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们的后面。

小巷深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浓烟。这是炮弹在爆炸。烟雾愈来愈大，这说明，不仅是我们排的火炮向这里送来小礼品。大地在脚下颤抖着，愈颤愈烈。火炮向敌人齐射。学员们和拉脱维亚的射手们从左边和右边向毗邻的街上冲去。

当我们跑近敌司令部的大楼时，射击停止了。浓烟由楼房的窗子里滚滚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暴乱者举着双手从大门走了出来。大部分叛乱参加者被拘捕。我们仅仅减员了一个同志。

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样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7月9日，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为死去的战友（很遗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们把他埋葬在万民圣灵墓地。

当我们在哀乐声中一起把棺材放进墓穴时，枪声齐鸣，我们向战友致告别礼。这时，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们冒着机枪火力向叛乱者进攻时的那种紧张情景。

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锻炼一下，学员们——未来的年青指挥员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大家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8月31日夜間，又传来了命令：

“取枪！”

值班员的声调显然在说明，这不是平常的演习警报。

我跳向枪架，抓起我的步枪，放在床位旁，开始穿衣服。

“领子弹！”值班员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们整好队，点了名。然后被分成组，并分别被带开。

我和其他 7 个学员坐上了汽车。我们这个组由两名契卡人员指挥。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司机并排坐，另一个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始后，坐在车厢里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有人谋杀列宁同志。”

我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在哪儿？是谁干的？怎么回事？列宁还活着吗？”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滚，但没敢提出来。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 10 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墅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亚卡驶去。

8 月 31 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

动身去镇压富农暴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战。”“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

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己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 23 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 6 倍多，将近 150 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 200 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23 条枪一起发言了。

钳制住敌机枪火力之后，我们立即腾出些火力射击袭击者。

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经受不住正面和后方交叉火力的打击，狼狈地向草原逃去，战场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伤员。

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近 100 条枪，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 38 个俘虏。

在这时，我才知道，连长负了重伤。团司令部派来了通信员，带来了任何我为连长的命令。“可是还有选举制呢，为此，红军战士该怎么议论？”我沉思着，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处置。但战士们马上提醒了我该怎么办：“指挥这个连吧，给我们下命令吧！”

这时所有的战士都按操典规定的动作转向我，喊了声“连长同志。”就这样，我当上了连长。

一个月以后，召回所有学员到莫斯科参加考试的指示到了。

我们在西韦尔斯旅的这一批指挥员——教官，在返回时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牺牲了。我们大家分散在各个部队，所以在走时我才知道他牺牲的细节。我在旅司令部里听说，雷金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带领自己的排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们排有 14 个人，在撤离时，他们向攻击者回击，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所有人全部阵亡。瓦西里·雷金才 18 岁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第一次考试——在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了最后的一次考试。但是，他用他的荣誉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就象一个红军指挥员所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又回到了列福尔托沃。

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训练班开始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 B·M·斯维尔德洛夫、A·M·科隆泰、C·M·库尔斯基等。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所讲的一切，课后我们经常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久，所有到过前线的人不用考试都得到了《红军军官》证书。同时，我与训练班另外 6 个同志还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前往伏尔加沿岸军区，到喀山去参加第 40 步兵团的组建工作。

出发前，红军军官们被邀请出席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莫斯科市苏维埃、工厂联合委员会和各工会的联合会议。

这一次，我又十分幸运地看见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挺着胸膛，兴高采烈地来到工会大厦。

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会场上静下来，会议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宣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演说。”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说错了，因为现在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谋害的日子并不长。众所周知，列宁被擦过毒药的子弹打伤之后，动了很大的外科手术，因此他应该躺在床上，精心治疗……

但是，他现在竟走上讲台。

礼堂里静了下来，接着，呼喊声象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乌——拉！”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又是“乌拉”！就象是在冲锋，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样，经久不断的胜利的呼声响彻着大厅。

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大厅静下来时，领袖的声音响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危险。他揭露了协约国的计划，揭穿了向白匪军提供武器、弹药以至军服的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卑鄙龌龊的行径。报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讲到了我们这些军人。

“我们知道，”他说：“红军的意识在发生着巨变。红军开始走向胜利。它从自己的人中间提拔了上千名军官，这些军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里学完了课程……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1956 年）第 28 卷第 109 页。

……联合会议还未结束，而我们已经来到喀山火车站，登上了车厢。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前线。途中，伊里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他的话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它使我澄清了糊涂的认识，抛弃了陈腐的观念，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就这样，我告别了莫斯科，来到了东部前线。我准备在这里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正凶恶地扑向我们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而那里生活和工作着伟大的列宁……

1942 年 3 月，我从遥远的中国回到了阔别 20 多年的莫斯科。我发现，莫斯科比起当年显得更加戒备森严，战备组织工作更加有条不紊。虽然在莫斯科战役中德国军队被击溃，并被打退了 100—250 公里，但局势仍然是紧

张的。城市上空飘浮着防空汽球，高射炮严阵以待，城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敌人的炸弹留下的弹坑。人们为祖国的命运忧心忡忡。

我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一再请求：“上前线，上前线。”

这不是我在国内战争初期当红军指挥员时那种年轻人的冲动。现在，我已经 42 岁了，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所以我迫切地希望马上直接参加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能为战胜希特勒匪帮贡献自己的力量。

战争的第 11 个月就要过去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这是希特勒匪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用“闪电战”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了。德国失去了一批最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坦克兵和飞行员。希特勒的战略家们被迫受了持久战的事实。

同样，苏联也需要时间来组建和训练新的战略预备队，这项工作是 1942 年春天开始的。短期内组建新的战略预备队困难重重。在被敌人暂时占领的国土上，1941 年曾居住着全国 40% 的人口，并且有数千个能为红军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武器弹药的工业企业。但是，此时已疏散到大后方的工厂不仅能弥补损失了的生产能力，而且大大超过了原有的水平。

由于苏联人民的忘我劳动，1942 年上半年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获得很大增长：步枪和卡宾枪的生产由 1941 年下半年的 1,567,141 枝增长到 1942 年上半年的 1,943,397 枝，120 毫米迫击炮由 2,315 门增长到 10,046 门，各种类型坦克由 4849 辆增长到 11,178 辆，战斗机由 8,200 架增长到 8,268 架。

从 1942 年 5 月起，各个方面军开始组建空军集团军。这是符合战争需要的。最高统帅部掌握着由混成坦克集团军和坦克军组成的预备队，并根据需要，用它们去加强在主要方向作战的方面军。

对于 1942 年夏天在苏德战场出现的局势，我们的盟国——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持何种态度呢？他们是怎样履行自己的同盟国义务呢？

当法西斯集团把 80% 的武装力量投入到苏德战场时，英、美两国的军事领导人却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不紧不慢地调遣自己的军队到其他次要的战场上，不慌不忙地安排这些部队的战斗行动。到 1942 年夏季，英、美两国的军队人数已达 1,000 万以上。他们拥有众多的装甲坦克部队、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一再要求同盟国在欧洲战区开辟第二战场。

英、美两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曾保证要在 1942 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这些许诺只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做做样子，首先是为了安抚强烈要求尽快给苏联以积极援助的美、英两国人民。因为同盟国知道，一个个新锐师正从德国本土和被它占领的西欧国家源源不断地调往苏德战场。凯特尔上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 1942 年 5 月 1 日，东线共缺少 31 万 8 千人。计划在 5 月份给东线军队补充 24 万人。从 5 月到 9 月期间，由年轻的新兵组成的预备队人数可达 96 万。此后，在 9 月份，不会有任何兵源补充。”为了弥补在苏德战场的损失，希特勒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把 18 岁至 45 岁的所有德国人都征入军队，甚至开始从 46—55 岁这个年龄组里征兵。

苏德战场不仅迫使敌人不断补充兵员，而且迫使他们扩大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生产。1942 年与 1941 年相比，坦克、自行火炮、强击炮的生

产从 3,806 辆 (门) 增长到 6,189 辆 (门); 迫击炮从 4,230 门增长到 9,780 门; 战斗机从 9,540 架增长到 11,408 架; 攻击机从 3,660 架增长到 6,000 架。

此外, 尽管美国与希特勒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美国垄断集团仍然继续向德国供应战略原料。甚至在 1942 年, 德国还通过西班牙从美国进口了 40.6 万吨粮食、22.7 万吨煤和焦炭、17 万吨燃料和 1500 吨橡胶。所有这些做法, 加上我们的同盟国的消极态度, 使法西斯集团得以在 1942 年春季调集 600 多万军队、近 5.7 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 千多辆坦克和近 3500 架战斗机, 用于对苏作战。兵力雄厚, 从数量上已超过希特勒开始发动侵苏战争时的水平。

诚然, 这次的进攻地带狭窄。实施新的打击的全部力量都集结在战线南翼, 然后逐步向北扩展。

希特勒开始进军高加索, 目的是夺取石油产地, 推进到伊朗边界, 打到伏尔加河畔。看来, 他认为苏联边远地区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

我的任务不是描写 1942 年春季战场上的全部事件, 但是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 我不能不粗略地剖析一下德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 因为这样可以使读者对伏尔加河地区发生各个事件的意义进行评价。

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 1942 年 4 月 5 日发布的第 41

号训令, 说明了希特勒政治领导集团和军事当局的意图, 而在 7 月发布的第 44 号和第 45 号训令中, 又对这些意图作了具体的说明。

让我们看一看第 41 号训令。

它开始这样说: “在俄国, 冬季战局即将结束。由于我东线士兵英勇善战和富于牺牲精神, 我们的防御行动获得了巨大胜利。敌人的兵力和技术装备损失惨重。为了急于利用臆想的初期的胜利, 他们在这个冬季消耗了大量的预备队。”

我们看到, 德国统帅部在自己的分析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 并试图把自己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描绘成军事上的胜利。希特勒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而把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

由此产生了这个文件中规定的目的。

训令中写道: “目的是彻底消灭苏军残存力量, 尽可能夺取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

……首先要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在战线南段实施主要战役, 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 以便进而夺取高加索石油产地, 并穿越高加索山脉。”

敌人突击刻赤地区, 攻打塞瓦斯托波尔。希特勒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 完全占领了克里木, 为进攻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做好了翼侧准备。

尽管敌人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但这个城市在 7 月初以前一直在我们手中。

1942 年 5 月 12 日, 西南方面军转入进攻, 从两个方向实施向心突击, 一个从巴尔文科夫突出部实施, 从西南绕过哈尔科夫, 另一个是辅助突击, 从沃耳易斯克地区实施。

有关这次进攻中的重大事件, 在历史著作和著名苏联军事家的回忆录中已有许多评论。

我无须赘述, 也无须加以评论。众所周知, 这次进攻我军以惨痛失败告终。希特勒对伏尔加河地区、沃罗涅日和高加索的进攻蓄谋已久。德军冲

破了我军防线，并进一步向纵深扩展。

德军统帅部充分利用了当时出现的这一有利态势。德国将军库尔特·蒂佩尔斯希写道：“俄国人企图破坏德军预定的进攻，结果却适得其反。俄国人防御力量的削弱使我军第一战役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德军各集团军还是用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补充准备，调整兵力配置，补充一切必需品，然后才开始进攻。” 6月底，德军统帅部完成了进攻准备。

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1956年版，第232页。

现在我们知道，在苏德战场南翼，大概从奥廖尔至塞瓦斯托波尔，是德军“南方”集团军群。

它又分为“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

这两个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消灭顿河以西的苏联军队。

“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合围顿河以西的苏联军队，并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A”集团军群会师。“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前出至斯大林格勒……，使顺顿河而下实施突击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地域与从塔甘罗格、阿尔乔莫夫斯克地域进攻的部队会合。”第41号训令这样写道。

初期，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配置如下：

威廉·利斯特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群辖德军坦克第1集团军、野战第17和第11集团军以及意大利第8集团军。

冯·博克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群辖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野战第2和第6集团军以及匈牙利第2集团军。此外，还有正从后方开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敌人在飞机和火炮上占有优势，能够大大加强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力量。

6月28日晨，德军野战第2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和

匈牙利第2集团军对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发起进攻。

6月30日，第6集团军开始突击。

斯大林格勒还很遥远，德军首先扑向沃罗涅日。1942年的战事开始了，并逐渐地把越来越多的军队卷入了这场血战。

1942年5月，我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后备军的副司令员。司令员还没任命，因此，指挥部队的责任落在我身上。

7月初，统帅部命令将我后备军改称第64集团军，并将我集团军部署在顿河地区。当时我西南方面军在德军打击下正向东疾退。我集团军的任务是：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某一地域接敌。集团军所属部队迅速登上军用列车，向位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集结地进发。

在到达巴拉绍夫之前，我一直和集团军司令部一起乘车前进。此后，为了便于和前线来的人交谈，尽快弄清前线的形势，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换乘了小汽车。我们的汽车很快超过了火车。

德军轰炸机不断轰炸火车站和运行中的列车。我们在各大站都停车，了解我集团军所乘列车的运行情况。

在伏罗洛沃车站，我们遇上第21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参谋长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前线形势，但我们从他那里弄清楚的唯一情况是，方面军

司令部已退至伏尔加河，现设在斯大林格勒城内。

我们的汽车穿过一个个村镇。我们看到，当地居民对敌人的到来丝毫没有准备，他们相信敌人的进攻会被我军阻止。因此谁也没有做疏散准备。在城镇、车站的电影院里仍在放映电影。只有在夜间，这种和平景象才被我的射击敌机的稀疏零落的高射炮声所打破。

1942年7月16日，我们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我们在那儿得知，敌侦察队和先遣支队已进入切尔内舍夫斯卡亚——莫罗佐夫斯克地界。次日，我第62集团军先头部队就在这里与敌人遭遇，并阻止了敌人继续前进。

第62集团军准备在顿河右岸的克列茨卡亚、卡耳梅科夫，苏罗维基诺、佩谢尔斯卡亚、苏沃洛夫斯基一线组织防御。司令部设在顿河左岸的卡梅什村，距部部队60—80公里。

这一天，第64集团军各部队分别在几个车站下车，第112师在科特卢班、卡查里诺和菲洛诺沃车站，第214师在顿斯卡亚、木兹加和雷奇科夫车站，第29师在茹托沃车站。其他部队还在伏尔加河岸边，离方面军司令部指定的防御地区还相距120—150公里。

7月17日，我们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第64集团军所辖步兵第229、第214、第29和第112师，海军陆战第66和第154旅，坦克第40和第137旅，应于18日夜间前出至苏罗维基诺、下索洛诺夫斯基、佩谢尔斯基、苏沃洛夫斯基、波格金斯卡亚、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要立即就地构筑工事，要以顽强的防御阻止敌人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破。各师应以一个团的兵力为先遣部队，配以炮兵，配置在齐姆拉河一线……”

训令中规定的任务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各师和集团军各直属部队刚下火车，正在向西方、向顿河方向前进。各部队还没有排成战斗纵队，而是按照乘火车时形成的队形前进。

有几个师的头部已接近顿河，而尾部却还在伏尔加河岸边，甚至还在火车车厢里。集团军的后勤部队和辎重还都在图拉地区等待上车。

刚下火车的集团军部队不仅需要集合整队，而且要渡过顿河，徒步行军120—150公里。预定前往齐姆拉河的先遣支队的路程比集团军的主要防御地区还要远40—50公里。

我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上校，向他说明了不可能按期执行训令的理由，并请他报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第64集团军不可能早于7月23日占领防御地区。

占领防御地区的日期从7月19日改为21日。

但到7月21日，第64集团军各部仍未能占领指定的防线。

部队下车后就在草原上向西方、向顿河方向行进。我乘车来到了第62集团军司令部。

第62集团军司令员B·B·科尔帕克奇少将，身材高大匀称，他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眉毛又黑又浓、剃着光头的师级政委K·A·古罗夫向我介绍了情况。

方面军司令部选定沿克茨卡亚、苏罗维基诺、上索洛诺夫斯基，苏沃洛夫斯基、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为第62集团军第64集团军的防御地带。由加强营或加强团组成的各先遣支队，要前出至楚茨坎河、奇尔河、切尔内什科夫斯基和齐姆拉河一线。

我军的一切条令和教范都规定，防御者首先要了解敌人和判断选定战

场，将部队部署在最有利的位置上。防御者总是要依赖有利的地形，它应该能使防御者在有利的条件下实施反突击，发扬火力和在必要时隐蔽自己。

同时，地形应该尽可能阻挠进攻者的运动和减弱它的机动能力，在有工程保障时应能阻止敌坦克的前进，使进攻者没有隐蔽的接近路，尽量延长其暴露在防御火力之下的时间。

第 62 集团军的防线不符合这些要求。我们没有来得及利用河流沟谷这些天然屏障，其实，只要在这些地方稍微构筑些工事，它就可以变成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我军阵地却处在光秃秃的草原上，无论从地面或从空中都极易观察到。在各防御分队、部队之间有许多空隙，特别是在右翼。这些空隙使敌人有可能包围我防御阵地，穿过它直抵我防御后方。

顿河以西的防线拉得过长，第 62 集团军第 1 梯队的 4 个师的防线长达 90 公里，第 64 集团军的 2 个师和 1 个旅的防线长达 50 公里。特别是在防线右翼的步兵第 192 师拉得最长。第 1 梯队各师的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先遣支队被部署在远离主力达 40—50 公里的地方，即无炮兵掩护，又无空军支援。这一切使得主要防御地带的力量大大削弱，使第 2 梯队和第 1 梯队的预备队被缩减到最低程度。

但是，在第 62 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的情绪却是高昂的。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少将告诉我，近日他将试探一下当面敌人的实力。

我和右邻部队建立了联系。但我对左邻部队却一无所知。我仅知道在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地图上曾标出那条防区分界线。

遵照方面军的训令，第 64 集团军向西运动，渡过顿河。

B·H·戈尔多夫将被任命为我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为他还未到任，所以我必须决定如何组织防御。

在熟悉了情况，分析比较了第 62 集团军各部所搜集到的有关敌人的情报后，我根据方面军 7 月 17 日的训令决定：步兵第 229、214 师、海军陆战第 154 旅及坦克第 121 旅占领顿河右岸从苏罗维基诺至苏沃洛夫斯卡亚镇一线，防线左段（从波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斯卡亚）由第 29 师防守；第二梯队的步兵第 112 师部队署在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奇尔河一带；海军陆战第 66 旅、坦克第 137 旅和各学员团作为第二梯队集结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居民区。

7 月 19 日晚，B·H·戈尔多夫将军带着就任第 64 集团军司令的书面命令来到了第 64 集团军司令部。当时，司令部设在伊利缅——奇尔斯基村。我继续任副司令员。这位中将的头发已经花白，灰色的眼睛显得十分疲惫。

戈尔多夫看了我的各项决定，他对第一梯队的配置未作任何重大的修改，批准并命令执行。但是，对于集团军第二梯队的配置，他作了重大的改动。他命令不要把步兵第 112 师摆在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而把它拉开布署在斯大林格勒防线的外围，即沿梅什科夫河，从洛哥夫斯基村到格罗莫斯拉夫基村；把海军陆战第 66 旅、坦克第 137 旅和各军校学员团调到阿克塞河地区，即集团军的左翼。

戈尔多夫将军的这一决定集团军的全部预备队都留在顿河左岸，使第 64 集团军在顿河以西形成的防御失去了第二梯队和预备队。

7 月 21 日晨，我来到顿河以西的防御地区，用 21 日和 22 日两天时间与各位师长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当时部队还正在从火车站到阵地的路上，迟迟未能到达，而且各师团均不满足。

第 64 集团军各部队各兵团这些天抵达防御地区的情况，敌人无疑是清楚的。他们“容克”侦察机长时间地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我们对其束手策，因为集团军没有高炮部队，而方面军空军集团军的歼击机正用于战线的其他地段。

一般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于 1942 年 7 月 17 日，那天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开始与敌交火。但他们的顽强抵抗只持续到 7 月 19 日。德军摧毁了他们的防线。成群地涌进了顿河的大弯曲部。

现在我们手中有一份文件，就是这份文件规定了当时德军的这次新的突击的目的。这就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第 45 号训令，希特勒在这个训令中对第 41 号训令做了某些修改。

第 41 号训令提出：

“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打到斯大林格勒，或者至少应把它置于我重炮火力之下，要使它失去作为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意义。”

1942 年 7 月 23 日发布的最高统帅部第 45 号训令中写道：

“‘A’集团军群的近期任务是：合围并消灭已渡过顿河、现在罗斯托夫以南和东南地域的敌军……

‘B’集团军群的任务同原先规定的一样：在构筑顿河防御阵地同时，向斯大林格勒实施突击，粉碎集结在那里的敌军集团，占领该城，同时切断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狭窄地带，破坏河上的运输。”

希特勒急于进军高加索，低估了我新锐集团军出现在顿河大弯曲部的意义。他命令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穿过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到该集团军右翼的齐姆良斯卡亚镇，编入“ A”集团军群。

为夺取斯大林格勒，从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编成内抽出部队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

北集团由坦克第 14 军和步兵第 8 军组成。该集团的任务是：在 7 月 23 日从哥洛夫斯基和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发起进攻，然后沿顿河右岸向上布济诺夫卡和小纳巴托夫斯基方向进军，攻占卡拉奇。

南集团由步兵第 51 军和坦克第 24 军组成。该集团的任务是：在 7 月 25 日从奥勃利夫斯卡亚和上阿克谢诺夫斯基地域发动进攻后，应从苏罗维基诺以南突破防线，然后取道旧马克西莫夫斯基，从南面逼进卡拉奇。

由第 6 集团军编成的这两个集团的任务是：合围并歼灭在顿河大弯曲部的苏军主力，强渡顿河，进攻斯大林格勒。

此外，由坦克第 4 集团军的 2 个步兵师，1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和 4 个罗马尼亚步兵师组成的第 3 集团的任务是：在 7 月 30 日强渡顿河，夺取登陆场，继而沿科捷尔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从南面和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或是向南，进攻高加索。

分析这种态势可以看出，德军，特别是它的南集团的积极行动是针对我第 62、第 64 集团军仓促组织好的防御地区的。正如我已指出的，敌人通过不断空中侦察，必定已发现我正在到来的部队，观察到我军的展开和部队的防御作业，也就是说，敌人对我第 62、第 64 集团军防御地段上的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

对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战役，它将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对于这个战役的战略和战术的轮廓我们更是无从猜测。

我们只是解决自己防御地段的最紧迫的问题。

在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初次交战之前，我感到自己还缺乏与这样强大而狡猾的敌人作战的经验，必须首先研究他们的战术，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我和许多经过战阵的指挥员进行过交谈，我努力多下部队，向有经验的指挥员学习，也学习红军战士们的经验。

7月22日，我回到集团军司令部时得知，戈尔多夫在前一天被召到莫斯科，次日回来时已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第64集团军司令部接到方面军的命令。命令要求海军陆战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沿顿河右岸向齐姆良斯卡亚镇运动。它们的任务是：攻击敌翼侧和后方，消灭正在那里横渡顿河的敌军集团。按照戈尔多夫的命令，这支部队应于7月22日夜间接在苏沃罗夫斯基镇。

但是，由于下奇尔斯卡亚附近的桥承受不住坦克的重量，坦克第137旅的重型和中型坦克未能渡过顿河。该旅只派出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和15辆T—60坦克参加这一行动。

后来得知，前出至齐姆良斯卡亚地区的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敌军集团。但是，很遗憾，方面军司令部签署上述命令时，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

我对这种分散兵力的决定提出了异议，但是B·H·戈尔多夫没有取消已发出的命令。

我只得乘Y—2飞机飞往苏沃罗夫斯基去监督命令的执行。

7月23日10时，部队向苏沃罗夫斯基镇进发。在回来的路上，我决定沿集团军前线飞行，以便从空中查看我军阵地。

在苏罗维基诺东南上空，我机与一架德军D—88飞机遭遇。敌机做了一个战斗转弯，就向我们冲击。

我们的Y—2飞机没有装备武器，而敌D—88飞机装备有火炮和机枪。一场猫和老鼠的战斗开始了。

德国空中强盗近十次向我发动攻击。我们的飞机看来马上就要被敌机的炮火击碎。下面是空旷的草原，着陆就会变成固定的靶子，立刻被敌机击中。

我们的飞行员根据太阳确定好方位，急急地向东飞去，希望能找到一个小村庄或一片小树林，以便暂时摆脱敌机。但草原上是一片空旷……记不清是在敌机的第几次攻击之后，我们的飞机坠落到地面，折成两截。

在飞机坠落之前，飞行员巧妙地操纵了一下飞机，所以，坠地后我和飞行员都比较平安。我们只是被抛出了座舱。我的前额上碰了一个大疱，胸部和脊椎被摔得生痛，飞行员的双膝被碰得青紫。

敌机驾驶员见我们的飞机在冒烟，大概以为我们已经完蛋了。他在空中兜了个圈，就向西飞去，消逝在地平线上。

过了不久，第62集团军作战处参谋A·A·谢米科夫大尉，在草原上打扫战场时，遇到了我们，用汽车把我们送出了危险地带。谢米科夫大尉后来成为苏联英雄。

……此时，我第62集团军右翼已同敌人最强大的北集团展开了顽强的战斗。敌人是在7月22日日终时推进到我第62集团军主要防御地带的。

第62集团军防线右翼，在克列茨卡亚、叶夫斯特拉托夫斯基和卡耳梅科夫地域的防线已被突破。敌人投入了新锐部队之后，开始向马诺伊林、马约罗夫斯基突击，并取道普拉托诺夫向上布济诺夫卡突击。24日日终时，敌摩托化第3、第60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在戈易宾斯卡亚地区和斯克沃林

地区出现在顿河边上。

鉴于这种形势，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 B·B·科尔帕克奇于 7 月 24 日凌晨 5 时决定，以坦克第 13 军和近卫步兵第 33 师的力量实施反突击，恢复近卫步兵第 33 师防御地带的原有态势，进而恢复集团军整个右翼的原有态势。实施反突击的时间定在上午 10 时。准备时间只有 5 个小时。

这是抗击数倍于己之敌的英雄壮举。

近卫步兵第 33 师的近卫步兵第 84 团的 4 名防坦克枪手的战绩轰动了整个方面军。他们是：彼得·博洛托、格里戈里·萨莫伊洛夫、亚历山大·别利科夫和伊万·阿列伊尼科夫。

这四位英雄在克列茨卡亚以南占据了一个山岗，挖好了工事隐蔽起来，他们把自己安顿得很舒服。几个朋友愉快地交谈着。

“干粮，这谁都知道，没有它也能活，”彼得·博洛托掂着手中沉重的背囊说：“可要是没有供应我们大炮和手榴弹，我们准得玩儿完啦……”“灰尘！”这两个字就如同是准备战斗的命令，八只眼睛一齐向前方望去，数着慢慢爬来的坦克。

“30 辆”，别利科夫最先数完，说：“每个弟兄分 7 辆，还剩两辆大家一起打。”敌坦克拉开队形准备进攻。爬在前面的是 1 辆 T—3 中型坦克，它的两侧各有 1 辆 T—4 坦克，跟在后面的是一群 T—2 轻型坦克。身穿黑色军服的坦克兵大概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战士和战壕，他们打开坦克上盖，身子探在外面。彼得·博洛托清楚地看到了描画着白边的十字，他瞄准坦克的了望孔，勾动了防坦克枪的扳机。1 辆 T—3 坦克冒烟了，开始减速，最后停了下来。敌人打开舱盖，纷纷往外爬。

接着，亚历山大·别利科夫向 1 辆 T—2 坦克开了第二炮，坦克立刻中弹起火。大概，反坦克枪发射出的带钢心的穿甲燃烧弹击中了坦克油箱。几秒钟之后，博洛托和别利科夫又精心瞄准，分别向两辆 T—4 坦克开火。他们没有数开了几枪，但最终两辆坦克都趴在地上燃烧起来。就这样，他们一直打到黄昏。敌人停止进攻，退了回去。山岗附近留下了 15 辆燃烧着的坦克。

四位英雄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一场战斗。而他们建立这样的英雄的功勋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时，第 64 集团军的部队虽然占领了方面军司令部指定的防御地区，但还有些部队未能到达。H·A·比留科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 214 和 A·M·斯米尔诺夫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第 154 旅的情况稍微好些。这两支部队已集结完毕，并赢得了近三昼夜的时间来组织防御。

E·E·萨任上校的步兵第 229 师还正在向防御地区靠近。

我估计，按照方面军的命令从苏沃罗夫斯基向齐姆良斯卡亚运动的海军陆战第 66 旅和坦克第 137 旅，遭到了敌人的翼侧突击。

当我得知第 62 集团军正面的敌人转入进攻之后，我强烈地请求方面军司令员把这两个旅撤回到原来的阵地。戈尔多夫接受了我的建议。7 月 24 日 17 时，这两个旅被调回下奇尔斯卡亚。

同时，我决定把 A·F·索洛古布上校的步兵第 112 师也调到顿河右岸，在奇尔河下游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设防。这一决定立即得到方面军司令员的同意。

根据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 B·B·科尔帕克奇将军的决定，坦克第 13 军（约

150 辆坦克）近卫第 33 师的一个近卫步兵团和一个坦克营在三个炮兵团的支援下，于 7 月 24 日实施反突击。但这一行动未能获得积极的结果。反突击失利的原因是：刚刚组建的坦克第 13 军的战斗动作不协调；没有时间组织与其他部队和空军的协同动作。

而敌人则利用自己在飞机和坦克方面的优势，在 7 月 24 日，继续加强攻势。敌坦克第 16 师和步兵第 113 师突入卡查林斯卡亚地域，推进到科斯卡河。

日终时，敌以摩托化第 3 师和第 60 师的兵力，摧毁了位于上布济诺夫卡地域的我步兵第 184、第 192 师师部。敌人进至戈卢宾斯基和小纳巴托夫斯基地域后，对我第 62 集团军右翼部队构成了合围的态势。

这时，方面军司令部已积蓄了相当的兵力。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已经到达。组建了坦克第 1 和第 4 集团军。步兵第 126、第 204、第 205、第 321、第 399、第 422 师，以及其他兵团和加强部队也相继到达。

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命令我们，不仅要遏止敌人的进攻，而且要把他们赶过奇尔河。

1942 年 7 月 25 日，我在卫国战争中第一次参加了战斗。

敌人以两个步兵师和 1 个坦克师的兵力主攻我右翼的步兵第 229 师。该师防御正面近 15 公里，却只有 5 个营的兵力。另外 4 个营还在路上，在这个师的战斗队形和纵深，部署着坦克第 21 旅，该旅有 5 辆 KB 重型坦克、9 辆 T—34 坦克和 20 辆 T—60 坦克。

凌晨，战斗打响了。

开始，敌一个步兵师在坦克配合下向我步兵第 229 师中部——第 783 团发动进攻。

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我军各营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步兵和坦克的多次进攻，击毁敌坦克 9 辆，仅在第 783 团防御地段就打死近 600 名德国士兵。

当天下午，敌人楔入我防御阵地，抵达 155，0 高地，并攻占了第 79 国营农场。这时，位于 155，0 高地附近的师指挥所，受到德军冲锋枪手的攻击。师长被迫迅速撤离，这样便与步兵第 783 团和步兵第 804 团 2 营失去了联系。师部派了一名军官乘坦克与这两支部队联系，但却不见回音。估计这个军官牺牲了。

1942 年 7 月 25 日，我的第一个战斗日就这样结束了。我没能加强步兵第 229 师，因为所有的预备队都在顿河以东。

7 月 26 日凌晨 5 时，敌步兵和坦克在炮火准备和空袭之后，又发起了冲锋。我从自己的观察所（位于下奇尔斯卡亚西北 10 公里处）看到，80 多辆德军坦克在大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冲击。主要的目标是步兵第 783 团各分队的驻守地——牛奶场。

我看到，德军坦克在空军掩护下突入我军战斗队形。一群德军坦克与我 KB 型坦克相遇。展开了激战。我军的重型坦克顶住了敌人的冲击。但是，T—60 轻型坦克损失很大，纷纷沿山谷撤退。

不久，步兵第 783 团团团长牺牲，政委负伤，该团开始向东撤退。

师长立即把第 804 团的两个刚刚到达的营投入战斗，试图阻止敌人进攻，但为时已晚。

这两个营遭到敌坦克炮火的杀伤，停止了前进。几小时之后，他们又

受到敌步兵和坦克的攻击。由于没有来得及挖战壕躲避，他们顶不住敌人的攻击，放弃了 161 和 156 两个高地，向位于奇尔河右岸的萨文斯基村退却，以掩护第 62 集团军的翼侧。

我近卫迫击炮兵对集结在这一地段上的德军部队猛烈轰击，第 214 师炮兵也使敌人受到重创。但敌人不顾伤亡，继续向前猛冲。中午，敌人把两个坦克群投入了战斗。其中一群约 40 辆坦克，追击我正向奇尔河岸撤退的两个营，另一群坦克冲向下奇尔斯卡亚。

下午得知，我右翼的步兵第 229 师的防线被突破。敌人正冲向奇尔河，也就是说，敌人正向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推进。我集团军在顿河右岸没有预备队。原先从米纳耶夫地区向齐姆良斯卡亚运动的海军陆战第 66 旅和坦克第 137 旅一部，虽已被我调回，正向下奇尔斯卡亚前进，但徒劳无益的行军使部队十分疲惫，行动更加迟缓，坦克燃料也将耗尽。

为了肃清突入的敌人，特别是为了保住第 64 和第 62 集团军的接合部，我当即做出如下决定：命令经过夜行军之后正在洛哥夫斯基村一带休整的步兵第 112 师和坦克第 137 旅的 10 辆 KB 坦克火速渡过顿河铁路桥。他们的任务是：占据从旧马克西莫夫斯基沿奇尔河至它的河口的防御地区，固守在有利阵地上。必须迅速可靠地保护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制止敌人向第 62 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这次行动很顺利。7 月 26 日晚，步兵第 112 师成功地渡过了顿河，抵达雷奇科夫斯基——旧马克西莫夫斯基铁路沿线，并在那里与步兵第 229 师建立了联系。我们还把海军陆战第 66 旅的一部连同个炮兵营调到下奇尔斯卡亚西北方向，作为步兵第 229 师的第二梯队。但坦克第 137 旅的轻型坦克，由于没有燃料，未能抵达下奇尔斯卡亚。我们不得不从顿河左岸为这些坦克调运燃料。由于坦克未到，我又从海军陆战第 66 旅中调出几个步兵营和炮兵营去保护步兵第 214 和第 299 师的接合部。不久，他们就遭到了敌机的攻击，接着德军坦克又向他们冲击。水兵们隐蔽下来，开始阻击敌人的冲击。

这时，最危险的是下奇尔斯卡亚方向。敌军坦克已逼近下奇尔斯卡亚，企图同时夺取顿河渡口和奇尔河渡口。我集团军没有反坦克武器，而坦克第 137 旅的轻型坦克，由于没有燃料仍无法开动。

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海军陆战第 66 旅的一个炮兵营。他们的炮是用骡马牵引的。虽然马匹已经十分疲惫，但火炮终究还可以移动。

这个炮兵营迅速把 3 个炮兵连在两公里左右的防线上展开。一连长 C·G·达特里耶夫中尉和三连长 C·G·达特里耶夫中尉是亲兄弟，二连长是罗日科夫中尉。各连刚把火炮在暴露发射阵地上摆开，还没有来得及掘好战壕，敌人的坦克就出现了。炮兵营的水手们并不惊慌，立即投入战斗。大约 25 辆坦克在距我炮兵发射阵地 1.5—2 公里的地方展开队形，胡乱地射击起来。

炮兵营代理营长 C·G·达特里耶夫中尉向各连长发出命令：“各就各位！”各连长迅速站在火炮旁，准备直接瞄准射击。敌坦克开始加强火力，而我炮兵依然沉默。他们冷静、沉着地让坦克爬到 400—600 米处，突然向它们猛烈开火。两辆坦克在原地打起圈来，冒烟了。坦克和炮兵开始了拼死的决战。敌坦克不顾损失，仍继续向前爬进，在进行间向我射击。但它们相继燃烧了起来。战场上烟雾弥漫。这次决斗条件是不公平的：德国坦克兵有装甲保护，又是在运动中；而我们的炮兵却是在暴露的阵地上。但我们的战士没有胆怯，

勇敢地战斗着，炮手受伤了，牺牲了，立即有侦察员和通讯员上来顶替。其他侦察员们奉命准备着反坦克手榴弹和燃烧瓶。

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一小时。我们的炮手们在精神上压倒了敌人。他们丢下 12 辆被击毁的坦克，滚了回去。直到夜晚，敌军坦克和步兵再也不敢靠近下奇尔斯卡亚。敌人误认为我炮兵和海军陆战队的顽强抵抗完全是准备好的防御。为了摧毁我军在这个防御地段上的抵抗，敌人又派飞机来轰炸我军阵地。敌机以每 20—25 架为一个梯队，反复轰炸我军战斗队形，轰炸我军后方以及顿河、奇尔河渡口。

我要特别表扬海军陆战第 66 旅的炮兵战士们所建立的功勋。是他们击退了敌军强大的坦克群对下奇尔斯卡亚镇和这一地区渡口的进攻。如果敌军在 26 日白天夺取下奇尔斯卡亚，他们就可以在当天渡过奇尔河，并先于我步兵第 112 师抵达旧马克西莫夫斯基、奇尔火车站和雷奇科夫斯基地区，从南面一举逼近我第 62 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

本来，我们是可以阻止敌军前进，不让他们抵近顿河和奇尔河，并封闭已经出现的突破口。但不知谁通知在顿河、奇尔河右岸的我后勤各分队说，德军坦克已逼近到 2—3 公里远的地方。于是许多人都涌向渡口。

要立即阻止涌向渡口的人流和车队。我派炮兵少将 B·A·布劳德带着我身边的参谋们到渡口去。但已经来不及了。敌机已经发现渡口处拥挤着人员和汽车，开始向渡口猛烈轰炸。

在这次轰炸中，牺牲的有劳德将军、作战处长 T·M·西多林中校、集团军工程勤务处长布里洛夫上校和集团军司令部的其他军官。

傍晚，下奇尔斯卡亚附近的顿河桥被敌机炸毁。这样，留在顿河右岸的第 64 集团军步兵第 214 和两个海军陆战旅失去了渡河点。这时，集团军参谋长 H·A·诺维科夫上校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 H·H·阿布拉莫夫，正在位于伊利缅——奇尔斯基的集团军主要指挥所里，他们过于主动，未经我同意（我当时还在下奇尔斯卡亚），就通过无线电台向步兵第 214 师、两个海军陆战旅以及坦克第 137 旅发出了撤到顿河左岸的命令。我是在 7 月 26 日夜间，回到集团军司令部时，才得知这一情况的。想到夜间在河面上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已没有一个渡口可以使用了。

要停止渡河，要立即在右岸组织防御，把两翼支撑在岸边。为了把这个决定通知部队，我们动用了所有的通讯器材。我说不清是哪些通讯器帮助了我们，使部队收到了命令，在向顿河左岸撤退时多少有点组织，在渡河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渡河极其困难。敌步兵第 71 师从正面进攻我军，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渡河器材。

H·A·比留科夫将军指挥的第 214 师的一个团担任渡河掩护任务。H·A·比留科夫和师政委 A·E·索鲍利，在组织该师撤退时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勇敢精神。步兵第 214 师和集团军的其他兵团渡过顿河后，立即沿顿河左岸组织好防御。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在 7 月 27 日傍晚，第 64 集团军整个防线上的突破口都已被封闭。虽然敌人冲破了第 64 集团军的第 1 条防线，但他们未能发展攻势，被迫停止奇尔河和顿河边上。

敌人从下奇尔斯卡亚地区直接突击斯大林格勒的危险已被消除。敌人也没能从南面打到卡奇附近的各渡口。

三天的战斗，时间并不长，但对我这个刚到最前线不久的人来说，这短短的三天在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第 64 集团军的右翼部队被迫后撤了，但初战失利没有使我们失去斗志。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不可一世的德国将军们会成为红军战士手下的败将。

敌人的得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发起进攻时，我集团军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战斗队形。假如我们有哪怕是两、三天的时间来组织防御；按团、营展开战斗队形，修好战壕掩体；组织好火力协同和通讯联络；补充弹药；组织好后勤供应，那么敌人就决不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我第 64 集团军的防御。

在德军对我步兵第 229 师防御地段实施炮火准备时，我注意到了他们的战术弱点：他们的火炮和迫击炮射点散乱，并且只是射击前沿而不往纵深射击；在战斗中也缺少广泛的火力机动。

在 M·B·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几年里，我曾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西部战线的许多战役。我了解德国将军们对于炮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的看法（比如伯恩哈德的思想）。因此，在顿河地区作战的最初几天，我以为敌军炮兵会表演出正统的协同动作：精确的徐进弹幕射击，快似闪电般的火力机动和火炮机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看到，敌军炮兵还是使用老方法，慢慢地啃着一条一条的堑壕。

假如当时我们有更深的防御纵深配置，不是 5 个营，而是全部 9 个营，再加上反坦克预备队，我们就不仅可以遏制敌军的进攻，而且可以大量杀伤敌人。

德军坦克没有步兵的配合和空军的支援是不敢冲锋的。外国报纸经常宣扬德军坦克兵如何英勇果敢、动作迅猛、可这次在战场上，看不到这些特点。

德军步兵的优势在于，他们的冲锋枪性能好、火力强。可是，我没有见到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迅速的运动和果敢的出击。德军步兵进攻时是不惜子弹的，但经常是盲目射击。

7 月 27 日，当我第 112 师的一个团向新马克西莫夫斯基村实施反突击时，敌军步兵根本没有迎战就撤退了。只是在次日，7 月 28 日，当敌坦克部队赶到后，敌步兵才又来夺取前一天未经战斗就放弃的阵地。

德军的阵地前沿极易观察，特别在夜间，因为它的上空飞着许多曳光弹和各种颜色的信号弹。敌人似乎害怕黑暗，也可能不打枪他们就感到寂寞。

敌人的机动极易监视，因为他们的车队在草原上行驶时总是开着大灯。

战斗中，敌人的空军战斗能力发挥得最好，敌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联系、协同动作都组织得很严谨。可以感觉到，德军飞行员对德军和我军地面部队的战术都是熟悉的。

只要敌步兵受到我炮兵或机枪火力的压制，德军飞机很快就会赶来。俯冲轰炸机排成环形编队，轮番轰炸我军战斗队形和炮兵阵地。

以上是我研究敌军战术的初步结论。观察敌人，研究他们的长处和短处。熟悉他们的习惯，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从 7 月 26 日至 7 月底，我集团军的战斗行动主要集中在右翼，即大奥西诺夫卡、叶里茨基、上奇尔斯卡亚地区。敌人极力想从这一带突破我第 229 师和第 112 师的战斗队形，然后向东北方向突击，绕到第 62 集团军的后方，

直逼洛哥夫斯基和卡拉奇地区的顿河各渡口。

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雷奇科夫斯基铁路会让站以北的一个高地的观察所里，与第 229 师师长和第 112 师师长保持着直接联系，并通过集团军司令部与其他部队保持着联系。

战斗成胶着状态，双方各有胜负。有几天，德国陆军第 51 军的部队，在坦克的加强下向我实施攻击。有几天，同时有近百辆坦克向我进攻，而我军在这里仅有 10 辆坦克。但是，我们的部队不仅击退了敌军的猛攻，并且几次发起反冲击。第 112 师的表现尤为突出。

战斗持续了 5 天，7 月 31 日凌晨，我第 229 师第 112 师的几个团，在那 10 辆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转入反冲击，把敌人赶过了奇尔河。当晚，我军截获了一份无线电报。一个署名的“X”的德军军官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说：“在劳罗维基诺附近渡过奇尔河的步兵第 51 军已被击溃。”

第 64 集团军是作为预备队新组建起来的。集团军中的多数军官和士兵是初次参加战斗。在顿河草原上，他们授受了战斗的洗礼。他们承受了退却的重压与痛苦，但他们没有胆怯。初战的失利没有动摇他们必胜的信念。是的，他们是退却了，但他们是在战斗中退却，他们遏止了敌人的进攻，而敌人兵力之多，有时甚至超出他们的想象。不应该要求他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敌人的优势是绝对的，以第 64 集团军当时拥有的兵力，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第 64 集团军的军人们硬是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势头，粉碎了德军统帅部要在顿河右岸包围并消灭我军的企图。

我缅怀步兵第 112 师的两位师长——A·F·索洛古布上校和 A·E·叶尔莫尔金上校，缅怀这个师的许多英雄战士。正是他们在 1942 年 7 月底以前，一直把德国陆军第 51 军和坦克第 24 师阻止在奇尔河地区，使敌优势兵力不能从南面突入我第 62 集团军主力部队的翼侧和后方。以后，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们自始至终英勇地抗击敌人，先是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作战，继而又在斯大林格勒城内作战。

这两位师长都牺牲了。A·F·索洛古布牺牲在顿河上，A·E·叶尔莫尔金是在奥廖尔城攻坚战中阵亡的。

我缅怀步兵第 112 师出色的副师长、苏联英雄 F·T·

米哈利欣、师炮兵主任 H·A·戈德列夫斯基上校、师政治部主任 B·E·莫罗佐夫，以及指导员瓦西里耶夫、奥罗别依、菲利蒙诺夫等人。

光荣的步兵第 112 师的军人们赢得了永垂不朽的荣誉。

与第 112 师并肩作战的是 E·E·萨任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229 师。该师部队还没有集中好，就遭到德国陆军第 51 军和坦克第 24 师的突击，并于 7 月 26 日 16 时前被敌人逼到奇尔河边。但第 229 师的部队和各分队在这里死死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人的不知多少次进攻。当时，敌军企图从南面向东北方向突击，前出顿河和卡拉奇城，与在戈卢宾斯基地区已经推进到顿河的敌主力集团会合。

8 月 8 日，我步兵第 229 师和近卫步兵第 33 师以及步兵第 399、第 196、第 181、第 147 师在顿河以西陷入包围。在萨任上校的指挥下，第 229 师击退了当面敌人的多次进攻，率领一部分部队突围了顿河左岸……

当顿河地区正在激战时，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将军给我的观察所打来一个电话。

他告诉我说，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已决定由 A·A·洛帕京中将接替他担任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

当天早些时候，M·C·舒米洛夫少将来到了第 64 集团军司令部，接管了第 64 集团军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接到了方面军参谋长 C·H·尼基舍夫少将签署的方面军命令。命令要求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同时实施突击，歼灭上布济诺夫卡和奇尔河地区的两个敌军集团。并给第 64 集团军加强了步兵第 204 师和坦克第 23 军。

命令是 7 月 28 日 14 时接到的，而进攻发起时间规定在 29 日凌晨 2 时，也就是说只有 12 小时了。

我和 M·C·舒米洛夫必须尽快找到第 204 师和坦克第 23 军。对它们的位置，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打电话询问方面军司令部，得到的答复：“你们到顿河和利斯卡河之间的地区去找这两支部队吧。”

为了寻找这两支部队，我们在草原上乘车整整转了一夜。7 月 29 日，又找了一个上午，直到中午，才在日尔科夫地区找到了坦克第 23 军的一个旅。该旅旅长对进攻计划一无所知，因而毫无准备。

在寻找驻扎在“十月胜利”国营农场的坦克第 23 军军部的途中，我们顺路来到了沃洛金斯基村，第 62 集团军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A·A·洛帕京将军身体发胖，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外表显得十分安详。他在指挥所里用丰盛的午餐款待了我们。他告诉我们，第 62 集团军不能执行方面军参谋长的命令，因为部队还没有准备就绪，弹药还未运到，而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批准这个命令。

A·A·洛帕京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没有批准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一事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由 H·E·莫斯卡连科将军和 B·C·克留琼金将军指挥的我坦克第 1 和第 4 集团军正向进攻中的敌人实施突击。而我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反突击是要配合这次行动，并发展这个攻势。

但是，坦克第 1 和第 4 集团军都未能遏止敌军的进攻，并击溃敌军。

洛帕京告诉我们，目前，坦克第 1 集团军已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敌空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克留琼金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的集结行动和横渡顿河行动都告失败。反突击计划已无法实施。

我不再去寻找第 204 师和坦克第 23 军。应该回到集团军司令部去。

7 月 30 日，我奉召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7 月 31 日一整天，我都呆在斯大林格勒，等候方面军司令员 B·H·戈尔多夫的接见。

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格勒实际上已经成了前方城市，但我在城里并未感觉到有明显的恐慌气氛。对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城市马上就会成为激战的战场，他们不相信红军不能在顿河把敌人挡住。

方面军司令员在 8 月 1 日晚接见了。他当着我的面听取了空军第 8 集团军司令员、空军少将 T·T·赫留金的报告。

“敌人已陷入我军的防御阵地，”戈尔多夫说：“现在可以一举歼灭他们了。”我试图提出不同看法。

“我对前线的了解并不比您少！”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把你召来，是要听你解释，为什么第 64 集团军的右翼撤过了奇尔河？”

“撤退是迫不得已的！”我回答说：“我们没有来得及把集团军全部展开。第 229 师仅有一半部队参加防御战……”

B·H·戈尔多夫没有让我说完，就厉声说：

“提出书面报告！书面的！”

毫无办法。我只得请求他允许我回集团军去以便在那里根据各地图和文件写出详尽的书面报告。

南部集团

1

从斯大林格勒回来后，我得知，一支强大的德军部队，于7月31日从齐姆良斯卡亚地区，沿季霍列茨克至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向科捷尔尼科沃方向发起进攻，插向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后方。

德军在顿河大弯曲部遇到顽强抵抗以后，希特勒立即修改了第45号训令，并重新部署了部队。他把哥特将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从正在进攻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里抽出来，交给“B”集团军群。并向“B”集团军群下达了命令：从行进间实施突击，从南面攻入斯大林格勒，造成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两面夹击之势。

在这几天里，方面军各部队都收到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第227号命令。命令极其明确、极其坦率地说明了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命令中说：

“敌人不顾遭受到的惨重损失，把越来越多的新兵力投入战场，他们正在向苏联的腹地一步步地逼近，他们不断地占领新的地区。蹂躏、毁坏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残杀人民。

战斗正在沃罗涅日和顿河地区、在南方靠近北高加索的大门口进行。德国占领军正冲向斯大林格勒，冲向伏尔加河，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库班河地区和北高加索，攫取那里的石油资源和粮食资源。

敌人已经占领了伏罗希洛夫格勒、斯塔罗别尔斯克、罗索希、库普扬斯克、瓦卢伊基、新切尔卡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地区以及半个沃罗涅日……在失去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顿巴斯和其他地区以后，我们的领土大大地缩小了，因而，我们的人员、粮食、钢铁、工厂也变少了。我们失去了七千多万人口、年产8亿多普特粮食的产粮区以及年产1千多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

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也丧失了粮食储备的优势。继续后退就意味着自杀，就意味着断送我们的祖国。

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些论调是有害的、是错误的。

它将削弱我们的斗志，助长敌人的威风。因为，如果不停止退却，我们就会失去粮食、燃料、钢铁、原料、工厂、铁路。由此得出结论：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一步也不能后退！

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必须顽强地坚守每一个阵地，坚守每

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停止退却，然后打退并粉碎敌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德国人并不像某些惊慌失措分子想像的那样强大，他们已成为强弩之末。顶住敌人现在的和随后几个月的突击，我们就可以稳操胜券。

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突击，并把他们赶回去吗？能够。因为现在我们后方工厂的生产在突飞猛进，我们的前线正在得到愈来愈多的飞机、坦克、大炮和迫击炮。

那么，我们到底缺什么呢？我们缺的是，在所有部队中建立铁的秩序和纪律。这是我们当前致命的弱点。如果我们要挽救局势，捍卫祖国，就必须在我们的军队中建立极严格的秩序和铁的纪律……

惊慌失措者和胆小鬼应该就地枪决。从今以后，每个指挥员、红军战士、政工人员都应遵守这个铁的纪律：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绝不后退一步。”“绝不后退一步！”这类口号以前也提过。但是，从没有一个文件这样毫不掩饰地向全体人员，不但向全体红军指挥员，而且向普通士兵，谈到我们国家的困难处境。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告全体苏联人民书。因为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多民族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子弟兵。

党、苏维埃政府坦率地把国家的困难告诉人民，这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热烈的反响，它必将带来积极的结果。每个战士、每个指挥员都深深地感到了对祖国、对人民应负的责任。的确，我们已无路可退了。

这个文件打开了政治工作的新局面。政工干部开始坦率地、毫不粉饰现实地向普通士兵讲明形势，并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各级指挥员也懂得了，退却再也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了。

但是，如果认为，造成这种新局面只是因为这个命令，那就太天真了。这个命令只是表达了全军上下自夏季战役以来就酝酿着的一种情绪。如果不是成千上万的人意识到我们当时极为窘迫的处境，这个命令本身不会发挥任何效力。在退却的艰难日子里，我们的战士无时不感到痛苦、懊丧、悲忿。

很多红军战士和下级指挥员对我说：“我们去年退却……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突然袭击，这使我们在投入战斗之前就损失了许多飞机和坦克。可是现在，我们有坦克和飞机，有武器……我们现在可以顶住敌人！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退却？！”

8月2日早晨，舒米洛夫将军召我去他那里。

我来到集团军司令员工作兼居住的房间时，发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在。会议听取了参谋长关于南方局势和我军左翼情况的报告。

情况令人担忧：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已突破我第51集团军的防御，于8月1日占领了列蒙特纳亚，逼近科捷尔尼科沃。第64集团军和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已逐渐被敌人从南面包围。

舒米洛夫将军建议我立即前往方面军的南部地段，查明情况，就地采取必要措施。他说，这个决定已得到戈尔多夫的同意。

我迅速做好了出发准备。随同我一起去的有副官 I·A·克利莫夫、传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和瓦季姆·西多罗科夫，还有几名通信兵。我们分乘三辆汽车（其中一辆载有电台）向南出发。

途中，我来到了位于上鲁别日内村的第214师师部，见到了师长 H·A·比留科夫。这是我从7月24日以来第一次见到他。比留科夫汇报了情况。在

该师防守的整个地段上，从下奇尔斯卡亚至戈罗茨卡亚镇，都平静得使人生疑。敌人甚至没有试图强渡顿河，也没有实施积极的侦察。敌人的这种消极态度使我感到很奇怪。

我和比留科夫将军坐在干稻草垛旁谈话时，大约 30 发炮弹在附近爆炸了。稍稍平静一点之后，我告别了比留科夫，向南进发。我们的下一站是设在格涅拉洛夫斯基村的第 64 集团军的步兵第 29 师师部。

第 29 师配置在阿克赛河沿岸，在戈罗茨卡亚村至新阿克赛伊斯基村的地段上，正面向南。该师以北，沿着顿河是第 214 师的防御地带。该师以南，从波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地区，由配置我集团军的独立骑兵团防御。该师的左翼没有设防。

我还知道，第 118 筑垒地域的部队正在沿梅什科夫卡河一线展开和准备防御。但这是在后方，在阿克赛河以北。

我们在第 29 师师长 A·A·科洛布京处过了夜。8 月 3 日晨，我们前往上雅布洛哥内村和科捷尔尼科沃一带侦察。和我同行的有两个步兵班，他们是我从第 29 师师部带来的。他们分乘两辆汽车。草原上的能见度很好，可以看出 8—9 公里之远。

当我们从北面接近上雅布洛奇内村时，我们发现从南面过来两支步兵队伍，其中还有炮兵。这是 A·A·柳德尼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138 师和 C·C·库罗帕坚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157 师正在向北面撤退。

两个师都不满员，它们隶属于 T·H·科洛米耶茨少将的第 51 集团军。这两个师在齐姆良斯卡亚和列蒙特纳亚地区遭到敌人的攻击，损失严重。在失掉同集团军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向北、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撤退。和他们一起撤退的，有集团军炮兵副司令员 B·F·德米特里耶夫少将率领的两个近卫迫击炮团。

柳德尼科夫和库罗帕坚科对南面的情况都很不了解，他们被敌人吓住了，我立刻就发现了这一点。我命令这两个师听我指挥，并决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整顿。这两个师按照我的命令退过阿克赛河，在那里占领阵地，组织防御。在这两个师的后面，配置了 A·M·斯米尔诺夫上校的海军陆战第 154 旅，作为第二梯队。我把南部集团临时司令部设在上库姆斯卡亚镇。参谋长由第 51 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个军官担任。

然后，我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勾通了联系，并通过作战值班军官，详细报告了方面军南部地段出现的局面。我与第 64 集团军司令部没能取得联系。

方面军司令部通知我说，西伯利亚的新锐步兵第 208 师将在奇列科夫和科捷尔尼科沃车站下车，并建议由我指挥这个师。

“师部在哪里？”我问道，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8 月 4 日晨，我向各位师长（柳德尼科夫、库罗帕坚科、斯米尔诺夫）再次下达命令：沿阿克赛河在各自占领地段上构筑工事，组织防御。然后，我和前一天一样，又乘车通过格涅拉洛夫斯基和上雅布洛奇内，向西南方向侦察。

在格列米亚恰亚车站一带，我们又遇到了沿铁路向北撤退的人员和车辆。我费了很大劲才在人群中找到指挥员，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8 月 3 日，第 208 师的几个军运列车的部队，在科捷尔尼科沃车站刚下火车，突然遭到德军飞机和坦克的攻击，部队损失很大。幸存在部队正

沿铁路撤退。师长、团长和司令部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在涅贝科沃会让站附近，步兵第 208 师的一个营已展开成散兵线，正面朝南，开始构筑掩体。营长报告说，他从由南面败退下来的人那里得知，在科捷尔尼科沃出现了德军坦克，因此他自己决定占领防御阵地。团长和师长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我赞许他的做法，并命令他截住败退下来的士兵。我答应将从距他最近的司令部里与他取得联系。我想在奇列科夫车站或许能找到个师部或团部。

驶近车站时，我们看见好几个军运列车。第 208 师的其他部队正在这里下车。有 4 个军运列车在科捷尔尼科沃被击毁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里。铁路路基和列车周围到处挤满人群，辎重行李散落遍地，炊烟阵阵，一片混乱。

我找到其中一个列车的指挥员，他是个少校营长。我对他扼要地说明南面的情况，命令他向涅科沃村附近的 141.8 和 143.8 高地派出较强的掩护分队，把其余各分队调离车站，等候师部指示。

发出这些命令之后，我带着自己的小组乘车来到了第 1 奶品农场，它位于奇列科夫火车站以西两公里处。

在那里，我们架设电台，准备与方面军司令部联系。我记得呼号是“阿库斯季克”。时值正午，万里晴空。在奶品农场这个市镇里，除我们之外，还有第 208 师的部队。15 分钟后，副官克利莫夫报告我，“阿库斯季克”已经叫通。我向电台走去时，发现天空中出现 3 批 9 机编队的飞机，从北面直向我们飞来。我觉得好像这些飞机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突然，传来了爆炸声。我回头望去，看到这些飞机正在轰炸奇列科夫火车站和停在那里的军车。车厢和车站的建筑物燃起大火。猛烈的火舌迅速地从一座建筑物伸向另一座建筑物。

我跑到电台前，命令报务员用明码发报：“在奇列科夫车站，我军飞机正在轰炸自己的军列！……”当我看着报务员拍发报警信号时，我没注意到又有一个九机编队从北面飞来，向镇里投炸弹，接着，它们排成环形队形，开始轮番俯冲扫射。多少红军战士刚来到前线，还没有看到敌人，就被打死或打伤，这个场面令人十分痛心。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刚到达的部队在卸车区域没有得到空中掩护。方面军司令部没能保障这一行动的顺利实施，更没有通知空军部队。

我们的电台也坏了，我失去了联络手段。

那天晚上，在比留科夫斯基会让站附近，我们终于找到了第 208 师师长 H·M·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上校。我记得他当时脸色惨白，声音颤抖。他受到极大的刺激，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死去，使他内心痛苦万分。

“将军同志，”他对我说，“我无法对我的下属解释这些无谓牺牲的原因。”我在这里停留了几小时，等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平静下来以后，我把师政委、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主任叫到他那里，命令他们四人立即与分散在从涅贝科沃会让站到茹托沃车站以及到阿布加涅罗沃一线的部队取得联系，当夜带领他们渡过阿克赛河，在安东诺夫镇至茹托夫村一线占领防御阵地，并在部队防线的前面和左翼派出加强巡逻队。

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我估计德军不愿与我们布署在科捷尔尼科沃地区铁路沿线的部队纠缠，他们将穿过普洛多维托叶和京古塔镇实施纵深迂回。事后得知，敌坦克第 48 军的坦克纵队正是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冲往这一方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第 208 师的指挥人员加强侦察，以便搞清这

一地区的敌军主力的去向和意图。

我们驱车返回南部集团临时司令部时已是夜间。

值得庆幸的是，明月当头，我们可以不开汽车大灯，借着月光在草原上奔驰。在格涅拉洛夫斯基以南 10 公里处的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我们遇上了一个骑兵侦察组。我从警卫中派出一个班的战士乘汽车迎了上去。

“站住！什么人？”

对方回答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他们是从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镇撤下来的骑兵第 255 独立团的侦察班。从班长口中我们得知，从凌晨起，敌人开始在那里大举强渡顿河。

“告诉你们团长”，我对那个班长说：“我命令他在波将金斯卡亚和上雅布洛奇内正面进行侦察，监视敌人的行动，敌人可能从科捷尔尼科沃地区开进到这里。让他通过位于格涅拉洛夫斯基村的第 29 师师部与我保持联系。”

来到格涅拉洛夫斯基村后，我得知，第 29 师奉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要立即从防御地段开拔，向东转移到阿布加涅罗沃车站地区。我明白，这是方面军首长已获悉，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正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从南面扑向斯大林格勒的消息，因此决定将舒米洛夫的第 64 集团军的正面转向南方，迎击坦克第 4 集团军。这样，我的部队就应从南面掩护第 64 集团军的行动。

8 月 5 日晨，草原传来的隆隆爆炸声将我们惊醒。这是敌机在轰炸和攻击沿阿克赛河岸缓缓东进的步兵第 29 师的纵队。

同一天早晨，骑兵第 255 独立团奉命防守第 29 师留下的地段、包括乔索夫斯基和格涅拉洛夫斯基。当然，一个骑兵团防御这样宽的地段是困难的，但我们没有别的部队了。何况看来敌人也不打算在这个地段攻击我们，因为敌人正把部队调往东北面的铁路附近，以便从西面掩护其主力。

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在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镇附近渡过顿河的敌军部队，也在向东北方向移动，在阿克赛河只留下了力量薄弱的掩护部队。敌军部队机动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保障其主力部队左翼的安全。而其主力正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从东南方向绕过铁路进攻斯大林格勒。

我骑兵掩护部队当面是力量薄弱的敌军，而且基本上是罗马尼亚部队，这使我稍微放了心。但敌主力部队向东北方向的运动却使人不安。显然，敌人为了从南面突击斯大林格勒，正插到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这势必将切断我军的交通线和供应线。

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南面出现的态势。司令部向我下达了绝对命令，要我用现有的力量坚决守住阿克赛河沿岸的阵地。

我向各部队下达了在阿克赛河地区顽强防御的命令。并且对火炮和迫击炮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检查。为了避免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向各个方向派出了侦察队。

作为预备队的是海军陆战第 154 旅和精心伪装在山谷里的两个“卡秋莎”火箭炮兵团。

8 月 5 日晚上，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开始进攻，攻击点选在柳德尼科夫和库罗帕坚科两个师的接合部。主要突击在 8 公里宽的正面实施。敌步兵渡过了阿克赛河，并部分地楔入我战斗队形。看来，敌军坦克正准备渡河。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战术方法和战役方法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这次行动又是故技重演。象渡顿河一样，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火炮轰击，继而是步

兵，步兵后面是坦克。当8月5日晚，我侦察兵和观察哨发现在防御正面、特别是在波波夫山谷里，集结了大量的敌步兵、炮兵和各种车辆时，我马上就猜到了敌人的意图。

我决定破坏敌人的这次进攻。

计划很简单：凌晨用炮兵突击敌出发阵地上的集结兵力，然后，用迅猛的反冲击把敌步兵赶过阿克赛河。

天黑之后，敌人大意起来了，汽车行驶时开着大灯，丝毫不怕我军飞机。坦克还没有动，它们在等待架设浮桥。

夜里，我找到柳德尼科夫师长和库罗帕坚科师长，告诉他们8月6日早晨我的行动计划。他们很快就领悟了我的意图，并立即投入攻击准备。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我这一手。天刚亮，我炮兵开始向敌集结兵力开火。我们站在147高地上看到，先是敌步兵、然后又是辎重队和炮兵，从山谷和掩蔽工事里爬出来，四下逃命。

敌人慌乱地向南逃去。

这样，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就破坏了敌人准备在8月6日发动的进攻。

8月6日的战斗使敌人损失惨重，被打死、打伤、俘虏的人数很多。我们还缴获了8门大炮、大批的步枪和机枪。

我看到，这支部队虽然是在撤退中收拢来的，但他们并没有丧失战斗精神，仍然是作战勇猛，攻击时齐心合力，迎敌时沉着镇定。而这是最宝贵的。

这样，我们不仅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而且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

日终时，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了这一天的战斗情况。我也得知，在第64集团军的新防御区——阿布加涅罗沃和京古塔区域，这天同样发生了激战。

最后我还知道，东南方面军由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上将指挥。我从1938年就认识他，那时我们一起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当夜，我给他发了一封短信，其中提出如下建议：不要限于消极防御，而要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实施反突击。

1942年8月7日，最高统帅部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3、第62、第2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没有坦克）。在东南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4、第57、第51集团军，以及正开赴斯大林格勒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

我没有得到答复，甚至不清楚叶廖缅科是否收到信。

8月7日，敌人在同一方向再次转入进攻。中午时分，他们已楔入我军的防御阵地5—6公里。

我们决定再次用反攻击恢复态势。任务简单明确：粉碎敌人，并把他们赶过阿克赛河。

我们决定不在白天实施反攻击，因为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也不象8月6日那样在早晨实施，而准备在日落前两小时实施，那时天已渐黑，敌机已没有多少时间活动了，敌步兵已过河，而敌坦克还在河对岸。我们的这次冲击

再次获得成功，敌人被赶过了阿克赛河。

8月12日，根据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海军陆战第66旅和斯大林格勒要塞区划归南部集团。

这些部队调给我后，多少使南部集团、特别是其右翼的相当稀疏的战斗队形更加紧凑密集。我们利用河流沟谷等天然屏障建起了坚固的防线。

在这段时间里，敌坦克第4集团军正从南面向普洛多维托耶和阿布加涅罗沃地区进攻，我第64集团军在加强了机械化第13军（由T·A·塔纳希申上校指挥）之后，正与该敌进行顽强的防御战斗。

很清楚，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采取惯用的手段——钳形攻势。他们企图在西面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斯大林格勒，与此同时，包围在城西和城西南地域的我军所有部队。看来，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才把我南部集团稍稍后撤，撤至梅什科瓦河附近。

我们8月17日接到方面军的撤退命令。南部集团司令部立即制定了部队撤退到新地区的计划。

部队动作迅速，顺利地完成了夜间撤退行动，并抵达新的防御地区，未受任何损失。

敌人发现我军撤到新的防御地区时，为时已晚。只是在8月18日晚，梅什科瓦河上空才出现敌军侦察机。但是，敌机没有急于攻击我新阵地。看来，它认为不是时候。这段时间里，主要事件发生在其他方向上：第62集团军右翼的韦尔佳奇——科特卢班——斯大林格勒一线和第64集团军左翼的普洛多维托耶——通杜托沃——斯大林格勒一线。在这些方向上的战斗中，参战部队之多，武器技术装备之强，都是阿克赛河战斗所不能比拟的。

2

每个人都有自我肯定的时候。南部集团的顽强防御使我有权利认为，在组织阿克赛河防线时，我第一次独立作出的各项决定，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我们不仅可以在某一防御地区阻止敌人的攻势，而且可以重创他们，迫使他们撤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相信自己部队的力量，相信指战员们的才干，临危不惧，正确地估计形势，百折不挠地执行既定任务。

我知道，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前面，战场形势变得愈来愈危急，愈来愈令人忧虑。德国人依仗坦克、飞机的优势，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向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逼近。我做好了迎接任何考验的精神准备。年轻时，我在国内战争中受过锻炼。与高尔察克匪帮浴血奋战的那些红军指挥员和政委的光辉形象依然活在我心中，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记得那是在1919年初。我带着红军指挥员训练班的毕业证书来到喀山，被任命为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不久，这个团的两个补充连被调去接受第2集团军司令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检阅。司令部设在萨拉普尔。我是第二月的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带这两个连去的，天虽冷，但我还是出了满头大汗。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是一位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的首长。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些头发花白的队列教官。而我这个多少有些孩子气的年青军官，却要在他们面前指挥各有150人的两个连队，汇报训练情况。只要有一个人走错了步子，或是做错了操枪动作，就全糟了。

但是，战士们都感受到了这里的严肃气氛，一个个挺直腰板，振奋精神。就象上了发条一样。所有口令他们都完成得很认真，做到了整齐划一，

准确无误。转弯，又是一个转弯，展开横队，又收拢为纵队。我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做错动作。而两个月前，他们在队列里还是笨物笨脚！特别是2连的那个小伙子。

评判员们看着我，故意板着面孔，而把笑容藏在胡子下面。我知道，我的稚嫩惹他们发笑，而我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因为我还没长胡子……最后传来口令：“立定！……”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在队列前走过，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着红军战士们和指挥员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补充连的训练水平和精神状态都十分满意。最后，他握了握我的手，告诉我说，我们团不久就要编入作战军队。

1919年3月初，我团从喀山调到了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编入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各营分驻在托伊马、下托伊马和上托伊马三个较大的村子里。

把部队从喀山带到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条不紊地组织人员上车，要给每列车分配炊具、物资、马匹和板车。应该从何着手，谁也不清楚。此外，还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红军战士中有些人在喀山服役时表现还可以，一听说要离别亲友上前线，就打算往家里溜。

集团军的一个委员会来到我们团，警告我们说，如果部队出现开小差的现象，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将处分团指挥人员。

我们对部队进行了解释说服工作，还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各分队建立了审查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制止一切开小差的企图。

由于我们的努力，部队很顺利地完成了转移任务。

我们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当时高尔察克发动了新的攻势。他的军队占领了阿汉斯克、奥萨、比尔斯克。3月11日，又占领了乌法。我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150公里的缺口。

白匪军卡马第8师的几个团乘虚而入，直接威胁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和奇斯托波尔。而在那里，在卡马河流域积存着大量的国家中部地区所急需的粮食。

我们团的任务是：尽量缩小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在春汛到来之间，把这里的居民点控制在自己手里，保障粮食外运到我国的中部地区去。但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们武器不足，机枪更少的可怜，全团只有三挺“马克沁”。团长请求集团军司令员按编制给我们团配足机枪。

集团军司令员绍林回答他说：

“白匪军手中有许多机枪，用他们的机枪补充吧！阿津就是这样做的。”他停了一下，又解释道，“第28师师长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集团军司令员尊敬这位师长，称呼他时还带上名字和父名）就是用敌人的炮弹补充自己的炮兵。炮弹一打光，他就命令骑兵团说：‘冲到敌人后方去，搞些炮弹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与高尔察克匪徒展开战斗的前夕，我心中就对阿津师长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这并不是因为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传说着他的许多神奇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他作战勇敢以及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严酷无情。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只要克服对危险的恐惧心理，你就不再是个胆小鬼。残酷无情更容易做到，在激烈的战斗中，手中的武器就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你的手别发抖。而我尊敬阿津，是因为他是一位刚毅而又机智的指挥员，士兵们都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阿津和他们一起战斗，

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有时，白匪用榴霰弹和密集的机枪火力把我们的战士压在地上，而阿津却跑过去，沿着隐蔽的散兵线给士兵们发烟卷。谁能不跟这样的指挥员打冲锋呢？当然，阿津这样做有点太冒失，可当时的阿津师长才年仅 23 岁。阿津善于迅速地判明敌人的企图，洞悉敌人的弱点，因此敢于把部队派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

阿津获得的荣誉激励着我，哪个年轻人不想做一个出色的人？！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我不想隐瞒，我当时处处都想模仿阿津。

当然，这种想法不只我有，我们团的许多连长、营长都希望在阿津的指挥下作战。

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没有见到阿津，但他在我们的想像中是个身材高大、灵活机警的人，说起话来声如雷鸣。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团被编入步兵第 28 师。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团开赴可能与敌遭遇的地区去。命令最后几行要求我们按照条令把部队编成行军纵队。我们感到很惊奇。

那时，新的条令还没有制定出来，红军使用的是旧条令，只是在旧条令外面贴了一张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封皮。大家逐段逐条地学习条令，遇到讲上帝和沙皇的地方，就略去不看。我们惊奇的是，一向善于按自己的新法则指挥作战的阿津，居然也要求我们执行旧条例。看来，他并不象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简单。

2 营和 3 营被派去掩护奇斯托波尔，1 营和所有的团属分队取道耶拉布加和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前出至缅泽林斯克。还有一个营的补充兵力派往那里，这个营是由 700 名被赦免的逃兵组成的。

我指挥的支队前往耶拉布加，一路上我都在考虑，怎样执行阿津的命令：按照条令来组织行军纵队。条令要求派出前方尖兵和侧方警戒，可是部队是乘雪橇前进的，路旁的积雪几乎能没马脖子。无法派出侧方警戒。当然，我派出了骑兵侦察哨，但他们也只能沿着大路走。

在耶拉布加，风传敌人就要打来，很快就会占领这座城市。有些人惊慌失措，找各种借口想要逃到马马得什或直接逃往喀山。其实，敌人还离得很远，高尔察克的卡马第 8 师的主力还远在比尔斯克地区，只是该师的第 32 团已占领缅泽林斯克。

部队在耶拉布加宿营。次日黎明，就向卡马河畔的切尔内方向进发。由 400 名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共产主义营将在那里与我们会合。政委 A·A·捷列金在卡马河畔的切尔内迎接了我们，并通知我们说，鉴于白匪军将进犯这一地区，在这里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共产主义营就是这个委员会组建的。

我们的团部设在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可我不愿呆在团部，想去共产主义营看看，他们的阵地离敌人最近。营里有一些缅泽林斯克人，他们熟悉地形。我想，应该尽快摸清缅泽林斯克的地形，继续前进，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在共产主义营营部，迎接我的是营长 M·A·罗季奥诺夫。他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皮夹克。在这之前，他是舒甘斯克乡的军事委员。过了一会儿，营政委 A·B·戈尔布诺夫和副官 C·E·马马林也来了。戈尔布诺夫长着浓黑的眉毛，外表很象营长。马马林肩膀很宽，很有些军人风度。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骑兵侦察队的队长 E·M·古里亚诺夫。他全副军人披挂，帽子歪戴着，前额上留着一绺哥萨克式的长发，是个真正的骑兵。我被介绍给他们的 4 位连长：法

捷耶夫、斯塔里科夫、安德里亚诺夫和博罗兹诺伊。前三个连长看来都精明强干，只有博罗兹诺伊显得肥胖笨重，讲话带着乌克兰口音。4个连长都是党员，全营的党员共有43名，其余全是党外同情者或志愿兵。当时在那一带还没有共青团组织。

总而言之，这样的部队是可以信赖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勇敢作战、直至最后一个人。

回到团部后，我向团长报告了共产主义营的人员组成情况，并建议我团当夜向缅泽林斯克进发。共产主义营中的许多指战员都熟悉地形。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团可以从敌人手中夺取缅泽林斯克。否则，敌卡马师主力从比尔斯克赶到之后，我们就更困难了……“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力，”团长打断我说：“集团军司令员和第28师师长都没有下达进攻缅泽林斯克的命令。”

刚刚来到团里的政委阿列克赛·尤里耶夫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是彼得堡的工人，参加过十月革命起义。他支持我的意见，说：

“消极防御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在战术上是错误的。这一带缺少有利的作战阵地。我们不能在卡马河岸坐等敌人的到来。”

经过反复讨论，团长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他要我带全团出发相机行事，而他则继续留在卡马河畔的切尔内，等待与集团军司令部恢复联系。

谈话结束后，尤里耶夫走到我跟前，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的做法很象彼得堡人”他对我说：“就这样干……”

他比我年长3岁，来我团之前，在北德维纳河地区与白匪和英国人打过仗。无疑，他的经验和政治知识都很丰富，但他从不炫耀这些，讲起话来简单通俗，以理服人。简而言之，他很快引起了我的好感。

经过一夜的行军，我团来到库津别季耶沃村，并在这里停下歇宿。在这里，我们获悉，阿津师的步兵第39、第43团和孔特雷姆支队，已从卡姆巴尔卡地区开上比尔斯克至缅泽林斯克的大路。

休整之后，部队于晚间继续向缅泽林斯克前进。走在最前面的是古里亚诺夫的侦察队，共产主义营的一个连担任前方尖兵，后面跟着主力部队。

尤里耶夫、我和共产主义营的副官马马林赶上了前面的侦察队。他们排成横队，拉开很大的距离，象影子一样，在月光照亮的雪地上向前滑动着。

在距缅泽林斯克15公里处，一个通讯员骑马给我送来一份简单的命令：“不要停止不前。我命令你们占领缅泽林斯克。

把执行情况随时报告给我。师长阿津”。

“好，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都是正确的。”政委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阿津师长似乎知道，似乎听到我的激情在胸中沸腾。他下达的正是我所盼望的命令！现在只需加快速度，勇敢些，再勇敢些地冲向缅泽林斯克……不久，左侧的侦察员报告说，遇到了孔特雷姆部队的警戒队。

半小时后，孔特雷姆本人骑马来。他是阿津的爱将，英勇善战。因为是夜间，我没能看清他的脸，但从说话声音中，可以感到他很自信，有阿津的风格。他也接到了进攻缅泽林斯克的命令，只是还不知道从哪面攻打。他对这个城市不熟悉。

在这一点上，副官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的尖兵连会起很大的作用。

经过商议，我们做出如下决定：对敌人实施夜间攻击。第40团以共产主义营中的当地人为向导，从南迂回缅泽林斯克的后方，拂晓开始攻城，孔

特雷姆的支队，将在马克林的小口径炮兵连的支援下，从正面攻城。

凌晨，寒气逼人。我部开始进攻。火炮向城里猛烈射击。城里大概慌作一团了，连大钟都敲响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进了城市。白匪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几乎未作抵抗就仓惶出逃。

应该说，这个城市的居民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也许，他们不相信我们会巩固自己的胜利。原先红军到过这里，没有坚持住，白军一来就把他们打跑了。现在又来了红军，别人也会把他们赶走。

我把指挥所设在邮局。费了很大劲，才和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取得了联系。我向团长报告说，我已执行了阿津的命令。

刚通完话，忽然又有电话叫我，我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你是指挥员吗？”问话的是一个粗鲁的男人声音。

“是的。”

“我是卡马第 32 团团长科雷舍夫大尉！”

“你好呀！你是从哪个世界爬出来的？你那里的情况怎样啊？”

“我这很好”，大尉说：“你和你的政委快找根上吊的绳吧！”

“绳子一定会找到的，第一次见到你时，就用它把你绞死！”

大尉用军官骂人的话骂我，我也用水兵的粗话回敬了他。

但谈话并未就此结束。

“你算个什么指挥员！”科雷舍夫接着说：“你看你的部队是怎么进攻的？战斗队形乱七八糟，真能叫人笑破肚皮！”

“而我看，你的模范团都是些胆小鬼，见了我们比兔子跑得还快！”

大概那个白匪军官气得摔了电话听筒、我只听到“啪”的一声，谈话中断了。

1919 年的春天来到了。卡马河解冻了。小河里的水奔流起来。

现在，泛滥的河水成了第 2 集团军右翼的可靠屏障。敌人暂时还不敢渡河。卡马河畔的切尔内储备的粮食已经运往我国的中部地区，但是，在奇斯托波尔还有许多粮食没有运出。

尽管道路泥泞，高尔察克匪帮还是不断地把新的兵力投入战斗。第 28 师的部队在耶卡帖林堡——萨拉普尔——维亚特省的波梁内铁路沿线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师长阿津不倦地奔走于各旅、团之间。师政委格奥系吉·尼古拉耶维奇·佩拉耶夫也不落后。他是一位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哪里有困难，哪里发生残酷的战斗，师长和政委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着红军战士们。《战士报》时常刊登他们的传奇性的故事：“阿津只身闯入白匪军团部，砍死了在场的所有敌军官，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佩拉耶夫和阿津两人俘虏了整整一个营的白匪，然后派他们带着红袖章到高尔察克那里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工作。”

敌人未能突破第 28 师的防线，但第 2 集团军的其它防御地段的情况都不妙。第 7 集团军的一个师长，旧军官罗曼诺夫投降了敌人。很快我们这里就出了乱子。第 28 师右翼的各团接到了据称是第 2 集团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要求我们立即不停地向西撤下去，甚至在维亚特卡河那样的地区也不要停下。我们的第 40 团奉命退到耶拉布加。

我们日夜兼程地在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向后撤。在耶拉布加，我们收到阿津的命令，才知道前一个命令是高尔察克的特工机关伪造的。阿津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在季希耶戈雷村、邦久加饲养场和远至托伊马河一线占领防御。

我们立即向邦久加饲养场派出了骑兵侦察队，随后，又派出 1 营。当团主力部队的纵队正要出发的时候，由 700 名逃兵组成的 2 营哗变了。他们坚决拒绝出发。连长和营长们拿他们毫无办法。在哗变的士兵中，有一些人持富农观点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他们很善于蛊惑人心。他们利用我们的困难处境，提出反革命口号。他们要求发放新服装和其它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

偏巧这天尤里耶夫政委又得了伤寒病。只得由我去“驯服”那些哗变的士兵。我两次集合全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去执行战斗任务，但都白费口舌。第三次，我火了，跳上马就向他们冲去。我当时年轻，没经验，以为强迫命令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我冲入嘈杂的人群，突然愣住了。人们把我挤在中间。步枪和卡宾枪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着我的脑袋，我听到拉枪栓的声音。只要稍不冷静，我就会被打死。

怎么办？回团部大概已经晚了，而且也不够策略。哗变的人会认为我胆怯了……他们会起哄，吹口哨。不，决不能这样！当然，他们疲倦了，不愿再去危险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抗拒师、团首长的命令。其他营的士兵也是又累又饿，为什么他们就该战斗、而这些人却坐着休息？谁给他们这种特权？

我感到，许多哗变的士兵也理解这一点，他们不过是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这些害群之马找出来。把他们孤立起来。但是，用什么办法呢？

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冒险的主意，以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好吧，既然这样，那你们是先开枪呢？还是先吃饭？”

我下了马，眼睛不住地盯着那几个领头的。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左边。我身后是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我转过身，对他大声说：

“把饭菜送到空场上去！快点！”

彼得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飞快地向团部跑去。

哗变的人群慢慢地安静下来。对吃午饭的议论分散了他们的其它想法，出现了某种心理上的松动。必须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我对他们说话的口气好象我们把什么都已经谈妥了一样，“到空场吃饭去，边吃边谈……”

人群里传出赞同的议论，大家开始向空场走去。

“光说话填不饱肚子……”

“说得对，”许多人喊道。

领头哗变的人不得不顺从大家的意志。他们跟着人群来到空场，饭菜也运到了那里。我通过传令兵命令共产主义营营长率领部队悄悄地包围空场，命令驻在城里的第 28 骑兵团的一个连在附近集合待命。

回到空场时，彼得·亚库舍夫口气很随便地警告那些领头哗变的人说：“骑兵连和机枪都已经准备好，并瞄准你们了。第一个齐射往天上打，如果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当然，传令兵的话有点夸张，但很起作用。哗变的人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埋头吃粥，好象把我也给忘了。

我和传令兵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哗变的士兵手中拿的不是步枪、卡宾枪，而是勺子、饭盒。这时，骑兵冲到了空场上，共产主义营的战士们包围了正在吃饭的人群。

“投降吧！”

哗变者纷纷举起拿着勺子和饭盒的双手。那个样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现在把他们缴械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我们查出 63 个领头的，并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

这 63 个人中，没有一个连排长。这说明，营里拒绝执行命令和刚才的骚乱是由于士兵的过于疲劳而自发形成的，而坏人正是利用了这场骚乱。

……4 月 19 日，团长杜金决定进攻敌人，夺取季希耶戈雷林，尔后，再进攻邦久加林。这个任务交给了 1 营和 3 营。

团长不愿马上把 2 营投入战斗，这是很自然的。

凌晨，部队通过了托伊马河上的狭窄的徒步桥，来到邦久加饲养场以西的边缘地区，占领了出发阵地。我军没有大炮，敌人也没有。拂晓，我军排成散兵线开始进攻。敌人顽固地进行抵抗。但是，我团主力还是冲上了敌军阵地，展开了肉搏战。白匪军抵挡不住向后退去。我们紧紧追上，想切断敌军向东的退路。

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观察到整个战场，甚至看到每一个战士的行动。当我们以为我们的进攻已胜利在握的时候，敌人用 1 个营的预备队发动了反冲击。这个营作战勇敢，战术灵活，他们击退了在林边担任掩护的我团的左翼连队，开始从翼侧威胁我团主力。而这时，我团主力已接近季希耶戈雷村。

我团战斗队形出现混乱。由于没有预备队，各营相继都败退下来。一部分战士在饲养场以西涉水渡过托伊马河，大部分人则冲向徒步桥。那里眼看就要发生堵塞，这对敌人来说，正是个极好的靶子。幸好敌人正忙于进攻季希耶戈雷村，暂时还没有注意到我军的撤退方向。对此，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我跳上马，赶过败退的部队，停在桥头上。我脑子里很快形成一个计划，把部队带回去，带领他们向季希耶戈雷村冲击，打击敌人的侧翼。

但是，能够阻止这群手持武器冲向桥头的人吗？他们将近 400 人，而我们只有我和传令兵两个人。我大喊：

“站住！谁要上桥除非踩着的我尸体！”

我举起了卡宾枪。前面的人站住了。在他们后面的人挤成一团。

“指挥员们，到我这里来！”

这时，在人群的后边传来喊声：

“站住！……站住！……回去！……”

这是各级指挥员在发令。

我命令道：“向后转！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我见大部分战士都已把头转向敌人方面，就高喊：

“前进！冲啊！”

我看到，连排长们也纷纷向部队发号施令。

危机过去了。我又跳上马。高呼：

“跟我冲啊！跟我冲！……”晚上，总结战斗时，我们才知道，团长又遭不幸。他本来就在生病，又泡了一个凉水澡。过河时急流冲倒了他的坐骑，他只好泅水过河。现在正发高烧，脸都变青了。团部副官纳扎尔金、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塔拉索夫和我守护着他，给他喂热茶暖身子。

2 营的两个战士走进来，交给我一封信：

“崔可夫同志！我们觉得您不相信我们，因此不让我们参加战斗。我们

为过去的事感到羞耻，但是，难道您以为我们不珍惜苏维埃政权吗？您认为我们会当叛徒吗？我们情愿将功赎罪。请您派我们参加战斗，无论您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都一定出色地完成，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几乎全营所有的战士都在信底下签了名。

“谁教你们写这种请愿书的？”我问。

“没有人教，我们自己想到的。大伙要我们得不到宽恕就不回去。”

我请求团长杜金允许次日一早就把这个营投入战斗。州委会的同志们支持我的意见。于是，副官按团长的口授写了一道命令：

“2 营于 4 月 21 日拂晓前在邦久加饲养场南面集结待命。”

当天夜里，团长被送进野战医院。我们团现在既没有团长，也没有政委，我担起了全团的指挥任务。根据我的请求，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和塔拉索夫代理政委的职责。

凌晨，2 营来到了出发阵地。他们的任务是渡过托伊马河，进攻对岸的敌人，占领邦久加村，并固守在那里。渡河点选在大坝。但是，侦察员很快就报告说，大坝已被汛期洪水淹没，水深齐腰……

我们还是决定沿大坝进攻，但在我们商定具体细节的时候，敌人开始进攻季希耶戈雷村，企图夺回昨天失掉的阵地。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翼侧被他们作为攻击目标的我团 2 营，正准备在他们的右翼采取积极的行动。

塔拉索夫第一个来到大坝，他纵身跳入齐腰深的冰水里。头也不回地向对岸冲去。全营紧跟在他后面。敌人没想到我军会如此大胆地从这里过河。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进入战壕。

2 营出其不意地夺取了邦久加。他们加固了阵地，与占领了邻近的季希耶戈雷村的 3 营会合。白匪军昏头转向，他们害怕陷入包围，头也不回地败退了 10 公里。

2 营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白匪军连，连长是一个中尉。

全营战士个个兴高彩烈。他们诚心诚意地、英勇无畏地洗刷了身上的耻辱。白匪军官被押送到师部。

白匪军官的口供很有价值。不久，我们收到阿津发来的简短而充满激情的电话记录，上面写着：

“第 40 团的红军战士们：你们是好样的！我赞美你们的大无畏精神，望你们继续这样打击敌人。阿津。”

我团在新占领的地段上防守了 10 天。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突破了步兵第 28 师沿萨拉普尔——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喀山铁路的防线的左翼，推进到维亚特卡河边，对我形成包围之势。而维亚特卡河和卡马河涨大水又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河上没有桥，唯一的一艘汽船在维亚特卡河上拖着驳船，往返于马马得什与安济尔克村之间。因此，第 28 师右翼的所有部队奉命向马马得什撤退，我第 40 团担任掩护任务。

4 月 30 日夜，我们在遏阻敌人的同时，开始向耶拉布加撤退。

撤退的第一天，敌人一个骑兵连沿托伊马河谷绕过我团右翼，占领了我后方的鞑靼切尔内村。敌人企图通过这次对我后方的袭击引起我军的慌乱。但是，敌人的这个骑兵连几乎被我全歼。敌军第 2 次企图在列卡列沃村附近包围我团，但也没成功。在穆尔济哈村和托克马什卡村一带，我团坚守了整整一昼夜，从而保证了第 28 师第 3 旅顺利渡河。

5月4日那天，对我们来说是极为艰难和危险的。安济尔卡村的渡口上挤满了辎重车和人员。首先我们要把火炮运过河去。汽船拖着驳船往返一次需要几个小时。人员和辎重上船时很混乱。于是，我任命塔拉斯夫为渡口指挥长，并拨给他一个骑兵侦察排。

我们团的最后一个防御地区距河边3公里。这时因为涨水河面已宽达5公里。连日来的挫折使敌人恼羞成怒，一次次疯狂地向我阵地发动进攻。我们也动用了所有力量和最后一点弹药，艰难地抗击着敌人。

轮船倒数第2次往返的时间长得让人焦急。如果轮船发生意外，被敌人炮火击中或是发动机出现故障，那我们就将困在被敌人控制的河岸上。我们一面拼死抗击着敌人的攻击，一面不停地观察轮船。终于，它在对岸码头靠了岸，卸完船，又向河这边驶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撤退时我团各分队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组织纪律性。红军战士们自觉而有效地制止了一切混乱现象。在最后最关键的十分钟，我们得到了对岸我军炮兵的火力支援。他们阻止了白匪军的进攻。

5月4日晚，我们在马马得什顺利地登陆了。现在，敌人与我们之间隔着一一条宽阔的维亚特卡河。

我师阻击高尔察克军队的最艰苦的时期，就这样结束了。敌人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高尔察克从北面进攻莫斯科的计划破产了。

1919年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打给第2集团军司令员B·A·绍林的电报中说：

“我谨以工农兵和哥萨克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您、同志，向英勇的第28师转达诚挚的问候和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英勇顽强地抗击了高尔察克匪帮、保卫了苏维埃俄国。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光荣的第28师的英勇无畏的战绩报告工农政府。

光荣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英雄们！他们是祖国的精华和骄傲！”

……现在，我置身于斯大林格勒前线。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与敌人进行生死搏斗时，充分发挥出我们的聪明才智，如果我们时刻牢记，当时还年轻的红军部队，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能够用劣等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正义事业，那么，在今天，希特勒匪帮也必将受到严惩，并走向灭亡。

残酷的年代自有其残酷的法则，那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付骄横的侵略者，就必须机智、勇敢、坚决地战斗。

这就是我在南部集团从阿克赛河撤到第64集团军防御地带以后的一些思考。那时，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

1

从8月下旬开始，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战事已经向东移到了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带。

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都把攻击矛头

直指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两个集团军的共同任务是：包围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前出至伏尔加河。

我和舒米洛夫将军一起查明了集团军正面的敌情。此后，我就前往瓦西里耶夫卡村一带。据兵团指挥员报告，我军正在那里与进攻的敌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在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以北的 110.4 高地，我找到了配属给库罗帕坚科师的炮兵团团长的观察所。在这里，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正在进攻，但不知为什么炮兵团却按兵不动。

“敌人正在进攻，你们为什么不开火？”我问炮兵团长。

他显得有些窘迫，说：

“炮弹快用完了。”

指挥员在准备撤退时，往往都这样搪塞。

“我命令你们立刻装上炮弹，向敌人射击！”

“打哪个目标？”

“打敌人的预备队。”

我从观察所里清楚地看到，大群大群的敌军步兵正在比尔佐瓦亚村蠕动。

炮兵团接连两个齐射，迫近的敌预备队沿着山谷四散奔跑起来。

过了一会儿，师长也来到了观察所。我们立即又组织师属炮兵实施了补充火力突击。接着，步兵团转入了反冲击。战斗持续了 2 小时。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又回到我们手中，敌人狼狈地向南退去。

次日，我来到了柳德尼科夫师指挥所，它位于第 74 公里铁路会让站附近。这个所谓的指挥所是个窄小的堑壕，只有 1.5 米宽，6 米长。尽管柳德尼科夫请我进去，我没有立刻钻进指挥所。

敌军的重型火炮正向我们四周轰击，但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场，因为我军已在那里展开了反攻。

反冲击的主要兵力是坦克营和柳德尼科夫的步兵分队。他们都是刚刚投入战斗的。我看到，在我军的打击下，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向后败退。但过了 20—30 分钟，敌机飞来了，开始俯冲攻击。我坦克和步兵停止了前进，在原地向敌人射击。殊死决斗在两军的坦克之间展开了。双方的步兵都没有向对方靠近。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小时。

我觉得这一地段的局面是稳定的。我向舒米洛夫通报了这里的情况，就前往尤尔金国营农场，它是第 29 师的防御地段，位于阿布加涅罗沃以北 10 公里处。

在还没到达阿布加涅罗沃之前，我们在一辆已烧毁的 T-34 坦克旁边把汽车停下来。决定稍吃一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们都已饥肠辘辘，都感到分发的食品不够吃。但是，正当我们席地而坐，打开罐头，准备就餐时，我发现距我们的“餐桌”只有一米远的草地里，竖着一个烧焦的、发黑的人的胳膊。我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大家顿时大倒胃口。我们站起身，丢下摆在报纸上的食品，坐上车走了……。

在第 29 师指挥所里，我遇到了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

看来，他不大愿意坐在方面军司令部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敌军飞机轰炸自己步兵的情景。刚才，这里曾发生短暂的枪战，我们的部队迅速撤

退到新的防线，诱使敌步兵快速向前推进。正在这时出现了敌机。它们以20—30架为一个机群，轮番地轰炸自己的军队达半小时以上。德军步兵和坦克兵被炸得抱头鼠窜，他们向天空发射了几十颗白色信号弹，意思是：“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敌机并不善罢甘休，一直轰炸到没有炸弹为止。

我军实施的机动虽不复杂，但却非常巧妙，我步兵部队迅速地撤离敌空军准备轰炸的阵地，这样就把敌人引诱到自己的俯冲飞机的火力之下。

晚上，我决定返回集团军指挥所，它位于泽塔以东10公里的一个凹地里。

在接近第74会让站时，我们看到一大群红军战士越过铁路，向北撤退。听不到枪响，也看不到后面有追兵。我们三人下了汽车，命令他们停止退却，返回铁路另一侧构筑工事。

过了一会儿，柳德尼科夫师的几个连排长来了，我命令他们坚守这块阵地。我们没能赶到柳德尼科夫的指挥所，因为天色已黑，夜间出发可能会遭遇德国人。

在铁路道口，我们遇上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军官（他的姓名我已记不得了）。他告诉我，舒米洛夫和整个司令部的人都在打电话找我。这时，我才想到，我已近10个小时没有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了。

M·C·舒米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J·T·谢尔欠克、H·H·阿布拉莫夫、参谋长A·A·拉斯金都与我相处得很好。我们结识不久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工作中大家齐心合力，并总是互相关照（直到我离开这个集团军，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友好气氛）。而现在，他们突然不知我的去向。

他们的担心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这种“四处游荡”的将军失踪、牺牲或是被俘的事，时有发生。

我走进司令部，舒米洛夫一见我就高声喊道：

“他在这儿，找到了。”

他立即给方面军参谋长打了电话，报告他我回来了。

大家责备我、骂我，但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异常的兴奋。他们因为久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已经命令柳德尼科夫和其他部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搜寻我，至少要找到被打毁的汽车。可是，我竟平安地坐着自己的汽车回来了。

2

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在继续进攻，他们从南面穿过通杜托沃实施其主要突击。8月21日，他们楔入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的接合部达15公里。这就增加了哥特集团军从南面突破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的危险。

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A·A·叶廖缅科，为了加强对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从我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线上，抽调了4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4个近卫迫击炮兵团和坦克第56旅，用于加强斯大林格勒以南由第57集团军防御的危险地段。这些部队阻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但是这一调动却削弱了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而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正准备向他们的接合部发动进攻，从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

从8月13日起，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A·A·叶廖缅科将军统一指挥。B·H·戈尔多夫将军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副司令员。

敌人计划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伏尔加河的同时，还企图从纵深包围

我第 62 集团军的右翼。后来，他们是相当认真地实施包围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这一计划的。

1942 的 8 月 23 日，斯大林格勒面临危急关头。这一天，敌人突破了第 62 集团军在韦尔佳奇和彼斯科瓦特卡地段的防御。敌坦克第 14 军和步兵第 8 军的 3 个步兵师，2 个摩托化师和 1 个坦克师涌进了这个突破口。敌人的先遣营在 100 辆坦克的支持下，从雷诺克村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

形势万分危急。任何一点惊慌失措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德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正是想引起我军的恐慌，并利用这一点攻入斯大林格勒。敌人于 8 月 23 日白天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进行了近 2000 架次的轰炸飞行。从战争开始以来，敌人的空袭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斯大林格勒这座沿伏尔加河绵延 50 公里的大城市，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灾难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数以千计的家庭。在这一天中，共有 120 架敌机被我空军和高炮部队击落。轰炸一直持续到天黑。

但是，这场狂轰滥炸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中间引起惊慌和混乱。军人和市民们都坚决响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城市党组织的号召。著名的工厂，如拖拉机厂、“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和发电站，都变成了防御的堡垒。工人们一边生产武器，一边和部队并肩保卫工厂。头发花白的察里津保卫战的老英雄、炼钢工人、拖拉机厂工人、伏尔加河上的水手、装卸工、铁路工人、造船工人、职员和家庭妇女、父亲和儿子，全市人民同心协力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由 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10 师和斯大林格勒卫戍区的其他部队，也进入了战斗阵地。

战斗越来越激烈。德国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德寇愈是接近城市，战斗就愈加激烈，红军战士就愈加勇敢。如果要打个比喻，那么，可以把我军在这些日子的防御看成是弹簧，压得越紧，弹力越大。

德军第 6 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的首席副官，在记述这些天的战斗时写道：“苏联军队寸土必争。坦克第 14 军军长冯·乌特斯海姆将军的报告简直使我们难以置信。……他写道：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市人民的支援下实施反攻。市民们也拿起了武器，表现得异常英勇。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经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坦克驾驶仓里，呆坐着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从未见过。”

B·亚当：《困难的抉择》，德军第 6 集团军一个上校的回忆录，莫斯科，1967 年版，第 106 页。

在这几天里，在斯大林格勒以西 40 公里的小罗索什基地区作战的 33 名军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是第 62 集团军步兵第 87 师第 1379 团的战士。带领他们作战的是副指导员、共青团员列昂尼德·科瓦廖夫。他们虽然身陷重围，却没有后退一步。德国人用 70 辆坦克多次冲击英雄们的阵地。战士们的粮食吃完了。天气酷热，可他们连一滴水也没有。但是，他们没有丝毫动摇。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共打毁敌军 27 辆坦克，打死敌人近 150 人。

鉴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遭到顽强抵抗，德军统帅部开始不断加强其进攻力量。战役规模越来越大。

虽然 8 月 23 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但是，他们未

能扩大突破口，并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地区。沿雷诺克——斯帕尔达诺夫卡——奥尔洛夫卡一线，各村庄临时组织起来的防御阵地变成了敌人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斯大林格勒北郊，数百名劳动者以及防空高炮部队的战士和第62集团军的军人们，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德军无法从这里攻入城里。

在南面，在第64集团军的防御地段上，敌人也未能冲到伏尔加河。我军的多次反攻击使敌军伤亡惨重。

在这段时间里，我军防御最薄弱的环节是在第62集团军的右翼，也就是在科特卢班车站和科内会让站一带。假如敌人哪怕是将两个师从科内会让站转过头来，沿铁路向南进攻，那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到位于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后方的沃罗波诺沃车站，从而切断这两个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联系。

但是，希特勒的将军们看来是想一箭双雕：在行进间夺取城市，同时包围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他们只认定这个目标，却没有发现苏联军队的抵抗正变得越来越顽强。他们想用狂轰滥炸动摇我们的军心，但是这个算盘也打错了。全市人民承受住了这次极为野蛮、极为残酷的打击。

第62、64集团军实际上已被装进一个口袋，口袋的底部在顿河岸边的利亚皮切夫村，北侧在伏尔加河边的雷诺克，南侧在通杜托沃火车站。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要从通杜托沃车站南面前出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红军城，需要沿直线走15公里。

德军司令部认为形势很有利，可以迅速夺取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因此，希特勒要求保卢斯将军和哥特将军在8月25日拿下斯大林格勒。

现在，只有全军将士，即从方面军司令员到每一个士兵都表现出果敢顽强的精神，才能挽救我们的军队。我们知道，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已作出决定，要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我们懂得，在这里，在伏尔加河，决定着1942年整个战争的命运和结局。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在整个战局中的地位与1941年的莫斯科很相似。在这里集中了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主要的战略、政治和经济目标。

1942年秋季，在伏尔加河地域进行的战斗是如此炽烈，以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苏联军队能否守住斯大林格勒，将对整个战局发生极大影响。

尽管局势十分严重，第62、第64集团军在防御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对敌军主力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击。8月下旬敌人企图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经通杜托沃火车站、直扑向伏尔加河。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使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所有军队都陷于包围之中。我们必须阻止敌人在我防线南部的这一楔形攻势。

最高统帅部有计划地加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力量。从8月1日至20日，共向这两个方面军派去了1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军。但由于铁路通过能力有限，这些部队不能如期抵达前线。只有5个步兵师在8月20日之前到达卡查林斯卡亚地区，而各坦克军要在8月23日或24日才能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区。由于顿河和伏尔加河的中间地带局势紧张，方面军司令员不得不命令这些刚刚开到的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即没有给它们划定在战线中的位置，又没有给它们时间进行战斗准备。

从统帅部预备队拨出的由M·C·克尼亚泽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315师，在8月23日以强行军的速度前往戈罗吉什地区，以便在内围廓占领防御。当

天下午，该师在行军途中，先后遭到敌机和从韦尔佳奇地域冲进来的敌军坦克的攻击。

由 B·A·格拉兹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35 师，奉命在中国廓占领防御。但它的先遣支队 23 日夜间接才抵达防线。在科特卢班车站以南，由 A·A·斯托利亚罗夫大尉率领的先遣支队，与一大股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展开了战斗。敌人向我先遣支队的阵地发动了 5 次冲锋，均被打退。激战中斯托利亚罗夫大尉中弹牺牲。鲁边·鲁伊斯·伊巴露丽上尉接替了指挥职务。伊巴露丽上尉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了。

鲁边·鲁伊斯·伊巴露丽牺牲后被授予大尉军衔并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他的骨灰现在安放在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近卫步兵第 35 师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攻击，还未占领防御阵地，就被迫撤退到萨莫法洛夫卡地区。

为了消灭突入到伏尔加河的敌军，我军建立了两个突击集群。第 1 突击集群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 H·A·科瓦连科少将指挥，其编成内有坦克第 4、第 16 军，步兵第 84、第 24、第 315 师。该集群的任务是，8 月 25 日清晨向苏哈亚梅切特卡山谷方向实施突击。

第 2 突击集群包括坦克第 2、第 23 军，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装甲兵司令 A·C·什捷夫涅夫中将指挥。该集群的任务是，通过契尔洛夫卡向叶尔佐夫卡突击。这两个集群的任务是，以协同的动作围歼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域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

为了恢复顿河左岸的防御态势，方面军司令部发布了如下命令：坦克第 4 集团军左翼的近卫步兵第 27 师和第 298 师，从北面向韦尔佳奇实施突击，歼灭当面之敌，并推进到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一线；第 62 集团军的右翼，包括配属给该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 35 师和坦克第 169 旅，向佩斯科瓦特卡进攻，并在日终前抵达韦尔佳奇——

佩斯科瓦特卡一线，在顿河左岸与坦克第 4 集团军会合。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继续留在城内。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 月 26 日，在小伊万诺夫卡地区设置了辅助指挥所，在那里坐阵的是方面军副司令员 H·A·科瓦连科少将和方面军参谋长 C·H·尼基舍夫少将。

由科瓦连科将军和什捷夫涅夫将军指挥的两个突击集群的突击，迫使敌坦克第 14 军转入防御。8 月 26 日，在科特卢班地区的突破口只剩下一条 4 公里宽的走廊。保卢斯被迫从空中向这个军提供补给。

在这以前，敌人已经组织了强大的反步兵和反坦克的火力系统。敌空军这些天活动得特别频繁，他们有步骤地轰炸和扫射我行进中的部队，使我军无法在白天有组织地准备和投入战斗。

我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和第 62 集团军的右翼部

队，实施旨在挺进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佩斯科瓦特卡一线的反突击计划未能实现。

特别应该说一说这个时期的通讯工作。

战争的第 2 年，通信联络仍是我军的薄弱环节。德军所有部队都已配备了电台，而我军却仍以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经常出故障，于是不得不派出军官四处联络，而用这种方法指挥分散在开阔草原上的部队是非常困难的。

在敌军日益增强的压力下，我军被迫撤退。经常是印有“急件”字样

的命令送到部队时，命令中要求守住的村镇已经失守；有时甚至被指定执行命令的部队也已经名存实亡。

在大军压境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市党组织的工作特别紧张。州党委第一书记 A·C·丘亚诺夫领导的市防御委员会变成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战斗机构。在工厂区，工人们组织了工人营来保卫自己的工厂。这些工人营的工人来自拖拉机厂、“红十月”工厂、“街垒”工厂和其他企业，他们舍生忘死地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

数百名共产党员开赴前线，开赴斗争的第一线。对惊慌失措和贪生怕死的行为展开了无情的斗争。斯大林格勒市防御委员会发出告人民书：“亲爱的同志们！

亲爱的斯大林格勒公民们！

狂暴的敌人已经逼近我们亲爱的城市。像 24 年前一样，我们这座城市又在经历着艰难的时刻。散发着血腥气的德国鬼子要闯进充满阳光的斯大林格勒，要玷辱我们伟大的俄罗斯河流——伏尔加河……

斯大林格勒的公民们，同志们！

我们决不让敌人侵占我们亲爱的城市，决不让敌人毁掉我们的房屋和亲爱的家庭。我们要在所有的街道上构筑起不可逾越的街垒，要使每一座房屋、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街道都变成攻不下的堡垒。

所有的人都出来修筑街垒吧！大家组织起战斗队吧！在每条街道上都筑起街垒……在严酷的 1918 年，我们的父辈保卫了红色察里津。让我们在这 1942 年也护卫住荣获红旗勋章的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译注。

大家都去构筑街垒！

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起来保卫我们亲爱的城市，保卫我们的家园！”在烈焰滚滚的街区里，正在英勇战斗的有居民防空队、医疗卫生分队和消防队。不参加生产的妇女、儿童、老人以及伤员们被疏散到了伏尔加河左岸。内河港的船只和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艇，虽然在敌机轰炸中遭受巨大损失，仍冒着炮火向后方输送人员，再把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左岸运到右岸。区舰队还派出部分舰艇轰击突入到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敌军。

省和市的党组织在新到达的部队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他们和部队党委会一起，争分夺秒地组织工人队伍和部队连、营之间的协同动作。在这些日子里，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变成了战斗的堡垒。在党的领导下，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投身到抗击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去。从祖国内地开来的部队，看到城市军民团结战斗的情景后，都增强了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心。

在城市防御的南翼，局势也更加复杂了。约有 250 辆敌军坦克在通往红军城的接近地上进攻。8 月 24 日，德军坦克第 14、第 24 师和摩托化第 29 师从南面打到了索良卡林，但未能继续推进。我步兵第 422、第 244 师和近卫步兵第 15 师的反冲击，制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

在这些战斗中，炮兵分队的表现尤为出色。他们共击毁近 60 辆敌军坦克。

敌人对我近卫第 15 师的近卫炮兵第 43 团战炮排的阵地实施了强大的

航空火力准备之后，搭载着冲锋枪手的约 20 辆坦克开始进攻该排阵地。排长 M·F·赫瓦斯坦采夫上士，让坦克开近到可以用大炮直射时，才下令开炮，一举击毁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边射击边逃了回去。不一会儿，炮兵阵地上空出现了敌机、敌军坦克再次发起冲锋，在行进间向我军阵地开炮。许多炮兵战士负了伤。赫瓦斯坦采夫命令他们撤退，自己带领 5 名战士用一门没有被打坏的炮继续向敌人射击。他用几发炮弹又击中敌人一辆坦克。炮弹很快打光了。敌军坦克开始从两翼包抄这个排的发射阵地。炮手们全都牺牲了。M·F·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枝反坦克枪，在距坦克很近的地方向坦克开火，又打毁了一辆。其余的坦克冲了上来。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颗手榴弹，跳出战壕，向最近的坦克投了过去，但坦克没有被炸坏。他又迅速跳进战壕，敌坦克在战壕上反复轧了几遍。当坦克刚一开走，赫瓦斯坦采夫又跳出战壕，向它投了一颗手榴弹。他没有看到自己投出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落到什么地方，德军步兵的冲锋枪把他打倒了。

勇敢的炮兵上士 M·F·赫瓦斯坦采夫牺牲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这是我军英雄炮兵的功绩之一，而这样的功绩有几十例、上百例。

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在近一星期的战斗中毫无建树。他们损失了大量的战斗人员和战斗技术装备，被迫放弃了进攻红军城、尔后推进到伏尔加河的计划。

8 月 27、28 日，希特勒统帅部重新部署了部队，命令右翼部队向左翼运动，更准确些说，是向战线中部的阿布加涅罗沃、卡普金斯基地域调动。被调往该地区的有德军坦克第 14、第 24 师，摩托化第 29 师以及罗马尼亚的步兵第 6 和第 20 师。这些部队的任务是，向泽塔和纳里曼实施突击，穿过这两个村庄与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会合。我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的两个师面临被包围的威胁。

但是，敌军的机动被我侦察机关及时发现，方面军司令员命令第 62、第 64 集团军各部队撤退到新的防御地区。它们包括：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新希望”国营农场、大小罗索什卡、罗索什卡河左岸、切尔夫连纳亚河左岸、新罗加奇克、伊万诺夫卡等。

8 月 29 日夜，我和第 64 集团军工程兵主任 D·B·博尔

济洛夫斯基上校乘车去切尔夫连纳亚河沿岸地区勘察地形。我们当夜在驻守在佩斯昌卡村的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格军那里过夜。次日清晨，我们才开始勘察。

8 月 30 日上午，我们在新罗加奇克地区勘察时，看到了正在撤退的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卡尔波夫卡地区，战斗已经打响。第 64 集团军的部队距这个阵地还有 30—50 公里，我很担心这些部队不能及时退到新的防御区域，不能像 8 月 17 日我南部集团军撤退时那样悄悄地摆脱敌人。

中午，我们遇到了 E·A·戈利科夫将军，他受方面军司令员的指派，也在这里勘察地形。菲利普·伊万诺维奇见到我们很高兴，因为他可以把这一地段的勘察任务交给我们。而我很高兴，因为他当时就从自己的预备队中拨出一个反坦克炮兵团给我，而我可以用这个团封锁切尔夫连纳亚河上的几处浅滩。

8 月 30 日晚，德军飞机发现了这个阵地，并向反坦克炮兵团阵地上投了几颗炸弹。

我向舒米洛夫将军通报了我的勘察工作、新的防御地区的态势以及友

邻的第 62 集团军的情况。整整一夜直到 31 日上午，我们一直没合眼，我们等待着部队撤回新的防御地区。

31 日早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部队没能悄悄地摆脱敌人。

第 64 集团军各团渡过切尔夫连纳亚河之后，立即展开队形，占领战斗阵地。集团军指挥所设在腊瓦特卡山谷，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山林空地”国营农场。第 62、第 64 集团军的翼侧在新罗加奇克林附近接合。在左翼，第 64 集团军与 E·A·托尔布欣少将指挥的第 57 集团军会合。敌人不敢从行进间对我军新阵地发动攻击。

9 月 1 日，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的右翼和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左翼在旧罗加奇克地区会合，但是敌人的这次钳形攻势未能包围我军部队。从这以后，敌人的这两个集团军把进攻重点放到了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地区，即沿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至科捷尔尼科沃铁路一线。

9 月 1 日，德国人显然是忙于调遣军队和占领出发阵地，以便进一步发动进攻。9 月 2 日，他们开始对我军后勤设施、炮兵发射阵地和通讯枢纽部进行猛烈轰击。我们设在亚哥德纳亚山谷的备用通讯枢纽部被破坏。显然，德国人掌握了我军通讯枢纽部的位置，甚至对我军各指挥所的位置也很清楚。

9 月 3 日晨，德军在飞机轰炸和炮火准备之后，发动了全线进攻。中午 12 时，敌军已在我集团军左翼渡过了切尔夫连纳亚河。方面军司令员要求我们立即恢复原有态势，并命令舒米洛夫将军亲自到 128.2 高地指挥反攻。

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H·H·阿布拉莫夫带着通讯指挥器材，继续留在卡腊瓦特卡山谷波波夫村附近的指挥所里。中午，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他了解了情况以后，口头传达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几个命令，然后又沿前线往前走了。半小时后，我们这里遭到了空袭。大概是敌军侦察机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但我们无权转移指挥所，因为这里是通讯枢纽部，要从这里指挥部队。何况在空袭时，在开阔的草原上转移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在掩蔽部里继续工作。而掩蔽部的顶部，不过是 20 多厘米厚的木棍和土层。

我的办公桌上摆着几部电话。对面是军事委员会委员 H·H·阿布拉莫夫的桌子。掩蔽部只有 6 平方米，四壁是土墙，顶盖很低，里面又热又闷，尘土飞扬。顶上的土不时地从木棍和木板的缝隙中漏下来。

轰炸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渐渐习惯了，不再去注意引擎的轰鸣和爆炸的巨响。

突然，我们的掩蔽部仿佛被抛了起来。爆炸声震耳欲聋。我记不清我和阿布拉莫夫是怎样摔到地上的，桌子、凳子都被掀翻。在我们的头顶上，透过尘雾露出了一块天空，沙土石块从上面飞落下来，周围是喊叫声和呻吟声。

尘土稍稍消散之后，我们在距掩蔽部只有 6—8 米的地方。看到一个巨大的弹坑，直径约 12—15 米。周围躺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还有炸翻的汽车，炸坏的电台。电话通讯也被破坏了。

集团军的通讯中间站这时已经修复，它位于亚哥德内村附近，在集团军基本指挥所以南 2 公里处。我决定从那里与部队保持联系。

我带上副官克利莫夫和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内，乘我的汽车出发了。

但是我们的车刚开出山谷，敌机又开始轰炸我们的指挥所。飞机投放的是小型炸弹。我们看到，一群 D—

88 飞机超低空飞越我们指挥所上空，每架都投下 10—12 枚炸弹。接着它们开始追赶单个的汽车。一架容克飞机向我们的汽车俯冲过来。我们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靠沉着机智脱险的。

我一面紧盯着敌机，一面向卡尤姆喊道：

“直走，不要拐弯！”

我一见敌机投弹，就命令司机向右猛拐。高速行驶的汽车猛然来了个 90 度转弯，炸弹着地时，我们已开出 100 多米。

敌“容克”飞机向我们投掷了约 12 枚炸弹，但我们几个人谁也没有受伤，只是汽车的蓄电池箱被打漏，电解液流光了。马达不能发动了。刚才与敌机周旋的地方距指挥所才 300—500 米。

趁卡尤姆修理马达，我登上了一个土岗，发现德军坦克正从齐边科村驶出来。前面是 10 辆，然后又是 10 辆，总计大约 100 辆，坦克正从切尔夫连纳亚河谷中驶出来。它们在大路上排成纵队，向北面、向巴萨尔吉诺会让站方向驶去。

这时，我们得知，当敌机轰炸我们的部队和集团军指挥部的时候，敌军坦克趁机突破了我军在瓦尔瓦罗夫卡和齐边科地区的防御。现在，这些坦克距我们的指挥所只有 2 公里。很快，我炮兵向敌坦克开火了。于是，我决定不再去通讯中间站，我步行回到被炸坏的指挥所。在指挥所里，我又见到戈利科夫将军，他又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和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系已经恢复。我得知，德国军队已在两处突破了第 64 集团军的防御：一处是在齐边科村镇附近；另一处是在纳里曼村镇附近。

第 62 集团军防域地段的形势也很不乐观。敌人已在罗索什卡河地域突破我军防御，扑向巴萨尔吉诺会让站一线。

天黑前，我一直留在指挥所。夜间，舒米洛夫才把我们召到新的指挥所，它设在别克托夫卡以西 5 公里的树林里。

第 62、第 64 集团军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向后退却，一直退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最后阵地。

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每条道路上，都是绵延不断的向后撤退的人流。集体农庄的庄员，国营农场的工人，拖家带口地向伏尔加河渡口赶去。人们把牲口、家什等所有能拿走的东西都带上了，什么也不给敌人留下。

3

9 月 5 日，敌人占领了沃罗波诺沃车站，并调集预备队，试图展开不间断的进攻，闯过萨多瓦亚车站。这里是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敌人在这个方向的突击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带着集团司令部的一组军官，分乘 3 辆汽车，前往距沃罗波诺沃车站 2 公里的佩斯昌卡。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一地段。

从佩斯昌卡村的西北角，可以清楚地看到沃罗波诺沃车站以及那里的德军高射炮、步兵和坦克。这时，空中出现了 7 架我军的伊柳辛式飞机。我们观察了这些飞机用火箭弹攻击敌高射炮和集结的坦克的情景。

我们都集中精神观看这场战斗，没有发现从南面飞来几架 D—88 型德军飞机。敌机发现了我们的汽车，立即就对我们发动了攻击。

庆幸的是，恰巧附近有一个很好的掩蔽部，那是第 64 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两三天前使用过的。我们立即钻进了掩蔽部。说实在的，再晚一点就坏了。到底有多少架飞机轰炸了这个村的西部，很难估计。但我们觉得，好像所有的炸弹都落在我们周围。轰炸持续了近 10 分钟。

当灰尘消散之后，我们发现掩蔽部的顶盖已有一半被掀开了。奇怪的是，我们当中谁也没被炸伤，谁也没有被顶部落下的木头砸伤。

我们走出掩蔽部之后，看到德国坦克正从沃罗波诺沃方面向上耶耳珊卡的我军阵地进攻。25 辆坦克冲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步兵。伪装和掩蔽在上耶耳珊卡村的我军坦克和步兵，向敌人开了火。

几次齐射之后，就有 7 辆敌军坦克中弹起火，其余的坦克立即调转车头，全速驶回了出发阵地。敌人以后的攻击也都被我击退了。

但是，我们的部队，首先是步兵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坦克手表现的十分突出，他们以准确的炮火击毁了 15 辆敌军坦克。

我来到坦克手们中间，我意外地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列别杰夫上校，他是 1937 年和我一起在基谢列维奇服役的战友。我当时指挥一个机械化旅，列别杰夫是营长。

我们的相会是短暂的，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列别杰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英勇牺牲了……

当我们经过“山林空地”国营农场返回司令部时，我们看到数架“容克”飞机排成环形战斗队形，正在攻击一片小树林，大概是发现树林里集结有我军的部队和辎重。我军的大口径高射机枪在射击敌机。路旁的菜园里停着一辆卡车，上面架有一挺机枪。一架 D—88 型飞机从编队中斜插出来，向这辆卡车俯冲。车上的两名机枪手毫不胆怯地向敌机开火。一串曳光弹击中了敌机。敌机想退出俯冲，但已经来不及了，一头栽进了距机枪手不到 100 米远的泥土里。

4

德军突破了我军的外廓防线，迫使红军退到内廓（市区）防线。随后，德军把其主力压上了我第 62、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即沿铁路从卡尔波夫卡车站到萨多瓦亚车站的那个地段。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一举占领斯大林格勒。

9 月初，活动在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防线正面的敌军有 9 个步兵师，3 个坦克师和 1 个摩托化师。这个敌军集团共拥有 500 辆坦克，向它提供空中支援的是第 4 航空队的 1000 多架飞机。

在这一地区上空作战飞机的敌机，每天达 1000 架次，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对城市实施空袭的飞机。

德军与防御斯大林格勒的我东南方面军的部队相比，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这以前已被大大地削弱。第 62、第 64 集团军的某些师只有 500—1000 人。

在这两个集团军防御地带作战的 10 个坦克旅，总共只有 120 辆坦克。

鉴于斯大林格勒的严重局势，最高统帅部在 9 月 3 日的训令中，要求统帅部代表 I·H·朱可夫大将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训令中说：“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现在距斯大林格勒只有 3 俄里。如果我北部集团的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

你应该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

援助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

1 俄里等于 1.067 公里——译注。

见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 3 个集团军正在城市以北集结，其中有 С·К·科兹洛夫少将指挥的第 24 集团军，其编成内有 5 个步兵师和 1 个坦克旅，Р·В·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第 66 集团军，其编成内有 6 个步兵师和 4 个坦克旅。此外，还有 Н·С·莫斯卡连科的近卫第 1 集团军。该集团军正在集结，人员物资补充即将完成，其编成内有 8 个步兵师以及 3 个还在途中的坦克军（坦克第 4、第 7、第 16 军）。

拥有近百架飞机、由 Е·Л·鲁坚科空军少将指挥的空军第 16 集团军，也被编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这个空军集团军应使用于支援从北面和从西北面向敌人实施反冲击的部队。

为了完成统帅部规定的任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决定，除上述 3 个集团军外，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左翼部队也参加反突击。空军第 8 和第 16 集团军应掩护方面军各部队的集结，并对敌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实施突击，保障部队的进攻。

我们当时知道，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正在集结着我军强大的反突击力量。他们的任务是，消除已经形成的从韦尔佳奇至伏尔加河的敌军走廊。击退敌军，并与第 62 集团军会合。

同时还应指出，德军从罗索什卡河——切尔夫连纳亚河一线推进到我内廊防线之后，他们的前进速度降低了。敌人开始做攻城准备，在行进间对部队进行扩充和调整。

我们以为，最高统帅部和方面军指挥部将会等到保卢斯的集团军陷入城市巷战以后，再选择时机向德军翼侧实施突击。

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在斯大林格勒北面所发生的情况。

Н·Е·莫斯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1 集团军，预定在 9 月 2 日发起进攻。但是，该集团军未能如期到达出发地域。

这段时间，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里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是 И·Н·朱可夫。他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副手，在这里拥有全权。统帅部不断地催促他把那 3 个集团军投入战斗。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引用了一段他和最高统帅部的电话谈话。朱可夫请求推迟反突击的时间，以便各部队完成集结和完成前送弹药、物资等工作。斯大林回答说：

“您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到你什么都弄好了再动手？……叶廖缅科断言，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朱可夫接着写道：

“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许按原定时间 5 日发起总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

И·Н·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 1978 年版，第二卷第 72 页。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最高统帅的这些谈话和高级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

但我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I·H·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敌人已被阻止在内廊防线上，他们的进攻速度缓慢，行动犹豫。攻到城下和夺取城市是两码事。我们的军队在郊区顽强地抗击着德军，敌人将会陷入巷战之中而不可自拔。

但是，统帅部仍在不断催促。

9月3日，近卫第1集团军转入进攻。但是，进攻开始时，部队没有得到炮兵和航空火力的充分的准备和有利的支持，而且不是所有部队都到达了出发阵地。该集团军只前进了5—6公里，就被敌人阻止住了。

敌人这时在内廊防线上调整兵力。在9月5日以前，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9月5日，I·H·朱可夫执行统帅部的命令，命令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集团军发起进攻。但是，这次进攻也没有准备好。I·H·朱可夫写道，炮火的密度不大，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系统，而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进攻部队未能全部完成预定任务。

城北的苦战一直持续到9月15日。那里的部队在50公

里的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但是，我军既未能继续向前推进，也未能夺取敌军阵地，进而向南突破，向斯大林格勒靠拢。

9月12日，最高统帅助理I·H·朱可夫和国防委员会代表I·M·马连科夫向统帅部呈送了以下的报告：

《莫斯科，斯大林同志。

.....2. 我们没有停止第1、第24、第66集团军已经开始的进攻，我们正在坚决实施进攻。

正如我们已向您汇报过，我们把掌握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投入了这次进攻。

未能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的原因是，我军的炮兵和航空兵弱于敌人。首先发起进攻的我近卫第1集团军，既没有1个加强炮兵团，也没有一个反坦克炮兵团或防空火炮团。

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迫使我们没等部队集结完毕和加强炮兵的到达，就于9月5日把第24和第66集团军投入了战斗。

各步兵师是在50公里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

由于各部队匆忙投入战斗，又缺少加强兵器，我军未能突破敌人防线，并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但是，我们的迅速突击却迫使敌人把其主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转过来对付我们，这就缓和了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如果没有这次突击，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被敌人占领了。

3. 我们未给自己规定统帅部不知道的任何其他任务

.....》。

见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到9月12日，第62、第64集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经过英勇抵抗之后，撤退到距城市2—10公里的防线上。这时，在庫波罗斯诺耶地域的敌军已前出至伏尔加河，从而把第62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分割开了。

第62集团军担负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和工厂区。它的防御正面从伏尔加河右岸的雷诺克村开始，经奥尔洛夫卡、戈罗吉什和拉兹古

利耶夫以东地域，再经实验站、萨多瓦亚火车站到库波罗斯纳亚。奥尔洛夫卡距伏尔加河的最大的距离只有 10 公里。9 月 13 日，双方直接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打响了。

5

1 个半月的战斗生活，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使我有可能在战斗中研究敌人并分析他们的战役企图和战术思想。

用两个楔子插入我军防御纵深，然后在某一点上会合，这是德军将领们一切战术思想和战役企图的基点。由于德军在飞机、坦克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突破我军防线，插入楔子，造成一种包围的假象，从而迫使我军撤退。但是，只要用顽强的防御或反冲击，阻止或粉碎其中一个楔子，另一个就会悬在空中、失去依托。

在战术上，敌军也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只有在坦克已经接近攻击目标时，步兵才进攻。

而坦克的进攻，一般又要等到敌机已经飞到我军头顶上时才实施。只要打乱这个顺序，敌人的进攻就会受挫，他们的部队就会败退回去。

例如，在顿河沿岸，第 112 师就连续几天成功地打退了敌人在上奇尔斯卡亚和新马克西莫夫斯基地域的进攻。那时，敌机不敢飞近我军阵地上空，因为附近配备着掩护顿河铁路桥的强大高射炮群。

在阿克赛河也是这样。敌军坦克没有及时支援步兵，所以步兵很快就被打退了。

在普洛多维托叶、阿布加涅罗沃和许多其它地段的战斗也是如此。

侵略者经受不住我军的突然打击，特别是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我们每一次对密集敌军的火炮攻击都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德国鬼子害怕近战，他们在距我军 1 公里或更远的地方，就开始用冲锋枪射击，子弹连一半距离都达不到。他们放枪是为自己壮胆子，同时也想吓唬我军战士。他们害怕我军部队在反冲击时接近他们，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德军步兵同坦克和航空兵的通信联络组织得很好，特别是通过信号弹和无线电台进行联系。敌人步兵常常用几十发、几百发信号弹，向自己的飞机指明部队和阵地的位置。我军指挥战员摸清了这个信号系统，常利用它迷惑敌人。

在分析敌人的战术和战役手段时，我努力寻找对付敌人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经常考虑，怎样在战场上消除或削弱德国空军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我军战士的心理影响。我想起了在国内战争时与白匪和波兰白军的战斗。当时我们没有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敌人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进攻。我们跑步接敌，使敌人炮兵来不及修订标尺轰击我们。战士们齐声高喊着“乌拉！”冲上去，这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因为我们的冲锋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我得出结论，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斗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变换各种办法与敌人展开近战。我们应该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航空兵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要使每个德国兵都觉得，他正处在俄国武器的瞄准之下，随时都可以请他饱尝一颗致命的铅弹。

这些想法是我在思考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时产生的。我觉得，恰恰是在这城市争夺战中，才可以迫使敌人接受近战，并打掉敌人手中的主要王牌——空军。

1942 年 9 月 11 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召见我。这个军事委员会是斯

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和联合军事委员会。

我告别了舒米洛夫、阿布拉莫夫、谢尔久克、拉斯金内和其他同志，乘车从别克托夫卡前往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亚梅。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离开战场，没有看到自己的后方了。

通往后方的道路繁忙拥挤。小路上挤满了后撤的部队和难民，法西斯飞机对这些向东疏散的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袭击。渡口上拥挤不堪。在伏尔加河各条支流运行的渡船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超载。

在伏尔加河岸边，聚集着许多满载伤员的马车和汽车。看到这种情景，我心如刀绞，但我去爱莫能助。人们看到我佩带着将军军衔，都围拢上来询问：“城里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放弃斯大林格勒吗？”“什么时候停止撤退？”。

我当时不知道统帅部和方面军首长的计划，但我始终坚信，我们将全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我们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我对伤员们说：“不可能放弃！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但是，当人们问我，什么时候来船把他们运走时，我却无言以对。

伤员们躺在露天里。身上的绷带沾满了血污和尘土，看上去象染过颜色的树皮。饮食没有保障。医护人员累得东倒西歪。

在一个渡口旁，有一所野战医院。我走进手术室，那里正为一个背部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战士做手术。外科医生和护士们的脸色比他们的工作服还要白。他们劳累过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惫不堪。伤员在呻吟，手术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红的纱布。医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继续工作。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又要做下一个，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几个了。

另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被抬上了手术台。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着什么。从伤口上取下绷带时，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没有喊出声来。其他几张手术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感到头晕，感到有点恶心。这里也是前线呀。

夜里，我们渡过了伏尔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行车可以不开大灯。我们沿蜿蜒的道路行驶，有几次几乎是沿河边走。有时德军炮弹飞过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轰击从东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没有经过战阵的人 would 以为，在这火光冲天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毁灭了。但我知道，在河对岸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是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

我们一行4个人：我、我的副官 I·A·克利莫夫、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和传令兵列沃利德·西多林。

我们午夜时赶到亚梅村，更确切些说，我找到了不久前亚梅村所处的位置。德军用远程炮火和空中轰炸摧毁了这个村子，残破的房屋被我军拆去构筑掩蔽部或当柴烧了。当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方面军司令部，甚至连一个知道方面军司令部现在何处的人都没找到。

记不清我们坐着车在这村子周围绕了多久。大约午夜2时，我们找到了第64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丛做了巧妙的伪装。值

班将军告诉我，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参谋长刚刚躺下休息。召我到司令部来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议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说。毫无办法，我只得去找亚历山德罗夫借宿。

战斗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个觉。战场距这里 8—9 公里，与敌人隔着一条伏尔加河，所以我不用担心夜里会发生意外。

9 月 12 日 10 时整，我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并立即受到司令员廖缅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H·C·赫鲁晓夫的接见。

他们向我宣布，我已被任命为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并向我交待了任务。

他们的指示大意是：德国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我军不能把斯大林格勒交给敌人，不能继续撤退，也无处可退了。而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洛帕京将军认为，他的集团军守不住城市。

最后，方面军司令员问：

“崔可夫同志，您怎么理解这项任务？”

我没想到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也无需多想，因为一切都很明确，不言自明。我立即答道：

“我们不能把城市交给敌人，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城市。现在我不提任何请求，但在研究城市形势之后，我将请求军事委员会给予援助，而到时请帮助我。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就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认为我正确地理解了任务。

我们告别了。我想尽快地单独呆一会儿，思考一下，我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敌人已兵临城下。

走出掩蔽部后，我找到方面军参谋长 I·E·扎哈罗夫将军，了解第 62 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位置。

出发准备很简单。只能带最必需的东西，否则汽车装不下。我命令传令兵列沃利德留在左岸，找到第 62 集团军后勤部并留在那里工作。列沃利德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没理解我的意思。

“怎么啦？”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一切都明白了。我不由地想起他是怎样成为我的传令兵的。

列沃利德当时 16 岁，是共产党员季莫费·西多林中校的儿子。战前，西多林中校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我就认识他。

战争开始后，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了西多林。他是第 64 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

1942 年 7 月 26 日，西多林中校在顿河渡口旁牺牲。我曾几次见到老西多林和他的儿子在一起，他们形影不离，而且彼此长得很像。7 月 26 日晚上，这个小家伙到指挥所来找我，报告说：

“司令员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遗体已运到。”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死者的儿子，所以一时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扭过头对他说：

“交给司令部警卫队长，叫他们挖好坟坑，准备乐队和葬礼所需的其他

东西。”

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不知道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很生硬。

等到列沃利德走开后，我告诉阿布拉莫夫：

“他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

“真的？！”

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16 岁的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请求爸爸带他去前线。他爸爸让他在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当了一名列兵。

他很勇敢，枪又打得好，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安葬西多林中校时，我不在场。第二天早晨，我准备去自己的观察所。上汽车时，我看到了列沃利德。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不假思索地喊道：“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列沃利德从地上跳起来，弹掉身上的土，整了整军装，像箭一样跑去执行命令。他很快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汽车。路上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母亲被疏散到西伯利亚某地。我小心地问他，是不是想找母亲。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疼处。他坚定地说：“不去。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人报仇。”从那时起，列沃利德·西多林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很安心，甚至在战斗中，也是高高兴兴的。他什么都不怕，只是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地为他死去的父亲流泪……

想到这些，他看了看他的眼睛，又带上他回到炮火连天的城市里。

列沃利德·西多林至今仍在苏联武装部队中服役，军衔是中校。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

6

在前往第 62 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往事。人生中有这样一些日子，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仍然使人精神振奋，受到启示。

1919 年 5 月 4 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它是我的第 2 个生日。在那天，我被接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 1918 年 11 月起，我就参加了党的同情者小组）。

那天早晨，我被通知参加团党支部的会议。

“晚上，我们要讨论你的入党申请，”一个共产党员告诉我说。

我很兴奋。整整一天我不是按小时、而是按分钟计算着时间。我努力埋头工作，但是办不到。头脑中思绪万千，使我坐卧不宁。当然，我们团的共产党员不会说我胆小、懒惰、或是不关心他人。

在这方面，我是不担心的。但是，做一名伟大列宁缔造和培育的党的真正党员，我够格吗？还应做哪些事才能对得起列宁、对得起列宁党的党证？开会时间到了，我心中忐忑不安……

共产主义营的政委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戈尔布诺夫主持会议。会上，首先悼念了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们。然后，师政治部代表向党组织传达了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详细地介绍了代表大会讨论的几个军事问题。接着，讨论党员发展。

最后，会议主席宣布：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提出了入党申请……”

我站起来，立正站好。有人惊奇地说：

“我们一直以为崔可夫是共产党员呢。”

“谢谢！”我慌乱地回答说，接着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经历。

会议主席问：

“有要发言的吗？”

首先发言的是2连连长瓦尔杰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接着是骑兵侦察班长瓦西里·费多托夫。

大家结合作战情况评价了我的工作，因为那时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执行战斗任务。

同志们一致同意接受我入党。表决后，我感到自己已经是苏维埃俄国的执政党——列宁党的一员了。领到党证以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在被包围的时候，在进攻或退却的时候，都没有丢过它。

那时，全国各地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支援东部前线军队的工作。在我们东部前线各地区，也都在深入贯彻党的“八大”决议和“八大”制定的红军建军基本原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大会工作，这就保证了列宁提出的党领导军队的总路线的贯彻。托洛茨基贬低政治委员和军队党组织的观点，受到党的批判和坚决抵制。

4月10日，B·A·列宁发表了致彼得格勒工人信，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高尔察克匪帮。中央政治局仅在4月下半月，就6次开会讨论东俄的局势，对与高尔察克作战的各集团军，给予具体的指示和帮助。莫斯科、彼得格勒、雅罗斯拉夫利、萨马拉、喀山等城市的党组织，动员共产党员踊跃参加为东部前线组建的补充连和补充营。

4月底，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指挥的东线南部集团对高尔察克实施了主要打击。其作战路线是：从布祖卢克地区出发，经别列别伊到马法。高尔察克军队的左翼被击溃。这为我北部集团的第2集团军、继而是第3集团军的战斗准备和转入决定性的进攻，赢得了时间。

5月下半月，第2集团军，其中包括步第28师，准备强渡维亚特卡河。

……5月20日，也就是进攻前4天，弗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来到了马马得什。我在第3旅旅部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姓名、职务，旅长戈尼欣也在场。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般的人物。他中等身材，体格很健壮。不过，我当时没能仔细打量他。原因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强烈地吸引着我，那是一双兰色的大眼睛，同时是冷酷的、锐利的。想不看他的眼睛是不可能的。他看了看我，一开口就以“你”相称：

“你这样年轻就当上团长了？”

我立刻回答说：

“阿津同志，您也不老呀！”

“老是不老，但是活了很久了……是共产党员吗？”

“是，”我自豪地答道。

“你的团在哪？”

“正在城市南北两侧防御敌人。”

“你要防御很久吗？”

“我想，您一到来防御就结束了。”

戈尼欣旅长插话说：

“阿津同志，他觉得进攻比防御更带劲……”

阿津看了他一眼，戈尼欣没有说下去。

“这要以后看”，阿津转向我说：“两小时后，到这里来，我们去看看对手。”

“是！”我回答道，并按条令做了个向后转，走了出去。

两个小时后，我骑着我的棕黄色的马，准时来到旅部。门口已经备好了两匹马。我下了马，把僵绳交给了传令兵。

阿津和戈尼欣从旅部走了出来。这时，我有机会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师长，他的肩很宽，动作灵活，步伐矫健。他的打扮相当奇特：高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制服，领口敞开着；肥大的哥萨克裤子下面是一双带马刺的靴子。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子，帽子戴得稍向后偏，这就特别突出了他那宽大的前额和向右梳着不十分浓密的、柔软而色淡的头发。手中还提着一条长长的马鞭。

他跳上自己的顿河种马，立刻向城北奔去。跑上田间大路后，他勒住马。我一直一步不落后地紧跟在他后面。

阿津看了我一眼，问道：

“很早就会骑马了吗？”

“6岁学会的。”

这时，戈尼欣也赶上来了。阿津用手指着东面的敌占区，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

从我们站的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河的对岸和地平线上连绵的高地。我回答说：“强渡维亚特卡河之后，我将通过亚科夫列沃村向前进攻，以便夺取村东的几个高地。”

阿津说：

“你对任务的理解是正确的。只有夺取这些高地，才能保证其余部队渡过维亚特卡河。”

他又问：

“占领这些高地之后，你准备留多少预备队？”

“大概一、两个营。”

阿津惊讶地转过身来：

“什么？”

“是这样……我的团现有5个营，而不是编制规定的3个营，所以我可以大方点。如果行动顺利，就得留两个营作预备队。”

听了我的回答，阿津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

“派谁担任前卫？”

“用轮船和驳船可以一下子运过1营、3营……和乐队。”

“什么乐队？要它干什么？”阿津皱起眉头。

“团的乐队……为了让大家战斗得愉快。”

“是这样，明白了。你自己这时在什么地方？”

“就在轮船上，我留副团长指挥其余部队渡河。”

“对，”阿津赞许道，又警告说：“记住，整个战役成功的关键在于速度。”

阿津再次肯定了我的各项安排，就让我回团里去。他带着戈尼欣向北奔去，寻找左邻部队去了。

他们走后，我回想我们的谈话、师长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我明白了，勘察地形时，师长暗暗地对我进行一次军事考核。此外，我还确信，我对师长的渡河计划的理解是正确的。

回到团部后，我见到了师政委 T·H·佩拉耶夫。他十分平易近人。深棕色的眼睛带着关心和信任的神情，说起话来温和平静，但每个词都像钉子一样钻进你的头脑。总的说来，他不愧为阿津的战友。和他一同来的是我们团的新政委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杰尼索夫。对此，我十分高兴，因为一个团没有政委，就好像一条船没有桨一样。

杰尼索夫黑脸膛儿，黑头发。他当即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1918 年入党，原是坎巴尔克工厂的工人，工厂在卡马河左岸、萨拉普尔后面。

“其他情况我们以后在工作中会互相了解的……”初次见面，我就感到政委是个性格刚毅的人。

佩拉耶夫询问了战士们的情绪、给养、服装和弹药等情况。我回答说，这些当然都不充足，但我不想叫苦，我们可以自己解决。接着，师政委衷心地祝贺我加入了党组织，这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忍不住地向他讲自己在会前的激动心情和想法。还讲了会议的经过。我讲话时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格奥尔吉·尼古拉耶维奇听得很认真。

“好，我希望您能永远记住这件事。”他说。

“这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我回答说。

7

国内战争有许多独特的斗争组织形式。武装起来的人员被编组为军队的不同的战斗单位——团、旅、师、军或游击队。他们懂得斗争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自己的战术方法。他们积极主动，而不是墨守成规。每次战斗都有创新。在这种战争中，如果不能经常地创造性地认识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就必然在第一仗、最多在第二仗惨遭失败。高尔察克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军官，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库中得到的当时是很完善的军事技术装备。因此，同高尔察克军队的斗争就更加艰巨，因为妥协是没出路的。对高尔察克来说，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而对我们来说，只能胜利。

高尔察克的富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们，让自己的部队去占领交通干线、铁路枢纽、重要的行政中心、工业城市和产粮区。他们组建了强大的机动部队和兵团。与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居民点、道路和江河地的斗争。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即使在高尔察克军队暂时停止进攻的时候也没有。他们仍旧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精悍的自卫军军官指挥的、装备齐全的机动部队上。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这段时间里，保卫共和国的军队，同样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实施同样的机动进攻战役；他们也没考虑到，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已经成为战斗的联盟，而全国劳动人民、甚至包括高尔察克匪帮后方的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成为我军完成战斗任务的依靠。

党提出的“全力反击高尔察克！”的口号，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毫不留情地粉碎白匪军，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个口号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纲领。

这次我组织全团准备进攻时，我就预测了进攻的发展进程，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估计。我设想了一幅战术画面：敌人防御，我们进攻；敌人希望我们正面进攻，我们却要寻找侧翼；但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敌人又调整了

部署，并重新占据着防御我进攻的有利阵地。其结果是，我军不断地遭受损失。这就是说，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敌军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支很好的侦察队。这支侦察队要象人们常说的，成为指挥员的耳目。

同时，我认为，防御和进攻一样，也需要侦察，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抽调优秀的战士，组织骑兵侦察队和步兵侦察队。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骑兵侦察队上。该队队长由智勇双全的菲利普·古里亚诺夫担任。他挑选了近 40 名久经征战的老兵，都是和他自己一样勇猛的骑手，而且枪法准确，刀技娴熟。他们中的每个人我都认识，经过前几次战斗，我对他们都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身材高大、骨骼粗壮的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向我走来。他的手很长，背微驼，脸上长满粉刺，说起话来带着鼻音。

“崔可夫同志，您吩咐吧！”他站在我面前说道。

“你会干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会。”

“比如说呢？”

“你愿意的话，咱俩摔一跤，可是，如果我把你的骨头摔断了，你可别怪我。”“还会什么？”

“枪打得准，还能在骑马时藏身在马肚子下面。难道你不知道是我把杜金团长连人带马从泥潭里拉出来的？”

我们聊了起来。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曾经在沙皇禁卫军猎骑兵团当过兵，后来参加过攻打冬宫的战斗，B·A·列宁在斯莫尔尼宫时，别尔德尼科夫曾多次担任过大厦警卫。同雅科夫·马克西莫维奇·别尔德尼科夫一起参加骑兵侦察队的，还有他的朋友伊万·帕拉特尼科夫。据别尔德尼科夫介绍，帕拉特尼科夫的听力像鸟一样灵，夜间能看见东西，而且动作敏捷，任何妖魔鬼怪都会被制服。

我觉得米哈伊尔·佩列沃希科夫也很有意思。他是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头脑机灵，身手矫健，他甚至可以追上狂奔的马。

安德列·西帕伊洛夫、瓦西里·费多托夫、格里戈里·桑尼科夫、费奥多尔·罗季奥诺夫、伊万·奥西波夫、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他们像一个人一样，都是既勇敢、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战士。古里亚诺夫选入侦察队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勇士……

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没有错看他们。

1919 年 5 月 24 日凌晨，两艘战船开到了马马得什码头

附近，它们负责掩护拖挂着驳船的轮船。步兵第 249 团首先登船，接着是我们团。

战士们动作很快。阿津站在码头上，不时给战士们打气。一辆装载机枪和弹药的马车停留在栈桥上，阿津向驭手骂了一句。

“你骂什么？”驭手说道：“没看到车子重吗？快帮一把！”阿津跑到车子跟前，在战士们的助威声中，合力推起车来，马车很快就上了驳船。

两个营的部队、乐队和一门 3 英寸口径折大炮都上了船。

我走到阿津跟前问：

“可以开船了吗？”

他让我转过身，面对轮船，拍着我的后背，喊道：

“前进吧，敌人的末日到了！”

我们开船了，乐队奏起了《同志们，勇敢地向前》的乐曲，部队情绪高昂。我们全速驶向对岸，敌人沉默着。我们看到，从对岸靠别索尼赫村的地方，划来一条小船，船里有3个白军士兵，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他们趁还未开战，脱离了高尔察克军队。

在距对岸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轮船和驳船先后搁浅。我们立刻成了没有战斗力的活靶子。我来不及多想，马上问船长：“水有多深？”“一俄尺半到两俄尺。”

1 俄尺 = 0.71 米——译注。

我命令乐队：

“奏《国际歌》！”说完，我纵身跳入水中。

水不深，只到胸部。站在我周围的战士，也都跳入水中。河水好像开了锅。红军战士们纷纷从轮船和驳船上跳入水中。空中回荡着《国际歌》的乐曲，水面上挤满了向前游动的人群。水面上只能看见他们的头，有成百上千个头，都在朝白军占领的河岸方向前进。

一直在观察我们登陆的阿津，看见我们的船搁浅之后，立即命令火炮加强对敌军堑壕的轰击，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处境。我们终于登上了河岸。轮船和驳船在我们跳下水后离开了浅滩，开到岸边。我们搞了个码头，把大炮、大车和马匹从船下卸了下来。

敌人未经战斗，就退到了亚科夫列沃村和安济尔卡村以西的高地上。这说明敌军主力摆在纵深。1营在行进间占领了亚科夫列沃村并渡过了安济尔卡河。3营夺取了奇尔施村。

在亚科夫列沃村附近，炮兵架起了火炮。观察所设在教堂的钟楼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轮船拖着驳船又靠岸了，这次又运来了我们团的两个营。他们大约3小时后才能到达战场。

这时，在维亚特卡河注入卡马过的河口里，两军的江河区舰队展开战斗。高尔察克区舰队企图用全力把我军战船从维亚特卡河河口赶开，以便从后方攻击正在渡河的我军部队。而我军的区舰队根本没有想过撤退。整个河面都笼罩在浓重的硝烟中。

在预备营和另一门大炮与团主力部队会合之后，我们决定继续进攻。

太阳还很高，这时各营在两门大炮的支援下一齐发动了冲锋。敌人经不住我军的冲击，动摇了，向后败退下去，退到他们的下一个阵地——200高地。

位于右翼的营夺取了旧穆尔济哈村，已在新穆尔济哈村作战。

为了更好地观察战斗进程，我带着传令兵来到了新穆尔济哈村的北面。在那里，发现了正在实施反冲击的敌军散兵线。走在前面的是手握马刀的军官，刀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散兵线一排接一排。敌人随时可能打垮我军，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敌人把我军从已占领的高地赶到安济尔卡河，并继而赶到维亚特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

应当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传令兵骑马到共产主义营传达我的口头命令，要该营展开队形，从侧翼攻击敌人……但还没等命令送到，我团主力已开始向后溃退。

我骑的是棕黄色的马，身上穿着皮夹克。红军战士们应该认得我。如果认不出来，我也要迎着敌军官的马刀冲上去……

我迎着正在退却的部队飞驰过去。战士们停住了脚步，我冲进人群当中高喊：

“跟我来！”

说完催马就走。我想回头看看部队是不是跟在后面，又不敢看。最后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跟上来了！挺着刺刀跟上来了。周围子弹嗖嗖地飞，好像有一群蜜蜂在叫。但我既不能低头，也不能俯身趴在马背上，因为红军战士们会认为我胆怯了。

在距白匪军还有 200 米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动摇了。闪亮的马刀不见了，带着金肩章的军官们已经把背对着我们了……

我听到有几个人对我说：

“崔可夫，我们是不会后退的，你到左边去，我们的人正在那里撤退。”

我意识到，这一地段上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当我掉转马头，回目张望时，不禁毛骨悚然：我军散兵线正在缓慢地后撤，甚至连枪都不打，白匪军的散兵线在后面追赶；在 200 高地上，出现了敌军骑兵，大约有 150 人，正在展开队形，准备冲锋。

我冲到高地附近，看到一个可悲的场面。红军战士的散兵线停住了，白军距他们只有 20 米，站在前面的两个军官挥舞着马刀高喊：

“投降吧！”白匪军的骑兵正向这里冲来。

我高喊着“乌拉”，掠过自己的部队前面，来到两军之间。红军战士们立刻投入了肉搏战。两个白匪军当即被刺死，一部分敌兵向后逃跑了，其余的举起了双手。敌骑兵已冲到跟前，他们的脸都可以看清了。我来不及下达命令，就用手枪向近处的敌骑兵射击。身后传来我军战士射击的枪声。敌军的马匹和骑兵在我的眼前纷纷倒地。又过了一会，白军骑兵都逃跑了。

我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控制周围地区的那个高地。但是，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战士们开始挖战壕。指挥员在调整散兵线，填补空当，组织整个防线各段之间的联系。

不久炊事车来了。战士们盛满了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家也给我盛了饭。团政委杰尼索夫从左翼骑马来到了这里，他也精疲力竭了。

休息片刻之后，杰尼索夫和我又到各营各连去，向战士和军官们说明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并与友邻部队恢复联系。我们一直忙到深夜。

我们总结一天的战斗。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敌人已从维亚特卡河岸被赶走，这就可以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河。我团在主要方向上已向前推进 15—20 公里，从两侧控制住了马马得什至耶拉布加的大道。

但这一天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指挥人员伤亡很大。副团长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营长热列兹金负伤，部队失去了季亚科诺夫和舍夫佐夫两位营长，还有几位连长，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同学尼克，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由于缺少指挥人员，我们决定按编制员额把 5 个营合并为 3 个营。

我任命 1 营长谢尔盖耶夫为我的副手。前沙皇军队的军士库兹明接替了他的职务。2 营长仍然是布哈尔金，3 营长是安德里亚诺夫。

现在，团部有许多科、股、处，可在那时是没有的。全部作战文书都装在团长和他的副官的皮图囊里。我通过通讯员和电话向各营下达了一切必

要的指示之后，在日出时就和政委一起骑马到阵地上去了。

在山谷中，野战炊事车已经冒起缕缕炊烟。战士们努力把一天的饭都吃进肚子。大家邀请我们一起吃。政委和我每人喝了一小锅汤。

这时，右边响起了枪声。敌人蠢蠢欲动了。但我们没有急于进攻。我们要趁黎明给火炮定位，并组织各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为此，我和政委立即登上了地图上标明的 200 高地。

敌人在我右邻部队的地段上活动频繁。昨天，高尔察克白匪军的预备队，在敌卡马河区舰队的炮火支援下，沿卡马河岸发起了进攻。枪战已经发展到我团右翼。我让政委留在高地上，自己骑马跑到山脚，向穆尔济哈村驰去。在那里，我看到友邻第 43 团各营正全线败退。白军排成整齐的散兵线跟在后面，相距大约 1 公里。榴霰弹在红军战士的头顶上爆炸。

他们忽儿挤作一团，忽而又四散奔逃。指挥员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想制止败退。

在穆尔济哈村，我遇到了炮兵连长，他们连的炮位就在村外，我命令他向正在进攻的敌军开火。在这个村里，我还遇到了我们团的骑兵侦察队，共有 40 人，菲利普·古里亚诺夫带队。他立刻举着红旗前支增援。

我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侦察队行列。他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手中拿着一长鞭子。他无情地抽打败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话骂一句。当败退的士兵开始向后转时，这个勇猛的骑手骑着他那没有鞍子的马向南、向卡马河岸奔去。他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编入我团的骑兵侦察队……

白匪军的攻击被打退了。他们被我军的大炮和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师政委佩拉耶夫身负重伤。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是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的灵魂。他多次参加激烈的战斗，不知有多少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曾向他发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慑着敌人，鼓舞我们去创造光荣的事业。可现在，在穆尔济哈村，他遭到了不幸。

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团的战斗队形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击，就和政委决定转入进攻。

我们带部队沿大路经过阿尔马拉村，向耶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

我们把共产主义营、步兵和骑兵的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当我确信营长们都已正确理解了任务之后，就骑马来到了炮兵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

在那里，我见到了炮兵营长。团进攻地段共有 7 门大炮。当时有 7 门大炮掩护一个团已经足够了。部队展开队形，开始向前推进。越过高地的南坡，穿过伸向北方的大道。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军后方，不知是谁的火炮向 1 营的散兵线轰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部队最密集的地方。是谁打得这样准？是敌人的区舰队沿卡马河冲到了我军后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炮兵，像常说的那样，“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 232 高地上，有两门大炮正在直接瞄准射击自己的部队。我们无法同他们联系，只得派去两名骑兵侦察员，同时，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了红旗。

不久就查清，轰击我团进攻部队的是我军江河区舰队陆战队的大炮。由伊万·库兹米奇·科扎诺夫指挥的“黑政委”陆战队（这是高尔察克匪帮给他们起的名字），经过顽强战斗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

高点。他们看到我团进攻部队的散兵线越过 200 高地的山脊，就误认是白军，于是就轰击起来。也许是穆尔济哈村钟楼上的红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赶到了炮阵地，轰击停止了。发生这种令人懊恼的事，是由于缺乏通讯器材和及时的互通情报。

这场混乱大约耽误了 1 个小时，敌人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实施反冲击。这次敌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预备队的共产主义营投入战斗，接着，我带领骑兵侦察队向前冲去。

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搞复杂的机动。我只好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向白匪军冲去。

敌人正气势汹汹的向我逼来。只剩 300 米了。走在前面的是军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身穿长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师。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显然，牧师参加冲锋，说明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士。

他们步伐坚定，队伍整齐，简直象在受检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战对付心理战。

两军默默地接近，没有“乌拉”的喊声。

这时，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击，接着是一阵剧痛。我的马倒了。我意识到，马被打死了。但是为什么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时没有想到。我的脚卡在马镫里，右手还握着缰绳。传令兵骑着马跑到我跟前，跳下马来。我从马镫里抽出双脚，一句话也没说，就飞身上了传令兵的马。我好象忘了左手的巨痛，仇恨地怒火在胸中燃烧。

我举起手枪，使出全力喊道：

“乌拉！”

红军战士们也随声喊了起来。竭尽全力向前奔去。战场上，“乌拉”的喊声冲上云霄，又向远方滚滚而去。

敌军的散兵线被撕裂。敌军官死的死，逃的逃。牧师也落荒而逃。在跑动时他的长袍下摆向两边飘起，活象乌鸦的翅膀。

“喂！穿长袍的，你这个坏蛋！”

我愤恨的骂道。我本想去追他，但这时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超过了我，他们高举着明晃晃的马刀向前奔去。

我一回头，看到师长阿津正沿大道飞奔而来。他骑着一匹乌黑色的马，身披黑色的毡斗篷，战刀在头顶上闪耀。骑兵第 28 团的两个连紧跟在他的后面。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骑兵和步兵的“乌拉”声震天动地。我军炮兵已把炮火转向阿尔马拉村。

阿津超过我时，喊了一声：

“你好！”就往前冲去。

骑兵们紧跟着他直向敌军后方杀去……我骑马跑进了阿尔马拉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我从马上爬下来，把身子靠着井台旁的取水吊杆。左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

此时，1 营长库兹明跑了过来，看到我的伤势，立刻招呼卫生员来救护。

枪声已经停了。我记不清是谁从我手中取下了缰绳，是谁把我扶进屋。我仿佛在睡梦中听到一个人轻声说：

“他在发高烧。”

我睁开眼，看见政委杰尼索夫在我身旁。他递给我一个水壶。我喝了

几口，感到嗓子火辣辣的。那水壶里不是酒精就是伏特加。左手被包扎好了。酒精使我提起了精神。

“战斗怎么样？”

“敌人跑了。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占领耶拉布加。”

大家想把我运到哪儿去，我并不关心。我觉得困得要死，浑身疲乏已极。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政委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走后你和谢尔盖耶夫指挥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告别了。临走前，杰尼索夫问：

“党证在身上吗？”

我在衬衣口袋里摸到党证，回答说：

“让它留在我这儿吧！”

经过两天的战斗，阿津的第28师右翼各团，粉碎了盖达将军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克拉斯诺乌菲姆第1团、卡施特姆第2团、帕夫洛达尔第58团、萨扬第59团、贝加尔第10团和上乌金第12团，并向前推进了50公里。

敌军望风披靡，未经战斗就放弃了耶拉布加。他们根本守不住这个城市，因为我进攻部队与F·A·斯米尔诺夫的江河区舰队相互配合，把这座城市围得象个铁桶一般。如果白军留在城内，他们将被围歼。开进耶拉布加的是我第39、第40、第43团和科扎诺夫的陆战队。

占领了耶拉布加城以后，第28师前出到战役地区，对敌翼侧形成包围之势，威胁着敌军后方。我第5和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缩小了，又恢复了协同行动。敌军战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很快又影响到敌军后方。乌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更勇敢、更坚决地展开了反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

在那些岁月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对列宁党的忠诚和英雄主义精神，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躺在大车上，走了很长时间。道路崎岖，猛烈地摇晃常常把我惊醒。脑袋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热、一阵冷。

在马马得什我才完全清醒过来。团卫生主任赫梅廖夫正站在我的床边为我诊脉。他留着黄中带红的小山羊胡子，长着一对蓝眼睛。他说：“现在已经一切正常了。失血过多。应该躺几天。”但是，我躺不住，闲得难受就翻阅起一堆报纸来。

……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决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高尔察克，承认他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以后，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前一个多月，同盟国最高会议讨论了“俄国问题”，决定增加对高尔察克的白卫军的援助。5月26日，向高尔察克发出了关于有条件的承认他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照会。在照会上签字的有：美国代表威尔逊、英国代表劳埃德·乔治、法国代表克莱曼梭、意大利代表奥兰迪、日本代表西园寺。照会中说，这些国家愿意帮助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和一切与他们合作的人，向他们提供部队装备、补给品和弹药等。

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

卧床的 3 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 3 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

我走到篱巴门前，隔着小花园听到从窗子里传出阿津愤怒的说话声。他大概正在训斥什么人。我担心地想：该不该在这种时候见他？如果见了，大概要后悔的……但我还是决定进去。我走进外层，见里面空无一人。我正在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只有阿津一个人。他向我那只挂有胸前缠满绷带的手看了一眼，安静了下来，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说：

“回来啦？”

没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拥抱我，说道：

“好样的！你的团已成为……‘装甲’团啦！”

当时，我们用装甲一词称呼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阿津口中的这个词，是对我团的很高的评价。它表明，阿津认为第 40 团从现在起已加入第 28 师功勋部队的行列。

接着，阿津提高声音，又谈起因我到来而打断的想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牧师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随他们去好了！但是，为什么教堂的管事，甚至连看门的，也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难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资产者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穆尔济哈带着白匪兵冲锋的牧师？”我提醒说：“如果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会回来了。”

我向阿津问清了我们团的位置之后，就立刻乘马出发，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萨拉普尔的大道。

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是前线。我看到，这里正在恢复和平的生活。农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场上放养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们现在已相信红军的力量，希望白匪军永远不再回到这里。

晚上，我在萨拉普尔以西 35 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

团部设在学校里。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户，我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正在举行全团党员大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门。主席台上坐着杰尼索夫、戈尔布诺夫、费多托夫、古里亚诺夫和安德里亚诺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当时一般党员会议都有这项议题。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话，我悄悄地坐在边上。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我又和战友们、和真正的朋友们在一起了……

会后，党员们立即回到各自的连队。这时已是 1919 年 6 月 2 日凌晨。拂晓前，向前面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担任前卫的 3 营。凌晨 4 时，团主力出发了。我的戎马生活又开始了。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生活。

全团战士都知道，这天我们要夺取萨拉普尔。我和杰尼索夫随前卫营——3 营一起行动。

早晨 7 时，我们接近了尤里诺村。这时，骑兵侦察员报告，当面之敌是卡佩利团，大约有 1500 名步兵和骑兵。他们已做好冲锋准备，正向我们靠近。

事后得知，我们当时面对的确是卡佩利将军的一个特别团，其成员都是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敢死队。”我们

派通讯员去通知各营，我们将与“敢死队”遭遇。我们决定用独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队：由前卫营在原有方向上与敌人交火，团主力中的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队形，以便从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的突击。

炮兵连摆在村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方面

3——4公里内的情况。指战员们奉命在我军炮兵开火以后再投入反冲击。

我留在炮兵连长处。政委杰尼索夫带1营在村子左边展开队形。

白军的散兵线出现了。中间是步兵，两翼是骑兵分队。

炮兵连长想开火，我阻止了他：

“等一等！”

计划很简单：把白匪军放近点，用霰弹杀伤他们，然后转入冲锋。

我没有为留在炮兵连感到后悔。白匪军的散兵线距我军300米左右时开火了。这时，我向炮兵连下达射击命令。

几个齐射就大显神威，炮弹几乎都落到敌军散兵线最密集的地方。我团各营随即发起冲锋。卡佩利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们逃起来很在行，一路上不仅丢弃了步枪和子弹盒，而且连靴子都扔掉了，光脚跑起来轻松嘛。

我们未能追上他们。

抵达西加耶沃村之后，3营转向东南，前去攻打乌斯季萨拉普尔卡。与此同时，我团主力会同骑兵第28团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萨拉普尔。

卡佩利的“敢死队”根本没有打算防守这个城市。

萨拉普尔的居民对我军很热情。他们受高尔察克统治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看到，白卫军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皮鞭、绞架、枪杀过了一段时间，一艘燃烧着的平底船顺流漂到了乌斯季萨拉普尔卡村边的河岸上。这是白匪军搞的“浮动火葬场。”在上了锁的船舱里发现了几百名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6月3日白天，顺卡马河漂下来两个带绞架的木筏。第一个木筏上有4个被绞死的人，第二个木筏上有5个……

前出到卡马河岸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高尔察克的江河区舰队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别列左夫卡地区活动。6月3日凌晨，这支由12艘船组成的区舰队抵达乌斯季萨拉普尔卡，观察哨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区舰队。当敌人对村子猛烈轰击时，我军炮兵才开始还击。村里几处起火，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奋不顾身地与烈火搏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烧毁。尽管我们遭受突然进攻，但我们的炮兵仍击沉一艘敌舰。

在萨拉普尔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高尔察克的区舰队首先向城市开火，轰击民房，轰击正在梦乡中的市民。我军击沉2艘敌舰。

高尔察克的区舰队损失了3艘战舰之后，向北面的彼尔姆退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萨拉普尔市开始了和平生活。广场上，俱乐部里，挤满了年青人，红军战士们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顺便提一句，我们团里有许多天才的民歌手、杂技演员和小丑演员。他们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愉快和欢笑。以前，卡佩利将军的“敢死队”在这里为非作歹，经常公开地侮辱市民，而我军指挥员却为市民们举办娱乐晚会和有管乐队伴奏的舞会。许多青年人向团部递交了自愿加入红军的申请，一时间团司令部里简直是门庭若市。

马马耶夫岗

1

9月12日晚，我们乘车来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渡口。一艘渡轮上已载着一辆T—34坦克，第二辆坦克也正准备上船。他们不让我的车上船，我只得出示第62集团军司令员的证件。

一个负责技术装备的坦克军副军长向我报告了自己的职务。

我请他谈一谈他的部队的情况。他说：

“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军有近40辆坦克，其中只有一半可以开动，其余的已被打坏，但还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

渡轮从北面绕过戈洛德内岛的沙咀，驶向中心码头。水面上偶尔落下炸弹，射击是无目标的，没有危险。我们开始靠近河岸。远远就可以看到，由于我们这只船的到来，码头上拥上来许多人。伤员们从避弹壕、弹坑、掩体中被抬了出来。带着包袱、提箱的人们也都从隐蔽的地方出来了。

一张张熏黑的脸上挂着泥痕，那是眼泪和尘土合成的。又饥又渴的儿童向水边奔去……见此情景，我的心紧缩起来。喉咙好像被一团苦涩的东西堵住了。

我们的汽车开下了渡轮。方面军司令部曾告诉我，第6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察里察河谷，距河口不远。

城里的街道上死气沉沉。树上没有一根绿枝，都被大火烧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和孤零零的烟囱。许多石头建筑也被烧毁，门窗没有了，楼板也塌了。偶尔可以见到完好的房子。人们正在忙着把包袱、茶炊、器皿从房子里搬出，运到码头上。

我们的汽车在伏尔加河岸边沿铁路线来到察里察河口，然后又沿河谷来到了阿斯特拉汉大桥，但没有找到指挥所。天已黑下来了。

在火车站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个工兵部队的政委。令人高兴的是，他知道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马马耶夫岗的山脚下。

我们下了汽车，在黑暗中，攀援着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岗。终于，我听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声：

“站住！什么人？”

指挥所到了。山沟里布满新挖的避弹壕和掩蔽部。这就是马马耶夫岗！我当时怎么能想到，它会成为斯大林格勒争夺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哪里会想到，这块土地将被炮弹和炸弹炸得面目全非？

我来到了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

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不过，我知道他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中，无论是我还是他，都遇到过许多人，往往是遇见后又分手了。

但是，这次相遇却使我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后来成为苏联元帅，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他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最可亲可贵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在红场上我为他送葬的悲痛时刻。我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不仅是因为我们一起参加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许多战斗，不仅是因为我们曾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许多日日夜夜，而且还因为

我们曾为失去自己的战友而共同承担苦痛和悲伤。

可当初我们彼此还不了解，更不知道我们的性格是否合得来？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严格说来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个较宽的避弹壕，顶上铺着树枝和麦秸，最上边盖着 10—20 厘米厚的土。避弹壕里一侧是土凳，另一侧是土坑和土桌。顶盖在炮弹的爆炸声中不停地颤动。敌人正在轰击城市和马马耶夫岗，但目前还只是有计划地普遍轰击，并没有明确目标。

桌子摊着几张地图，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手拿电话筒的克雷洛夫将军，另一个是值班电话员叶列娜·巴卡列维奇。她是个 18 岁左右的蓝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将军正口气严厉地与什么人谈话，声音很高，很生气，而且态度强硬。巴卡列维奇坐在入口处，两手各拿一只电话听筒，正向什么人说：

“他正在打另一个电话。”

我掏出证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边继续训斥那个人，一边用眼睛浏览了证明信。打完电话后，我们互相问了好。在微弱的油灯下，我看到一张精干、严厉而又令人愉快的脸庞。

“您看，司令员同志，坦克军军长未经我允许，就把指挥所从 107.5 高地迁到了伏尔加河岸边。换句话说，下属部队的指挥所现在在我的后面。真是乱弹琴……”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坐到了桌旁。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巴卡列维奇把听筒递给克雷洛夫。他开始就明天的任务下达着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谈话的内容，我决定不打扰克雷洛夫。我一边听他打电话，一边研究他的工作地图，研究地图上的标记和箭头，我想了解形势发展的情况。我看到，克雷洛夫这会儿是没有时间从容地向我通报形势的。我应该信任他，不干扰他的行动，不改变明天的计划，因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

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那些日子里，可以说，时间就是鲜血。因为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就必须付出指战员的鲜血。克雷洛夫显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有关的地段。他向指挥员们说明任务时，讲得十分详细，并多次重复，这样就使我了解了战斗情况。我感到，我们之间将会找到共同语言。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自始至终形影不离。我们住在同一掩蔽部里，或者可以说是在同一个避弹壕里，同睡，同吃，共同分担痛苦和分享欢乐。

他是集团军的参谋长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在判断上从来没有发生分歧。

我特别珍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获得的战斗经验，珍视他的精深的知识、组织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优点。

光明正大，关心同志，忠于职守，这就是共产党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质。

我电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我已到任，并已接近了第 62 集团军的指挥权，接着便着手工作。首先，我决定查清坦克军军长为什么不顾“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擅自转移到伏尔加河岸边。我命令叫通他的电话。

“坦克军军长已接通，”巴卡列维奇一边把听筒递给我，一边报告说。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职务，接着就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变更了自己

的指挥所的位置。

那位将军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遭到迫击炮轰击，人员伤亡很大，在前线的下属部队不稳定和一些其他原因。我问他，在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时，他是否与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联系过。他回答说：

“不知道，我马上查一下。”

我命令这位将军和他的政委立即到马马耶夫岗来见我。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来到掩蔽部。我与他打了个招呼，我们以前就认识。

K·A·古罗夫象 H·A·克雷洛夫一样，同我一起工

作。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掩蔽部，但相距也只有 2—3 米。我们常在观察所见面，一同分析情况，作出决定。他是一位精通军事的政工干部，他善于宣传身教，从政治上保证战斗和战役的实施。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个人，了解各兵团的指挥员。他知道可以委派谁去担任什么工作，并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

司令部各位处长和他们的副手都来到了掩蔽部。

过了一会，有人报告我，坦克军军长和政委到了。我立刻请他们进来，并让在场的人都不要走。我问：

“您是一位苏维埃将军，是一个战斗地段的首长，如果您下属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未经您允许就撤退到后方，您将做如何想？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第 227 号命令，您的行动应该如何评价？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挥所撤到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这是什么问题？”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两个人都惭愧得无地自容。这点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

我严厉警告他们，我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临阵脱逃，并命令他们于 9 月 13 日 4 时之前把指挥所迁到 107.5 高地。

古罗夫说了声“对”，表示赞同的我决定。他命令坦克军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但当我们又见面时，我听到古罗夫对军政委说：

“今后也要这样做。”

这时，方面军副司令员 E·A·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当我接管第 62 集团军指挥权的时候，能在马马耶夫岗见到他，这使我非常高兴。

我经常在战场上与他见面。在前线各个地段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非常了解各集团军的情况，并总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坦率地对战斗和战役的进展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次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对斯大林格勒命运的担忧。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很快就走了。他答应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有必要给我们集团军增派几个新锐师，因为第 62 集团军几乎所有的兵团和部队都在最近的战斗中大大地削弱了。有些步兵师只剩下几百名战士。在顿河大弯曲部作战时，第 62 集团军就已经受到严重损失。

我观察克雷洛夫的工作，又通过与助手们的谈话和了解，在夜间 2 时左右，我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情况，不过还有许多细节不清楚。

9 月 12 日，日终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向第 62 集团军部队进攻的是敌野战第 6 集团军的部队和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几个师。敌人个别部队已在普诺克以北和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库波罗斯诺耶附近前出到伏尔加河。配置成马蹄形状的德国军队从正面和两翼把我集团军压向伏尔加河。

进攻第 62 集团军的敌军由 9 个配备着加强武器的战斗

师组成，另外还有几个“施塔赫尔”集群。他们还得到拥有近千架各种作战飞机的德军第 4 航空队的支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这个强大集团的近期任务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并前出到伏尔加河，也就是说，经过战斗向前推进 5—10 公里，把我们赶下河。

第 62 集团军编成内的师和旅的数目，不能正确地和完整地反映集团军部队的人数和战斗力。比如，9 月 14 日上午，有一个坦克旅只有一辆坦克，有两个坦克旅根本没有坦克，不久，它们就被调到伏尔加河左岸去重新组建。9 月 14 日晚，由几个旅、师组成的混成支队总共才有约 200 名步兵，人数比一个满员步兵营还少；其友邻是 I·A·阿法纳西耶夫上校的步兵第 244 师，该师人数不超过 1500 人，而师里的步兵人数充其量与一个满员营差不多；步兵第 42 旅有 666 人，其中步兵不到 200 人；位于左翼的由 B·F·杜比杨斯基上校指挥的近卫第 35 师的步兵不超过 250 人。其余各兵团、各部队的情况都很类似。A·E·波波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 23 军所属各旅共有 40—50 辆坦克，其中近百分之三十被打坏，只能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只有 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步兵第 10 师以及另外 3 个独立步兵旅基本满员。

第 62 集团军与左右两侧的友邻部队都失掉了联系。我集团军两翼支撑在伏尔加河岸边。德军飞机昼夜出动 1000—3000 架次，而我空军却无力向我们提供这样积极的援助，我军空军的飞行架次还不到德军空军的十分之一。

敌人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我军的高射炮有一部分被敌人摧毁，有一部分撤到了伏尔加河左岸，从那里能掩护伏尔加河及沿河右岸的狭长地带。在右岸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高射炮。

9 月 13 日，高炮第 1079 和第 748 团合并为一个炮兵群，由 J·A·叶尔绍夫上校指挥。但这样无济于事。德军飞机从早到晚在斯大林格勒、在我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上空耀武扬威。

在观察敌机活动时，我们发现德军飞行员投弹不准确。只有当中间地带宽阔时，也就是说，当敌我双方前沿阵地之间有足够宽的距离时，敌机才敢轰炸我军前沿。这使我们想到要最大限度地缩短中间地带，缩短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

战斗中的伤亡、退却，弹药和粮食的不足，人员和技术装备在补充上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对部队的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有些人希望尽快撤过伏尔加河，脱离这场苦战。

集团军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努力提高战士们的战斗精神。我的助手和朋友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师级政委古罗夫、克雷洛夫将军和波扎尔斯基将军、维特科夫上校、旅级政委瓦西里耶夫等。各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认识到，我们要为斯大林格勒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1. 首先要使全体人员明确，不能继续后退，也无处可退。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斯大林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我们要与敌人背水一战。我们苏维埃军人要响应党的号召，执行人民的命令，要么守住

城市，要么就战死沙场。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要通过党团组织向全体人民宣传这个决定。

2. 在市内各大企业里，建立由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武装队伍，他们应当配合集团军部队或者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工厂。

要按军队的标准发给他们武器和其它装备。

冒着飞机和大炮的轰击，修理损坏的各种技术装备的工人和职员们，当然要在党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下，按照连、营编制，组织成军事化队伍。

3. 未经集团军司令员和参谋长的同意，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

4. 集团军司令部留在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岛上撤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着手改编集团军的某些部队。集团军中，没有一个兵团或部队在人员和技术装备上达到编制的一半。一些师、旅的指挥机关被调到伏尔加河左岸进行整编。但这并不是向伏尔加河左岸撤退，因为这些措施是军事上必需的。我们决定把分散的部队组建成新的兵团。

9月13日2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制定出未来2—3天的行动计划。

“你们现在有吃饭的时间吗？或者说不吃饭也行？”我问克雷洛夫。

“噢，有时也吃饭。”古罗夫替他回答了我。

我们的副官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面包、罐头和凉茶。我们简单地吃了一点，就各自睡觉去了。每个人都想着一个问题：“明天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决定首先要使渡口免遭敌军炮火的打击。为此，必须使左右两翼转入坚强的防御，在中央则应以局部冲击占领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会让站，以及占领从该站向西南延伸的、一直到拐向贡拉克转弯处的一段铁路。这样就可以把中央的战线拉直，并以铁路路基这个防坦克障碍为依托，进而夺取戈罗吉什和亚历山德罗夫卡。预定由坦克军完成这项任务，该军将得到步兵分队的加强和集团军炮兵主力的支援。9月13日必须完成变更布置，14日实施进攻。但是，敌人抢到我们前面去了。

凌晨，我们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和轰炸声惊醒。

6时30分，德国军队以一个步兵师加上40—50辆坦克的兵力，从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地区转入进攻。突击方向是经过阿维阿戈罗多克，向中央车站和马马耶夫岗推进。

在我集团军的两翼，敌人只实施了牵制性行动，他们用一个营从北面冲击我防守奥尔洛夫卡的步兵旅的战斗队形，而在左翼则用几个独立营攻击我军一个混成团的阵地。

在集团军的中央和左翼，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敌人不断投入新的预备队，发展着攻势。

敌军火炮和迫击炮对我军战斗队形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射击。敌机在战场上空频繁活动。

从马马耶夫岗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战场上和空中的战斗。我们亲眼看到，有近10架飞机冒着火焰栽到地上，其中有我军的，也有敌人的。虽然我地面部队和我空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德军队依仗着数量上的优势，在战场上仍然占了上风。

我们认为敌人的这些行动是战斗侦察，估计敌主力的进攻将于一两天后才开始。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马马耶夫岗的最高处，各种炮弹、炸弹象雨点一样

落在这里。我和克雷洛夫在一个掩蔽部工作，有时和他一起到炮队镜跟前观察交战过程。有几个掩蔽部被摧毁，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也有伤亡。

有线通信经常中断，无线电枢纽站经常出故障。全体通信兵都被派出检修线路，就连我们掩蔽部里的电话员，也经常放下电话去寻找和排除线路上的故障。9月13日全天，我和方面军司令员仅通了一次话。我向他简略地报告了这里的局势，请求他在最近几天内给我加强2—3个新锐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击退敌军突击的力量了。

虽然通信兵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16时之前，司令部与各部队几乎中断了联系。

这时的形势相当严峻。尽管从北面进攻奥尔洛夫卡的一营敌军已被我步兵第115旅消灭，但在集团军防线中央，我军遭受了损失，被迫向东撤到位于巴里卡德村和红十月村以西的树林的西缘。德军夺取了126.3高地、阿维阿戈罗多克和一座医院。在左翼，我军混成团放弃了萨多瓦亚车站东边的拖拉机站。在战线的其余地段上，敌军的个别进攻被击退，我军击毁敌坦克16辆。

我们决定实施反冲击。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反冲击发起时间定在9月14日凌晨。我们知道，集团军的力量很有限，不可能拨出较大的兵力用于反冲击。不过我们深信，敌人也想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对我军将会采取的积极行动有所准备。我们想起了苏沃洛夫的原则：“奇兵必胜。”我们不指望速胜，但我们可以出其不意地打乱敌人的部署。我们必须突然的反冲击到剥夺敌人的主动权，哪怕是局部的、暂时的也好。

22时30分，我向各部队下达了实施反冲击的命令。命令中给每个部队都规定了具体任务。

摩托化步兵第38旅，在一个加强摩托化步兵连和配属的炮兵营的配合下，向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东南面的村庄进攻。萨拉耶夫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实施反冲击，目标是126.3高地，然后是144.3高地。

混成团和一个坦克旅向阿难阿戈罗多克和153.7高地方向实施反冲击。独立步兵第42旅准备对医院和153.7高地方向实施突击来支援反冲击行动。

命令要求所有参加反冲击的部队互相协同，确保联系。

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应坚守现有阵地。

担任反冲击炮火支援的有3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3个统帅部预备队的炮兵团和3个近卫火箭炮团（“卡秋莎”）。

在马马耶夫岗这一天的战斗表明，从这个指挥所指挥部队是不行的。由于敌人的炮击，我通讯联络频频中断，无法指挥部队。我们决定把集团军指挥所移到察里察河谷。集团军观察所仍留在马马耶夫岗。两天之前，方面军司令部就已准许我们转移指挥所。

第62集团军处境险恶，我们急需加强几个新锐师。

9月13日，敌人距伏尔加河的最大距离不超过10公里，而沿河绵延50公里的斯大林格勒市的最大宽度仅5公里。这就是说，敌人要夺取斯大林格勒，特别是夺取城市的北部工厂区，只需在战斗中向前推进10公里……

背水一战

9月14日凌晨以前，集团军指挥部转移到一个叫做“察里津地窟”的坑道里。这是一个被隔成十间屋的子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用薄木板镶衬。在8月份，东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土筑的顶盖足有10公尺厚，一吨重的炸弹才可以穿透其个别地方。掩蔽部有两个出口：下面的出口直通察里察河的河床，上面有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

我与克雷洛夫同志在9月14日凌晨离开马马耶夫岗。古罗夫比我们早走一步。随我们一起前往的还有做为城市向导的集团军装甲部队的副司令M·I·魏因鲁布中校。德国人的夜航机在头顶上盘旋，他们借着火光寻找着目标，进行轰炸。

我们穿过瓦砾场和被破坏的街道。在离新设指挥所大约500米处，我的汽车被电话电报线缠住了，只好停下来。克雷洛夫和魏因鲁布乘坐的车也停了下来。我们耽阁了3分钟左右，这时，离我们汽一不远的地方炸响了10来枚小型炮弹。

非常幸运，我们谁也没受伤，都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没有时间休息。在新的地点，我必须亲自检查通讯联络及部队反攻的准备情况。一切都正常。除了夜航飞机外，看来，敌军都在休息，或者为白天的行动做准备。

清晨3点，我们开始炮火准备，3点30分，开始反冲击。我用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了反冲开始的情况，并请求在天亮时，让空军掩护我部队的战斗行动。司令员向我保证做到这一点，并马上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将把统帅部预备队的近卫步兵第13师配属给我们。

这个师于9月14日傍晚开始在伏尔加河渡口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地区集结。

尽管只给一个师，但对我们来说，也是极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虽然我们在9月14日进行了集团军反突击，但只动用了部分非主力部队，所以并没对局面带来会么变化。

我立即派工程兵主任图皮切夫上校率集团军参谋组前往克拉斯诺斯洛博达迎接近卫师。

在这之后，我同克雷洛夫又开始与部队联系，了解战况。

在集团军中心地区，我们的反冲击在初期有一些进展。但是，在中午12点，敌人投入了相当数量的步兵和坦克，开始迫使我军退却。攻击矛头直指中央车站和马马耶夫岗。

这次攻击异乎寻常地凶猛。尽管损失巨大，侵略者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闯。乘着汽车和坦克的步兵纵队冲入城市。大概，希特勒匪徒认为自己已交好运，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拼命冲向伏尔加河、冲向市中心，好去瓜分战利品。我们的士兵、狙击兵、装甲兵和炮手隐蔽在房子里、地下室里、临时火力点里和屋角旁。他们从那里亲眼看见，醉醺醺的德国鬼子是怎样从汽车上跳下来，吹着口琴，在人行横道上乱喊、乱跳。

法西斯强盗尸横遍地，但后续部队仍象潮水般拥进了大街小巷。他们的冲锋枪手渐渐地潜入铁路以东的市区，逼进车站，逼近专家楼。战斗在距集团军指挥所800米的地方进行。

危险出现了，敌人可能在我近卫步兵第13师开到之前占领车站，切断集团军，并推进到中心渡口。

在左翼，在米宁城郊，战斗更加激烈、残酷。敌人在我右翼也加紧进攻。形势每小时都在恶化。

我手上还有一支未受损失的不大的预备队，即由 19 辆坦克组成的唯一的重型坦克旅。

这个坦克旅位于集团军左翼，在城市南部的一个大粮仓附近。我命令将这个旅的一个营迅速调到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来。两个小时左右，坦克营到了，它拥有 9 辆坦克。在这段时间里，克雷洛夫将军已从司令部的人员和警戒连里抽调人员组成了两个组。第一组由作战处长 A·扎利久克上校指挥，配以 6 辆坦克。任务是：封锁从车站到码头的街道。第二组由 M·I·魏因鲁布中校指挥，随另外 3 辆坦克一起，前往专家楼。敌人正从那里用大口径机枪向伏尔加河及码头疯狂扫射。

在这两个组里，有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和政工干部，他们几乎是全是共产党员。正是他们阻止了希特勒分子占领码头——掩护了载着罗季姆采夫近卫师的第一批渡船。

14 点，近卫步兵第 13 师师长、苏联英雄亚历山大·伊里奇·罗季姆采夫少将前来向我报到。他浑身上下全是泥土。从伏尔加河到我的指挥所这段路上，他不得不多次“着陆”于弹坑，躲藏在瓦砾场，躲避敌机的俯冲。

罗季姆采夫少将向我报告说，他的师人员配备齐全，人数约一万，但武器、弹药配备较差。一千多名战士没有步枪。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托方面军副司令员 E·A 戈利科夫中将，不迟于 9 月 14 日晚把近卫师缺额的武器运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地区。但是，按时运到武器的保证落了空。我立即命令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我的后勤副手洛博夫将军，动员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要他们在集团军后勤各部队里收集武器，交给近卫师使用。

罗季姆采夫将军已了解了集团军前线的形势。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将军很善于边走边与人们互通情况。罗季姆采夫已从他那里领受到任务：9 月 14 日夜，整个师渡河到伏尔加河右岸。师炮兵部队除反坦克炮外，全部占领左岸的发射阵地，掩护步兵行动。反坦克炮、迫击炮运进城里。

全师马上投入战斗。其中两个步兵团的任是：肃清市中心、专家楼及车站的法西斯分子。第 3 个团的任务是：守住马马耶夫岗地区。还有一个步兵营作为预备队，留在集团军指挥所。

步兵师作战地段的界线是：右边——马马耶夫岗、铁路回线；左边——察里察河。

我们建议罗季姆采夫把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边、靠近码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掩蔽部、避弹壕，通讯联络系统也都是现成的。

谈话结束时，我问他：“有什么想法？”

他答：“我是共产党员，我决不离开这里。”

我马上补充道：“当你师到在前沿阵地，所有在这个地段上独立作战的部队都归你领导。”

罗季姆采夫思索片刻说：“他的指挥所位于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他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会感到不安。”我安慰他，并保证，只要步兵师完成这次作战任务，我们将允许他把指挥部挪到前面去。

接着，我强调说：“我们没有权力指望敌人会消极行动。敌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我们、占领城市。所以，我们不能够仅限于防守，而应该抓住每

一个有利战机，打反攻，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并用我们的积极行动破坏敌人的计划。”时针快指向下午4点，离黄昏只剩下5个钟头了。我们这些被打散了的、极端疲乏的部队和分队，能在中央方向再坚持10个、甚至12个小时吗？这比任何事情都使我担心。指战员们能完成这似乎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吗？如果不能，那么，近卫步第13师就可能在伏尔加河左岸成为一场悲剧的见证人。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执行反冲击任务的混编团的许多指挥员都牺牲了，目前该团处于无人指挥状态。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最后的一支预备队——警备连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也都已经投入战斗。透过掩蔽部的顶盖，传来德国飞机马达的轰隆声和刺耳的炸弹爆炸声。

为了找到不管什么样的预备队，我把师长阿·阿·萨拉耶夫上校叫来。他是警备司令，他的师控制着各备用防御点和城市的各火力支撑点。

他向我详细地报告了师里的状况、他们部队守卫的防御区及城里和工厂区的情况。

从他的报告中我才弄清楚，原来他那里的防御工事大都是由一些小的火力点组成，其中25%—30%是土木结构。当然，这些防御工事不够稳固。我亲眼见过一部分工事，其中包括街垒，确实不能成为作战的必要的火力支撑点。

我问萨拉耶夫上校，他是否清楚，他们师已归属集团军，他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领导。我问他，是否需要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电话问清楚这个问题。萨拉耶夫回答说：他是第62集团军的战士。

但是，不能指望把他的部队作为预备队来挡住敌人的突击。因为不能把他们从那些支撑点上撤下来。可是，萨拉耶夫手中还掌握着几支由各要塞，各防区司令率领的各工厂和地区的武装警卫队。这些由城市警察、消防人员、工人组成的警卫队总人数达1500人。他们的武器数量不足。我命令上校在市中心找一些坚固的建筑物，每个建筑物里配上由共产党员指挥的50—100名战士的战斗分队。他们要在这些支撑点里固守，并坚持到最后。我提醒说，他的师及武装警卫队可在集团军弹药补给处领到武器和弹药。我指示萨拉耶夫要与我的指挥所保持经常的联系。

他当着我的面马上在城市平面图上标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标。我同意了她的建议。

阿·阿·萨拉耶夫作为师长、尤其是作为警备司令员非常熟悉这个城市和城市各工业目标的联系渠道，他能在许多工厂及坚固建筑物里，组织起武装警卫队给我们以帮助。城市居民将与第62集团军的勇士们肩并肩地与法西斯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刻。

尼·伊·克雷洛夫听过我与萨拉耶夫的谈话之后，把萨拉耶夫叫到自己跟前，就建立通讯联络、指挥方式等细节进行了交谈。

与集团军各部队的联系经常中断，我同古罗夫多次走出掩蔽部，来到普希金大街，希望根据声音来判断战斗的进程。

战斗就在离我们400—500米的地方进行着。

历史学家们曾断言，在一些大规模的交战中，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因为手中只缺少一个营而不能夺取最后胜利。我想，为了把第62集团军截成两半，并前出至伏尔加河，这几天保卢斯手中已有足够的部队。然而，我们战士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却使敌人的一切和都化为乌有。

黄昏时分，坦克旅旅长斯·尼·霍普科少校来向我报告说，他的唯一的一辆坦克被打坏了，现停在车站附近的铁路道口上。

“怎么办？”他问道。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坦克虽然被打坏，但是还可以用来射击。除此之外，坦克旅还有近百名坦克手，他们都有冲锋枪和手枪。

我下令说：“到坦克那里去。集合所有兵力，守住道口，直到近卫第 13 师的部队通过为止。”

他懂了，转身跑去执行我的命令。稍后知道，霍普科光荣地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

黄昏降临，战斗渐渐平息下来。空中，德军飞机也少了，我用了很多时间来打电话。我要搞清楚，近卫第 13 师目前的位置，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是怎样准备渡河器材的。然后，与司令部人员一起，总结一天来的战斗情况。

敌人密集地涌向马马耶夫岗。逼近横贯城市通往中央车站的铁路线。车站仍在我们手中，可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物里已隐藏着德国法西斯的冲锋枪手，他们是从我渐渐稀疏的战斗队形中偷偷地钻过去的。

在集团军中央地区作战的我军部队，现在已所剩无几。设在马马耶夫岗的集团军观察所，也被炸弹和敌炮火摧毁。

集团军左翼报告说，敌人的攻击被打退，但敌人正在积蓄力量，实施侦察，准备新的进攻。

我对战局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后认为，我不能再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求任何援助了。

我知道，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方面军已对我尽其所能。9 月 14 日夜，伏尔加河所有渡口都准备妥当，近卫第 13 师开始渡河。

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一整夜都没合眼，因为一部分人在前线重建分队；另一部分人在专家楼、车站指挥战斗，以掩护罗季姆采夫师顺利渡河；还有一部分人在中心码间附近迎接渡过河的一个个步兵营，并带领他们通过被摧毁的街道，直奔前线。

夜间，近卫第 34、第 42 团及第 39 团的一个营渡过了伏尔加河。天色渐亮以及敌机的出现，使后来的渡河行动受到阻碍。

已渡过河的步兵团占领了从克鲁托伊深沟至车站的市中心地段。第 42 团 1 营前往车站。萨拉耶夫师的 1 个营和 A·E·叶尔莫尔金上校所领导的步兵第 112 师的一支部队，守卫马马耶夫岗。车站在左侧（西南方向）由坦克旅的余部、混编团及 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42 旅的残部来防守。其余的地段仍然照旧。

9 月 15 日凌晨，敌人开始向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在集团军中央方向，敌步兵第 295、第 76、第 71 师配备着坦克向车站、向马马耶夫岗进攻；在左翼，敌坦克第 24 和第 14 师及步兵第 94 师向米宁城郊、库波罗斯诺耶发起攻击。右翼相对安静些。进攻前，敌航空兵在城市里狂轰滥炸，然后，敌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盘旋、侦察、俯冲。

战斗一开始形势就对我很不利。午夜，刚渡过河的罗季姆采夫的生力军，还没来得及认清环境和站稳脚跟，就遭到敌优势兵力的攻击。

车站附近和米宁城郊的战斗异常激烈。一天之内，车站 4 次易手。深夜，车站又回到我们手中。罗季姆采夫师的第 34 团，在重型坦克掩护下，

进入专家楼，但未奏效。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旅和 A·A·萨拉耶夫师的几个分队损失严重，被迫退到列索波萨多奇那雅地区。B·F·杜比杨斯基上校的近卫步兵第 35 师，以及其他部队的几支分队，也同样遭受巨大损失，撤退到城市西郊、察里察河以南。

9 月 15 日傍晚，很难说马马耶夫岗在谁手中，因为获得的情报互相矛盾。敌人的冲锋枪手沿察里察河偷偷地接近铁路大桥，并向我指挥所射击。集团军指挥所的警卫队重新投入战斗。此外，尽管入口处设有警卫和纠察，但躲避敌机轰炸和射击的人，仍然挤满了掩蔽部的通道。这些人中，有集团军通讯部队的、警卫营的、行政管理部队的、各部队的联络官、以及司机和其他人。他们都因有“紧急公务”通过入口，然后便滞留在那里，掩蔽部没有通风装置，所以空气闷热污浊，臭气熏人。尤其到了深夜，指挥所里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我们轮流到洞外去透透空气。察里察河以南的城区火光通明，象白昼一样。尽管德国冲锋枪手的子弹在头顶上、在脚下呼啸着，但这样也挡不住我们离开闷人的洞穴。

这一夜，我们每一个人都为马马耶夫岗的命运担心，如果它被占领，那么，敌人将控制整个城市和伏尔加河。

我命令：A·F·叶林上校的第 39 团各分队，在今夜必须渡过河，向马马耶夫岗推进，争取在拂晓前占领那里的防线，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岗上的制高点。

我感到，现在从设在山谷里的掩蔽部对整个集团军进行指挥已愈来愈困难了。所以，我命令 H·M·波扎尔斯基将军率领作战处及炮兵司令部的一部分参谋，在伏尔加河岸边、靠近码头、对着扎伊采夫斯基岛南岸的地方，设一辅助指挥所。波扎尔斯基领导的这个辅助指挥所将是集团军司令部和右翼部队之间的指挥机构。

在 9 月 15 日的战斗中，敌人被击毙 2000 多人。伤员则要多 3—4 倍。9 月 14 日至 15 日，两天之内，德军伤亡总计为 8,000 到 10,000 人，被击毁的坦克有 54 辆。我军的人员和技术装备也遭到巨大损失，并且退却了。当我讲：“我军遭受巨大损失，并且退却了”，这并不是说，人们是有秩序、有组织地从一个防区撤退到另一个防区。而是说，我们的战士们（甚至已不成为战斗分队），其中大部分已经受伤，从德国坦克的轮子下爬出来，撤回下一个防区。在那里，他们被接收，并被编成新的战斗分队，补充有限的弹药，然后又重新投入战斗。

很快，希特勒匪帮就明白了，靠蛮横是夺取不了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咬起人来还很疼的呢。于是，他们的行动变得谨慎起来。细心地准备进攻，打仗时，再听不到手风琴声和歌声，也看不到跳舞的了。

9 月 13、14、15 日三天的战斗表明，在城市的废墟上歼灭敌人，比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大草原上要容易得多。

尽管敌人兵力雄厚，但在狭窄的街道和被炸毁的建筑物里作战，却无法施展其力量，总是遭受重大损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往往弄不明白，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死神在何处等待着他们。

“血，染红了伏尔加河，染红了城市的街道和公园。德国鬼子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滑下坡去、走向灭亡！”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的话。

我们的士兵和指挥员们都知道，我们已不能退却。也无处退却。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侵略者并不是铁打的，他们是可以打败的。我们手中的

机关枪、冲锋枪，就能打穿敌人的肌体。我们的反坦克手敢于靠近德军坦克50—100米处，十分准确地击毁它们。

9月16日、17日两天的战斗更加激烈。在补充了新锐预备队之后。敌人在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42旅的中心地带，连续不队断地发起攻势。在马耶夫岗和火车站附近的战斗尤为残酷。

9月16日凌晨，叶林团在步兵第112师几个分队的配合下，夺回了马耶夫岗，但进攻很快被阻止了。开始了遭遇战和遭遇攻击。确切的说，马耶夫岗的殊死战斗，一直持续到1943年1月底。

敌人也很清楚，占据马耶夫岗，就可以控制整个城市、工厂区及伏尔加河。为达到此目的，他们毫不吝惜士兵的性命和武器弹药。我方也抱着相同的决心——无论如何要守住马耶夫岗。因此，敌人的许多坦克团、步兵团、师被歼灭、被击溃在这里。我们也不止一个师在这里经受了从残酷和顽强程序来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战。

成吨重的炸弹，203毫米口径的炮弹，把整个地面炸翻了过来。但是在两军相遇时，用刺刀、手榴弹的白刃战，就成为主要的、最有效的和行得通的斗争手段了。

争夺专家楼的战斗，忽儿停息，忽儿打响。我们攻击的炮火稍一减弱，敌人马上就开始向伏尔加河中心渡口实施攻击。我们被迫不停地进攻，牵制住聚集在专家楼里的敌人。

苏维埃大街的一座四层楼房，原是州消费合作社联社的家属宿舍，从9月17日开始，变成罗季姆采夫左翼部队的一个支撑点。这座楼房被称做“巴甫洛夫楼。”当然，雅科夫·费多托维奇·巴甫洛夫并不是房主，可是，他却和战士们一起，把这座楼房变成堡垒。

为了它，德国侵略者损失了上百名军官和士兵。不论是强攻，还是长时间的围攻，都没有得手。争夺这座楼的战斗长达50昼夜。在这座房子的东边，至今还保留着被炮弹炸掉一半烟囱的一座四层楼房。它过去是一个制粉厂，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它与“巴甫洛夫楼”一起，形成了阻止敌人突向伏尔加河的屏障。

车站地区的战局更为变化莫测。车站和它附近的建筑物，一天之内就四、五次易手。每一次强攻双方都要以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死亡为代价。战斗力减弱了，部队减员了。敌我双方又不断地补充新锐力量。

我军在市中心顽强抵抗，特别是近卫第13师的抵抗，粉碎了保卢斯的如意算盘。最后，他把布署在沃罗波诺沃、佩斯昌卡和萨多瓦亚地区的第二突击群的全部兵力都投入战斗。

在补充了兵力和装备以后，敌人以两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集团军左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一招我们已预料到了，但是，要击退这次打击，我们却有些力不从心。尽管敌人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他们每推一步，也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一个攻击目标——城市或村庄反复多次易手，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见的顽强战斗的典型。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一座大型粮仓。从9月17日至20日；整整几个昼夜，那里的战斗一刻未停。不仅整个粮仓，而且连它的其它几层楼和几个库房，也都分别数次易手。上校杜比杨斯基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不断变化着。原先，我们在粮仓的上面，德国人在下面。我们刚刚把德国人从下面赶出来，他们却又钻到了上面。

现在，在粮仓的上部，还正在进行战斗”类似这样的双方都拼死争夺的目标，在城里有几十个、几百个。在这些地方，几个星期以来，每一所房屋，每一个突出部，每一节楼梯，都在被激烈地争夺着。

9月16日下午，我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我们已没有预备队，而敌人却不断地把生力军投入战斗。这样的浴血奋战还将持续下去，集团军将进一步被削弱，以致毫无战斗力。我请求马上再给我们加强2—3个新锐师。

显然，方面军首长很了解城里的战况，很清楚城市作战的意义。9月12日—16日战斗的表明，在城内防守比在草原开阔地上实施反突击，能更有效地杀伤敌人。

很快，方面军司令部把步兵第92旅和坦克第137旅调来配属给集团军。步兵旅装备齐全，它的成员——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水兵，都是很优秀的军人。步兵旅的任务是，沿铁路线占领防御地段，其界线是：北起察里察河，南至由铁路线围成的三角地带。

坦克旅只有装备着45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该旅的任务是在马马耶夫岗以东0.5公里的铁路回转线地域，占领环形防御，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推进。

9月17日，我得知，位于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在阿卡托夫卡和库兹米奇地段向南转入进攻。进攻者的任务是：歼灭敌军集团，与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会师，也就是与在城市西南方向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会师。

这消息太令人振奋了——整个前线就要转入反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立即开始筹划，如何配合这次进攻。对于被敌人逼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第62集团军来说，迫切需要与侧翼的友邻部队会合。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仍决定：在集团军中部实施积极防御；在右翼，用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实施突击。加快与城市北部作战的部队会合。

那天晚上，叶廖缅科上将预先通知我，进攻即将开始。我们应该用右翼部队支援友邻部队，同时从红十月村、从马马耶夫岗地域向西南实施突击，分割并消灭城市西部的敌人。为了加强集团军右翼，特增派由B·A·戈里什内上校率领的步兵第95师给我们。这个师将于9月18日傍晚在伏尔加河渡口集结。

2

我们的指挥所不断地遭受敌人的袭击，因此，我们被允许放弃在察里察河谷里的掩蔽部，转移到距“红十月”码头以北1公里的新指挥所去。

9月17日傍晚，集团军前线的形势是这样的：右翼——从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5天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敌人实施的所有局部的攻击均被击退）；在集团军的中央地区，前线已出现折线：马马耶夫岗和中央车站在我们手中，专家楼则落入敌人手中。敌人从那儿向中心渡口射击；左翼正面已从察里察河起，沿着铁路展开，直抵伏尔加河岸边的抽水站附近。

在生力部队到达以后，我们将混编团的残部并入M·C·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南翼的剩余部队被编入杜比杨斯基近卫师。他们的司令部则到伏尔加河左岸集中，重新组编。

这样，集团军左翼仍旧是两个步兵旅——第42、第92旅以及杜比杨斯基的近卫步兵第35师。这样，就使部队的指挥变得更为方便。

9月17日夜，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新的地点。通讯器材、勤杂人员和一些司令部军官从晚上就开始转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作战参谋最后才撤离。带着各种文件、材料，穿越敌人冲锋枪手甚至敌坦克控制的街道，这是极为冒险的。我们很可能突然与敌人遭遇。

因此，决定参谋编队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走水路。他们将实施复杂的机动——从察里察河口出发，到伏尔加河左岸的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再由那里乘汽车向北，到扎伊采夫岛对岸的“62”号渡口，再换乘装甲艇重返伏尔加河右岸，然后迅速抵达新指挥所。

从察里察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保障工作，交给了I·A·维特科夫上校及他的助手们。午夜12时，我们的车队满载着文件和一些私人用品，趁天黑从掩蔽部出发，顺利地在上船地点集中。途中，炮弹和迫击炮弹时而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渡过伏尔加河后，我们在博科尔德村和克拉斯诺斯洛博达村之间，为寻找我们的汽车，耽搁了近1小时。最后，终于找到了汽车，我们把一切东西都装到汽车上。这时，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走到我跟前，建议我去距克拉斯诺斯洛博达5公里处的国营苗圃，可在那里的管理处吃点东西，洗个澡，然后再去新指挥所。

我们请克雷洛夫带领司令部的编队先去新指挥所，并许愿给他带回些吃的。

然后，我和古罗夫以及我们的副官们来到国营苗圃。那里的人象迎接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稀客一样，盛情地款待我们。我们洗了蒸气浴，换上干净暖和的士兵服，填饱了肚子。就这样，吃饭、喝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由于窗户都被遮住了，以至我们没有觉察，黎明是什么时候来临的。当我们发觉时，我们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渡口只在夜间工作，我们恐怕赶不上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到达新指挥所，那么克雷洛夫和参谋们会怎么看我们呢？我们跳上汽车，就向“62”号渡口飞驰而去。我不熟悉道路，由古罗夫那辆车在前面带路。但是，他也记错了路。我们不知不觉又转向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知道走错了路之后，我们又赶紧向回开。

当我们来到“62”号渡口时，我看到码头上只停放着一艘小快艇，我觉得好像就要解缆了。在这紧急关头，好像故意与我们为难似的，我们的汽车又扎在沙地上空转起来。我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这最后一艘装甲艇就要开走，我们全天将被困在左岸上。这一天，集团军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斯大林格勒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我不敢往下想，急忙向码头奔跑过去。装甲艇已开始离开码头。我使出全身力气，连跑带跳地向小艇奔去。我使劲一跳，终于上了艇！古罗夫正向码头跑来。我向舵手喊：

“把船往回开！”

他慢条斯理地转过头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第62集团军司令员！”

舵手把艇开回码头，古罗夫和副官们跃上船舷。装甲艇离开岸边，全速全右岸驶去。

艇长向我道歉，说不认识我。十分钟后，我们已到达右岸。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并向他表衷心的感谢。

在新指挥所里，我们见到了克雷洛夫、维特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很兴奋。因为我们又在一起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晚上我们清点人员伤亡情况。炮兵、工程兵及装甲兵的副主任全都离开了我们。

军事委员会给我们指派了几个新的副职：炮兵副主任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少将，装甲兵副主任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中校，工程兵副主任的位置还空着，因为未找到代替人。我为此事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了报告，很快，科先科少将到我这里来了。在B·M·特卡琴科中将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由他来作我的工程兵副司令员。

新的集团军指挥所没有掩蔽部，甚至连能够躲避子弹和炮弹的碎片的掩体也没有。在我们的上方，在陡峭的河岸上，有很多储石油的油槽和混凝土制的装重油的贮油池。在浅滩上堆放着车床、发动机及一些其它的工厂设备，原先准备把它们疏散到伏尔加河对岸，结果都丢在这里。河边停着几只没完全打坏的驳船和许多浮运的木材。

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驳船上，其实，就是睡在露天里。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被安排在河岸附近匆忙掘成的避弹壕里，这些避弹壕甚至还没上盖。

工兵们不知听信了谁的话，认为在陡岸上方的储油槽全是空的，于是就在其下方开始修建掩蔽部。后来，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轻信付出了代价。

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向马马耶夫岗西南方向实施反突击，以便从北面与三个担负反冲击任务的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作战，切断和击溃向斯大林格勒进犯的德军部队。

9月18日象平时一样开始：太阳刚一露头，敌机就出现，开始轰炸并冲击我战斗队形。敌主要目标是车站和马马耶夫岗。空袭之后，敌人的火炮、迫击炮紧接着向我开火。作为回报，我们的大炮也轰隆隆地响起来。战斗非常激烈。上午8时，城市上空的德军轰炸机突然消失了。我们都明白，在城北作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已在积极行动。那边已开始了战斗侦察。14时，我们上空又出现了几百架“容克”，它们又继续早上开始的对第62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实施轰炸。这意味着，北边的战斗侦察已经停止，或者说，暂时告一段落。

敌机对我军积极行动的反应非常敏感，尤其是对北边。我们根据敌机的这一活动规律，常常可以猜到我方面军其它地段的态势。我们感谢这位“邻居”，也因为这6小时的轰炸间歇时间，使我军得以加强，使我阵地更加完善。

清晨，我右翼部队转入进攻，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旅，占领了30.5高地；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占领了135.4高地。在坦克第23军的地段，机械化步兵第38旅，彻底占领了“红十月”村西南边的果园。A·E·叶尔莫尔金师的分队及A·F·叶林的近卫第39团，在马马耶夫岗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一天之内，他们就向前推进了100—150米，并在马马耶夫岗的顶部，修筑了牢固的工事。在市中心和集团军左翼的战斗，仍象从前那样的残酷。敌人虽然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们的部队仍坚守在除车站以外的已占领的阵地上。在5天的浴血奋战中，车站曾易手15次之多，只是到9月18日傍晚，才最后被敌占领。

我们已无力再对车站实施反冲击了。罗季姆采夫将军的第13师已精疲力竭。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后，就立即投入了战斗，并承受住了攻打这个需市

的德国军队的主要突击。近卫军战士们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也被迫把斯大林格勒的几个街区让给了敌人。这并不是退却。谁也不想退却，近卫军勇士们死守在阵地上、撤退的只是重伤员。与师主力部队失掉联络的近卫军战士，单独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一组，仍然在铁路板道房的岗亭里、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在月台线后面、甚至在车厢底下，坚守着，战斗着。他们在独立地继续执行上级交给自己部队的任务——插入敌后方或两翼，打击法西斯强盗，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强迫敌人接受这样的巷战战术，即：迫使敌指挥官不分昼夜地使自己的连、营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断地向各个方向投入兵力，去包围、压垮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苏维埃战士的“单人堡垒”。当时，我已经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我在前线生活的第一天就开始酝酿了），即用什么来对付敌人已形成的、但又陈腐的战术呢？

我思考中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与敌人面对面地交锋。

有时，他们比在指挥所里观察敌人战斗队形的将军们，更了解敌军士兵的心理状态。他们研究敌人的特点。我这里强调“研究”二字，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他们智慧，赋予他们激情和思考能力。他们不仅理解自己指挥官的意志，而且还能判断形势，识破敌人意图。当然，他们比起司令部的参谋们，对敌人的部队了解得要少，也不能看到我们从观察所里所能看到的那么广阔的战场，但他们在与敌人周旋的无数次冲击和反冲击中，根据敌人在战场上的行为，能够比别人更多地、更强烈地感觉到敌人的士气。而了解敌人的士气，不是抽象的，而是直接从战场上看到的——这才是任何战斗中最重要

的要素。

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里，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了解敌人的士气，所以他们不怕敌人数量上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战士受伤时也不下战场，并竭尽全力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党教育我们的军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部队的政治部门、党团组织，在完成党中央委员会指示的同时，努力培养每个军人对我们正义事业的信心。通过战斗生活的具体实例和英雄们的功绩，来增强他们对祖国的高度责任感，升华他们的道德精神。所有上述要素使我们坚信，我们的军人具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真研究审订了我们的分队在巷战时所应采用的战术。

我们应该做到，第一座房屋，只要里面有我们的军人，哪怕只一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在地下室里、或者是在楼梯平台上战斗的士兵，如果他们了解集团军的总任务，他们将大无畏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并独立地去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在巷战中，士兵有时就是将军。

不相信士兵能力的人不能成为指挥官。在争夺车站的那几天里，我同军事委员会委员 K·A·古罗夫、参谋长 H·A·克雷洛夫就决定改变我们的战术。我们没有让军队中原有的一些条例、制度来约束我们的手脚，在连、营里，除已有的班和排之外，又组织了新的战术单位——突击小组。

9月18日，我接到东南方面军的命令。当时第62集团军隶属东南方面军，下面就是这份文件。

《第00122号战斗命令》摘要：

东南方面军司令部，1942年9月18日18时。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兵团向南方全面转入进攻以后，不断给敌人以打

击，使敌人在库兹米奇、苏哈亚、梅切特卡、阿卡托夫卡等地区遭受巨大损失。为抵抗我军北方集团的进攻，敌人从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波诺沃地区抽出大批部队和兵团，经古姆拉克调往北方地区。

为粉碎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敌军集团，我命令你们协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1. 命令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在马马耶夫岗地域组织至少 3 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的突击群，对斯大林格勒西北郊的敌人实施攻击，并把他们歼灭在这个地域。当日任务：在切实保障背后的雷诺克和奥尔洛夫卡地区、128 和 98.9 高地以及斯大林格勒西北郊和西郊的前提下，消灭城里的敌人。

命令方面军炮兵主任，以强大的炮兵进攻来保证第 62 集团军在右起戈罗季谢和古姆拉克、右至察里察河的地带实施突击。

从 1942 年 9 月 18 日 19 时起，把戈里什内步兵师列入第

62 集团军建制。命令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于 1942 年 9 月 19 日 5 时前、使这个师的大部分从“红十月”村附近的北边渡口，渡过伏尔加河到斯大林格勒，并用这支力量从 102 高地地区向城市西北郊实施突击。

步兵于 9 月 19 日 12 时实施进攻。》

从方面军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戈里什内师应尽快渡过伏尔加河，于 12 至 18 时这段时间里占领出发阵地。

当时，各个渡口的渡河条件都极为困难。期限显然不够用。

然而，戈里什内师渡河——这仅是任务的一个方面。方面军的命令中指出：第 62 集团军应拿出不少于 3 个师的兵力组成突击群。到哪儿去找这 3 个师呢？不是在第 2 梯队里，还是在集团预备队里，都拿不出整建制的师了。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在前线作战，都已投入巷战。

但方面军的命令毋庸置疑是必须执行的。

在反攻的准备过程中，集团军司令部的各个部门、各兵团和各部队的司令部门，都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极高的工作效率。

在执行方面军命令的过程中，我于 9 月 18 日 23 时 50 分

签署了对本集团军的命令。在残酷的防御战之后，在尽管是缓慢的、但毕竟是退却之后，在命令中出现一个新的词汇——

进攻。

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的部队，以极大的战斗热情接受了这个命令。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更加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如果反攻，就说明我们还有力量。由此可见，防御就要结束了。

进攻的时间定于 9 月 19 日 12 时。

从清晨起，我们就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期待着敌人营垒里出现任何惊慌失措的现象，期待着能出现敌人从我方面军地段调走部队的迹象。但我们只发现，敌机活动得不那么频繁了。清晨，斯大林格勒上空没有出现轰炸机。可见，我军北面的部队继续积极行动。

12 时正，我部开始实施攻击。攻击是在方面军炮兵群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支援下实施的。没有敌机的威胁，我们的任务变更很轻松，当然，飞机在巷战中已经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了。

但快到 17 时的时候，斯大林格勒上空出现了德国飞机。凭这一迹象可以断定，我军在敌人北翼的进攻又被阻止了。

第 62 集团军突击群的进攻，无论是在中央地带，还是在左翼，均形成与敌人打遭遇战的局面，只有右翼的敌人相对地消极些。

9月19日全天，在马马耶夫岗地域进行胜负难分的最为残酷的战斗。摩托化步兵旅占领了126.3高地；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的一个团，进入多尔吉冲沟以北地区，并始终与摩托化步兵旅保持着密切协同。戈里什内师的两个团在9月18日夜间接过河以后，迅速投入战斗。他们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也没有来得及熟悉一下周围的情况，在越过马马耶夫岗脊部以后，立即与正在进攻敌人步兵和坦克展开遭遇战。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112师的几个分队，从清晨起，就打退敌人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并在日终时，仍然坚守在从马马耶夫岗至波洛特尼亚大街的铁路沿线地区，坚守在多尔吉冲沟的分岔口，以及跨过克鲁托伊冲沟能往阿尔捷莫夫斯基大街的公路大桥。

在我面前放着B·B·古谢夫预备役中校的信。从1942年9月14日起，他就开始在步兵第112师参加战斗。方面军政治部根据他个人的要求，派他到在“红十月”工厂地区作战的部队中去。他在信里写道：

“我父亲在这个厂里做了35年的碾压工人。我就出生在马马耶夫岗附近，并在那里渡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父亲参加过保卫察里津的战斗。当战火在我的故城燃烧的时候，我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我由“62”号渡口来到右岸。炮声隆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就象一艘巨大的装甲舰的船舷。在“红十月”厂区，我找到了步兵第11师指挥所。我向师长叶尔莫尔金和政委利普金德作了自我介绍。叶尔莫尔金同志问我过去曾在哪里服役。我告诉他，我参加过1941年6月22日佩列梅什雷地区的战斗，我当时在曾三次获得勋章并被命名为伏龙芝的机械化第7师服役。当我谈到这一点时，叶尔莫尔金看了我一眼，便问：“古谢夫，你认识我吗？”这时，我才认出他来。叶尔莫尔金曾任机械化第7师的机械化第15团的团长。我们曾经在基辅附近一起被包围。在那里，我们组织了一支队，经过多次战斗后，终于与自己的部队在哈尔科夫城会师。叶尔莫尔金师长是一个对事业无限忠诚的人。为完成交给他们师的战斗任务，他投入了自己的全付心血和力量。他身上有着西伯利亚人坚韧不拔的品质，也有着已故师长索洛古布的顽强战斗精神。

在那一天，我结识了叶尔莫尔金得力的助手们——副师长、苏联英雄彼得·吉洪诺维奇·米哈依利齐内，师炮兵主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戈德列夫斯基以及师政工人员瓦西里耶夫、奥罗别伊、库夫申尼科夫、扬琴科和其他人。这些政工人员多数时间是在分队里度过，他们边参加战斗，边给师里的报纸写文章。

当时，师里约有800名攻击型步兵。他们在戈罗季谢、马马耶夫岗以东的战线占领防御。我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步兵第416团。该团与步兵第112师的156反坦克独立营一起，准备攻击马耶夫岗的敌人。步兵第416团团长阿谢耶夫大尉，准备将全团兵力投入到攻击马马耶夫岗的战斗中……19日清晨，开始攻击马马耶夫岗。与此同时，林格勒方面军从北面发起反突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两昼夜。我们的战士冒着德军强大的炮火，不顾敌机的密集轰炸，顽强地向前推进。步兵第416团团长冲在全团的最前排。终于，第416团与第156反坦克独立营重新占领了马马耶夫岗的顶部，并与步兵第95师一起，把敌人赶到多尔吉冲沟后面。”此时，在战斗中被大大地削弱的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正在市中心进行着巷战，看来，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击溃这个师，向伏尔加河的中心码头逼近，从而把集团军截成两段。

两个步兵旅、杜比杨斯基的近卫第35师以及布勃诺夫坦克旅的剩余部

队，正在从察里察河到瓦尔代斯卡亚大街，再往东南，直到伏尔加河岸的地区，进行着巷战。

在马马耶夫岗地区，我军的兵力与敌人进攻的兵力大体相当，而在近卫步兵第 13 师的地段及其南部，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明显占有优势。

9 月 19 日的战斗表明，德军不会把自己的部队从城里调往北面，而是要在城里的伏尔加河沿岸放手大干，企图一举歼我第 62 集团军。

我生力军从各个方向抵近伏尔加河。伏尔加河的所有渡口都在敌人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之下。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局势，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为了不中断与左岸的联系及部队的供应，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组织好部队渡过伏尔加河。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整个白天伏尔加河都在敌人的观察距离和射程之内。我们需要众多的渡口或码头。以便装御人员和弹药补给。因此，除了集团军自己掌握的两个渡口外。

我们让每个师都自行组织渡河。哪怕规模再小，总是能够对各师的撤退伤员和运送弹药方面有所帮助。所有的渡河方式，都被我们认真研究过，整个渡过行动，都在我们认真的监督之下进行。

我们拟制了与各部队进行电话和电报通信的应急方案。这个方案是由集团军通信主任尤林上校（后来成为将军）制定的。他总是掌握有备用电路和沿伏尔加河河底敷设的电线线路，当一个通信系统被损坏之后，我们可以改用另一个系统。除此之外，在左岸还设有通信中间站，通过中间站我们能够与驻扎在城里的各师保持联系。但在大规模轰炸和扫射的情况下，与我河岸各部队的通信经常中断。

3

连日来，德军的将军们采取了一切措施，阻止我生力部队渡河进入城里。从天明到天黑，伏尔加河上空都有他们的飞机盘旋和俯冲，而到夜间，则进行炮击。所有码头和通向码头的道路，整天都被敌人火炮和六管火箭炮封锁着。第 62 集团军要把部队和物资渡过伏尔加河，简直是困难重重。

夜间渡河可达右岸的分队，应当在该夜尽快进入到各个阵地，物资也要在当夜分发给各部队，否则，会被白天的轰炸毁灭。我们无法处置在伏尔加河右岸的马匹和车辆，因为没有地方可隐蔽它们，以躲避子弹、炮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打击。因此，所有运过伏尔加河的物资，都是战士们用肩膀把它们扛到各发射阵地。白天，他们要打退敌人的猛烈攻击；夜里，他们不能休息和睡眠，要搬运弹药、食物和各种工程器材。这就大大地消耗了战士们的体力，但部队的战斗力并未因此削弱。这种情况继续了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星期，而是整个战斗过程。

在市里，从战斗打响到战斗结束，各码头的军械交换站都是由索科洛夫中校管理的，而给养站是由斯帕索夫中校和季诺维也夫少校管理的。他们始终处在枪林弹雨之中，随时都可能被炮弹、炸弹炸得粉身碎骨。

9 月 19 日，H·E·巴秋科的步兵第 284 师向伏尔加河左岸开来，这个师被编入第 62 集团军。我们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因为这一天，在市中心，即罗季姆采夫师战斗的地区，局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化；在步兵第 95 师第 112 师战斗着的马马耶夫岗地区，形势也相当危急。而中心渡口已经完全瘫痪。

那天晚上，我们得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于 9 月 20 日再次从北面向

敌人实施攻击。

因此，我决定，我部将从马马耶夫岗地区向西南方向继续实施反攻击。我们相信，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9 月 19 日的反攻击之后，新的攻击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深夜，第 62 集团军接到命令。命令要求我们 9 月 20 日

以现有的一切兵力继续实施进攻，完成既定任务。

罗季姆采夫师所属地段的形势继续恶化。然而，我们却抽不出哪怕是一个营的兵力去帮助他。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他的第 39 团再还给他，这个团于 9 月 19 日之前已脱离师的建制，在叶林的指挥下，战斗在马马耶夫岗地区。

杜比扬斯基的近卫第 35 师的部队严重减员，已无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战斗。因此，我们决定把剩余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步兵第 42、第 92 旅，把师指挥机关撤往伏尔加河对岸重新整编。

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方面军炮兵司令员 B·H·马特维耶夫少将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要求，随步兵师一起去加强第 62 集团军的炮兵部队，应渡河到伏尔加河右岸、到城里去。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坚决反对这个主张。我们把步兵师的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左岸，而把炮兵观察所搬到右岸。从那里它可在宽大的正面指挥火炮和炮兵连的火力机动。我们只是要求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随部队一起渡河。

在市里，正如我已经觉察到的那样，我们的炮兵群既没有马力牵引，又没有机械牵引。

这样，我们就丧失了火炮的机动。用双手推着大炮和榴弹炮，在被炸得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行走，通过市区的废墟，这是不可能的。从 9 月后半月起，从伏尔加河对岸把炮弹运过来，再运进城里就已经很困难了，有时完全行不通。因为白天敌人监视着从东边通向伏尔加河的所有道路。从 9 月 22 日起，敌人抵达中心渡口，他们向每一只渡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在夜间运送弹药也很冒险，因为敌人已知道我们的渡河区域，他们不断地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弹，使伏尔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昼。把弹药运过这 1 公里宽的水面，比从 100 公里以外把弹药运到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把师属炮兵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城市防御和进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中师属炮兵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把炮兵团和榴弹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对岸，使每一个师长或旅长都能随时调动自己的炮兵火力，射击前线任何一个地段。集团军炮兵司令 H·M·波扎里斯基少将，在必要的时刻，也能够组织伏尔加河左岸的所有旅和师的炮兵连，集中火力打击一个目标。

H·M·波扎里斯基对使用炮兵火力抗击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进攻这一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波扎里斯基指挥的营射击和团射击经常是十分准确的，并且具备灵活的机动能力。在伏尔加河对岸的阔叶林里，集中着身管炮兵和火箭炮兵的强大的突击火力。

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在工厂的车间里，也有直接瞄准的火炮和迫击炮。这些炮兵火力向企图冲向伏尔加河各个地段的德军，实施无情的猛烈的打击。对集结在工厂区前和马马耶夫岗上的敌人庞大的步兵群和坦克群，波扎里斯基的炮兵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

火炮——战争的上帝。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它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 62 集团军的炮手们，以机动、准确的火力，给德国侵略者带来很多的烦恼。而指挥这些炮兵的是出色的炮兵专家和天才的军事首长 H·M·波扎里斯基。他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胆有识的红军指挥员。

从 9 月中旬开始，每天晚上，H·A·克雷洛夫将军、H·M·波扎里斯基将军、师级政委 K·A·古罗夫和侦察主任 M·J·格尔曼上校都聚会在我这里。我们根据侦察情报，把凡是德军正在集结兵力、进行进攻准备的街区，都标在作战地图上。然后，在天明之前，用所有炮兵火力，包括“卡秋莎”，突然向这些街区实施打击。我们还用远程航空兵向那些街区实施突袭。这样，每一发炮弹都射击敌人集结的中心地区，较之对广阔的场地和地区进行拦阻射击更有效。敌人的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我们还用直接瞄准射击打击敌人，骚乱敌军战斗队形。在这一连串夜袭之后，敌人进攻时，再也摆不出气势汹汹的样子了。

9 月 20 日黎明时，战斗又打响了。

在我军右翼（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拉兹古利亚耶夫卡）继续进行牵制战，而在马马耶夫岗地区，步兵第 95 和第 112 师的部队，正在抗击着敌人新锐部队的攻击。

晌午，第 95 师师长戈里什内上校向我报告情况时说：“如果不考虑前线向这一边或另一边不超过 100 公尺的微小变动的话，那么，可以说，马马耶夫岗的局势仍旧是稳定的”。

我警告他说：“要注意，哪怕是 100 公尺的变动，也会招致丢掉马马耶夫岗……”“宁死，我也不放弃马马耶夫岗，”戈里什内回答说。

师长 B·A·戈里什内上校和他的政治副手 A·A·弗拉先科，深入地、准确地了解战斗的每一个细节，在战斗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能够互相弥补：前后不仅是一个指挥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他对全体人员的政治教育给予很大的关注；后者在领导本师党的政治工作的同时，能够深入、细致地研究作战行动实际问题。他善于很理智、很内行地与每一个指挥员交谈。

听了他们用电话向我报告的情况后，我丝毫不怀疑报告中对事实分析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不论他们（戈里什内或弗拉先科）之中谁向我汇报。因为他们俩个人都十分了解作战情况，都很熟悉敌人的作战特点。

戈里什内师紧随罗季姆采夫师进入城市。他的师是刚一渡过伏尔加河，未经休整，就投入到争夺马马耶夫岗的战斗中，然后又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厂地区作战。该师的一些团中，准确地讲，只是一些团司令部，轮流撤回伏尔加河左岸，在那里进行短期休整，补充连队，然后重返战场。

戈里什内和弗拉先科，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仍然在自己的观察所里，从容地、镇定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

要去他们的指挥所比去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敌人的狙击兵已经封锁了“街垒”工厂及“红十月”工厂之间的凹地。最初几天，我们就有许多战士牺牲在那里。因此，这片凹地被我们称为“死亡沟”。为了减少伤亡，我们横跨凹地砌起石头围墙。这样一来，只要弯着腰、紧贴住石墙，就可以到达戈里什内的指挥所。

在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 13 师的地段上，情况也十分严重。9 月 20

日晌午，敌人的自动枪手已潜入中心渡口地区。师指挥所已开始用冲锋枪与之对射。该师的近卫第 42 团的部分分队已处在半包围之中，通讯联络经常中断，而且中断的时间愈来愈长。派往罗季姆采夫司令部的集团军通讯参谋都牺牲了。派往中心码头的叶林团迟迟未到，因为他们在途中被敌机发现，并且遭到连续的轰击。

集团军只能从左岸用炮兵火力援助这个师，然而，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罗季姆采夫师的左面，在察里察河上，战斗愈来愈残酷。在那里作战的有姆·斯·巴特拉科夫的步兵第 42 旅的几个营，由北海舰队水兵组成的步兵第 92 旅以及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与他们的联系也经常中断，这使我们很难判明这一地段的战斗形势。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敌人集结了新锐力量，拼命想冲到位于我防御中心的伏尔加河，然后扩大突破口。因此，我们必须在马马耶夫岗区域继续实施反突击。如果减弱这里的反突击，那么敌人就会放开手脚，全力猛攻我左翼。进而击溃我在城市中心的防御部队。

9 月 21 日夜，原作为集团军预备队、放在马马耶夫岗东边的巴秋科师的步兵第 284 团，渡河来到城里。

将近夜里两点钟时，我接到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一个坦克旅，已从北面冲过敌军阵地，将在奥尔洛夫卡地区与我们会师。我把大家都唤起来，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整整一夜都在寻找这个坦克旅，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与我第 62 集团军会师的好消息。然而，没有等到这样的报告。几天以后，我们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达目的地。坦克第 67 旅整个旅和他们的旅长希德贾耶夫上校一起，在敌人战斗队形的纵深处全部阵亡。

9 月 21 日到 22 日，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处于危急关头。

敌人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第一次把我集团军切成两段：在近卫步兵第 13 师的地段，敌人前出至第 2 堤岸街，其先遣分队已逼近中心码头。

9 月 21 日傍晚，第 13 师占领的前线阵地是：克鲁托冲

沟、第 2 堤岸街、“1 月 9 日”广场、太阳大街，共产主义大街、库尔斯基大街、奥尔洛夫斯基大街、无产者大街、果戈里大街，直至察里察河。

该师的几个分队陷入包围，一直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关于他们的情况、尤其是近卫步兵第 42 团 1 营的情况，我们没看到更详细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的战报里以及后来的报纸、书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时，都谈到：保卫火车站的那个营，于 1942 年 9 月 21 日全营覆没，只有一个叫科列加诺夫的少尉军官活了下来……

坦率地讲，直到最后一天，我还不相信这个营于 9 月 21 日全部阵亡的消息。因为当时从敌人的举动判断，我总觉得，在车站附近及其左侧地区，一直有我们的战士在战斗，法西斯分子在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是谁在那里坚持搏斗？他们又在怎样搏斗、——这一点谁也不晓得。这些人的命运，象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后来，在我的《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一书出版以后，以至电台广播了这本回忆录的部分章节之后，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包括伟大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的信。这位老战士说，他知道在法西斯占领车站以后这个营的详细情况。这封信使我很激动，终于能在 15 年后查明这些人的命运。我常常怀念他们，我一直不相信，与法西斯分子在车站附近搏

斗了 7 天的战士，会在一夜之间全部阵亡、或者说投降了。

我确实没弄错。1958 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时间，去访问了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尔尼戈夫省普里卢克区的一个叫利科维察的村子里。见面后，第一眼，第一句话，立刻就使我们相互认出来了。

安东·库兹米奇马上使我回忆起，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的地点。他说：“您还记得吗？那是在 9 月 15 日晚上，在普希金广场的教堂旁，您看见我便问：上尉，你的人在哪儿？……噢，在这里，那就接受任务吧，要把法西斯赶出车站。清楚了吗？

……”

“是的，我还记得。”我回答说。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 42 团 1 营 1 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风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 10 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

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我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

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

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

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连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

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安东·库兹米奇让我读了这一页。这里，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写的话：

“9月18日。刚才，志愿冲锋枪小组悄悄地遁在夜幕中。他们走了，他们懂得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潜入敌人后方，并在那里独立作战。

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5天的弹药和给养以及在敌后作战的详细指示。

不久，敌人的防御就出现乱子。敌人显然搞不清：是谁捣毁了刚刚运来弹药的汽车，是谁消灭了机枪手组和炮兵班。

从早晨到中午，敌机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一些飞机离开机群，隐入高空，然后又掠地飞行，向街道、向建筑物的废墟上抛洒暴雨般的子弹；另一部分飞机，拉响战斗警报器，在城市上空盘旋，企图制造紧张慌乱气氛。燃烧弹从天而降，重型地雷接连爆炸，城市笼在熊熊大火之中。9月18日夜，德军炸毁了我们车间与‘制钉厂’其他建筑之间的围墙，并开始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战士刚刚把敌人掷来的手榴弹从窗子扔回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科列加诺夫少尉受了重伤，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两个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科列加诺夫救出来送往伏尔加河。再往后他的命运如何？我就知道了。”

“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读完这几行日记，我问道。

“我们在‘制钉厂’坚持战斗了一天多，”安东·库兹米奇继续讲：“扎沃敦上尉带着他的迫击炮连来增援我们。他们的迫击炮弹早已打完了，但是，迫击炮手们打起仗来个个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重新配备力量，向车站集结火炮和坦克。

全营接到命令：做好准备，打退敌坦克的攻击。

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午夜，一个当地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德军坦克准备发起突击。她还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敌军部署的有价值的情况。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娅·维杰涅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城里的居民经常帮我们搞一些侦察，也常常给我们送水来。遗憾是的，这些勇敢的爱国者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年青的女侦察员，战士们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轰炸中牺牲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1营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有几个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们开始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

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伏尔加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的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这卑鄙的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伏尔加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伏尔加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我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的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们甚至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发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

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嚣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囊。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晃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

‘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的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的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

大家疲惫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伏尔加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战斗警卫，是我们的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伏尔加河岸边的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基上的车厢也在燃烧。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伏尔加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

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

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伏尔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桨，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

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

安东·库兹米奇结束了他们营在9月21日以后的故事。

现在，对近卫第13师第42团1营的遭遇都清楚了。这是我们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又一见证。他们在被分隔开的防区，以战斗小组为单位独立作战，他们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而战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敌人大为头痛。每一个这样的战斗小组，都与兵力优势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战斗，敌人开始害怕我们的战士了。

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们眼里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们看成是地狱。

而大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们却竟场比赛，看谁最勇敢，看谁最经得起考验，看谁消灭的侵略者最多。

在那几天里，德军的一大股自动枪手，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中心码头，切断了我集团军主力与在库尔斯克大街、高加索大街和克拉斯诺波利斯克大街作战的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联系。但是，到了9月21日，保卢斯还不敢宣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城市的南半部和中心渡口。因为在那里，我军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9月21日晚，在达尔和戈拉地区的我军观察员，发现了大批敌步兵和坦克在集结。不久，敌人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他们企图在行进间冲到察里察河左岸，但其进攻受到我伏尔加河左岸炮兵火力的拦阻。部分坦克和步兵退回出发阵地，剩下的敌人被苏联英雄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旅歼灭了。这个旅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水兵。在这次战斗中，B·茹科夫中尉率领的、由17名水兵组成的小分队，就击毁了6辆坦克。在这个地段上，法西斯匪徒共损失8辆坦克、近300名士兵和军官。而苏联水兵一步也没有后退。

次日，敌人在市中心每隔1小时就用步兵和坦克向罗季姆采夫师的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竭力想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只是在傍晚，敌人加强了其坦克、步兵和飞机以后，才把罗季姆采夫的部队稍微压退了一些。德军先遣支队沿莫斯科大街前出到伏尔加河岸。与此同时，敌人一个步兵团沿基辅大街和库尔斯克大街推进到专家楼地区。

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尤其是在坦克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始终没能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近卫军战士只是退到中心渡口偏北一点的地方，但是市中心仍在他们手中。仅在9月22日一天之内，他们就击

退敌人 12 次进攻，击毁敌坦克 32 辆。尽管敌人不断地发动猛烈的攻击，但敌人在这里没能再向前挪动一步。9 月 21 日，戈里什内师的部队来到多尔吉冲沟的北源头，使其右翼与坦克第 36 旅衔接起来。但在 9 月 22 日白天，敌人多次进攻，将其从这里的阵地逐出。戈里什内师退到了沿马马耶夫岗西南坡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在多尔吉冲沟和克鲁托冲沟之间（戈里什内师和巴秋科师的接合部）在人民委员会大街和维连大街一线占领防御作为第 2 梯队的步兵第 112 师，就突然出现在第一线，并投入战斗。

在城里进行的第 10 天的战斗即将结束。希特勒原拟在 9 月 15 日以前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破产了。在这些天里，德军陆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向斯大林格勒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不断地投入预备队。我们的侦察发现，每天都有敌人的补充人员和坦克抵达斯大林格勒。

4

敌人靠近中心码头，我集团军的后方以及伏尔加河就几乎整个地暴露在敌人眼前。而伏尔加河又正是我集团军后勤供给的主要通道。我命令我的负责后勤的付手，迅速建立 3 个码头和 3 条横跨伏尔加河的水路交通线。第 1 个码头在上阿赫图巴地区，第 2 个码头在斯库德里地区，第 3 个码头在图马克地区。从这里，用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船以及一些小船只，在晚上往“红十月”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克村附近的码头运送物资。

从“街垒”工厂到扎伊采夫斯基岛，有一条架设在铁桶上的渡桥，而在岛与伏尔加河左岸之间有一个小渡口。集团军地段上的所有的船只，都严格登记造册，并配置在各师、各旅之间。每个师都建立了小渡口，这些小渡口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渡口的所有工作都是按本部队指挥员亲自制定的计划进行。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步兵旅，其后勤供给是经戈洛德内岛单独进行的。

敌人只要到达伏尔加河，必将沿河岸发起攻击，切断我部通向河边和渡口的去路。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为了破坏敌人的计划，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在 9 月 23 日清晨，从马马耶夫岗地区不断发起攻击，并把巴秋科师（这个师已于前一天夜里渡过河来到城里）投入战斗。这个师的各团的任务是：消灭中心码头地区的敌人，从两侧牢牢地控制住察里察河河谷。

我在给巴秋科师长布置任务时，要他注意总结战斗小组进行巷战的经验。开始时，我以为他不太了解强击队的意义和作用。难道能轻易丢弃传统的连、排战斗队形吗？因为连队组建时他教战术就是这样讲的。然而，这个外表整洁、神态端正而机警的巴秋科（当时还只是个中校）看了我一眼说：

“司令员同志，我是来与法西斯匪徒作战的，不是来参加阅兵的。何况我的各团都是西伯利亚人……”

原来，他在伏尔加河对岸时，就从我们的联络员那里得知，第 62 集团军创了新的战术方法。因此，他命令他的团长、营长们学习研究城市作战经验，并给每个战士准备了双份弹药、手榴弹、梯恩梯药包等战斗物资。

与巴秋科简短地谈话之后，我就得出了结论，他的师将会与法西斯战斗到底，决不会退回伏尔加河左岸。这时巴秋科师正沿着伏尔加河河岸向南、向中心码头实施反攻击，以增援罗季姆采夫的部队。同时，罗季姆采夫那里也得到了近两千名兵员的补充。我们打算借助这次反冲击，不仅遏止敌人从南面发动的进攻，而且还要消灭已冲到伏尔加河的德军部队，并与留在城市南部的各个旅恢复密切的联系。9 月 23 日 10 时开始反攻击。

激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

战斗之激烈，屡次都达到白刃格斗的程度。巴秋科师暂时遏止了敌人从中心码头区域向北的进攻。但没有能够消灭进犯到伏尔加河的敌人，也没有能够与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各步兵旅会合。

但是，保卢斯企图前出伏尔加河、然后沿伏尔加河从两翼突击我集团军后方的计划落空了。我集团军各部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些部队是：罗季姆采夫师、巴秋科师、戈里什内师、叶尔莫尔金师；巴特拉科夫旅、捷里霍夫旅、博尔维诺夫旅、安德鲁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诺夫的坦克部队以及第 62 集团军的其他部队。

对于第 62 集团军来讲，危机已经过去。敌人第一次突破到伏尔加河，没有给我集团军防御带来太大的影响。马马耶夫岗仍然在我们手中。我军虽损失很大，但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完全被歼。以西伯利亚人为主的巴秋科师的反冲击，遏止了敌人在市里的进攻。法西斯匪徒的进攻被挫败了。大街上趴着几十辆燃烧着的德军坦克和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的尸体。

我从未想过离开这里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去，甚至也没有考虑过撤到伏尔加河中的某个岛上去。因为这样做将会立刻影响到各兵团的指挥员、他们的司令部以及全体战士的精神状态。有一次，K·A·古罗夫告诉我，他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留了几条船。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要神智健全，就决不会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去。

古罗夫紧紧地拥抱着我，激动地说：

“就是剩下我们俩个人，也要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这是比任何友谊都更加牢靠的战斗情谊，它使我们更加亲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同意我的观点。即使在距敌人 1—3 公里这样近的地方，指挥集团军部队作战已很困难，但当我暗示他回到左岸的中间联络站时，他坚决反对，说：

“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我们感觉到并且发现，几乎所有的师、甚至团的司令部都在注视着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动向。为了确信我们仍然与大家一起留在右岸，许多司令部都派自己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到集团军司令部来。

明白这点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就不总是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而是经常到师、团的观察所去，有时去坑道，直接让战士们亲眼看见，将军们——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离开他们，而是与他们一起战斗。

激战时，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设在距前线 120—150 公里的下奇尔斯卡亚或在戈卢宾斯卡亚镇。而第 6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集团军司令部，在 10 月中旬的那几天里，距前沿仅 400 米。

当时，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让师、团各级指挥员们，而且要让战士们都感到并且认识到，他们不是孤独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就在他们身边。

9 月 24 日傍晚，市内的战斗渐渐平息。电台向全世界报道说：伏尔加河的要塞仍然在我们手中，城市在燃烧着，它已变成一座活火山，正在吞噬着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分子。是的，事实正是这样。

斯大林格勒的捍卫者们学会了在烈火和浓烟中作战，他们为祖国的每一小块土地顽强地搏斗，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匪徒葬身在这里。关于这些情况，

每天电台在晚间的战报节目里都有报导。而第二天，好像为了报复我们，希特勒的统帅部派几百架轰炸机来轰炸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头顶上倾泻着数以千计的炸弹。

在 1942 年，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城市是希特勒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元首毫不吝惜德国士兵的生命，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德军师投入这场战火中。

参加过攻打这个城市的德国将军汉斯·德尔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写道：

“9 月中旬开始的争夺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战斗，可以称为阵地战或‘要塞战’。大规模的战役终于过去了。战争从草原开阔地转到被大大小小沟壑分割的、有许多小树林和山谷的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转到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这里到处是铁的、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建筑物。作为长度单位公里，已被公尺所代替；总参谋部的地图也被城市平面图所代替。

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铁路路基，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消耗弹药之多已属空前）也不能相比。我们与敌人距离已近到极限。尽管我们有优势的空中力量和密集的火炮力量，但在近战中都无法发挥作用。俄国人比德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更善于利用地形和进行伪装；他们有丰富的街垒战和固守楼房的经验；而且他们占领着牢固的防御阵地。”从缴获的德军摩托化第 29 师的战斗日志中得知。9 月 17 日，该师师长向第 6 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报告：

“……我师的两个摩托化团几乎全军覆没，220 辆坦克只剩下 42 辆。”

希特勒曾经对第 6 集团军司令说：“你带领你的集团军，你将所向无敌！”可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初期战斗中，这个集团军就碰得头破血流。

希特勒撤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职，仅仅是再次表明自己的意图：无论如何要占领斯大林格勒。

9 月 23 日，所有侦察渠道都证实，敌人继续在市内战斗的同时，又在戈罗季谢和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域集结大量兵力。这就不难证明，新的敌军集团将对马马耶夫岗以北的工厂居住区、拖拉机厂、“街垒”厂和“红十月”厂实施攻击。

为了击退敌人从这个方向来的突击，我们立即着手组织后方反坦克地区。其界线是：从码头（在梅切特卡河口）、梅切特卡河南岸至维什涅瓦亚峡谷口，往下沿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小树林西缘直至伏尔加河。工程兵部队接到命令：在 3 天之内敷设密集的反坦克雷区，掘出崖壁和断崖。各师长、旅长们接到命令：选派出特别分队及为其警戒的分队，在自己的防区内构筑反坦克地区，敷设反坦克雷区。为了防止敌坦克冲到我后方地区，要组织一个配备有备用地雷的工兵小组，以便能随时在敌坦克可能突破的所有道路和路口敷设地雷。

9 月 24 日晚，当市中心的战斗停息时，我们得到证实，敌人的生力部队正在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和戈罗季谢地域集结。夜里，我们决定局部地变更集团军的兵力布署，以便压缩并巩固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的正面和马马耶夫岗地域的战斗队形。9 月 25 日，下达了变更布署的命令。在命令中特别强调了：“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敌人闯入阿尔季列里斯卡亚大街地区和靠近伏尔加河河岸。

并准备进一步肃清城里的德军……

1942年9月26日黎明前，集团军所有部队要作好一切准备，反击敌人可能实施的攻击、特别是在戈罗季谢和‘街垒’，厂方向上的攻击。”

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全靠侦察兵向我们提供的准确的情报。应该对第62集团军M·3·格尔曼领导的全体侦察员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没有报错过一次敌情，因此，使我们能够预先知道德军的行动，并作出必要的决定。

顿河与伏尔河之间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草原，这使我们能够大纵深地观察整个地形。

但仅此一点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识别出假机动和虚拟情报。

我们是冒着风险行动的，因为这次变更布署是在与敌人十分接近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并且是在防御纵深极窄地域里实施的。这里没有直通路和行军路线，到处是深沟、坍塌的建筑物、障碍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

时间计算上的一点错误或者伪装上的丝毫不惧，都会破坏整个战斗的布署，遭受敌人炮火的重大杀伤。集团军司令部的所有参谋作为向导被派到部队中去，具体组织夜间的部队机动。

防御集团军北翼的部队由三个步兵旅（第115、第124、第149旅）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步兵第315师的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一些建制不全的分队组成。它们的左面，即从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到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地段上，由拥有56辆坦克（其中36辆中型坦克，20辆轻型坦克）的坦克第23军防御。这个军与叶尔莫尔金步兵第112师互相紧密策应。

在小树林西缘、标高112的地域内，有作为第二梯队的近卫坦克第6旅。这个旅有7辆T—34坦克和6辆T—60坦克。这些坦克几乎全都被打坏，在这里只作为固定发射点使用。

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被包围在靠近中央车站的一个城市公园里。他们坚持战斗着。与他们的通讯联系时断时续。这个团剩下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步兵第92、第42旅与集团军失去联系，前者在察里察河以南地区单独作战，后者在察里察河以北——在青年共产国际大街、比尔斯卡亚大街和科兹洛夫斯卡亚大街战斗。集团军司令部派往这两个旅的参谋都没有返回。步兵第92旅（其战士来自水兵）在机枪营营长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导员B·C·弗拉索夫指挥下，进行着顽强殊死的战斗。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实处境后，我决定把该旅的剩余部队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起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巴特拉科夫上校对本人在此决定之前因受伤已离开这个旅。

在我左翼，敌人放开手脚地给部队补充了兵员和装备，并开始向马马耶夫岗及其北面地区调遣部队。

占有空中优势的德军部队，既不想认认真真地侦察，也丝毫不想掩饰其准备对我实施突击的企图，他们大大咧咧，蛮横不可一世。第一次调到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那些德军部队，尤其显得狂妄可笑。

德国兵在进攻之前的晚上或夜里经常向我们大喊：

“俄国佬，明天你们就要被赶进伏尔加河啦！”

这时，我们通常能正确无误地判断，明天敌人一定会从这个地域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在与狂暴的亡命之徒作战中，我们精心地制定我们的战术和特殊的斗争策略。我们学习并学会了在肉体上以及精神上打击和压倒侵略者。

我们相当注意在各部队中开展狙击手运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支持这一创举。集团军的报纸《保卫祖国》报，每天都公布被我狙击手打死的法西斯匪徒的人数，刊登出色的狙击手们的照片。

各个政治部门、党团组织都参与领导狙击手运动，在党团会议上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详细地制定各种措施，以提高神枪手的技术。每个狙击手都承担起训练几个射击能手的任务，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独立的狙击手。这样一来，昏头昏脑的法西斯分子可要吃苦头了。

我亲自会见过许多著名的狙击手，经常与他们交谈，并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瓦西里·扎伊采夫、阿纳托利·契霍夫、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及其他狙击手，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经常同他们商量问题。

这些著名人物同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反。当我第一次遇到扎伊采夫和梅德韦杰夫时，使我注目的是，他们的谦虚态度、从容的举止、格外沉静的性格和机敏眼神。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盯着一个目标不眨眼睛。他们的手结实有力——握手时，就象一把老虎钳子一样，紧紧挟住对方的手。

狙击手们“打猎”，往往是一大早就来到事先挑选好的地方，仔细地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耐心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他们知道，一点点疏忽和急躁都可能出事，将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因为敌人总是很认真地观察着我军狙击手的行动。狙击手只消耗很少的子弹，但他们每放一枪就意味着被瞄准的法西斯分子不是死亡就是重伤。

我们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经常向年青的射手传授经验，教他们掌握准确射击的技巧。

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同我们一起打到柏林。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师扎伊采夫还要多。

我狙击手的活动使希特勒的将军们十分恐慌。通过我们的传单他们才清楚我狙击手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损失。他们决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我们。

这是9月末的事情了。深夜，我们的侦察员拖回来一个“舌头”，这个“舌头”说，法西斯狙击兵学校的头儿科宁格勒少校已经从柏林乘飞机来我们这儿了，他的任务是首先消灭苏军的主要的狙击手。

师长H·E·巴秋科上校把狙击手们召来，他说：

“我认为，从柏林来的法西斯的‘超级狙击手’对我们的狙击手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扎伊采夫？”

“应该干掉这个‘超级狙击手’，”师长说道：“只是要小心些，要动动脑子。”

“是，一定干掉他，上校同志！”狙击兵们回答。

我军的狙击手运动发展得很快。日益壮大的狙击手队伍在这之前就歼灭了不下一千个敌人。报纸和传单都报导过这些情况。一些传单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便研究起我们狙击兵的战斗方法，并开始采取积极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狙击手。事情已过去了，但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大张旗鼓地在报纸、刊物上暴露我狙击手运动这一作战经验，实在有些操之过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敌人过早地知道我狙击兵的作战特点。只要我们干掉一两个法西斯军官，德寇就马上对我预定的伏击地点进行炮击。我们不得经过备用的通

道，迅速转移阵地，以摆脱困境。

法西斯狙击手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时机，用准确的、决定性的一枪，结束他的性命。

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回忆说：

“对于面临的决斗，我们有好几个晚上都在窑洞里进行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狙击手都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都是他们每天对敌人前沿阵地细心观察而总结出来的。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各种诱惑方式。但是狙击技术的特点在于，尽管别人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最终的战果取决于射手本人。与敌人面对面相遇，射手每次都应该有创新、有发明、采取新的行动。

墨守陈规对于狙击兵来说就等于自杀。

‘那么，柏林来的狙击手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互发问。我很熟悉法西斯狙击兵们的射击和伪装特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辨别出：哪些是有经验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胆小鬼；哪些是执拗、果敢的敌人。然而，这个德国“超级狙击手”的特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个谜。我们每天观察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特征。很难说他在什么地段，很可能，他经常变换阵地，并且同样小心地在寻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样。就在这时发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罗佐夫的光原瞄准器被打坏了，而舍伊金被打伤了。莫罗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练的狙击手。在与敌人进行复杂的、艰苦的战斗中，他们从未败下阵来。毫疑问，他们遇上了德军的‘超级狙击手’。黎明时分，我和尼古拉·库利科夫来到昨天我们的同志呆过的阵地。对研究过多日已经熟悉的敌军前沿进行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白天快结束了。这时在敌人的掩体里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个钢盔，并且慢慢地沿堑壕移动。射击？不行！这是个诡计。钢盔移动得很不自然。可能是狙击手的助手在拿着钢盔移动、而他本人则在等待，等待我射击时才暴露自己。

‘他可能隐蔽在哪里呢？’当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埋伏地点时，库利科夫问。

根据对于在这一整天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猜想，那个柏林来的狙击手就在这里。需要特别保持警惕。

第二天过去了。谁的神经更坚强呢？谁能靠机智巧胜对方呢？

我忠实的战友尼古拉·库利科夫也全神贯注地等待这一决斗。他已不怀疑敌人就在眼前，但坚信我们能胜利。第三天，与我们埋伏在一起的还有指导员丹尼洛夫。清晨，象往常一样来临了。夜幕消逝，敌人的阵地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清楚。战斗又开始了，炮弹在空中吱吱作响。而我们仍伏在光学仪器上，密切注视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吗，你们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导员突然兴奋起来。他由于疏忽差一点探身到胸墙外。但这已经足够了，法西斯分子打伤了他。当然，只有经验丰富的狙击兵才能这样准确射击。

我长时间地注视着敌军阵地，但没有找到他的埋伏地点。根据射速我断定，那个狙击兵就在某个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我继续观察。左面，停着一辆被打坏的坦克；右面，有一个土木发射点。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边呢？在坦克里？不，老练的狙击手是不会隐藏在那里的。

在土木发射点里？也不可能，发射孔是堵着的。在坦克和发射点之间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烂砖头，中间放着一块铁板。它早就放在那里了，并不引

人注目，我从敌人所处的地位思量着：哪里是狙击兵应占据的最佳位置呢？那块铁板下面是否挖了个掩体？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潜伏过去，藏在那里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里，在双方都没有占领的中立地带的那块铁板下面。我决定检查一下。我在一块小木板上套上手套，把它举起来，法西斯分子上钩了，开了枪。我按举起来的姿态小心地把小木板放下，仔细观察弹孔。没有丝毫偏差，直接命中。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是在铁板底下。

‘这个恶棍就在那里！’埋伏在我旁边的助手尼古拉·库利克夫小声地骂着。

现在应该把他诱出来，‘放入’瞄准圈里，那怕是一小块脑袋。但是眼下不可能。还需要时间耐心等待。我已熟悉他的特点了。他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理想的阵地。而我们应该更换一个阵地。我们夜里做了准备工作，并一直在那里呆到天亮。拂晓，德军开始向伏尔加河各个渡口实施炮火轰击。很快天大亮了。随着白天的到来，战斗越来越激烈。但无论是大炮的轰隆声，还是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不能使我们稍微分一点心。

太阳升起来了。库利夫开始进行盲射，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狙击兵的注意力。我们决定等待一个上午。午饭后，我们的步枪是处于背光处，而德军的阵地是在太阳直射下。在铁板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还是光学瞄准镜发亮？库利科夫开始向上小心地举起钢盔。法西斯开火了。这个希特勒分子以为，他终于把四天以来一直想要战胜的那个苏联狙击兵打死了，于是，他从铁板下面伸出了半个头。我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一点也不犹豫，就立即准确地射击。法西斯分子的脑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枪的光学瞄准器却仍在原处，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直闪到傍晚。

.....”

这就是我们第 62 集团军的狙击兵。显然，只是说步兵狙击兵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有不少的炮兵狙击兵和迫击炮狙击兵。像舒克林和迫击炮手别兹季德科，这样的一些炮兵指战员，都以自己准确的射击而驰名整个集团军。敌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经过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囱击中敌人”。战士们都打趣地这样说。

我忘不掉炮兵狙击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亚库梯人，身材魁梧、健壮。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我堑壕与敌堑壕之间，即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他一个人操纵着一门 45 毫米加农炮坚持战斗。

他伪装得非常巧妙，敌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坏时才发现这门炮。有一次，他终于被发现了，敌人根据炮声测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弹向他飞来。炮上的光学瞄准器被炮弹碎片打坏了，而大炮却安然无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无事。

我与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再次见面，是 1972 年 5 月 9 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当然，他同我一样，在这 30 年中都变化很大。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互相认出来了。他使我回忆起了 1942 年我们在掩蔽部的那次谈话：“你问我，我的炮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机会，等到德军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时，我才射击，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对我说：‘好样的！想喝点茶吗？’我说：‘喜欢喝浓茶。’你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兰地。

我说：‘谢谢你’！”

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的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守兵。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支撑点。城市的保卫者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

在反突击中，我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

9 月底，在所有的团里都组织了强击改——人数不多，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和刺刀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

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 5—10 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的战士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把他们干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这样一种打坦克的办法，即让德国坦克从头顶上过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手的射击之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城市的保卫者必须用火力切断敌步兵与坦克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敌人有组织的战斗队形。然后分别攻击笨重步兵和已闯过去的敌坦克。坦克离开了步兵是很难单独作战的，而敌步兵没有坦克的加强更是寸步难行。

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白天，我们更多是进行防御，击退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很少发起攻击。

我们用各种办法消灭侵略者。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语的《乌拉》，并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进攻的样子。敌人往往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可我们的炮手和机枪手早已对准这些地方了，这时我们开火，往往能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

“卡秋莎”火箭炮对敌人在新的进攻之前所集结的大批步兵和坦克进行齐射，效果极佳。我永远不会忘记叶罗欣上校指挥的“卡秋莎”团。

这个团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市里，它选择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作为阵地，敌人的炮火打不着它。叶罗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带式车体牵引的，它能够

迅速地进入发射阵地，实施突击，或更确切地说是齐射。它也可以在实施突击后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掩蔽处。

这个团的技术使敌人丧魂落魄，指战员们牢靠地掌握着这些装备。

我们的战士在伏尔加河的残酷的战斗中学习、成长，他们发明的新鲜战术数也数不清。

大家都成熟了，他们中很多人从普通的战士成为优秀的指挥员。

后来，在战役快结束时，我们从被打死的和俘虏的敌人的日记中知道，我们的新的作战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总是搞不清：今天我们又会在哪儿攻击、用什么武器作战和怎样作战？我们在夜里把他们折腾得疲惫不堪，以致第二天他们投入战斗时往往还睡眼惺松、无精打采。

只要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打算占领我们在头天夜里没有设防、或战斗队形稀疏的地段，我们马上就派部队把这些地方占满，并且立即布置火力配系，敷设地雷场。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出色。我们既知道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也知道敌人的兵力集结地。因此，我们可以抓住适宜的时机对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

在日终时，或者在一天的战斗快结束时，我们往往又实施新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不总是很有力，但对于已经虚弱的敌人来说，就是轻微的打击也是可怕的。我们总是用出其不意的攻击使敌人不断地处在紧张和恐惧之中。

近卫军的英勇精神

1

9月26日，所有的情报都证实：在新的进攻中，敌人将从戈罗季谢和拉兹古利亚耶夫卡方向实施其主要突击。

我们不断地对集结的敌步兵和坦克进行火炮急袭射击。

同时，我们决定让装备齐全的坦克第23军和A·B·叶尔莫尔金上校的步兵第112师和各部队迎击敌人的这次突击。除此之外，E·H·斯梅霍特沃罗夫少将的步兵第193师正向我们靠近，我打算用该师的兵力加强坦克军和防御正面。

我们很担心马马耶夫岗的形势，坚守在山岗顶部的是戈里什内师的部队。岗的南坡和西坡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只要再向前推进100米，就可以拿到这把打开城市和工人住宅区防御的“战术钥匙”。为了不让敌人得逞，为了破坏敌人这一有计划的进攻准备，我们决定再次实施反冲击。

我们准备不动用全部兵力，而只用部分兵力，不是在整个正面，而是只用数个强击队实施反冲击。军队的基本兵力留在预先准备好的各个阵地，以便反击来自戈罗季谢方向的敌人的进攻。

9月26日19时40分下达了反冲击命令，而在一天以前，已向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

大家都知道、感觉到、并亲眼看到敌人正准备着新的积极行动。因此，

错过发动进攻的机会就等于自我毁灭。第 62 集团军在伏尔河右岸所占领的地域已非常狭窄，没有地方可以退却了。

我红军战士和部队的指挥员们都深刻地、正确地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所面临的严峻而紧张的形势。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可看到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弹药和给养要用人力从船上卸下，并从码头分别送往各发射阵地和前沿堑壕中去。这是极为繁重而艰苦的力气活。在一个星期以前，各部队还常常要我们提醒：弹药来了，要尽快去领取。而现在，用不着提醒和召唤了。夜幕刚降临，验收人员和搬运人员几乎倾巢而出来到码头上。小艇一靠岸，很快就被卸空了。各种物资迅速被运往前沿阵地。

应该指出，在完成从左岸向右岸集团军各部队运送物资的艰巨任务中，海军少将 C·C·罗加乔夫指挥的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每一次横渡伏尔加河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无论是汽艇还是轮船，在载货时都没有在对岸耽搁时间，总是及时把物资运来。

对于区舰队水兵们的作用和功勋，我用一句来概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很可能，第 62 集团军会因弹尽粮绝而全军复没，更谈不上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我们的步兵、炮兵、坦克兵和水兵们——所有的城市保卫者，都已做好反击敌人向工厂及工人住宅区突击的准备。9 月 27 日清晨 6 日，我们开始反冲击。

当日，第 64 集团军也在库波罗斯诺耶地域转入进攻。

在最初阶段，我们的战绩不错，但是到了上午 8 时，我战队队形遭到几百架敌俯冲轰炸机的猛烈袭击。实施反冲击的分队只得卧倒隐蔽起来。

10 时 30 分，敌人转入进攻。其进攻部队是新锐轻步兵第 100 师、补充步兵第 389 师以及坦克第 24 师。其目标是红十月镇和马马耶夫岗。

德军飞机对我从最前沿直到伏尔加河的整个战斗队形进行狂轰滥炸。戈里什内师在马马耶夫岗顶部设立的支撑点被敌人的炸弹和炮火夷为平地。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也一直处在敌航空兵火力攻击之下。位于附近的一些油槽燃烧了起来。从戈罗季谢地域进攻的敌坦克，不顾一切地闯过地雷场。敌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潮水般地向前蠕动。接近中午时分，我指挥所与各部队的电话通信变得很不稳定了，无线电台也坏了……

由于集团军不能与各部队保持稳定的联系，虽然指挥所距前沿最多不过两公里，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知道前线的情况。为了对战斗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我们不得不一再把指挥所的位置向前沿挪动。

我们分头带上部队的联络军官亲临火线：古罗夫到坦克兵团的前沿；我到巴秋克师；克雷洛夫到戈里什内师的指挥所。

但是，即使我们亲临部队前沿，还是不能搞清楚整个的战斗情况，因为浓烟密布战场，无法进行观察。晚上，我们返回指挥所时，发现集团军司令部又损失了许多参谋人员。

直到深夜，我们才搞清情况。局面非常严重：敌人已通过地雷场，闯过了我前进战斗队形。虽然损失不小，但仍在某些地段向东推进了 2—3 公里。

“再有一次这样的战斗，我们会落到伏尔加河里了”，我这样想着。

坦克军和承担主要突击的叶尔莫尔金师的右翼遭受巨大损失。在 27 日日终前，他们用剩余的兵力在梅切特卡河大桥、巴里卡德镇以西 2.5 公里

处、巴里卡德镇西南部、红十月镇西郊、直到班内峡谷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德军则占领了沙赫京斯基大街、热尔杰夫斯基大街和 107.5 高地。

戈里什内师被迫撤离马马耶夫岗顶部，师里剩余的战斗分队占领着马马耶夫岗的东北斜坡。

在集团军前线的其它地段，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敌人被打死不下 2000 人，损失坦克 50 多辆。我们也同样遭受惨重损失，尤其是坦克兵团的各部队和戈里什内师的各兵团。

这天夜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求各兵团和各部队的所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寸步不离前沿阵地、掩体和堑壕，把各分队编成战斗队形，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上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掩体内、在前沿阵地与士兵交谈的作用和意义，难道还用说吗？以我的亲身经验，我知道，当你在掩体内同战士促膝谈心，分担他们的痛苦，分享他们的喜悦；或抽上一支烟。一起分析战局；或出出主意，该怎么样打仗；那就是一定会在战士中树立起这样的信心：“既然将军也在这里，那么说，应该坚守下去！”这样，战士没有命令绝不会退却，他们将与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口气。

重要的是，要让所有军人都知道，他们的任何功绩都不会被埋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深信，任何任务他们都会完成。当然，师长也没有必要老是蹲在第一线的掩体里，因为他的位置应该在指挥所里，他应该从那里领导整个战斗进程。但作为上级指挥员，在预见到战况极为危急时，不应该远离前沿，而应该尽可能地靠近自己的战士。这样，战士们不但不会抱怨你，相反，他们会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你，他们会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要求所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包括集团军司令部，都到前线去。要向战士们讲清楚：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坚持到底。

9 月 27 日夜，E·H·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的步兵师

有两个团渡河来到我右岸。我立刻前派他们去参加争夺红十月镇西郊的战斗。戈里什内师步兵团的残部，在巴秋克夫师的支援下，对马马耶夫岗组织反冲击。集团军炮兵司令员受命用火炮和迫击炮通宵射击马马耶夫岗，不让敌人在岗上设防固守。

9 月 28 日清晨，敌人出动步兵和坦克发起疯狂的攻击。敌机更是不间断地对我军的战斗队形、各个渡口和集团军指挥所实施密集的突击。敌机不仅投炸弹，还扔下金属块、犁、拖拉机轮子、耙子、空铁桶等。这些东西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和嘈杂声，从空中呼啸而下，落在我们战士的头上。

我们就此向全体战士说明，敌人把随手能拿到的金属物体当炸弹投下来，正好说明他们弹药不足。他们想用这个方法吓唬人，其实是办不到的。

在伏尔加河上搞运输的 6 艘货船已损失了 5 艘，只剩了 1 艘可以使用。油槽的熊熊火焰一直燃烧到军事委员会的掩蔽部。指挥所和集团军与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由于烟熏和闷热，都喘不过气来。敌俯冲飞机的每一次袭击，都使我们的电台和人员受到损失。

甚至在排水管道里工作的炊事员格林卡（他把厨房设在排水管道里）也被炸伤。

尽管形势对我十分不利，但我们还是感到敌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他们

的进攻已很不协调，已不象从前那样有组织、互相密切协同。配合坦克进攻的步兵营是从各个地段抽来的，信心不足。这使我们可以用密集火力分段击退敌人的突击，然后转入反冲击。因此，我请求空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T·T·赫留金将军给予援助，他答应尽其所有支援我。

在我军飞机对敌人进行猛烈袭击时，戈里什内师的一个团和巴秋克师的两个营组织了反冲击。他们果敢地进行猛攻，一举占领了马马耶夫岗上的三角点。但是没能攻上最顶峰、接近压力水箱。顶峰仍然不属于任何人，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在不停地轰击顶峰。

在9月28日一天的战斗中，我们基本上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德军没能扩大进攻并向前推进。他们没能战胜宁死也不离开阵地的顽强的红军战士。这一天之内，法西斯损失了不下1500人，烧毁了30多辆坦克，仅在马马耶夫岗斜坡上，就丢下了近500具尸体。

我方的损失也同样惨重。坦克军共伤亡626人，巴秋克师伤亡将近300人。戈里什内师的人员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们仍在坚持战斗。

由于伏尔加河上的浮动器材遭到损失，部队渡河和运送弹药都很困难。河的右岸聚集了许多伤员，他们没能在夜间被送过伏尔加河。就在这时，侦察员报告，敌人的精锐的步兵和坦克部队正从戈罗季谢方向开来。他们已接近红十月镇。

争夺工厂和工人住宅区的战斗刚刚打响。

我们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工程障碍器材，转入顽强的防御。9月28日19时30分下达了第171号命令。命令中指出了各部队必须坚守的地区。命令中还写到：

“各部队指挥员要用最快的速度进行工程作业，以加固自己的阵地；要在前沿和纵深构筑防坦克、防步兵障碍物，并改造一些建筑物，使之适合于巷战；要利用身边所有的器材来构筑障碍和障碍物，甚至拆毁一些房屋和电车轨道；要通过地方政府把居民组织起来一起干。

主要工作要由自己的部队来干。要昼夜不停地进行工作。

要向全体军人说明：集团军现在是在最后的地界上战斗。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每个战士和指挥员的职责就是坚守在自己的掩体内、在自己的阵地上，一步也不许后退！无论如何要把敌人消灭！”

读者会问：敌人每天往城市投掷数千枚炸弹、数万枚迫击炮弹和炮弹，怎么会有地方政府和居民呢？而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和厂区的数千居民在尽一切可能帮助第62集团军。

比如，10月14日以前，在拖拉机厂里，工人们一直在帮助我们的坦克手修复被打坏的坦克；在“街垒”工厂里，工人和炮手们一起修理火炮。

一部分工人参加了本厂的护厂队。城市的和各地区的党委不但存在而且还在积极地工作。他们帮助集团军的党组织和指挥员在市里和工厂住宅区内建立支撑点。

我不能不回忆起市委书记A·C·丘亚诺夫同志、A·A·皮克辛同志以及A·A·弗多温同志。区委的几位领导人与集团军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居民们、工人们、党组织和市里的共产党员们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作战，一起经受烟熏火烤，并肩保卫着这个城市。

难道我们今天可以忘记已故的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坦克工业的人民委员B·A·马雷舍夫吗？是他在斯大林格勒战

斗最紧张的日子里，在拖拉机厂完成了党和政府的委托！

我们没有象报道英雄那样去报道、描写他们，但是我们经常以崇敬的心情回忆起他们的英雄业绩。这样的业绩，他们每天都在默默无闻地、坚持不懈地去做。而他们从没想过什么功名，只有至死忠于自己的人民和亲爱的共产党的苏维埃人民才能够建立这种功勋，才具备这种谦虚的品质。

党组织和政治部门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我们防御的灵魂。

我不能有一再强调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它首先是一个党领导的战斗集体，是按这样一个原则工作的集体：为了战胜敌人，维护祖国的荣誉，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我们团结一致，一直战斗在一起，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意见分歧。

对斗争目的的深刻理解、党性和战斗的友谊，使我们团结成一个战斗整体。我们不能不回忆起以下的一些政治工作干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旅级政委 A·B·瓦西里耶夫、负责共青团的副主任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政治监察员伊万·斯塔里洛夫、伊万·潘琴科、阿列克赛·斯图波夫、师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B·B·瓦维洛夫、E·E·切尔内绍夫、B·C·特卡琴科、T·M·奥夫恰连科、B·A·谢罗夫和 B·A·格列科夫等。他们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和街垒战的特殊性，把党政工作的中心从营团转移到连队和强击队。他们善于给下级的党、团组织指明：如何去巩固指挥员的威信；如何去完成战斗任务；如何去寻求最有利的战斗形式和方法；如何使每一个战士都树立必胜的信心。而所有这一切正是指挥员在解决战斗任务时所依靠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基础。正是基层的党团组织激发了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群众性和英雄主义精神，并使这种精神日益增强。正是这种群众性的英雄主义精神使恐慌和胆怯无以存身。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集团军的全体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坚定顽强，在几乎绝望的、险恶的处境中仍然取得了胜利。

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党性的基础上、在战斗中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更增强了全体战士们的必胜的信念。

战士们在掩体里看到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就在身旁，因此他们感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仍在伏尔加河右岸，仍然与他们在一起。

尽管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党和团的组织仍在发展着并锤炼得更加坚强。几十名、几百名战士在火线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每个人都渴望参加战斗，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那样也英勇献身。

我曾讲过雅科夫·帕夫洛夫中士的英勇事迹。他带领着很少几个勇士，坚守在市中心罗季姆采夫师防线右翼的一座楼房里，几乎 50 多天没有睡觉和休息。法西斯分子的炸弹和炮弹象雨点似地落到这座楼房上，但都没能打垮这几个勇士们的坚强意志。“巴甫洛夫楼”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保卫这座楼房的是极普通的苏联人，是祖国各族人民的忠诚儿子。他们有：俄罗斯人——巴甫洛夫（后来成为苏联英雄）、亚历山德罗夫和阿法纳西耶夫；乌克兰人——萨布盖达和格卢先科；格鲁吉亚人——莫西阿什维利和斯捷帕纳什维利；乌兹别克人——图尔古诺夫；哥萨克人——穆尔扎耶夫；阿布哈兹人——苏克巴；塔吉克人——图尔德耶夫；鞑靼人——拉马扎诺夫等。

还可以举出许多苏联人舍身忘死、忠于祖国的例子。在“红十月”工厂和“街垒”工厂之间，有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向西延伸的冲沟，沟里长年堆满了炉灰渣。敌人正是选定这条冲沟来突破我军防御。彼得·扎伊采夫中尉奉命率领机枪排守住这个地区。他们的任务是：不让敌人从这里逼近伏尔

加河。白天，这个地区的敌人火力很强，使人连头都抬不起来。敌人对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掩体、每一寸土地都进行扫射。扎伊采夫在夜里带领自己的排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这里，机枪手悄悄地占领了发射阵地。机关枪的位置安排得很巧妙，可对眼前所有的地方实施短距斜射。

早晨，敌人先用火炮和迫击炮对冲沟实施密集射击，接着便开始进攻。我机枪手用准确的点射回敬敌人。由于不停地射击，机枪套筒里的冷水都沸腾了。忽然，一挺机关枪哑了，机枪手倒下了。排里的党小组长、列兵叶梅利扬诺夫马上代替了这个射手，机枪又响了。一会儿，排长也倒在机枪旁。敌人仍在继续向前猛扑。扎伊采夫中尉受了致命的伤，头垂在机枪上。中士卡拉肖夫挺身而出，代替排长指挥战斗。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法西斯分子一直没能冲破我们的防线，没有摧毁我勇敢的机枪手们的战斗意志。敌人为了从防线冲向伏尔加河花费了很大代价：400 多具德国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丢在冲沟里。

海军陆战营的战士、共青团员米哈伊尔·帕尼卡赫在同一个厂区的战斗中建立了光荣的功勋。

事情是这样的：

法西斯的坦克向海军陆战营的阵地猛冲过来，几辆坦克向水兵米哈伊尔·帕尼卡赫藏身的掩体压了过来。它们一边行进，一边用机枪和火炮猛烈射击着。

通过枪炮声，可以清楚地听到坦克履带的隆隆声。敌坦克愈来愈近了。这时，帕尼卡赫的手榴弹已经打完了，手边只剩下两个燃烧瓶。他从掩体里探出头来，举起燃烧瓶，对准开近的坦克正要掷出，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射中了他举在头上的瓶子，大火立刻燃遍了他的全身。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又抓起第二个燃烧瓶。这时，坦克已经到了他身边。大家都看到，这个浑身着火的人是怎样从掩体里跳出来，直奔到法西斯坦克的旁边，把燃烧瓶投向坦克发动机部位的格栅里。刹时间，大火和浓烟吞没了我们的英雄和敌人的坦克。

米哈伊尔·帕尼卡赫的这一英雄主义功勋，很快就在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里广为传颂。

2

敌人占领了车站和码头之后，集团军的部队和斯大林格勒的市中心区被截面两段。集团军部队的主力被隔在察里察河以北。

与此同时，保卢斯以两个步兵师和 150 辆坦克的兵力向马马耶夫岗北面的红十月镇发起了突击。这次突击遭到我步兵第 95 师、第 284 师和坦克第 137 旅的反突击。我们还及时地把刚到达的 E·H·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 193 师投入战斗，用以加强这个方向的力量。这个师原来是第二梯队，配备在维什涅瓦亚山谷的红十月镇西郊一线。

9 月 26 日、27 和 28 日，在集团军整个防御正面上，都

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很难说清楚，哪些街道或者哪些街区曾有多少次互为易手。

在这几天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达到了更高境界。战士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宁死也不后退一步，“在伏尔加河右岸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已成为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誓言。每一个坦克手，每一个步兵，每一个炮手和每一个工兵都懂得：斯大林格勒的土

地哪怕是交出一米都是犯罪。当交战者双方只剩下几十米中间地带时，我们就进行近战。

甚至经常有这种情况，当敌机狂轰滥炸时，我们的战士与德国鬼子躲在同一个地下室里，坐等轰炸结束。敌机走后躲在同一地下室里的敌我双方又继续战斗起来。

这几天，在马马耶夫岗北部和争夺红十月镇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向前推进了不过 1—1.5 公里，但敌人始终没能冲到伏尔加河。至于战斗伤亡情况，不是每次都能统计出来的，因为战斗异常激烈，很难把数字搞清楚，即使有了，也常常是不准确的。

众所周知，与 7 月份相比，德军 9 月份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数量几乎增加到两倍，而武器装备更是增加了数倍。而这一切，就像是放进烧红的炒锅里的蜂蜡，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昼夜里，敌人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所有部队，在主要攻击方向上推进了不过几十米，有时只达到几百米。我们同样损失惨重。下面援引几个具体事实。

根据部队的报告，1942 年 9 月 28 日，敌人损失了 29 辆

坦克 1500 多个官兵。其中仅在马马耶夫岗的斜坡上就留下近 700 具德国人的尸体。

我们的坦克兵团在三天的战斗中伤亡 626 人。步兵第

284 师在 9 月 28 日一天战斗中死 39 人、伤 137 人，另有 127 人下落不明。

在集团军的右翼奥尔洛夫卡地域，9 月 28 日以前战斗不很激烈。敌人的进攻是局部的，投入战斗的部队也不多，战斗结束时，前线变动不过是无足轻重的 100—200 米。而我们在那里，除了个别几次反冲击外，没有实施、也不可能实施什么积极行动，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我军在那里作战的部队有：K·M·安德留先科上校的步兵第 115 旅、步兵第 149 旅和摩托化步兵第 2 旅的部队以及在前几次战斗中已严重削弱的步兵第 315 师、第 196 师和第 10 师的部队。他们防守着在战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奥尔洛夫卡凸出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坚守住这个凸出部。

这个凸出部直接威胁着在戈罗季谢地域集结的敌主要集团。如果友邻方面军的部队在北面进展顺利的话，这个凸出部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从北面进攻的部队，哪怕只是出动一部分兵力，冲过来 10—20 公里，与奥尔洛夫卡凸出部的部队会师，那么，前出到伏尔加河边拉塔尚卡地区的敌人的一支大部队就会被截断，而敌主要集团的左翼就会被包抄。

保卢斯也预见到这种危险，于是他组织兵力向凸出部发起进攻。为了尽快地消灭我在奥尔洛夫卡地域的部队，他迅速把坦克第 16 师和步兵第 389 师的几个团以及“什塔赫利”

集群投入战斗。

9 月 30 日 13 时，敌人开始进攻。他们的主要力量直指我在奥尔洛夫卡地域设防的步兵第 315 师、摩托化步兵第 115 旅和第 2 旅。这次，敌人在进攻之前先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安德留先科旅的第 1、第 2 营伤亡很大。但仍然坚守在奥尔洛夫卡镇的北部和南部。敌人的钳形攻势很快就要在奥尔洛夫卡以东会合。这样，敌人就打通了一条沿奥尔洛夫卡通向拖拉机工厂和斯帕尔达诺夫卡的通路。

方面军 首长问我：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坚守奥尔洛夫卡凸出部？准备

用什么来支援在那里作战的部队？

9 月底，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名为顿河方面军，而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辖第 62、第 64、第 57 和 51 集团军。

我能回答什么呢？最好的支援无疑是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从北面向攻击奥尔洛夫卡的敌坦克第 16 师和兵第 389 师的后方实施突击。但是，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集团军没有预备队。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处于敌人强大攻击的威胁之下时，我们显然不能给在奥尔洛夫卡凸出部作战的部队以实际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以一个防坦克歼击团和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第 124 旅的两个连去加强步兵第 115 旅的第 1 和第 2 营。

经过几次苦战之后，坦克军事实上已丧失了战斗力。全军只剩下 17 辆被打坏的坦克和 150 名战士。这些战士被编入到步兵部队，司令部则被调整回伏尔加河左岸去重新组建新部队。

当天，我们的情报证实，敌人的大批步兵和坦克正在维什涅瓦亚山谷、红十月镇的公墓一带以及多尔吉冲沟和克鲁多冲沟集结。与此同时，已经补充的敌坦克第 14 师和步兵第 94 师和部队正从城市的南郊开过来。敌人的意图很清楚，他们准备对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实施新的攻击。

9 月 30 日夜，近卫步兵第 39 师开始从伏尔加河左岸渡

河。该师的各团只补充了一半，每个连仅有 40——50 人。这个师在 9 月 18 日—20 日期间，曾在近卫第 1 集团军序列里参加了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多次战斗，在向库兹米奇村实施的进攻战斗中，部队受到重大伤亡。但是部队的基本战斗力没有被摧毁，其主要成份是空降兵，且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师长斯捷潘·萨韦利耶维奇·古里耶夫少将从战争一开始就来到前线，他是个精力充沛、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人。他个子不高，但很敦实，正如大家所说的，推动他一下并非易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给我留下这种印象。“大概，他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十分严格”，我当时这么想着，而很快就确信了这一点。是的，近卫步兵第 39 师多日来一直坚守在“红十月”工厂，这个师的战士从不知道什么叫后退。古里耶夫也从不离开自己的指挥观察所，甚至在德军自动手枪的榴弹打在观察所门口的时候，他也不愿离开。这种情形不只出现过一次。师长做出了榜样，团长们也都是身先士卒，在战斗中表现得勇敢顽强。

该师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在危险的时候总是站在大家的前面。政委，后来是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师长 E·E·车尔尼雪夫，在领导各部队的政治部门的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直接在前线度过的。我记得，他腿部受伤以后，仍坚持不下火线。我仿佛现在还看见，他手拄拐杖，站在正在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火炮旁，指挥炮兵连作战。

该师到达城市的当天，我就决定把各团部署在西利卡特工厂（在右面）祖耶夫斯基大街（在左面）的防线上，并准备向巴里卡德镇实施反冲击。但在 10 月 1 日的战斗过程中，我被迫改变了这个决定，因为在斯梅霍特沃罗夫师的地段上，敌人已深深地楔入我们的战斗队形，并严重地威胁“红十月”工厂。当日，古里耶夫将军的近卫师作为第二梯队被摆放在斯梅霍特沃罗夫师的后面。古里耶夫接到命令，他们师的任务是：在“红十月”工厂的各个

车间里构筑工事固守，把各个车间都变成很有威力的火力支撑点。

N·H·古尔季耶夫校的步兵第 308 师被派来参加对巴里卡德镇实施反冲击的战斗。该师各团已到达伏尔加河左岸下准备渡河到我们这边来。

步兵第 308 师在城市里作战的时间比其他部队短，但其击退敌人进攻的次数以及战斗的顽强性，并不亚于 62 集团军的其他兵团，在工厂区最残酷的战斗中，该师在法西斯军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击退敌人和坦克的攻击不下 100 次。

该师师长古尔季耶夫上校、各团团长、整个部队的党组织和全体战士（基本上都是西伯利亚人）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顽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任务：一步也不能后退，要奋不顾身的去完成它。

第 308 师军人的群众英雄主义是古尔季耶夫师长本人无比勇敢所带来的成果。的确，战士们在反冲击中或者在第一线的掩体里经常看到他。他个头很高，身材匀称，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从不低头屈服，是个铮铮铁汉。（这位英雄的指挥员，当上了将军以后，象所有勇敢的人那样，英勇地牺牲了。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的 1943 年，在奥廖尔地区。人们为了纪念他在那里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10 月 1 日，侵略者在集团军的整个前线发动了几次顽强的进攻。在奥尔洛夫卡地域，敌人的钳形攻势会合了。安德留先科步兵旅的第 3 营、摩托化步兵第 2 旅的一些小分队和步兵第 315 营陷入合围。

经过重新补充的步兵第 115 旅的第 1 营和第 2 营，在奥

尔洛夫卡以东设防固守，准备迎击四面来的敌人。我们给他们加强了两个连的生力军和一个防坦克歼击炮兵团，交给他们的任务是：进攻奥尔洛夫卡，与被切断的部队会合。

被合围在奥尔洛夫卡西面的部队，人数近 500 人。他们从 10 月 2 日至 10 月 7 日与敌人的优势兵力拼死血战。10 月 7 日夜，部队已弹尽粮绝，他们以成功的夜袭冲出合围圈，突向拖拉机厂的工人住宅区北面、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对岸。生存下来的仅有 220 人。

冲出合围圈的同志们，讲述了他们与集团军主力部队失掉联系后，怎样在饥渴难忍、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与敌人苦战了六天之久，被围部队的处境变得恶化还因为，安德留先科旅的第 1 营和第 2 营，在 10 月 2 日实施的反冲击一开始就严重受挫，使敌人得以从北面发起突击，在奥尔洛夫卡以东组成了第二个合围圈。这两个营和萨拉耶夫师的步兵第 282 团一部分陷入了这个合围圈。经过两天（10 月 4 日至 5 日）的战斗，他们按照旅长安德留先科的命令，利用夜间发起突击，于 10 月 6 日凌晨突围成功，撤到拖拉机厂北部。

保卢斯想用一次打击解决奥尔洛夫卡凸出部的企图未能得逞，法西斯分子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争夺奥尔洛夫卡的战斗中，我们以少量兵力，把敌坦克第 16 师的近 100 辆坦克、步兵第 389 师的几个团和“什塔赫利”集群牵制在这个地段上达 10 天之久。

我很难说清，哪个师、哪个旅、甚至哪个团消灭了多少敌人。因为集团军的整个防御正面都在进行着战斗，尤其是马马耶夫岗以北的战斗尤为残酷。

军事委员会分析了集团军整个前线的战斗情况后，认为，敌人下一次的猛烈突击将指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街垒”工厂和“红十月”工厂。

敌人正从斯大林格勒南郊向这个方向大量调集兵力。

虽然，从维什涅瓦亚山谷至伏尔加河河岸的距离仅 4—5 公里，我们还是设法使防御阵地成纵深梯次配置。我们把 10 月 3 日来到集团军的、B·I·若卢杰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37 师作为第二梯队。

除此之外，我们还把许多武器交给由这几个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工厂支队，并加强他们与军队的联系和协同动作。支队的工人在以前一直在工厂里修复被打坏和损坏的武器、火炮和坦克。现在他们不得不放下工具，拿起武器与第 62 集团军的战士们一起积极地保卫自己的工厂和车间。

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被送回伏尔加河左岸的预备队里。

在集团军中心地带——巴里卡德镇和红十月镇地域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古尔季耶夫向巴里卡德镇发起的反攻击，由于遭到敌人的反扑而在 10 月 2 日下午停止了。日终之前，该师终于还是占领了西里卡特工厂的一部分，并占领了巴里卡德镇的西北郊。但没能继续发展进攻。

斯梅霍特沃罗夫师与沿比布里奥捷奇内大街和卡鲁谢利内大街进攻的敌步兵和坦克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战斗。战斗十分激烈，甚至发展到白刃格斗，侵略者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才在日终前出到采霍夫斯基大街和比布列伊斯基大街。

同一天，在巴秋克师和罗季姆采夫师的接合部，希特勒匪徒的一个营，换上红军军装，冲过我战斗队形，扑向克鲁多冲沟，并迅速地向伏尔加河推进。可是，敌人狡诈的手段并没有得逞。这帮恶棍被巴秋克师的几个预备连的反冲击彻底消灭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集团军指挥所离油槽不远，并且几乎是在露天的高大的重油库的下方。10 月 2 日，法西斯匪帮可能已搞清了我指挥所的位置，就开始对它进行猛烈的炮击和轰炸。爆破弹把整个河岸炸行不成样子，炸坏了装满石油的槽，燃烧着的炽烈的液体大量地涌了出来，经过我们的掩蔽部流向伏尔加河。指挥所淹没在火海里。

燃烧着的石油流到岸边后，又扑向驳船和被河水冲到岸边的许多圆木上。火流卷着驳船和圆木顺流而下。刹那间，好象整个伏加河突然燃烧起来，火焰幸灾乐祸地在湍流中猛烈飞腾着。

通信线路被烧毁，只能靠无线电联络，但无线电联络也常常中断。我们被火势四面围住，几乎成了火神的俘虏。

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下达命令：

“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家要继续在未被损坏的掩蔽部里坚持工作！……恢复同各部队的通讯联系，并且保持无线电畅通！”

然后，他走近我，小声地问道：

“怎么样，我们坚持得住吗？”

我回答他：

“挺得住！”并利用他说过的话表示决心：“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擦干净自己的手枪。”

“好，就为样！”他说。

坦率地讲，在刚着火时，我跳出掩蔽部，只觉得火光刺目，两眼发花，的确有些慌张失措，但是 H·A·克雷洛夫将军向大家高声发布命令，其中也包括向我，就象进攻时高喊《乌拉》一样，成为鼓舞我们战斗的力量。就这样，我们在大火的包围中坚守在岗位上，一直没间断对部队的指挥。

大火燃烧了几个昼夜，而我们没有预备指挥所。由于所有部队，包括工兵部队，都已投入战斗，没有可能构筑。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坚持在几个完好无损的掩蔽部、掩壕和射击坑里。

我和克雷洛夫将军时常被方面军参谋长 I·O·扎哈罗夫紧急叫到无线电台旁。他要求我们准确地报告前线的形势。但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就连师的司令部门也常常不能准确地掌握前线的形势。这是因为通信联络时断时续，通讯器材故障频仍。

我们通过无线电台用密语通话，但当头顶上弹雨横飞的时候，事情并不那么轻松和容易。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话务员为了保持无线电通话，手持送话器，牺牲在岗位上。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方面军司令部常常这样询问我们。

我们认为，这是方面军司令部的首长想确信：我们是否还活着，是否还在城里指挥部队。

我和克雷洛夫总是不约而同地回答：

“哪里炮火最激烈，我们就在哪里。”

3

10月3日黎明，敌人开始发动新的进攻。

古尔季耶夫师在18时以前扼阻了敌人进攻。但是，日终时，德军从两翼包围过来，该师只得向尼日涅乌金斯基大街以南撤退，退到铁路另一边。把左翼摆在温尼茨基大街。该师的一位团长马尔克洛夫少校在战斗中负了重伤。

斯梅霍特沃罗夫师一整天都在与敌人争夺公共澡堂和炊具厂。公共澡堂曾易手好几次，但最终仍在我们手中。该师各团不过200—250个战斗员。

在公共澡堂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个叫格纳的5岁小男孩。他是从废墟中爬出来，奇怪的是，一点也没有受伤。I·A·维特科夫上校把他看作儿子一样收养了下来。我们大家也同样喜爱这个男孩子。他认识集团司令部所有的军官和将军，并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子和父名。他跟着维特科夫上校一直到了柏林。如今根纳季——那个小男孩，已是个工程师，在乌克兰工作。

古里耶夫师击退了德国人对“红十月”工厂的所有进攻。戈里什内师、巴秋克师和罗季姆采夫师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抗击敌人在集团军左翼发动的数次进攻。

战斗进程表明，敌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冲到伏加河，占领主要工厂之后，从那里沿伏尔加河向南发展攻势。在这段时间里，敌人不断向这个方向上投入新的兵力。10月4日前，我们查明，从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到107.5高地，在大约5公里的正面上，敌人就集中了5个师的（3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此外还有许多加强部队。德军还从苏德战场的其它地段和从德国本土调来大约40个工兵营。德军在奥尔洛夫卡地域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那个凸出部，而且还企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便向各工厂实施主要突击。面临这种局势，我们决定派若卢杰夫师去坚守拖拉机厂。

第37师各团占领防线之后，于5日晨立刻投入战斗，阻击已突破古尔季耶夫师和叶尔莫尔金师战斗队形的敌兵步兵和坦克。

集团军需要有喘息的时间，哪怕是一天也好，需要整顿队伍、集结火炮、供给弹药、补充人员，以便下一步用局部反攻击把侵略者从拖拉机厂住宅区和巴里卡德镇驱逐出去。方面军司令员要求我们在10月5日清晨开始

反攻击。但集团军根本无法做到这点。因为我们这里弹药告竭，而通过伏尔加河运送弹药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0月3日夜，C·H·别雷上校的坦克第84旅开始渡河到右岸。但是，只有轻型坦克才能渡河。这些轻型坦克来到右岸后，立即被编入若卢杰夫师和古尔季耶夫师的战斗队形之中。它们被用来作火力点，因为用它们进行反冲击，去迎击德国人的坦克，是不理智的。

10月5日，敌人仅在城市工厂区上空就出动了近2000架次飞机。从天亮起，部队的行动都停止了。受伤的战士在天黑之前无法离开避弹壕和掩体，只能是在黑暗来到之后，才向伏尔加河岸边的伤兵后送站慢慢地爬去。

晚上，军事委员会委员古罗夫从伏尔加河左岸回来了。

他在左岸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他知道我也有一个多月没洗澡了，就劝我去一趟伏尔加河左岸。这个建议诱惑力很大。可我还是拒绝了。否则，集团军的战士们，看到自己的指挥员在如此严重的时刻竟然渡河去左岸，他们作何感想呢？

这天晚上，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他来到之前，指挥所的混乱状况已稍微平静下来。尽管在我们的掩蔽部上方的重油池还在冒烟，但火已经熄灭了。通讯联络状况愈来愈糟糕，由于敌人的轰炸和炮击，始终无法改善。显然，法西斯的火炮手和迫击炮手已经知道我们的指挥所的准确位置，一直对它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一发发迫击炮弹在我的掩蔽部入口处爆炸。指挥所人员的伤亡数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显而易见，这里已经不能作为指挥所了。E·A·戈利科夫来到我们这里约一昼夜，看到此种情况后，建议我们转移指挥所。

可是，转到那里去呢？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萨拉耶夫师司令部里，该师已去左岸重新整编。我们需要沿伏尔加河岸向拖拉机厂方向移动约500米。

转移是夜里进行的。戈利科夫随我和古罗夫第一批离开。

集团军参谋长H·A·克雷洛夫在天亮以前要坚守在原地，直到新指挥所与部队恢复联络为止。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人人都疲惫不堪。所以，一到新指挥所，我就感到精疲力竭，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请求E·A·戈利科夫和H·A·古罗夫关注下恢复通讯联络的情况，然后就倒在地板上，像死人一样地睡着了。

天亮时，我醒过来，我得知克雷洛夫仍然冒着敌人的轰炸和射击，留在老指挥所里。这里的通讯联络已畅通，因此，我建议克雷洛夫立刻转移到较安全的新指挥所来。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来了，一身灰尘，面色苍白，倦容满面，走进掩蔽部，一下子倒在地上，就熟睡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都为这个小小的重逢感到高兴。

这几天，军事委员会紧张地工作着。我们甚至察觉不到白天和黑夜的交替，黑夜与白天的区别对我们已毫无意义。我们不停地工作着，只是在战斗稍平息的时候，才利用短暂的时间，相互替换睡一会儿。

我们知道，集团军还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得到的情报说，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军正在纠集新的更强大的兵力，准备突击斯大林格勒。为了阻挠敌人集结兵力、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不断地向敌人发起小规模的反突击，特别是使用炮兵和航空兵的力量。参加航空兵突击不仅有集团军和方面军的航空兵部队。甚至还有最高统帅部的航空兵力量。我们每天都要

回答上头的询问：轰炸哪里？需要莫斯科的航空部队轰炸哪些目标？从 10 月 6 日早晨起，德国人继续加强进攻。他们从巴里卡德镇向拖拉机厂住宅区实施主要突击。大概他们没有料到若卢杰夫将军的近卫第 37 师会突然出现有他们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战斗异常激烈。

对于 B·I·若卢杰夫将军的第 37 师的到来，我不能不说上几句。这是一支真正的近卫军，所有的战士都很年轻，个个身强力壮，高大魁梧。其中许多人身穿空降兵的制服。他们冲进楼房和地下室后，往往拔出匕首和芬兰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退却，即使被合围，也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面对死亡，他们高呼：“为了祖国！”“永不退却，永不投降！”

仅在这一天内，敌人就出动 700 架次飞机攻击该师的战斗队形。尽管如此，法西斯匪徒仍然没能前进一步。

夜里，坦克第 84 旅派出数个小分队来到若卢杰夫和古尔季耶夫师的地段上。此时，集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趁夜隐蔽在战壕里，并建立起支撑点和设置好障碍物。

看来，方面军司令部认为我们的几次顺利的反冲击已经消耗了敌人的力量。因此，坚决要求我们集团军用第 37 师的兵力再次发起反冲击。而我认为，敌机的轰炸正是进攻的前奏。我们的意见与方面军首长发生分歧。整整一天我们同方面军首长进行着争论。到了晚上，在强大的压力下，我不同意只用若卢杰夫和古尔季耶夫的部分部队实施反冲击。我们决定，10 月 7 日下午开始反冲击，因为我们盘算着，天黑之前，敌人将没有时间反击，而且他们的飞机也不可能参加。

凌晨 4 时，我签署了实施反冲击的命令。但我们来不及执行这个命令了。因为 11 时 20 分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遭遇到进攻者有组织的火力攻击，他们从早已准备好、并且掩蔽得十分巧妙的阵地上向我们攻击。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挺直身子向前冲锋。他们用两个步兵师的兵力攻击拖拉机厂住宅区的我军工事，还有 50 多辆坦克的火力支援。第一轮的攻击被击退。若卢杰夫师的部队使法西斯匪徒遭到重大伤亡。敌人把预备队调来之后，又反复发动几次冲击。日终前，敌人楔入我战斗队形，占领了拖拉机厂工人住宅区的一条街道，并且紧接着向体育场逼近。斯塔哈诺夫采夫大街和斯库利普图尔公园还在我们手里。

18 时，敌人的一个步兵加强营在横跨梅切特卡的铁路大桥以西转入进攻。我们用“卡秋莎”猛烈轰击他们，几乎全歼这个营。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我们歼敌近 4 个步兵营，击毁 16 辆坦克。

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之后，敌人已无力在第二天继续发动进攻。近卫第 37 师在主要突击方向的出现，粉碎了法西斯的计划。他们没能组织起突然的攻击来冲破我防线。

10 月 8 日，敌人开始准备新的战斗。我们得知，希特勒向自己的仆从夸下大口，说要在近几天内拿下伏尔加河上的堡垒——斯大林格勒。德国士兵从掩体里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你们快要咕嘟咕嘟地灌饱伏尔加河的水啦！”

德军飞机开始向城市撒传单。侵略者在传单上威吓说：“希特勒将把每一个逃回伏尔加河左岸，不愿投降当俘虏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都看做是逃兵”。传单上印着我集团军被坦克和大炮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图片。

戈培尔宣传家们的宣传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们的党团组织不断地在部队和分队做工作，揭穿敌人宣传的挑拨意图。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给优秀战士和指挥员授奖，多次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通过他们把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誓死守卫斯大林格勒。传达到所有部队中去。

所有部队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这个决定。

下面是一份一个共青团组织的战斗生活的文件：

“听课内容：关于共青团员在战斗中的表现。

通过决议：宁肯死在战壕里，决不当可耻的逃兵。不但自己不逃跑，还要使身旁的人也不逃跑。

向报告人提问：是否存在离开射击阵地的正当理由？

回答：在所有的正当理由中，只有一个是可以被考虑的，那就是死。”

我记得，那天在一点钟，当这个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分子向古尔季耶夫的第 308 师的防御地带开始了这一天之内的第 12 次进攻。就在这时，象是做会议总结的一样，连长发言了。他是这样说的：

“我想澄清团小组长发言中的一个问题。他在这儿多次讲了关于死的问题，并且说，祖国要求我们为胜利而死。他显然表达得不够准确。祖国要求我们去夺取胜利，而不是去死。

是的，有些人将不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要不怎么能叫战争。而机智勇敢地去战斗，在战斗中献身，促使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这才是英雄。既能够战胜敌人，又能够保存自己的人，则是两次英雄！……”

当时，古里耶夫将军说：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战士叫阿列克赛·波波夫。德国鬼子悄悄地向他靠近时，他把轻机枪架在一边，把冲锋枪摆在另一边。自己手里拿着一杆步枪。周围摆满手榴弹。如果很多鬼子进攻，他就用机枪扫射；如果出现一个鬼子，作就用步枪射击；敌人爬近了，他就扔手榴弹。他就是这样以一当十地坚守在自己的掩体里。”我们近卫军战士的力量在于；他们作战机智、勇敢、充分发挥祖国交给他们手中的武器的效能。在那些日子里，数以千计的军人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勇果敢、有智有谋，并且出色地掌握各种武器。

我们集团军里很快就流行一首名为《献给守卫城市的英雄》的歌曲。它是 H·帕诺夫中士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朴实无华。近卫军战士们尤其喜爱其中的一段。它真切得就象生活本身一样：

爆炸声震颤着大街小巷，
马达声日夜不停地咆哮。
坚如磐石般的红军战士，
誓死保卫伏尔加河两岸。

同志临牺牲时说：

让敌人永远记住，
第 62 集团军从不后退，
哪怕是一步！

第 62 集团军的军人有这样一条法规：

绝不能后退，只能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把祖国的领土一米一米地夺回来。

我手头里存有几份当时曾在前沿阵地广为发行的战斗快报，由于时间久远，纸张已发黄。

其中有一份是这样写的：

“现在科兹洛夫正在英勇地战斗！

科兹洛夫·安德列·叶菲莫维奇是一个机关枪手，他是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卫国战争中，他一个人就歼灭了 50 个德国鬼子，这还不包括他的机枪班打死的。仅从 1942 年 10 月 7 日至今，科兹洛夫同志就打死了 17 个德国鬼子。科兹洛夫机枪班是全营最优秀的机枪班。科兹洛夫同志曾参加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哈尔科夫保卫战。他两次负伤。先后获得两枚奖章。大家要向科兹洛夫看齐！”

再看另一份快报：

“击毁和焚毁 7 辆德军坦克！

红军战士雅科夫·谢尔比纳和伊万·尼基京负了伤也不离开战场。祖国的忠诚儿子再没有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之前，一直坚持战斗。在不到半小时里，这两个勇敢的反坦克枪手就击毁了 7 辆德军坦克”。

类似这样的快报很多，文章都很短小。但却鲜明地、令人折服地报导了那些不怕牺牲去创造胜利的红军战士！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在伏尔加河上搞运输的优秀船夫和水兵们！

在那里工作的人。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面对着死亡。你想在敌人炮火下划船渡过伏尔加河，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无与伦比的勇敢是不行的。而我们的船夫们、我们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们，却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这样的航行，他们不断地给斯大林格勒运来弹药和食品。

正象上面提及的，在敌人准备用重兵进攻工厂区之前，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加强沿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维什涅瓦亚山谷、马马耶夫岗一线的防御。刚调到我集团军的坦克第 84 旅已布置在阵地上，以加强这个地域的防御。我们组织好该坦克旅与各步兵师的协同动作，从而使部队的战斗队形更加密。坦克军下属的几个旅，因失去战斗力已在伏尔加河左岸解散了。完好的坦克移交给了第 84 旅。

除了这些措施外，还命令各部队加快工程作业，牢牢地守住所占领的阵地。在受坦克威胁的方向上也都敷设了数千枚地雷和应用地雷，我们压缩了近卫第 37 师和步兵第 95 师的战斗队形，使之更为密集。还给他们加强了火炮。所有这一切强化措施都只能在夜间进行，并且是在敌人对我集团军整个战线不断地实施局部攻击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很清楚，敌人的行动想达到两个目的：对我集团军整个战线进行战斗侦察；牵制我机动力量于伏尔加河右岸窄小的、更准确地说是浅近的防御地带里。作为回答，我在集团军整个战线上派出数个强击队不断的对驻守在建筑物里的德军实施突击；狙击手们（我集团军内已拥有近 400 名狙击手）神出鬼没，打得德军士兵和军官龟缩在掩体里不敢抬头。就在这些措施的掩护下，我们抓紧时间重新部署兵力，加强工厂区域的防御。

最艰难的日子

1942 年 10 月 14 日，希特勒向德军部队下达命令：除了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个苏德战线上转入战略防御。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德军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这座城市实施一次新的、即第三次攻击。希特勒的战略家们企图通过这次攻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感觉到了这点，因为在这之前，即 10 月 13 日，我的侦察人员就已查明，仅在城市的工厂区当面，保卢斯就集结了 3 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这些部队在约 5 公里的正面展开队形，形成一个极为强大的撞击力。

“撞击就撞击吧，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在这之前，集团军司令员同志，您应该好好睡一觉。”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和我一起晚上检查完各部队的战备情况后，对我说。

他把我一直送到床前，我们默默地相互看了一眼。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一种忧虑、以及在这种时刻对我们之间的战斗情谊的信任。用一个眼神就能表达这种信任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政委。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什么，我不知道，但他的话——睡吧，睡吧！却流淌在我的心田，就象遥远的童年时期母亲的声音在回响。

尽管我十分疲劳，却不能马上入睡。耳边回荡着库兹马·阿基莫维奇的声音，眼前又出现了卫国战争中政治委员们的形象。我的思绪回到了 1919 年……高尔察克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在乌拉尔支持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他等待协约国送来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重新恢复进攻的势头。

B·A·列宁在估计东方战线的形势时认为，这里是对革命势力的主要威胁。他在 5 月 29 日发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写道：“如果我们在入冬之前没能夺取乌拉尔，那么，我认为革命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这几天我们收到东方战线司令部的命令，按照命令，步兵第 10 团改称步兵第 43 团，并由步兵第 28 师转入步兵第 5 师序列。命令要求我们渡过卡马河，进攻亚纳乌尔火车站。

我极不情愿脱离阿津的指挥。要知道正是在阿津的师里，我们受到了战斗洗礼，学会了与敌人、甚至是与优势敌军作战的本领。

我认为阿津是一个极有才干的军事导师。他反对因循守旧，不拘泥条令的字面意义。在战斗中，他总是开动脑筋，大胆果敢，且富于创造性。他教导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从国内战争中学习新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从教令或条令里读到的。一句话，他是一位出色的、有才能的、非常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军事首长。

我们在进行着革命斗争。我们抛掉了曾被西方的正统派推崇为经典的、而现在已是过了时的、陈腐的阵地战战术。我们创造出一系列的战斗方式，例如、深远的迂回、包围、并前出至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不怕远离自己的防线实施果敢的机动、迅猛的冲击；在进攻时，尽快近战接敌，迫使敌人与我展开白刃战，敌人通常是害怕白刃战的，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在我们一边。所有这些战术的应用，都得到了阿津的大力支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出身于顿河哥萨克。我也见过阿津身穿哥萨克制服，也曾认为他曾是顿河哥萨克第 46 团的军官。甚至曾在叶拉布加市见过阿津的 H·H·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他时 also 把他当作顿河哥萨克。

但我这里有一封他的母亲 E·A·阿津娜（她在几年前去世了）的信。信中

写道，她的儿子阿津·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是拉脱维亚人，1895 年生于威帖布斯克省的波洛茨克县、马利亚诺沃村。

1974 年，我去鞑靼，途经昔日的疆场，我才调查清楚阿津的一些情况。B·M·阿津是 1918 年初随着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队来喀山的。他的支队参加过从白匪军手里解放喀山的战斗。后来，所有参加过喀山战斗的支队合并成混编第 2 师。1918 年 11 月，混编第 2 师同维亚特卡特别师合并为步兵第 28 师。B·M·阿津始任师长。

在东方战线，第 28 师以神速的进攻完成了向叶卡捷琳堡（现在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的英勇进军。

1919 年 8 月，该师在阿津的指挥下，在萨拉托夫地域作战，成功地粉碎了邓尼金进犯莫斯科——萨拉托夫铁路的企图。8 月 23 日，阿津的部队同伏尔加河区舰队一起，占领了卡梅申，然后又攻占了杜博夫卡。

从 9 月 5 日起，该师参加了攻击察里津的战斗。那时察里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盘踞。在一次冲锋中，阿津负了重伤，但他没有离开战场，因为他的战斗禀性与医院的各种限制简直不能相容。

10 月，南方战线和东南方战线的部队转入进攻邓尼金的军队。B·M·阿津师先对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实施突击。然后编入第 10 集团军，并参加了击溃顿河白匪军的战斗。

1920 年初，阿津师占领了苏罗维基诺镇，继而强渡奇尔河，经由托尔莫辛，占领了齐姆良斯卡镇，最后渡过顿河，于 1 月底前出至马内奇。

在马内奇，阿津与帕夫洛夫将军的骑兵队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战斗。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带着一些指挥员从一个旅到另一个旅去，途中突然陷入哥萨克白匪军的埋伏。足足有一百个骑兵追赶他们。他们边回击，边赶紧跑向自己的部队驻地。就剩下几公里了，突然发生了不幸：马在跳沟时绊了一下，马肚带崩裂了，阿津随马鞍一起跌在地上，右手折断。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追捕的敌人抓去了。

由匪军决定在阿津身上发泄自己部队屡遭失败的仇恨。红军指挥部向敌人提出，愿意用任何一个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军来交换阿津。但是，白卫军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找不到对等的人。敌人害怕阿津，就像害怕死亡一样。

在严刑拷打和百般侮辱之后，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被绞死在季霍列茨卡娅镇的广场上。白匪军把他的尸体剁碎埋入葬马的墓地，后来，他的遗骸被迁到其他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不久前才弄清楚）。我们的优秀的追捕野兽的少先队员们在那里找到了英雄的坟墓。现在阿津的墓矗立在法斯托夫斯卡娅镇……我团强渡卡马河后，继续向乌拉尔进攻，追击敌人，但是，到现在为止，第 5 师的首长一个也没来过我们这个团。

我不止一次地与政委交谈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但杰尼索夫最后总是安慰我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能对付，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

总之，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政委那昂扬的情绪。何况，我们一直在前进、前进。

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向大皮济河进军的路上，他来到我跟前，异乎寻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我忍不住问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帕维尔？”

他终于开口了，讲了自己的忧虑。事情是这样的；革命前，他随全家从彼得格勒迁到距现在的部队驻地仅 30 公里的坎巴尔卡的工厂。那年 3 月份，红军撤走时，他的家就留在那里了。杰尼索夫一直忧虑着家庭的命运，一直为 18 岁的儿子担心，但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团队。去师政治部找还不熟悉的首长提这种个人的私事，他又难以启齿。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见：

“怎样处理好呢？”

党性不允许他擅自决定这种事情，尽管他比我大许多。我当即建议他带上 3—5 个骑兵侦察员，立刻出发去坎巴尔卡。

政委高兴起来，说：

“我只需带一个传令兵就够了……”

送走政委后，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团队继续追击敌人。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政委，担心着他的家庭的命运。

他终于回来了。他那副样子很可怕。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变成土黑色。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不，不能去问，不能去触及他那受伤的心。

终于，他自己说出了一切：

“儿子瓦西里……才 18 岁，在与白匪军作战时牺牲了……”

事情就这么普通，可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剧痛，我为战友的不幸而悲痛。

我无法用语言安慰他，只感到在眼睛里，在眼皮底下，有类似砂子的什么东西刺痛着我。

但最后还是帕维尔·杰尼索夫——我们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帮我恢复常态。

“你说说吧，你在想什么？”——他这样问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弹药不够……”

“你应该马上去师部，”他向我建议：“把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搞清楚……”

不用说，到了师部，我必须先向师长作自我介绍。因为我的外貌远不象个指挥员。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热天到来，我的手上，尤其是双脚长满神经性皮炎，痒得我无法忍受。所以，我经常好几个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裤腿，穿着凉鞋。客气点说，这种不平常的装束，会引起师长困惑不解：这个全师最年青的红军团长，怎么打扮得象个从集市上来的小伙子呢？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想起了杰尼索夫的建议，先不要去找师长，而是去找政委。我向政治部走去。首先碰到的障碍是哨兵不让我进楼。

当我向他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 43 团团长时，他回答：

“这个你随便对别的什么人去说，而不要对我说。”说完就扭过脸去，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人。看他那整洁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长。我向他打听：

“同志，请告诉我，师政委加比舍夫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师政委加比舍夫。”他回答，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党证，并报告说，我是步兵第 43 团团长。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里去！”

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兼做卧室的办公室。加比舍夫急忙地责备起我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这副样子就到我们这儿来？活象只剥光的兔子。”

我除了口头解释外，还交验了物证：脱下凉鞋，并给他看身上的绷带……。

谈话近一个钟头。师政委询问了我团的战斗力、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武器、弹药、被装和粮食的保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一点也不隐瞒，一点也不夸张。

谈完话后，政委建议我同他一起去见师长。

“我就对他说，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见你，问清楚你是谁之后，才决定来的。”这种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

我们走进师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绍给师长。

“他很不幸，”他说：“他有病，甚至不能穿军装，因此他很难为情。”师长卡尔波夫原来是沙皇军队的基干军官。开始时，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听完政委的解释之后，他的表情和悦了，并让我坐下。

卡尔波夫年仅 40—45 岁。听完我的报告，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好象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直到我问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时，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决于形势。”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和从哪里给我团搞到供应。他认为我提问题没找对象，让我去问师供给主任。我从师长这里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罗加诺夫的第 3 旅的司令部刚刚到达亚纳乌尔车站。你的第 43 团将编入这个旅……”

就这样，我结束了对步兵第 5 师师长的拜访。我缓慢地向政治部走去。加比舍夫赶上我。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用信任的语气问：

“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回答。

加比舍夫把我又叫到他那儿，坦率地对我说：

“你啊，崔可夫，作为年轻的指挥官和共产党员，要警惕！如果你能像以往那样独立地去完成战斗任务，我们将支持你。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明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回到团里去，象从前一样去干吧！”我们象老相识、老朋友那样亲切告别了。

我再没去司令部的其他部门。对于我来说，拜访了这两个人物就够了：一个是个兄长，另一个官气十足。

的确，旅比师低一级，在第 15 旅里，情况要好些。旅长斯特罗加诺夫虽然不是党员，是个沙俄军队的旧军官，但他经常到各团里看看。而旅政委们，象戈里亚奇金、萨达科夫更是我们的常客。我们这些年轻的指挥员总是能感受到政治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同政委们建立了十分融洽和密切的关系。

6 月份和 7 月上旬，我们一直紧紧地咬住退却的敌人。他们在后卫的掩护下，竭力想摆脱我们。白匪军的用意很明显：重新布置兵力，调集新锐预备队，到乌拉尔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在敌人到达

乌拉尔之前或在乌拉尔境内，赶上敌人并歼灭他们。这就决定了我们进攻的战术。我们从行进间不断突袭敌后卫部队。白匪军的部队动员回避重大的战斗，他们竭力保存兵力。

在通往乌拉尔的路上，高尔察克占领区的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纷纷加入我们团的战斗行列。听他们说，这个地区被高尔察克军队列入征集对象的大部分男人都躲进了树林。为此，敌人的讨伐队，进行残酷的报复。他们用树条、通条抽打应征壮丁的亲人，甚至连孩子和老人都不放过。他们还威胁说，要彻底毁灭这一大片村镇。

由此我们决定：要加快进攻速度。

萨拉宁斯克工厂的工人们控诉说：“高尔察克部队的军官宣称，如果青年不去征集报到，他们就把抓到的人质都枪毙，把村镇烧光。”

最后通牒的期限是第二天上午 8 时。工人们请求我们尽快占领工厂，并把高尔察克分子从那里赶出去。

我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帮助工人同志们。杰尼索夫建议挑选能够不休息、连续战斗的志愿者。结果全团官兵都是志愿者。

我们计算了一下要走的路，估算了一下时间。时间很紧张，我团将迟到 3—4 小时。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快速支队。快速支队由骑兵侦察员、乘坐农民大马车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机枪班组成。立即出发的命令很快下达了。我和杰尼索夫率领这个快速支队，把团主力部队交给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率领。

快速支队连夜在树林中行进，绕过和甩掉白匪军的人数不多的掩护队伍，在天亮之前，在离最后通牒限期还差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接近了工厂住宅区。

白匪军知道我们的行动后，提前开始进行镇压。我们根据住宅区上空的滚滚浓烟猜到了这点。

“跑步前进！”我向侦察员们发出命令。

我们的机枪车上有两挺“马克沁”机枪。

我们从迎面跑来的居民身边奔驰而过。这些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许多人只穿一件衬衣，披头散发，脸上流露着恐惧和绝望的神色……我们没停下来打听村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一切都很清楚……

冲到小丘上，我们看见村镇的许多房屋被大火包围着。

讨伐队在哪？他们怎么没开火？噢，原来他们怕对残暴的行为负责，正要从这里逃走。

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正奔向河边。许多人找到浅滩正跑步横渡乌法河。

我们的机枪向渡口实施远距离射击。一个个长点射就象牧羊人的长鞭子，一下子把这群两条腿的野兽赶到水里。把白匪军打退到河对岸之后，我们开始帮助居民们救火。

我们找来了消防唧筒、大水桶、小水桶等，帕维尔·杰尼索夫抓着火龙带管咀，红军侦察员们提着装满沙子或水的桶扑向火焰……

与烈火斗争的激烈场面也感动了我。我下了马后，向燃烧着的房屋跑去。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台阶上躺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被砍断了一只手臂。在她头顶上方冒着一团团的浓烟，旋舞着火舌，然而，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

突然，身边不远的地方炸响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响了另一个。敌人

虽逃往对岸去了，但仍用燃烧弹来泄他们对整个村镇和居民们的仇恨。

应该渡过河去消灭讨伐队的炮队，并乘胜追击……但这个任务只能由正开来的团主力部队来完成。因战士们从救火现场撤下来是不可能的。战士们是不会理解我的意图的。我的助手谢尔盖耶夫来了。他报告说，大约两小时之后我团就能抵达这里。我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谢尔盖耶夫带领 5 个骑兵侦察员到村镇南边去寻找浅滩。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比我大 3—4 岁，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军官。战斗中他勇敢异常，甚至是狂热般的勇敢，有时我感到，他是在故意找死。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发淡褐色，长着一张开朗、善良的俄罗斯人的脸庞。他已成家，但从未收到过妻子的信。有一次，他给我看一张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的照片，他说，这就是他的塔季扬娜。但是，每当我问起他妻子在什么地方和近况如何时，他的脸色就阴郁起来，并且沉默不语。他从不谈自己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却偏爱谈他曾在沙皇军队里担任团徒步侦察队长时的事。

有时他的确把死当儿戏。红军战士个个都卧倒在地，伸起一只手都很危险，而谢尔盖耶夫却直着身子沿散兵线来回走动。我不只一次地责问他：“你为什么要白白地去冒险呢？”

他总是用同样的话回答我：

“算了吧！……让他们快点打死我吧！”

不论是我本人，杰尼索夫，还是红军战士们都很尊重他的勇敢和诚实。有一次，我们与他谈起入党的事。但他好像是开玩笑似地回答：

“难道非党人士就不能象共产党员那样去死？”

现在，在这里，当他看到白匪军的狂暴行为之后，他简直坐卧不宁，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如果我不派他带领几个骑兵侦察员前去，他，大概会一个人奔向河对岸。

菲利普·古里亚诺夫的侦察员们跟随我奔向村镇北边。

乌法河流到此地变得又宽又浅。为了核实从居民那里获悉的情报，侦察员亚库波夫——他是鞑靼人，我们叫他亚什卡，骑马涉水渡过河，然后又返回来。白军发现了他，向他开火，但子弹没打着身手敏捷的侦察员。一切都好。也就是说，可以步行渡河。

团主力到了，但炮兵连还滞留在途中的树林里，起码要等待 3—4 个小时才能到达。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敌人还在继续炮击工人住宅区。我立刻作出决定，不等炮兵就强渡乌法河，追赶白匪军，直到把他们消灭干净。

我把掷弹炮班班长和军乐队队长叫来，谈了我的计划。

计划是这样的：

掷弹炮班先占领位于村镇中心的靠河边的发射阵地。乐队就摆在炮手的旁边。当各营刚一报告强渡准备工作完毕，乐队就奏起《同志们，勇敢地向前！》这支歌子。5 分钟后，掷弹班向敌人开火，所有的机枪也同时向敌人扫射，这时，步兵跳入水中渡河，并高喊：“乌拉！”向敌人进攻。

将近 12 时，各营营长陆续报告已准备好强渡，我正打算给乐队发信号的时候，第 3 旅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来了。

我向他报告，我团正准备进攻。

然后，我转向乐队……旅长生气地问：

“这是演什么闹剧呀？”

“过 5 分钟后，您就会看到……”河对岸已开始骚动。看来，乐队奏的

曲子使敌人不知所措。白匪军们从掩蔽所站起来，向我这边张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们的掷弹炮一齐开火，机关枪也哒哒地扫射起来。红军战士开始强渡乌法河，向对岸敌人发起冲击。敌人顶不住红军战士的猛攻，仓惶逃窜。这次战斗我们抓获 40 个俘虏，缴获 3 挺机枪。

斯特罗加诺夫在整个战斗中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战斗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并要求把他刚写的报告通过电话或派骑兵通讯员送往师部。报告中这样写道：

“步兵第 43 团今天在乐队的伴奏下，强渡过乌法河，击退了敌人，并在继续追击中。

俘虏、战利品数字，还在继续清查中。斯特罗加诺夫。1919 年 7 月，于萨拉纳。”红军战士保卫村镇，使居民免遭高尔察克讨伐队残害的光荣事迹，很快就在乌拉尔地区传颂起来。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红军的性质的工作，不仅政工人员在做，每一个战士也都在做。这使我们同劳动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工厂的工人们奋不顾身地帮助我们与白匪军进行斗争。熟悉道路和林间小路的当地居民，为我们当向导。他们知道敌人驻在什么地方、敌人向哪里调动、在哪里集结。我们拥有这么多优秀的侦察员和向导，使我们可以在乌拉尔地区这个难以通行的、多森林的山地里，一天前进 30—40 公里。

7 月 6 日，我们经过战斗夺取了曼恰日重镇，次日又占领了阿尔京斯克工厂。工厂的工人和镇上的居民为我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集会上我作了简短的致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讲话。

从萨拉普尔开始，我们与退却的高尔察克部队的后卫发生过多场战斗，每一次我们都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这一点把我们、特别是我个人惯得过分自信了。

然而敌人远不象我们想像的那么虚弱。

就在这时，新的考验接连地出现了。

我师几个团在萨拉普尔——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布古利马——乌法铁路线之间进攻时，我们不知道，高尔察克为了控制乌拉尔地区，已把大批预备队投入战斗，并且已在乌法河与兹拉托乌斯特之间的山地高原上鏖战。因此，当我们在乌法河与敌军遭遇时，感到非常意外。

在别列佐夫卡附近的战斗，完全按照我们未预料及的另一种形式打了起来。我们几乎被迫转入防御。

补充侦察之后才知道，在上波塔什卡聚集了近一个营的白匪军，其配有大炮的主力部队布置在 5 公里远的别列佐夫卡。因此，我们决定：深夜时分，由第 1 营攻击盘踞在上波塔什卡的敌人；第 2 营绕过这个镇，攻击别列佐夫北郊敌人的翼侧。

7 月 9 日凌晨，第 1 营在库兹明率领下发起攻击，尽管高尔察克匪徒进行了绝望的抵抗，还是被 1 营逐出这个村镇。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战斗明显地延滞下来，因为敌人调动其主力部队，绕过我团左翼侧，向我进攻部队反击。

布哈尔指挥的第 2 营在夜间迂回，由于道路不好，抵达战场时已比原计划迟了很多。

形势愈发复杂了。拥有两倍优势的敌人绕过 1 营的左翼，向我各分队

逼近。

我已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个预备队——徒步侦察小队投入了战斗，并命令骑兵下马，成步兵分队，给他们加强了机枪，也投入战斗。但兵力仍然不足。敌人觉察到我们的弱点，胆子大起来了，更加猖狂地向我冲来。

在 2 营没有到达战场、向别列佐夫卡的敌军侧发起攻击以前，我们必须坚持 1 小时以上。

共产主义营这时距我们团还有 30 公里，正在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工厂进攻。因此，我只有采取最后一招了，即从发射阵地撤下两门火炮，疾速地运送到左翼侧，并迅速地展开。这一切简直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我们的炮手还没来得及发射一炮，在他们的头顶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战士们都卧倒地上。敌人见此情景，拼命向前冲。当敌人冲到了距离大炮还有 400 米的地方，就在这时……

我跳到卧倒在地上的炮手身旁，下达口令：

“霰弹瞄准敌人，开炮！”

炮手们迅即跳起来进行直接瞄准，霰弹开始在进攻者中间爆炸，一群敌人倒下了，另一些掉头就往回跑。这时，布哈尔金的营正从西北方悄悄的接近别列佐夫卡，迫使敌人仓卒退却。

我们不能去追击敌人，因为部队需要立刻休息。

我没有睡着，心里思索着白匪军为什么如此顽强地抵抗？要知道，在这之前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明天他们又会玩什行新花样？应该同政委商量一下。

午夜，我走进杰尼索夫的小屋。

我们坐在桌旁，打开地图。我们的进攻路线是经过秋利加什镇到舍马哈。前面是塔尔德列斯基山，再往前是乌法列伊斯基山，翻过这两个山岭，我们将到达亚细亚。

黎明时分，我才同政委分手。我们说好，太阳升起时出发。

7 月 10 日中午，我团未经战斗就穿过秋利加什。在这里，我得到情报，说敌人正慌忙向尼亚泽佩特罗夫斯克撤退。

我师已靠近乌拉尔主山脉。通过山脉的道路基本上是在多林的山地，这里易守难攻。如果敌人在这片山地和隘口设防，他们只需用少量兵力就能建立起纵深梯次防御。那时，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火炮是很难突破这个防御的。

但是，高尔察克没来得及往这里调集预备队，没能建立起牢固的防御。他们仅仅在乌拉尔以西同我们打了几场遭遇战。他们的部队，包括卡佩利将军的那个军，都没能阻止我军的进攻。他们被各个击破，慌忙地撤退了。这样，在白匪军的几个主要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些疏于掩护的大缺口。这使我们能够迂回敌军的两翼，甚至在当地居民中找到的可靠的向导的帮助下，绕到敌军后方。在翻越乌拉尔山脉时，我们挑选的一些最隐蔽的、连在普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路。

我师在敌人第 5 集团军与第 2 集团军的接合部、即在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乌法——车里雅宾斯克铁路线之间实施进攻，用了 6 天时间就征服了乌拉尔山。我们穿过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铁路干线，前出至乌拉尔山的东支脉。步兵第 43 团第一个越过乌拉尔山，并于 7 月 18 日占领了一个大村庄沃斯克列先斯克。

白匪军在兹拉托乌斯特和叶卡捷琳堡遭到失败后，同来自西伯利亚的新的预备队一起，显然，是决心阻止我部继续前进。为争夺车里雅宾斯克市，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持久战。因为正是这场大战，将最终地决定乌拉尔的归属。

我团接受任务：“从沃斯克列先斯克经秋布克向卡拉博尔卡进攻。”命令中既没有关于敌人、也没有关于我军的任何情报。

7月19日清晨，我们从沃斯克列先斯克出发。

穿过秋布克镇，在到阿拉基村之前，侦察队报告说，卡拉博尔卡方向有大股军队在运动。侦察员的情报很快被证实，我从望远镜里果然看到，白匪军的一长列步兵纵队在不设任何警戒的情况下行进。瞬间，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战斗计划：先把敌人的纵队放进阿拉基村，然后让配有火炮的前卫营用火封从村里向西去的所有出口。这时，主力部队由东绕过敌纵队，突击敌军翼侧和后方。把敌人击退到大、小阿拉基湖。

推算一下敌人的运动速度，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大约只有3个小时，一切都要抓紧进行。我让骑兵通信员把命令送往前卫营，并要求团政委杰尼索夫返回主力部队，以便尽快地率领主力部队顺大路前往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再从东边绕过敌纵队。吩咐完毕，我便带骑兵侦察员们和两辆机枪车穿过小树林向这条大路急驰而去。

很快，我们就看见了敌纵队的尾部，这个纵队有近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在接近村子时，停下来休息。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杰尼索夫和谢尔盖耶夫骑马向我奔过来。谢尔盖耶夫报告说，我团第2、第3营已到达敌军翼侧。

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我方。

大约过了1小时，村子里传来了机关枪的射击声。这说明敌人已与我前卫队遭遇。敌人纵队开始展开战斗队形。而那些中止休息的敌军连队，马上面向北面组织防御。

这时我看到，敌人把所有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去突击西北方向，同时兵分两路从左边和右边绕过已被我前卫营封锁的阿拉基村。我决定率领骑兵侦察队去冲击敌纵队最后面的一个营。我们的兵力当然太少，但我们是突然袭击，机关枪手将两挺机枪推向通往大路的一个高地上，向敌人的纵队开了火。近40人的骑兵侦察队冲了过去。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于是一群群的士兵和军官纷纷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我们把军官与士兵分开，然后将俘虏送往后方。我准备向已展开的敌人分队发起新的攻击。这时，我团第2营转入进攻，白匪军被迫退向湖边。

被包围和被紧逼到湖边的白匪军士兵军官，先后停止抵抗，缴枪投降。就这样，刚刚到前线、身穿英式军装、装备新式步枪和“梅特拉利耶扎”型机枪的白匪军第12师第47团，便整个地被消灭了。我们俘虏了一千多人（其中17个军官），缴获近千枝步枪和12挺机枪。

俘虏中的士兵被押送到沃斯克列先斯克，那里有我们的辎重队。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很高兴这么快就打完了仗。俘虏中的军官，在警备勤务队的警卫战士押送下，被送往另一个叫秋布克的村庄。

当天，我团占领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往后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没有收到继续行动的命令。其实，我团这时已同左、右邻部队失去联系，与师部也中断了联系。

第2天，我们获悉，驻扎在卡缅——乌拉尔斯基地域的敌主力部队正向沃斯克列先斯克方向运动（我们在那里关押着头一天俘虏的1000多名白军士兵）。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立即动身去沃斯克列先斯克，用警报声把俘虏叫起来，把他们送往上乌法列伊。后来才知道，师司令部已设置在那里。

在这之后，我回到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在团司令部附近，杰尼索夫把我叫住。他从窗户伸出头来，叫我到他那屋里去。一进屋子，饺子的香气扑鼻而来，真是令人垂涎……哪个俄罗斯人不爱吃这种西伯利亚式的饭食——肉馅饺子！平常，每个至少要吃50个饺子，有时更多些。但我们没有多少吃饭时间，敌人又开始炮击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一个炸弹在我们窗前爆炸了。窗框被炸飞了，桌子像是被扫帚扫过似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我们俩被摔在地板上，震得耳朵发聋。长时间地嗡嗡作响。毫无办法，饺子全毁了。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能享用饺子是多么难得呀！

7月21日，我团从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出发，经捷姆里亚斯向乌鲁库利进军。安德里亚诺夫的第3营作前卫营。在乌鲁库利村附近，前卫营遭到敌人从捷连——库利湖方向来的攻击。战斗很激烈。为反击敌人的进攻，我们命令库兹明的第1营展开，并命令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打击敌翼侧。敌人支持不住，向后退去。

从俘虏的军官那里得知，与我们作战的是得到沃伊采霍夫斯基军的一个工程连和一个舟桥连加强的第47团残部。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在卡拉博尔卡附近的战斗中仓忙溜掉的特卡琴科大尉。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包围第47团，把它逼到捷连——库利湖边，然后活捉特卡琴科。

就在这时，杰尼索夫来到我这里。他满脸惆怅若失的神色。他很喜欢安德里亚诺夫营长。他向我讲了安德里亚诺夫受伤的情况：伤在脸部，子弹从上颌穿进去，从耳后飞出来……。

我和政委筹划着合围敌人的计划。最后决定：让杰尼索夫绕到敌后，断其退路；我带领两个营将白匪军赶到湖边。

我们在行进时想出的这一计划，实施得很顺利。第47团的残部和工兵连被彻底打垮。

特卡琴科带着几个传令兵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他逃进了湖边的一个农庄，我们想，这回他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我们冲进农庄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我们跳进村边一座房屋的院落内，看见地上躺着三个军官的尸体。他们用手榴弹把自己结束了。其中一个就是特卡琴科。当时他还在喘气，我们从他的军便服口袋里找到一些文件……就这样，从军装到武器全部由协约国武装的第12师第47团，再也不存在了。

过了一小时，湖对岸的敌人开始向我们猛烈炮击。我们完成了任务，在开阔的岸边再也无事可做。第1和第3营开始慢慢地向乌鲁库利撤去。我带着骑兵侦察队也从村子里出来了。突然，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的一个深水沟里爆炸了。我的战马竖立了起来，飞跃过沟去，它带着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我当即失去了知觉。我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乌鲁库利村的团司令部里了。在这里，我得到了治疗，正复了脱臼的脚，敷上止胸痛的草药，我很快镇静下来。只是由于震伤，耳朵依然感到堵塞，脑袋嗡嗡作响。

桌上放着敌人的文件、地图和信件。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高尔察克匪徒在这个地区已进退维谷。在一些军官的信件中，还流露出沮丧和绝望

的情绪。

俘虏在回答问题时，对我指战员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出其不意的机动和迂回战术佩服备至。他们能叫出阿津、艾兴、普特诺等人的名子。更使我们惊讶的是，他们毫不隐藏他们的情绪和想法。他们公开承认，高尔察克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与红军作战已变得愈来愈困难。

7月24日晚，我团接受任务：进攻穆斯柳莫沃村，并前出到捷恰河，准备下一步占领纳古马诺夫。

7月25日清晨，我们向穆斯柳莫沃村进发。

穆斯柳莫沃村……，我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在我身上产生并发展了那种被称为指挥员气质的东西：对信任你的人的命运的责任感，关于判断敌人意图的本领、以及在复杂的作战情况下，采取唯一正确措施的能力。

在与敌第46团进行小小的遭遇战之后，我们占领了穆斯柳莫沃。占领了……直至发生了今天我定书名为《战斗青春的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故事。

我先遣连队渡过捷恰河到了对岸。但是在河边的林地旁遭到敌人强烈的阻击，各先遣部队被迫停了下来。

下午，敌人在十门重型火炮的支持下，多次向我团占领的阵地发动反击。我的观察所设在一个磨坊里，这时磨坊的砖楼正处在敌交叉火力之中，磨坊几次被命中，我只得寻找新的地点。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每隔一小时就发动一次进攻。在一次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谢尔盖耶夫牺牲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是我的好战友，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在遇难前的几天里，他不知怎的竟反常地缄默起来。在俄罗斯卡拉博尔卡的战斗中，他的坐骑被打死了。两天之后，在离乌鲁库利不远的地方，他的第二匹战马又被子弹打穿了两只耳朵，还打中了他的军用挂包。那时，我看到谢尔盖耶夫骑着脑袋上缠满白色绷带的马走了过来，就打趣揶揄他：

“怎么，你想给白匪军指示目标？”

他看了我一眼，就把身子转开，然后问道：

“你坦白地说吧，马和我，你更心疼谁？”他沉默了一会，又补充道：“如果是我，那就不必惋惜了……反正迟早我要被他们打死。”

我希望他这种宿命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很快地过去。但就是在这儿，在这抬头走路随时都有危险的地方，他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捷恰河，就旁若无人地叼着烟卷，沿着还未来得及掘好避弹壕的散兵线上，直着身子走来走去。

结果，他被打死了，身体被敌人的6颗子弹穿了许多洞。

在战斗进程中可以看出，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强，我明白，在这个地方就别考虑什么进攻的问题了。白匪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步兵至少是我们的2倍，炮兵是我们的3倍。

我们炮兵连的炮弹很有限。弹药库在我们后面80—100公里处。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分析一下我团在穆斯柳莫夫地域的各个阵地，我得出结论：它们既不利于防御，也不利于进攻。而敌人在这里却能利用隐蔽接近路到达我阵地翼侧，甚至迂回到我后方。

暂短的7月之夜来临了。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预感到，团队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向四处派出的侦察队，不论是往右翼侧的，还是往左翼的，处处都碰上了敌人。一个白军俘虏军官被用担架抬进了我的

鞑靶式的小农舍。他没负伤，却顽固地沉默不语。我很不理解他这种反常行为。不知他是受了暗伤？还是在假装？这个白匪军官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很快又送来一个被俘的士官生。这是一个大约 20 岁的年青人，他同样也沉默不语，在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文件。

这一切都在提示我，敌人是决心发动进攻了。白匪军也在进行侦察。我们不能再等下去。要立即实施隐蔽机动。

我决定从这个村子向北撤。在图古尼亚克湖和乌列克特湖之间占领阵地，这样就能护住自己的两翼。

我同政委急忙赶到这个新地段，我们看到了一条干涸的深沟。看来这两个湖在过去的什么时候是连在一起的。沟沿上延伸着一排篱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军的配置起了掩蔽的作用。从水沟朝敌人方向，有一块约 300 米的象桌面一样平整的开阔地。然后是一片小灌木丛，几乎一直延伸到穆斯柳莫夫村前。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敌人却无法把炮兵观察所移到这个开阔地上来，因为每一个小丘都在我们的控制下。

防御正面很宽，我们只好把 8 个连展开成散兵线，留作预备队的只有 1 个步兵连和几个徒步侦察队和骑兵侦察队以及 4 挺机枪。

天一亮，穆斯柳莫夫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半小时后，枪声停了下来。我得到报告，对射是在村庄里进行的。看来，敌人从四面八方转入进攻时，自己打了起来。

我同杰尼索夫骑马巡视我军阵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突然，一些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朝我们挥舞着军帽，大声喊着要我们隐蔽起来。我们向前方看去，在灌木丛后面出现了敌人的散兵线。我们急忙下马，趴在机枪旁边。

我用望远镜透过篱笆看到了敌士兵和军官的面孔，敌人正展开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向我军阵地逼近。我们相信红军战士们能够沉着应战，决定把白匪军放近点。

战士们耐心地等待着。当敌人第一道散兵线前进了大约 200 米时。我下达了命令：

“开火！”

白匪军象割倒的草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伤员四处滚爬。射击约持续了 5 分钟。我同政委站了起来，透过篱笆观看整个场面。但红军战士并不赞赏我们的轻率举动，他们喊：

“崔可夫，杰尼索夫！这儿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快走开吧！……这里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对付！”

战士们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象是命令，我们只好服从。我们刚跳上马，敌炮兵便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飞过了我们的头顶，在远处爆炸。我们急速跑出交火地带。

团指挥所设在库纳沙克村东南的一个高地上。附近不远处是炮连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团队正面的地形。白匪军企图沿图古尼亚克湖岸迂回到我军右翼。

我们只好投入徒步侦察队和两个机枪组来延伸我们的阵地，从而使该侧翼仿佛延长了很多，因此，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7 月 26 日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敌人损失重大，而我军则伤亡甚微。

夜晚，我们加强了警戒。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轮流睡觉。晚上，我们的侦察员拖来了两上受重伤的敌士兵，并搞到了许多文件。

根据文件和俘虏的口供证实：与我团作战的是西伯利亚第 12 师第 46 和第 48 团的分队，还有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约 600 名士官生。士官生都分在第 46 团和第 48 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 3 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察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

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我若是有你这样的儿子就好了……爱惜这个团……再见了。”

他的眼角涌出了泪水。我站立着，紧闭双唇。马车把他拉走了。

我翻身上马，没有理睬任何人，就向观察所奔去。

回到观察所，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派侦察人员外出搜索、并重新布置火器之后，又陷入沉思，沉思……

第4天，7月28日，太阳刚升起，敌人在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开始了新的冲击。但这次冲击已不象昨天或前天那个样子了。步兵从灌木丛后面钻出来，我军火炮和机枪刚一开火，他们就调过头去，跑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他们的火炮却一直轰击着我军阵地。

中午，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和政委戈里亚奇金来到我的观察所。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战场上，便把午饭也带来了。我们在灌木丛旁一起进了午餐。斯特罗加诺夫通知我说，由于敌人在我团的地段上实施主要突击，我的预备队将消耗殆尽，他已命令第45团的一个营赶到这儿归我指挥。

旅长和政委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战场，看到战场上横尸遍野的情景，很是吃惊。他们说，高尔察克把他的全部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妄图不惜任何代价击溃我军、重新夺回乌拉尔。几天来，在车里雅宾斯克西北和南方战斗频繁，双方各有胜负。我集团军第26和第27师在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波列扎耶沃车站的铁路线一带，正在艰难地阻击白匪的进攻。我师主力正向东南方向运动，准备对敌军里雅宾斯克集团实施突击。

经他们这么一讲，使我对这个地段上战斗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的右翼是谁？”我问旅长。

他犹豫了起来，沉默了一会，说：

“步兵第35师的部队正在靠拢。”

斯特罗加诺夫又待了一会，便回旅部去了。戈里亚奇金和我一直呆到晚上。作为党内同志交心，他告诉我，第35师第2旅旅长科托明带着一些指挥员（沙俄旧军官）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骂到：

“嘿！……这帮败类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我非要和他们算帐不可！……”
“是的，你也看到，我们只好加倍警惕……”然后，他又问：“你那儿旧军官多吗？”我们团只有3个旧军官。但他们都象不久前牺牲的谢尔盖耶夫一样，是好样的，我可以替他们担保。

“你瞧，”戈里亚奇金说：“你现在没有政委了。”

“您大概会很快就把政委派来吧！至于说到有人要在我们背后捅刀子，那我们的红军战士决不会答应……杰尼索夫的工作暂由伊万·普罗克希茨代替。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有威望的共产党员，团里所有人都认识他。”

旅政委走时拍拍我的肩膀说：

“多保重……”

我决定把前来增援的1个营放在前沿阵地，而把共产主义营留作预备队。我这样决定是要个花招对付我的上司的。如果我把“人家的”营留作预备队，那么，上司随时都可能把这个营从我手里调走。而如果我把该营放在前沿散兵线上，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这个营撤回，同时，预备营也就不会受到触动。

7月29日，敌人又发动了几次毫无成效的进攻。可以感觉出，敌人在惨遭几次损失后，无论是部队的士气还是体力都一落千丈。甚至敌人的炮击也变得稀落起来。看来，炮弹也快打光了。

中午时分，斯特罗加诺夫打电话来，下令从7月30日清晨起转入进攻。任务是：占领穆斯柳莫沃，继而向米阿斯河畔的米阿斯基镇进攻。

进攻战役计划早在防御战期间就已想定。

发起进攻的前一夜，我们对敌战斗队形进行了详尽的纵深侦察。拂晓前，侦察员们带回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左翼，我侦察人员巧妙地潜入白军各战斗队形之间的缺口，深入到穆斯柳莫沃村，又悄悄地返回。

我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我左翼营绕过乌列克塔湖边的高尔察克部队，前出到穆斯柳莫沃村。在其它地段上，敌人抵挡不住我军的突然进攻，开始撤退。全团抓获俘虏约400名，缴获机枪6挺。也就在这时，我听说，整个东方战线的红军部队已全面展开进攻。

穆斯柳莫沃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在那个时期所参加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而现在已是1942年10月14日。

我一觉醒来，直觉地感到面临着危险。夜晚就象一瞬间那样逝去了。我甚至觉得，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还没有离开我的床铺似的。但天已大亮了，看来，我睡得相当死。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空前残酷的一天又来临了。

2

奥尔季纳列茨·鲍里斯·斯科尔尼亚科夫给我倒了一杯浓茶，我一口气喝完，便走出掩蔽部。耀眼的阳光使我一阵目眩。刚出来，迎面遇上了司令部和指挥所的警卫长格拉德舍夫少校。我们一起往北走了几十米，来到司令部所属各处的所在地。它们被安置在匆忙挖成的掩壕里、或者在伏尔加河陡峭的右岸上的窑洞里。

有个窑洞里放着一个图拉茶炊，烟囱是自做的，冒着一缕细烟。旁边坐着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将军。他是图拉省人，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和自己的“老乡”——图拉茶炊分手过。因为他有喝浓茶的嗜好。……“怎么，米特罗法内奇，”我问：“在德国鬼子的‘音乐会’开始前你还来得及喝茶？”“来得及，”他自信地说：“不行的话，我就带着它到观察所去喝！”

西边传来巨大的轰隆声。我们抬起头，仔细地听着。炮弹和迫击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接着，附近传来爆炸声，大地颤抖，火苗四溅。爆炸的气浪把我们推倒在河岸的陡坡上。茶炊也翻倒在地上，终归没来得及把茶烧开。然而，炮弹的爆炸简直使伏尔加河的水也沸腾起来。波扎尔斯基用手指着天空。头顶上出现了法西斯的飞机，分成几批，象一群大雁似的自由自在地飞翔着。炮弹的爆炸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使人无法讲话。我看了波扎尔斯基一眼，他从眼神明白了我的意思，抓起图囊和望远镜，就向自己的指挥所跑去。我也急忙地走向自己的指挥所。

烟雾和尘土四处飞场，遮天蔽日，空中弥漫着臭味。我来到掩蔽部，正准备用脚踢开门，突然，一股爆炸的气浪，把我推进房间。进门后，我见克雷洛夫和古罗夫坐在凳子上，两人手里都握着话筒。旁边站着集团军通信主任尤林上校，他正在向克雷洛夫报告着什么。

“通信情况怎么样？”我问：

“经常中断，我们已接通无线电，用明码通话。”尤林报告说。

“这还不够……”我冲着他大声说：“要动用河左岸的预备通信枢纽部，让它发挥作用，重复发报并向我们通报情况。”

尤林明白我的意思后，走了出去。我沿 F 形坑道掩蔽部走过去。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男女通信兵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看着我，想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猜出我的心情和前线的战况。为了向他们表明，什么重大事情也没有发生，我沉着而又缓慢地走向掩蔽部，又从那头走回来，从 F 形掩蔽部的另一出口走到大街上。

我在街上、特别是在拖拉机厂方向上所看到和听到的，难以用笔墨描述。俯冲轰炸机的发动机嗡嗡作响，炸弹雨点般纷纷落下，高射炮弹的曳光弹道划破长空，在空中爆炸开花。

四周一片轰鸣、呻吟声。用大桶搭成的横跨杰涅日内河的徒步桥被炸断，并被水冲出老远。

远处，一片残垣断壁，拖拉机厂的厂房在熊熊燃烧。

我命令集团军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组织两个“卡秋莎”营齐射：一个射向硅制品厂；另一个射向体育场前面敌部队的集结处。然后，我又打电话给空军集团军司令员赫留金将军，请求他设法让法西斯的飞贼安份点儿。赫留金将军直率地说，目前实在爱莫能助。敌人严密封锁了集团军的各个机场，我们的航空兵暂时还无法突击斯大林格勒。

军事委员会委员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情况便十分清楚了。敌人投入了全部力量对付第 62 集团军。敌人在人力、技术装备和火力上都占有优势，必定力求分割包围第 62 集团军，进而各个歼灭。目前敌人主要突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之间的地带。其近期目标是突至伏尔加河。从敌人投入战斗的兵力和武器来分析，可以看出，敌人竭尽全力阻止我强大增援部队渡过伏尔加河增援我部，阻挠我向斯大林格勒输送弹药。近几天，我们第 62 集团军面临着孤军进行前所未有的残酷斗争的局势。

我们的掩蔽部象发疟疾一样颤抖着，大地隆隆作响，声音象针扎般地刺耳。沙土从顶棚上直掉下来，在角落里和顶棚上的木头附近，什么东西噼啪作响，附近大炸弹爆炸引起的震动，使我们的掩蔽部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我们已无处可去。有时实在喘不过气来，我们便不顾炸弹、炮弹在附近爆炸，轮流走出掩蔽部去换换空气。

那天，我们一整天没有看见太阳，只有一个栗色的亮点高悬在当空，难得从烟雾中透露一线光亮。

在强大火力地掩护下，敌 3 个步兵师、2 个坦克师，在宽约 6 公里的正面上，对我战斗队形发起总攻。我步兵第 112、第 95、第 308 师和近卫第 37 师遭到主要突击。由于先前的一些战斗受到损失，我各兵团，尤其是第 112 师和第 95 师的兵力极大地削弱了。敌人占优势：在人员和火炮上比我超出 0.7 倍；坦克超出 2.8 倍；作战飞机超出 4 倍以上。

敌步兵和坦克于清晨 8 时向我阵地发起进攻。第一次进攻被击退，阵地前沿燃烧着 10 辆坦克。敌人死、伤不计其数。1 个半小时后，敌人以更多的兵力再度发起进攻。敌人更加准确地朝我们的火力点射击，强大的火力压制着我们，使我们在阵地上无法抬头。

10 时，近卫第 37 师第 109 团被敌坦克和步兵击溃。该团战士钻进地下室和楼房，在包围中继续战斗。敌人使用了喷火器对付他们。我们的战士只

得一边回击，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一边扑灭烈火。

敌人一颗航空炸弹在集团军指挥所附近爆炸，炸塌了 2 个掩蔽部。警卫连的战士们和司令部的一些工作人员赶紧挖土抢救自己的同志。一名军官被圆木头压住了腿。同志们试图挖出圆木，这时，上面的碎土落下来，又重重地压在这个军官的腿上。他恳求同志们把他的腿砍掉或锯断。可是，谁能忍心下手呢？而这一切，都是在大炮的连续射击和飞机的轰炸下发生的。

11 时接到报告：步兵第 112 师左翼也被突破。大约 50 辆坦克正要碾过该师战斗队形。

该师曾历尽艰险，在顿河西、顿河、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等地，参加过许多战斗。到 10 月 13 日，只剩下以师长叶尔莫尔金上校为首的不足一千名战士了。他们组成零散小分队和守备部队，在各个独楼里，在拖拉机厂的车间里，在尼日内镇和伏尔加河的陡坡上，英勇战斗。

11 时 50 分，敌人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体育场。深深地楔入我防御阵地，离拖拉机厂不到一公里了。体育场南面是一片石头建筑物，有个叫做六面街区的地方已成为我军的支撑点。守卫它的是近卫步兵第 109 团的一个营，配备有火炮。这个街区已几经易手。团长奥梅利琴科亲自率领反冲击的分队作战。

集团军司令部通信枢纽部从无线电里截收到一些明码报告。我抄录如下：“德国鬼子到处出动坦克进攻……我们的坦克在阿纳尼耶沃地段作战击伤它们 4 辆，而在特卡琴科附近，击伤 2 辆，第 118 团 2 营的近卫军人击毁 2 辆。第 3 营正坚守着冲沟一带的阵地，但坦克纵队已突进扬塔尔纳亚。”

近卫第 37 师的炮兵报告：

“我们将炮口直接对着坦克射击，击毁 5 辆。”

师参谋长布鲁什科同志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

“被敌坦克楔子分割开的普斯塔夫加罗夫的近卫军人们（近卫第 114 团），组成小分队，固守在楼房和废墟里，在敌合围中战斗。敌坦克潮水般冲击着坚守在阿纳尼耶沃的一个营。近卫军中尉伊万诺夫和指导员叶鲁希莫维奇指挥的该营 6 连的官兵全部战死，只有一些通信员幸免于难。”

12 时，无线电传来近卫第 117 团的报告：

“团长安德烈耶夫牺牲，敌人包围了我们，我们宁死不降。”

这个团没有被消灭；团指挥所附近躺着上百名德寇尸体，而我们的近卫军人们仍然活着继续打击敌人。

古季耶夫的步兵第 308 师各团报告：

“坦克从北面向阵地攻来，战斗异常激烈。我炮兵直接对准坦克射击。我部遭受伤亡，特别是来自敌机的轰炸和扫射，请求赶走飞贼。”

12 时 30 分，敌俯冲轰炸机轰炸了近卫第 37 师指挥所。师长若卢杰夫将军被埋在掩蔽部里。同他失去了联络。集团军司令部承担起指挥该师部队的任务。通信线路和无线电台过载。挖找若卢杰夫将军及其司令部人员的工作仍在继续，已采取了措施往掩蔽部里输送空气（插进一根金属管）。15 时，浑身湿透、沾满尘土的若卢杰夫将军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向我们报告：

“同志们！近卫第 37 师仍在战斗，我们决不后退！”说完立即走下台阶，双手捂住脸颊。

在戈里什内的步兵第 95 师地段上，从早晨 8 时起，也进行了一场严酷无比的战斗。第 3 炮兵连排长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基米罗夫中尉

回忆到：

“10月14日那个晴朗的早晨是从一阵山崩地裂声中开始的，我是我们在以往的战斗中从未遇到过的。上百架飞机在空中嗡嗡地盘旋着，到处响着炸弹和炮弹的爆炸声。一团团的烟云和尘雾笼罩着天空。简直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大家都明白，德寇重新发起了强大的进攻。电话通信很快中断了。战士们冒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走到大炮旁，射出一排排炮弹。我们炮兵连的观察所被包围；但连长雅西科同志依然沉着镇定。他整整一夜指挥着炮连打击法西斯分子，当法西斯分子逼近观察所时；他往往呼唤炮连向自己开火。清晨他成功地突围。由于敌人的轰炸和扫射，我们每门炮只剩下2—3人。尽管如此，我们丝毫没有动摇。连长雅西科被埋在土里，许多人被震聋。轰炸和扫射还在继续。四周一片火海，尘土飞扬。人员在伤亡，装备在毁坏，但我们仍不停地射击、射击。”

我们的炮兵就是这样同其它兵种并肩战斗。

13时10分接到报告：集团军指挥所有2个掩蔽部被炸塌，人员有伤亡。

14时左右，同所有部队的电话通信都中断了，只有电台在工作，也是断断续续，时有时无。为了恢复通信，派出了一些军官。但这联络速度太慢，他们带来的情况往往为时太晚。

到15时，敌坦克深深地楔入我战斗队形，前出到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地区。我守卫部队虽已不成建制，但他们在合围中英勇作战，牵制了敌人的行动。他们用火力切断敌步兵坦克间的联系，敌坦克在没有步兵配合的情况下龟缩不前，成为我炮兵和防坦克枪手的活靶子。然而，敌坦克仍在下午15时前突入到集团军指挥所前面，距离我们只有300米。司令部警卫连投入战斗。如果敌人再靠近的话，我们就要亲自上阵同德军坦克搏斗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再撤退了，否则，我们将会丢掉最后的一些通信和指挥器材。

在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隐蔽着坦克第84旅的约10辆坦克。其任务不是反攻击，而是设伏，以防德军突破。15时，德军坦克潮水般地直扑斯库利普图尔公园，在那儿遭到伏击。我们的坦克手狠狠地打击德国坦克，弹无虚发。德军企图夺取这个支撑点，但10月14日至16日一连三日都没有得逞。保卢斯的航空兵不得不出动几百架次飞机来对付坦克兵的这个支撑点，直到17日敌航空兵才把它摧毁。

敌人不顾惨重伤亡，仍向前推进。敌自动枪手已楔入我部战斗队形之间形成的缺口。几天来，德军多次与我司令部警卫连交火。

16日35分，团长乌斯季诺夫中校请求向他的指挥所开炮，法西斯分子已逼近指挥所，并向里扔手榴弹。向自己的指挥员开炮，这个命令是很难下的。最后，波扎尔斯基将军还是不得不下令让“卡秋莎”营发射一个齐射。炮火成功压制了敌人，给敌以重创。

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的防御中，工人支队和部队分队一起，战斗到弹尽粮绝。在这些由斯大林格勒工人组成的支队里，有国内战争时期察里津保卫战的参加者，大多数是共产党员。10月14日下午，保卫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的工人支队，同逼近的敌先遣分队展开激战。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和若卢杰夫的第37师的部队和分队，歼灭了工厂前面广场上和通往工厂的街道上的敌人。戈里什内和古尔季耶夫和第95、第308师的部队，

与武装起来的工厂工人一起，以“街垒”工厂车间为依托，狠狠地痛击通往工厂的街道上的敌人。他们得到了 C·H·别雷的坦克第 84 旅的支援。几千具法西斯分子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广场和街道上，几十辆燃烧着和击毁的坦克堵塞了大街和通道，然而，敌人仍有一些零星的分队突入到伏尔加河岸、尤其是工厂之间的河岸。决不能给敌人在那里有立足喘息的机会。在左岸炮火的配合下，我军从两翼合力围攻，打得敌人遗尸遍地，落荒而逃。

敌人依仗强大的航空兵突击力量和坦克、步兵的优势，有时在某些基点上突破我防御。

第 62 集团军被拦腰切断。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之间约 1.5 公里的地带，被敌人牢牢控制。敌火力扫射着通往杰涅日纳亚沃洛日卡的所有冲沟。我们的联络军官无法穿越到拖拉机厂。从我们的指挥所可以清楚地看见拖们机厂，但看不到工厂车间里进行着的战斗。我们唯一能够向我们的战士们提供的支援就是炮火。炮兵一直由我们亲自掌握。

德国将军德尔在其《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对进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作了以下的描述：

“10 月 14 日，打响了当时最大的一次战役：数师（其中包括坦克第 14 师、步兵第 305 和第 389 师）并举对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厂发起进攻。俄国的第 62 集团军司令部就设在该厂东边。为此，从战线的四面八方，甚至从驻扎在顿河和卡尔梅克草原的部队侧翼，抽调了大批增援部队、工程部队、反坦克部队和分队，尽管这些部队在原驻地也是必不可少。还从德国空运了 5 个兵工营到作战地域。空军第 8 军也全力支持此次进攻。

进攻部队向前推进了 2 公里，但未能彻底摧垮防御该厂的 3 个俄国师的抵抗，并占领陡峭的伏尔加河河岸。即使我军日间能在战线的某些地段突至河岸，夜间还得被迫退出，因为隐藏在冲沟里的俄国人切断了他们与后方的联系。”

德尔：《进军斯大林格勒》，莫斯科，1957 年版，第 57 页。

事实上，当时防御拖拉机厂的，并不是德尔将军所说的有 3 个师，而是基本上只有 1 个师，即若卢杰夫的近卫军第 37 师，外加步兵第 112 师的 600 名官兵。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援引我们 10 月 14 日的战报如下：

“集团军在步兵第 112 师、近卫第 37 师、步兵第 308 和第 95 师的地段，与进攻的敌步兵和坦克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在战线的其它地段，击退了敌小股步兵和坦克进攻，牢固地坚守了阵地。我炮兵对进攻的敌步兵和坦克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敌以优势兵力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实施了主要突击，日终前，已迫近工厂，那里现在正进行激烈的战斗。

敌人在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实施主要突击的同时，经过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之后，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下，以 3 个步兵师和 2 个坦克师的兵力，在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硅制品厂一线转入进攻。

敌航空兵以连续不断的密集突击，轰炸和攻击我部队的战斗队形、整个沿岸地带和所有渡口。夜幕降临后，轰炸还在继续。敌人一天内出动了大约 3 千架次飞机。”

我们，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各师、团指挥员都知道敌人在准备以优势

兵力发动强大攻势，但是坦白地讲，这样大规模的突击，却是我们未能预料到的。我们明白，决战已经到来，而且不会很快结束。如果我们顶住这次攻势，希特勒分子未必能够再次调集到这样强大的兵力和这样大量的武器装备。我们感到，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敌人，都已到了关键时刻。

10月15日的战报说：

“集团军正在战线的北段和中段进行艰苦的防御战。南段正反击敌小股步兵和坦克的进攻。敌人投入生力军（步兵第305师），继续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向南、向“街垒”工厂方向发展进攻，并向斯帕尔塔诺夫卡和雷诺克发起进攻，企图沿伏尔加河前出至集团军后方。10月15日日终前，敌人攻占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切断了近卫步兵第37师和步兵第95师之间的防御正面，并以其先遣部队插入步兵第308师后方，前出到集团军指挥所。

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在距指挥所300米投入战斗。”

到16时，叶尔莫尔金、若卢杰夫的部队和古尔季耶夫师的右翼被敌坦克分割，正在合围中作战。

来自部队的报告时常有矛盾，越来越难以查明真伪。各团、师的指挥所、观察所被炮弹和炸弹摧毁，许多指挥员阵亡。集团军指挥所里牺牲了30人。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都来不及把埋在炸塌了的掩蔽部里的人救出来。对部队的指挥主要通过无线电来实施，办法是：从早上起，接通了设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备用电台，我们通过无线电把各种命令先发送给电台，然后由电台再转发到伏尔加河右岸的各部队。

战斗日夜不息。被包围和分割的防守部队仍在继续战斗，他们通过无线电宣告：“为了祖国，宁死不降！”从而使我们知道他们仍然存在。

10月15日午夜前获悉，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拖拉机厂，战斗正在各车间里进行。

3

通信线路被破坏，战火不仅在右岸燃烧，而且烧到了伏尔加河左岸，我们的预备指挥所就设在那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们集团军的炮兵主力和方面军的全部炮兵都在河左岸。

我向方面军首长请示，能否允许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些部门到河左岸的预备指挥所去，前提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全部留在城里。我们的意图是，在集团军指挥所万一被摧毁的情况下，能保证从左岸继续指挥部队。

“我不同意，”我得到答复。

可是，军事委员会的掩蔽部越来越拥挤。若卢杰夫师和坦克第84旅的司令部被摧毁，人们纷纷来到这里，他们在这儿只能躲避炮弹和轰炸，但怎么能指挥自己的部队呢？

我担着风险建议炮兵司令波扎尔斯基将军渡河到左岸去，从那儿指挥炮兵。他几乎是含着眼泪说：

“我不去……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要死一起死……”

他就是不走，我只好让走。实际上，他在左岸会更好地指挥炮兵。

我们接到部队和兵团的许多令人焦虑的报告。有的请求支援，有的请示该干什么，如何干。对这些问题，我们简短明确地回答：战斗到底，决不后退！部队伤亡很大：10月15日，若卢杰夫师和戈里什内师的战斗人员伤亡约75%。尽管这样，这天法西斯的多次进攻都被击退，未能前进一步。敌人损失了33辆坦克，约3个营的步兵。

从 10 月 15 日早晨起，敌人又投入生力军（步兵第 305 师）继续沿伏尔加河向南和向北发展进攻。敌炮兵对我战斗队形从头到尾轰了个遍，航空兵仍象过去一样，往城里投下了几千枚炸弹。

尽管如此，被拦腰切断的我集团军仍在继续拼搏。北集群（步兵第 124、第 115、第 149 旅和叶尔莫尔金一部）在合围中与敌优势兵力展开一场激战，敌人是从北面由拉塔尚卡开始、西面沿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河谷，并由拖拉机厂发起进攻。与该集群部队的联系不时地中断。

10 月 15 日夜，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师的 1 个团调到伏尔加河右岸，我们立即命令该团在“街垒”工厂以北投入战斗，这儿是我部最薄弱的防御正面。

当夜，加强有数个机械化团的敌步兵第 389 师和坦克第 16 师，再度发起进攻，企图消灭在合围中坚持战斗、守卫着雷诺克和斯帕尔塔诺夫卡镇的北集群部队。从 10 月 16 日早晨起，敌 3 个步兵师（第 305、第 100 和第 94 师）和 2 个坦克师（第 14 和第 24 师）投入沿伏尔加河向南的进攻，企图击溃我战斗队形。

已大大削弱了的若卢杰夫师和戈里什内师的部队以及柳德尼科夫师的一个团，与坦克第 84 旅一起，同得到航空兵和炮兵加强的敌 5 个师的兵力，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苏军步兵的火力，还以重大损失为代价、穿过德国飞机群的拦截、来到城市上空的我强击航空兵，再加上包括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炮在内的我炮兵，重创了希特勒匪帮。

希特勒分子在进攻初期气焰不可一世。但现在，他们甚至在对付决心以死相拼、决不放过敌人的我零散部队，也显得束手无策。

在争夺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的战斗中，我侦察人员同时还发现，敌一重兵集团正准备从沙赫京斯卡亚大街和 107.5 高地向“红十月”工厂实施突击。侦察员缴获了一些文件，并抓了敌工兵部队的一些俘虏。这些工兵部队是从刻赤、米列罗沃、甚至从德国本土空运到这里来的。

我们密切地注意着这些地段的情况，一再要求斯梅霍特沃罗夫、古里耶夫、巴秋克、罗季姆采夫等师，加强工事，积极侦察，以强击队的作战行动去消灭侵略者。

保卢斯的战术意图十分明显：竭力把我主力吸引到工厂地域，并牵制在那儿，然后，准备悄悄地在新地段实施突击。

但是，他的这套伎俩并没有使我们丧失警惕。我们的侦察员揭露了他的意图，因此，敌人的每次突击都遇到我预有准备的防御。

例如：10 月 16 日日，敌大批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沿拖拉机厂至“街垒”工厂的道路发起进攻。敌人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实施了决定性的主要突击。而在这儿，敌人遇上隐蔽在地下的第 84 旅的坦克。在特拉姆瓦伊纳亚街及其以西地域，我坦克部队从 100—200 米的距离上，以齐射反击敌人的进攻。顷刻间，敌十余辆坦克中弹起火。希特勒匪徒的攻势受到挫折。这时，我炮兵从左岸向受阻的敌步兵和坦克实施了歼灭性的炮击。

希特勒的将军们远离战场，看不到在主要突击地段上的战况，不断地让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潮水般涌向我防御地区。就在这里，我“卡秋莎”以猛烈的齐射歼灭敌人，并阻止他们的进攻。敌坦克落入我伪装得很好的 T—34 型坦克和反坦克火炮的火力网内，遭到致命的打击，丢下步兵，转身逃了回去。

我的负责坦克部队的副手 M·T·魏因鲁布和坦克第

84 旅旅长 C·H·别雷，事先做了精心准备。10 月 16 日，他们为希特勒分子准备了一个啃不动的硬“胡桃”。直到当天下午，德军首脑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知道其主力碰上了什么，随即向这一地域出动了航空兵。在集团军正面的其它地段，敌人的进攻也屡遭挫折。

整整一天，我们都取得了胜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10 月 16 日夜，柳德尼科夫师的另外两个团也渡过河来，并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在沃尔霍夫斯特罗耶夫斯卡亚大街、“街垒”工厂，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地区与若卢杰夫师和戈里什内师的零散部队会合。柳德尼科夫的司令部也设置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掩蔽部里。已没有其它可容身之地了。

柳德尼科夫的步兵第 138 师是从第 64 集团军的编成调

到斯大林格勒来的，当然，不是全部人马。该师在顿河、尔后在阿克赛河和在第 64 集团军时曾遭到很大损失。

当夜，我接到通知，方面军司令员 A·A·叶廖缅科上将及其副手 M·M·波波夫中将要到我们这儿来。

我和军事委员古罗夫一同赶去码头迎接他们。炮弹在周围爆炸、轰隆声响个不停，德国人的六管火箭炮不停地轰击着伏尔加河。好几百个伤员向码头、渡口爬去。走在路上，常常要跨过一些尸体。

我们不知道方面军司令员乘坐的快艇在何处靠岸，只好沿河岸蹒跚寻找一阵，没有找到，便回到了掩蔽部……令人惊讶的是，叶廖缅科将军和波波夫将军已经在指挥所里。

在他们眼前是一片凄凉景象。指挥所的掩蔽部象个大弹坑，一根根圆大头从土里露出。

岸上的所有物品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煤渣和尘土……。

在黎明分手时，我向方面军司令员要求补充兵力和弹药，我们不要整师的补充，只要求补充一些分队。弹药要多些，因弹药尤其缺乏。

“好吧，我们一定满足你的要求”。司令员说。他边走边建议，说鉴于第 138 师已赶到，可变换一下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沿伏尔加河右岸向南迁移一点。

10 月 17 日这一天是在艰苦的防御战中度过的。北集群的部队仍然在包围中作战。20 多辆德国坦克掩护着自动枪手突至斯帕尔塔诺夫卡镇南郊。在那里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指挥员稍微有一点软弱或惊慌，都会使整个集群遭到覆灭。

防御雷诺克和斯帕尔塔诺夫卡镇的步兵第 124、第 115 和第 149 旅的部队和分队，按照敌人的战报材料，已多次“被全歼”了。但这种荒唐事只有在希特勒司令部的情报中才会出现。

10 月 15 日，“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向希特勒统帅部报告：“被围在斯帕尔塔诺夫卡工人区的苏联兵团已被消灭”。然而，10 月 20 日，总参谋长却向希特勒报告：“敌坦克第 16 师和步兵第 94 师的部队已突入斯帕尔塔诺夫卡西部，并占领了一片房屋”。

（看，这就是所谓的“歼灭”！）

10 月 19 日，第 4 航空队司令里希特霍芬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格勒的战况很不明朗。各师报来的都是喜报……每个师报告的

情况都不一样。

对斯大林格勒北边的斯帕尔塔诺夫卡的进攻已经受挫。

空军第 7 军军长菲比希将军很沮丧，他抱怨步兵没有利用他的飞机所取得的战果。”

里希特霍芬指责保卢斯和赛德利茨说：德国步兵不会利用飞机在“步兵投弹距离上”进行轰炸的战果，“对俄国人显得毫无办法”。

沃尔弗冈·韦尔滕在《坦克第 16 师战史》一书中写道：“坦克第 16 师接受了全力进攻雷诺克的任务……各团和东伯爵的 25 辆坦克……对雷诺克的进攻遭到失败。坦克第 16 师损失惨重，已有 4 千多名官兵埋葬在士兵公墓。”我们收到第 124 和第 115 旅旅长的电报，他们请求允许其司令部转移到斯波尔内岛。我答复他们说，他们从伏尔加河右岸撤退无异于从战场逃跑。电报发出后，我把作战处长 C·M·卡梅宁上校派到北集群，以查明这一地段的态势和情况。

这时，敌人继续从拖拉机厂至“街垒”工厂一带向南进攻。敌航空兵的几百架俯冲飞机和轰炸机对第 84 旅的坦克隐蔽地段进行狂轰滥炸。楼房起火，大地一片火海，隐蔽在该地域的也在燃烧，因为高炮无法可靠地掩护部队，人员和装备都遭受了损失。

同一天，几股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突至“街垒”工厂的西北扇形区。

该厂的工人武装支队投入了战斗。

戈里什内师的残余部队被合编成第 161 团，在索尔莫夫斯卡亚大街占领防御和进行战斗。我们让该师的司令部和两个团的司令部移到左岸，进行补充。

古尔季耶夫和第 308 师，整整一天在体育场地域反击敌坦克和步兵的进攻。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 193 师的部队，在哥萨克大街地域多次击退敌步兵和坦克的进攻。古尔季耶夫师的处境很难，其两翼已被敌人合围。黄昏前，有一个营的希特勒份子与坦克一起楔入谢韦尔纳亚大街。

在古里耶夫师和巴秋克师地段上，敌人的全部进攻均被击退。10 月 17 日这一天，共击毁和烧毁敌坦克 40 辆，歼灭敌步兵约 2000 名。

10 月 17 日晚，军事委员古罗夫通知，从莫斯科来的党中央委员 C·J·马努伊尔斯基同志，想到我们城市里来，并说他已经同意，我坚决反对，并要求古罗夫改变这个决定。古罗夫不同意。于是，我说：

“马努伊尔斯基是党的著名人物。我们不能拿他的生命冒险，他有可能在渡伏尔加河时牺牲。就是活着，我们也下能让到他部队去。”

古罗夫同意了 my 意见。

马努伊尔斯基同志知道了这件事。1947 年，他从美国回莫斯科，途经柏林。我们在机场见了面。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同我坐在一起，不停地埋怨我，说我不该不让他到伏尔加河右岸我的指挥所去。

听完后，我这样回答他：“如果 1942 年我同意您到我们那儿去，那么，今天恐怕桌旁就没有您这位交谈者了。”

争夺“红十月”工厂的恶战已迫在眉睫。侦察情报证实了这一点。为了更好地指挥部队，得到方面军司令部的同意后，我们决定把指挥所转移到铁路大桥附近的班内沟，这儿离“红十月”工厂较近。

10 月 17 日夜，集团军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带着文件和指挥器材离开掩蔽部。到达班内沟后，我们费了很长时间寻找安置集团军指挥所的地点，

好几次遭到敌人机枪的扫射。

很显然，这儿不适合安置集团军指挥所，我们只得沿伏尔加河岸间南走了约一公里。最后，直接在露天的、没有任何遮掩的伏尔加河岸上展开工作。我们离战斗的最前沿——马耶夫岗只有1公里。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处指挥所，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这儿。

10月18日，我派往北集群的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卡梅宁上校从那边给我送来报告，说那儿的态势很严重，但并不是不可挽救。突入斯帕尔塔诺夫卡的敌人已被消灭。该集群的部队沿雷诺克镇北部、斯帕尔塔诺夫卡西郊和南郊、包括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口附近的码头一线占领防御。这个报告使我们稍微松了口气，不必再为集团军右翼操心了。

这一天的主要战斗仍是争夺“街垒”工厂，并向南扩展到“红十月”工厂，柳德尼科夫、若卢杰夫、古尔季耶夫的部队，整整一昼夜反击着敌人由北向“街垒”工厂和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的进攻。15时，敌人在杰列文斯卡亚大街以南突破我防御正面，前出到伏尔加河。第650团以刺刀反冲击消灭了突至伏尔加河的希特勒分子，恢复了态势。

日终前，敌步兵和坦克沿特拉姆瓦伊纳亚大街突破我战斗队形，逼近“堡垒”工厂西边的铁路。留在工厂里的工人支队，投入了持续数天的激烈战斗。这场战斗结束时，整个支队只剩下5人。

斯梅霍特沃罗夫的部队，从早晨起，就反击从西面进犯的敌步兵和坦克。11时30分，该师右翼被突破，给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附近的古尔季耶夫部队造成有可能被包围的严重威胁。为了消除这一威胁，我只好在这个城市的整个战斗期间，第一次命令部队向后、向伏尔加河撤退200—300米。这样，我们就拉平了战线，压缩了战斗队形。

命令中没有使用撤退一词，而是这样说的：

“古尔季耶夫师应于10月19日4时前，在索尔莫夫斯卡亚大街、图皮科夫斯卡亚大街……的地段占领防御”。这就是说，从斯库利普图尔内公园地域后撤至新的阵地。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是怀着多么痛苦的心情签署了这项命令，伏尔加河地区的每一米土地，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呵……

据不完全统计，10月18日这一天，敌人有18辆坦克被击毁，约两个营的步兵被消灭。

鉴于敌人突至集团军的最后的一个渡口、并前出到步兵第193师后方所造成的威胁，我决定将其右翼向“街垒”工厂西南边附近的铁路岔口撤退。

10月18日，我们感到敌人的攻势、特别是航空兵的突击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我们的部队。敌人一昼夜间只在某些地段向前推进了50—100米，敌人已开始力不从心。

可以看出，不仅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侵略者也不能无休止地重复疯狂的进攻。他们已大伤元气。敌人的物资储备也消耗殆尽。敌航空兵突击从一昼夜3千架次骤减到1千架次。

尽管损失惨重，保卢斯仍不肯放弃夺取整个城市的意图。战场上又出现了敌新锐的步兵和坦克部队，他们不顾一切地向前、向伏尔加河扑来。看来，希特勒为了夺取这座城市，准备把整个德国都葬送掉。

但是，希特勒分子已是江河日下，连其生力部队和援兵，现在也尝到

伏尔加河河岸上的战斗究竟是什么滋味。下面摘录的是敌步兵第 79 师第 226 团下士约瑟夫·沙夫施泰因的一段日记：

“戈罗季谢离斯大林格勒不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今天第一次看见了伏尔加河。我们的进攻毫无结果，进攻开始还顺利，后来又向后撤退……夜间，猛烈的轰炸。我们想，我们要完了……第二天，进攻仍然没有结果，还是残酷的战斗。敌人从四面八方、从所有的墙缝、罅隙里射击着，不能露面……夜间，飞机、大炮和俄国的‘卡秋莎’使人不得安宁，损失惨重。”

在争夺伏尔加河畔这座城市的会战中，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和士兵的威力。敌人越凶恶，我们的战士作战就越勇敢顽强。幸免于难的战士在全力保护着自己，守卫着自己的阵地，发誓要为自己和牺牲了的战友们报仇。常有这种情况，受轻伤的战士不仅为被后送到伏尔加河彼岸、甚至为后送到最近的卫生所而感到惭愧。

10 月 19 日和 20 日，集团军在斯帕尔塔诺夫卡、“街垒”工厂和“红十月”工厂前面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两天两夜的进攻，并没有给它带来任何重大战果。

我们昼夜不停地战斗，迫使希特勒分子不仅在日间、而且在夜间也得发动进攻。但是，德国人的夜间进攻通常是在没有航空兵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不会有任何效果，经常只是进行枪战而已。

但是，我们已获知并看到，敌人正在巴里卡德镇和 107.5 高地地域集结兵力。敌人准备以生力部队发动新的突击。因此，我们也该精确地计算一下自己的兵力，以便迎击敌人的连续攻击，腾出或积蓄力量，用在新的方向上进行反击。

我们只能依靠集团军的后勤部队和从各师卫生营里康复出院的人员来补充。集团军司令部的一批参谋被派往后勤机关。一名饲养员要负责 5—7 匹马。缩减了各工厂和仓库的编制。裁缝、靴匠和其它专门人员被组成补充连，开拔到河右岸。这些原来很少受过训练或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到城里以后，很快就成为巷战的专家能手。紧张的局势迫使每个人都要认识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实质。

这些战士说：“向右岸开进时，心里非常害怕。但一踏上这块土地，恐惧就消失了。我们只知道一点：伏尔加河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没有退路可走，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消灭侵略者。”

4

10 月 21 日和 22 日，法西斯的生力部队沿公社大街和中央大街对斯梅霍特沃罗夫师和古里耶夫师发动进攻。从这天起，争夺“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和我伏尔加河渡口的战斗日趋激烈。

敌航空兵又开始每昼夜出动 2000 架次。两天来，敌人损失了 15 辆坦克、1000 余名步兵。德军阵地距我阵地很近，近得我们能够使用喷火器。喷火器能在 100 米之内喷火，烧死一切生物。

10 月 23 日，敌人把补充后的步兵第 79 师连同坦克一起投入战斗。他们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其主要突击方向指向中央大街、卡鲁谢利纳大街和“红十月”工厂，现在，战斗重心转移到“街垒”工厂至班内沟一带地段上。

日终前，敌人以巨大损失为代价，突入斯大林纳大街（至面包厂），并越过堆满被击毁的车厢的工厂专用铁路。约有一个连的敌自动枪手渗入到

“红十月”工厂西北的扇形地区。战斗前沿向伏尔加河岸接近了约 300—500 米，对集团军的最后一个渡口构成严重威胁。

黄昏时分，我们的炮兵对集结在“红十月”工厂接近地上的敌坦克和步兵实施了猛烈的突击，这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德军的进攻，并缓解了我防御部队的压力。

10 月 24 日晨，敌人的第一轮进攻被击退，损失惨重。于是，敌人投入了第二梯队和预备队。16 时 30 分，经过激战，敌人占领了“街垒”工厂的中部和西南部。

大约 2 个营的敌步兵和 17 辆坦克，沿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卡亚大街逼近“红十月”工厂的西北大门。古里耶夫师的第 117 团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但希特勒的几小股自动枪手突入了工厂车间。

如果说在 10 月 18 日至 23 日这段时间，敌人把主力集中去对付“街垒”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卡的话，那么，从 10 月 24 日起，敌人又以新的兵力对“红十月”工厂实施了猛攻。

战斗越持久，就越紧张、残酷。

遭到我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后，保卢斯的攻势开始明显地减弱。在签署 1942 年 10 月 24 日的战报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是日，集团军在战线的北段和中段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在南段同敌小股步兵进行了战斗。

敌人经过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之后，投入生力部队和坦克，于 11 时，恢复了对“堡垒”、“红十月”和斯帕尔塔诺夫卡镇的进攻。

是日，北集群部队击退了敌人的全部进攻。夜间，将突入之敌驱逐回去，并全部占领了斯帕尔塔诺夫卡镇。

上午 9 时，敌人开始进攻。经过苦战，日终前，敌人占领了“街垒”工厂中部和西南部。我步兵第 138 师和第 308 师正进行争夺“堡垒”工厂的战斗。

步兵 193 师从 11 时起反击敌步兵和坦克的进攻，敌人以生力部队从图皮科瓦亚大街沿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卡亚大街向“红十月”工厂北端发展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企图沿斯大利纳亚大街进逼伏尔加河。18 时，敌坦克在我步兵第 895 团地段前出至该团指挥所，敌步兵紧跟坦克突入我已稀疏的战斗队形。战斗仍在继续。

近卫第 39 师正在进行争夺“红十月”工厂的战斗。敌一部已楔入工厂西北部。

集团司令部有 4 个掩蔽部被炸弹直接击中，倒塌了，死伤 15 人以上。步兵 1045 团团长季莫申中校不幸牺牲。

缴获的文件和俘虏证明，在集团军正面作战的敌人共有 7 个步兵师、3 个坦克师。其中包括：坦克第 14、第 24 和第 16 师；步兵第 71、第 94、第 100、第 295、第 389、第 305 和第 79 师。敌人正在佩斯昌卡地域集结约 1 个师的摩托化部队。在一天之内，敌机出动了约 1500 架次。

我决定：将步兵第 45 师的 2 个步兵营分别转隶近卫步兵第 193 师和近卫步兵第 39 师，任务是恢复这两个师在谢韦纳亚大街和图皮瓦亚大街铁路一线的防御正面，决不许敌人继续前进。”

孤注一掷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和当前的战斗进程，可以看出，敌人同我们一样都精疲力尽。10 天的战斗，敌人再次将我集团军分割为两部分，并占领了拖拉机厂，但它未能消灭我集团军主力。

敌人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兵器上都无力达到这一点。因此，敌人只好从纵深调来预备队投入战斗，甚至从德国本土调来生力部队。

我集团军正面不仅出现了新的德国师，如步兵第 44 师，还有匆忙用飞机调来的独立团、独立营。但这仍无济于事。敌人迫不得已从宽广正面的各师抽出许多营，特别是工兵营，并把它们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以图摧垮我军的抵抗，但是，这些匆忙投入战斗的部队和分队，很快就被我们歼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战火中。

尽管希特勒再次实施突击的兵力已不够了，然而，他不尝试一下，是不会轻易就把主动权交给我们的。

经过十月份的艰苦战斗之后，我们的指挥员明白，希特勒在短期内是无法再准备这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了。敌人那一堆堆来不及收拾的尸体和被击毁的装备都证实，对进攻者来说，要跨过他们自己留下的这些“障碍物”向前推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战士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做出了自己的结论。而他们的结论是很少有错误的。

9 月底，希特勒在国会的一次演讲时说：“我们正在攻占斯大林格勒，我们一定会夺取它，这一点你们可以相信。一旦我们占领了它，就别想让我们退出。”戈培尔在同土耳其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是个言谈谨慎的人，我可以自信地对你们说，冬季来临之前，俄国军队再不会对德国构成威胁了。我讲这一点时，我深信事情的发展会象往常一样，它是不会辜负我的。我请你们过几个月之后再回忆我的这次谈话。”

很难相信，希特勒和戈培尔竟不了解直接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自己的官兵的心情。从德军军官 9 月 10 月份的一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局势的不同评价。其中有一些人看来还没有尝到斯大林格勒交战的滋味，例如，黑内斯中尉在 10 月初写到：“我们正在攻占斯大林格勒。元首说，‘必须攻下斯大林格勒’，我们回答：‘它正在陷落，斯大林格勒很快就会落在我们手里。今年，我们的冬季战场将是伏尔加河。’”

然而，到十月底，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德国士兵的信件中，完全是另一种论调。

上等兵瓦尔特写到：“斯大林格勒简直是地球上的一座地狱；是另一个凡尔登，有新式武器装备的红色凡尔登。我们天天进攻，即使我们早上攻占了 20 米，可是一到晚上，俄国人又夺了回去。”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与德军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要塞凡尔登地区进行血战，德军死伤惨重，未能攻下凡尔登。——译注。

上等兵中 φ·贝斯特在给母亲的信中悲观地写到：“要想使斯大林格勒成为我们的，恐怕还得等很长时间。俄国人投降，他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第 6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这样评价形势：保卢斯目前不可能重新发动象

10月14日至25日那样的强大攻势。为此，他需要一个较长的喘息时间（10—20天），需要运送大批的炮弹、炸弹和坦克。然而，我们知道，敌人在古姆拉克和沃罗波诺夫地域，大约有2个师的预备队可以投入战斗。我们认为，3—5天后，这2个师将会遭到削弱，保卢斯将被迫减弱攻势。那时，我们便可休整一下，重新部署兵力，加强工事。但是，问题在于：在兵力缺乏的情况下，如何挺住这3—5天。

我们只有第37、第308和第193师，而实际上，这只是些番号，总共只有几百人。击退敌人最猛烈的进攻后，我们也受到很大的削弱，但仍希望能击退敌新锐预备队的新的进攻。我们一如既往，准备与敌人血战到最后一人、最后一粒子弹。

我们部署在伏尔加河左岸各发射阵地的集团军炮兵、各师和各炮兵的战斗力，几乎都得到了保存。此外，我们的航空兵也逐渐得到加强。

从10月24日起，敌人很少实施夜间攻击。看来，他们已确信，夜间进攻得不到理想的战果。于是，敌人决定利用夜晚时间休息，并准备日间的战斗。我们则相反，决定夜间以强击队的活动和出其不意的火炮和航空兵的急袭，来打乱敌人有计划的进攻准备，使敌人不得安宁。夜间成为我们活动的天地。

10月25日日间，敌人以重兵在集团军正面全面重新发起进攻。一个配属有坦克的步兵师对斯帕尔塔诺夫卡镇的突击，使北集群正面出现了严重的局势。

在航空兵和坦克的支援下，敌步兵逼使我步兵第149旅后退，并占领了古姆拉克——弗拉季米罗夫卡铁路以南的五坑地域和斯帕尔塔诺夫卡镇的中心。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只赶来援助北集群B·A·博尔维诺夫的第149旅，他们用炮火重创敌军。

10月25日同一天，第64集团军右翼部队在库波罗斯诺那地域转入进攻。

敌人10月26日、27日的两次进攻都没有得逞。B·A·博尔维诺夫的第149旅，在伏尔加河区舰队战舰的支援下，将侵略者赶出了斯帕尔塔诺夫卡镇。

10月27日，第149旅参谋长科奇马列夫少校被炮弹直接击中，不幸牺牲。

是日，集团军中部的柳德尼科夫和古尔季耶夫的部队进行了艰苦的“街垒”工厂争夺战。看来，希特勒的生力军不善于近战。尽管在工厂车间里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士，然而，在兵力上占5倍优势的敌人，在我们强击队面前，一点便宜也没占到。

10月27日，柳德尼科夫师的左翼和古尔季耶夫师的一个团被敌人击溃。敌自动枪手占领了梅津斯卡亚大街和图温斯卡亚大街，开始扫射我们最后一个渡口附近的地域。此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和古里耶夫的部队，击退了德国步兵第79师的多次进攻，这个师把主要突击指向“红十月”工厂。

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潜入上述部队的人数稀少的战斗队形里。他们逼近第39师司令部，向古里耶夫的掩蔽部里扔手榴弹。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派集团军司令部的警卫连前去援救古里耶夫。警卫连协力攻击，将敌自动枪手从师部击退了，并乘胜跟踪追击，一直突至“红十月”工厂。我们把该连补充给古里耶夫师，让他们留在那儿了。

敌人继续对渡口和“红十月”工厂实施突击。15时左右，我军顺利地

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日终前希特勒分子仍成功地占领了马申纳亚街。

在“街垒”工厂和“红十月”工厂之间的地段上，敌人离伏尔加河只有400米左右。敌人的自动枪火力和炮火扫射着由西通往伏尔加河的冲沟。现在要沿河岸向前运动只能爬行。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方便的。很快，我们的工兵横着冲沟竖起两层木栅，中间填入石头，用来“拦截子弹”。

尽管方面军首长正在紧张地做反攻准备，但他们仍对防御斯大林格勒的各集团军、特别是第62集团军提供了支援。

10月26日夜間，根据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编入第62集团军编成的步兵第45师各团，开始向伏尔加河左岸开进。一夜时间，该师只有2个营成功地渡过河，其它部队为避免无谓的损失，从伏尔加河岸后退至阿赫图巴河。

我把渡河过来的2个营配属给第193师师长。他们在

“街垒”工厂和“红十月”工厂之间占领防御。任务是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和渡口突破。

大概敌人已获悉我生力军开进了工厂地域，他们对两厂之间的地段轰炸了几乎一整天，向这2个营的战斗队形投掷了成吨的炸弹。然后，象往常一样，在敌航空兵对该地段实施突击之后，步兵和35辆坦克发起了进攻。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敌人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

经过一天的战斗，这2个营虽已伤亡过半，但没有让敌人突至伏尔加河。可是，到黄昏前，敌人还是成功地迫使这2个营的左翼和步兵第193师的零星部队撤退到巴金政委大街。

各分队剩下的人员仍坚守在离伏尔加河只有300米的地方。

黄昏前，敌人占领了“红十月”工厂的西北部。那儿展开了一场持续几个星期的恶战。

第62集团军的兵力，在10月14日至27日的战斗中，遭到极大的削弱，以致我们甚至连一个班的兵力都不能从前沿撤下来。

保卢斯还能从战线的相对平静的地段抽出部队来对付我们。而我们连预备队都没有，在狭窄的河岸地带实施机动根本不可能。集团军司令部几乎处于无警卫状态。唯一的一个预备团教导营（为集团培养军士），一直被我留到最后时刻。

现在，该营也在工厂地域投入战斗。

B·F·索科洛夫上校的第45师各团，渡河非常缓慢，因为第62集团军的码头已被摧毁。他们要在远离城市的阿赫图宾河和图马克镇附近搭乘渡船，只能夜间从哪儿进入伏尔加河，冒着生命危险，在已突至伏尔加河的岸边的敌人鼻子底下，潜入集团军的防御地段。

在索科洛夫的第45师到达之前，我们还要坚持2—3天。我们再次缩减了各处和各部门的人员。抽出20人，与从伏尔加河河岸附近的卫生所和医院出院的30名战士编在一起。又从战场上拖来3辆被击毁的坦克：1辆喷火坦克，2辆中型坦克，并且很快就把它们修好了，于是我决定进攻敌人。从10月29日清晨起，3辆坦克和50名步兵开始反冲击。反冲击方向是萨马坎茨卡亚大街一线的斯梅霍特沃罗夫师和古里耶夫师之间的接合部，敌人在那儿差不多已偷偷地突至伏尔加河。

我的负责坦克部队的副手M·I·魏因布整整一夜引导这些坦克，在陡峭的

河岸寻找较好的出发地域。

凌晨，反冲击开始，左岸的炮兵和叶罗欣上校的“卡秋莎”团给予了支援。反冲击虽未能夺取较大的地域，但取得了可喜的战果：喷火坦克烧毁了3辆敌坦克；2辆中型坦克压死了龟缩在两条堑壕里的许多敌人，我们的步兵立刻固守在堑壕里。

我们的无线电截听员，报告了希特勒分子用明码汇报俄国坦克情况的内容。看来，他们在为自己的后退而向上司辨白。在该地段，我们一整天都取得了胜利。在集团军正面的其它地段，这两天来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街垒”工厂地域，经过多次进攻之后，德国人得以前出到诺沃谢利斯卡亚大街。在这里，个别的希特勒自动枪手小分队，已冲到伏尔加河河边，但在白刃格斗中被消灭了。

柳德尼科夫和古尔季耶夫的部队，这两天来击退了敌人7次进攻。

巴秋克的步兵第284师，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92旅，在马马耶夫岗及其以南地域，击退了敌人的频繁进攻。他们再次使用了喷火器材。

10月29日黄昏前，战斗开始平息下来，而10月30日，只进行了对射，因为侵略者已精疲力尽。保卢斯的冲击没有达到目的。

哈德尔上将在日记中写到：“到1942年秋季，第三帝国的人力资源将枯竭。”这是对德国动员能力的一个全方面评价。哈德尔没能预料到，德国的精锐部队会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歼灭。德国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将给德国的武装力量带来危机。当他恍然大悟时，希特勒抛弃了他。但是，撤换一个将军要比应付前线的战事轻松得多。

希特勒只得从其它战线抽调人员和装备。整个苏德战场上行将到来的大灾难，已隐约出现在他面前。

希特勒仍在进攻，伏尔加河和高加索的主动权仍掌握在他手里。然而，侵略者的进攻被粉碎之时，便是他的部队被歼灭之始。

众所周知，在10月的日子里，希特勒不愿听到关于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转入防御的消息。他仍不相信，他那血腥的冲击已被阻止下来，仍把一批批的部队投入火坑。

然而，他正在失去1942年的战局主动权。

在10月底的战斗中，在那对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来说是极为艰苦的日子里，胜利的曙光已冉冉升起。

11月的最初几天，战斗的紧张局面稍微得到缓和。我们的侦察员乘机深入敌驻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要从斯大林格勒撤退。相反，我们断定，保卢斯正准备发动又一次进攻，还要对城市实施一次攻击。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保卢斯是否来得及在我们大反攻之前实施突击？关于我们的反攻日期，我们无法做任何预想。在同方面军首长谈话时，我们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好奇心，我们明白，现在在红军中，没有比反攻日期更为机密的了。

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集结了多少兵力，他是怎样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部队的。或许，这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希特勒的统帅部不会甘心于他们无法全部占领斯大林格勒这一现实。

我援引一些数字来加以说明。

7月，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实施进攻的“B”集团军群拥有38个师。

到10月底，该集团军群编成中已达81个师。

从向高加索方向进攻的“A”集团军群中，抽调了许多部队来加强“B”集团军群。

“A”集团军群在开始实施进攻时，编成内有60个师。到10月份，希特勒只在该集团军群中留下了29个师。

还从中部战线、沃罗涅日、法国、德国调遣许多独立部队到斯大林格勒。

德国将军汉斯·德尔试图为希特勒的这些行动做解释。

他写到：

“最高统帅部的训令说：统帅部（希特勒）想肃清斯大林格勒其它地域的敌人，然后，‘结束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

现在，这场战斗不仅仅具有战术战役性质，交战双方的宣传机构都赋予它战略意义。只要俄国人还在伏尔加河以西作战，斯大林就可以声称，斯大林格勒正在进行着英勇顽强的防御。只要希特勒的部队还没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最后这一块土地，希特勒就不会罢休。政治、威信、宣传和感情使统帅不能作出清醒、冷静的判断。”

当然，汉斯·德尔这样解释11月的事件，不是没有道理的。2

显然，到了11月份，德国继续攻打斯大林格勒，已经并非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独裁对威望的得失一向是很敏感的。当然，德国的将军们，仍象从前一样，低估了苏联人民和红军的力量。

在11月的头几天里，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扰乱敌人，使之不得安宁，如果德军统帅部突然决定从斯大林格勒撤军，就紧紧地咬住他们，不让他们逃掉。

我们把一切——经验、才干、胆略都用上了。我们的强击队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他们夺回一座座楼房和整片整片的地区，迫使敌人分散力量，把预备队也投入战斗。德国人盘踞在楼房里，如同坐在火药桶上，随时都可能遭到攻击，都可能被炸、蹦到天上去。

与此同时，我们在做反击敌人新的进攻的准备。我们的侦察员报告，敌人已开始巴里卡德镇和红十月镇地域集结。已经到来的寒冷仿佛把希特勒匪帮硬往城里逼，而我们的部队还在那里作战，敌人想尽快地解决我们，然后安心地钻进温暖的地下室。11月4日，我在日记中写到：“近几天……敌人将继续实施残酷的进攻。他们将投入大约2个步兵师的生力军，然而，很明显，敌人是在作最后的挣扎。”

在以小股的强击队作战的同时，集团军已组织了一定数量的预备队。在伏尔加河左岸，我们拥有戈里什内师的2个步兵团，加上他的师部（他们在那儿得到了补充）和步兵第92旅，该旅得到从远东开拔来的海军官兵的加强。

在这些部队陆续渡河到城里来的时候，我们已决定重新部署兵力；把戈里什内的2个团放在柳德尼科夫师和索科洛夫师之间，即“街垒”工厂以南进行防御，这点我们只做到了一半，因为渡河过来的只有1个团；把若卢杰夫师的所有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都编入第118团，该团留在已占领的阵地上，作战上隶属柳德尼科夫；把古尔季耶夫步兵师的所有士兵和初级指挥人员都补充给柳德尼科夫；把若卢杰夫师和古尔季耶夫师的司令部和几个团部转移到左岸；左岸的炮兵直接隶属于集团军炮兵司令员；从而加强集团军炮兵群，以代替已开拔到南边去的方面军炮兵。解散集团司令部警卫营（原集团

军预备教导团)，全部人员和装备补充给古尔耶夫步兵师；把斯梅霍特沃罗夫步兵师转入第二梯队，任务是防守剩下的唯一的渡口。

每个师的共同任务是：以局部的作战扩大防御基地，每天至少要把前沿阵地向前（向西）推进 80—100 米，以便在 11 月 6 日日终前将“街垒”和“红十月”工厂，地区的敌人全部肃清。每次推进，不管多么微小，都要立即组织牢固可靠的固守。

在据此而颁布的专门命令中，还提到两个坦克连。我们能有这两个连的坦克，全靠斯大林格勒修理工人的忘我劳动。他们冒敌航空兵扫射和空袭的危险，将击毁的坦克修理好。

节日前夕，敌航空兵明显地活跃起来。侦察机整天在我们的战斗队形上空飞来飞去，寻找到重要的目标——指挥所、步兵分队集结处后，立即召唤以 40—50 架为一群的轰炸机，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突击。

步兵第 149 旅旅长博尔维诺夫上校在激战中受了致命

伤，这是一个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富有主动精神的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牺牲后被安葬在克拉斯纳亚斯洛博达地域。他的名字永远铭记在第 62 集团军全体军人的心中。他具有战士的情怀，象战士一样生活在战壕里，又象英雄一样壮烈地牺牲。11 月 5 日，以团长乌斯季诺夫为首的第 895 团司令部，被敌人的一颗炸弹直接命中，全体阵亡。

我们加强了强击队的夜间行动。巴秋克上校师的西伯利亚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待天黑之后勇敢地向前推进，夺取一个个掩蔽壕、发射点，消灭里面的敌守兵。就这样，他们一步步地扩大地盘，解放一片片土地。

可能会有人问：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 13 师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我闭口不提他们？要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报刊在报导伏尔加河畔的战斗进程时，描述罗季姆采夫师的情况是最多的。

罗季姆采夫师从 9 月 15 日至 25 日期间，承受了敌人的

主要突击。他们以闻所未闻的顽强精神奋战了 12 天。可是 9 月 26 日，保卢斯集团军把主要的突击矛头转向北边，指向马马耶夫岗，指向工厂和工厂住宅区。于是，我们便把下述的其它几个师投入战斗：叶尔莫尔金师、戈里什内师、巴秋克师、斯梅霍特沃罗夫师、古尔季耶夫师、若卢杰夫师、柳德尼科夫师、索科洛夫师、安德留克科旅、博尔维诺夫旅以及其它一些兵团和部队。

摄影记者、作家、新闻工作者，都蜂拥到罗季姆采夫师那里。他们不能到其它师的地段上去，因为那儿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到那儿去。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们有时看到的主要是罗季姆采夫师在作战。

作为原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我不愿意贬低任何一支参加过伏尔加河交战的师和部队，不愿意贬低他们为争取胜利所做出的贡献的作用。叶尔莫尔金的步兵第 112 师，一直在城里、在敌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遭到优势敌数百次的进攻，难道他们就不能象其它部队一样，理应获得光荣和荣誉吗？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的步兵师，打到几乎弹尽粮绝，吃尽苦头，但仍勇敢地同敌人的优势兵力血战，难道他们就不是一个英雄师吗？

严寒降临了。

我们俄罗斯的北方居民，最喜欢 3 月底、有时是 4 月的春天。那时，天上飞着白嘴鸦，小河里漂着浮冰。大家都在等待着温暖和鲜花，准备到田间劳动。1942 年之前，据我知道，所有河流，在深秋或初冬，都悄悄地披

上了一层冰衣，仿佛要在它的覆盖下沉睡。常常是这样，晚上河水还在平缓地流淌，而到了早晨，你再看时，河流已变成平滑如镜的冰床。

这是我在奥卡河、在莫斯科省和图拉省的其它河流所观察到的情景。我在这些地方渡过了我短暂童年。

伏尔加河的秋天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她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缓慢地结冰。

气温下降到零下 10 度，伏尔加河仍未封冻，河上冒着热气。气温降到零下 12 度，河上才漂流小块冰。到了零下 15 度，紧随小块冰之后，终于开始出现大块冰。随后就是连绵不断的大冰块不停地移动着。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装甲艇和个别大胆的人，手里拿着篙杆，从这个冰块跳到另一个冰块上，穿越伏尔加河。但只有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河人中的勇士才敢这样做。甚至从远东来的水兵都不敢问津。

可能，保卢斯正在等待这种时候来发动新的进攻。侦察员带回来一些证件，这是从击毙的敌步兵第 44 师的士兵和军官身上搜缴的，该师驻扎在沃罗波诺沃地域，是德军第 6 野战集团军主力部队的预备队。这说明实施新的进攻的生力军已进入出发阵地。我们正面临着两面作战的严重局面：一面同敌人作战；另一面同伏尔加河上的自然灾害作斗争。

估计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势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预先向后勤司令部提交了一份周密的计划，要求保证城里作战部的需要。计划要求：第一，运来补充人员和大批弹药（因为没有这些，集团军就要遭殃）；第二，运来粮食；第三，运来保温服装。我们已有意地减少食物，适应性地忍受严寒，但察觉到敌人正在准备突击后，我们就不能再处于既缺人、又缺弹药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弹药无异于束手待毙。

弹药需要很多，确实越多越好。战士们也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储备一些手榴弹、地雷、子弹、炮弹。他们坦率地表示，宁肯挨饿受冻，也决不能没有弹药。

我把监督弹药的清查、分配和储备的工作，交给了斯帕索夫、索科洛夫和季诺维耶夫。

他们一直呆在城里每天亲自向我报告物资的抵达情况。分配计划（给谁多少，备用多少）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

红军战士手拿肩扛，从码头上搬运物资。

另外，各部队和兵团的指挥员挑选当过渔民和海员的战士和指挥人员，让他们自己造小船，然后从集团军和方面军的仓库领取手榴弹和地雷，运到河右岸。当然，这样做不是没有危险。不少满载弹药的小船常常在夜色中因停靠的不是地方，或撞在冰块上而遇难。

小船被夹在冰块之间，陷入敌人机枪火力之下的事也屡见不鲜。为此，只好组建了抢救队。抢救队的船上配备撑杆、缆绳和绳索，夜间在岸边值班，一俟发现遇难信号，便立即前去援救。

就这样，在几天的时间之内，在冰排形成之前和敌人发起新的进攻之前，集团军的弹药得到了保障。我们还用这种方法储存了大批粮食，在十月革命节那天，我们做西伯利亚式的肉馅饺子来改善战士们的生活。我有自己的秘密仓库，由斯帕索夫中校管理。里面存放着集团军的应急储备品——约 12 吨巧克力糖。我打算在困难时刻，每人发半块，在伏尔加河封冻和没恢复正规供给之前，可以维持一、二个星期。

伟大十月革命节就要到了。我们预料，希特勒匪帮一定会在城里发动新的攻势来破坏我们的节日，因为敌人在古姆拉克车站和沃罗波诺沃还有预备队。但我们对此并不担心。我们知道敌人要恢复 10 月份那样的攻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兵力，而时间对我们有利。战时，甚至在被完全分割隔离的部队中，都存在着一条任何人也操纵不了的联络线，人们称之为“士兵小广播。”它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带来各种消息，诸如：大部队正在向伏尔加河、顿河移动；A·M·华西列夫斯基、H·H·沃罗诺夫及大本营的其它代表们已来到前线等。

显然，大本营的代表们来来去去，决不是为了欣赏伏加河的美景。

在我们还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我们不能袖手坐待，因为最后一个渡口已处于敌机枪火力之下。我们应该保护“红十月”工厂地域的码头，使它不受敌自动枪和机枪的威胁，以便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船，那怕只是在夜间，能够停靠码头、装卸物资。因此，待 B·F·索科洛夫的步兵第 45 师的所有部队渡河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对敌实施反攻击，任务是把敌人从渡口赶走。命令决定，步兵第 45 师在“街垒”工厂和“红十月”工厂之间的地带上实施主要突击。命令古里耶夫师在本防御地带发起进攻，并前出至谢韦尔纳亚站的铁路线。

命令要求所有进攻分队和部队都要勇敢、迅速地向前推进。

读者可能要问，为什么昨天第 62 集团军首长还认为，集团这几乎危在旦夕，而今天又决定实施反攻击？

是的，这就是战争的规律，特别是当时我们所处的那种局势。

可以想象一下，在伏尔加河沿岸的狭窄地带占领防御约达 3 个月之久的第 62 集团军的处境。如果集团军不抓住时机打击疲劳之敌，将它从岸边赶回 200~300 米的话，那么，集军本身就可能被赶下河。难道我们当时能在伏尔加河岸上坐等敌人恢复元气吗？难道能告诉敌人，我们只会防御吗？坐等敌人先发制人，而不试图改变一下态势，那怕是稍微的改变，使之有利于我，那将是愚蠢的。

我们的反攻击于 10 月 31 日实施，据我看，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在某些地区向前推进了 100 米左右，占领了诺沃谢利斯卡亚大街西段、果园的西部；在“红十月”工厂夺回了平炉车间、模型车间、型材车间、分类车间、和成品仓库。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向自己、也向敌人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防御，而且也能进攻，也能夺回原来失去的东西。结果是，在 10 月 14 日至 31 日持续进行的拼搏中，最后是我们，而不是敌人实施了最后的突击。这是第 45 师给我们带来的一场精神上的胜利。该师取得这一胜利不是偶然的，该师各团都有许多光荣传统。它们曾分别被命名为：博贡团、塔拉先团和顿河团。该师是以第一任师长、国内战争的英雄尼古拉·邵尔斯的名字命名的。

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指挥以邵尔斯命名的师是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索科洛夫，他是一位年轻的上校，后来升为将军。他和他的亲密助手格拉马兹达、莫热伊科、巴卡诺夫、谢罗夫等，很快就控制了局势，掌握了打巷战的技巧，建立了强击队。不错，该师各团在防御战方面打得较少，但他们都获得了丰富的城市进攻战经验。以邵尔斯命名的这个师一直打到了柏林。伏尔加河畔的战斗经验，使它以后在顺利完成夺取扎波罗热、敖德萨、卢布林、

罗兹、波兹南和柏林等城市的任务中，受益不浅。邵尔斯师的强击队在城市战斗中锐不可挡，任何防御他们都能突破，在最复杂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取得胜利。

我常常思考：为什么希特勒这样固执地、丧失理智地违背战略战术的一切原则，集中全力，试图占领整个城市？是什么促使他把大批大批的人群，象送入绞肉机一样，投到战火里？是什么在刺激着他？

8月，他那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的计划遭到失败。

当然，希特勒的这项计划也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很多大、小城市或经过一次突击、或经过为期不长的战斗之后便被他们占领。只有列宁格勒以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在近郊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敖德萨、基辅、塞瓦斯托波尔也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他没能攻下莫斯科，在近接近地上就被打败了。希特勒可能认为，他的精锐之师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占领斯大林格勒。他的军队在哈尔科夫、沃罗涅日、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北高加索发动的夏季攻势所取得的胜利也鼓励了他。然而，他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却没有成功。

希特勒投入1个航空队和2个精锐集团军攻占斯大林格勒。9月的战斗开始了。整个9月，敌人为夺取该城而实施的攻击没有取得任何战绩。几昼夜才向前推进100米或200米，而且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这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战绩。

9月底，局势逐渐明朗，希特勒战争机器的优势已经丧失，再也运转不灵了。在城市里进行巷战，并没有给他带来胜利者的桂冠。即使他占领了城市，这也将是得不偿失的胜利。

怎样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待这一切呢？

在城市里，德军失去机动能力，坦克兵团无法发挥其突击威力，航空兵也失去了作用，尽管开始时法西斯空军独霸了制空权。10月也是以希特勒的战略战术的破产而结束。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到11月初，苏联最高统帅部巧妙地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悄悄地集结了大量的部队，而希特勒的预备队已消耗殆尽。况且，要在深秋发动新的攻势已嫌过晚。

但十月份过后，希特勒不顾其政治、军事形势的危机，又从新开始强攻斯大林格勒。

4

11月11日6时30分，经过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

后，敌人转入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有5个步兵师（第389、第79、第305、第100和第295师）及2个坦克师（第24和第14师），还得到了从罗索希空运来的步兵第294师工兵营和从米列罗沃空运来的步兵第161师工兵营的加强。进攻是从沃尔霍夫斯罗耶夫斯卡亚街至班内沟的宽约5公里的正面上发起。大部分德国师基本上是满员师。敌人的战斗队形高度密集。

看来，保卢斯企图一举击溃柳德尼科夫、戈里什内、索科洛夫和古里耶夫的步兵师，并前出至伏尔加河。

整整一天，为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手榴弹战和白刃战又继续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我北集群部队从梅切特卡河河口的铁路桥向南、向拖拉机厂方向转入进攻。

在马马耶夫岗，巴秋克师与进攻之敌展开了遭遇战。

工厂的烟囱被炸弹、炮弹和迫击炮炸塌。显然，敌人把主要突击指向

了柳德尼科夫步兵师和戈里什内步师之间的接合部。

最高统帅部代表、总参谋长 A·M·华西列夫斯基对那些天的局势做了公正的评价：“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部队集中全副力量准备反攻时，扼守斯大林格勒的部队的处境继续恶化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歇后，11月1日，敌人又恢复了对 B·A·崔可夫的第 62 集团军的猛烈攻击，把以前同顿河方面军对峙的部队调到了这里。尽管敌人遇到了我军的抵抗，到傍晚时，还是占领了“街垒”工厂的南部，还从这里前出到伏尔加河。第 62 集团军的处境由于伏尔加河开始结冰而更加严重了。”

A·M·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莫斯科，1975 年，第 249 页。

11 时 30 分，希特勒分子投入预备队，其步兵和坦克击溃了戈里什内师步兵第 241 团右翼的战斗队形，向前推进了 300—400 米，在 500—600 米的正面上前出到伏尔加河。集团军第三次被分割，柳德尼科夫步兵师与主力部队断掉联系。

但在战线的其它地段上，集团军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保卢斯没能发挥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他没把第 62 集团军赶到冰冷的伏尔加河里去。

我们没有估计错，保卢斯准备了一场新的攻势，关于这一点，希特勒本人在 11 月 8 日对“老党卫军”的讲话中已宣布。他说：

“我想得到伏尔加河的某一地点，碰巧这座城市就是以斯大林本人的名字命名的。但我急于到那儿去，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我要到那儿去，是因为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三千万吨的物资、其中有 9 百万吨石油，要通过它来转运。从乌克兰和库班来的小麦，要汇集在这儿然后继续北运。从那儿还能得到锰矿石……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夺取它！而且，你们也知道，我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夺取它！只剩下几个点还没占领了。有人问：为什么您不快些把它夺过来？因为我不想让它成为第二个凡尔登。我要用少量的突击群来达到这个目的。”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发动新攻势，正是伏尔加河上开始出现巨大冰排的时候。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船只，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无论是从阿赫图巴河还是从图马克河开来，都不能抵达我们这里。我们与左岸的联系被切断了很久。尽管局势这样严重，敌人的突击并没有使我们措手不及。战斗的第一天，保卢斯没有得到任何决定性的战果。

我们从击毙的德国人身上搜获得的文件知道，希特勒匪帮将不可能这样长久地实施进攻了，过 2—3 天，他们就会一蹶不振。我们感到，我们的对策很正确：敌人不但没有从城里撤退，而且还调集了生力军，如调来步兵第 44 师。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再次把脖子套进绞索，而套在敌人脖子上的绞索，很快就要勒紧了。

在同方面军首长的电话通话中，我明白，他们很满意我们的顽强精神。但是，第 62 集团军还面临着不少考验：从 11 月 12 日早晨起，敌人调来预备队，重新部署兵力。看来，还要对付敌人新的进攻。果然，中午 12 时，敌人再度发起进攻。在集团军正面的所有地段上，战斗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发疯似的法西斯分子不顾一切地冲上来。

远东来的水兵（步兵第 92 第 3 营，已转属戈里什内步兵师）足智多谋，

显示了光荣的红海军的威风。图温斯卡亚大街上的一些汽油箱几经易手。红海军战士在战斗的硝烟中，脱掉大衣，只穿海魂衫，戴着水兵帽，击退敌人的攻击后，自己又转入进攻。在“红十月”、“街垒”工厂的车间里和马马耶夫岗上也进行了同样残酷的战斗。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无畏的勇士，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他们。

下午，我们同战斗在马马耶夫岗的巴秋克师指挥所的电话通信中断了。通讯员季塔耶夫前去修理。不一会，恢复了通信，但季塔耶夫再也没有回来。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炮弹的坑沿上，嘴里紧紧地咬着电话线的两个接头。死亡并没有阻碍勇敢的通信兵去执行战斗命令。看来，他就是死了仍在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

我们对战斗情况和敌人的兵力、兵器所做的判断，都得到了证实。希特勒匪帮在 11 月 12 日发动的疯狂进攻，也没取得理想的战果。集团军的各防御地段都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两天的战斗，希特勒匪帮死伤惨重，数以千计。

我们给方面军司令部送去整整一口袋从击毙的敌士兵和军官身上缴获的证件。

11 月 12 日，我签署了一份战斗命令：

“敌人企图在‘红十月’工厂东南部突破我正面，前出至伏尔加河。为加强近卫步兵第 39 师左翼，肃清工厂里的全部敌人，兹命令近卫步兵第 39 师师长，使用近卫步兵第 112 团抽调来的 1 个营，去加强你师中央和左翼的战斗队形，任务是全面恢复态势，肃清工厂之敌。”

在此前一天，德军步兵第 791 师师长冯·施韦林将军也给他的工兵营营长韦利茨大尉下达了任务：

“进攻命令（1942 年 11 月 11 日）：

1．敌以重兵守卫着‘红十月’工厂的部分地区。主要的抵抗基点是平炉车间（4 号车间）。夺取该车间便意味着斯大林格勒的陷落。

2．第 179 加强工兵营应于 11 月 11 日占领 4 号车间，并向伏尔加河突破。”

韦利茨：《被出卖的士兵》，莫斯科 1965 年，第 70 页。

以上两个命令几乎是同时下达的，这充分说明了战斗的紧张程度。

争夺平炉车间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而争夺工厂和在工厂内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

如果认为我们的敌人不懂得什么是强击队和强击群，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韦利茨大尉证实，在争夺“红十月”工厂的战斗中，他的营就曾组织过强击队作战。

他写到：

“我向他解释我的计划。我将投入 4 个强有力的强击队，每队 30—40 人……不通过门窗突入车间。只需要炸开车间的一角，第一个强击队将从这个缺口冲进去。强击队各队长都配属有炮兵前进观察员。强击队的装备有：自动枪、喷火器、手榴弹、集团装药和炸药块、烟雾弹……作为第二梯队的霍尔瓦提人分队，立即占领并防守夺下来的阵地。”

同上，第 69 页。

我读到韦利茨书中的这段话时，甚至产生过怀疑，他是否是从我们对强击队作战和装备的论述中转抄下来的。但经过深入的研究，我找到了其中的差别。德国人的强击队没有挖掘通往突击目标的地道和堑壕通道；像野战一样，他们在强击队后面跟进的是第二梯队，而不象我们那样，跟进的是巩固队。然而，相似之处还是很多的。

总之，希特勒匪帮为夺取“红十月”工厂是要孤注一掷。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个支撑点。我们则力求在这段时间里，将“红十月”工厂里的敌人全部肃清。

这场战斗进行得如何？韦利茨大尉写到：

“心情开始沮丧。看来，俄国炮手们已经吃过早饭，开始打炮了，我们不得不经常趴在地上。空中弥漫着灰尘……一个急冲，土堤已甩在后面……我们跑过挖断的道路，越过落在地上的一小块块屋顶铁皮，穿过一团团的炮火烟云和卷起的尘埃，拼命向前跑着……总算跑到了！……

我躺在一堵很厚的墙下……梯子只剩下铁架子……我们散开……观察地形……

4 号车间离我们只有 50 米左右。一座阴森森的大楼……长达一百多米……这是全厂的中心，厂房上耸立着很多高大的烟囱。

我转身向匍匐在墙边的司务长费策尔说：

‘你把车间右边的那个角炸开！带上 150 公斤炸药。你们排应在今天夜间开进，清晨，爆炸就是进攻开始的信号……’我对其它人也下达了命令，指定了攻击出发地区。”

韦利茨：《被出卖的士兵》，莫斯科，1965 年，第 74—75 页。

这就是希特勒匪帮的进攻计划。当然，他们很可能会给我们增添许多麻烦。如果占领了“红十月”工厂的主要车间，他们就能扫射我们在伏尔加河的所有渡口，甚至用火控制我们作临时仓库使用的右岸码头。我们的侦察兵打乱了敌人的这一企图，他们不仅警惕地注视着正面各地段的敌战斗队形，还密切地注视着敌纵深战斗队形的动向。几天来，直到希特勒匪帮发动进攻之前，我们在这一地段抓获了很多俘虏，他们供出的关于正在准备进攻的口供，通过我们观察得到了证实。因此，我下达关于密集在工厂及其车间里的战斗队形的命令，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及时采取的有效对策。

韦利茨继续写到：

“进入出发阵地的命令到了。我看了看表：02：55。一切都准备完毕。各强击队已进入攻击出发地区……要在 4 号车间前的地雷障碍物中间打开了一条通路……

霍尔瓦提营作为第二梯队已准备立即出发……

该出发了，天仍旧很黑……我来的正是时候。后面，我们的大炮开始齐射……命中率很高，因为天已渐亮……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我们前面。左边又一颗，紧跟着又一颗。车间、工厂庭院和烟囱都消失在黑烟中。

‘炮兵观察员到我这儿来！见鬼，他们发疯了？都是近弹！……这是怎

搞的？在那儿、东边，在伏尔加河那边，闪着大炮齐射的火光……可是，这是敌人的炮兵在射击呀！难道这可能吗？世界上决没有任何炮兵能这样还击！’这意味着，还在进攻开始前，我们就遭受了损失。”德国人未预料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得知敌人集结后，在离平炉车间 300 米处指挥部队的斯捷潘·萨韦利耶维奇·古里耶夫师长，不仅加强了工厂的战斗队形，而且让炮兵做好了准备，要在任何一分钟、甚至一秒钟内，向 4 号车间前早已预测好的地方开火。

韦利茨继续写道：“但我们的炮兵已将徐进弹幕射击向远处转移。前进！费策尔司务长轻身敏捷地从洼地跳起，在昏暗中很快接近那栋隐约出现在他面前的大楼。现在就看他的了……

韦利茨：《被出卖的士兵》，莫斯科，1965 年第 75—77 页。

他受命将大批炸药放在 4 号车间的墙下，——作者注。

费策尔返回来了……

‘点着了！’他喊了一专，便趴在地上……

一阵耀眼的闪光！车间的墙壁慢慢地倒塌下去……黑灰色的浓烟包围了我们。烟雾熏着眼睛……强击队通过障碍物，急速地冲进烟雾中。

当烟幕消散后，我看到车间的整个右角被炸塌了。第一批工兵通过十米宽的缺口，沿着刚刚炸下来的石块爬过去，冲入车间……我看到，第二强击队也在左边冲入车间，开阔地上的进攻进攻得也很顺利。战斗警戒队也在向前推进。但突然间，一种绝望的恐惧笼罩了我的心头。……我跳进跟前的一个坑里，踩着一大堆碎砖向上爬……

我从大弹坑里向四周张望……在这儿防守的防御者，占有绝对的优势……受命从这儿向前冲的士兵，随时都得看着脚下，否则，掉进乱七八糟的钢筋里，就象上钩的鱼，吊在半空中。深深的弹坑和重重的障碍，迫使士兵们沿着跳板、注意保持平衡、鱼贯而行。而俄国的机枪手们早已瞄准了这些地点，从暗楼、地下室飞出的弹雨都集中到这儿。在墙壁的每个突出部后面，都有一个红军战士守候着入侵的士兵，准确地扔出手榴弹。防御准备得很出色……

我从弹坑里跳出，刚跑了 5 步，又被火力压在地上。

旁边躺着个上等兵，我推了推他，呼唤他，没有回答。我敲了敲钢盔，他的头垂歪到了一边。一张死人的畸形面容对着我。我急忙向前跑去，又绊在另一个尸体上，我翻滚到弹坑里……

我斜对面是一个个圆锥形管道，狙击手通过它向我们射击。我们用喷火器对付他们……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这是他们向我们扔手榴弹。防御者采用一切手段进行抵抗。

是的，这是些顽强的小伙子！……

我当即下达命令：原地卧倒，等夜幕降临后，撤回到防御阵地！就这样，结束了进攻。

一切都是徒劳。我简直不明白，俄国人从那儿来的这股力量。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突破过多少坚固的正面和筑垒防线，克服过多少有工事构筑的江河障碍——河川和运河，夺取了多少精心构筑的火力点和抵抗基点，占

领了多少城市和乡村……可是在这儿，在伏尔加河面前，连一个工厂也夺不下来！……我看到，我们是多么虚弱。

我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开始进攻时，我们营有 190 人，现在将近一半受伤，15—20 人死亡。这意味着，这个营再也不存在了！不会给我补充兵员了。”

韦利茨：《被出卖的士兵》，莫斯科，1965 年，第 77—79，81—82 页。

我从韦利茨大尉的书中摘录这些段落，是为了让敌人来供述一下 11 月的战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敌人虽无理性，却也骁勇；虽嫌盲目，然亦剽悍；尤其是敌人组织城市进攻战的技能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性。但同时我们还看到另一景象，即参加战斗的只是士兵、司务长、中尉和大尉衔军官。希特勒的将军们到那儿去了？正如我已说过：近卫第 39 师师长 C·C·古里耶夫将军、政委 E·E·切尔内绍夫和参谋长札利久克中校，离工厂车间只有 300 米；而冯·施韦林将军——进攻“红十月”工厂的那个师的师长，却躲在远离工厂和战场约 10 公里的拉兹古利亚耶夫卡镇。

我们不能忘记，工厂的工人、工长和工程师们在迷宫似的车间、通道、地面和地下管道为我们的部队带路。他们与红军战士一起，穿过下水道，出现在有利阵地，狠狠地打击敌人。

5

击退敌 11 月 11 日至 12 日的进攻后，尽管集团军已是第三次在伏尔加河畔被分割，但所有的城市保卫者，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到普通战士都明白，这是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了。我们深信，敌人目前不可能再象 10 月份那样组织兵力，并得到新的技术装备、特别是坦克、弹药和燃料。而没有这些，特别是没有技术装备，敌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

大家都深信，下一次强大的、势不可挡的突击，该由我们的部队来实施了。始于 7 月下旬的战斗进程，已为此创造了一切条件。

11 月 12 日后，保卢斯没有停止其主动的进攻行动，战线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安静下来的时刻。希特勒最高统帅部不想承认进攻遭到挫败。于是，数月前在斯大林格勒战线各地段开始的交战，仿佛有惯性一样，一直持续到 11 月 19 日。我们直接面对敌人，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一直对敌实施反击。只要敌人不放下武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就要履行自己神圣的使命，牵制住敌兵力，并歼灭他们。

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援助脱离集团军主力的柳德尼科夫师。该师的处境很危险：它北、西、南三面受敌，而东面又被满是冰排的伏尔加河切断后路。

我们在 2、3 天内断断续续地送去了一些弹药和食品，运出了一批伤员。

我们只得想法从右岸战斗队形里尽量抽出一定的武器。首先，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斯梅霍特沃罗夫师的全部人马编成一个团，即第 685 团，在戈里什内师右翼后面集结，然后，沿伏尔加河由南向北反击敌人，以同柳德尼科夫师汇合。

我们从斯梅霍特沃罗夫师的所有部队中，总共只调集到 250 个有战斗力的人员。戈里什内师右翼还逐渐得到左岸来的一些小分队的补充。我们就

以这些部队在 11 月 20 日不断地向北实施反击，以争取同柳德尼科夫会师。

我们的反击使敌人无法歼灭柳德尼科夫师。

我不能不说说以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上校为首的该师指挥人员的勇敢精神。尽管处境异常恶劣，他们仍保持镇静和自信。电话线被切断，只有无线电通信仍保持畅通。我几次亲自与柳德尼科夫用明码通话。我们之间不用称名道姓也能从声音上听出对方来。我公开地告诉他，马上就提供援助，很快就能与他会合。我希望他能明白，为什么同他的通话这样公开地进行，还希望他明白，很快我们就不能给他任何援助了。他也谈了对很快会合的希望。我们就这样尽力迷惑敌人。

直到 11 月 15 日夜，我们的“夜航”飞机才给柳德尼科夫师空投了 4 包食品 and 4 包弹药。11 月 19 日夜，4 艘装甲艇终于进入杰涅日纳亚纳洛日卡河，然后在该师防御阵地靠岸。装甲艇送去了弹药和药品，运走了 150 名伤员。应该谈一下“普加乔夫”、“斯巴达克”、“潘菲洛夫”号轮船和第 11、第 12、第 13、第 61、第 63 号装甲艇的船员们的工作。在这些日日夜夜里，他们实实在在地创造了英雄业绩。

我亲自在夜间观察过这些船是怎样一米一米地在冰块中开辟出一条通路的，他们从图马克码头沿伏尔加河向北驶向第 62 集团军防御阵地。

有几次，这些船无法在夜间返回，而日间沿德国人占领的河岸行驶，又十分危险。于是，船只便留在我们的河岸那儿，用降落伞、白布单和口袋伪装成冰雪的颜色。

柳德尼科夫师的命运令人担忧。应该把它解救出来。我们的部队日夜不停地对在柳德尼科夫部与集团军主力之间突至伏尔加河岸的敌人发起反击。

与此同时，我强击队一步一步地在集团军正面的其它地段，确切地说，在整个正面上，从敌人手里夺回一座座楼房、一个个掩蔽部。北集群由北向拖拉机厂发起进攻；索科洛夫师和古里耶夫师向“红十月”工厂发动进攻；巴秋克上校师和步兵第 92 旅向马马耶夫岗发起进攻；罗季姆采夫师在城里攻占楼房。我们的进攻每天都不间断，强击队开始缴获战利品和抓获俘虏。

11 月 18 日黄昏，古罗夫、克雷洛夫、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瓦西里耶夫同志聚集在我的掩蔽部里，我们讨论了进一步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就在这时，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电话，预先通知我们很快就要下达命令。我们大家相互看了一眼。

“这项命令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着。

突然，古罗夫用手拍了一下前额，说道：

“我知道了，这项命令准是关于大反攻的！”

我们来到通信枢纽部，急不可耐地等待“博多”式电报机噼啪地敲出盼望已久的命令条文来。

午夜 12 时左右，终于盼到了！

一个个字母蹦跳着，组成一行行文字，一条条的命令。

心脏在颤动。

方面军的命令！命令描绘出苏联最高统帅部整个意图的轮廓。电报机传出：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于 11 月 19 日清晨，从克列茨卡亚、伊洛夫林斯卡亚地域，向卡拉奇方向转入反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稍晚将于 11 月 20 日间，从赖戈罗德地域和萨尔帕湖、察察湖、巴尔曼察克湖出发，向苏

维埃镇方向、进而向卡拉奇转入反攻。任务是：突破敌正面，围而歼之。

我们大家——我本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以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一下子怎也不能马上全部弄清楚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意义。

命令中谈的是反攻，是合围并歼灭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全部敌人。这场战役已不是局部意义上的战役，因为入进攻的有三个方面军。可见，最高统帅部已调集、集结了重兵来实施这次突击。我们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斗争，我军对进攻之敌的顽强抵抗，已出现了快要结束的苗头。只要敌人深深地陷在巷战里，只要一批批的德国部队被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它的两翼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可见，苏联军人的鲜血没有白流，斯大林格勒人为坚守防御而进行的一切努力没有白费！而曾几何时，星云压城城欲摧，仿佛我们要被敌人击溃呵！

“决不后退一步！”，“伏尔加河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没有退路！”的口号已赋予了新的涵义。

“决不后退！”现在意味着“只有前进！”“伏尔加河那边没有我们的退路！”则意味着“只有向西挺进！”

力量的源泉

1

斯大林格勒防御战坚定了我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最终决定任何一次战斗结局的是精神力量。要证实这一结论，有现成的例子。9月和10月，保卢斯指挥数倍于我的兵力、坦克和大炮，在取得制空权的航空兵掩护下，对我阵地实施了连续突击，但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决不能使城市保卫者从精神上崩溃。相反，他越是凶狠地对我防御目标实施突击，我们的战士就越是顽强地拼搏，有时是以小股作战，有时甚至单枪匹马地干。不论是在市中心，还是在工厂区以及马马耶夫岗都是这样。

原因何在呢？我们的战士如此坚定、如此顽强的源泉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希特勒的战略家们有权认为，我们拥有某种工事和某种特殊武器，使得他们在兵力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仍不能取得胜利。

是的，每一个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的确是由一种特殊武器，一种侵略军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威力强大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我们对胜利坚定不移，我们一分钟也没有背弃过这个信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所捍卫的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是后代人的光明生活。敌人必定灭亡！这不是口号，不是群众集会上的发言，而是我们永恒的信念，是我们战斗力的动力和勇敢作战的源泉。

当形势表明，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时，方面军各部队补充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政治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仅第62集团军从全国各边区、各州召集来的9千名共产党员中，就有区委、州委和市委书记、部门主任和指导者、集体农庄的和工厂的书记以及其它党的工作

者，共 500 多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A·B·基里洛夫和 A·H·克鲁格洛夫同志，俄罗斯联邦国营农场副人民委员 A·C·斯图波夫和其他同志，来到集团军以加强政治部门。在集团军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核心。每个连都有一个坚强的党小组。近卫第 33、第 37 和第 39 师的许多营，全部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

党的力量遍布集团军的所有重要地段。在行军时、在战壕里和在战斗中，共产党员以自己的行动做出表率：应该怎样为完成党和祖国的要求——“决不后退一步！”而斗争。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向人们宣传，我们已无路可退，我们不仅能阻止住敌人，而且能把它赶回去。为此，需要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克敌制胜的本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和自我牺牲精神，其力量如此之大，是任何度量单位都无法衡量的，它对部队，对每一个战士心灵的影响，是现今西方出版的论述上次战争的长篇巨著的作者们，是那些不想承认共产党的领导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人，所永远不能理解的。

我从第 62 集团军共产党员的党的政治工作经验中，举几个例子。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党的力量遍布在所有重要地段上，这就是说，政治工作没有脱离集团军的任务，而是直接深入到部队，以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誓死坚守着阵地。但要让人们在精神上做好这样顽强斗争的准备，却不那样简单。

可以想象一下，战士们肩上扛着反坦克枪或手提机枪，腰间缠着子弹带和手榴弹，背着母亲或妻子给装满食物和用品的背囊，随着纵队行走在通向伏尔加河的泥泞道路上。疲劳加上尘土和汗水，使他们连眼睛也睁不开。何况，在那遥远的故乡，有他们的老母亲，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惦念着她们，希望回到她们身边。然而，他们却来到伏尔加河，看到大火映红了天空，听到隆隆的爆炸声，于是又惦念起家乡、妻子、儿女。只是现在他们按另一种方式来想念他们：“没有我，他们该怎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不对他们晓以祖国面临亡国危险的大义，他们会在重重顾虑下停止不前或放慢脚步。

但他们没有停下来，仍一往无前地向前走着。因为，路两旁的标语、口号，用火一般的语言，召唤着他们前进：

“同志们！如果你不在斯大林格勒将敌人挡住，敌人就会闯入你的家园，捣毁你的故乡！”“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斯大林格勒！”“指战员们，祖国母亲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祖国母亲不会让你们的亲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已渐黑。在左岸渡口码头旁边，停靠着一些被打坏的小船和一艘被打穿船舷的汽艇。

在沿岸的一丛丛灌木丛旁、一棵棵被炸毁的白杨树下、一个个弹坑和壕沟里，到处都坐满了人，成百上千的人，然而却非常寂静。大家都屏息地看着伏尔加河对岸那淹没在烟火中的城市。在那儿，石头似乎都在燃烧。有的地方火光直冲天际。难道人们就生活、战斗在这样一片火海中？他们在那里呼吸什么？他们在那保卫着什么？是残垣断壁、一堆堆的石头吗？……然而，上级命令他们渡河到那边去，并立即投入战斗……

是的，是有命令，但是仅仅靠命令，而不使人们在心理上做好完成这一命令的准备的话，那么，上渡船必定是慢慢腾腾地，而渡船在航行中一旦

遭到射击时，人们就会弃船跳入水中，不向那火海、向那战斗的地方游去，而是相反，游回到刚刚离开的码头，应该有人做出榜样。每个连、每个排里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仅仅自己，而且还率领其他向那燃烧着的城市游去……这样的人不仅连、排里有，各班组时也有。他们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执行指挥员的命令时，以模范行动做出表率，让大家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这就是在完成战斗任务时的政治工作。

下面是原戈里什内师的列兵机枪手、现奥列霍沃 - 祖耶沃纺织联合工厂的细木工、共产党员彼得·别洛夫谈的关于横渡伏尔加河时如何做政治工作的事：

“在上渡船前，来了一位个子不高、圆脸、剃光头的将军，他是方面军副司令员戈利科夫。他刚从河对岸回来，他说：‘从外面看，那边好象一切都在燃烧，简直无立足之地。然而，在那里却驻扎着并出色地战斗着整团、整师的人马。他们极需要援助，他们期待着你们……’

然后，给我们分发了报纸，给每人发了一本铅印的手册《城市战斗须知》。

渡船就要靠岸了。我们等待着口令，而心里却充满了忧虑，因为人总是愿意活着的……我们看见，没等下令就第一个登上渡船的，是一个满脸胡须、又瘦又小的大尉，他袖子上缀着一颗小星，这表明他是教导员。后来我得知，他是营党委书记瑟罗米特尼科夫，一位大概是 1918 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后面跟着一队战士，这是些什么样的战士，说来都可笑！例如，我们这时的斯捷潘·奇卡里科夫，他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党为胆子小而发愁。有一天，我们开始下火车，不知为什么高射炮兵开了火。这个可怜的人，一听炮声就飞快地向田野跑去，好不容易才追上他，让他清醒过来。总之，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挑选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没等下令就带他们第一批登上渡船。您瞧，连奇卡里科夫也没有流露出胆怯来！

上船进行得很迅速，我们启程了。船上人很多，大约有 500 人。我们共产党员都被安排在栏杆旁，以防止慌乱。

我们航行着……河水被火光映红。这时，仿佛故意为难似的，月亮从云缝中露出脸来，然后，头顶上突然亮起耀眼的亮光，亮得都能看报。左右两边响起爆炸声。一颗水雷在船舷边爆炸。我想，唉！完了，现在都得沉底了！这儿水最深，正是伏尔加河的中心，而他，那个大胡子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却爬到弹药箱上，当着大伙儿的面坐在那儿，与邮递员逐一挑看着信件。他挑看着，邮递员一会儿指指这个，一会儿指指那个。有人呻吟起来，立刻又停了下来，因为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朝那儿看了一眼，仿佛：同志，别急，可能也有你的信啊！

当我们驶到一个死角时，周围一片漆黑（有人用步枪把灯打灭了），大伙听到一个声音：

‘同志们，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和邮递员就在发光的前甲板附近，那儿就是营部……’

你可能会说，这位同志很有计谋。当然了，信件对战士来说，几乎等于同亲人会面，人人都急着要见到信。在这样的形势下，平稳地坐在最危险的地方——弹药上，还做着这样的事情，这是需要胆量和机智的。一句话，共产党员——勇敢的人……”

有关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勇敢、坚定、机智、沉着的例子，有关他们善于在紧急关头成为战士们注意的中心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模范作用也是由此而形成的。

模范作用……我想，集团军政治部做得非常正确，它要求各部队都要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品行问题。军事委员古罗夫和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签署的信中叙述了政治部的这项要求。信中谈的是城市巷战。信里写道：“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为周围的人做出表率。

坚定不移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的行为准则。如果那个党员表现出惊慌失措或胆小怕死，党组织对这样的党员一定要按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直到开除出党。”

这封信不仅各连、营党组织，而且各级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也进行了讨论。每位首长似乎都感到了普通党员对自己品行的经常性的监督。根据党章，每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执行党的会议做出的规定。党的纪律就是这样——会议的决定每个人都得执行，违反了党内纪律就要受同样的处分，而不管你级别的高低。我作为集团军司令员，是坚决拥护对共产党员的这一要求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市中心进行巷战初期最困难的日子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能够迅速地制止那种怀疑城市防御是否合适的悲观情绪的蔓延。军事委员会依靠党组织，采取措施同贪生怕死和惊慌失措的现象作斗争。据我所知，第 62 集团军的每一个军人，不论他是普通战士还是指挥员，对战场上的逃兵都是义愤填膺的。真正的军人是不会容忍那些躲在别人后面、或为图保命而出卖别人的懦夫的。绝大多数的城市保卫者都怀有这种激情。尽管局势异常严重，敌人在人力、装备上都占优势，然而没有发生一宗张惶失措的事件。这都要归功于第 62 集团军的党组织。

应该考虑到，在巷战中，整整几个星期、整整几个月处于日夜不停的爆炸声中，政治工作者是无法召开大规模的红军战士大会，来宣讲党的重要决议和首长的命令，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来发表热情激昂的长篇大论。宣传鼓动员经常在地下室或楼梯口下，在同战士们的简短谈话中，宣讲战斗任务。而更经常的是，直接在战斗中以实际行动来说明，应该怎样掌握武器，怎样完成指挥员的命令。坦白地说，这种实际行动起到的作用，远比长篇大论要大得多。因此，第 62 集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精通巷战战术，熟练掌握各种武器，首先是自动枪和手榴弹。大多数政工人员都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认为，第 62 集团军党组织的主要功劳在于，了解到巷战的特点后，政治工作人员把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到了连、排、强击队里。个别谈话成为政治指导员、党团小组长、政治副职、政治辅导员的主要工作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士们认识到，即使在敌后只剩他一个人，他应该、也能够同敌人战斗到底。对首长给予的信任——独立行动权，每个战士都能结合团、师和整个集团军的任务来合理地使用。只有对战士信任、信任、深深的信任，才能激起广大士兵的创造性的战斗积极性。这是一项需要耐心、复杂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而正如大家所知道，它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党组织的这一努力，每个城市保卫者才成为敌人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党组织执行战斗命令是机动灵活，坚定不移的。我记得，集团军部的

监察员和辅导员 A·潘琴科、A·斯塔里洛夫、A·克鲁格洛夫、M·科甘、A·肖明、H·祖耶夫、H·科库诺夫、H·埃尔金、B·罗古列夫、E·古尔金、A·萨夫琴科，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助手 N·尼古拉耶夫，科长 H·季托夫和 A·斯图波夫，他们一接到集团军的战斗命令，便立即下到那些担负最复杂、最困难的任务的地段。他们是带有任务下去的，就是将命令贯彻到每个战士，动员党团组织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完成战斗任务。而正如大家所知道，当时的形势很复杂，各地段、各楼房里的情况各不相同。政治工作人员要根据形势来选择对战士做工作的方式方法。他们不是等待合适的机会到来，而是直接下到强击队，到机枪手、狙击手和工兵身旁，无论什么地方他们都去。随时对战士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工作，这是政治部门对其工作人员的一贯要求。

各级政工人员和指挥员——从营的党小组到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和军事委员，都经常来到前沿并留在那儿。我本人也常到战士们的战壕里，向战士们讲解党的重要决定和这个分队的战斗任务。不言而喻，通过在战壕坦克的交心，战士们会更深刻地感到自己的责任，会更好地理解去完成受领的任务的重要性。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开展党的政治工作的。

据我所知，集团军部监察员、营级政治干部、后来是中校的伊万·谢尔盖维奇·潘琴科，在奥尔洛夫卡地域的战斗中，一直同全营一起在合围中战斗。最后，他带着 120 人的队伍于夜间冲破德国人的合围圈，与在工厂地域作战的部队会合。

政治部辅导员伊万·肖明在“红十月”工厂模型车间作战时，一直与强击队寸步不离，他们一起战斗了两个星期。只是他受重伤后才被送下来，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巴秋克的步兵第 284 师的党组织，工作配合默契，协调一致”。政治部主任特卡琴科，该师各团的政治副职和党小组长，将党团组织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从而该师在战斗从没出现过贪生怕死和惊慌失措的现象。巴秋克师的西伯利亚籍战士，坚定果断，使德国鬼子大伤脑筋。仅在马马耶夫岗，巴秋克的强击队就以机枪、冲锋枪火力消灭了数千敌兵。

巴秋克师的政治机关非常注意总结推广对敌斗争的新经验。反坦克枪手德米特里·舒马科夫用反坦克枪打飞机的经验就足以说明问题。政工干部 C·涅霍罗舍夫当天就把这一经验推广到所有的分队，两天后，该团反坦克枪手就击落了 6 架敌机。狙击手运动的发起人是该师的瓦西里·宰采夫，这项运动开展后，在各个分队、各个掩蔽部和战壕里，马上出现了《狙击手公报》，用来统计当天消灭了多少希特勒分子。师里的战斗小报每天都登载神枪手的事迹。巴秋克师还广泛开展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给牺牲了的同志亲属写信。信中，战士们发誓要为战友报仇。整个分队，整个排、连，甚至整个营，都在信上签了名。不言而喻，凡是立过誓言的军人，都会竭尽全力去履行它。

共产党员在集团军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把热饭送到前沿，送到各火力点；为精心照料伤员而付出巨大的心血；有条件时，还在掩蔽部里开辟了俱乐部，使战士、军士们可以在里面读读报纸，听听无线电，稍事休息。

集团军和各师的党委一般都是在部队里召开党委会。许多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军人在火线入了党。

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向第 284 师优秀军人、其中包括瓦西里·宰采夫颁发党证的仪式。他们吻着党证，发誓血战到底，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狠狠打击敌人。

这些还不是我们集团军的共产党员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全部画面，党员们在心理上培养、在实际中保证了部队高度战斗力。第 62 集团军的共产党员在部队中起着骨干作用。他们团结群众，战斗时冲锋在前，格斗时勇猛无比，进攻时坚定不移，突击时机智勇敢，防御时坚韧顽强。

对共青团的领导是集团军党组织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共青团！”……我一想到它，心里就充满了激动和骄傲之情。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我们集团军的共青团员立下了多少不朽的功勋！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同希特勒侵略者斗争得多么勇敢、多么顽强！

在这个被摧毁的城市的各条大街上还正进行着激烈战斗的时候，我就向市委和市执委的领导同志请求，将来斯大林格勒重建后，应把最美丽的大街命名为共青团大街。这是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要求，因为战斗在各条大街上的第 62 集团军的主要成员是青年军人。许多连、营、团全部由共青团员组成。

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总是打先锋。凡是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我们的城市呆过的人，都能看到，具有良好精神和战斗素质的年青团员，在战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欣慰地看到，在艰苦的战斗中，年青的战士和指挥员，在沉着、勇敢和军人的献身精神方面，比之我们这些老兵毫不逊色。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年青一代的军人，不仅继承、发扬光大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

歌颂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年青参加者，就是歌颂在危险关头以自己的胸膛掩护伏尔加河、掩护祖国母亲的青年一代；就是歌颂我们苏联青年无限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忠贞不渝的赤子之心；就是歌颂整整一代青年威武不屈、勇往直前的性格；就是歌颂年青一代宽阔的胸怀、深厚的战友之情。

我们的共青团员光荣地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屈服，没有被吓倒，而是得到了锻炼，学会了战胜敌人的战斗本领和技巧。

在一次激战中，敌坦克向据守在车站附近的罗季姆采夫师的一个步兵连发起攻击。团支部书记费多尔·雅科夫列夫抓两颗反坦克手榴弹，挺直身子，高呼着“同志们！决不后退一步！”将手榴弹扔到领头的坦克底下。坦克燃烧起来。雅科夫列夫正要扔第二颗手榴弹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雅科夫列夫的模范行动激励着战士们，他们用手榴弹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在雅科夫列夫的遗物里找到了他写的一张纸条。《我的誓言》——这是这位共青团员为自己写的真诚而朴实无华的诗句所加的标题。诗是：

我是党的儿子，祖国是我的母亲，
敬爱的列宁就是我慈父。
战斗中，我决不后退，
让朋友和敌人都知道……

法西斯敌人的 8 辆坦克在机场营房区攻击哈桑·扬别科夫指挥的 1 辆坦克。他接受了挑战，并击毁了 4 辆敌坦克。但扬别科夫的坦克也被铝热弹击中燃烧起来。敌自动枪手包围了坦克，并等着苏联坦克手们从车里跳出。

然而苏联军人决心宁死不降，战斗到底。当火和烟雾充满了坦克的战斗部时，我们坦克部队的值班无线电员，接收到了扬别科夫车长用他那熟悉的声音发出的信号，他喊到：“永别了，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接着传来歌声：“起来，伟大的祖国，去投入生死的决战！”。这是扬别科夫的全体共青团员坦克手们在高唱。苏联军人哈桑·扬别科夫、驾驶员安德烈·塔拉巴诺夫、报务员瓦西里·穆希洛夫和炮长谢尔盖·费坚科为了祖国而英勇、自豪地牺牲了。

受过列宁主义教育的共青团员们，从苏联各地来到伏尔加河上的这个坚强堡垒，他们以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优秀儿子。

人们永远怀念年青的中士雅科夫·巴甫洛夫——著名的“巴甫洛夫楼”的“主人”，年青的中尉季莫费伊·谢马什科——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战斗的英雄。共青团员军人成为敌人闻之丧胆的强击队的核心，他们在巷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现在，已把在战场上找到的染满城市保卫者鲜血的共青团证作为珍贵的文物保存起来。

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将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瞻仰这些证件，这是伏尔加河堡垒的英勇的年青保卫者们对苏维埃祖国无比忠诚的证明。

这是一张编号为 13145761 的团证。它已被地雷碎片炸破。来自萨拉托夫的 19 岁的共青团员尼古拉·博罗杜申，就是怀揣着这张团证去冲锋陷阵的，后来他英勇地牺牲了。

这是又一张团证，四周已被烧坏。它的主人是乌克兰籍战士、坦克手彼得·弗拉先科。

年青的战士在牺牲前几天才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证是在战场上颁发给他的。在同敌人的决斗中，弗拉先科的坦克中弹起火，他仍坚持战斗到最后。他的战车周围躺着几十具法西斯分子的尸体。

一位哈萨克共青团员基瑟姆·阿曼若洛夫象珍藏瑰宝一样珍藏着自己的团证。他在工厂居民区的一条大街上中弹倒地，手里仍紧紧握着团证。这是他的一面旗帜，他高举着它去战斗、去牺牲。

这是瓦西里·布托夫和亚历山大·奥列尼切夫的团证，已被子弹打穿。这两名共青团员在攻打法西斯侵略者占据的拖拉机厂时，一马当先，不幸牺牲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

在伏尔加河岸的战斗中，有成百上千名年青人被提升为团、营、连、炮营、炮连的指挥员。青年指挥员把部队紧紧团结起来，他们是年青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共青团员。

是什么使他们创造出了这些震惊世界的英雄壮举呢？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传统所培养的苏联青年的良好的精神品质。五年计划期间，他们在第聂伯列宁水电站、在共青城的工地上、在伏尔加和乌拉尔的工厂里、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在北方和南方的忘我劳动中，经受了锻炼。

第 62 集团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普通战士中仅有一种特权，那就是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经过耐心细致和孜孜不倦的政治工作，全军形成了同志般的战斗团结。战士尊敬和爱护指挥员；指挥员与战士同甘共苦、生死相依。这种战斗的友谊增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常常有这种情况，你来到观察所，就会感到战士们怎样保护你。

罗季姆采夫将军大概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红十月镇西边的前沿阵

地，战士们是怎样劝说我们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他们保证：没有我们，他们也能对付得了受领的任务。

象这样的战士爱护指挥员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充分证明了我们指挥员有崇高的威信，也证明了我军的一长制得到党的政治工作的有力支持和帮助。

战士们热爱自己的指挥员和将军，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都是同样出身的人。这是那些研究德国何以在东方战线遭到惨败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永远无法理解的。

虽然战火和水把我们与辽阔的祖国大地分隔，我们的心总是同全体苏联人民连在一起。

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收到了许多信件、包裹、电报，更不用说枪支弹药了。正是这种温暖的关怀，激励着第 62 集团军的全体军人去创立不朽的功勋。全体指战员都知道，他们的战斗功勋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2 我们讲了主要的事情，讲了斗争中的思想工作，讲了爱国主义，讲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对故乡的热爱，讲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贞不渝，讲了对战士的培养教育。然而，如果我们在战斗进程中没有掌握、没有提高战斗技能，没有取得以劣势兵力顶住、阻止住优势敌人的突击、直至最后把它赶走的作战本领，那么，上述这一切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

尽管在那异常恶劣的条件下，部队机动非常困难，然而，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仍然实施了机动，使兵力较弱的方向在夜间得到了加强。德国人被搞得莫名其妙：昨天这里几乎还是空无一人，可今天清晨这里已建立起牢固的和顽强的防御，有时还实施反攻击。

希特勒的将军和军官们的城市作战战术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楔形攻势在巷战中被粉碎，失去了锐势。

技术装备、特别是飞机在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使敌人在城市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敌人原以为，航空兵将摧毁一切，并为地面部队打开一条通路，然而，他们的打算落了空，因为我们的强击队与敌人短兵相接，这使希特勒的飞行员颇伤脑筋，既不能伤害自己人，又要能轰炸俄国人。很多次，他们企图轰炸我强击队，而炸弹却落到了德国人的头上。

我们的城市作战战术是与德国人的战术相对立的，它是在战斗中制定的，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加以完善的。

我在伏尔加河岸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决不能死搬教条。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探求组织和遂行战斗的新方法。

斯大林格勒同我国所有的和平城市一样，都没有防御准备，更不用说在围城条件下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原先在城里的街道上没有构筑过任何防御设施，只是在开始巷战后才构筑。这也是第 62 集团军当时的作战条件的特点之一。

我们集团军创造了许多大城市作战的新方法。在交战过程中，我们的军官和将军们不断地学习，大胆地抛弃不适合巷战战术方法，在部队中推广和使用新的战术方法。

早在会战的初期阶段，我们就已完全清楚，要迫使敌人放弃他自己的计划，只能采取积极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在这方面，我们各支撑点的守备部队，都有了各自为战、机断行事的经验。他们学会了与所属炮兵、迫击

炮、坦克、工兵协同动作、以及用各种武器进行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的作战方法。他们为了反冲击经常频繁出击，这使他们积累了在巷战中实施机动的经验。

特别是从 11 月 19 日展开全面反攻以来，第 62 集团军的指挥员组织起精干小分队，以突然迅猛的突击，对敌人实施攻击，并夺回敌人占领的一座座楼房和一个个地段。他们猛烈地进攻敌人，插入敌后，迎面扫射、压制企图探头起身的敌人，迫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在战斗中，我们的强击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强击队的作战特点是由城市战斗的性质决定的。所谓城市战斗、城市进攻就是对有设防的住宅、楼房以及成为敌支撑点和抵抗区枢纽部的其它设施实施强击。

这种作战排除了使用大部队的可能，因此，投入作战的只能是小股步兵和个别少量的大炮和坦克。

在城市战斗的不同阶段，强击队行动的条件也不尽相同。如果敌人是刚刚突入城里，只占领了市区的一部分，他们自然是来不及构筑工事、建立牢固的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以小股部队行动，而且要独立行动。如果敌人已突入城里 2 至 3 个星期，而且以牢固的工事、周密配置的火力网来保障其防御，这时以小股部队独立作战，取得战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小股部队只能作为大部队的尖刀去行动。

强击铁路工人之家的胜利就是由每队 10—12 人的 3 个

强击队取得的。但有 82 名各种专业兵与他们协同行动。由此可见，强击队的兵力大小、编成以及作战性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强击队独立行动时，其人员不宜太多，编成主要为单兵种，但它始终要与其它分队协同动作，来完成总战斗任务的一部分。

每个强击队的兵力和编成，还取决于强击队的行动目标。指挥员应根据已掌握的有关行动目标的性质、守备部队的人数等侦察情报，来决定强击队的兵力和编成。此时，应考虑各队的行动特点。决不可忽视这些特点。不了解它们，就不可能掌握对城市有设防的楼房进行争夺战的战术。

强击队的基础是突击队，每队 10—20 人。突击队通常率先冲入楼房、土木发射点，并在里面独立作战。每个突击队都有其局部任务。其装备是轻武器：自动枪、手榴弹、匕首、铁铲（有时还当斧头用）。所有突击队归一名指挥员领导。为便于指挥，指挥员配备有信号弹和照明弹，有时还有电话。

巩固队通常分为数个小队，当指挥员一发出“冲！”的信号，他们便紧跟在突击队后面，从各个方向同时突入房屋。突入楼房夺取火力点后，立即构筑防御工事，组织对敌火力配系，粉碎敌增援守备部队的任何企图。巩固队装备重武器：轻机枪、重机枪、防坦克枪、迫击炮、防坦克炮、钢钎、十字镐、炸药。在巩固队编成内，一定要包括工兵、狙击手和其它在战斗中能有效协同动作的专业兵。

近卫军上尉谢杰尼科夫就是这样组织强击队的。他们占领了一座设防牢固的 I 形大楼，这是敌人的一个强有力的抵抗枢纽部。敌人从这儿控制了伏尔加河的一段重要地段，监视着通往伏尔加河接近地的大纵深。

实践使我们深信，各强击队必须以一个分队的人员为基础组成。一个连、一个营里不能产生现成的强击队。每个排、每个班、每个战士都应该学会强击战术。

时间和突然性，这是强击队成功地进行机动的两个极重要因素。每个

接受强击敌支撑点或抵抗枢纽部任务的指挥员，应首先利用时间和突然性这些因素。在近战、尤其是城市里的近战中，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手榴弹是战士们强击时不可缺少的武器。它经常决定着强击距离。进攻的出发阵地距敌越近越好。从这一观点来看第 62 集团军强击队的作战行动，就清楚地看到，强击队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蔽接敌。

即使指挥员拥有勇敢的强击队，如果不做充分的进攻准备，要取得胜利也是枉然。强击应经过认真准备，必须准确地考虑到每一个细节。研究强击目标，制定强击计划，这是准备工作的两大要素。

指挥员根据侦察所得的资料对目标进行研究后，必须对下列问题得出明确的回答：楼房类型、楼板、墙壁的厚度，有无地下室，出入口在哪儿，工事性质，隐蔽枪眼的位置，障碍物的位置及其形状，支撑点的敌守军有无可能与其它分队秘密来往（通过战壕）。有了这些资料，指挥员就能很快查明敌火力点的配置、其扫射扇面及其死角。如果侦察时不弄清敌守军的日常生活和毗邻楼房的火力杀伤作用，那么，对攻击目标的认识就不能说是完整的。而完整的资料，无疑对选择最有利的强击时间将产生影响。

强击队的战术是建立在每个战士的行动迅速、勇猛果断、积极主动的基础之上的。对强击队来说，必须采用最灵活的战术，因为突入设防楼房，进入敌人占领的错综复杂的房间后，强击队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情况。敌人可能会在楼房里转入反攻击。但是，不要害怕！你已夺取了主动权，它已掌握在你手中。你要凶狠地用手榴弹、自动枪、匕首、铁铲作战。房屋里的战斗是激烈的，因此应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不要掉以轻心。

集团军各部队摸到了一条规律，如果敌火力兵器仅集中在人为支撑点的楼房内，就以短促的炮兵准备，特别是对毗邻敌工事进行短促炮火准备来突然发起强击。

利用夜间或硝烟的掩护下推进到前沿的小口径炮兵，配以反坦克枪，在压制敌火力点方面，给进攻部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们以拦截射击阻挡并歼灭企图援救受攻守军的敌步兵。

独立作战的坦克，对敌枪眼或楼房进行猛烈的射击，有力地支援了强击队，加速了强击行动。使用其它现代化的斗争武器，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些指挥员提出一个问题：在城市战斗中，行动的伪装来说，是夜幕还是烟幕更为有利？我说两者都行之有效。重要的是，在夜幕或烟幕的掩护下行动，指挥员要灵活果断地指挥战斗。在强击铁路员工之家的战斗中，使用的就是烟幕。当时烟幕持续了 13 分钟，掩护了数个强击队由南向前推进，使德国兵 3 个伸出到翼侧的土木发射点没能发觉。而且，烟幕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在强击 I 形楼的战斗中，夜幕也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这次战斗，进攻选在黎明开始时，而部队的集结是在漆黑的夜间进行的。

采取坑道攻击的办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它适用于用其它方法接近目标时可能要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因此，工兵是强击队的重要成员。

在城市战斗中，与强击队作战有关的战术问题就简要地作这样的介绍。

3

我不能不说说妇女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中的英雄壮举。在我们的一些部队——高炮营、Y—2 夜航轰炸机团里，大部分战斗编组和机组人员都是由妇女组成。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看来，这些部队执行战斗任务，丝毫不逊于由男人为主组成的部队。

在斯大林格防空军的战斗编组中，无论是在高炮旁还是在探照灯旁，大部分都是妇女。

当成百上千颗炸弹落在她们身旁，不仅不能瞄准射击，甚至连在炮旁都呆不住的时候，她们也没有丢下大炮，而是继续射击。在炮火的硝烟中，在炸弹的爆炸中，她们仿佛没有看到炸起的泥土，仍在战斗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10月，我遇到过一个炮班，其中有5名还完全是孩子，但已经是经受过战斗锻炼的勇敢的姑娘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一头金黄头发的瞄准手。当时，她对九架法西斯俯冲机进行射击，只击落了一架，而她的伙伴们认为，完全可以打下2至3架，她为此愁容满面。

第62集团军的通讯分队基本上由姑娘们组成。如果派她们到通信中继站去，你可以完全放心，通信一定会得到保证。即使这个中继站受到炮击、遭到飞机轰炸、陷入敌人包围，但如果没有命令，就是死神逼近，姑娘们也不会离开。

我听说这样一个件事：有一次，在巴萨尔吉会让站地域的中继站，只剩下一个女通信兵娜佳·克利缅科。当她的女友们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时，她没有离开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仍报告着战场上的全部情况。下面就是她向集军通信枢纽部的最后报告：“中继站附近没有自己人，只有我一个了，炮弹在周围爆炸……我的右方有一些画着十字的装甲坦克正逼近，它们的后面跟着步兵……我已无法撤离，反正是会被打死的，我将继续报告。听着……一辆坦克向我的中继站驶来，从坦克里爬出两个人……他们在往四周观察，看来是两个军官。他们朝我走过来了。我紧张得心都要停止跳动了，眼看就要发生什么……”。

通话就此中断了。

50年代时，我曾遇到原第62集团军的女通信兵、现任斯梅良地区区委书记拉祖梅耶娃。我还是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第一次认识她的。通信枢纽部被法西斯分子的炸弹和炮弹摧毁，而她们仍守在电话机旁，继续呼叫着各部队的指挥员。

拉祖梅耶娃是自愿报名参军的。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 and 知识都献给了保卫祖国的事业。

1943年她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她复员后当了中学教师。从1949年开始做党的工作。

在我面前的这位谦虚、严肃的妇女，她只讲自己的战友，而关于自己，只是在我一再请求她详细地谈谈她自己当时做了些什么时，她才说：“谈谈自己”她惊奇地耸肩说，“好吧，我就谈谈自己。同我一起在马马耶夫岗的，有来自卡梅申的一个小姑娘玛丽亚·古利亚耶娃。在1942年9月12日，我和她一起，冒着敌机的不停轰炸挖掩蔽部（虽然我们误把出口朝向敌人，但也没什么不得了的！我们的通信枢纽在那里从9月1日一直坚持工作到14日）。我同她，后来是同舒拉·舍申尼亚总机值班。在市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塔娅·弗多温娜、柳芭·斯图卡洛娃、克拉夫季娅·什通达、列娜·佩列托尔奇娜等……我记得1942年8月31日那一天，姑娘们坐在帐篷里，守着电台，已经听到轰炸机的嗡嗡声，但姑娘们没有撤离岗位，因为需要转发有关德国人进攻、敌坦克插入我某部队后方的紧急通报。当时，不论是正在发报的法尼亚·列赫尼克，还是坐在她旁边的女友们，都没有离开岗位到掩

蔽部去。通信兵姑娘们已自然形成一个约定：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危险，都不能扔下女友不顾。姑娘们看着飞来的飞机，听着炸弹的呼啸声，判断炸弹大概落到什么地方。飞机一次二次进入，而她们继续拍发电报……糟糕！敌机又第三次进入，结果是，架设帐篷的地方成了一个大弹坑。

那时，形势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甚至来不及安葬我们的战友。她们就这样永远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沟。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红军战士，虽然牺牲了，却完成了战斗任务……”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还向我谈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亚的事：

“战争爆发前，她在儿童保育院工作。当听说军事委员部要征召一些自愿参加红军的女共青团员的消息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舍申尼亚立即到保育院院长那儿，请求上前线。

这一天终于来了。1942年4月底，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团员，来到了军事委员部。

一天之内，手续就办理完毕。5月2日，姑娘们就来到了部队。在阿斯特拉罕电话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后，舒拉被分到第115筑垒地域独立通信连，在总机工作。这是1942年7月在顿河的事。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她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架设了一条由筑垒地域指挥部通往波扎尔斯基将军处的电话线。这一天，马马耶夫岗一分钟也没有安静过。

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怒吼。当时，要使通信不中断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点钟，通信枢纽部里的架线兵一个也没留下，都查线去了。再也派不出人去恢复被炸断的通信线路了。这时，舒拉对通信连长说：

‘请允许我去，总机上没有我也能应付。’

‘火力太猛，你甚至无法到达断线处。’

‘我能，中尉同志，只要您允许我去。’舒拉坚持道。

连长同意了。于是，舒拉捏了捏留在总机上的一个姑娘的肩头（这是告别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过线，当天曾战斗在马马耶夫岗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都记得，自从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断后，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舒拉的声音……我常常回想，我们的女通信兵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在这战火纷飞的城市里，没有人来为她们构筑掩蔽部，她们自己或集体一起挖筑掩壕，然后用随手捡到的东西覆盖在上面。她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掩壕里坚持工作了好几个月。她们经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敌人摧毁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这时，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妇女同志来说，就更艰苦了。她们在沉闷、拥挤的掩蔽所里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几个月没有喝上一口热水。

……塔玛拉·什马科娃在巴秋克师服役。我认识她。她抢救伤员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连手都不敢抬起的情况下，也从前线抢救回许多重伤员，她为此而获得了荣誉。塔玛拉爬近伤员，和伤员并排地躺着进行包扎。她先确定受伤的程度，再决定该怎样处理。如果是重伤，那决不能留在战场上。塔玛拉经常用尽全身气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两倍的伤员背回来。有时无法把伤员背起来，塔玛拉就把雨衣、帐篷铺在地上，把伤员搬到雨衣帐篷上，然后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玛拉·什马科娃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人应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但许多被从死神那儿夺回来的战士，甚至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现在她在库尔干州当医生。

象塔玛拉这样的女英雄，在第 62 集团军里是很多的，第 62 集团军各部队受奖人员的名单中，就有一千多名妇女。她们中有：自始至终坚守在“巴甫洛夫楼”的玛丽亚·乌利扬诺娃；有从战场上抢救出上百名伤员的瓦利亚·帕赫莫娃；荣获红旗勋章的娜佳·扎尔基赫；在前沿阵地冒着炮火给数百名指战员包扎伤口的玛丽亚·韦利亚米多娃医生以及其它许多人。如在被围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备部队里，为几十名受伤的近卫军战士包扎伤口、最后因伤流血过多而手拿绷带牺牲在伤员身旁的柳芭·涅斯捷连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吗？10 月后的后半个月，城市里的情况更复杂，前线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为避免无谓的损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被迫把一些部队和机关撤往左岸，决定首先把妇女送往左岸。军事委员会命令各级指挥员和负责人让女兵们暂时撤到左岸，在那儿休整休整，几天后再回来。

军事委员会 10 月 17 日做出这个决定，18 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团来找我。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司令员同志，您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城里赶走？我们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打败该死的敌人。您为什么要分什么男女？难道我们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决不过伏尔加河。”这是 10 月 18 日进行的谈话，是在我们转移到新指挥所之后，我告诉她们，在新指挥所里，我们无法全部开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势迫使我们改用其它较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携式无线电台。这样，在没有为大型通信器材准备好工作地点之前，我只好把她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们同意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但要我保证，一旦具备了工作条件，一定要让她们回到右岸来。

10 月 18 日，她们渡过伏尔加河。而从 10 月 20 日开始，只要克雷洛夫、古罗夫或我同左岸进行电话联系，女通信兵们就同我们纠缠：“我们已经休息过来了，您什么时候让我们重新回到城里？”或者说：“司令员同志，您准备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后来，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0 月底，她们带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筑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还记得斯大林格勒的优秀女侦察兵玛丽亚·韦季涅耶娃、莉扎·戈列洛娃、玛丽亚·莫托里娜等，她们一次次地钻过鹿砦和地下室，通过河沟和下水道，穿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

显然，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谈斯大林格勒防御时，仿佛忘掉了左右邻的其它集团军？不，我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第 64 集团军所做出的英勇壮举，该集团军在勇敢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将军指挥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击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强性，从而迫使希特勒的将军们，把本应用于攻击市中心的一些团和师，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萨山前。

我怀着同样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战的部队和兵团的军人们。他们在那儿经常牵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城市保卫者的负担。打个比喻说，友邻部队从左右两面牵住了保卢斯的耳朵，使他无法为所欲为地进行武装掠夺。

我现在所写的只是我受命指挥的部队、兵团以及工人武装支部的战斗

行动，是直接与我有关的、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围歼

1

转折……它就象黑夜消失、黎明到来一样，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市的废墟上进行防御战并把保卢斯的大量兵力牵制住时，我们就深深地感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准备力量，要对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敌重兵集团军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我们转入进攻的一天必将到来。

正如后来所知，1942年11月19日前，双方兵力对比是这样的：

苏军有3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的兵力1,106,1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5,501门，坦克1463辆。

敌人在该线拥有兵力1,011,5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0,290门，坦克675辆。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苏联部队特别是在火炮和坦克上占有优势，这在实施反攻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最高统帅部巧妙地集结了必需的预备队，这是敌人所未能料到的。

双方的航空兵拥有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飞机，但在过去的9月份、特别是10月份的战斗期间，德国航空兵的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燃料基本上已耗完。苏军航空兵在发动机使用寿命和燃料方面占有优势得到了良好的保证。

到11月19日为止，第62集团军战斗队形的纵深不超过一公里。面对敌军，背靠伏尔加河。在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废墟地带，我们的部队就坚守在这里。

我集团军主力的右翼是柳德尼科夫师。在该师受到合围、已被紧逼到伏尔加河边，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占领防御。

在左翼，近卫步兵第13师沿河岸占据着一条狭窄的地带。该师的防御纵深只有200—300米。集团军司令部位于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284师接合部后面，离前沿阵地800—1000米，我的观察所更近，就在从东边环绕马马耶夫岗的一条铁路路基上，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集团军的防御正面宽约25公里，敌炮火可以从任何一翼侧对我防御正面扫射个遍，机枪火力可以达到集团军战斗队形的全部纵深。处在这狭窄的地域里，情况变得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市里的制高点马马耶夫岗、准确地说是水塔和107.5高地，都控制在敌人手里。

敌人从这些地方可以控制由东通往伏尔加河的全部接近地，而这意味着，弹药、装备、食物都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才能运到城里。

显而易见，这一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集团军提出两项首要任务：一是消灭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人，同柳德尼科夫师会合；二是夺取马马耶夫岗和107.5高地，以便把防御纵深扩展到达4.5公里，并消灭监视我集团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接近地的敌观察所。

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给部队补充一定的兵力和弹药，需要给集团军

加强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的激烈的城市防御战期间，大本营和方面军首长几乎从不拒绝我们的要求。但在反攻前夕，很显然，是不会再给我们增派部队和坦克了，就是炮弹和子弹，我们得到的也有限。

我们只好动用所有的储备物资，部队的兵员补充也主要依靠康复的伤员，他们也早就想返回自己的部队、回到城里来。这期间，第 62 集团军越来越高的声望，象块磁铁把所有的老战士都吸引回来。

至于给集团军输送弹药、或增派坦克，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了。通过伏尔加河调运物资仍然是困难重重。从 11 月 12 日起至 19 日，伏尔加河面已有冰块流动。接连好几天，没有一艘小艇或汽船能破冰行驶。

11 月 19 日清晨，雾很大。大概这一天是安排渡河最困难的一天。没人能够渡河过来。

我们甚至无法根据敌航空兵的活动来判断敌在营地里干些什么。在预定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刻，我怀着微弱的希望走出掩蔽部，希望大炮的轰鸣声也能传到我们这儿。

四周一片昏暗。一切都淹没在乳白色的浓雾里。

7 时 20 分。

令人难熬的等待！那怕有一点征候，那怕有任何迹象，证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也好。

晚到的黎明终于来了。雾仍不见稀少。真糟糕！如果在我们的突击方向上也是浓雾弥漫，那么，对敌目标的炮火准备就很困难，我们的航空兵也无法行动。

快到 12 点，雾开始消失，天色变亮了，伏尔加河冰块撞击着河岸，一片嘈杂声。开始上冻了。

现在出现了一些征候，说明敌人也不是很顺心的。天上没有一架德国的轰炸机。一架校射飞机在我们的阵地上空逗留了一会就飞走了，看来，它被召了回去。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该干我们的事了。我们开始准备预备队以援救柳德尼科夫师，并使强击队行动起来。

傍晚，方面军司令员 A·A·叶廖缅科来电话。他通知说，进攻已开始。我们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进攻日期仍是原定的 11 月 20 日。

很快就要有结果了。

按原定计划，11 月 19 日 7 时 20 分，集中在长约 28 公里的主要突破地段上的各种大炮和迫击炮进入战斗准备。7 时 30 分，传来开火的命令。

3500 门大炮和迫击炮将一吨吨的钢铁和炸药抛向敌人的阵地。破坏射击进行了一小时，压制射击进行了 20 分钟。

这是伟大卫国战争中我军第一次实施这样强大的突击。

这次炮火突击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使敌人大为震惊。

8 时 50 分，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 5 集团军和第 21 集团

军的步兵和坦克，以及顿河方面军的第 65 集团军的突击集群同是转入进攻。

坦克第 5 集团军的快速集群（坦克第 1 和第 26 军）和第 21 集团军的坦克第 4 军，在进攻的第一天中午，就突破了敌战术防御，并前出到战役地区。战斗已在敌防御纵深展开。我军突破敌人的抵抗，顺利地发展着进攻。

在保卢斯的司令部里，他们是如何迎接这一天的呢？

11月18日至19日，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许多次进攻战斗。汉斯·德尔在其《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证实：

“那天（11月19日），第6集团军还没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集团军首脑认为没有必要采取坚决的措施。18时，集团军司令部通报说，要各侦察分队在11月20日继续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活动。”

德尔：《进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译自德文，莫斯科，1957年，第69页。

是日22时，“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男爵才发出命令。

冯·魏克斯的命令说：

“鉴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出现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便迅速腾出兵力来掩护第6集团军的翼侧，并保证利哈亚（卡姆斯克—沙赫京斯基以南）奇尔河地段铁路沿线的安全（集团军靠它进行补给）。为此，我命令：1．立即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作战，各侦察分队的行动除外。这些分队的情报对于组织防御是必不可少的。

2．第6集团军立即从所属编成中抽出2个摩托化兵团、1个步兵师，并尽可能再抽出1个辅助摩托化兵团，将这些部队归属坦克第14军司令部；此外，还要抽出尽可能多的反坦克器，并将这些集团梯次集结在你部左翼，以便向西北或向西实施突击。”

德尔：《进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译自德文，莫斯科，1957年，第69页。

但是，正如目击者证实的那样，第6集团军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并没有产生惊慌，德国将军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

一夜过去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的时刻到了。

伏尔加河和它附近的草原上又是雾气腾腾。夜里，一会儿结冰，一会儿化冰，黎明时开始下雪。我们的航空兵又不能前来支援进攻了。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的兵力是我们的集团军、友邻的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第51集团军在左翼实施突击。发展进攻的任务由T·A·塔纳希申上校指挥的坦克第13军和B·T·沃尔斯基坦克兵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4军担任。投入战斗的还有T·T·沙普金中将指挥的骑兵第4军。该军几乎都是由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骑兵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哥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

早上9点多，雾才开始消散。方面军司令员A·A·叶廖缅科几次改变炮火准备的开始时限。

上午9点30分，大炮和迫击炮开始射击。

突击是在距第62集团军指挥所60—70公里的萨尔帕湖地域实施的。

城里也在进行战斗。我们用强击队发起攻击。

11月19日和20两日，方面军司令部一直关注着敌人的行动。它是否开始撤出自己的部队？但应当指出，即使保卢斯决定从城里撤出部队，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轻而易举。在计划撤退时，在开阔地上摆脱敌人是一回事，

而在巷战中摆脱敌人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里，敌我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双方的防御支撑点，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要想摆脱是极困难的。

战后缴获的一些文件证明，第6集团军司令部尽管在晚间接到了冯·魏克斯的命令，但直到11月20日中午，仍没察觉即到将来的这场灾难会有多大。

保卢斯没有来得及撤消他11月20日下达的进攻命令。

他还在进攻！

到11月20日中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实现了突破。

13时，机械化第4军进入突破口。16时，坦克第13军在自己的地段上急速向敌防御纵深发展。22时，骑兵第4军紧跟机械化第4军前进，向西发展进攻。

11月20日下午，保卢斯才在司令部会议上第一次谈到局势的危险性。他警告说，可能会出现危机局面。他仍沉住气。但德国的将军们却陷入一片混乱中，在通信联络中断、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生疏的形势下，简直晕头转向。

直到11月20时黄昏，保卢斯才接到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军预备队被全歼的通报。

保卢斯转移了指挥所，但到11月21日夜间，他又不得不匆忙地另找更安全的地方。

11月20日晚上，我们第62集团军司令部还没掌握有关我军进攻地带局势的确切通报。我们几个指挥人员得出结论是：一切都在进行中，可是应当考虑到情报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性。

我们只能以微弱的兵力将敌人牵制在城里，此外不能再干什么。我们在等待着进攻部队南下同我们会合。

11月21日，城里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伏尔加河仍漂着冰凌。渡口上冷冷清清。又是雾，又是雪。甚至在停雪的短暂时刻，敌机也没有出现在阵地上空。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但我们的侦察员没有发现敌人集结兵力以进行强攻的迹象。因此，我们可判断出，我们的进攻发展得很顺利。

在这同时，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从这个指挥所跑到另一个指挥所。夜间，他从戈卢宾斯基跑到古姆拉克地域。他的司令部开始慌乱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11月21日深夜，当第6集团军司令部四处躲避苏联坦克时，希特勒向设在下奇尔河的一座德军司令部的电台发去一封电报，其内容是：“集团军司令应率领其司令部向斯大林格勒开进。第6集团军应占领环形防御待命。”如果说，保卢斯在尝到我军打击的威力之后，已开始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的话，那么，在遥远的德国大本营里，希特勒还陶醉在他不可战胜的梦幻中。

保卢斯开始慌张了。我军还未完成合围，而保卢斯在11月22日18时就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发电：

“集团军已被合围……燃料储备即将耗尽，坦克和重型武器将无法开动，弹药已发生危机。食粮只能维持6天。”

保卢斯在叙述第6集团军所处的困境的同时，请求在决定是否留在斯大林格勒的问题上，给予自主权。

希特勒对保卢斯的这一个企图立即做出反应。他回答说：“第6集团军

就地占领环形防御，等待从外面进行解围。”

22 日晚，我们从各种渠道获得消息，我军的进攻正顺利地发展着。23 日 16 时，A·T·克拉夫琴科少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坦克第 4 军与 B·T·沃尔斯基少将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机械化第 4 军在苏维埃农庄地域会师。

合围已合拢。处在钳形夹击中的德国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一部共 22 个师，33 万人。

2

战后，在评价 1942 年 11 月最后几天的事件时，理论界围绕着保卢斯集团军被围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迄今为止，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原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千方百计地夸大宣扬以下的假定：如果当时希特勒允许保卢斯自由行动，而保卢斯将集团军撤出合围圈的话，那情况又该会怎样呢？

如果没有忽略在这场理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想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推到他的狂热主义上，从而为普鲁士军官团恢复名誉的意图的话，那么，上述假定是不值得一谈的。

他们断言，是希特勒，只能是拥有无限独裁权力的希特勒，才把他们推到顿河草原、陷入伏尔加河畔，而且在危机关头，既听不进明智的意见，又找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

我不太相信希特勒的将军们在那时能提出什么明智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最明智的是不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从那以后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在愚蠢和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不仅对全世界、而且对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民族，犯下了愚蠢的罪行。

如果全面地看一看斯大林格勒战役就会看出，拉长自己的交通线，远离主要供给基地，远离德国本土几千公里，来进攻高加索，强攻一个我们决心全力捍卫的城市，这是明智的吗？第 6 集团军陷在巷战中，在两翼遭受巨大损失、受到削弱的时候，还继续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攻击，这难道是明智的吗？如果明智的话，保卢斯就不会向大本营发去那些歇斯底里的电报了。况且，11 月份所发生的转变，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在 8 月、9 月、10 月的浴血奋战打下的基础。如果明智的话，完全可以预见到事态将向何处转变。

我军在伏尔加河的反攻，是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所有集团军准备实施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 11 月那最关键的日子里。

11 月 19 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发起进攻。这时保卢斯还没有惊慌，他还在打算实施进攻。

11 月 19 日，德国的将军们还没想到会遭受失败。

11 月 20 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苏联统帅部要夹击敌在斯大林格勒的整个集团的意图已明了。德国将军们这时既还没叫喊被合围，更没叫喊大难临头，他们不相信我们已学会在战役地区大规模地消灭他们。保卢斯及“B”集团军群的指挥部仍在打算以自己的力量寻找出路，摆脱困境。而这时，苏军坦克正急速地合拢包围圈。保卢斯则不慌不忙地把预备队投入战斗。

11 月 22 日，他开始大呼灾难临头。然而，为时已晚。11 月 23 日合围圈合拢了。

怎么办？把部队撤出斯大林格勒，突出重围？

试问：在斯大林格勒，在城市战斗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怎样考虑使

自己的部队脱身的呢？

如果要撤走，保卢斯的部队不得不丢弃全部移动技术装备、所有的重型武器和所有的火炮。我们就要让他们钻进我们的火网，这样，能从城市的废墟里漏网爬出去的只是少数。

然而，保卢斯集团军并没有全部被困在城里。他在城郊还有许多部队。他可以把它集中在狭窄的正面地段上，并可以在 11 月 23 日或 24 日向突破口实施突击。假定说，他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丢下所有的技术装备和火炮突围到开阔地。

但正如保卢斯要人承认的那样，燃料已耗尽了。

大雪、风暴、冰层、我军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第 6 集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当年拿破仑从莫斯科逃出来到别列津纳河就全军覆灭。而保卢斯在草原上，就只能使他的军队覆灭得更快些。

希特勒不但没有作出这一决定，而是要自己的将军们、要保卢斯组织环形防御，并坚持到最后。希特勒是要以兵力达 30 多万人的被围部队拖住我 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否则，这 5 个集团军就能在战役地区大大地加强我军的攻势，使我军能够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实施突击，把在高加索的“ A ”集团军群，象合围保卢斯集团军一样，也装进大口袋里。然后将它分割。保卢斯集团军从 11 月 23 日坚持到第二年的 2 月 2 日。要是在大草原上，该集团军数日内就会被击溃、被歼灭和被俘虏。因此，不单单是希特勒，而且他的将军们，也要对德国士兵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到灾难负全部责任。

我不打算对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实施的反攻进行全面叙述。这场反攻是怎样发展的，当时的参加者将会叙述得更全面、确切。但是，我军仅仅在卡拉奇地域会师远没有解决问题，前面仍是困难重重。

我军在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进行合围过程中，封闭了合围的对内正面之后，又立即着手，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发展已开始的进攻。

11 月 23 日日终前，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 1 集团军和坦

克第 5 集团军的步兵兵团前出列克里瓦亚河和赤尔河地带，并在那里占领牢固的防御。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 51 集团军和骑兵第 4 军的部队

推进到格罗莫斯科拉夫卡、阿克赛、乌曼采沃及萨多沃耶以东一带。采取这些行动的结果，使合围战役在西面和南面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料到敌人必将试图给被围部队解围，因而及时采取了措施，在危险方向上加强力量，以对付敌人匆忙建立的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的突击。

德军新建的集团军群也遭到了失败，解救保卢斯集团军的企图破灭了。合围圈现在已牢牢地合拢。

3

我们再回到第 62 集团军的战线上来。

我说过，我们同伏尔加河左岸的联系被切断。这使我们受到限制，无法采取积极行动。

方面军首长曾有波—2 飞机将弹药、主要是食品空运过伏尔加河。但无法做到大量空投，因为必须把物资投到宽仅 100 左右的地带上。计算稍有误差，物资就会落到伏尔加河或敌人手里。

运来的弹药、食物越来越少，而伏尔加河上的流冰却越来越多。看来，

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12月16日，大约下午4时，大伙的注意力被不寻常的噪音和岸边冰块的破裂声吸引了过去。当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权当食堂的掩蔽部里吃饭。我们大家听到这不寻常的噪音后，都跑到岸上，我们看到一块硕大无比的冰块正从扎伊采夫斯基岛飘移过来。

它摧毁着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撞碎大大小小的冰块，并改变它们的流向。几根冻在一起的圆木，象轻飘飘的细木片一样，被撞得粉碎。这场面实在太惊人了。这块几乎同伏尔加河一样宽的巨大冰块，漂流速度慢了下来。我们大伙都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它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漂流，它意味着我们将有一座天然桥梁；如果停不住，渡河的艰险情景还会象以前一样：小船的马达声、叫喊声、落水的人和被挤在冰块里的人的呼救声连成一片……终于，巨大的冰块在我们的掩蔽部前面停了下来。真让人高兴万分，简直不敢相信。

我立即把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找来，命令他们组织二、三批战士带着杆子和绳子过河到对岸去。任务很简单：沿着冰块对岸，然后再返回来。工兵出发了。天已黑下来。大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每人都到岸边去了好几次，听听有没有冰块移动的声音。

晚9时，第一批工兵返回来了，他们很顺利地冰块上往返伏尔加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同“大陆”连在一起了！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日，战报上出现了这样的话：

“从12月17日早晨起，可以沿铺在冰块上的两条木板步行通过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上的这种复杂情况，也大大地妨碍了我们执行本集团军提出的各项任务。然而，我们仍抓住一切合适的机会和敌人的每一点失误，对敌实施突击，一米一米地夺回祖国的领土。

但是，只靠各步兵团的进攻，集团军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地域的伏尔加河的敌人。因为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预备队。

怎么办？怎样才能把柳德尼科夫师解救出来？

这时，我们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派上了用场。我们决定以炮火消灭敌人。然而，要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有许多困难：要非常准确地对敌人的每个据点实施射击，这需要神炮手。神炮手我们有，但从右岸进行射击校正却很困难，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信中断，而无线通信效果又太差、很不可靠。

我们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向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左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圈在里边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廊。我们的炮兵，从左岸清楚地看到这条走廊，就能弹无虚发地轰击敌人的火力点。

直接瞄准射击是在右岸的校射员的帮助下进行的。他们观察并准确地指出目标和落弹偏差，把结果报告给各炮兵观察所，后者再转告发射阵地。

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看到我炮兵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的轰击，便接敌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上。炮兵按发光信号停止了射击。以强击队为主的步兵分队，用手榴弹发起短促冲击。攻击并俘虏躲在土木发射点和地下室里的敌人。

12月23日，戈里什内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尽管遭到了敌人顽

强的抵抗，一些部队仍缓缓地向前推进，与柳德尼科夫师建立了直接联系。

12月24日，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因连续作战而精疲力尽的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和2个步兵旅，要从本集团军中撤出，转入预备队，前去整编。

按照惯例，师长、旅长、甚至团长在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之前，都要到集团军指挥所来告别。

同朋友们、尤其是同战士们告别，真是难舍难分。告别时，我们回忆起往事，脑海里再次展现出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反冲击的情景。

这些曾同我们一起渡过许多艰难日子的指挥员们，如今就要离开集团军，令我感慨万分。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又想起他们所率领的部队，这是一些多么生气勃勃、以承担危险任务而自豪的勇敢、坚定的部队！他们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一到伏尔加河渡口，便立即投入了战斗。

军事委员会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天早晨都汇总有关有多少伤员要送过伏尔加河、是哪个部队的等情况。这是为了掌握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坦克兵、炮兵和通信兵。集团军在人员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恰恰相反，集团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了，因为每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增加一份对我军力量的信心，我们已获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回想起A·F·索洛古布的第112师，该师早在顿河、奇尔河就开始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那时该师隶属于第64集团军，曾击退了保卢斯用来对付我第62集团军翼侧和后方的敌步兵第51军进攻。没有命令，该师从不后退一步。该师还在顿河两岸英勇作战过，师长伊万·彼特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在法西斯分子的枪弹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是1942年7月底，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和索洛古布都在顿河右岸雷奇科夫斯基镇北的116.6高地上，我正给该师布置任务。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突然用150毫米火炮向这个高地射击。炮弹交叉着射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显然，炮弹很快就要准确地落在山顶上。于是，我让伊万·彼特罗维奇回自己的司令部。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您呢？难道我可以在您之前从这高地上后退吗？”

我安慰他说，这不是后退，而是侦察完毕回自己的部队，以便率领部队前进。

当时冒着敌重炮的射击，行走在毫无遮档的野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却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前面。

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伤了师部的一名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伊万·彼得罗维奇沉着走过去，扶着伤员从高地往下走去。在小山沟里，我赶上了他们，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那里为伤员包扎伤口。

步兵第112师师长H·F·索洛古布上校，早在为自由

的西班牙而战时，就表现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从7月26日起，他率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占领了阵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多次击退企图占领第62集团军左侧、深入集团军后方的法西斯部队的进攻。当他发现敌人有可能要夺取顿河铁路大桥时，他勇于负责，机断行事，炸毁了大桥。

德国飞机来空袭。敌人开始迫使顿河右岸的我登陆部队退却。大家看到，师长在 H·F·索洛古布上校在岸上走来走去，安排对登陆部队的支援。一艘小船刚刚离岸就被迫击炮弹击中。只有两个战士浮出水面。

索洛古布旁边又落下几颗迫击炮弹。有几个人倒了下去，死神仿佛有意放过了他似的。

“他会念咒还是怎么的？”许多人这样想着。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击中索洛古布附近的一颗树。几块赤热的弹片击中了索洛古布，他摇晃了一下，又挺起了身子。师长的脸上和宽阔的胸膛流着鲜血。战士们跑过来想把他抬走，但他不同意。他靠在战士的肩上，继续指挥战斗。

在小橡树林的林中空地上，一个群众集会的场面展现在众人面前，索洛古布站在红旗旁宣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多人都在想：师长的心脏即使停止跳动，他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师长极度虚弱，脸色苍白，双腿终于软了下去。当把他送到卫生队时，他已昏迷过去。为了抢救师长的生命，师里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卡·卡尔波娃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索洛古布认出我后，想坐起来。

他说：“司令员同志，我执行了您的命令……”

看到战友伤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然而他却竭力打起精神说：“我还要和您一起战斗。”

“对，我们还要一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师长已停止了呼吸，我肃立在他的床头，向我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第 112 师师长索洛古布上校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我同这支部队重逢，已是 9 月 12 日，在伏尔加河畔。这时，A·T·叶尔莫尔金上校担任了该师师长。该师的任务是在城里机动作战：从马马耶夫岗到维什涅瓦亚山谷、到拖拉机厂以及敌人计划进攻我们的其它地段。该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其中至少有 10 次是在希特勒的主攻方向上作战。

该师特别精于机动，当然，这要归功于师长及其司令部。这支部队总是赶上最激烈的战斗，勇猛地去反击优势之敌的突击。

1942 年 5 月，我在预备队第 1 集团军时，就熟悉了斯梅霍特沃罗夫师，那时，该部队正在组建。也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我们在拉图地域举行的战术演习中，斯梅霍特沃罗夫就显示他那机智和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

该师开拔到斯大林格勒后，一直承担红十月镇的防守任务。该师很少实施机动，但它击退了数倍于已的优势之敌的几十次突击。即使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个星期夺取了 2—3 条街，那也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才取得的。该师的战士从未退却过。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有用自己的尸体填满掩体和堑壕，才能向前移动。就在战斗最艰苦的日子里，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灰心和惊慌。他那平稳而镇静的说话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在那样的日日夜夜里，即当上百架轰炸机、俯冲机盘旋在该师上空，成千发炮弹落在其防御地区爆炸，炸弹、炮弹的爆炸声使空气都在震荡，甚至话筒里都听到法西斯俯冲机的噪叫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却显得更加镇定。他在离前沿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指挥着各团、营的战斗。

该师在斯梅霍特沃罗夫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阵地，不断在消耗希特勒的兵力。只是在敌人被包围、并从进攻转入防守时，该师才撤出城里。

这些天里，我还同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若卢杰夫将军告了别。

希特勒分子曾突破若卢杰夫师的防御，占领了拖拉机厂，然而，敌人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了众多的兵力和武器，以致无法继续发展进攻。突破第 37 师各团的防御、向拖拉机厂进攻的，不是 1 个、2 个师、而是整整 5 个希特勒师，其中还包括 2 个坦克师。

我记得，10 月 4 日清晨，B·T·若卢杰夫偕同助手们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在乘船渡河时，他们遭到了敌人火炮、迫击炮的猛烈轰击。

古罗夫、克雷洛夫和我会见了若卢杰夫。当时我们都挤在坑道里的一间房里，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若卢杰夫进来时头碰在门框上。他穿着一件空降兵的短皮上衣。

若卢杰夫接受了防御拖拉机厂接近地的任务后，向我们每个人都提了许多问题，详细了解城市战斗的特点。我们尽量简明扼要地向他讲述了城市作战的特点。当 H·A·克雷洛夫告知他，第 37 师的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上、离“街垒”工厂不远时，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坚决要求把指挥所向前移到拖拉厂居住区的体育场区域。

“不行，”我回答：“体育场一带一直处在敌炮火射击之下，我们没有权利拿一师之长的生命来冒险。”

他跟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了饭后，然后离开了我们的坑道。因为这时敌人已开始实施进攻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

10 月 13 日晚，若卢杰夫将军和古里耶夫将军、这两个空降兵出身的老战友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

古里耶夫问：

“维克托，我的老伙计，你是在哪儿着陆的？我听到你们地段的方向上正在进行战斗，感觉如何？”

“你好！斯捷潘，”卢杰夫回答：“我这里已是第 10 天反击该死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进攻了，他们简直象群野狼一样，从三面围攻我。斯捷潘，你哪怕稍微帮我一把也好……”

“哎，伙计，到处都一样。飞贼整天都在我的小伙子们头上盘旋，一分钟都不让人安宁。我们的萨沙（罗季姆采夫），也象普罗米修斯被锁在峭壁上一样，被困住了，而他一直在反击敌人的进攻。你就这样坚持住吧！不要发愁，我的老伙计，反正我们是没什么可帮你的……”

“那怕送些烟卷来也行，一天抽 100 根也不够！”若卢杰夫朝话筒里嚷道。……他走了，而留下来的继续坚持战斗。

4

12 月 24 日，在“红十月”工厂区作战的古里耶夫的近卫第 39 师的部队和分队，开始攻击法西斯分子盘踞的各车间。

日终前，各强击队肃清了模型车间、分类车间和机工车间的敌人，尔后进入工厂西边，从而完成了对敌人的合围。敌人不想离开工厂到西边去，不愿到露天的破烂楼房里，因此进行殊死的抵抗。

12 月 24 日夜间，近卫军人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再度发起攻击。肉搏战、手榴弹近战一直持续到清晨。在近战中，敌人经不住我强击队机智灵活的逼攻，到清晨，工厂里的敌人被全部肃清。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守住了被他们改建成强大防御枢纽部的主办公楼。然而，数天后，这批敌人就被步兵第 45 师的强击队围歼掉。

指挥该师的是 B·I·索科洛夫上校。索洛夫上校的政治副手、团级政委 H·A·格拉马兹达正确地指导党政工作人员切实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因为形势不允许，而且也没有时间来集结和进行勘察等工作，该师所属各团、营，渡过伏尔加河之后，就立即投入战斗，发起反攻击。该师官兵的功绩从下面这一事实就可窥见一斑：该师师长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索科洛夫，1942 年 10 月底来斯大林格勒时，军衔是中校，而 1943 年 3 月离开斯大林格勒时，已晋升为少将。其他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军衔，也得到了晋升。

我集团军同柳德尼科夫师会合，占领了“红十月”工厂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加上伏尔加河封冻、冰层安静下来，因此我集团军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机动，对敌实施更加沉重的打击。

上级配属给我们一个野战筑垒地域（筑垒地域由指挥机关和一些拥有强大火器的分队组成）以替代撤入大本营预备队的各部队和兵团。要该筑垒地域实施进攻作战，它不太胜任，然而它却能出色地完成防御任务。它的各分队起先占领着伏尔加河上的一些岛屿——斯波尔内岛、扎伊采夫斯基岛、戈洛德内岛，后来接替了柳德尼科夫和罗季姆采夫各部队的任务。

筑垒地域面临的任务是，如果敌人企图渡河向东突围的话，不准放敌人到伏尔加河。

现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要夺取并牢牢扼守马马耶夫岗，然后派主力部队占领 107.5 高地，从而切断龟缩在城里的敌部队在与各工厂区负隅顽抗的敌部队之间的联系，尔后各个歼灭。

集团军将夺取马马耶夫岗的任务交给了巴秋克师，对 107.5 高地的突击，则由索科洛夫师、古里耶夫师和什特里尔戈尔海军陆战旅担任。

戈里什内师的进攻目标是街垒镇，它应保证从北面实施突击。罗季姆采夫师的任务是，在市中心积极行动，保障集团军的左翼。柳德尼科夫师为集团军的第二梯队，因为该师极需休整一下。

我们获知，被合围的希特勒集团，其兵力不少于 20 个师（确切数字为 22 个师），共计 30 多万人（包括军官和将军）。

敌人的这个强大集团军被我军的 7 个集团军——A·C·扎多夫集团军、A·B·加拉宁集团军、F·A·巴托夫集团军、A·M·奇斯佳科夫集团军、E·A·托尔布欣集团军、M·C·舒米洛夫集团军和第 62 集团军——铜墙铁壁般合围起来。

在与顿河方面军的 7 个集团军作战的敌 22 个师中，有 6 个师（步兵第 79、94、100、295、305 和 389 师）对抗第 62 集团军。这几个师得到了 5 个工兵独立营（第 50、162、294、366、672 营）的加强，它们是希特勒在 10 月份派出进攻斯大林格勒的。

为什么保卢斯用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来对付已连续作战 5 个月已精疲力尽和第 62 集团军呢？这实在令人费解，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虽然德军已陷入合围，保卢斯并未忘记第 62 集团军，仍然挥动巨大的拳头对着它。因此，我们进攻马马耶夫岗并经由红十月镇对 107.5 高地进攻时，不仅遇到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顽强抵抗，而且还遭到了有力的反扑。

此外，敌人深深地体会到，在城市里，不仅进攻，就是在利用绵亘的正面堑壕进行防御时，也都不可能按照野战战术的各项原则实施。有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后，敌人学会了利用最牢固的楼房和住宅的地下室作为其顽抗的支撑点，而夺取这些支撑点，是颇费一番周折的。

为了摧毁敌人在“红十月”工厂办公大楼里的支撑点，索科洛夫师的

强击队的战士们不得不打通主墙。战士们把 122 毫米榴弹炮分解开，一件件推进已占据的楼里，然后再组装起来。直接瞄准打几炮，墙上便形成一个缺口。这样，法西斯守备部队的存在，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场 122 毫米榴弹炮战，是炮兵第 178 团第 6 连连长 B

·P·别利费尔搞起来的。他一直打到柏林，现在在文尼察州当教师。

街道和广场上仍是空荡荡的。无论是敌人还是我们，都不能公开地活动。任何人不小心露出脑袋或穿越街道。都会遭到狙击手的射击或自动枪手的点射。

被紧逼到伏尔加河的第 62 集团军不断地改善本集团军的态势，并恢复了与被切断的 A·A·柳德尼科夫师的战斗联系。此时，斯大林格勒城外的我军，正与企图前来解围（从南、西南方向向斯大林格勒以西的被围部队接近）的敌军展开顽强的战斗。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上，对于敌人可能前来给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解围的方向上，由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前往阻击。阻击的正面分别为 165 公里和 100 公里。合围的对内正面与对外正面之间的距离，在西南方面军地段上约 100 公里，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段上则为 20 到 80 公里左右。

这一局势要求我们，作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尽快歼灭被合围的敌集团，因为要保持合围的对外正面，就需要补充兵力和延长时间。总参谋长 A·M·华西列夫斯基在 11 月 23 日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对局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希特勒匪徒无疑会立即采取种种措施，企图在最大的外来援助下，救出被合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

“处于合围对内正面的所有用三个方面军的部队（无需做重大的部署变动和补充准备），应从 11 月 24 日清晨起，继续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消灭被合围的敌人。”

A·M·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莫斯科，1975 年，第 252 页。

从 11 月 24 日至 30 日各方面军的部队继续执行上述任务。然而却未能实现将被合围敌军分割并消灭的意图。

德国武装力量的上层领导人，对被围的保卢斯部是向西南撤退、还是原地不动的问题发生意见分歧，最终由希特勒裁决了：

“第 6 集团军应留在原地！这是一支要塞守备部队，而要塞部队的职责就是顶住围攻。”

为了便于解围和指挥，德军在“A”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又组建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其编成内包括：德、罗部队混编的“霍利德”集群；由被打败的罗、德兵团混合编成的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以逃出合围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兵团和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的残部为基础混合编成的“霍特”集群。“顿河”集团军群里还包括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顿河”集团军群得到了拥有约 500 架飞机的第 4 航空队的支援。该集团军群的司令是曼施泰因元帅，其受领的任务是解救保卢斯的部队。

12 月初，“顿河”集团军群已拥有 30 个师（不包括被包围的保卢斯部），其中有 6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最有战斗力的是“霍特”集群。该集群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从南边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采取行动。其主力部署在

科捷利尼科沃地域。

戈林曾向希特勒保证，他的航空兵将保证保卢斯集团军所需的一切。

“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决定以最强的“霍特”突击集群实施主要突击，解救被围部人。

“霍特”集群包括：坦克第4集团军的兵团：从北高加索、沃罗涅日和奥廖尔附近调来的一些师；从德国调来的增援部队、其中包括1个拥有100毫米装甲和88毫米的“虎”式坦克营。反突击开始前，“霍特”集群的编成内包括：3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5个步兵师、2个空军野战师、2个骑兵师，还有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的一些分队和部队……“霍特”集群受领的任务是：在顿河以东沿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发起进攻，同时向第6集团军接近。其行动开始时间定在12月12日。

苏联最高统帅部给各方面军的任务是，将外围廓向西扩大150—200公里左右。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的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对罗斯托夫和利哈亚实施向心突击。这次战役计划要歼灭意大利第8集团军以及撤到奇尔河和顿河的德军兵团。这项进攻计划的代号是“土星”，准备在12月中旬实施。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接到训令，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分割并歼灭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集团。然而，我们未能在行进间做到这一点。我军在此之前进行的交战使力量受到削弱，我们也没有迅速判明，陷入斯大林格勒这个大包围圈里的敌人究竟有多少兵力。保卢斯的部队躲在地下，并加强了防御阵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立即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抽出P·B·马利诺夫斯基将军指挥的近卫第2集团军，来支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然而，局势发生了变化，分割保卢斯集团的行动只得暂停下来。

“顿河”集团军群准备向斯大林格勒实施两次突击：一次从科捷尼利沃出发；另一次从托尔莫辛出发。组建突击集群的工作也在相应地进行。

对敌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应给予应有的评价。12月12日，敌人就从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发起强大的突击。敌突击集团仗着在兵力上对已大大削弱的第51集团军的优势，开始向斯大林格勒推进。同往常一样，德国人频繁地使用坦克和飞机。然而，他们未能突破我军的正面。第51集团军一面撤退，一面进行顽强的抵抗，使敌人遭到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看到，被合围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又打起了精神。俘虏们证实：保卢斯及其周围的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与前来解围的部队相互靠拢配合攻击的命令。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遭受了巨大损失，遗体遍野，到处堆满被击毁的技术装备，他们以此为代价，用了4天的时间，才向斯大林格勒推进了一半的路程。每时每刻敌人都可能从托尔莫辛方向实施突击。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及时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令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部队改变方向，现在的进攻方向不是正南，不是罗斯托夫，而是向东南方向进攻，以便包围敌莫罗佐夫卡和托尔莫辛集团军。我军的进攻先于德军从托尔莫辛实施的突击。这场进攻于12月16日由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发起，从此以“小土星”战役载入了军事学术史。

我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摧毁敌人在奇尔河和顿河地区的抵抗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掩护“顿河”集团军左翼的“霍利德”战役集群。进攻的第9日，他们进抵塔钦斯基和莫罗佐夫卡，从西面包抄了“顿河”集团军群的翼侧和后路。为挽救局势和免

遭全歼，曼施泰因把托尔莫辛集团投入保护左翼，并将坦克第 6 师从科捷利尼科沃集团抽出撤回，从而减轻了对我第 51 集团军正面的压力。

12 月 24 日，曼施泰因暂时得以稳住了莫罗佐夫卡附近的态势，但他在梅什科瓦河又遭到了突击。

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暂缓歼灭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被围的敌军，把近卫第 2 集团军紧急调往梅什科瓦，以便抗击“霍特”集群实施的解围突击。近卫第 2 集团军从行进间投入战斗，与第 51 集团军各师协同行动，阻止了德军在梅什科瓦河的进攻，为我军在这一正面地段投入新锐兵力提供了可能。12 月 24 日，曼施泰因刚刚停止了对莫罗佐夫卡的进攻，我军便开始了对科捷利尼科沃的进攻。12 月 19 日，敌科捷利尼科沃集团军全军覆灭。曼施泰因只得下令撤退，以免自己的部队遭受重新被合围的威胁。德国统帅部想把部队解救出斯大林格勒合围圈的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12 月份战斗的结果：战线的对外正面已远离斯大林格勒 200—250 公里。灾难就要降临到在高加索作战的“A”集团军群。歼灭被围的保卢斯集团的时候到了。

5

最初，希特勒的士兵尽管身陷重围，但仍顽强地进行抵抗。可能，德军官兵和将军们对他们严密封锁了苏军的合围圈已经在卡拉奇完成的消息。而当士兵们最终得知自己的处境后，军官们又开始安慰他们说，霍特将军的强大突击集团正赶来援救他们。就这样，直到 12 月底，他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殊死地进行防守，经常战斗最后一颗子弹。几乎没有人当俘虏，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从来没想过会投降做俘虏。

只是在曼施泰因的集团军群被击溃、我军把侵略者赶向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后，被围敌军的士气才开始明显地低落。不仅士兵和军官，连将军们也不再相信能够突围出去。我军的一连串突击使敌人大为震惊。

我们的政治机关，在对德国士兵的无线电广播中，讲述了近期内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德国士兵得知，共计 30 多万人的被围集团军所需的食品，只能靠空运得到。但是，用于运送食品、弹药、燃料和回程时撤送伤员的运输机需要大量的歼击机掩护，而希特勒目前正需要把这些歼击机用在其它战线上。我们的广播说：“因此，德国士兵和军官们，你们的日口粮很快就要缩减到 100 克面包和 10 克香肠。”德国的共产党员们和“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瓦尔特·乌布利希亲自在斯大林格勒，向被包围的德国士兵和军官们，讲明在前线和在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

1 月初，顿河方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方面军军事委员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捷列金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扎科夫少将来到我们集团军指挥所。他们是从伏尔加河的冰上过来的。

罗科索夫斯基和捷列金在集团军司令部的土屋式掩体旁下车后，久久地询问我们：战斗期间我们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德国法西斯部队发动进攻、把成千上万颗炸弹投掷到城里时，我们做了些什么？是怎样做的？等等。

方面军司令员走进掩体，在土桌旁的土凳坐下来后，简要地说明了歼灭敌被围集团的计划，并给集团军下达了任务。为了割裂敌被围集团，巴托夫将军和奇斯佳科夫将军的集团军从西面实施主要突击。扎多夫将军和加拉

宁将军的集团军由北面、舒米洛夫将军和托尔布欣将军的集团军由南面同时转入进攻。第 62 集团军的任务是：“以积极的行动，从东边将更多的敌人吸引过来。如果敌人企图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突围的话，就坚决地把它堵住。

任务很明确。于是，我向方面军司令员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在方面军主力发起主攻之前，决不让保卢斯从城里撤走一兵一卒。

最后，方面军司令部的几个参谋一再问：

如果敌人在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突击下，把全部兵力从西边调到东边来，第 62 集团军能否顶得住？”

我们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这样回答：

“如果说保卢斯在今年复秋两季用其全部兵力都未能把我们赶进伏尔加河，那么，现在已是饥寒交迫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就休想向东跨进几十步。”方面军参谋长马利宁将军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说：1943 年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已不是 1942 年夏季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保卢斯的集团军已不成其为集团军，而只是一个有武装的战俘营罢了。

在方面军所有部队开始进攻之前，也就是在 1 月 10 日之前，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在执行方面军司令员下达的任务的同时，一直以强击队进攻敌人。我军各个阵地的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都有几十个支撑点和土木质发射点被摧毁或落入我军手中。结果，敌 22 个师中有 6 个师和 5 个工兵营，仍同过去一样，被第 62 集团军牵制住。

被戈林调来、向被围部队运送弹药和食品的运输机，经常遭到我航空兵的攻击。

围绕着水塔进行的生死搏斗，从 9 月下半月到 1 月 12

日，几乎持续了整整 4 个月（120 天）。

马马耶夫岗的最高点到底易手多少次，谁也说不上来。参加攻打马马耶夫岗的有：罗季姆采夫师的部分官兵；戈里什内的整个师；叶尔莫金的第 112 师；而在这里参加战斗最多的是光荣的巴秋克师。该师于 9 月 21 日抵达右岸，22 日便在多尔吉冲沟投入战斗。然后，该师仿佛在马马耶夫岗及其附近的各个山脊上扎了根似的，一直战斗到最后，到 1943 年 1 月 26 日，与奇斯佳科夫将军指挥的部队会合。

关于该师师长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的情况，我要说几句，他刚来斯大林格勒时是个中校，而在歼灭保卢斯集团军之后离开该城时已是一位将军。在这位师长身上充分地体现了三个可贵的品质：指挥坚定、作战勇敢、党性很强。他是个既严肃又正直的人，令人可畏可敬。他双腿受过伤，有时走路几乎是一步步地勉强挪动，但他从不坐守在掩体里：他拄着拐棍，又到前沿，又去观察所，而回来时经常要扶着副官的肩膀，但这只是在夜间没人看到的时候才这样。巴秋克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伤病。我是在 1 月份才知道，那时他没人搀扶已无法走动了。他对任何上级和下级人都是坦率地讲真话，尽管这样做有时很伤人情面。

他上送的报告不需要查证，总是有根有据的。

巴秋克师在来到我们这儿之前就已屡立战功，在卡斯托尔纳亚附近，曾胜利地击退了敌大批坦克的进攻。该师培养了许多不仅在斯大林格勒、就是在全国也闻名的指战员，例如：炮兵连长、著名的防坦克歼击手舒克林，迫击炮连连长、神炮手别兹季季科，出色的工兵扎伊采夫、梅德韦杰夫、阿夫扎洛夫及其他许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英雄们。

该师党组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指挥员：米捷列夫团长、在会战快结束时牺牲在马马耶夫岗的马雅克营长、舒马科夫连长。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政治工作者：特卡琴科、叶尔马科夫、索洛维约夫、格鲁布林，优秀党小组长叶夫多基莫夫、克鲁申斯基、拉德任科。

该师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转战于卡斯托尔纳亚、斯大林格勒、扎波罗热和敖德萨，进军卢布林、波兹南，最后在柏林胜利完成了战斗历程。

1943年1月10日，顿河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同时转入进攻，分割希特勒的被围集团。第62集团军也由东向西推进，以策应已进攻的各集团军。此时，在马马耶夫岗地域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战斗。这说明敌人非常清楚马马耶夫岗的战术作用。巴秋克师经由马马耶夫岗实施的进攻，在1月25日前，一直遭到敌人的反冲击，敌人纠集了最后的兵力，坚守这里的阵地。

在集团军其他各师的地段上，敌人没有退却，但也没有象在马马耶夫岗那样转入反攻击。他们只是利用工事的掩护进行射击，经常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1月23日，第54师师长索科洛夫向我报告了这样一件

怪事。他的部队前出到红十月镇的西郊，包围了法西斯分子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军向敌守军劝降。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竟向我战士要起面包来。我们的人可怜这些饿鬼，送给他们一些。敌人接过面包来，看来又有了精神，重新开始射击起来。

经过几次这样的“外交谈判”之后，我们的官兵迅速与炮兵取得联系，炮兵们推来几门大炮，直接瞄准这个支撑点射击。等我们拿下支撑点后，发现这里的敌守军是清一色的亡命之徒，几乎每人胸前都佩带有好几枚希特勒奖给他们的奖章。

1月25日，我们已感到我军正从西边压过来。于是，第62集团军便前出到斯大林格勒西郊各工厂居住区。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转向北面，消灭盘踞在各工厂区和各工厂居住区的敌北集团。巴秋克师转攻南面，对付敌南集团。1月26日，久已盼望一天终于来了。这一天，第62集团军的部队与从西面实施进攻的巴托夫集团军和奇斯佳科夫集团军的部队会师了。

下面是这次会议的经过：

黎明时，观察所报告，发现希特勒分子陷入混乱，东奔西跑。听到坦克的轰鸣声，出现了身穿红军服装的人……看见重型坦克，装甲上写着“车里雅宾斯克集体农庄庄员”、“乌拉尔金属工人”等字样。

罗季姆采夫师、古里耶夫师、巴秋克师和其它师的近卫军人，高举红旗冲向前去。

上午9时20分，在红十月镇地域举行了激动人心的会师仪式。A·E·古辛大尉把一面写着“1943年1月26日会师纪念”的红旗交给巴托夫集团军的部队代表。

严肃而饱经风霜的官兵们，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近卫军大尉F·乌先科向罗季姆采夫将军报告说：您的著名的近卫军战士们赠送给我们的红旗已收下。

“请转告你们的指挥员，”罗季姆采夫将军说：“今天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因为经过5个月艰苦顽强的战斗之后，我们终于会师了！”

钢铁堡垒——重型坦克开过来了。坦克手们从舱盖里探出身子，挥手欢呼。强大的战车群继续向工厂、向前方驶去。

很快，第 62 集团军其它分队的代表们也同巴托夫集团军、奇斯佳科夫集团军和舒米洛夫集团军的部队见了面。

敌人仍在负隅顽抗，但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敌官兵缴械投降。经常是数名苏军官兵就俘虏了上百名希特勒法西斯分子。

1 月 31 日，第 64 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第 6 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元帅和他的司令部的所有人员。当天，德军南集团也完全停止了抵抗。市中心的战斗结束了。是日傍晚，第 62 集团军的军人们俘虏了敌步兵第 295 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和他的司令部人员，还俘虏了当时正呆在该师司令部的步兵第 4 军军长普费费尔炮兵中将、第 51 军军长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中将、第 295 师参谋长迪塞利亚上校以及一些校官参谋。

希特勒的这些将军，是被第 62 集团军通信团 18 岁的团小组长米哈依尔·波尔特为首的 3 名战士俘虏的。波尔特在来斯大林格勒之前，曾在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战斗过。

1 月 31 日晚，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在我的已经变得宽敞明亮的掩体里，审讯被俘的德国将领们。看到他们那一副副因为饥饿、因为自己的命运生死未卜而心神不安的样子，我吩咐端些茶来，并请他们吃点东西。他们都身穿礼服，胸前佩带着勋章。奥托·科尔费斯将军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一块面包片，问到：

“这是什么意思，是宣传吗？”

我回答：

“如果将军认为这茶和小吃具有宣传的意思，那么，我们并不特别坚持要您食用这宣传性的食品。”

这一对话使俘虏们稍微活跃起来，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约 1 个钟头。科尔费斯将军比别人说得都多。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声称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回避回答问题。

科尔费斯将军在交谈中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状况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状况，有许多共同之处。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坐在那儿，口里不时地说着“是”和“不是”，哭了。

最后，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中将问：

“准备怎样处理我们？”

我告诉他有关俘虏管理条例，并补充说，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佩带奖章和勋章，但武器除外。

“什么武器？”普费费尔仿佛不明白似的，看着赛德利茨感兴趣地问。

“被俘的将军不得随身携带任何武器。”我又重复了一遍。

于是，赛德利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铅笔刀交给我。我当然又交还给他，并告诉他，这类“武器”我们并不认为是武器。

普费费尔将军问我：

“在 11 月 19 日之前的城市争夺战期间，您和您的（第 62 集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我回答说，我的指挥所和集团军司令部一直在城里、在伏尔加河右岸，指挥所司令部的最后所在地，就是我们现在呆的地方。

于是，普费费尔将军说：

“真遗憾，当时我们没有相信我们的侦察员。我们本来是能够将您和您的司令部从地球上抹掉的。”

审讯完被俘的将军后，我们把他们押解到方面军司令部，希望他们尽快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真实情况，以免发生谬误，并摆脱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他们的影响。

1949 年，我在柏林与奥托·科尔费斯将军重逢。他那时已是德苏友好协会里的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我们见面时，已经象老熟人一样了。我当时担任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正帮助德国同志恢复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前少将奥托·科尔费斯为巩固德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许多事情。奥托·科尔费斯不是单枪匹马地干，许多德国将军、军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后，都开始为和平、为新的德国而奋斗。

6

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南集团被消灭后，尽管局势已很明朗，即全歼敌北集团已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敌人仍在负隅顽抗。

1943 年 2 月 2 日清晨，我和古罗夫一起来到设在“红十月”工厂办公楼的废墟上的观察所。师长柳德尼科夫、索科洛夫和戈里什内的观察所都离这儿不远。第 62 集团军对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及这两个厂的居住区实施了最后一次突击。参加进攻的部队有戈里什内师、索科洛夫师、柳德尼科夫师、古里耶夫师、罗季姆采夫师和施特戈里尔旅。友邻的各集团军的部队也同时从西、西北向敌北集团发起进攻。进攻于中午 12 时开始。

炮火准备很短促，只对可见目标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是怎样在废墟里抱头鼠窜。我步兵和坦克随即发起进攻。

残余的希特勒分子抵挡不住最后的攻击。他们举起双手投降，刺刀上绑着白布条。

成千上万的德军俘虏从我们身旁走过。他们朝着近 6 个月以来一直想突破的伏尔加河、伏尔加河彼岸走去。所有士兵和军士都虚弱已极，衣服上爬满了虱子。他们衣衫褴褛，令人不忍目睹。尽管已是零下 30 度的严寒，有些人还赤着脚。然而，德国的军官们，个个全身披挂，都是肥肥胖胖的，口袋里装满香肠和其它食物，看来是分配“可怜的口粮”后剩下的。

第 6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各师师长和部分团长，聚集在“红十月”工厂被炮火毁坏了的办公楼里的最后一个观察所里，高兴地互相祝贺胜利，怀念未能活到今天的战友。

希特勒早在 1942 年 11 月就下过保证，要解救被围部队，现在已不得不正式承认惨败，并宣布举行三天的哀悼。

被围歼在伏尔加河畔的敌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的部分部队，是一支突击集团军，共拥有 22 个配备大量加强兵器的师，兵力上超过 1 个方面军军团。

希特勒很为第 6 集团军、为它的机动能力和突击能力、为它的全体官兵而感到骄傲。该集团军各师是由“纯血统的阿利安人”组成。例如，步兵第 79 师是在 1942 年 8 月组建，几乎全部由 20 至 27 岁的青年组成。据俘虏自己说，该师每 5 个士兵中就有 1 个纳粹党员。

第 6 集团军司令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和坦克第 4 集团军司令官霍特上将就是德国将官中的典型代表。在攻击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堡垒时，保卢斯 52 岁，52 年中他在德国服役了 3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一名队列军官，

大战结束时，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名参谋。1918 年德军战败后，保卢斯没有退役，还在军事部服务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坦克司令部任参谋长，积极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

希特勒掌权后，保卢斯被提拔到赖歇瑙元帅指挥的集团军参谋长的岗位上。保卢斯随该集团军在 1939 年秋进军波兰，1940 年参与了攻陷法国的战争。1940 年 9 月，保卢斯被任命为德军参谋总部军需部长。1941 年 1 月，晋升为坦克兵将军。在进攻苏联前夕，已成为希特勒的将军们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 6 集团军在伏尔加河畔被围歼期间，希特勒奖给保卢斯佩戴铁十字骑士勋章用的“橡树叶”，并授予他元帅军衔。

第 6 集团军承担过许多极重要的任务。1940 年 5 月 10

日，该集团军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背信弃义地第一个侵入比利时国土。它在阿贝特运河突破了比利时部队的抵抗之后，旋风式地占领了全国，给比利时带来了死亡和毁灭。第 6 集团军各师蹂躏过欧洲许多国家，到过布鲁塞尔和巴黎。

1941 年，希特勒把第 6 集团军调到东方来对付苏联。它在哈尔科夫地域参加过许多战斗，夺取了乌克兰的许多城市，并在 1942 年从那儿进军伏尔加河。该集团军被委以重任，承担了 1942 年南方作战计划的最重要的任务——夺取伏尔加河上的要塞。

希特勒企图为已覆灭的第 6 集团军戴上骗人的光环，以掩盖自己战略计划的失败。194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大本营发表一个特别公告，其中说道：“俄国人建议第 6 集团军的士兵投降，然而，德国士兵无一例外地都继续在原地坚持战斗。”第二天大本营又广播说：“有少数德国士兵和盟国士兵向苏联军队投降。”这所谓“少数”却足足有 9 万 1 千多人。

对已当了战俘的 2500 名军官、24 名将军和保卢斯元帅本人的命运，希特勒却闭口不提。

苏军在伏尔加河畔歼灭了法西斯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之一——“B”集团军群，尔后，又歼灭了由装备齐全的精锐部队组成的“顿河”集团军群。该军事集团被歼灭后，仅在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就收殓和埋葬了约 14 万希特勒分子的尸体。在长达 200 个日日夜夜的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德军统帅部付出了包括死伤、失踪和被俘在内的至少 150 万人的代价。

我们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驻扎了约 1 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第 62 集团军各师基本上得到休整补充，得到了新的武器，并准备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开进，赶上远去的战线。

祖国给予防御斯大林格勒的各部队和各师许多优厚的奖励。几乎所有的师、团都被授予近卫军称号。第 62 集团军也改为近卫第 8 集团军。在指挥员和战士们的胸前都戴上了“近卫军”徽章。

在奔赴前线前夕，我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调往新的工作岗位举行了欢送会。师级政委、后来擢升为中将的古罗夫，对我们大家来说首先是一位战友。

从战斗开始以来，他一直在河右岸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分担受挫折时的痛苦和分享胜利时的喜悦。而现在却分手了……

我们将库兹马·阿基莫维奇送出中阿赫图巴村。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华西里耶夫、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琴科、别列杰夫和我。谁也没说

一句离别的话和祝愿的词，但我们都与古罗夫拥抱吻别。虽然我们大家眼里含着眼泪，古罗夫却比别人更难过：他走了，而我们留了下来……

K·A·古罗夫是个意志坚强、非常冷静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都站在伏尔加河岸上，炸弹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他摘下帽子，看了我们一眼，微笑着说：“破是破了点，但还能戴。”

他是个善于把严格的党纪和军纪同令人信服的语言结合起来的坚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善于及时地在政治中保证所有战斗计划和措施的实施，不论这些计划和措施什么时候实施。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选定哪个人之后，就给予信任，从不用繁琐的监督去对待别人。他经常对我说：“这些汇报应当查实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实的”。事实上，也的确象他说的一样。在生活中，他是个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北顿涅茨河

1

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它们使我确信，苏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解除誓言。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这是神圣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思想上的转折。

《红星报》在 1942 年 12 月 1 日在社论中写到：

“第 62 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进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

“第 62 集团军的光荣将与世永存。几年后，在炮弹翻耕过的战场上，将长出嫩绿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耸立起一座座崭新明亮的大楼。那时，我们老战士将会自豪地说：‘是的，当年我曾在英勇的第 62 集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我那时的激动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当然的自豪从来不会使人有思想负担，但它也不会让你高枕无忧，否则，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考虑到：当时消灭敌被围集团的战斗还在进行，敌编成内有 22 个师、160 个独立部队，共计 33 万人；随着合围圈的缩小，他们被紧迫到遭到破坏了的城市墙角里，但他们还相信，“顿河”集团军群的强大的坦克兵团一定会接应他们。那么，那些天我心情激动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那时毫不怀疑，这场规模宏大的交战，必将以敌人的全部覆灭而告终。然而，如果曼施泰因的部队突破合围圈，并与保卢斯部会合的话，那么，第 62 集团军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还要经受多少次考验呢？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焦虑不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很久以后，在各级领导人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差不多过了 10 年，即 1952 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这些事件交换了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时正在索契疗养，午饭后，响起了电话铃。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谁讲话？”

“我是波斯克列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

由于太突然，我有点慌张。很快传来了低沉、平稳、人人都熟悉的、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斯大林问：“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样？感觉如何？”“休息得很好，感觉也极好。”我回答说。

“您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斯大林问。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现在就派车去接您。来吧！只是不要把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准备不到 10 分钟。汽车来了。我们走了不长时间。

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帽檐上拿开。说：

“为什么这么正规！认我们随便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这是我的习惯。”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是习惯，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们走进一个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间。斯大林开始问我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当时我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阳台上。饭桌旁毫不拘束的气氛，有助于开诚布公地交谈。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然问道：

“您说说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样想的，1942 年 12 月我们能否将曼

施泰因集团放进斯大林格勒，在那儿把它同保卢斯一起收拾掉？”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中，我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向保卢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围部队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围的外围廓正面是没有充分的信心的。敌“顿河”集团军群也有可能晚些时候突至斯大林格勒。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解救出保卢斯集团军后，就不再会给我们机会把们们关起来了。

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就合围本身来说，天衣无缝的合围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更不会一再重复。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即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围部队补充兵力，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并鼓动他们与解围部队一起冲出合围圈呢？如果这样的话，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力将会长久地被牵制住。而消灭这样一个庞大而凶猛的集团，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时间。

我把心里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叹了口气，沉思起来。他低声地说：

“这是非常冒险的。而冒险是不行的！人民渴望胜利！”

他站起身来，在凉台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抽着烟斗，突然问道：

“您说说，崔可夫同志，什么是被围之敌？”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思索着问题的后面有什么含义。但不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

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 6 集团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看 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 6 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

E·梅伦廷：《1939—1945 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 173 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团留在合围圈中。

他认为，被围的第 6 集团军可以牵制我数个集团军。确实，他赢得了时间，他从高加索的包围中爬了出来，他把我大量兵力牵制在伏尔加河，推迟他惨败的时间，以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挣扎。他的将军们帮了他的忙，但结局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时我曾考虑过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有下列条件来保证：使集团军的全体成员从精神上来个转变：即明智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进行野外进攻战的素养；善于在比防御性的巷战更大的范围内指挥部队实施机动的素养。

事实上，集团军是在非常狭窄的地带上进行了 150 多天的防御战。当时，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们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战术决心，他们已习惯于在狭小的地方行动，并为达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现在，当面临要进入野战阵地；要通过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十公里的区域；还可强渡江河障碍；要指挥营和团穿过田野、高山峡谷；不言而喻，他们已考虑过这些。而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摆脱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想到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团长，来检查自己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

在那时，也象以往一样，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亲身经验，帮了我的忙。

那是 1919 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交战之后，被击溃的高尔察克部队不战而退，渡过托博尔河，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追赶。

我指挥的步兵第 43 团，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荣誉革命红旗。

很快，团里来了一位新政委 F·C·尤苏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厂的工人，他比我大 15 岁左右，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很快就宣布：“团长，你来指挥，我将保证做好政治路线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过乌拉尔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高尔察克退过托博尔河以后，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萨克，补充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这些人将会同红军作坚决的斗争。

在高尔察克的命令中规定，农村居民中拥有私人土地 50 俄亩以上者为征召对象。

西伯利亚的牧师们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尔斯特特别卖力。

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配十字架的教徒游行，搞了什么“祈祷和忏悔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书、报纸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等等。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

高尔察克顺利地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招募，组建成一个军，辖 15 个团。他们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几个团征战近 1000 公里，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弹药、特别是炮弹严重不足。

下面的这个事实或许能有力地说明当时的困难；方面军从中央要了 4 万双皮鞋和包脚布。

粮食供应全靠当地居民，他们完全站在红军一边。

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东方面军改组成两个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 M·B·伏龙芝指挥，下辖第 1 和第 4 集团军；东方面军，由 B·A·奥尔德罗格指挥，下辖第 5 和第 3 集团军。第 2 集团军转隶南方面军。阿津的步兵第 28 师、第 7 师和第 21 师的一部，随集团军调走。我同我的团留在东方面军。这些师调往南方面军是因为邓尼金的集团军已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东方面军得到的装备和弹药越来越少，粮食供应更无着落。尽管这样，红军战士的士气仍很高昂，我们继续向东发展进攻。

各团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亚不可！”的口号前进。

西伯利亚的大门是库尔干。在光荣的骑兵首领托明的指挥下，红军骑兵大队飞也似的驰入库尔干，并转向北边的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尾随骑兵大队也进入库尔干。

那天，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他们在托博尔河对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组织的火力袭击。我了解到，敌人要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部面临的任务，就是用战斗强渡托博尔河。为了预防万一，那天我在城南不远的地方涉水过河亲自去观察。侦察兵的情报和我的判断都证实，这里的敌人没有撤退的意思。

呆在我团里的斯特罗加诺夫根据师首长的命令，下达指示：第 45 和第 44 团从两侧控制住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路，并准备强渡托博尔河；第 43 团退向南面，任务是强渡托博尔河，并沿铁路右侧向瓦尔加希车站进攻。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团未发一枪一弹就渡过了托博尔河，但无法发展进攻，因为在这个地段，我们的道路被旧河床、河岔和到处都是泥泞的河岸切断。还好像有意作难似的，地图上的标记也到此为止。这些河岔和旧河床究竟有多少，走向哪里？谁也说不上来。我曾亲自与骑兵侦察员去寻找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在一条河岔前面的河湾洼地东边，我们遭到伏击，

牺牲了两名侦察员，我的坐骑也被击毙。战马倒在烂泥里，我的双脚卡在马镫下，我差点就长眠在那里。雅科夫·马尔德尼科夫把我从泥足深陷的困境里解脱出来。据他自己说，他能藏身在马肚下驰骋。

全团停止了前进。我只好向旅部报告，说在该地段无法实施进攻。

次日清晨，我带着 1 名传令兵和 2 名侦察兵前往库尔干师司令部。接近该城时，我们听到铁路桥附近响起炮声，随后是轻机枪密集扫射。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友邻部队在进攻，于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作战的。斯特罗加诺夫和各团团长指挥所就在库尔干东北郊。

从库尔干向北不远的地方又传来枪声。在那儿作战的是 A·A·萨宗托夫指挥的我师第 13 旅。

清晨 8 时左右，敌炮兵、装甲列车和机关枪给我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在铁路桥附近渡过托博尔河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了。

我把情况弄清楚，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又思考了一番之后，来到旅长跟前，这时，他身边站着几位团长。我说：

“这样组织进攻，除了伤亡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直率是年轻人的特点。无论是旅长还是各团团长，都没想到这样无礼的话会出自我的口中，无论按什么条文他们都有权把我看作是一个学生。要知道他们都是久经征战的老干部。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斯特罗加诺夫问我，声音里流露出一丝不满。

“敌人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块土墩都已试射好。这儿集中了敌人的主要火器。如果我们不用炮火压制住敌人，进攻是不会成功的。此外，白天进攻也不行……。”

最后，我对旅长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的团将在明天中午以前边强渡托博尔河，占领有大片森林的河对岸之后，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

我这种自信得罪了老同志。这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很容易看出。旅政委戈里亚奇金这时也在指挥所。他没有加入谈话。但我告别后前往师部时，他赶上了我，用指责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要使我们的指挥员下不了台？难道他们不想消灭敌人吗？”

我激忿地答道：

“只有愿望不行……我是心痛我们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他们白白流血牺牲？”

“好吧！”他谅解地说：“那你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明天一定击溃敌人，强渡托博尔河，并前出到树林的东边，是这样吗？”

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下在同旅长谈话之前就已考虑成熟了的计划，回答说，决不食言，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按自己的计划行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保证取得胜利。

戈里亚奇金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师部。我去找师长，可他到政治部去了。

卡尔波夫师长热情地迎接我，可能这次我是穿着制服来的。他问起我团所在地段上的战况。我坦率地依次汇报了全部情况。

师政委加比舍夫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戈里亚奇金。加比舍夫向我打过招呼之后问道：

“你提了一项什么样的强渡托博尔河、消灭敌人的计划吗？”我明白，戈里亚奇金已向加比舍夫报告了我的建议。

卡尔波夫和加比舍夫已知道，在这两天的战斗中，萨宗托夫旅和斯特罗加诺夫旅时的几个团没有取得胜利，并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此，师长立刻对这个建议产生了兴趣。我只得把刚才对斯特罗加诺夫旅长说过的又重复了一遍。

卡尔波夫说我的计划太轻率，说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自己的团。谈话似乎就到此为止了，但加比舍夫马上插了话。

他直戴了当地对卡尔波夫说：

“为什么不能让崔可夫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个地方实施进攻呢？”

经过短暂的交谈，在政委的坚持下，卡尔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然后，他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的奖品——一块刻有名字的金表给了我，并问我还需要什么，在实施这项大胆果敢的决心中，需要一些什么帮助？

“从现在起，全师的所有地段都马上停止进攻，”我说：“炮兵应停止射击，由我来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射击。黄昏前，沟通炮兵与我在库尔干南郊的指挥所的联系。师炮兵主任应当到我的指挥所里。我旅的其它各团应做好从明日清晨起发展战果、扩大突破口的准备。”

卡尔波夫马上命令参谋长下达了有关命令。然后，他仍很感兴趣地问我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我很难确切地指出几时开始，于是我含糊地回答：不是夜间便是明日黎明时开始进攻。

反正中午前保证完成任务……

当我要离开师长时，两位政委——加比舍夫和戈里亚奇金拦住我，邀请我到师政治部去一下。他们仿佛商量好一样，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同志般地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一决心我是反复考虑过的，并请求他们不要再耽搁我了，因为做准备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至于成功与否，明天就能见分晓……

我从师部的通信枢纽部向我的副手布哈尔金下达命令把全团从所占领的地段撤下来，午夜 12 时前带到库尔干南郊；团部立刻派一小队骑兵侦察员、徒步侦察员和 2 挺重机枪赶到那儿。

出其不意是实现企图的基础。因此，我要求停止进攻和炮击，以便使敌人确信我们已精疲力尽、再也不能在该地域实施进攻。现在我需要的是有关白军的最新情报。为此，我决定亲自去获取，当然不是靠力量，而是要靠计谋。

我知道在库尔干南郊的托博尔河上，有一个骑马可以过去的徒涉场，攻城的那天我曾亲自从那儿过河。我决定团指挥所就设在这唯一的徒涉场附近。

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被叫到这儿来了。他的任务主要是在团进攻的两翼实施炮火准备，不让敌装甲列车能沿铁路不受制裁地实施机动。

卡西莫夫是个已过中年、精通自己专业的炮兵。他并未因向他下达战斗任务的是个还没长出胡须的年青指挥员而感到委曲。他把我的指示看作是命令，保证在面临的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击。

骑兵侦察队和徒步侦察队到了，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我的马车。我换上白军少尉的服装，传令兵装扮成上等兵。这些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兵在俄罗斯卡博尔卡附近歼灭高尔察克匪兵时搜集的。就这样，骑兵侦察员带着两挺机枪跟随“少尉”渡过托博尔河。同时我把徒步侦察队也带到渡口。

在托博尔河以东约 3 公里处，在两条旧河床之间的灌木林中，骑兵侦察队下了马。

我和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干涸的河沟和低地向白军的战壕摸去。还未走到约 300 米，我就装作喝醉了酒的样子，大骂彼得没有把马刷洗干净，我们骂骂咧咧地越过延伸到着树林西边空地的战壕，来到敌人的后方。

传令兵象商量好的那样对待的我怒骂，他只是催马急急前进，并一再说：“是，长官！”我在白卫军士兵的眼皮底下，两次用短鞭抽打亚库舍夫。这就造成完整的错觉，即正在行进的是长官和传令兵。在敌人的战壕里并没有当官的，而军士和士兵连想也不敢想要向怒气冲冲的长官提问点什么。

我们就这样沿着林中空地走了约 4 公里，几乎到了铁路跟前，把敌全部地段的阵地都观察了。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次侦察获得了实施进攻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敌阵地的确切配置；渡河地点；隐蔽接近战壕的通路和最利于我军展开的地区；以及敌人官兵的士气和表现。侦察兵携带几挺机枪留在两条旧河床之间，饲养员与马匹（约 40 匹马）集中在徒涉场附近。我和传令兵换上衣服后，前去迎接从南边向城市接近的部队。

刚刚结束的侦察，更加坚定了我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得知白军在库尔干抢劫了一个造酒厂。毫无疑问，敌军官得到这些不花钱的美酒会嘴馋得慌。因此我和传令兵沿敌战壕走动时，敌士兵就把我的醉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他们躺在战壕里，避免同喝醉酒的军官照面。

我想，到了夜晚，敌士兵们也会喝的……这正是实施奇袭所必需的。

我在城南约 5 公里处遇上了本团的部队，我让他们停下来进行大休息，让战士们吃饭，而把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请来开了个会。会议开得很短。我简单地通报了一下战线的情况和今天侦察的结果，然后阐述了一下这次进攻的计划。在确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正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和实施方法之后。我让他们回到部队去做准备。

日落前，全团开始横渡托博尔河。夜间 1 时左右，第 1 和第 3 营就已一枪不发没有任何阻碍地悄悄抵达对岸。这两个营在登陆场展开，作为进攻的第 1 梯队。我把我的副手布哈尔金率领的第二营留下做预备队。

第 1 和第 3 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大约 2 时左右，我们开

始偷偷地向敌阵地接近。尤苏波夫政委和我在这两个营的结合部。部队行动很肃静，口令都是低声下达的。以后，随着黎明的到来，部队紧贴着挂满露水的草地匍匐前进。进攻前，部队躺着休息了 15 分钟，同时对敌掩体进行了观察，它们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起来！跟我冲！……”我小声地向散兵线下达命令。政委站了起来。我们并肩而立。

我们身后所有的人象一个人似的都站了起来，向前冲击。右边有人忍不住喊道：“乌拉！”

全体投入进攻。1~2 分钟后，我们已站在掩体的胸墙上，用枪口对准了呆若木鸡的敌官兵。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缴了白军的械，并把他们送往后方以后，我继续前进。第 1 营穿过树林向马佳克会让站冲击。第 3 营向东北方向展开，以继续扩大突破口。在铁路附近，我们的几个连队遭到顽强的抵抗。直到这时，我才向炮兵下令开火。敌人的一辆装甲列车从东边开过来，遭到我炮兵的打击，立刻向瓦尔加希车

站退去。

到上午 10 时，全团前出至树林的东边，突破了敌人的纵深防御，且战且进，推前了约 15 公里。我们旅的其它部队跟随我团转入进攻。

中午时分，沟通了联系。卡尔波夫师长打来电话，向我下达了新的任务：在东北方向上巴拉什科沃村进攻。我试图解释说：部队没有睡觉，已很疲劳，需要休整。师长打断我的话说：

“我希望第 43 团同样出色地完成新的任务，从而支援极需支援的其他各团。”这时，仿佛是顺便说说似地，师长又补充道：“我要给第 43 团请功，呈请授予政府级奖赏。”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捉了 500 多个俘虏，缴获了 3 挺机枪。我们师的突破和尔后的进攻，与第 5 集团军部队的总攻汇成一片。敌人失掉托博尔河上的有利阵地后，开始向东撤退。

对我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一次取得独自定下决心、果断地指挥作战的资格的考试。

战斗中需要深思熟虑的果断，正如鸟儿需要翅膀一样。而最主要的是，我相信了这样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当然，不能把国内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实施方法机械地套用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因为时过境迁、进行战争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然而，对解决战斗任务采取创造性的态度这一原则本身、包括主动性和慎重的果断性，是决不能放弃的。回想起过去的经验，我从精神上做好了解决新任务的准备，并尽力在准备经受新的考验过程中，用这种精神去感染教育部属。

2

1943 年 3 月底，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将第 62 集团军调入

西南方面军编成内，并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

集团军驻扎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我们补充了兵员和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技术装备。

最高统帅部为了推广斯大林格勒部队的战斗经验，把这些部队分散到了各个军团。有些兵团完全离开了我们。一些新的师、新的兵团补充到我们集团军。

我们离别任何一块土地，从来没有象离别斯大林格勒这样难舍难分过，尽管正是在这儿，我们集团军经受了从未预料过的考验。斯大林格勒仿佛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故乡……

我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告别了那些永远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发誓一定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摧毁他们的柏林的巢穴；我们发誓永远铭记牺牲了的战友，坚决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军用列车沿铁路艰难地行进着。敌人在撤退时曾试图彻底破坏所有一切，他们炸毁了桥梁，破坏了铁路的路基，将钢轨运往西方。我们光荣的铁路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复杂条件下，居然想出办法，沿着被破坏的路基，一点点地修复了铁路线。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设置在一辆破旧的双轴客车车厢里。车厢晃来晃去，简直象货车。然而，只要它摇晃，说明客车还在行进。路上经常停车。

我想起 1920 年国内战争时期步兵第 43 团从库尔干开往船基时的情形。

那次我们在铁路行驶了 30 天左右。从斯大林格勒到斯瓦托沃—库皮扬斯克的距离，要比从库尔干到大卢基近 5—6 倍，但军用列车却走了一个多星期。

谁也还没有给我们布置具体的任务，然而很清楚，我们集团军很快要投入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里彻底解放乌克兰的战斗中去。

这时第 62 集团军本身的状况如何？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编入本集团军的几个师，经过改编后，只留下 3 个师。这 3 个著名的战斗兵团是：С·С·古里耶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39 师，В·Ф·索科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74 师；Н·Е·巴秋克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79 师。与我们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些非近卫军部队。

代替已调往其它集团军的几个师，而补入第 62 集团军的新部队是：В·С·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27 师；В·В·弗拉基米罗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88 师；А·А·马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82 师。

这些师曾在其它集团军的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

这些部队全部满员，具有优良的战斗传统，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进攻战中，获得了战斗经验。

不久，我们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告别的时刻来临了。他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

他要离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司令部各部门和各师、团。集团军里许多人都认识他、喜欢他、对他非常尊重。当然，大伙都舍不得他离开，但同时又为他的军事天才得到承认而高兴。不举行欢送会是不能让他走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库皮扬斯克以东约 30 公里处，在基斯洛沃卡镇一所乡村学校的一栋炸坏了的楼房里，我们在匆忙地打扫出来的大厅里，把没有损坏的课桌和讲桌都移到一起，摆成了饭桌。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想说点心里话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是语言贫乏、是太激动影响了用词、还是这些心里话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心里明白，任命我的这位战友为集团军司令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然而感情上该怎样接受这一事实？我含着眼泪，真想延长分别的时刻，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的声音。可是，我致完简短的告别词后，就离开了。我要单独地呆一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理解我的心情。在临走时，他到小屋里找我，我们互相告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А·В·瓦西里耶夫少将，也跟着克雷洛夫离开了我们。他也得到提升，提任了集团军军事委员。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去执行任务，但往往不太注意安全。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就是由于粗心而牺牲在德军的狙击手枪下。

В·В·弗拉基米罗夫少将代替 Н·А·克雷洛夫担任

了集团军参谋长。他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熟悉司令部的业务工作。然而，领导一个师和领导一个集团军当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可能不表现出来。В·В·弗拉基米罗夫得到了 Н·А·克雷洛夫精心培养出来的集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批天才军官的大力帮助。

很快，原近卫步兵第 39 师政委 Е·Е·切尔内绍夫上校接替了 Н·А·古罗夫军事委员的职务。他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斗。我很了解他，他性格平静，很勇敢，我非常尊重他。

又到了 4 月份。在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大地裸露出身子。倾盆大雨冲

掉了地上的积雪。

山谷里洪水奔腾，河溪泛滥，北顿涅茨河的水也溢出岸外。乌克兰的大自然丰富多彩，变幻莫测。昨天暴风雪还席卷大地，而今天田野上却飘荡着浅蓝色的雾气。在温暖的大地上，青草已开始发绿，稀疏的冬麦又开始卷苗了。

1943 年 4 月 16 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 62 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 8 集团军。

方面军司令员 P·B·马利诺夫斯基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愉快的消息。那又有什么呢！第 62 集团军曾光荣地为祖国立过战功。从现在起，集团军开始过新的生活，过已预先做好进攻准备的近卫集团军的生活。

1943 年 4 月 18 日，我们接到由 A·斯大林和 I·朱可夫签署的大本营的训令。

下面是这个训令的某些要求：“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应把富有战斗经验和英勇顽强的部队组成近卫兵团（近卫步兵军、近卫集团军）留做预备队或第二梯队，在进攻战役中把他们使用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实施突破；在防御战役中，使用他们去实施反突击。”

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接着，在阐述这一原则时，大本营具体指示各方面军司令员将哪些近卫兵团撤入预备队或第二梯队，由其它部队接替其防御地区。

训令中还指示：要利用战役间歇，使各近卫兵团主要是做好“实施进攻和突破敌防御地带”的准备。

训令中直接指出，必须特别注意详细地研究诸兵种协同动作、近战、夜战、反坦克等问题。

接着，训令展示了关于各近卫兵团如何做好进攻战役准备的全套计划。

5 月，我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师都荣获政府级奖赏：近卫军军旗和勋章。在离库皮扬斯克不远的舍夫琴科沃村，军事委员会举行了授予近卫第 79 师近卫军军旗的仪式。

那天阳光明媚，H·E·巴秋克师长把全师集合在村外的田野里。近卫第 79 师！该师在斯大林格勒作为红旗步兵第 284 师而遐迩闻名。它曾在马马耶夫岗作过战，战士们多次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打马马耶夫岗，把德国侵略者赶了出去。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步兵第 284 师是城市保卫者的中流砥柱，它奋战了 150 个日日夜夜，始终不停地战斗，连一分钟的休息或战场沉寂都没有。它不断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是保证我军能够准备好反攻的铁军之一。四次荣获勋章，这就是该师从伏尔加河到柏林进军中的光辉历程的总结。

绣有伊里奇·列宁画像的红旗迎风招展，田野上响起一阵阵“乌拉！”声。

隆重的受阅仪式正在进行，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地平线上出现了 3 架敌机。但这支光荣的部队没有一个战士稍微动一下。空中展开了空战。我们的歼击机起飞迎击敌人，把敌机赶跑了。是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已不是斯大林格勒，在那里德国的空军曾独霸了天空。我们的庆祝活动有着牢靠的空中掩护。

时间在消逝……

集团军正在为面临的交战做准备。尽管防空警报象暴风雨前不绝于耳的雷声一样，预示着恶战来临，但战役间歇的时间仍在延长。

5月初，在我部驻地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我们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一批接一批地从后方机场飞来。从敌军驻地纵深内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后，出现了法西斯的歼击机，我们的飞机前往截击，同它们展开搏斗。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在南方面军、我们的西南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整个正面上，都展开了空战。不难想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最高统帅部的密集的航空兵突击，阻止敌人自由地将部队从一个地段调往另一个地段，干扰敌人集结强大的突击部队。

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大将责成我们在五月份要认真做好防御战准备。他给我送来了地图，图上已由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标出了我军的防线，我们要照图建立防御地区，构筑深沟坚垒，也就是要在德武列奇纳亚、库皮扬斯克、先科沃、戈罗赫瓦特卡地段、沿奥斯科尔河面向西和西南方向建立防线。

P·B·马利诺夫斯基命令我集团军在较狭窄的地段组织防御。还又要求我们做好准备，如果敌人转入进攻，就在库皮扬斯克——沃昌斯克方向、库皮扬斯克—丘古耶夫方向、或沿奥斯科尔河右岸，对伊久姆市和北顿涅茨的各个渡口，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进行防御，不合战士们和各级指挥员的心思。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在进攻中同敌人较量一番，要在战役地区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

我推测，希特勒很有可能准备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发动1943年的总攻，防御我方面军两翼的任务必将落在我们肩上。

我想设法同高级指挥员商讨有关实施进攻战役的方法，向他们学习在机动进攻时指挥部队的经验，向他们探询他们所知道的敌人在我军进攻时的表现。同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的谈话使我获益匪浅。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1942年11月我军突破德军顿河防线、从顿河推进到北顿涅茨河的情况。他的叙述非常动听。他从不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从大夸大我军的胜利。

我还同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进行了交谈。战前，我们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他是一位机智、刚毅的指挥员。

B·A·库兹涅佐夫，还有坦克第3、第6集团军司令员F·C·雷巴尔科和E·M·哈里托诺夫，让我注意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就是斯大林格勒之战后，德国人开始丧魂落魄地害怕被包围，他们特别害怕我坦克出现在其后方。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北顿涅茨河的侦察员抓来一个“舌头”。俘虏声称他是野战第6集团军的。起初，我们的侦察员不相信。该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就已不复存在。这个德国兵解释说，希特勒下了一道特别命令重建了第6集团军，把它称为“复仇者”集团军。

指挥该集团军的是霍利上将。

我们试图向这个德国士兵打听，他打算复什么仇？是复斯大林格勒之仇吗？一提“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就引起他好一阵惊慌。他告诉我们，在德军中说这个词是很危险的，它已成为失败的同义词。

就这样，在斯林大格勒近卫军人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复仇者”集团军——德军第6集团军。

5月13日，从电话里接到大本营训令：

“1．暂时停止航空兵对敌机场和交通线的行动。何时恢复行动，待下达专门的指示。

如果敌人发动进攻，关于空军的使用，由各方面军司令酌情定夺。

2．采取措施，迅速储备航空燃料。考虑到须从后方运送，应筹备足20个油料基数，并在最短时间内将器材准备就绪。”

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5月20日3时30分，大本营发来通报说，德军将于5月19日至26日期间在我正面发起进攻。

大本营命令部队不能放松警惕和削弱战斗准备；航空兵应保持全面准备状态。通过侦察和审讯抓来俘虏，查明敌军的部署和进攻意图。

5月过去了。我们了解到，希特勒的将军们沉醉在美梦中，似乎从南北实施联合突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削平1943年春季之前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一线形成的突出部，并从两面夹击和歼灭库尔斯克的防守部队、占领库尔斯克，造成对我后方的纵深突破。

希特勒当然明白，这是报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之仇以及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的最后一次尝试。因此，他把一支支生力部队、新的技术装备、著名的“虎”式和“豹”式坦克以及“斐迪南”式自行火炮，都投入到已点燃的战火中。

双方都在准备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交战，都在集结这次交战的兵力和兵器，加紧构筑战壕，准备进攻出发阵地。

现在的问题是：谁将首先发动进攻？时间对我们有利，而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防御是不可能长久的。

7月4日夜間，整个战线沸腾起来。然而，首先发言的不是进攻者的炮兵，而是防守者的炮兵。于是，库尔斯克会战拉开了序幕。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计划规定，一俟发起库尔斯克会战，相邻的几个方面军都要转入进攻，使希特勒统帅部无法加强库尔斯克方向上的部队。

西南方面军应向巴尔文科沃发起进攻；南方面军应从马特维耶夫—库尔斯克地域向西、向斯大林诺、继而向梅利托波尔进攻；布良斯克方面军向奥廖尔进攻；西方面军向卡拉切夫进攻。

在这种局势下，德军统帅部失去了以预备队实施机动的任何可能性。

7月7日，我和友邻的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B·A·库兹涅佐夫上将应召到方面军司令部。我们心里都明白，该轮到我們动手了。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向我们传达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意图——利用希特勒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机会，西南方面军部队向顿巴斯发动进攻。任务是：或击退敌人，或万不得已时牵制住敌人，不使其有调动部队、增援进攻库尔斯克的部队的机会。

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强渡北顿涅茨河；协同正从米乌斯河向斯大林诺（顿涅茨克）进攻的南方面军的部队，突破巴尔文科沃地域之敌在红军城的防御；歼灭敌顿巴斯集团，并前出至第聂伯河。

在分析研究这项计划时，我们还没有太大把握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完成这项计划。很清楚，希特勒军队的覆灭已不可逆转地开始了，但要确定它的抵抗程度，我们暂时还没法办到。

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进攻时各辖3个军（或9个师）。

每个集团军各配属1个突破炮兵师、1个混成航空兵军和2至3个坦克团（或自行火炮团）。

近卫第8集团军还配属了步兵第33军，其编成内有步兵第50、第230、第243师和步兵第253独立旅。

A·H·鲁西亚诺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和E·I·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23军为方面军的第二梯队。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在进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审核了整个作战计划的每个细节，给各兵团指挥员下指示。

只剩下查明敌情和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敌炮兵阵地和火力点的分布情况了。这些情报一般是通过战斗侦察来查明的。然而，为了不暴露进攻准备，以取得实施突击的突然性，这次，我们不能积极地进行战斗侦察，何况强渡北顿涅茨河进行战斗侦察是非常复杂的事。集团军侦察主任M·J·格尔曼上校交出了唯一的一张敌人的防御工事图，这是在此之前根据各部队积累的资料绘制而成的。

敌人从3月下旬就开始沿北顿涅茨河河岸构筑防御地

区。在我们进攻开始之前，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两道阵地，每道阵地有2条堑壕。堑壕也是由半人深的胸墙下的掩蔽部构成的，覆以强度不一的顶盖。

敌人把部分火力点设置在冬季战斗中留下来的被击毁的坦克下面，把重机枪架设在土木发射点和露天里。步兵装备了装甲防盾板。许多火力点可对水面构成斜射。

堑壕由四通八达的交通壕连接，其前面得到防坦克和防步兵雷场掩护。

每公里地面的工事构筑的平均密度为：土木发射点4个，露天机枪阵地13个，堑壕和交通壕约2,000纵长米，防步兵障碍物约1,500纵长米，掩蔽部和土屋式掩体9个。

在纵深内，在制高点上，在居民点里和林缘，都构筑有各自形成环形防御和相互间保持火力联系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

在我军准备实施强渡的地段上，北顿涅茨河右岸对左岸形成居高临下之势，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方观察的困难。我们设置观察所应做到在渡河期间不致影响指挥战斗。我们的工兵踏遍了整个河岸，寻找设置观察所的有利阵地，即从那里在战斗中能够观察到敌防御纵深的场地。

我们还查清，在西南方面军的行动地带，与我们和南方面军对峙的是敌“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

7月17日4时50分，在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地段上，

开始了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在炮火准备开始时，方面军司令P·B·马利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A·C·热尔托夫中将来到我们集团军观察所。

河右岸掀起一排排尘柱，冒起一团团黑烟。

太阳还没升起。天空晴朗，7月的朝霞映红了草原。火箭炮射出耀眼的齐射，烟幕象浓雾一样漫过河流、芦苇、灌木林和两岸，笼罩了一切。

各先遣步兵营从灌木林里、从河岸的树林里，或匍匐前进，或弯曲着

身体奔向河岸。在烟雾掩护下，大舢舨一艘接一艘地离开岸边。

风时而把烟幕从河面上拉开。对岸的火力点活跃起来。然而，在我炮兵的准确打击下，立刻又成了哑吧。

第一批舢舨靠了岸。近卫军人们马上短促急冲，冲到了第一道堑壕，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炮击转向敌防御纵深，又一批舢舨离了岸。

到上午 8 时，我各先遣营占领了第一、第二道堑壕，并在原地固守。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将舟桥纵列运到岸边，并开始为大炮和坦克架设渡口。

渡过河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向前推进，扩大在敌岸的登陆场。但离岸后实施进攻，不象在渡口那顺利。敌人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因为敌人现在已远离我炮兵的射距。弹药的不足也影响到进攻的速度。这时，敌航空兵加紧了行动，对渡口实施突击。在河的上空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空战。我们的歼击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成功地赶走敌人的俯冲轰炸机。

战役计划的实施日期被打乱。

对我本人来讲，这是相当困难的时刻。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集团军实施的第一次进攻。受领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当然，在地图上标标箭头，布置布置任务，比起进行战斗、特别是同老谋深算的强大敌人战斗是容易得多。

应当认真考虑考虑，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尽管敌人伤亡惨重，但时至中午，我们的进攻仍处处受挫？

据被俘的德国军官证实，大约在 7 月 12 日，也就是在发动进攻前 5 天，他们已得知我方面军正在做进攻准备。他们还得知了我突击突破口的大概方向。显然，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还是未能收到突然袭击的效果。

敌人在突破地段建立了纵深梯次防御，调来了新的部队。正如德国军官供认的那样，7 月 13 日早晨起，敌人的强大兵力已坐等我军的进攻。在这之前，敌人就停止了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进攻，为了保住顿巴斯，曼施泰因根据希特勒的要求，开始从哈尔科夫附近和奥廖尔附近往顿巴斯调兵遣将。总共调去了 6 个师，其中有 5 个是装备有加强兵器的坦克师。

敌人派 2 个坦克师——坦克第 17 师和党卫军“海盗”师去援助配置在我正面地段的部队。

此外，据航空侦察报告，从哈尔科夫地域经顿巴斯到我正面地段上的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坦克、大炮和满载部队的汽车。

显然，我们正陷入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战斗。希特勒准备豁出一切，只要能护住顿巴斯。

从哈尔科夫附近调来的一些德国坦克师，出现在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的对面时，我们明白，这将大大减轻 H·E·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 A·C·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承受的进攻压力。而我们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却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又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战。

首先，敌航空兵加紧了行动，每群 20—30 架编队的“容克”机群，在歼击机的掩护下，不断地轰炸我各渡口。我们的一些部队，原奉命渡河到北顿涅茨河右岸，现已为时过晚了。

近卫步兵第 29 军的部队，数次发起攻击，都遭到敌密集射击。到处都有敌人的坦克投入战斗。敌炮兵明显地得到了加强。

是日，步兵第 33 军行动果断、坚决、它的部队接连占领了博戈罗奇诺耶诺、维斯拉山谷和锡多罗沃居民点。德国步兵第 387 师在这一天里越来越

顽强地进行抵抗，这就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该师也得到了加强。

敌人以频繁的轰炸干扰了近卫步兵第 28 军的渡河行动。

只有 H·E·巴秋克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79 师成功地渡过河，并在班诺夫斯科耶—普里希布地域集结。

近卫步兵第 88 师（师长为 I·A·韦欣少将）只来得及进行渡河集结。M·I·魏因鲁布的坦克集群渡过来已为时太晚，我没让它投入行动。

大本营要求继续进攻。一分钟也不能放松对敌人的压力。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的部队正在北边进行着更加紧张的战斗。因此，集团军司令部重新向各部队布置了进攻任务。

7 月 19 日，从早晨起，战斗已具有遭遇战的性质。敌人在几十辆坦克的支援下，不断地转入反冲击。10 时，敌 1 个步兵团，在 48 辆坦克掩护下，从卡缅卡方向；另 1 个步兵团，在 50 辆坦克掩护下，从苏哈亚卡缅卡方面，向近卫步兵第 82 师的右翼反扑。

敌人先时对该师阵地实施了虽短促但猛烈的炮火袭击。尔后，德国轰炸机出现在阵地上空，敌坦克楔子急速冲向我战斗队形。走在前面的是威力强大的“虎”式重型坦克，后面紧跟着轻型坦克和自行火炮。德国步兵在这些装甲防盾的掩护下挺着身子往前冲。坦克吼叫着前进，越过小沟直向我主要防御地区冲来。可是紧跟着，一颗颗手榴弹、燃烧瓶从堑壕里飞向坦克的侧面装甲，防坦克枪也不停地射击。敌坦克楔形队形被打乱。先头的坦克到达我军堑壕前沿，遭到炮火迎头射击。炮兵们直接瞄准射击。近战使敌航空兵无法投掷炸弹和扫射我战斗队形。

在近卫步兵第 79 师的地带内，战斗也相当激烈。7 月 20 日，该师占领了戈拉亚多利纳镇（又名秃山谷），但都无法发展进攻。加强有强击炮的敌坦克第 17 师的部队驶来，并在行进间投入战斗。此时，我近卫军人面临的任务是：阻止住敌坦克的楔形攻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这场交战，就其投入兵力的规模而言，并不令人注目。无庸赘言，这不过是一场局部意义的交战，然而，却是一场激烈无比的交战。部队称戈拉亚多利纳为“死亡之谷”。

激烈的战斗在戈拉亚多利纳镇里展开了。那里的建筑物几经易手，在坦克的撞击下，土墙纷纷倒塌，房屋荡然无存。

敌人在戈拉亚多利纳镇周围损失了 30 辆坦克，丢下了几百具尸体。敌人的反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但我们也遭受了巨大损失。许多甚至连斯大林格勒那地狱般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的人却躺倒在这里。我们还失去了光荣的战友、师长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将军。战场上风云多变。你一切都经受住了，一切都熬过去了。你曾英勇地和自己的士兵一起坚守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那是怎样的战斗啊！当时，似乎最艰难的日子已过去了，可现在……

我们把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秋克将军安葬在顿涅茨的土地上，在北顿涅茨阿尔乔姆纪念碑附近。

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们一边反击敌人的反扑，一边艰难地扩展登陆场。但显然，我们的进攻受到了挫折。

A·H·鲁西亚诺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 1 军没有投入战斗。我认为方面军司令员 P·B·马利诺夫斯基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从战役战术来看是行之有效的。因为敌人调来大量预备队同我对抗，使近卫第 8 集团军无法为机械化兵

团进入突破口创造条件。据我所知，马利诺夫斯基在 B·H·库兹涅佐夫将军的近卫第 1 集团军的进攻地段上，将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 23 军投入战斗，本意是要夺取敌人的第一道阵地。然而，该军的进攻同整个近卫第 1 集团军的进攻一样，都未能取得进展。

近卫第 8 集团军已精疲力竭，装备也消耗殆尽。由于敌航空兵破坏了渡口，弹药尤其缺乏。方面军司令员征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 A·M·华西列夫斯基的同意之后，命令近卫第 8 集团军暂时停止进攻，在原地构筑工事。在北顿涅茨河右岸争夺登陆场第一阶段的交战，就这样结束了。

4

8 月 10 日，我集团军开始将阵地移交给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8 月 12 日，我们进入方面军第二梯队配置地域。P·B·马利诺夫斯基告诉我，方面军正准备从北顿涅茨河右岸的登陆场发动新的进攻。这次突击仍选在近卫第 8 集团军曾进攻过的正面地段上，由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实施。

进攻准备的期限很紧迫。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 A·M·华西列夫斯基允许我参加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实施进攻的组织工作。这使我有机会作为旁观者来观察这两个集团军实施进攻的整个过程。

为了获得经验，我兴趣浓厚地观看了正在发动的进攻。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的第二梯队是：近卫机械化第 1 军，其编成内有 165 辆坦克（在准备进攻的过程中，增加到 200 辆）；拥有 220 辆坦克的坦克第 23 军和 B·H·巴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第 1 军。只要两个集团军的进攻一奏效，所有这些兵力即投入战斗。计划规定，一俟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的部队到达维基诺、多尔格尼科耶、克拉斯诺波利耶一线，坦克第 23 军和近卫机械化第 1 军，就在进攻的第一天立即投入突破。

没有异议，战役计划得很周密。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在发展进攻时，是能够给敌人造成危机形势，并同南方面军的部队一起，在顿巴斯围歼敌坦克第 1 集团军和野战第 6 集团军的部队。

为了便于观察，我选中了近卫机械化第 1 军的指挥观察所。它设在斯图杰诺克村西南的 215.6 高地上，从这个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实施进攻的整个地带。

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的进攻于 8 月 17 日拂晓开始。炮兵的第一次齐射相当有威力。这样稠密的火力，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敌人的堑壕上，烟尘滚滚，连泥土都直竖起来了。一片片的泥块还没落下，旁边又掀起一大片。敌各个炮兵连以及火力点的位置，早已被侦察清楚。然而，谁能保证，在进攻前夕，敌人不会转移阵地呢？我们在准备进攻，而敌人也在准备进攻。

但我听出来，在第一次密集齐射之后，我们的炮火稀落下来。这是为了节省弹药。

和我一起指挥观察所的还有 H·M·波扎尔斯基将

军、C·C·古里耶夫和 B·C·福卡诺夫将军。实际上，我们是处在 A·T·什列明将军的第 6 集团军实施进攻的地带的中心。

我很欣赏俄国军事学术经典作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罗夫的至理名言：“出奇方能制胜”。出其不意是在交战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眼前发生的事证实了这句名言。

A·B·苏沃罗人是俄国军事学术奠基人之一。——译注。

部队向敌人的阵地冲去。我们的大炮还在轰隆作响，炮弹撒向第二道防线，敌机枪、大炮从牢固的工事里向我部队实施歼灭性射击。我们的炮兵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器。

第6和第12集团军在8月17日发动进攻时有没有遵循突然袭击的原则呢？没有。这次进攻是从已经占领的登陆场开始的，敌人一定预料到，我军会投入生力部队扩大战果，因为通过巴尔文科沃向南突击，对敌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

毫无疑问，敌人发现了第6和第12集团军向北顿涅茨河接近。而两个集团军的渡河行动以及近卫第8集团军的换防，大体上就暴露了进攻的大概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确定进攻的具体时间，已没有重大的意义。在这里，沿袭下来的陈规旧套——开始炮火准备，在很大程度上帮了敌人的忙。

中午时分，第6集团军的进攻受挫。我军以重大的损失为代价，8小时战斗只向前推进了1至2公里。次日，进攻的散兵线已停止不前。不试一试实施机动、改变突击方向，一味硬攻是徒劳的。

战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8月18日，方面军司令员命令我率部进入第6和第12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

我反对把经过一场苦战后还没有做好进攻准备的本集团军投入战斗、投入到我们两次进攻均遭失败的方向和地点上。

集团军亟需休整。

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察觉出我的疑虑。他作为大本营代表千方百计试图消除我的疑虑。他非常信任地对我说：在我们北边、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行动区域内的局势，以及我军对哈尔科夫的进攻，都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运用一切力量把敌军从哈尔科夫附近吸引过来。哪怕只是几个师也好，即使吸引不过来，也不能让曼施泰因从我们的正面地段上抽走任何部队。

“如果你能牵制住德军1—2个坦克师，”他说：“这将是您对歼灭南方之敌的最大贡献。”

我建议放弃对第8集团军正面的整个地带实施分散突击的计划，我认为，重要的是将突击集中在一个狭窄地段上，楔入德军防御纵深约8—10公里，为机械化军投入战斗创造条件。如果突击成功的话，将已准备了一个多月的鲁西亚诺夫的近卫军机械化第1军投入突破口。

在突破地段上，大炮的数量是足够的，但是，实施炮火准备的炮弹却相差甚远。因此，战争之神（炮兵）这次仍不能为步兵提供充分的支援。然而，只要步兵、炮兵、航空兵密切地协同动作，机械化军及时地投入战斗，就能够弥补我们的许多不足。

马利诺夫斯基同意了我的建议。

这样，近卫步兵第29军受领的任务是：一鼓作气拿下苏利戈夫卡和多尔格尼科耶两个居民点。而近卫步兵第28军的任务是：占领多尔格尼科耶南边的林区。

并且规定，一俟占领上述地区，近卫机械化第1军便投入战斗。

8月21日夜，P·B·马利诺夫斯基来到我的指挥所，我们一起沿集团军驻地走了一圈，看了看各个师。各部队都在做战斗准备，并召开了党的会议。

许多官兵就是在这天夜里加入了党组织。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进攻的任务。有的说，近卫军人不应停止不前；有的说，是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无愧于近卫军人这一光荣称号的时候了。

“有这样好的战士，还能打不败敌人？”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对我说。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们来到出发阵地，明天的进攻将从这儿开始。一阵风把腐烂尸体的臭味刮到阵地上，德国人连自己人的尸体也没收拾。

我们将观察所选在戈拉亚多利纳北边的 217.4 高地上、在大森林的西北边。

我们只好在树林里过夜了。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真想一次又一次地检查检查，看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

集团军炮兵司令 H·F·波扎尔斯基的担子很重。他通常在弹药分布上很有些办法。他能很好地把迫击炮的火力分布到纵深达 600 米的 3 道徐进弹幕射击地区。但这次炮弹、特别是 122 毫米炮弹的数量仅够实施炮火准备。我们又一次检查了同航空兵协同动作。空军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 B·A·苏杰茨将军也在我们观察所，他已把自己的通信器材运到了这儿。

这次进攻。我们能不能做到出其不意呢？

这是一个相当矛盾的问题。登陆场已几经战火洗礼，从那里发起的进攻一个接一个，而这次我仍然要尽力做到，使集团军隐蔽地进入出发阵地。意图何在呢？意图只在于，德军统帅部在击退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进攻以后，将会认为，在这登陆场上，我们将不会投入新的集团军进行交战。这种推测当然不太有把握，但它终究给我们一些期望。

真有意思，我们的突击对敌人来说竟是突然的。这一点，后来得到被俘德军军官的证实。进攻的胜利也证实了这一点。

拂晓……大炮首先发了言。接着，B·A·苏杰茨派了几个强击机中队去袭击敌阵地。可以听到他同大队长机的谈话，他在引导飞机对我炮火准备时暴露出来的那些目标实施突击。

徐进弹幕已向纵深转移。各团团长和营长命令战士们发起冲击，散兵线一列接一列地在弹幕之后投入进攻。一切都进行得很协调。火力战斗已在敌第一道堑壕打响，手榴弹在不断地爆炸。传来了自动步枪的点射声。半个小时过去了。散兵线向前推进。现在只能听到在第二道、尔后在第三道堑壕进行的激烈战斗。我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以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步兵。

我们接到报告，近卫军人正发起争夺多尔格尼科耶村和马扎诺夫卡村的战斗。

成功了！这是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以来我们第一次取得的胜利。马利诺夫斯基命令 A·H·鲁西亚诺夫把机械化第 1 军投入战斗，该军应不停地沿着土路向多尔格尼科耶以南、多尔吉亚尔和巴尔文科沃的总方向发展进攻。接着，他与方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司令员 F·B·沃洛赫取得联系，命令他检查鲁西亚诺夫军投入战斗的情况。

机械化军的坦克纵队，将从我们所处的高地能看到的树林里驶出。战斗将激烈起来，我军的突击将会很有威力。

多尔格尼科耶的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敌人已被赶出马扎诺夫卡。为机械化军投入战斗的大门已打开。可是，坦克却没有出现！

马利诺夫斯基试图同沃洛赫中将联系。方面军司令员得到回答说，沃洛赫将军正在树林里，同坦克部队在一起。鲁西亚诺夫保证说，坦克马上就投入战斗。

我意味深长地看着方面军司令员。

“你看什么？！看什么！”他大声喊道：“你亲自去一趟，让他们投入战斗！他们是睡着了还是怎么搞的？”

我没等他再说什么，便急忙来到树林里，来到机械化军的出发地区。原来，方面军装甲兵司令沃洛赫中将身中流弹弹片，牺牲了。鲁西亚诺夫直率地告诉我，机械化军并没有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刚刚才在出发阵地集结。自然，我不能越过军长行事。我亲眼看到，坦克确实刚刚进入出发地区。

我对鲁西亚诺夫讲了关于必须把该军投入战斗的道理。

但我发现，他并不相信人们已突破敌人的防御，不相信我们为该军投入战斗创造了条件。

时间的消逝，敌人一面调动预备队，一面搜罗毗邻地段的兵力，企图堵住纵深达 10 公里、正面宽约 8 公里的突破口。

敌人的远程重炮不断地轰击从我后方通往前线的道路。

我向马利诺夫斯基报告，机械化军已错过进入战斗的时机。……敌人可能已做好迎击我第二梯队的准备。况且，空中已出现敌人的轰炸机，显然是从远方机场召唤来突击我坦克部队的，坦克部队的出现是敌人早已预料到的。

近卫第 8 集团军被迫转移炮兵发射阵地，向进攻部队靠拢。

方面军司令员整整一天都呆在集团军观察所里。晚上，他回方面军司令部时，命令我和友邻的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从 8 月 23 日早晨起继续发动进攻，任务不变。他还再次向鲁西亚诺夫将军明确了明日清晨投入战斗的任务。

次日清晨，经过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集团军再次发起进攻，肃清了多尔格尼科耶村的全部守敌，并前出到该村以南的西部林缘。根据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鲁西亚诺夫的军以密集战斗队形发起进攻。坦克翻过多尔格尼科耶村以南的 242.9 高地，立刻陷入敌埋伏在地下和隐藏在灌木林中的坦克火力网。敌人直接瞄准射击，我们的坦克中弹起火。

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敌人是怎样使用防坦克鱼雷对付我们的坦克，这种鱼雷从战壕里发射，用导线制导。鱼雷把坦克撕裂成几大块钢铁，飞出 10—20 米。在我们的炮兵还没有以强大的火力对敌坦克和战壕实施强有力的火力突击之前，看着坦克被击毁，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很明显，敌人在一夜之间就把预备队调到受威胁的地段。我们再次碰上了越来越强的抵抗。敌人将顿巴斯的全部兵力投入战斗，简直是用尸体堵住通往巴尔文科沃的突破口，因为在目前的局势下，丢掉巴尔文科沃对敌人来说无异于覆灭。

在西南方面军右侧行动的我军正向哈尔科夫挺进，南方面军在我左侧顺利地发展进攻，别尔扎林将军指挥的突击第 5 集团军的部队突破了古比雪沃、德米特里耶夫卡地段的敌防御，正在继续向前推进，近卫机械化第 4 军的部队则随之跟进。敌人慌了手脚，已不知从那里去调预备队，应该怎样堵塞突破口。

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8 月 22 日显然是关键的一天。敌人在顿巴斯重新向我们发起进攻。尽管第 6 集团军顶住了敌人带威胁性的突破，但

它已没有力量重新恢复态势。

在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地段上，敌人发动的新的强大攻势虽已受阻，然而，集团军也精疲力尽。”

8 月 23 日，草原方面军的部队，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积极配合下，解放了哈尔科夫市。

毫无疑问，我们的进攻虽然没能向纵深发展，但是却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为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但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敌人不从哈尔科夫附近调走部队，它是能够暂时阻止住我军进攻的。而那样的话，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就会同没有预备队的敌人作战，那么，我们在巴尔文科沃方向上所作出的努力，将会大功告成；而德军的覆灭，将要在巴尔文科沃地域开始。我军前出到哈尔科夫及其以南地区，继而向扎波罗热方向突进。

大本营在北顿涅茨的想定基本实现了。我们把敌人吸引了过来，牵制住它，使它无法实施机动。

8 月的战斗，不仅为全部解放顿巴斯、也为尔后解放祖国的整个南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泰因急急忙忙地飞往文尼察，赶到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他写道：“8 月 27 日，在希特勒的大本营举行了会议。我向希特勒明确地提出，唯一的抉择是：要么迅速给我们增派新的部队，至少得要 12 个师，同时从其它无战事的地段抽调部队来替换已被削弱的部队；要么放弃顿巴斯，以腾出集团军群正面上的兵力……”而那时，希特勒已不可能再给“南方”集团军群抽调 12 个师了……

扎波罗热、尼科波尔、敖德萨

1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向巴尔文科沃、克拉斯诺阿尔梅伊斯科耶、沃尔诺瓦赫一线的突进，决定了希特勒军队在顿巴斯的命运。草原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发起的进攻战役，使希特勒统帅部无法守住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地区。

曼施泰因为了摆脱迫在眉睫的灾难，经过长时间而毫无结果的寻找出路之后，于 9 月 15 日下令将“南方”集团军群主力部队撤过第聂伯河，而在南线的部队，则撤过莫洛奇纳亚河。

第聂伯河一线成为德军“东方壁垒的基础。”

这一名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情况。因为第聂伯河很适合构筑牢固的防线。

了解以下情况对我们非常重要：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米乌斯河、北顿涅茨河、顿巴斯失败之后，德军士兵和一般军官寄希望于什么呢？

东方壁垒——这首先是德军军官和士兵把它作为阻挡红军进攻的现实希望来称呼的。甚至传说那儿构筑有无论是人、是坦克或大炮都无法攻克的秘密工事。

德军统帅部在将部队撤往第聂伯河右岸、并把部队调到东方壁垒后面的时候，在左岸的某些地段上仍留下了一些得到大力加强的登陆场，既作为可能的反攻基点，也作为防御地区、筑垒地域。按他们的意图，这些登陆场能够消耗我军的力量。留在左岸紧挨河岸的登陆场，还是德军统帅部稳定军心的一副镇静剂。

扎波罗热市就是其中的一个登陆场。它掩护和控制着重要的工业中心，是第聂伯河左岸的东方壁垒的起点。

因此，统帅部给西南方面军下达的任务是：最晚不迟于 10 月 3 日全部肃清扎波罗热登陆场的守敌，并在该地段上前出至第聂伯河。

9 月 16 日，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向我解释，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准备将近卫第 8 集团军调到中央方向上，而 I·H·朱可夫坚持要将第 8 集团军转隶于草原方面军，以便支援 A·C·科涅夫实施的大规模战役。但是，P·B·马利诺夫斯基不想放走近卫第 8 集团军，他坚决请求大本营把第 8 集团军留在西南方面军的编成内。他报告说，没有近卫第 8 集团军，他无法占领扎波罗热登陆场。

9 月 23 日，集团军司令部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训令，命令集团军在第 12 集团军和近卫第 3 集团军的结合部集结，这两个集团军已经作为准备向扎波罗热登陆场发动进攻。

为此，我部应在维什涅夫卡、沃利尼扬卡、别克罗夫卡、新斯捷普尼扬斯基一线的正面地段上，替换近卫第 3 集团军和第 12 集团军的部队。

我们面临的是一条早就苦心经营的壁垒森严的防线。让我们看看曼施泰因的证词吧。他是这样写的：

“集团军群在 1943 年初接近第聂伯河时，根据我的倡议，就着手巩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和基辅附近的登陆场，为的是，至少使敌人无法切断我们在第聂伯河现有的重要渡口附近的后方交通线。”我们沿着焦土一步步逼近第聂伯河，村庄已被烧光，桥梁和铁轨被炸掉。村民被赶过第聂伯河。法西斯分子更加疯狂地推行恐怖政策。

原近卫步兵第 27 师政治部政治辅导员（现在是上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谢米里亚加告诉我，切尔沃诺阿梅伊斯科耶市解放后，当地居民反映，公园里有一座大型的阵亡将士公墓。

希特勒匪帮在这里枪杀了从 1943 年 3 月起就陷入包围的几千名苏联军人和当地居民（苏联坦克兵曾驻扎在他们的院子里）。我们的工兵开始挖墓地，准备隆重地将英雄们迁葬。挖掘时，幸免于难的城里和近郊农村的居民都聚集到这里。我们成为这个沉痛场面的目击者。许多人根据破烂的衣服和鞋子认出了自己的亲友，他们扑到墓坑里，吻着亲人们的遗体。我们就地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官兵们宣誓要更狠地打击敌人，尽快将敌人赶出苏联国土。

雨一阵阵地下着。眼前的茫茫草原已烧焦成一片黑色平原。甚至果园树上的叶子也全部被烧光。一座房屋，一栋木建筑物也没剩下。几千头被德国人打死的家畜，倒毙在田野里和道路旁，散发着臭气。

居民都被带走。凡是没法走的，都被打死在沟里……为了判断扎波罗热登陆场的情况，仅靠目视观察和航空侦察通报是不够的。方面军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在乌克兰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的帮助下，搜集到一些更为广泛的情况。

如果从工程准备的角度来看扎波罗热登陆场，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登陆场呢？

德军统帅部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了由许多支撑点组成的防御外廓，各支撑点又被绵亘不断的防坦克和防步兵障碍线所掩护，在内围廓和外围廓之间还建立了中间支撑点。

为了评述这个登陆场，我谈谈其外围廓。

外围廓前沿通过沃利纳亚谷南坡、克里尼奇内、扬采沃车站，东部边缘是德鲁热柳博夫斯基、伊万诺—甘诺夫卡、新斯捷普尼扬斯基以西地区和新耶连诺夫卡。

整个外围前沿均由一条梯形截面的防坦克壕所掩护。三角截面的防坦克壕的深度和宽度分别为 3.5 米、5—6 米。某些深度为 5—6 米的地段，灌了约 1 米左右深的水。

因此，这些壕沟不仅起着防坦克的作用，而且也是难以逾越的防步兵障碍。

在受坦克威胁方向，防坦克壕得到了雷场的加强。地雷交错地排列成 4 排。

整个外围工事配系的建筑，是考虑到要进行长久抵抗的特点。人员的掩蔽工事由坚固材料构筑，其顶部用能防御中等口径炮火和小型炸弹的顶板覆盖。火力兵器的配置，均可沿壕沿进行斜射。对这坚固的火力点、土木发射点、装甲帽堡，都需用破坏力最强的兵器才能摧毁。

敌人从各地段紧急抽调了一些兵团到扎波罗热登陆场。据我们的侦察人员证实，9 月 27 日，德军统帅部仅在防御第一线的克鲁格利克、“德米特里耶夫卡”集体农庄，就集结了 3 个步兵师。

第 125 师从塔曼半岛调来，人员编成有 7 千人。

第 304 师在我军压迫下，从利西昌斯克撤来此地时，担任后卫。该师只剩下约一半人马。

第 123 师是德军统帅部从第 17 集团军调来的。以上 3 个师的总兵力达 2 万 5 千人。

德军统帅部把防御纵深的抵抗寄托在强大的快速预备队上，即坦克第 40 军上。该军拥有 2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1 个党卫军骑兵师。

本来该军已集中完毕，准备调去作“南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但由于我军的进攻而被滞留在该登陆场。

我集团军司令部制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已经过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讨论。9 月 28 日，我批准了这份计划。9 月 29 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各军、师司令部开始制定战斗计划表，研究协同作战和战斗指挥问题，各排、营、团研究得尤其详细。

整个进攻战役的准备只用了两昼夜。这段时间有许多工作要做。加紧前送弹药，参谋人员研究地形，炮兵寻找前沿目标，并直接在步兵的战斗队形中组织防御纵深的观察哨网。

9 月 29 日到来了。敌人从早晨起，出动了约 4 个步兵营的兵力，在几个坦克群（其中一半是“虎”式坦克）的支援下，对步兵第 33 军的阵地不断发起反冲击。每次反冲击之前，敌人都要进行火炮—迫击炮急袭射击。很难判断，敌人要对那个目标实施反冲击。只能推测出，敌人是在对我准备进

攻的目标实施战斗侦察。

10月1日拂晓，我炮兵首先开火。

突破地段定为25公里。首次炮火突击打得猛烈而集中。

与此同时，右邻A·A·丹尼林将军的第12集团军、左邻C·C·列柳申科将军的近卫第3集团军都转入进攻。

我们的火箭炮在射击。然后，各种火炮的炮击声，象回声一样，响彻整个突破线。首先对第一道堑壕和已测定的火力点进行了猛烈轰击。敌人用来对我坦克直接瞄准射击的大炮遭到压制。接着炮火突然转向第二道堑壕。

我们的步兵实施蒙骗机动。一个短促急冲从出发阵地冲到防坦克壕，立即卧倒隐蔽起来并挖个人掩体。敌人以为我步兵是在徐进弹幕掩护下发起了攻击，急忙从深掩蔽部进入堑壕开火。这时我炮兵立即将突击火力再转到第一道堑壕。

从观察所可以看到，敌人工事的胸墙和顶盖与土块一起飞上了天空；在榴弹炮炮弹的准确命中下，装甲帽堡随着土块飞出去很远。

炮火再次转向防御纵深。我们的步兵又一个短促急冲，冲过了防坦克壕。我炮火又回到第一道堑壕。在近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中，就这样反复了几次。

我军的突击对希特勒军队来说并不是突如其来。然而，上午我军仍成功地突破了敌防坦克壕。步兵对第一道堑壕发起了攻击，展开了肉搏战。敌人被赶出了第一道堑壕。在坦克的掩护下，我部突入敌各支撑点，占领了一些居民点。

中午时分，弹药开始告缺。敌预备队从登陆场纵深投入作战；2时前，敌人在“虎”式坦克支援下转入反冲击。德国坦克上的88毫米炮，比我军的中型坦克上的武器要优越。

好几次，我军差不多要退回到出发阵地，幸而守住了防坦克壕，才顶住了敌人的反冲击。战斗在黄昏时平息下来。这一天战果不佳。我们没有突破敌人的防御。将敌人赶出登陆场这一既定目标，仍象进攻开始前一样遥远。由于弹药不足，使炮兵未能给步兵和坦克以应有的支援。

10月2日，经过对敌阵地短暂的急袭射击，于上午8时开始进攻。敌人立即开火迎击。我们成功地将敌人击退，夺回了一些支撑点，但快到12点钟时，进攻又受到挫折。

大约下午2时左右，我们从观察所发现，在敌防御纵深的地平线上，有一些黑点在移动，直向我军的战斗队形压来。这可能是敌坦克第40军的坦克。德军首脑用它们来对付我军，为的是要击退我对登陆场的进攻。坦克以两列队形在6公里宽的正面上压过来。德国步兵跟在坦克后面。炮兵司令员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尔斯基及时地采取了措施。我从无线电里听到他在给各炮兵部队下达命令。他把集团军所有的火炮都集中去对付敌正在实施反冲击的坦克。集团军炮兵的突击很起作用，敌坦克退了回去。但不断传来令人越来越担忧的报告，说炮兵部队普遍弹药不足。紧接着，炮连一个接一个地沉默下来。

尔后的进攻，对于我们已毫无意义。在友邻两个集团军的正面上，也没有取得战果。19时20分，方面军司令员下令停止进攻，转入顽强的防御。

各军军长接到命令，不改变炮兵部署，在占领地区加固工事。10月2日夜间，马利诺夫斯基命令：“近卫第8集团军要继续进行侦察、补充兵员、

储备弹药，以便根据特别命令在 5—6 天后继续实施进攻战役。”从 10 月 4 日起，我们对敌发射阵地加紧了侦察，并研究强击战的方法。我们按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模式，组建了进行城市巷战的强击队。

在恢复对扎波罗热的进攻战役之前，方面军司令员在近卫第 8 集团军司令部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 12 集团军司令员 A·A·丹尼洛夫将军、近卫第 3 集团军司令员 C·C·列柳申科将军、空军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 B·A·苏杰茨将军。

会议研究了参战各集团军、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问题。会议决定，由配属有大量加强兵器的近卫第 8 集团军担任主要突击。在我集团军右翼后面是鲁西亚诺夫的近卫机械化第 1 军，而左翼后面是普希金的坦克第 23 军。这两个军准备扩大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攻战果。

10 月 9 日夜幕降临了……

红军官兵们和将领们战前都得到了休整。晚饭的定量是按加强标准配给的。剩下点时间，还可以睡一会儿，好积蓄力量投入不仅是明天、可能是几天几夜的战斗。睡不着吗？在进攻开始前，在预感到要进行激烈的战斗前夕，不论是士兵还是将军，都无法入睡。

夜晚。既看不到一堆篝火，也看不到一处火光，甚至连划火柴和打火镰的闪光也没有。

前沿一片沉寂。一种特殊的沉寂。偶而忽这忽那地传来武器的碰撞声。一颗颗照明弹飞挂在德军阵地上空。

他们知道我们在准备进攻，他们也在准备对付我们的进攻。他们唯一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开始。今天、明天、拂晓、黄昏、还是中午？法西斯分子惶惶不可终日，飞机用降落伞投下一串串照明弹。他们在等待着……万籁俱寂。一切运动停了下来。部队已进入出发地域，交谈声停了下来，即使战士们聚在一起开个玩笑或在战前谈谈心，也是压低了嗓门，低声细语。总而言之，把一切都隐蔽起来。

我沿堑壕走去，见那里的红军战士已做好了清晨进攻的准备。一名自动枪手用雨布盖住身子，钢盔低低压在头上，半倚半躺着。这是一名列兵射手，年纪已不轻，可以看出是刚应征入伍的。猛一下看不出他是在睡觉还是打瞌睡。我停住脚步，他站了起来。黑暗中，他看不清我的军衔。

我们互相问好，我作了自我介绍。自动枪手挺直了身子表示敬意，我紧握住他的一只手，我们一起坐下。我们把烟卷藏在袖子里，用手掌遮住微弱的火光，抽起烟来。

“司令员同志，是明天吗？”士兵问。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是明天发动进攻吗？会不会由于什么原因而推迟？“明天，士兵同志。或许会推迟！你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想了一会。他不是那种急性子的人，回答问题也是不紧不慢、字斟句酌。

“在我们士兵看来，司令员同志，我们早已准备好了！方面军和集团军准备得怎样，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准备就是打，越快越好。最可怕的不是战斗本身，而是等待。对士兵来说，没有比推迟原定的进攻更糟糕的了。”

“怎么能这样说？”我仿佛感到很奇怪，我问道：“一天过去了，没有进攻，你又活过了一天，有什么不好？”

“然而，进攻的那一天终归要到来！为什么要等待？你养精蓄锐，全身

象弓弦一样绷得紧紧的，可是，眼巴巴看着又推迟了……你又得从头开始。而打死嘛？无论在进攻中，还是在防御中，都可能打死的。……防御中更容易糊里糊涂地死去。炮弹飞过来，它是不由你选择的。而在进攻中，司令员同志，自己就要想些办法。要及时地跃起，及时地卧倒，应当懂得怎样战斗！”

“看来，明天的进攻，对你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不是头一次，司令员同志，但总是象第一次一样！我的战斗生活是从库波罗斯纳亚山谷开始的。独立陆战旅……司令员同志，可能您还记得吧？”斯大林格勒的库波罗斯纳亚山谷是没法忘记的。陆战队在那儿的表现很突出。我知道，仅有为数不多的人活了下来。

“这么说，从那时起，你一直在部队里？”我小心翼翼地问。

“库波罗斯纳亚山谷战斗之后，我在斯大林格勒的医院里躺了一段时间……”

“是在河对岸吗？”

“没有来得及渡河到对岸。我们的医院在地下室里……我在戈拉亚多利纳山谷挂了花。

但我没有离开部队。没这个必要。”

“那明天呢，你对明天有何想法？”

“明天将进行战斗，司令员同志！我们尽力机灵点，一定能活下来。越是害怕，就越会死在战斗中。我们害怕的是眼前漫长的黑夜，只要黑夜一过，就没有时间来害怕了。”

在堑壕里，很少有人睡觉……

乌克兰的秋夜漆黑幽静，星星象是被雨水洗过一样，闪闪发光。

我沿堑壕走着，时而这，时而那，传来武器部件轻微的撞击声。

我回到自己的指挥所。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已经在那儿。他心绪不宁。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争夺登陆场的战斗中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等着我们。他很想亲眼看看进攻的进展情况。

不仅是集团军的、而且方面军的电信线路也都通到我们指挥所。空军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 B·A·苏杰茨也在我们指挥所。我们还与坦克第 23 军军长 E·I·普希金将军、近卫机械化第 1 军军长 A·H·鲁西亚诺夫将军保持着直线联系。

深秋的黎明到来了。东边的天空已红霞一片，谷地中还飘漫着薄雾。7 时 10 分，近卫军的火箭炮开了火。

我们从观察所里可以看到，被齐射所击中的田野燃起了熊熊大火。到处是火光、烟幕、尘柱。远处传来的爆炸轰隆声。重型炮也接着发了言。说话声被淹没，电台的耳机里一片噼啪声。苏杰茨将军打着手势，让我们朝天上看。

在炮兵射击的同时，强击机和轰炸机也出动去轰炸敌人的防御工事。

波扎尔斯基象乐队指挥一样，充满激情地指挥着自己的火炮。

40 分钟的射击！成吨的钢铁落到敌人的阵地上。齐射还在继续，黑烟还没消散，我们的近卫军人开始进攻。

炮兵可靠地掩护着他们的第一次急冲。

在如此漫长的距离上，跃进显得那样缓慢，尽管他们是在全力奔跑。他们奔跑着，身影越来越小，终于消失了。

“卧倒了？”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焦急地问。

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卡梅宁上校一直用望远镜观看着战场。他报告说：“不！没有卧倒！他们现在在第一道堑壕里……”第一道堑壕的情况怎么样？是在进行肉搏战吗？如果他们已经到达第一道堑壕的话，那么，现在已扭打在一起了。不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论肉搏没有人是近卫军人的对手。

可以看到我们的炮兵怎样展开。炮兵以直接瞄准射击摧毁敌人苏醒过来的火力点。近卫军人从第一道堑壕向防御纵深冲去。

收到第一批战场报告。近卫军人迫使敌人全线退却，占领了第一道堑壕，现在已发起争夺敌防御纵深各支撑点的战斗。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看起来才过了几分钟，然而，激烈的进攻随着同敌人不断的拚搏，转眼就过去了一个小时。

敌人凭借支撑点的掩护转入了反冲击。但对敌人的这套战术，我们早已了如指掌。各兵团和部队指挥员接到严厉的训示：不准停止不前，要以进攻对付反冲击。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一般说来，这是唯一的办法。敌人出来迎击，主动权和优势在我们手里。我想，如果敌人躲起来、从精心构筑的掩蔽工事里进行抵抗的话，事情反而要糟。

敌人将大批坦克群投入战斗，有自行火炮护送。我们的坦克从掩蔽工事里对德国坦克进行几乎是直接的射击。

但是，我们的坦克个对个地同“虎”式坦克和“斐迪南”自行火炮决斗是困难的。76毫米无法穿透“虎”式坦克和“斐迪南”自行火炮头部的装甲。而它们的88毫米炮的射弹初速很高，因此破坏能力也高。对付“虎”式坦克应该打它的侧面和尾部。这一点我们的炮兵了解得很清楚，而德国的坦克手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从不暴露其侧面。

近卫军人对坦克已是司空见惯。“对坦克司空见惯”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们不怕坦克。他们知道，只要逼近它，它就失去了火力威力。他们让坦克通过自己的战斗队形。专打坦克所掩护的步兵。而对付坦克则用防坦克枪、手榴弹和燃烧瓶。

中午时分，情况已开始明朗。

各集团军在整个战线全面推进了大约3公里。而重要的是，敌人终于被赶出阵地，形成了一个战术缺口。

一天的战斗下来，我军击毙敌官兵约二千五百人，俘虏69名士兵，击毁大炮19门、火箭炮12门、机枪47挺、汽车和装甲车7辆，炸毁3座弹药库。德军的这些损失，基本上是在反冲击时遭受的。

这些数字决定了我们次日的进攻战术。德军坦克集团的行动，也使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每次我们楔入德军战斗队形，或占领居民点和制高点，都立即招来敌坦克的反扑。

P·B·马利诺夫斯基和我亲眼看到这些反扑，特别是“虎”式坦克的突击，它们穿过我军的战斗队形，一直突破到外围廓的防坦克壕。

下午，敌坦克反扑时，我们的步兵几次施放烟幕。用这种方法迷惑住敌坦克乘员，我们的防坦克歼击手就向敌坦克跟前爬去，投掷手榴弹。于是，不可一世的“虎”式坦克，或遭受重伤，或原地起火。

因此，出现了利用烟幕和正在降临的夜幕使敌坦克第40军一蹶不振的战机。夜战势在必行，况且，由防坦克歼击手组成的强击队在夜间作战会更

有效。敌人没有将坦克撤离前进阵地，仍留在自己步兵的战斗队形内，藏在预先挖好的掩蔽工事里。夜间，我们的工兵就有可能在坦克威胁方向上设置了地雷障碍。

10月10日的战斗很晚才结束。我向各军军长布置翌晨的任务——大部分还是继续执行进攻第一天的任务，夜晚我命令各防坦克歼击手强击队出击。

一天的战斗下来，德国士兵已纷纷丢弃战壕，集中到各支撑点附近，有的藏身在深挖的掩蔽部和支撑点的土木发射点里。

强击队每队3—5人，装备有集束防坦克手榴弹和燃烧瓶，由一名军官或军士指挥。他们能够楔入敌战斗队形。

强击队分散活动了。敌人的阵地淹没在夜色中。田野里烟雾迷漫。这层黑幕连德国兵用以壮胆的照明弹也无法射透。突然，敌防御纵深的某处地方，象火星儿爆炸了一样，耀眼地闪亮了一下，一处，二处，三处……接着一切又笼罩在黑夜里。有时，紧跟着这些闪光传来爆炸声，火舌直冲天际。这是坦克起火，坦克油箱爆炸。顿时，敌人的十个火力点开了火。

一束束曳光划破了黑暗。无疑，我们的炮兵趁机测出火力点位置。如果试射好的话，只需2个或3个齐射就行。火力点哑巴了……又是黑暗、令人不安的战场沉默。

突然，在敌人驻地里，步机枪狂风般地扫射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强击队在挺进，还是发神经病？在那儿，有我们的战士，我们的近卫军人，他们毫不畏惧地同钢铁怪物决斗。

而在远处，几乎是在地平线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又一辆坦克起火。现在，德国人的机枪扫射着整个战线，照明弹不断地划破长空。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晨！

10月11日8时，方面军的所有炮兵都开了火。我们这次炮火准备只能实施一会。弹药！又是弹药不够！

炮火准备进行了20分钟，8时20分开始发起冲击。

第82师司令部报告，他们已前出列瓦西里耶夫卡地区。由于敌人火力太猛，无法继续前进。我命令他们在原地构筑工事。不要再发起冲击。

近卫步兵第27师遇到坦克的反扑，战士们卧倒在地，让坦克通过自己的战斗队形，然后用已运到阵地的152毫米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坦克的反扑被击退，德国步兵又投入反冲击。该师无法再向前推进。

近卫步兵第28军的部队，一开始便遭到敌人强大火力的抵抗。他们只好隐蔽起来。

步兵第33军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的第78师击溃了敌军，已接近“德米特里耶夫卡”集体农庄的东部。

我下达命令：全力消灭敌坦克！这是目前的主要任务。用炮火消灭敌步兵。敌人用作反冲击的坦克对我威胁很大，部队整天都在积极防御。看，战场上又有几辆敌坦克着了火，火焰冲天。仅据粗略估算，大约有20辆坦克被烧毁，而击伤后被拖走的有多少，我们就无法计算了。德军坦克再也不敢脱离自己的步兵孤军作战，再也不敢穿越我军战斗队形……

我军在伊万诺夫卡镇附近缴获1辆“虎”式坦克。我和集团军装甲兵司令员M·T·魏因鲁布上校、炮兵司令员H·M·波扎尔斯基将军一起乘车到了那儿。很想知道：“虎”式坦克究竟是怎样一种钢铁怪物？

这辆坦克的炮塔被 122 毫米口径的炮弹击穿。坦克附近躺着十几具德国士兵的尸体，坦克里的 4 名坦克乘员全被打死。

简直是一座超重型工事！光学瞄准镜的设计十分出色，88 毫米口径火炮的威力强大无比。

我认为，“虎”式坦克在 1943 年夏秋战局中是最具威胁的战车。希特勒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把赌注押在这种坦克上，不是毫无道理的。无疑，在 1943 年的坦克战中，它们本来是可以取得战果的。然而，我们已拥有 122 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它能够穿透“虎”式坦克的装甲。

方面军司令员 P·B·马利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 A·C

·热尔托夫一直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观察所里，简直寸步不离。我从他们那儿得知友邻部队——近卫第 3 集团军和第 12 集团军的战况。他们的情况也和我部一样。只有第 12 集团军迫使敌人稍稍后退。但就是在那儿，敌人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进攻第 3 天的任务仍未变：在预定的各个方向上突破敌防御，开展歼灭敌坦克的斗争。

10 月 11 日夜，各强击队又开始楔入敌驻地。敌坦克在黑夜里又爆发出耀眼的火焰。

我们的工兵在坦克威胁的方向上埋设地雷，炮兵拖来大炮以便对坦克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10 月 12 日 8 时，开始对夜间选定好的目标实施火力准

备。经过半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8 时 30 分，我们的步兵在为数不多的坦克支援下，再次发起进攻，一点点地去啃敌人的防御。普希金将军的坦克军和鲁西亚诺夫将军的机械化军暂时还未投入战斗。

从早晨起，敌人以强大的炮火还击，尔后便开始反冲击。

到中午时，已明显看出，敌人的反冲击已是强弩之末。一个尽管还是无形的、然而仍能感觉到的转折已出现。只要再加一把劲，敌人肯定会被摧垮。

在我们观察所前边大约 200 米的小山岗上，设置了近卫步兵第 27 师师长 B·C·格列博夫少将的观察所。

我部进行这样紧张的战斗已是第 3 天了，官兵们疲惫不堪。他们很可能察觉不到敌军正在动摇、其态势已不稳定的情况，因而错过关键性一冲的时机。为了提醒第 27 师的部队实施这一冲击，我带着副官来到格列博夫的观察所。我亲自向他们作了说明后，又通过电话向各团团长布置了具体任务。事完之后，鉴于情况紧迫，我又与副官沿原路返回。大概敌人发现了我们在小山岗上有某种活动，可能认为我们在改变指挥所，于是向一些高地和小山岗之间的小路进行了疯狂的炮击。我同副官正好走在半路上，简直象陷入火圈中。炮弹在四周爆炸。没有任何遮蔽物，只有一根幸存的电线杆。我们分别趴倒在它的两旁，头紧靠电线杆，躺着。我看见副官张嘴，在向我说什么，但由于炮弹的轰隆声无法听清楚。突然，副官的脸变得很难看，一刹那间我明白了，他是被弹片击中，疼痛得失去了知觉。

我跳起身来，抱起副官就撒腿朝小山岗跑去。那时，我大概连副官的重量也感觉不出来了。干等着炮弹落在头上，不做任何反抗，这不是我的性格。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从掩蔽部里看到这一情景，对我开玩笑说：“我

告诉你，你应该随身带上一条壕沟，这样你就不会陷入刚才的困境了。”

他和热尔托夫将军心绪不佳地离开我们的观察所，因为没能完成大本营的训令，将德军赶出登陆场。离原定 10 月 15 日占领扎波罗热的期限越来越近，而我们实际上仍在原地踏步不前。

进攻的第 3 个夜晚来临了。

我们思考着：怎么办？继续让强击队去行动？但敌人已知道了我们的战术。毫无疑问，他们已坐待强击队的到来。敌人可能将坦克从近阵地撤出，使强击队落入机枪的枪口下。然而，反过来讲，正是夜间我们才取得了重大战果。

可否以整个集团军的兵力实施夜间进攻？官兵已很疲劳，而且这样的进攻需要提前做准备。我们的运输车正在忙于运送弹药。

不过，夜间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实施完全的炮火准备。只对早已试射好的目标实施突击就足够了。敌人在等着我们的强击队的出现，而我们却用全部炮火和步机枪火力砸向敌人。

经过短暂的思考，我们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上定下了进行夜战的决心。为了加强作战部队的力量，决定把近卫步兵第 74 师也投入战斗，只留下 1 个团做预备队。近卫步兵第 29 军军长受领任务，将近卫步兵第 74 师的 2 个步兵团投入战斗，向舍尔科维、第 2 别济米扬内、新乌克兰卡方向实施坚决的突击，并于 13 日清晨前占领柳采尔诺夫斯基、果园西缘、舍尔科维镇和克里尼奇内镇一带地区。

在白天的战斗中，我们在舍尔科维和克里尼奇内遭受到很大的挫折。炮兵无论如何也无法以急袭射击压住这些支撑点，我军遭到来自克里尼奇内的最猛烈的步机枪火力射击。如果能将敌人赶出克里尼奇内，我军就能在该方向上有力地向前推进。

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的任务是：10 月 13 日清晨前，占领周围有许多非常危险的高地的地区，因为敌人在这些高地上构筑有支撑点。拿下它将打开通往敌防御纵深的大门。

步兵第 33 军的进攻目标是斯捷普诺耶。命令该军当夜实施战斗侦察。

通过侦察我们获得情报，知道敌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将坦克撤往第二道阵地，在防御纵深内沿博加特列夫卡、斯克沃尔佐沃、莫克罗耶车站、斯捷普诺耶一线展开。我强击队对敌人坦克的突击，已给德军统帅机关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在第一道阵地上，只剩下遭到猛烈打击的步兵部队和炮兵。

由此可见，夜战、近战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弹药不足的缺陷。敌坦克的夜间又无法直接瞄准射击。

23 时，我集团军炮兵对经过准确查明的目标进行了持续仅 10 分钟的强有力的密集袭击。23 时 10 分，坦克一边投入战斗，一边掩护跟进的步兵。

整个战斗过程，自然是无法观看到。战斗的指挥只能借助电话和无线电进行。

不久收到了报告。我从无线电台里听到了各军长、师长、团长之间的全部谈话。显然，突击实施得非常及时。德军的抵抗，正如日间估计的那样，已是最后的挣扎了。

右翼传来关于我军迅速推进到敌大纵深的捷报，对于这几天的战斗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推进。

近卫步兵第 28 军也在主要方向上发展着进攻。其部队推进了 5—6 公里，遭到强大的火力抵抗后，停了下来。本来没有给左翼（第 33 军）布置大踏步推进的任务，它要进行的只是战斗侦察。然而，左翼在进行战斗侦察的同时，也向前推进了 1 公里半。清晨，新的地区形成了。我军就在那里巩固下来。因为柳采尔纳、马特维耶夫卡（直通扎波罗热的一个大车站）、丘马茨卡亚、克留科夫、克里尼奇诺耶和分布在各个高地上的一系列支撑点，都已远远落在后面。现在的出发阵地对实施昼间进攻更加有利。

我们从 10 月 1 日起便以顽强的战斗去争取的转折终于来了。

10 月 13 日凌晨，P·B·马利诺夫斯基打电话给我。我详细地报告了集团军夜间的行动。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要我哪儿也不要，他说他马上就到我的指挥所来。他立即与空军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 B·A·苏杰茨将军联系，根据我们夜间推进的情况，向他布置了任务。

我又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集团军各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将于上午 8—9 时以有限的兵力重新恢复进攻，不让敌人进行任何机动。我的建议立刻得到首肯。

上午 10 时，马利诺夫斯基来了。我们在尼基福罗夫斯基镇以南的 137.6 高地相会。此时全线都已交火。我没有给部队下达向纵深推进的命令。我预料敌人会反扑，在这过程中，有机会再次消耗敌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敌人实施反攻击，但早已失去先前的势头。敌人没能在任何地点将我军击退。

坐在观察所里等待各兵团、部队司令部的战报是件令人难熬的事。我们大家分头到各司令部和部队去查看战斗情况，设法采取积极行动。下午 5 时左右，我回到观察所。有人向我报告说，方面军司令员找我，要我到我们的工兵刚刚为他构筑的土屋式掩体去。

我走下几级台阶，进到土屋掩体里。一股耀眼的光线使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碰撞了谁的腿。我听到马利诺夫斯基的抗议声。我向他道歉，但他打断我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如果夜间进攻怎么样？利用黑暗！

使敌人变成瞎子，然后再突击。你认为怎样？”

“怎样进攻？”我试图弄清楚。

“用方面军的全部兵力进攻！”马利诺夫斯基回答。

“那再好不过啦！”我回答。

立刻，在方面军司令员的土屋式掩体里，开始制定夜袭扎波罗热的计划。

需要立即向部队下达相应的命令，但已没有时间用文书形式去表达。

首先要做的是停止进攻。我向集团军炮兵下达紧急命令，调集弹药，准备夜间炮火急袭。各兵团司令部全部转入研究夜间强击的问题。总任务早已人人皆知。然而那是为昼间进攻制定的。夜战有它自己的特点。各司令部应派熟悉地物、善于在夜间定向的向导到各进攻部队。而这样的军官不是马上、也不是到处都能找得出的。还要抽出时间来训练他们。部队的重新部署还没有考虑。

我们决定只实施短暂的炮火急袭射击，不超过 10 分钟。夜间炮兵无法进行瞄准射击，不会取得特别的效果。只对事先测定好的目标实施突击这就足够了。应当珍惜炮弹，以便在翌晨的战斗中对敌工事实施直接瞄准射击。

近卫机械化第 1 军和坦克第 23 军担负了特别的任务。

鉴于敌人在先前的战斗中已狼狈不堪、开始将坦克部队撤往防御纵深、并且很可能准备从登陆场后送。也就是说，敌人的防御出现了既没敌人阻击、也没有火力封锁的突破口，这样一来，以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实施突击是理所当然的。计划规定，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步兵部队向突破口左右两侧推进的同时，将这 2 个军投入战斗。作为担负突破任务的集团军司令员，我承担了协调这 2 个兵团和集团军各步兵部队之间的行动的责任。

方面军司令员把夜间强击的任务交给了近卫第 3 集团军和第 12 集团军。

除了夜战的一般优越性之外，是什么使我们对夜间进攻计划这样感兴趣呢？首先是出敌不意。以如此大规模的兵力实施夜间进攻，这可不是寻常的现象。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大规模的夜间交战是相当频繁的，然而，却从来没有以 3 个集团军、1 个坦克军和 1 个机械化军的兵力实施过。所以，德军首脑在突击的最初瞬间是不会想到我整个方面军都转入进攻，因此无法恰当地作出判断，从而错过实施预备队机动的时机，而我军就有可能利用此机会向城市实施坚决的突破。

夜间进攻计划要求各级指挥员及其司令部迅速而果断地行动。我和 B·B·弗拉基米罗夫将军用了不到 40 分钟的时间制定出集团军的作战计划。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带着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分头下到各军、师，将夜间进攻计划传达到每个指挥员。研究和制定近卫步兵第 29 军与鲁西亚诺夫的近卫机械化第 1 军的协同动作、步兵第 33 军与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 23 军的协同动作的责任，都落在我身上。A·H·鲁西亚诺夫将军和 E·I·普希金将军被邀请到各步兵军指挥所。

我们首先研究和制定了 B·C·福卡诺夫将军与 A·H·鲁西亚诺夫将军的协同动作。然后，我又来到 A·A·谢苗诺夫将军的指挥所。我们在那里与 E·I·普希金一起制定了夜间行动的共同计划。

对敌阵地实施短暂的夜间炮火急袭的时刻就要到了。我和空军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沿各阵地观察。因为在夜间航空兵只能进行有限的活动，B·A·苏杰茨便到我们这儿来作客。

战前 B·A·苏杰茨指挥的一个航空兵兵团就驻扎在离扎波罗热不远的地方。1941 年他上前线时，锁上自己的住宅，从那以后，再也没回去过。那时，他在扎波罗热还没有成家。

他把钥匙给我看，说这把钥匙一直装在他的口袋里。他决心随第一批部队进入原来的空军营区，用钥匙打开自己的住宅，用他的话说：“庆贺乔迁之喜”。他热情地邀请我们这些战友到他的“新居”去作客。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尽管我深信，他是不会找到锁、门，甚至整个住宅……这是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很快就要开始炮火急袭射击。我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已视察了好几个师，我们来到近卫步兵第 27 师师长格列博夫处。他在睡觉。再过几分钟他的部队就要转入进攻，可他还在睡觉！我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位将军弄醒。他已经 4 天 4 夜没有合眼了。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也邀请他到自己的“新居”去。然而，邀请也没有使格列博夫清醒过来。他半睡半醒地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就又站着睡着了。

这不足为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21 时 50 分，山崩地裂，方面军的炮兵开了火。轰隆声不绝于耳。火箭

炮炮弹拖着火焰呼啸而过。10 分钟之后，炮火急袭射击停了下来。在炮火急袭射击后的沉闷的寂静中，可以听到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履带的吱吱声。所有的坦克都开着前灯，搭载着步兵，全速向眼睛被照花了的敌人冲去。

炮兵赶忙跟在坦克后面，步兵大大地超过了他们。我军以短促突击将敌人从第二道防御围廓的阵地赶了出去。

第一批俘虏缓慢地走着。侦察员就地审问了几个德国士兵。他们表示，这样大规模的夜间进攻，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德军首脑认为，我们的力量早已消耗殆尽。因此那天夜里，许多军官都进城去了，士兵们也躺下睡了觉。他们除了预料会有强击队的行动外，再也没有预料到其它什么。

午夜时，战况已经十分明朗。敌人的第二道防御围廓被我军突破了。普希金的坦克军进入突破口，后面紧跟着鲁西亚诺夫的机械化军。

我军在市郊迎来了黎明。在个别地方，坦克和步兵已突入市区街道，并在那儿进行战斗。

集团军各部队调集了炮兵，给它们补充了弹药。换了观察所之后，经过短暂的喘息，于上午 8 时从四面八方同时对扎波罗热发起强攻。友邻的第 6 和第 12 集团军一边扩大战果，一边向第聂伯河推进。

敌人试图全力抵抗。德军的重型大炮从河右岸开了火，空中出现了敌机。它们在掩护渡口以便部队撤退。

夜间进攻形成的节奏没有放慢。近卫军人全线迫使敌人退却。敌人丢弃大炮和重型装备向各渡口退去。然而，各渡口地区的制空权已被我航空兵所控制。能够侥幸逃离扎波罗热登陆场的敌军人数极少。

争夺扎波罗热市的激烈的血战已接近尾声。至 13 时，我军完全占领了该市。这是 10 月 14 日，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肃清扎波罗热登陆场之敌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一昼夜。

我们的先头部队正向第聂伯河挺进，我炮兵向各渡口开火，渡口被摧毁。在渡河时淹死的德国士兵和军官不计其数。

在 10 月 13 日和 14 日的夜间战斗中，仅近卫第 8 集团军就消灭了 3000 多名敌官兵，摧毁 26 门重型大炮、59 挺机枪、22 门迫击炮、32 辆坦克、120 辆汽车和输送车……10 月 14 日晚，我们收听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转播了最高统帅的命令，莫斯科向我们祝捷。

强渡第聂伯河、将敌人从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赶走的任务，已摆在西南方面军面前。

2

扎波罗热解放后，在西南方面军的编成内，进行了整编。

根据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C·C·列柳申科将军的近卫第 3 集团军转归南方面军，撤销了 A·A·丹尼洛夫将军的第 12 集团军。替代它们补充到我西南方面军编成的 B·B·格拉戈列夫将军的第 46 集团军和 A·T·什列明将军的第 6 集团军。这时，第 46 集团军已同草原方面军的部队一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西北强渡过第聂伯河。

出现了短暂的战役间歇。由于方面军司令员 P·B·马利诺夫斯基和本营代表 A·M·华西列夫斯基的一再坚持，我于 10 月 15 日动身到莫斯科住院治疗。A·A·马斯连尼科夫上将临时担任了近卫第 8 集团军司令员。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近卫军战士。

在我离职期间，近卫第 8 集团军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但我还是想简略

地讲解放扎波罗热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10月19日，集团军首长接到方面军关于向北行军、于10月22日拂晓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集结的训令。集团军面临的任务是强渡第聂伯河。这时，第12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4军（辖有3个近卫师）占领并坚守着第聂伯河右岸的一个登陆场。这个登陆场在扎波罗热以北40公里的沃伊斯科沃耶居民点附近。实际上，近卫步兵第4军是处在近卫第8集团军计划行动的地区内，该军因此而补充到我近卫第8集团军的编成内，直到战争结束。

近卫步兵第4军夺取的登陆场，为我集团军各兵团在10月23日中午渡河到第聂伯河右岸提供了方便。我们的部队在扩大登陆场的同时，占领了沃伊斯科沃耶、斯维斯图诺夫农庄、卡里诺夫卡、格罗扎、沃夫宁格等居民点。

10月23日夜，近卫第8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39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的恰普利地域，强渡了第聂伯河，并与第46集团军各部队协同行动，占领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10月23日，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46集团军在乌克兰第3方面军（原西南方面军）右翼展开，占领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和以南的登陆场，并准备对该城实施包围突击。

第46集团军从奥拉地域的登陆场向克里尼奇基、新尼古拉耶夫卡方向发起进攻；近卫第8集团军从沃伊斯科沃耶、沃夫尼奇地域的登陆场向索列诺耶、丘马基、奇卡洛沃方向进攻。

当步兵第33军各部队补充完毕、并开始调往前线后，于10月29日决定将阿波斯托洛沃作为主要突击方向。

至11月1日，强渡第聂伯河的行动已告结束。集团军代司令员A·A·马斯连尼科夫遵照方面军首长的训令，把集团军右翼部队指向阿波斯托洛沃，任务是沿铁路向前推进，以便卷击敌战斗队形。不难看出，这一新开辟的进攻方向将使敌人受到威胁。如果顺利的话，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46集团军将前出到德军尼科波尔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切断其退路，打通通往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的道路。意图是正确的，但付诸实施时，则应使用较大规模的兵力。如果再稍为早些选择在该方向实施突击，毫无疑问是会取得战果的。

当时正是秋季道路泥泞的季节。集团军的坦克很少。炮兵经常弹药不足，因为很难运过第聂伯河。因此，经过多次战斗顺利地扩大登陆场之后，集团军已没有能力继续实施进攻行动。敌人这时利用众多的支撑点，采用了机动防御的战术。这些支撑点同时又是弹药仓库，这样，希特勒军队就不象我们那样遭受道路泥泞之苦了。

11月4日，集团军试图以右翼部队沿铁路展开进攻。40分钟的炮火准备未能保证进攻，部队只前进了2—3公里，便受到挫折。

11月5日，又重复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敌人在个别地方还转入反冲击。14时，我集团军部队击退敌人的反扑后，转入顽强的防御。

十月革命节后不久，我就出院返回部队。此时，近卫第8集团军驻守在一些筑垒地域，官兵们在休整、部队进行了新的补充。

11月12日，我去见P·B·马利诺夫斯基和A·M·华西列夫斯基，以便了解一下集团军的任务。

华西列夫斯基首先讲了方面军、甚至是数个方面军的总任务——尽可

能快地拿下尼科波尔。“尼科波尔”和“锰”这两个词就象在此之前的“斯巴顿”那个词一样，开始挂在人们的口头上。

尼科波尔盛产锰矿。——泽注。

大本营代表给集团军司令员什么任务呢？

“进攻阿波斯托洛沃！”他这样对我说：“现在，他们将根据向阿波斯托洛沃进军的情况来判断近卫第8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哪怕1天前进5—10公里，毕竟也是在前进、在挺进！”

战争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在乌克兰还有这样一个小城市。而现在阿波斯托洛沃对集团军来说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正面楔入尼科波尔登陆场的防御是不可能的，那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从正面进攻，我们将不会取得战果。如果我军能前出至阿波斯托洛沃，那么将使敌人陷入惨败的境地，因为尼科波尔守军和登陆场的部队就会失去交通线，陷入合围。

于是，开始进攻阿波斯托洛沃。

又象在北顿涅茨一样，要将敌人从一个个支撑点里赶出去。最初实施进攻时，使用不上加强兵器。

11月14日，我批准了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各部队绕过敌人构筑在各火车站上的强大的支撑点，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卡——阿波斯托洛沃铁路前进。

当前的任务是突击尼古拉耶夫卡。任务很艰巨。我们在制定整个战役计划时，当然考虑到敌人会进行顽强的抵抗。

然而，也完全可以预料到，德军最高统帅部必将定下决心把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1集团军从尼科波尔登陆场撤走。

进攻的头几天困难重重。德国人投入坦克进行反冲击，而我们的步兵用来对付他们的只有防坦克枪和骡马牵引野战炮。

我想起争夺涅托布季诺镇的一次战斗。我从设在离车站1公里的观察所里注视着我军的冲击。发起冲击的是近卫第47师的部队。经过短暂而有效的炮火准备（甚至比火炮的急袭射击时间还短）之后，步兵发起冲击，将敌人打出了镇子。进攻是在田野、耕地里进行的。

凡是知道乌克兰的黑土在连绵的秋雨之后变成什么样子的人都会懂得，通过这种耕地实施冲击是多么的困难，靴子上粘满淤泥，简直寸步难行。

近卫军人占领了涅托布季诺镇的北郊之后，开始向该镇南郊推进。这时，从南郊开来4辆德国自行火炮。怎么办？用什么来阻止它们？4辆自行火炮在远处停了下来，而防坦克枪在远距离上又无法穿透其装甲。自行火炮不慌不忙地对我们进行瞄准射击。我们的进攻受到挫折。如果当时在我们的战斗队形里有3—4辆坦克或自行火炮，那么，进攻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到了11月20日，情况有了一些好转。

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弗拉基米罗夫卡、托马科夫卡、阿夫多季耶夫卡、赫鲁谢夫卡、纳塔利耶夫卡、涅扎布季诺、卡捷琳诺夫卡。6天来，我们的进攻只在敌阵地纵横交错的防御纵深内推进了10公里，但被我占领的这些居民点，倒很适合作为进一步进攻的出发地区。

E·I·普希金将军的第23军的坦克终于向我们靠拢过来。我们与他们肩并肩地从北顿涅茨进军到托波罗热。他们曾积极地参加了争夺托波罗热的夜

间进攻，但在进攻阿波斯托洛沃的前夕，军里只剩有 17 辆坦克和 8 辆自行火炮。

在 80 公里的正面上，我们仅拥有 40 辆中型坦克和 33 辆自行火炮。平均每 1 公里的正面上还摊不上一辆装甲车。

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连队也减员很多。每连只剩有 20 至

30 人。我们只好将各步兵团的第 3 营拆散，把士兵和军士移交给第 1 和第 2 营，把第 3 营的干部调到后方重新补充。

休息是必要的，但是，军事行动有自己的逻辑，确切地说，它需要进攻。我们认为，我们的冲击，哪怕只有少量的坦克支援，也将是带决定性的冲击，它将迫使敌人即使不溃败也得后退。

11 月 27 日晨 8 时，在坦克军的支援下，开始了进攻。坦克参战的效果，马上体现出来。我军一下子推进了 10—12 公里，占领了佩尔沃马耶夫卡、拉斯塔尼耶、彼得里科夫卡、亚历山德罗波尔、普罗帕希内、格格洛夫卡、科特利亚罗夫斯基。

集团军以一侧翼的部队向尼古拉耶夫卡推进，叩击着通往阿波斯托洛沃的大门；以另一侧翼的部队逼近锰矿。希特勒正是为保住该矿才把野战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1 集团军留在这儿。我们离锰矿还有 30 公里左右。

11 月 29 日和 30，我们发展进攻的计划未能实现。需要重新集结兵力。敌人压缩了防御。他们为守住尼科波尔和锰矿出动了全部主力部队进行抵抗。我军受阻于这一地区。

方面军首长要求刻不容缓地实施进攻。再来一次猛冲。步兵第 33 军在近卫第 28 军和近卫第 4 军之间投入战斗。但第 33 军也没有坦克支援。

突破敌防御的尝试再次失败后，我们接到指示，在原地加固工事，进行补充，等到 12 月 10 日再恢复进攻。我们占领了通往锰矿方向的一些较大的村镇，托克马科夫、丘马基和列别金斯科耶。后来，再也未能向前推进。

新的一年、1944 年来临了。但是，一月份我们并不轻松。气候条件仍然妨碍空军展开积极行动，短暂的微寒过后，连日是冰雪融化的天气。雪转雨，雨又变成湿漉漉的雪。一些不太宽的小河泛滥了，河水在河谷中汹涌奔流。草原上的一些小河在战役战术地图上根本没有标出来，但它们却给我们的行动造成了许多麻烦。我们一方面同狡猾的强大的敌人作战，同时还得同大自然作斗争。要战胜无数的水域、泥泞、大雾。

1 月 10 日，我们还是以近卫步兵第 4 军重新发动了进

攻。该军的任务是：在肖洛霍沃方向上实施突击，以便同近卫步兵第 28 军的部队一起，切断敌人从尼科波尔地域撤退的退路。

为确保对敌防御的首次突击，我们增派了安德列·伊万诺维奇·拉托夫将军指挥的突破炮兵第 9 师、坦克第 11 旅（由 17 辆 T—34 型坦克组成）和坦克第 10 团（由 3 辆 HB 坦克和 8 门自行火炮组成）来加强该军。

空军的任务是：压制敌人的火力点、防御枢纽部和炮兵发射阵地，并消灭敌人部署在突破地段附近的预备队。

9 时 35 分，步兵发起冲锋，炮兵对敌人的堑壕进行了徐进弹幕射击。步兵急速地冲到了徐进弹幕射击安全边界。徐进弹幕射击又转入第二道火力区。步兵冲进了敌人的第一道堑壕。经过短暂的对射，步兵又冲向第二道徐进弹幕射击区覆盖下的第二道堑壕。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被迅速地赶出了第二道堑壕。我军在一个地区内，就俘虏了整整一个连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实

际上这个连的士兵任何人也没有进行抵抗。在密集的徐进弹幕射击下，这个连撤离了堑壕，躲进了掩蔽部，一直没有出来，直到我军占领堑壕。后来一些士兵对我说，在我军炮火的轰击下，只有很少一些火力点还能重新射击。

由于短促突击的结果，我们几乎没有遭受损失便前出到索菲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公路。

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为了击退我们的部队，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反冲击。一天之内，我们击退了五次反扑。敌人损失惨重；但没能夺回任何一处阵地。

上午 11 时 30 分，无线电兵截听到并破译了敌人的一份无线电报：“克劳森的摩托化第 16 师应立即将坦克集结在尼古拉耶夫卡墓地”。

就在这时，我们的坦克已逼近奥尔洛夫墓地，并集结起来以便实施突袭。坦克埋伏在那里，任务是就地迎击敌坦克的进攻。

敌人无论在反冲击中，还是在防御中，都指望他们的坦克发挥优势。这就给斯大林格勒保卫者提供了一个在对付坦克方面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我们的坦克停在墓地外面的灌木丛中。敌人的坦克从尼古拉耶夫卡附近的墓地出发，向正在进攻的我军步兵的侧翼突击。敌人至少有 30 辆坦克冲向奥尔洛夫墓地，企图分割我步兵部队。它们需要越过 4 公里距离才能到达墓地。它们全速前进，不得不把自己的侧翼暴露在我坦克的炮火之下。4 辆“虎式”坦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击毁。在几分钟内，敌人共损失了 10 辆坦克。

其余的坦克急忙转弯，匆匆退了回去。敌人在奥尔洛夫墓地地区的防御被突破了。由于道路泥泞，我们的部队艰难地向前猛冲，才推进了 5—8 公里。实在无法再推进了。我们这次遇到了敌坦克部队坚守的防御。

直到晚上，突破地段的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需要再停歇一次，以便首先移动移动大炮。确确实实是移动。“运走”一词用在这里无论如何也不合适。坦克和履带式牵引车在路面还算结实的道路行驶尚且很艰难。而在这儿，全都陷入饱含水分的烂泥地里了。

在那些无名小河和小溪泛滥的地方，我们遇到一些陷进了淤泥只露出炮塔的德国坦克。

靠马匹的牵拉，我们才摆脱了困境。而对马来说，路也是很难走的……弹药的运送只能靠手提肩扛，或放在板车上。

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1 月 10—12 日的战斗表明，敌人已一蹶不振，他们的生动力量和技术装备也逐渐耗尽。敌人支撑点里虽然弹药有保障，但要调配使用对他们来说可能性也很有限。看来，只要再施加压力，再进行突击，再作某种努力，他们的防御就必然要崩溃。

1 月 15 日，大本营代表 A·M·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

司令员 P·B·马利诺夫斯基召集我到索菲耶夫卡的第 46 集团军司令部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第 46 集团军和第 37 集团军司令员 B·B·格拉戈列夫将军和 M·H·沙罗欣将军。

第 37 集团军也编入了乌克兰第 3 方面军。

会上详细讨论了乌克兰第 3 方面军今后行动的前景。并提出：如何使各集团军积极行动起来？为此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在会上宣布，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尼科波尔，收复尼科波尔的锰矿。

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些集团军司令员们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进攻作战计划？使进攻终于得以广泛展开，并完成大本营提出的任务。对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而即兴谈论一个大战役是不行的。华西列夫斯基建议我们各自返回集团军司令部，准备自己的意见，然后向他或马利诺夫斯基报告。

考虑的期限为一昼夜。

路上，我考虑成熟了一个重新部署部队以便更有效地实施突击的计划。

在司令部里，我对着地图计算了一下，作了一些必要的标记，便给 P·B·马利诺夫斯基打了电话。当然不是把建议都直接捅出来，但是，我谈了我的建议的基本内容。

我建议尽快把 A·T·什列明将军的第 6 集团军从第聂伯河左岸调到右岸，在最短期内，替换第聂伯河至友谊镇一带的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由于缩短了正面，我集团军就能腾出近卫第 29 军，以便在集团军右翼实施集中突击。

在我集中兵力在右翼实施突击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友邻部队 B·B·格拉戈列夫将军也应当在他的左翼采取同样的行动。因此，我建议扩大沙罗欣将军的第 37 集团军的正面，也腾出第 46 集团军的两个军，以对阿波斯托罗沃实施突击。

计划以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46 集团军的相邻翼侧在米哈伊洛夫卡、铁尔诺瓦特卡、罗什卡列夫卡正面向阿波斯托洛沃方向实施集中突击。

我建议，在各步兵部队到达斯大林斯科耶和巴甫洛波里耶地区之后，让重新编入方面军编制的、由 T·A·塔纳斯契申将军指挥的近卫机械化第 4 军进入突破口。

我立即拍电报将这份进攻战役计划呈报方面军司令部。

回电很快就来了。

一昼夜以后，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打来电话说，方面军司令部正起草训令，已给第 6 集团军司令员 A·T·什列明将军下达严格的命令，要求他尽快把整个集团军调到聂伯河右岸，以替换驻防第聂伯河友谊镇的近卫第 8 集团军。这样一来，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正面地带缩短了 60 公里。

大约在进攻前三天，方面军司令员来到奥尔洛夫墓地，把我、第 46 集团军司令员 B·B·格拉戈列夫将军和近卫机械化第 4 军军长 T·A·塔纳斯契申将军召到他那儿。马利诺夫斯基下达了关于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46 集团军两个相邻翼侧协同作战的最后的指示，大本营代表 A·M·华西列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问马利诺夫斯基，塔纳斯契申的机械化军将以什么方式投入战斗。

马利诺夫斯基神秘地同华西列夫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

“这个嘛，”他说，“现在还很难预料。一切都取决于进攻的进展情况和突破口在何处。一切都取决于哪一个集团军率先踏上兹拉托乌斯托夫卡、新乌克兰卡、巴甫洛波里耶地区……敌人的防御在哪里被突破，我们的坦克就在那里投入战斗。”我们明白了，他们在号召我们搞竞赛。我同格拉戈列夫会心地互相看了一眼……1 月 30 日，我们集团军和第 46 集团军进行了战斗侦察，我们一面同敌人接触，一面监视着他们。

1 月 31 日清晨，近卫步兵第 29、第 4 和第 28 军的部队，从每个师抽

一个营的兵力，开始在约 10 公里的正面上进行战斗侦察。战斗侦察的结果表明，敌人不准备放弃他们的前进阵地，他们抓住每一小块土地不放。

这时，我们俘虏了敌步兵第 123 和第 306 师的几个士兵和尉官。他们告诉我们，德国统帅部不准备从前进阵地撤回部队，他们认为前进阵地是尼科波尔登陆场防御的最后防线。

2 月 1 日早晨，近卫第 8 集团军各师经过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分别将第一梯队投入战斗。

大约在第 13 时，我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防御，进入战术全纵深。

P·B·马利诺夫斯基和 A·M·华西列夫斯基当时在 B·B·格拉戈列夫将军的第 46 集团军的观察所。近卫机械化第 4 军军长 T·A·塔纳斯契申将军也在那里。

马利诺夫斯基听完我的报告后，命令在指挥所等着他。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马利诺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来到了奥尔洛夫墓地。从墓地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部队是怎样向巴甫洛波里耶北效推进的。马利诺夫斯基当即命令机械化军进入战斗。近卫机械化第 4 军各纵队很快就接近了出发地区。塔纳斯契申将军行动起来干脆利落。机械化军的坦克紧随着近卫步兵第 29 和第 4 军各部队向突破口冲击。我们的航空兵和炮兵也转而支援近卫机械化第 4 军的行动。

机械化军冲入突破口，决定了已在尼科波尔地域第聂伯河两岸的登陆场坚守了数月、负责保护锰矿的希特勒的强大的军队集团的命运。

2 月 1 日傍晚，天气开始变坏，航空兵无法展开积极的行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笼罩着大地。大雨倾盆，脚下泥泞不堪。田野里深水洼灌满了水，它们连成一片，变成了湖泊。

2 月 2 日，天气没有好转，白天，10—15 米以外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在大雾里打枪，就象在棉花里打枪一样，没有什么声音。浓雾遮住了一切，士兵的衣服潮湿得沉甸甸的，靴子上粘了几普特重的泥巴。走起路来异常困难。但我们的部队仍在前进。进攻总计划规定的任务很明确的。

集团军首长、各军、师长怎么指挥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跟随部队前进，以便同部队保持联系，不失去指挥。

在团团浓雾里，和我一起上路的有：军事委员多罗宁将军、波扎尔斯基将军、魏因鲁布上校、希日尼亚科夫上校和其他人。为了保持同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将军及参谋人员留在集团军指挥所里。

我们分乘几辆越野汽车，由一辆 KB 坦克担任护送。汽车驶向铁路路基。但也无法沿铁路路基行驶。希特勒分子破坏了路基，他们把枕木都竖了起来。钢轨横七竖八地堆放着。我们极为困难地沿路基前进。每一块小凹地，每一处低地，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

中午 12 点前，我们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克镇。集团军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将军同我通了话。他告诉我，在敌人的防御前沿阿波斯托洛沃、彼列维斯基胡托尔地段上，已出现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对敌人很有威胁。敌人的步兵第 123 师和摩托化第 16 师已被我军击溃。格拉戈列夫将军的第 46 集团军的部队也顺利地向阿波斯托洛沃发展进攻。

很明显，有 5—6 个德国师在马尔加涅兹、尼科波尔、丘马基、奇卡洛沃地域陷入了半包围，他们只有一条通路，这就是在北边的正涨大水的索列

纳亚和卡缅卡两条小河同南边的第聂伯河之间的走廊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无疑会集中全力尽可能阻止我军的推进，并在卡缅卡河和索列纳亚河沿岸一带固守，那怕是守很短一段时间。这样敌人才有可能从留下的口子通过阿波斯托洛沃和大科斯特罗姆卡，突围出去。

大本营向我们提出两项需要一鼓作气完成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占领阿波斯托洛沃、马尔扬斯科耶、切尔托姆雷克、肖洛霍沃，从而切断德军部队从尼科波尔地域向西撤退的退路；第二个任务是：集团军转向尼科波尔。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克，我拟定了下一步的进攻计划，并利用在那里已建立起来的同各部队的联系，向他们传达了我们的决定：

我命令近卫步兵第 29 军军长，穿过卡缅卡河实施突击，任务是：前出到阿波斯托洛沃、扎波罗热一线，向马尔扬斯科耶方向采取行动；

命令近卫步兵第 4 军军长，穿过肖洛霍沃实施突击，首要任务是：切断敌人穿过彼列维斯基胡托尔的退路，下一步前出到切尔托姆雷克、叶卡捷琳诺夫卡、基罗沃一线；

命令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在整个正面转入坚决的进攻，任务是：在日终前占领基罗沃、新伊万诺夫卡地区；

命令近卫步兵第 27 师，在第 46 集团军各部队通过它占领的地区后，同坦克第 11 旅和坦克第 5 团一起，在扎波罗日茨、新伊万诺夫卡地域集结。

我用无线电向各队部传达了这个决定后，命令集团军作战组穿过新伊万诺夫卡向肖洛霍沃前进。因为应当从那里扩大进攻尼科波尔的正面。

我们越往南走，道路越不好走。雨雪交加。在广大纵深里，乌克兰的黑土都变软了。有轮的车辆根本不能在公路上开动。越野汽车成好几排在田野上行驶，每辆汽车都在车后留下了深深的车辙，使后面的汽车无法前进，因为会一子就下陷到油箱。在公路上、田野里，停留着无数的陷进泥坑的德国汽车……陷入泥坑中的还有一些坦克和装甲汽车。大量武器被扔在泥地里。

傍晚时分，我们总算到达了肖洛霍沃。近卫步兵第 4 军军长 B·A·格拉祖诺夫在那里迎接我们。他是徒步走到的。他和他的军官们带来了无线电台、电台的供电装置和司令部的文件。

集团军前进指挥部设在小镇的一座医院里。我们铺开地图仔细研究了目前的形势。这时，塔纳斯契申将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是前来求援的。这位指挥着一千多车辆的军长，请求给他的部队哪怕是派 50 辆马车也好，以便给他的部队运送燃料和弹药。汽车在泥地里只会空转打滑。

清晨，我们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声。进攻的命令正在执行……。

通讯兵把通信联络准备就绪。我身边没有带密码表，只好同参统长弗拉基米罗夫将军用暗语交谈。我们都熟悉彼此的声音。我告诉他我现在正在医院，同福卡诺夫、格拉祖诺夫以及同塔纳斯契申保持着联系。我不能提供其他的方位物，因为地图上在 25 公里范围内没有方位物。弗拉基米罗夫知道了我的方位，但正象以后查明的那样，希特勒分子也知道了。

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听到我的声音以后，非常高兴。看来，方面军司令部已经找过我一阵了。

我命令给我牵一些高大的马匹到医院里来，并命令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迅速向南面发动进攻。

德军指挥部急忙地把重型技术装备撤出包围圈。野战第 6 集团军和坦

克第1集团军的步兵部队，经由第聂伯河的河滩撤退。所有的越野道路、所有的村镇、甚至田野都堆满了敌人丢弃的汽车、火炮、坦克、各种和各式的马车和载重汽车。当时要清点这些东西简直不可能。

战利品和数量每小时都在增加。我们部队从卡缅卡到阿波斯托洛沃的公路上发现了一个坦克纵队——十辆完好无损的“虎式”坦克。这些坦克深陷在泥塘里，只露出炮塔。法西斯分子扔下自己的技术装备，穿过第聂伯河的河滩，沿着任何车辆都不能通行的无数小路逃跑了。

我们现在不用担心自己的左翼了，因为敌人不可能从尼科波尔组织反冲击了。当初气势汹汹的敌人，犹如吹鼓了气的皮球，现在被我军戳破了，泄气了，眼看就瘪了。但我们还得等待着敌人可能对阿波斯托洛沃实施反冲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尼科波尔—阿波斯托洛沃铁路一线打退，以使他们的部队顺利地第聂伯河的河滩撤退。

2月6日早晨，我决心跟踪观察一下已靠近托克车站的近卫步兵第27师是如何投入战斗的。

坐汽车是不可能了。我同副官骑马而行。到托克车站要经过巴扎夫卢克、托科夫斯科耶，在那里穿过卡缅卡河大桥，然后直达。

我们从巴扎夫卢克出来后，看到了一条被车轮压出很深车辙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我们理想的定向物。我们断定我军曾从这里通过，于是我们放心地沿路前进。太阳直射在我们的脸上，可见，我们是在向南走。方向似乎是对的。我们在田野上沿着车轮压出的车辙走着。但是，很长时间我们没遇到一个人。我有点怀疑，我们走的方向是否正确？我们登上了小山岗。我决定用地图查对一下。我停住马。后面副官和饲养员也停下来。我展开地图……突然，从哪个方向响起了自动枪点射声和枪声。子弹呼啸而来。我的坐骑一下子用后腿立了起来，随即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骑兵的老习惯救了我——我立即把脚从马蹬里拔出来，跳下马，立刻趴在深深的车辙里。

副官和饲养员就在我旁边。他们几乎同时喊起来，让我骑上另一头马，我的回答是命令他们：

“卧倒！”

他俩也趴在车辙里。一秒钟后，他们的马也被自动枪射中倒下来了。深深的车辙使我们免受伤害。我们一动也不动地趴了好几分钟。子弹纷纷射入紧贴身旁的地里。一段时间内。

我们装作被打死了。但是，长时间趴着不动也不行。我当时戴着红顶的将军羊皮高帽，穿着镶有彩条的裤子。总之，这些标志是德国人非常熟悉的。我们再也不能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下了。冰冷的水渗透了衣服，全身象被冰箍箍住了一样。

我们沿着车辙匍匐前进。敌人发现有动静。加强了自动枪的火力。

副官大叫：

“司令员！扔掉帽子！他们正朝红帽顶瞄准！”

这个要求当然是不符合体统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管什么体统吗？我摘掉帽子，但德国人的火力并没有停止。我们匍匐前进。很快，多那双打猎穿的牛犊皮靴的翻口里灌满了稀泥。副官建议我脱掉皮靴。没办法只好再听他的。脱下靴子后，爬起来轻松多了。在稀泥里爬行可真不是味道！我们一边向前爬，一边要扒开稀泥。

很快，我们根据声音断定，子弹已经不住我们身边打，而在我们头上

很高的地方飞啸。

可见我们爬下了小山岗，到了一个死角。

我们又小心翼翼地爬了一会儿。枪声终于停止了。我们站起来向村镇走去。

还没走到巴扎夫鲁克镇，我们遇见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B·A·多罗宁将军。他也是骑马去卡缅卡，在那条车辙上迷了路。我们当然让他转回去，于是，我骑上他的饲养员的马，向肖洛霍沃的指挥所走去，指挥所仍然设置在医院里。我回来后赶紧更换毡靴和备用制服。

但这一天的意外事并没有到此为止。还没有等我换好衣服，就听到越来越近的飞机轰鸣声，然后是炸弹的爆炸声。爆炸震动了楼房，窗户上的玻璃也震飞了。我走到街上，身子紧贴在墙边。说实话，没有地方可以隐蔽。周围都是开阔地，既没有灌木林，也没有沟渠。

德国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扔炸弹。目标都是医院。我想起我说过上太空，就是用暗语告诉弗拉基米罗夫我在医院里。就敌人的理解力来说，《伊索寓言》并不是那么深奥难懂的。德国人猜想到，医院被我们变成了某个重要的指挥中心。我们没有反击空袭的高射炮。只好耐心地等待德军飞行员卸完那致人于死命的重负。没有损失是不可能的。战争就是战争……

我们转移到经过仔细地伪装的新指挥所，同各部队联系上了。

在离肖洛霍沃不远的地方，我命令一个炮兵连展开，瞄准射击巴扎夫鲁克河的渡口。

近卫步兵第 29 军司令部向我报告，该军的部队同第 46 集团军步兵第 31 军的部队一起，击溃了阿波斯托洛沃方向的敌军之后，进而追击，在行进间占领了大科斯特罗姆卡、新谢苗诺夫卡、上米哈伊罗夫卡、“曙光”集体农庄和希罗基墓地。

在其他方向上，德军的退路，也变得狭窄了。

在一些重大的战斗中，常常有其焦点。在同尼科波尔的敌集团交战中，焦点就是大科斯特罗姆卡。阿波斯托洛沃防御重点的陷落，当然使德国统帅部失去了阻止我军进攻的任何希望。为了阻止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通过大科斯特罗姆卡进攻第聂伯河岸，德国统帅部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部队，包括把原在第聂伯河左岸阻击近卫第 3 集团军的部队也调来投入战斗。

在近卫步兵第 29 军部队正面和近卫第 4 军部队的右翼出现新的德国师：山地步兵第 3 师，步兵第 17 师、第 125 和第 258 师以及坦克第 9 师。

这些部队抵达后即对我们的两个军实施反冲击。我们暂时停止前进。道路又是泥泞不堪，由于弹药不足，我们在击退敌人的反冲击后，不能立即展开进攻。敌人在这几次反冲击中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我们自己也无力再组织一次突击，以攻下第聂伯河河岸和完成合围。据航空侦察报告，德国士兵在增援部队的反冲击掩护下，潮水般地跑出合围圈。在路上和河滩，到处都是他们扔掉的技术装备和重型武器。这已经不是撤退，而是狼狈溃逃。

2 月 8 日，我们得知 A·T·什列明将军的第 6 集团军的

步兵第 66 军的部队和 C·C·列柳申科将军的近卫第 3 集团军的步兵第 32 军的部队已经进入尼科波尔。

我认为，这一城市的解放经过，极好地表现了各兵种以及几个集团军甚至是几个方面军的协同动作。尼科波尔是近卫第 6 和第 3 集团军的部队解放的。但是，尼科波尔的解放在较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近卫第 46 和第 8 集

团军的行动。

在阿波斯托洛沃和大科斯特罗姆卡被我攻克以后，敌人开始迅速从尼科波尔撤退，放弃他们曾疯狂地、拼死拼活地坚守的锰矿。

2月29日可以被认为是彻底击溃敌人尼科波尔集团的日子。为了歼灭这股敌人，近卫第8集团军从去年11月开始一直同其他军团一起，并肩战斗。

3

1944年2月24日，我们收到了方面军司令员的一份训令，训令实际上给近卫第8集团军和其他集团军指出新的战役方向。

集团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敌人击退到因古列茨河对岸，并在右岸夺取登陆场。

2月25日，在因古列茨河左岸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实际上持续到2月29日。

我军顽强地向河岸挺进，扫清了左岸敌人的据点。大约几分钟后，战斗停息了，似乎进入相持阶段。无线电和电话联系不太灵，我应该到部队去，但没有一辆越野汽车能开得动，只好改乘坦克牵引车、即没有炮塔和火炮的T—34型坦克。

我来到近卫步兵第4军和第29军的司令部以及几个师之后，了解到部队尚未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来实施进攻。比如现在横在他们面前的、敌人沿河岸设置的防线，只部署一个梯队的兵力。泥泞的道路固然妨碍着我军的进攻，但也使希特勒分子无法利用可以机动自己部队的优势。因此，应当设法鼓起大家的士气，动员他们采取积极的行动。

我至今还记得，近卫步兵第82师是如何积极行动起来的。

我来到了A·A·马卡连科师长的指挥观察所，坚持要他果断地将他的师转入进攻。

步兵出发了。德军指挥部和士兵们都没有预料到，我军会在到处泥泞、完全无路可走、又无炮火积极支援的情况下，发动进攻。第一次进攻就奏效了，敌人惊慌失措，扔下武器，掉头就跑。这一天，近卫步兵第82师边走边打，约前进了16公里，前出到从新库尔斯基镇至舍斯佳连镇一带的因古列茨河河岸。

要扩大战果，但泥泞的道路又成了障碍。天无绝人之路，我从前沿返回集团军司令部时，我的车是沿希罗科耶——阿波斯托洛沃的铁路和路堤行驶的。我发现路轨和枕木都被拿掉了，但路堤还可以充当汽车运输的通道。回到司令部后，我立即命令工程勤务主任B·M·特卡琴科上校修整好这条路，以便运送部队、技术装备和弹药，并为经此路开往前线的运货车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就这样，我们经由这条路把近卫步兵第28军的部队调往前线，并保证了部队的粮食和弹药的供给。这条路成了我们的动脉，依靠这条动脉，我们在三天之内就调集好了进攻的部队。

方面军首长向集团军布置了一项任务：在3月1日至2

日期间，在因古列茨河右岸夺取登陆场，并前出至泽廖纳亚、安德列耶夫卡、泽廖内盖、戈罗赫瓦特卡地区。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遵照方面军的训令，应从这个地区开始，在特罗伊茨科—萨福诺沃、新布格方向，发动果断的总攻。在方面军的训令中，还向集团军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在希罗科耶、安德列耶夫卡地域内，准备好一些渡口，以便将伊萨·亚历山德罗维

奇·普利耶夫中将指挥的方面军骑兵机械化集群（它是由近卫机械化第4军和近卫骑兵第4军组成）投入突破口。

左邻的第6集团军，在此之前及时地把自己的战线转向西面。

这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决定以集团军右翼实施主要突击，把近卫步兵第28军投入战斗。同时命令Q·H·潘科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88师穿过因古列茨和泽廖诺耶镇前进。

进攻预定在3月3日进行。

侦察和勘察表明，因古列茨河右岸的防御相当坚固，设有：全断面掩体、带有观察所的炮兵阵地和迫击炮阵地、地雷区。总之，敌人再次处在筑垒地区内，还有河水泛滥的因古列茨河保护。为了突破这一设防地带，需要很多炮弹和迫击炮弹。但我们的弹药还是不够，运送又极其困难。

在突破因古列茨河敌人防御的战斗中，费奥多尔·列昂契耶维奇·卡特科夫上尉指挥的近卫第88师侦察连，在近卫步兵第28军的地段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卡特科夫的任务是：侦察因古列茨河河床、寻找强渡地点，查明敌人防守泽廖诺耶和希罗卡亚达恰镇的兵力。上尉仔细地分析了情况。他认定，要完全查明敌人的兵力只有率连队渡河到对岸。但是，连队穿过防线时必须避免战斗。

侦察兵用了半天时间观察地形和研究泽廖诺耶镇的情况。他们对每一座楼房、每一条街道、每一条沟壕都很注意。侦察员们发现了一段穿过泽廖诺耶镇到因古列茨火车站的铁路。

侦察兵也研究了从泽廖诺耶到因古列茨车站镇拐弯处的河岸。他们查明，德国的双人巡逻队有时沿着泽廖诺耶镇和车站镇之间的铁路路堤巡逻。巡逻队的行踪使侦察兵想到，正是在拐弯处没有德国部队。

连长卡特科夫拟定了计划。计划很简单：在夜幕的掩护下，在拐弯处悄悄地渡过因古列茨河，力争顺利通过河流与铁路路基之间的空旷地带，消灭巡逻队，越过铁路，向泽廖诺耶镇和因古列茨车站大楼匍匐前进。如果不成功，我军要用步机枪向泽廖诺耶南郊进行拦阻射击。

师长Q·H·潘科夫少将批准了这个计划。

侦察连大约有60个战士。他们配备有自动步枪和8挺轻机枪。通信员跟随连队架设电话线。

晚上10点，渡过河的侦察兵向铁路路基运动。经验最丰富的战士走在前面。在后面约二百公尺处，卡特科夫走在侦察连战士中间。四个通信兵悄悄地捌开电话线。走在前面的侦察兵和连长之间，不断用规定的信号互相呼唤。

从河岸到铁路路堤走了大约2个小时。侦察兵极其谨慎，因为只有小心隐蔽从事，才能使他们勇敢大胆的袭击取得胜利。

快到晚上11点时，侦察兵到达路堤便隐蔽了起来。卡特科夫上尉用电话同师长潘科夫将军联系。他向师长报告了情况，说他已准备好迎接被指定为进攻第一梯队的各个营。

根据计划，近卫第269团第2营应该进入侦察连的右侧，并向北拉开战线，以便向泽廖诺耶发动进攻；而近卫第266团第3营则进入侦察连的左侧，以便进攻车站镇。卡特科夫派向导来接这两个营。

在泽廖诺耶镇附近，德军摩托化第16师步兵团的两个巡逻兵中了侦察

兵的埋伏。经过简短的审问得知，从泽廖诺耶到尼古拉耶夫卡这一地段是由摩托化第 16 师负责防守。泽廖诺耶镇的守备部队是一个约有 300 人的混成营。有 6 辆坦克加强该营。镇的周围挖了全断面掩体，准备迎击东面来的敌人，值班机枪据守着这些掩体。该营的主力在镇的西郊。

约半夜时分，近卫第 3 营营长切尔尼亚耶夫少校、布罗夫中尉、第 2 营党小组长加利莫夫少尉都集中了卡特科夫那儿。

他们在这里进一步明确了两个营和侦察连的任务：两个营仍按原定方向发起进攻；第三营的一个步兵连加强到侦察连；侦察连向 84.4 土岗发起突击，截断从泽廖诺耶镇通往拉赫马诺夫卡和沃伊科沃的公路。约定在侦察连前出至 84.4 土岗以后开始攻击。信号——三颗绿色信号弹由卡特科夫发出。

这时，师长同两个营长和卡特科夫进行了联系。潘科夫将军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情况，批准了行动计划，并告诉他们，炮兵正瞄准泽廖诺耶镇和车站镇，一俟第一颗红色信号弹发出后，即进行炮击。

敌人的摩托化第 16 师是由中将冯·施韦林伯爵指挥的。正象后来从审讯案卷中得知，当时他认为，在苏军刚进行了争夺尼科波尔和阿波斯托洛沃的战斗以后，不经过长时间的战役间歇，是不可能进攻因古列茨的。他认为“泥泞将军”会长时间阻止苏军的进攻。后来我们从缴获的敌军这些兵团司令部之间的来往公文看到，他们更坦率地说，苏军突破泽廖诺耶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他们原打算在因古列茨河的防御地区尽量多坚持一些日子。希特勒的将军们那里想到，他们的如意算盘竟会被卡特科夫上尉、切尔尼亚耶夫少校、加利莫夫少尉和其他的苏联军官们打乱呢？

大约在半夜 2 时，侦察连和步兵连在卡特科夫的带领下已接近了 84.4 土岗。那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浓黑的夜色笼罩着四周。如果卡特科夫不是再次走运的话，那么，在这漆黑的夜色中是很难判定方向的。侦察员们摸到了电话线。电话线是从南到北架设的。侦察员们立即把自己的截听机接到线路上。线路没有声音。但是，通信后根据沙沙声断定，线路是接通了。

侦察兵沿着电话线的方向前进。他们又两次把截听机接上。第三次听到通话了。从电话中得知，正往炮兵营各发射阵地运送 148 发炮弹。卡特科夫猜测，电话线一定是直通到敌人炮兵观察所。

卡特科夫决定悄悄地拿下炮兵观察所。他把先头排放在最前面，还派了两个懂德语的战士——准尉科尔什及列兵济明和他们同行。电话线的走向证明卡特科夫的预想——电线将把他们带往控制这个地区的 84.4 土岗是有根据的。

几分钟以后，科尔什准尉发出了“注意”的信号。在稍北二百至三百公尺的地方。出现了汽车前灯的灯光。汽车在泥泞中打滑，常常停下来。它们好象在往炮兵阵地运送炮弹，正如在截听到的电话交谈中谈到的情况那样。

这又证明，侦察连已处在离 84.4 土岗很近的某一个地方了。

三颗绿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凭借信号弹落地的光亮，侦察兵们看到距离自己大约 50 公尺的地方，德国士兵和军官乱作一团。他们惊慌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信号弹在他们头上升起。卡特科夫命令发射白色照明弹，侦察兵们一个快速冲锋顺利地通过了他们同敌人之间的空旷地带，大家纷纷扔出手榴弹。以一个军官为首的几个敌人被俘虏了。另一群德军士兵隐藏在土岗上的掩蔽部内。我们的一个侦察员发现了掩蔽部上的烟

窗，往里扔了一颗手榴弹。

这时，在泽廖诺耶镇上，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卡特科夫从土岗上看到，亮着前灯的汽车正从泽廖诺耶镇匆匆地向铁路道口驶去。卡特科夫决定切断他们的退路。他命令配属给他的步兵连连长占领土岗上的环形防御。

科尔什准尉的任务是在电话机前值班，并回答德国人说：“土岗上一切平安无事，战斗正在东北方的某个地方进行。”他命令第3排继续前进去截住正在撤退的德国汽车。卡特科夫本人和第一排冲向铁路道口。侦察兵点着了道口上的载有燃料的汽车，俘虏了许多汽车司机。一个由15辆汽车组成的运载粮食和弹药的汽车队停了下来。第3排的侦察兵接近了道口。他们抓了将近30名俘虏，其中还有德国军官。敌人从泽廖诺耶镇撤退的退路被切断了。第2营也来到道口左侧，从而完成了对镇里的法西斯分子的合围。

近卫第269团的分队接替了在铁路道口边的卡特科夫上尉的侦察兵以后，卡特科夫上尉决定进行新的大胆的搜索。原来，他从被俘的军官中了解到，在泽廖诺耶偏西南的安德烈耶夫卡镇地域内，驻扎着敌人的一个榴弹炮兵连。卡特科夫查明，炮兵们常去安德列耶夫镇里过夜。连里只留下几个战斗警戒人员。他命令两个排的侦察兵坐上德国汽车，让德寇的司机开车到炮兵连去。他自己带着第3排，坐在前面的第一辆汽车里。

汽车大开着前灯向安德列耶夫卡驶去。留在84.4土岗的科尔什准尉几乎每隔5分钟就回答一次电话，说在他的地段“一切平安无事。”有几次他中断了联络，以便在同他一无所知的德指挥所打交道中赢得时间。

师长B·H·潘科夫少将收到了有关两个营夜间行动的情报以及卡特科夫上尉的报告后，当即命令近卫第269团团长拂晓肃清泽廖诺耶镇的敌人，然后让大家吃饭，并作好全团向沃伊科进攻的准备。

命令近卫步兵第266团团长帕夫连科中校带领全团渡河到右岸，并在拂晓重新向火车站镇发动进攻。

近卫步兵第271团团长格里戈里耶夫中校的任务是，渡河到右岸，并在拂晓展开对切尔沃诺耶镇的进攻，在那儿同侦察连建立联络。师工程兵主任接到命令，要在3月3日天亮前为坦克和大炮渡过因古列茨河作好准备。各炮兵观察所拂晓前已转移到河的右岸。

德军第16摩托化师的司令部收到来自炮兵、泽廖诺耶镇和火车站镇的、令人担忧的报告。报告说，在因古列茨河右岸战斗正在进行，苏军已经转入总攻。但师司令部认为这是大惊小怪。这算什么进攻？据侦察报告，还没有进行炮火准备，苏联部队在左岸的部署也没有作任何变更呢！德寇的师参谋长在地图上标出了发生夜战的地方。当然，被卡特科夫侦察兵占领的那个土岗没有作标记，因为科尔什回答德国电话兵说土岗“一切平安无事。”由于德国的一个营在泽廖诺耶镇全部被合围，并且没有一个士兵决心在黑夜踏着泥泞冲出合围，所以，仅在最初几分钟里还从泽廖诺耶传出过令人恐慌的、告急的消息。据记录下来的无线电通报，只说泽廖诺耶的德军阵地正受到苏联侦察兵的袭击。此后联络就中断了。

侦察兵的袭击会有什么结果呢？无非抓个“舌头”，也仅此而已。显然，师长冯·施韦林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惊恐不安。也许他累了，也许阿波斯托洛沃地域的战斗已使他精疲力尽了。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稳住自己的司令部。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校级军官都自我安慰，认定苏联军队没有能力发动进

攻，甚而怀疑搜寻苏军侦察兵的事是否值得重视……

敌人营垒里的短暂的恐慌平息了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带着一个德军载重汽车车队向安德列耶夫卡镇挺进的卡特科夫在做什么呢？

卡特科夫的汽车纵队到安德列耶夫卡去的那条道路，要从泽廖诺耶穿过 84.4 土岗。从土岗到安德列耶夫卡的距离是 5—7 公里。道路是临时铺设在荒地上的。地面上铺了一层矿渣，有些地方沿着车辙放置了一些原木。矿渣很管用，汽车常常打滑的现象总算对付过去了。在离镇还有半公里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东方渐渐现出了鲜红鲜红的朝霞，天亮了。

侦察兵们隐蔽地接近炮兵阵地，突然发起进攻。敌炮兵连的战勤班遭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

德国兵跳起来，急忙去抓枪，但是被侦察兵们击中了，倒在地上。手榴弹纷纷飞向掩蔽所和堑壕……

德军炮兵从安德列耶夫卡镇向炮兵连跑来。卡特科夫在路上向他们射击，而那些冲进炮兵连的人，却遭到埋伏的侦察兵的射击。安德列耶夫卡的守备部队和两个炮兵连的全体人员都被包围了，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被俘虏。卡特科夫在榴弹炮兵连周围建起了环形防御，并通过泽廖诺耶镇向师司令部报告了情况。

近卫步兵第 266 团第 3 营营长听到安德列耶夫卡的枪声后知道，这是卡特科夫的侦察兵已经冲进了敌人的防御纵深。于是，他调自己营的右翼切断从因古列茨车站通向西面的公路，并迅速发动进攻。于天亮前占领了车站镇。

敌人在河右岸、在泽廖诺耶、因古列茨车站地段的防御，实际上已被突破了。

3 月 3 日上午 11 时，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转入总攻，分数路强渡因古列茨河，并在一天的战斗中向前推进了 5—6 公里，夺取了几个分散的登陆场。并把它们同敌人防御纵深的深远凸起部连接在一起。现在登陆场已从泽廖诺耶扩大到安德列耶夫卡（扎别列日纳亚）、希罗卡亚达恰、尼科罗—科泽利斯克车站。集团军部队在河水四溢的那条河的右岸站稳脚跟后，把火炮、坦克和弹药运过了河。

德军最高统帅部这时还困惑不解：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敢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希特勒本人、随后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官直到 3 月 4 日还要求自己的将军冯·埃德尔斯海姆和冯·施韦林对此作出解释。

没过多久，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同缴获的其他文件一起落到我们手中。这份文件现在保存在我私人的档案室里。内容是：

电话记录

步兵第 30 军 1944 年 3 月 4 日 24 时

由电缆传送。机密

坦克第 24 师师长冯·埃德尔斯海姆：

摩托化第 16 师师长冯·施韦林：

军指挥部收到最高统帅如下的命令：

“鉴于摩托化第 16 师的战线被敌人迅速而深入地突破，那里的情况至今还不太明了，我断定你师一些分队的指挥员丧失了战斗力。我要求你们详细调查，并根据情节轻重，把那些失职的指挥员及其副手交军事法庭审讯，严

加惩处。要将处理情况立即报我。

最高统帅。

为此，坦克第 24 师师长冯·埃德尔斯海姆和摩托化第 16 师师长冯·施韦林，要在 1944 年 3 月 6 日之前，交给我下列材料：

1. 为什么敌人在泽廖诺耶能成功地楔入并迅速实施突破？

2. 2. 什么原因引起“2 号据点”毫无秩序地撤退？

3. 为什么 3 月 3 日夜摩托化第 16 师的右翼违抗军部

的命令毫无秩序地撤退，致使由是步兵第 3 师的左翼受到严重的威胁？

按照最高统帅的要求，所有失职的指挥员和他们的副手均解除职务，并送军事法庭审判。

缪勒将军

原件第 1044 号 R1944 年。

我想顺便援引另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这份文件如果当初夹杂在必须销毁的集团军的其它档案材料中，被一起销毁，恐怕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它了。这份文件是在中将冯·施韦林伯爵的普通文件夹里找到的，因为这个德国将军竭力要为自己任师长时的行为辩护，他从集团军档案中抽出了这个文件。

我们为什么对这个文件感兴趣呢？

今天，战败的德国将军们千方百计地在历史面前替自己辩护，竭力重弹德国总参谋部当时有高超的业务水平，它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如此严重地歪曲历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谁也不会争辩，从普鲁士将军沙伦堡尔斯特（1755—1813）起，封建式的军人贵族阶层在德国复活了，他们从中世纪条顿骑士们身上寻找传统精神。在这位将军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创办了一个军事学院。但是军人贵族阶层的形成，并不等于一种军事学派的形成，更不是一门军事学术。

今天一些被打败的希特勒的将军正在撰写回忆录。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向全世界大谈其作战本领。为自己的失败辩护，隐瞒他们使德国人民遭受灾难的真相。曼施泰因和其他人竭力要证明，他们在战争中使部队很少流血。冯·施韦林中将偶然留下的下面的一份文件，讲的正是这个问题：

步兵第 30 军军长

炮兵将军事弗雷特·皮科先生：

除 1944 年 1 月 19 日的电报外，我再补充以下内容。

在最高统帅部的几个通报中，三次提到：去年夏天，在米乌斯河、顿涅茨和扎波罗热的几次大的接连不断的防御战期间，我师曾三次遭受重大的损失。在这些战斗中，我师损失了 19,411 人，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战斗编制（步兵），我师三次遭到全歼。

尽管如此，我师动用自己的预备队，并且在得到补充以后，仍保持着战斗力。

但是，在经过争夺扎波罗热的几次战斗以后，我师的战斗编制和战斗力，尤其是步兵的战斗编制和战斗力，不可能再恢复了。已经没有预备队了。

在这个时期，即从 1943 年 10 月 10 日起，我师未经休整又在第聂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的西南地域开始了战斗。从 1943 年 10 月 10 日至 1944 年 1 月 14 日，我师又有 5120 人伤亡，失踪和生病。

我师参加了从去年 10 月 20 日起到 11 月 2 日在古利亚

伊一波列以北地域的几次战斗；从 11 月 11 日起到 11 月 30 日在纳扎罗夫斯克以南地域参加了战斗；从今年 1 月 10 日起至 1 月 14 日，参加了争夺新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卡）的战斗。

整个师从去年战斗开始起，伤亡人数至少相当于 6 次全军覆没。

我师元气大伤。我师步兵的素质不如目前一般的步兵分队，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这是事实。

摩托化第 16 师师长

冯·施韦林伯爵

1944 年 1 月 21 日于师指挥所

上述文件是 1944 年 1 月 21 日书写并向步兵第 30 军军

长报告的，当时我们的部队在尼古拉耶夫卡（旧称新尼古拉耶夫卡）地域，还没有对它进行 1944 年 1 月底和 2 月初那样的毁灭性的突击。既然上述文件说摩托化第 16 师已六次被歼，那么，我们在 1 月底和 2 月初对它实施进攻以后，摩托化第 16 师当然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它又补充了许多炮灰，投入新的战斗。

3 月 6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突破纵深达 12 公里，正面达 18 公里。部队前出至泽廖诺耶、新马林诺夫卡、喀山科夫卡、安诺夫卡、乌克兰卡、泽廖内盖、韦肖雷伊斯塔夫地区。

这样一来，就为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进入敌人已被清除干净的突破口，作好了准备。

3 月 6 日，方面军司令员命令普利耶夫进入突破口。20 时 30 分，普利耶夫将军的集群开始通过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战斗队形。

由于近卫第 8 集团军和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沿着新布格——尼古拉耶夫铁路急速而深入地插入，在 3 月 10 日日终前，就使敌人处于几乎完全被合围的态势。希特勒分子打算在西面突围，在 3 月 11 日前，他们组织了一个由第 17、第 125、第 302 步兵师和大量坦克组成的突围集团，并开始在西面和西北方向对新波尔塔夫卡和普里沃利诺耶实施突围。

为了加强近卫第 8 集团军的右翼，方面军司令员将 E·I·普希金坦克兵中将指挥的坦克第 23 军配属给我们。该军集结在泽廖内盖、巴什坦卡、舍夫琴科。

坦克刚刚向指定地点接近……我们同它保持着无线电联络。我们用简短的信号小心翼翼地对话，目的是使德国人无法从无线电截听中猜到我们在调动一个军。突然，无线电用明码宣布：普希金被打死了……中将、军长，被敌人歼击机扔下的炸弹弹片打死。第 23 坦克军军长……我俩经常在同一战线，同一司令部的掩蔽所或指挥所里见面。

有人说，你在战争中早已做了死的准备。不，这话不对！

可是，这个军该怎么办呢？它接到的任务只是集结，还没有向它布置战斗任务。又不能通过无线电向它布置。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用波—2 飞机把近卫第 8 集团军装甲兵司令员马

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将军从特罗伊茨科—萨弗罗诺沃地域送往巴什坦卡。他的任务是：去指挥处在集团军第二梯队位置上的坦克军；同普利耶夫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部队以及近卫步兵第 28 军各师保持密切的联系，阻止敌人穿过新布格—尼古拉耶夫铁路向西突围；对敌人想突入西面的各种尝试都要实施反突击将其击退。一个小时以后，魏因鲁布动身起飞了。过了三个小时，我收到了他顺利着陆和到达坦克第 23 军司令部的密语电报。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敌人每次发动的新的反冲击，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统帅部竭力想使部队在新波尔塔夫卡、巴什坦卡和巴尔马舍沃方向突出合围；敌人的主力分两个集群集结在两个地域，即由 5—6 个师组成的北集群，由 3—4 个师组成的南集群。

我们非常担心敌人占领新波尔塔夫卡，那里设有军械库。这个军械库座落在新波尔塔夫卡车站到弗拉基米罗夫卡的一段铁路支线上。一旦敌人从这个军械库得到弹药补充后，就会在火力上占了优势，因为我们的弹药已经快消耗完了。

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接到命令，调派一个弹药最少的炮兵营来，给这个营配备上缴获的并已修好的德军火炮，并把这些火炮部署在新波尔塔夫卡地域靠近已被我占有的德军炮兵弹药库的发射阵地，要他们不要吝惜德国的炮弹，猛烈地轰击新谢尔格耶夫卡、马列耶夫卡地域的敌集群。

我同作战组立刻从特罗伊茨科——萨福诺沃出发来到新波尔塔夫卡。在指挥所里和我在一起的有：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谢苗诺夫将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集团军副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上校、工程兵主任特卡琴科和参谋韦利金、卡修克、梅列日科、科帕年科、帕夫洛夫等人。我们在沃尔内伊到新波尔塔夫卡的公路上行驶时，曾两次碰到潜入的小股敌人，并两次打退了他们。我们沿着耕松了的田野开辟了一条通往新波尔塔夫卡的道路。

3 月 12 日早晨，我到达了新波尔塔夫卡，并同近卫第 28 军和近卫第 4 军建立了联络，还同坦克第 23 军建立了联络，就地研究了形势后，我明白，我们现在到达新波尔塔夫卡比任何时候都及时，必要。敌人已集结了足够的兵力和兵器，并已展开，目的是要突破业已形成的合围圈。

希特勒在斯尼吉列夫卡地域的被分割的军队集团，不仅大部队，而且小股部队都在寻找退路。散兵游勇流向四面八方。临近 1944 年春天，在德军中再也无人想重蹈斯大林格勒的覆辙了。

德国士兵绝望地投入了毫无希望的反冲击。有时他们陷入没膝的泥泞中，直挺着身子向我们阵地走来。一阵机枪短促射击后，他们的尸体铺满了已成泥浆的耕地。第一次攻击被我们的防御粉碎后，又掀起了第二次，第三次……这是那些疲惫不堪、已无生还希望的人的进攻，他们妄图冲到西面，希望能碰上运气，活下去……

敌出动大批步兵，在坦克支援下，绕过我各支撑点，企图穿越我部，沿着新波尔塔夫方向，突向弹药库。敌人已打通了从新波尔塔夫卡通往因古尔纳河向新戈罗热沃和普利沃尔诺耶前进的道路。可以看出，德国统帅部不顾死活地急于进行反冲击。

3 月 12 日日终前，法西斯分子的反冲击越来越频繁。他们向新波尔塔夫卡的渗透造成了现实的威胁。紧急编成的、并被部署在离德国弹药车不远的发射阵地上的两个炮兵连（使用 105 毫米口径的德国炮），毫不吝惜炮弹进行战斗。

炮兵们直接对准正在进攻的德国步兵开火。现在很难说他们被打死了多少。炮火是毁灭性的。为了使炮兵在连续不断的炮击中每隔 2—3 小时能轮换一下，建立了轮换的炮班。俘虏向我们提供了他们部队的番号：步兵第 17、第 125、第 302 师，山地步兵第 3 师和轻步兵第 97 师。

3 月 12 日日终前，德军终于向前推进了一些。在战斗中，有时我军不得不用近卫第 39 和第 79 师的零星部队来防守新波尔塔夫卡地段。这样，敌人也就摸到了我集团战斗队形中最薄弱的地段。

我们炮兵的轰击稍微地削弱了希特勒分子的猛攻。这时独立强击工程兵第 11 旅到达了。我命令该旅在韦肖雷农庄、新波尔塔夫卡车站和新波尔塔夫卡镇一线占领进攻出发地位。近卫步兵第 57 师的兵力也在该段展开。这使我军能够密集战斗队形，堵上德军借以向西突破的缺口。

我军开始重新部署部队。但这是在德国部队不停地实施反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地区的态势很危急，谁制服谁、谁消灭谁这个问题已明摆着了。

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占领了诺沃谢洛夫卡，并向新戈罗热诺突破。空军支援了他们的冲击。由 12 - 18 架飞机组成的机群轮番在我们的阵地上盘旋。战斗已逼近新波尔塔夫卡军械库南边。我决定用坦克第 23 军的一个坦克旅反击敌人的突围部队。

当时我的观察所设在新波尔塔夫卡的一座蒸气磨坊里。担任警卫的只有一个排的工兵。

这就是我这个集团军司令员留在手中的全部兵力。我等待着魏因鲁布将军向我报告，坦克第 23 军的一个坦克旅是否已作好战斗准备。终于收到了坦克旅已准备完毕的报告。17 时，我发出了坦克攻击的信号。攻击方向是新戈罗热诺和佐奥捷赫尼库姆。从观察所可以看到，我们的坦克在行进间楔入了德国步兵的战斗队形，坦克边走边向德寇士兵扫射，还击毁了大炮。德军官兵狼狈逃窜。他们在泥泞中奔跑是很困难的，跌倒了又爬起来，乱作一团，惊慌失措。几千名德国士兵扔下武器，脱下身上的衣服，狼狈地从佐奥捷赫尼库姆和新波尔塔夫卡附近，跑回到新谢尔格耶夫卡和马列耶夫卡去。

军械库地域的态势得到了很大改善。

3 月 12 日深夜，我接到方面军司令员的简短命令，命令指示我近卫第 8 集团军会同坦克第 23 军，以及由我预备队配属的步兵第 152 师一起，击溃企图从新谢尔格耶夫卡、马列耶夫卡地域向西突破的敌军集群，并在 3 月 13 日日终前，前出至佩斯基、多布拉亚、克里尼察、亚夫基诺、新谢瓦斯托波尔一线。

命令普利耶夫将军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占领斯尼吉列夫卡，并在 3 月 13 日这天坚守住基谢列夫卡、布尔哈诺夫卡、斯尼吉列夫卡、奥克佳布里斯基、巴尔马舍沃地域。

命令第 46 集团军在格罗姆科列伊河右岸巩固自己的登陆场后，在 3 月 13 日调集后勤机关和火炮，从早晨起进攻新奥克佳布里斯基。

这个命令是符合目前的形势的。方面军司令部正确地分析了态势，综合了各部队送去的情报，实质上是拟定了把挤压在别列兹涅戈瓦托耶、斯尼吉列夫卡地域的敌人集团合围起来并加以消灭的计划。

集团军部队准备于 3 月 14 日拂晓实施坚决的进攻。

敌人知道白天不可能突破我们的战斗队形，决定在深夜突围。

3月14日凌晨1时许，希特勒分子以密集的散兵队形和纵队向前突破，边冲边用步机枪射击。我们的炮兵无法开火，但步兵和坦克兵用枪口顶着德国人射击。德国兵只管向前冲，而不注意我们的火力。他们在黑暗中看不到自己的损失，成百成千地被打死。

半夜2时，我命令近卫步兵第35、第47、第57师和步兵第353师由北向南转入进攻。要在深夜确定如何展开战斗来消灭被合围的德军集团是困难的。只能根据步机枪火力的密集程度来猜测一些情况。只是到白天，我们根据战场上简直是成堆的法西斯士兵尸体才断定，希特勒军队企图进入因古尔河，想从这条小河的右岸逃生。

1944年3月14日。天空开始露出鱼肚白。

希特勒的一些纵队和独立集团仍然企图向西突围。

疲惫不堪的士兵一伙一伙地沿着田野和公路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地行走。这些侵略者昨天还是残酷无情、顽固不化，今天却无精打彩，垂头丧气。

深夜，我们的坦克原地待命。早晨，这些固定的火力点变成了致敌于死命的力量。

天色逐渐放亮，我军在整个战线开始行动起来。上午10时前，新谢尔格耶夫卡、新戈罗热诺、塔拉索夫卡、泽廖内盖地域时的敌人全被歼灭。两个小时以后，戈罗热诺会让站、新帕夫洛夫卡、新谢瓦斯托波尔、新布拉茨基地域内的敌人的一切反抗都被扑灭。

3月13日和14日的战斗结果是：歼灭了由步兵第79、第302、第97、第17、第125、第258师和坦克第24师残部组成的德国步兵第29军；重创了步兵第294、第304、第306和第370师。

在两天的战斗中，共打死约二万五千名德国官兵，俘虏了约一万名……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武器、汽车、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运输车。至于有多少尸体和武器留在或被扔丢在沟壑、山谷和田野里，这就很难说了。

只有少数敌人在西面、在南布格河那一边突围出去。

被解放的居民告诉我们，有一些德国兵和军官发疯了。

我们的部队击溃了敌人，把敌人从第聂伯河赶走了，完全从陆地上把敌人在克里木的庞大的法西斯军队集团孤立起来，并打开了通往德涅斯特和敖德萨的道路。

现在，我要来说说德国军方追究因古列茨河失职指挥官的不近情理的事。

下面是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霍利特将军于1944年2月

13日写的一封信：

摩托化第16师师长

中将冯·施韦林伯爵先生：

现对您提出控告，因为您：

(1) 违背您所知道的措词准确的军部的命令，没有竭尽全力守卫委托给您的卡缅卡地段，而是提早离开那儿，只留下力量薄弱的后卫部队，并且还命令你师在希罗基集结。这样，您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部队撤离了战场，并为敌人打开了通往战役地区的通道。

(2) 您认为无法将此事告知军部，尽管您有一切可能立即做到这一点。

(3) 在关键时刻，您再一次无视下达的命令，不尽一切可能同军部联络，也不向军部通报您所在地段的情况。

为了事先搞清楚情况，我委托集团军法官——首席审判顾问卡瓦齐克博士，就事情的实质听取您的意见。

这一委托不要看作是军事法庭的审问，而是代表我来听取您的意见。

为此，请您在把本师移交给冯·曼托伊费尔上校以后，带上有关实情的材料，立即到集团军大本营来。

霍利特签名

自从冯·施韦林的师所防御的正面地段被 E·N·卡特科夫上尉的侦察连突破后他就被解除了师和集群的指挥权，并被提交法庭受审。他好容易为自己作为辩护，后来被派往战事较平静的西线去了。

4

3月14日黄昏，有8千多名被俘的德国官兵，走过设在新波尔塔夫卡的近卫第8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前面。他们一队又一队鱼贯而来。有时，一个冲锋枪手就押送将近200人的队伍。在战线的这个地段，敌人从精神上完全被击败了。

方面军首长给我们集团军下达了任务，令部队急速改变方向，即从南部转向西部和西北部，并绕过河口湾向南布格河挺进，从行进间强行渡河，不使敌人有沿水域组织防御的机会。

3月19日和20日，各先头步兵团已强渡过南布格河。近卫军战士携带着轻武器，有的坐小船，有的坐木排，有的甚至坐在木头上渡过了河。大炮和坦克无法这样渡河。当时找不到架浮桥的材料。因此大炮不能支援已渡河的部队。各炮兵兵团的弹药也几乎耗尽了。炮兵师师长拉托夫将军只能给每门炮提供3发炮弹。

方面军司令员要求近卫第8集团军采取坚决行动，并提出了要集团军全部兵力都渡过河去的任务。命令 H·A·普利耶夫将军使骑兵机械化兵集群做好于3月22日夜在特罗伊茨科耶、新敖德萨地域渡河的准备。

但是，天气不好妨碍了我们执行命令。海上刮起了风。布格河的河口湾在正常气候时就是一大障碍，何况现在海水涌进了河口湾。海水迅速上涨，我们占领的一些登陆场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因此只得命令那些经过战斗占领了登陆场的部队离开登陆场，并返回左岸。

3月21日，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打电话到指挥所找到我，邀请我去他那里吃午饭，还暗示来了大首长。

我猜到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所指的大首长是谁。推迟渡南布格河不能不使大本营担心。到我们这里来的是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随行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大将。

被邀请到普利耶夫那里去的，还有近卫机械化第4军军长 T·A·塔纳斯奇申中将和空军第17集团军司令员 B·A·苏杰茨上将。

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和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祝贺我获得最高奖励——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我祝贺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荣获第二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安排了午餐。

我等待着一场严肃的谈话，但一切都是从开玩笑开始的。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想起了我前不久在卡缅卡附近的奇遇。那次我的坐骑被打

死了。

华西列夫斯基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询问我的马到哪儿了。而马利诺夫斯基似乎担心什么地问道：“集团军司令员，没有给你送去新的马具和羊皮高帽吗？”我解释说：当天晚上饲养员就找回了马具、鞍子和羊皮高帽，连我的靴子也找回来了。

“你的情况就象塔拉斯·布里巴一样！”马利诺夫斯基说：“那一位是爬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找自己的烟斗……碰上如此可观的战利品也算敌人走运了。”除了回击，我别无它法了。

“那怎么办呢？”我问华西列夫斯基：“总不能在掩蔽部里指挥部队。要是象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塔纳斯奇申那样的指挥员，不常到部队和前沿，那怎么行呢？”

华西列夫斯基打断我说：

“别生气，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同志！这都是玩笑话，不能一天到晚都谈正经的！谁不知道，在战争中既没有听到过炸弹的爆炸声和炮弹的轰击声，也没有听到过子弹的呼啸声的司令员，准是最糟糕的司令员！”

……午饭以后，华西列夫斯基邀请我们出席会议，研究一下近卫第8集团军和A·A·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尔后任务。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方面军部队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强渡南布格河和解放敖德萨。战役的最终目的是，我军前出至德涅斯特河。

近卫第8集团军必须突破南布格河右岸敌人的防御，并为普利耶夫的快速集群进入战斗创造条件。

我们各自带着这个任务返回自己的指挥所。

我们考虑了在狭窄的正面地段行动的一切可能性和复杂性以后，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制订了一个计划，用近卫第29军和近卫第4军的力量强渡南布格河，从安得列耶夫斯基登陆场突破敌人的防御，并沿卡尔斯鲁厄、兰道方向转入坚决的进攻。

敌人竭力阻止我们的进攻，但可以感觉到，德国军队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体力方面都已衰弱，他们顶不住我军的进攻，开始向西败退。在这一地段上，他们没有坦克。

至3月29日，集团军的部队进入了基辅—亚历山德罗夫卡、彼斯恰内布罗德、希罗科拉波夫卡地区。3月31日16时前，集团军部队已前出至下一个水域——季利古利斯河口湾。

步兵部队推进得相当快，他们不给敌人在经受斯尼吉列夫斯基的打击之后恢复元气的机会。但毕竟还是遇到了敌人在各个加固的据点中的有组织的防御。

现在极需大炮、坦克的支援，但这些技术兵器还没开始渡河。

在特罗伊茨科耶地域，我们正在日夜施工赶造一座载重量为16吨的桥。但要在春汛期间，一下子在南布格河上架起一座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只剩下大约五米的跨距了。凡是可以用于建桥的材料都用上了。工兵们在特罗伊茨科耶镇旁边看上了一幢质量很好的房子。

他们决定把它拆掉，将圆木用于铺设桥面。但是他们遇到了意外的坏情况。他们弄掉涂抹的泥灰以后，发现里面不是圆木，而是土坯。房架是用一些轻而不结实的零碎的木材造成的。

在渡口边已经集结了几千辆马车、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运载粮食和弹

药的载重汽车。我们的工兵疲惫不堪。他们浑身湿透，打着冷战。可是没有材料把桥建完。

工程兵主任 B·M·特卡琴科上校来找我。他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敌人的炮火下，在炸弹轰炸的情况下，在许多水域建造过渡口，但在这里却一筹莫展。

我站在那里，观察四周，也挖空心思出点主意。突然，我发现离这儿不远有一座风磨。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在特罗伊茨科耶周围有五座这样的风磨。也许……特卡琴科听了一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组织了一队工兵向风磨走去。从那里回来的第一个人是特卡琴科，他报告说，那些风磨可以用来架桥。我命令立即分给每个工兵 200 克伏特加和一些配菜，好填填肚皮，暖暖身子。

我问工兵们：

“怎么样，近卫军战士同志们，两小时后桥能架起来吗？”

“集团军司令员同志！有了材料，还有酒，桌上还有下酒的菜，怎么会没有桥呢！”

两小时后，我同司令部的同志一起来到桥上。我们的部队正在过桥。没等我的车驶上桥，一个长着胡子的工兵挡住了我的路。他的胸前闪耀着两枚勋章（一枚荣誉勋章和一枚卫国战争勋章）以及一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奖章。

近卫军战士双手捧着一个铝杯。

“将军同志，”他说：“桥架好了！请允许他向您祝贺胜利完工！这是我们的习惯呵！”

我只好下车，我同近卫军战士们用铝杯碰了杯。

“为开辟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道路的工兵们干杯！”

集团军司令部迁到了南布格河右岸。在那里有人向我报告说，敌人企图顽抗，但我们的部队处处都击溃了他们的防御。俘虏了约 300 名敌军官兵。从俘虏的供词中了解到，当面抵抗我们的是德国步兵第 9、第 17、第 358、第 294、第 302、第 306、第 325 师的被击溃的部队和罗马尼亚步兵第 16 和第 24 师的部队。

H·A·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也渡过了南布格河，进入了突破口，并穿过别列佐夫卡向拉兹杰利纳亚火车站发起进攻。

至 4 月 1 日，集团军部队接近了季利古利斯基河口湾。一部分部队从北边绕过河口湾，从行进间强渡过河。我们在那里运气挺好。刮起了北风。河口湾的水位下降了。

从季利古利斯基河口湾阵地溃败下来的敌人，一整天都在慢慢地向西南方向撤退。敌人企图用后卫部队来阻止我军推进，但未能得逞，这些后卫部队不仅被击溃，而且被全部消灭。

方面军司令员在催促我们。我们的部队紧张地全力以赴，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水域，向前挺进。

4 月 1 日，方面军命令近卫第 8 集团军于 4 月 2 日日终前出至多布良科、阿列斯塔罗一线。命令普利耶夫集群占领拉兹杰利纳亚火车站后，派人侦察蒂拉斯波尔、雅斯基以及通往敖德萨的铁路沿线。

我们不得不在原地停留下来，让先遣部队渡过眼前这个水域。我们应当调拢主力部队、炮兵、弹药，因为部署在有利阵地的敌人的后卫会用炮火

来对付在前面的兵团。

4月6日，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战胜了河流、河口湾及无数的小河湾和小溪之后，来到了敖德萨前面的最后一条河口湾，即在别尔卡、旧万达利诺夫卡地段的哈吉别伊斯基河口湾。

德军统帅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正是在这里能阻挡我们的部队渡河，并赢得一些时间来组织敖德萨的防御。河口湾最窄处约有800米，水深达2米。

敌人本来能在右岸组织防御。但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抢在敌人前面，从行进间强渡过河口湾。

敖德萨的大门被打开了。

H·A·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这时突然从右边拐了过来，从西北面威胁着敖德萨。

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已把集中在敖德萨地域的敌人的整个集团切割开。

在整个敖德萨战役中，乌克兰第3方面军各大兵团出色地组织了协同动作，几个集团军的行动很协调，步调一致。每个集团军都在自己的地段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次战役无疑已作为一次光辉的战例载入了史册。

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沿着黑海海岸向前挺进。不言而喻，如果没有我军的其它一些集团军，进行侧面行军，对敌构成包围态势，那么，他们的推进是不可能的。敌人害怕被合围，便撤退了。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紧追不放，不给敌人以立足喘息之机。

就这样，方面军各部队做好了攻打敖德萨的准备。艰苦的战斗已经过去了，不少的江河障碍已被克服，几个集团军的官兵也都立功受奖。现在鼓舞战士们的是：他们应当参加解放乌克兰的最后一个大城市的战斗，去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敖德萨就在眼前！”“向敖德萨进军！”的口号鼓舞着人们去创造奇迹。战士们在没腰深的泥泞中、在齐胸深的冰水里前进。德军首脑没预料到我军能在短期内克服如此棘手的天然障碍。

近卫第8集团军和A·A·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迂回行军，决定了这一城市的命运。守城的是罗马尼亚的部队，以及编成内有4个师的德军步兵第72军和党卫军的20多个独立营。他们在城市的北边和西北边占据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对这样的工事实施正面突击是不会奏效的，只能招致重大的伤亡，招致旷日持久的战斗和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的毁灭。

近卫第8集团军政治部向战士们发出了号召书。号召书说：“近卫军同志们！我们正在敖德萨挺进，要战胜敌人的疯狂反抗、通过泥泞的道路和克服各种困难……近卫军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使敖德萨回归苏维埃祖国。我们一定要象1941年保卫敖德萨的英勇的战士们那样，彻底履行自己的军人职责，一定要把敖德萨从法西斯恶魔手中解放出来！”

在这些日子里，敌人在某些地段发动了猛烈的反扑。从奥维季奥波尔到敖德萨的公路成了我军炮兵和敌人坦克搏斗的舞台。仅仅在塔塔尔卡地域由M·C·舍伊金中校指挥的第220团的近卫军军人就击退了敌人坦克的六次反冲击。在该团的防坦克炮兵连里，每一颗炮弹都是很宝贵的。火炮只是在敌人靠得很近时才开火。

炮班班长彼得·菲塔耶夫中士以惊人的沉着去消灭敌人的坦克。18 辆坦克向他冲击。

为了节约炮弹，菲塔耶夫让坦克进入直射射程 300 米。他第一发炮弹击毁了领头的坦克，于是堵住了其余坦克的路。他又打了三发炮弹，又有三辆坦克起火。每一发炮弹都命中目标。

敌人的坦克手惊愕万分，扔下自己的车辆企图逃命。该团冲进了塔塔尔卡。俘虏了一千多名德军官兵。

4 月 9 日早晨，从南面、北面和西面向敖德萨进攻的部队，已经看到了城郊、厂房、宫殿屋顶和居民住宅。从那里回来的侦察兵报告说，几乎所有最漂亮的楼房，其中包括歌剧院和港口的建筑物都埋有地雷。偷偷来找我们的敖德萨居民也这么说。准备撤退的希特勒恶魔想把敖德萨变为一片废墟。再过两天。炸药的魔力就会产生可怕的恶果。怎么办？无论如何要保住城市。

在各分队的党的会议上，作出了一个敖德萨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决定：炮兵不往城里打炮，飞行员不往城市住宅区扔炸弹！就这样，在半夜，在既没有炮火准备也没有航空火力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直接进攻城市和街道。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城市免遭破坏。各步兵分队和坦克从各个方向突然向敌人发起突击，攻击敌人的防御阵地。

4 月 9 日深夜，他们已经出现在敖德萨的大街上。到 4 月 10 日早晨前，近卫第 4 和第 28 军的部队同普利耶夫的坦克集群一起，逼近了杰里巴索夫斯卡娅大街，并前出至黑海岸边的小、中、大喷泉旁。近卫第 29 军经奥维季奥波尔向扎托卡实施突击。

光荣的斯大林格勒的狙击兵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扎伊采夫在夺取敖德萨的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他指挥近卫第 79 师的高射机枪连。扎伊采夫连的高射机枪班对付希特勒的飞机以掩护各先头分队。他们多次同敌人的步兵及装甲车进行战斗。在该城西南郊的接近地上，即黄麻厂地区，扎伊采夫带领自己的高射机枪连象步兵分队一样发起了冲击。他们同弗拉基米尔·布尔巴中尉的步兵连协同动作，一举占领了一个军用飞机场。突击是如此神速，以致敌人的航空大队的歼击机都没有来得及起飞。18 架完好无损的“梅塞尔施米特”歼击机成了高射机枪手的战利品。

苏维埃的爱国者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也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宫殿、剧院及城市住宅遭受破坏。C·A·德罗兹多夫大队的各游击小组，为了把敌人从正在进攻的红军部队那里引开，同希特勒分子展开了公开的战斗。仅在 4 月 9 日，德罗兹多夫的队伍就消灭了敌官员 120 名，俘虏了 75 人。成千上万的敖德萨人上街欢迎红军部队，并同红军一起肃清街上的敌人、扑灭大火、排除地雷和应用水雷。只是港口的建筑物未能幸免，全被敌人炸掉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敖德萨驻有一个斯洛伐克团。该团的士兵同当地游击队有联系。当我们的部队攻城时，斯洛伐克人告诉我们，法西斯在那些地方埋有地雷，这样我们才预先防止了一座著名的歌剧院发生爆炸。

就这样，敖德萨终于未遭受破坏。敌人被打败了，并被赶过了德涅斯特河。1944 年 4 月 10 日，在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324 门大炮鸣礼炮 24 响，以庆祝这一胜利。

敖德萨战役的顺利完成，决定了下一步解放克里木的一系列战斗行动的进程。希特勒军队失去敖德萨以后，实际上已陷入包围。红军在南方通过

各种努力造成的战役和战略态势，使敌人失去了在苏联黑海沿岸的所有支撑点。不久，乌克兰第4方面军和滨海集团军也发动进攻，消灭了在克里木的法西斯主力，把敌人的溃不成军的残部赶出了克里木半岛，并占领了黑海的主要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4月11日和12日，方面军司令员要求近卫第8集团军和A·A·普利耶夫集群彻底消灭德涅斯特河河口湾及其左岸的法西斯部队，并于4月14日日终前攻占石桥、图尔拉基、布里托夫卡、夏巴、特尔格、雷巴奇库列尼一带的德涅斯特河河口湾右岸的登陆场。

横在近卫第8集团军和普利耶夫集群面前的是宽度为5—10公里的河口湾。要在守敌的火力下顺利渡过这一水域，需要大量的工兵部队，并配备各种各样的渡河器材，需要航空兵和重炮兵的支援。而航空兵无法行动，因为机场无法使用。火炮又缺乏弹药。

4月14日，集团军部队在别里亚耶夫卡、马亚基地域强行渡过了德涅斯特河，然后，又投入了为扩大德涅斯特河右岸登陆场的战斗，他们逼近帕兰卡镇东郊，在那里遇到了罗马尼亚步兵第15师在预有准备的防御地区的抵抗。

战斗打得很艰苦。我军停止了前进。当时应该组织对其正面实施突破，但由于天气不好，影响了我们的计划。从4月16日起刮起了南风。德涅斯特河河口湾的水开始上涨。风刮个不停。在察里格勒河流里，水位上涨，近卫步兵第79师无法渡河。

后来，河水开始涨到我们占领的别里亚耶夫卡和马亚基以西的登陆场。4月18日，德涅斯特河在一些地方漫出了堤岸。4月20日，河水淹没了已作好进攻准备的近卫第35师部队的掩体。

集团军司令部每天都收到各个部队关于河水不断上涨的报告。

4月24日深夜，在计划好的进攻快要开始之前，风刮得更厉害了。河水淹没了炮兵阵地。

4月25日，我们仍然试图执行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转入进攻。但怎么能行！我们的炮兵几乎沉默不语，步兵在没膝的深水中无法跃进。河水还是不断地上涨、上涨，把一些小岛也淹没了。战士们聚集在小块的场地上，有的爬在树上，象白嘴鸦那样紧贴在那里。

我的观察所设在帕兰卡偏东南面的一个高地上。河水也涨到了这块高地上。开始只是脚下有噗哧噗哧的声音，后来东西都漂起来了。

我打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这里的情况。马利诺夫斯基起初不相信河水涨得这么厉害。在电话里当然是很难使人确信河岸上发生的情况的。我断然声明，如果河水还不断上涨的话，那么，最多一昼夜以后，我们将失去炮兵，而全体人员只能呆在树上的白嘴鸦窝里。

我们很幸运，方面军的浮桥架设营来到了马亚基。在该营的帮助下，我们把登陆场的人员撤了出来。4月27日，在未经战斗，就放弃了几乎整个登陆场。

到了左岸，我们开始整顿部队。需要对新补充进来的人员进行军事训练。

但还是没有得到休息。4月28日，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了新的命令，要求把集团军部队转移到科托夫斯基地域。命令部队在深夜转移，不要让敌人发现。这次转移加强了处于乌克兰第2方面军接合部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右

翼。

4月30日深夜，部队从马亚基地区向格利戈里奥波里亚和布加乔内地区挺进。

我们在前线以巨大的胜利来迎接五一劳动节。敖德萨已经在后面，前面是德涅斯特，眼前就要进行解放摩尔达维亚的战斗。

突然，大自然的灾难又落到我们头上。刮起了暴风雪。集团军司令部所在镇的屋顶都被刮走了，大风把树连根拔起。带着雪花的冰冷冰冷的空气涌进学校的教室。气温骤然降到零度以下。

深夜……我们的部队在田野里行进。而整个集团军已换了夏装……近卫第39师在雅斯基、坎杰利、新萨维茨卡亚几个镇之间的交界处遇到了暴风雪。周围漆黑一片。既没有灌木林，也没有沟坎；既没有地方可避风，也没有地方可躲雪；也无法生篝火。谁能料到5月1日的南方，在距离4月末人们就经常来沐浴和晒太阳的疗养区不远的地方，会突然刮起暴风雪，会突然降温呢！

我们这次进军就是这样不走运：冬天碰上解冻的天气，使我们吃尽苦头，由于解冻，道路泥泞不堪，根本无路可走；而春天，又突然来了寒流。

近卫第8集团军行军120公里后，于5月3日前前出至德涅斯特河岸边，并立即接到任务，要在5月7日前在普加乔内、舍尔佩内地域的德涅斯特河右岸的登陆场接替A·C·扎多夫将军的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队，并在那里集结力量，准备进攻。

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队占领的登陆场正面宽12公里，纵深为5—8公里。整个阵地完全处在敌人的大炮的射程下。这一带的制高点还在敌人手中。登陆场稍右、德涅斯特河沿岸一带是一片森林和小丛林。敌人在那里能隐蔽地集结部队，那里还有敌人的重炮连。

我脑子里油然而产生了这样一个决心：要把登陆场扩大到巴拉巴涅什塔、奇米舍纳和斯佩伊地区，牢牢地巩固德涅斯特河两个侧翼，不让敌人的炮火影响我们渡河。但是，我们刚到登陆场，就知道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9个师中还有3个师未赶到。弹药也没运来。

缺少加强兵器。在该登陆场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既没有防坦克地雷，也没有防步兵地雷。

5月6日，方面军司令员P·B·马利诺夫斯基在马拉耶什塔镇召开了各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他给我们分析了战役形势：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的德军已被击溃。其残部退过德涅斯特河。这就为进攻基希尼奥夫、解放别萨拉比亚、突击布加勒斯特和普洛耶什蒂创造了先决条件。我们面临的任務就是集结力量。会后，我们各自返回部队，以便同各兵团司令部一起考虑一下，准备大规模的进攻需要做些什么。

但是，5月8日早晨，又传来了另一项命令：命令方面军各部队转入纵深梯次配置的顽强的防御，至少准备三个全纵深为30—40公里的防御地区。

这个命令本身标志着我们在南方的整个战役意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原来，5月6日的会议之后，来了大本营的训令。训令说明取消方面军司令员刚给我们下达的关于进攻的决定的原因。

大本营命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沿着方面军所占领的整个战线构筑一个防御地区，并将该地区一直延伸到黑海。

无疑，在训令中并没有排除进攻的可能性，并初步定在5月25日实施

进攻。

我要在此抢先说明一下，后来，5月26日大本营又下达命令，将进攻改期，这次在命令中没有规定进攻的期限。

既然上述指示和5月6日统帅部定下的方针，都要求准备进攻，那么，为此已调到登陆场的主要的加强兵器——突破炮兵第9师和其他的炮兵团，应当在那里构筑进攻的出发阵地。当然，这同后来的任务、即转为防御是不相适应的。

最好是把炮兵主力从登陆场调到德涅斯特河左岸，从那里能最有效地用火支援登陆场的防御部队。应该象在斯大林格勒时那样去做。在那里，我们将炮兵放在伏尔加河左岸，而在右岸进行防御。但在这里做不到这点，因为唯一的渡口得不到保证。

如果有时间又有通过德涅斯特河的渡口，能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炮兵、集团军的炮兵及军的炮兵都调到左岸，并把它们布置在如下地域：一个炮兵群配置在红丘炮台，另一个炮兵群配置在斯佩伊以东的树林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用侧翼炮火轰击整个登陆场的前沿，不用通过唯一的渡口将弹药前送，也不会使登陆场内的部队过于稠密。

这个登陆场（下面我们将称其为普加乔内）是敌人的眼中钉。从那里到摩尔达维亚首都基什尼奥夫只有30公里左右。而占领了基什尼奥夫就打开了进攻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巴尔干的大门。希特勒的统帅部很清楚这一点，他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来消除日益迫近的威胁并转入积极行动，以完成最紧迫的任务：把苏军从德涅斯特河右岸击退到左岸。

我们应该预料到德国人必然会采取某些积极行动。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极为关心在德涅斯特河左岸建立防御地区。

5月8日以前，敌人集中兵力准备进攻普加乔内登陆场。

当时防守普加乔内的是近卫第8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敌人集中了4个步兵师和总共拥有大约250辆坦克的3个坦克师。

我们防守登陆场的几个师此时还没来得及补充有生力量及技术装备。在登陆场内总共只有10辆坦克，其中一半还是战利品。

很明显，敌人密切地注视我们在登陆场的一切调动。这个地域的制高点都掌握在敌人手中，侦察机也出现了。

5月10日凌晨2时50分，敌人开始对近卫兵第4和第28军的前沿阵地和防御纵深实施炮火准备。

经过40分钟的密集的炮击之后，敌人的步兵和坦克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开始发起进攻。

敌人的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是突然的。但最初的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

随着天色放亮，敌人重新组织炮兵和航空兵的火力准备，随后又在天上40架轰炸机的掩护下，把40—50辆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投入战斗，我近卫第28军的右翼被迫后撤到普加乔内镇中心。我们很清楚，敌人竭力想穿过普加乔内沿德涅斯特河岸逼近我们的渡口，进而截断它同两个军的部队的联络。

近卫第28军军长斯捷潘·伊里奇·莫罗佐夫中将，此时正在普加乔内的南郊，马上把预备队调了上来，将高射炮直接瞄准敌人的坦克射击，暂时阻止了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沿河向我舟桥渡口的进攻。

在这次保卫普加乔内的战斗中，著名的斯大林格勒狙击手瓦西里·扎

伊采夫双脚负了伤。我曾谈到过他已经当上大尉，指挥一个高射炮连。

在第 28 军的中部、即近卫第 39 师的地段上，敌人约 60 辆坦克，在步兵的掩护下，突入我军阵地，并踏上了普加乔内——舍尔佩内公路。由于敌人直接由西向东扑向渡口，集团军有被分割成两半的危险。此外，我集团军各军各师都开始发出弹药不足的信号。

在我军的舟桥渡口上，有几个被打坏的装有燃料的蓄油罐着火了，仓库里的炮弹也发生了爆炸。一天的战斗中，敌人就出动飞机 877 架次。

近卫第 4 军的部队于 5 月 10 日整整一天连续击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使敌人遭受很大的损失。

5 月 10 日深夜，我们又通过了一个决定：把驻扎在德涅斯特河左岸格里戈里奥波里亚地域的近卫第 29 军的所有炮兵火力，全部瞄准近卫第 28 军当面的普加乔内、杰拉克乌及其以南地段，对敌的侧翼和后方开火。这个军的炮兵的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希特勒分子不得不放弃沿德涅斯特河由北向南对我登陆渡口发展突击的打算。我火箭炮旅用直径 203 毫米的大炮直接向已突入普加乔内——舍尔佩内公路上的敌坦克和步兵开火。这次突击的战果是：敌人几十辆坦克被击毁、被打中起火；其步兵或被消灭或被击退。

为了加强近卫第 28 军和第 4 军的接合部的防御，傍晚调来了近卫第 57 师，它的任务是深夜渡河到德涅斯特河右岸，在这两个军的接合部，以后梯队占领防御。

在 5 月 10 日一天的战斗中，打死了 4 千多名德国官兵，击毁和烧毁 60 多辆坦克，在空战中，高射炮击落了敌人 15 架飞机。

方面军首长此时正在拉兹杰利纳亚火车站附近。深夜 3 点钟左右，大炮的轰击声惊醒了马利诺夫斯基。他命令方面军的航空兵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反击正在向登陆场进攻的敌人。

早晨，空军集团军司令员苏杰茨来到我设在布扞尔镇和塔什雷克镇之间的山岗上的观察所，随后而来的还有方面军炮兵司令员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将军。我同意前者用飞机轰炸敌人的坦克纵队和步兵纵队的计划，我请求后者给我们运送更多的炮弹。

5 月 10 日深夜，敌人的步兵和坦克都没有主动进攻。但步机枪火力一直对着我们的防御前沿猛烈射击，并对德涅斯特河的各个渡口及经由塔什雷克和布托尔镇通往各渡口的道路进行急袭射击。到次日早晨 6 点钟，我军的一些部队转入局部的反冲击，但遇到了敌人用各种武器组成的猛烈火力的拦阻，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返回到出发位置，并打退了敌人优势兵力的不断进攻。

6 时 30 分，敌人的大量步兵在 150 多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轰炸机的掩护下，从斯佩伊西北面的树林向近卫第 4 军两个师防守的舍尔佩内发起进攻。异常艰苦的战斗开始了。尽管我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敌人的坦克还是在 5 月 11 日 11 时前攻进了舍尔佩内镇。这样，近卫第 35 师和第 47 师的部队就面临着脱离集团军主力和脱离布托尔镇地域的渡口的威胁。这两个师的防御正面从舍尔佩内开始，沿着公路向西延伸，直到斯佩伊为止。

下午，敌人企图从舍尔佩内向北全力展开进攻，目的是逼近集团军的主要渡口。投入战斗的近卫第 57 师的部队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根据俘虏的供词和在近卫第 4 和第 28 军地段被打死的敌军身上搜出的文件证实，当面进攻的敌人兵力是：

步兵第 17、第 294 和第 320 师以及坦克第 3、第 13 和第 14 师。5 月 11 日这一天的战斗，敌人出动了飞机达 1200 架次。

敌人的航空兵在这些日子里动用了集束炸弹。在炸弹箱内装入许多约一公斤到一公斤半的小炸弹。这些炸弹箱由“福克 R 武利夫”式战斗机投掷下来，在空中的爆炸，小炸弹纷纷飞向地面，大面积地杀伤有生力量。但是，只要头上有 10—15 厘米厚度的轻型掩蔽工事，这些炸弹就无法伤害你了。我们的战士很快就摸清了希特勒分子这一“新式武器”的脾性，称它为“蛤蟆”，并且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躲避它了。为了回击它，我们的空军也采用了类似的、但经过改进的集束炸弹。这种炸弹在杀伤有生力量和对付坦克方面效果非常好。

在 5 月 11 日一天的战斗中，敌人遭到重大损失——至少被打死打伤 5000 人，被击毁和烧毁坦克近 50 辆。

5 月 11 日，P·B·马利诺夫斯基来到布托尔地域。他用望远镜观察了战场，看到上百辆被击毁和烧毁的敌人坦克后，他知道，敌人在该正面地段曾进行了猛烈的进攻，而要恢复原有局面，需要兵力、时间、主要是弹药。派步兵去进行反冲击打坦克，那是不能容忍的。

5 月 12 日，敌人从早晨 3 时起就开始积极行动。一次接一次地向我们发动进攻。在我们炮火的轰击下，正面许多地段的敌坦克纷纷着火燃烧起来。5 月 12 日，近卫第 29 军被近卫第 5 集团军的部队换防之后，转用火攻对付进攻的敌人，加强了我位于敌人主要突击方向地段上的集团军。同时，我们用了两夜的时间冒着炮火把炮兵主力从登陆场调回（炮兵主力原先是由方面军调到这里准备进攻基希尼奥夫的）并把它们配置在德涅斯特河左岸。这就加强了我们对付正在进攻的法西斯部队的火力。

在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敌人虽然拥有优势的兵力，但是没能把我们的部队从登陆场击退。他们损失了 100 多辆坦克，死伤一万多人，损失了其他许多技术装备。而他们得到的只是迫使我们的部队后退，使登陆场缩小了 2—4 公里。

5 月 15 日，方面军司令员命令：“近卫第 8 集团军停止扩大登陆场的战斗，转入固守已占领的地区……”

从 5 月 16 日至 22 日期间，敌人投入了预备队，多次对我们部队发起进攻。但每次进攻都是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被击退。

敌人最后的一次进攻是在 5 月 23 日清晨，是由步兵第 17 师和坦克第 3 师的部队实施的。这次进攻从 4 时 30 分开始，一直持续到 8 时，敌人发起 4 次冲击，每次都被我步枪火力和炮火打得动弹不得。许多坦克被我们的火炮和防坦克榴弹击毁和烧毁。很明显，敌人已竭尽它最后的力量，它已经一蹶不振，以至被迫停止进攻近两个星期。

我军在登陆场的防御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于把希特勒分子拖垮，并于 5 月底前肃清了舍尔佩内镇和普加乔内镇的敌人。

1944 年 6 月 5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被调为乌克兰第 3 方面军的预备队，随后根据大本营的决定，被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开始进行换防准备。

近卫第 8 集团军参加解放乌克兰南部地区的战斗就此结束了。

新的任务

1

1944 年的夏天来到了。6 月初，我已获悉近卫第 8 集团军将要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并将调往我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

这是崇高的荣誉。但在集团军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们无权扩散这一决定。整个集团军的换防，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

集团军司令部的任务很艰巨：要选定道路；确定行军路线和部队集中的地域；还要分配运输工具。

我们的司令部此时正进行人事调整和变动。维塔利·安德列耶维奇·别利亚夫斯基被任命去接替原参谋长 B·B·弗拉基米罗夫将军的职务。在此之前，他在集团军司令部任作战部长。他当时是我们集团军最年轻的将军，还不满 40 岁。大家都开他的玩笑，称他为“少壮派将军”。他精力充沛，工作勤奋、细致，干什么事都迅速、准确、有条不紊。

6 月 10 日，别利亚夫斯基被召到莫斯科去，他随身携带着有关集团军情况的完整材料。就在他刚走的那天，我们接到了转移的命令，要我集团军沿铁路线从苏德战场的南翼向中部调防。此时我们正在将军队调动的计划付诸实施。

预定 6 月 12 日早晨 6 时开始运送部队。为了进行换防，成立了一个以我的副手 M·F·杜哈诺夫维中将为首的特别作战组。

在确信军用列车正按计划装载和出发后，我、军事委员会委员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宁少将和炮兵司令员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中将受命驱车前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我们定于 6 月 14 日出发。我把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叫来，命令他检修汽车，做好远距离行驶的准备，并带足一千公里路程的汽油。

“一千公里？”卡利穆林又问了一句。

我从他的话音里听出有疑问。

“一千公里！”我肯定地对他说。

卡利穆林摇着头说：

“我当然要执行命令……只有这样做是白费劲，司令员同志！我们可以在路上加油……在别尔季切夫、文尼察，还能在日托米尔。”

这时，我感到很惊慌。秘密中的秘密，最神圣的消息，就这样简单地由我的司机脱口说了出来。他构画出了集团军向新目的地前进的整条线路。

“不要瞎猜自己的行军路线！”我对他说：“执行命令……”

卡尤姆会心地微笑了一下，说：

“请指示我往哪儿开罢，司令员同志……不过，我们已知道汽车该往哪儿开！”以前，我也常常听到战士的“小广播”，但是情报与情报不同。此时我真的不安起来。

如果我们沿铁路换防的情报落到敌人手中，就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小广播”传播的范围有多大，这次能不能在集团军范围内保持秘密呢？这使我和集团军特别处处长很焦虑，但是我们的焦虑是多余的。“小广播”没有落到敌人的手中。士兵如果对他的交谈者不信任，他是会注意谈话的分寸

的。正如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敌人对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换防一无所知……

在近卫第 8 集团军接到换防、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命令时，苏德战场的局势如何呢？

战线的总长度缩短了。我方现在能够在进攻时高度集中兵力，但守敌却加大了防御纵深，在防线上配置了足够的火器和兵力。

因此，每次发动新的进攻都要求我们非常灵活、迅速和突然地在某个地段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进攻，使敌人来不及进行回击。

祖国倾其所有供应前线。包括人员和技术装备。工业开足马力生产。在已解放的土地上，工业企业也开始投入生产。去年的战斗结出了果实。顿涅茨的煤矿、克里沃罗格的矿石、尼科波尔的锰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也都已开始生产。

在 1944 年夏秋战役开始前，整个战线长 4,450 公里。它仍然从巴伦支海延伸到黑海。

在这条战线上，依次布署了拥有好几百万人的各集团军，他们掌握着过去作战时从未有过的技术装备。

参战的红军共计有六百六十万。红军的火力已具有极其强大的威力，有九万八千一百门火炮和迫击炮。红军拥有七千一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空军约有一万二千九百架战斗机。

尽管法西斯侵略者暂时还占领我大片领土，尽管全欧洲的工业实际上都在为希特勒工作，尽管我们遭受了各种损失，并在战争条件下转移了工业基地，但我们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是铸造了夺取胜利的武器，并使我军在技术装备方面超过了德国法西斯联盟的军队。这是苏联人民最重大的胜利。

1944 年夏季来临之前，希特勒同盟只能拼凑出一支四百三十万人的军队来对付我们六百六十万士兵，他们的许多兵团在苏德战场的战斗中被击溃。欧洲的一切都被动员起来了。

由于动员了所有工业资源，希特勒统帅部才得以在苏德战场上集中五万九千门火炮和迫击炮、七千八百辆坦克和强击炮、三千二百架战斗机。

很明显，希特勒军队靠这些力量已经不能发动任何重大的进攻了。历史已无情地将希特勒军队换到了守军的位置。但仅凭这么一点兵力，又怎能继续进行象样的防御呢？

应当从纯职业方面来谈谈德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情况。在进攻方面，我对他们的观察时间很短，这还是在斯大林格勒，而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有其特殊性。在防御方面，可以说他们是有特长的。这是一伙凶恶的敌人，他们顽强善战。尽管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威信在德军中已一落千丈，但他们仍然忠于誓言，并且认为，现在他们的国家遭受到致命的威胁。我不认为 1944 年在德军中还有人真的相信希特勒是什么天才以及他所许诺的什么奇迹。但德国士兵知道他们在我们国土上犯下的罪行，他们害怕报复，因此全力以赴地作战，并施展他们的能耐。防御有它自己的特点。在防御中，只要善于组织，就能以少胜多。因此，在军事上我们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优势。

最高统帅的五一命令，对 1944 年夏秋战役的总目标阐述得很全面。命令中说：

“……肃清我国全部国土上的法西斯侵略者，恢复苏联从黑海到巴伦支

海的全部国界……把我们的波兰兄弟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以及其他与我们联盟的处于希特勒德国铁蹄下的西欧各国人民，从德国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见《斯大林军事文集》第 343，344 页。——译注。

为了具体落实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转为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制定了进攻战役计划。

今年夏秋战役的首要任务是：歼灭法西斯在“白俄罗斯阳台”的重兵集团、“中央”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

6 月 10 日，我军以列宁格勒前线的进攻，拉开了 1944 年夏季大规模交战的序幕。6 月 21 日，我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南卡累利阿转入进攻。6 月 23 日，解放白俄罗斯的战斗开始了。每小时都有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入战斗。尽管敌人紧缩了防线，但防线还是到处被我突破。

由 A·X·巴格拉米扬将军指挥的波罗的海第 1 方面军

最先开始行动。接着，A·C·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的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部队和 I·E·扎哈罗夫将军的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部队也开始进攻。由 H·E·帕皮温将军、T·T·赫留金将军和 H·A·韦尔希宁将军指挥的三个空军集团军支援陆军的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6 月 24 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在 H·H·罗科索夫斯

基的指挥下也转入进攻。他于 6 月 29 日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

在维切布斯克、奥尔沙、博布鲁伊斯克附近以及在别列济纳河各渡口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 4 个方面军在进攻，有几个空军集团军支援。仅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以及别列济纳河一个渡口的交战中，空军第 16 集团军司令员 C·L·鲁登科就出动了 400 架轰炸机，并由 126 架歼击机作掩护。坚决彻底战胜希特勒德国的曙光已经出现了。……

一切都变了！……在苏德战场中部，我军已打开了一个宽达 400 公里的突破口。

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以便加强 6 月 20 日开始的突击的这段时间，苏德战场的形势大体上就是这样。

2

800 公里的路程，我们乘汽车走了将近两天两夜。6 月 15 日，我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A·M·普罗宁、炮兵司令员 H·M·波扎尔斯基到达座落在科罗斯圣市以西森林里的方面军司令部。

当时，方面军司令员是 H·H·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参谋长是 M·C·马利宁将军。

我们在司令部里没有碰到罗科索夫斯基，他到普利皮亚特河以北的方面军右翼的部队去了。接待我们的是 M·C·马利宁将军。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老成持重。他为我们规定了最近的任务，并建议我们别等司令员了，马上到集团军集结地域去。

他警告说：“林子很僻静，有的地方藏着敌人！当然，匪徒是不会对集团军造成危险的……但对路经这片森林的高级指挥官来说，他们是危险的！要小心点！”马利宁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集团军将要集结的那片森林。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拉法鲁夫卡火车站，集团军司令部应该设在这个车

站附近。不久，运载集团军司令部的第1辆军用列车就到达了。卸完东西以后，立刻在森林里设置好司令部，并着手工作。

我们立即对集团军集结的地域进行了空中侦察。重要的是要立即将部队带出车站，并让他们可靠地隐藏起来。

拉法鲁夫卡、哈雷、安东努夫卡、图托维奇、萨尔内各车站上的军用列车都卸完了。各兵团和各部队的指挥员都接到了指示：部队和技术装备只能在深夜行动，同时要严格采取伪装措施。我们要求司令部和后勤主任应该精确地安排好调度工作。在交叉路口设置了以集团军司令部一些军官为首的检查岗，他们的任务是原地监视执行夜间行军纪律的情况。各部队先后在森林里安顿好，并仔细进行了伪装。严令禁止在河湖的开阔地洗澡和洗衣服。认真掩盖整个行军路线上和集结地域里的坦克履带的痕迹。没有得到专门的命令，禁止用任何无线电联系。全部无线电台封闭。用有线电话谈话要用密语。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对集团军的全体人员是否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完成新的任务，负有极大的责任。

政治工作人员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人、是士兵、是士兵对新的战斗所作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我们集团军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换防时，正赶上欧洲开辟第二战场。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应当说，这一事件并没有给前线的战士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最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了。这一点每个人都明白。我记得，1942年秋天，当法西斯军队攻进了高加索的时候；当保卢斯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卷入巷战的时候；当我们的战士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经过50公里行军，就直接向希特勒分子的工事冲击的时候；战士们就盼望开辟第二战场。

1943年艰难的夏天，当库尔斯克会战正展开，希特勒将一个又一个师的军队投入战场的时候，战士们就盼望开辟第二战场。

无须争论，晚开辟总比不开辟好。毫无疑问，英美登陆部队在法国一登陆，希特勒德国的处境就大大复杂化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我们盟友中间，还有敌视我们的力量在活动。西方列强统治集团的某些代表和希特勒分子之间，还在玩弄一场不小的秘密外交把戏。

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即使现在没有第二战场，我们也能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并胜利地结束战争。但是，我们没有一古脑儿地将不同的事件搞乱和混淆起来。一方面是各国统治集团问题，另一方面是士兵的事……前线士兵关切地、赞许地注视着诺曼底沿岸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的战斗。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的进攻越有效，我们盟军就会越轻松。

政治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训练我集团军的补充人员。他们安排这些年轻人同获得荣誉的军人、同著名的狙击手、炮手、机枪手及坦克手见面。年轻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听老战士们讲述战斗和立功的情景、讲述斯大林格勒会战和乌克兰战斗的情况以及讲述敌人的狡猾和恶习、敌人的策略及其策略的优缺点，并学习在战斗中产生又经过战斗检验的作战方法。

所有的军官、所有富有战斗经验的人——从士兵到将军，都参加了群众性的政治工作。

部队在训练中特别重视培养善于在森林地带作战的本领和善于在这种条件下进行侦察的本领，培养善于排除堵塞在公路、小路上的树杆等障碍物、陷井以及埋在最料想不到的地方的地雷这样一些本领。当时，德军统帅部正

开始极广泛地使用地雷。

地雷，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一种防御武器。希特勒分子早就使用地雷了。但是，现在法西斯工兵看到失败已不可避免，他们埋设地雷就不仅是为了阻止苏军的进攻。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有生力量，他们有更长远的打算……，也就是他们想使和平的居民在战后遭殃……。

当时已经很清楚，希特勒分子已从战线其他地段抽了 20 多个师调往白俄罗斯。尽管这样，红军还是在全歼德军明斯克集团之后，成功地展开了进攻，并前出到维尔纽斯、格罗德诺、沃尔科维斯克地区。确实，我军如此迅速深入的推进，使交通线大大延长，供应工作变得很复杂，部队也很疲惫，需要喘息休整一下。但是方面军首长在右翼暂时停止进攻的同时，又做了在左翼发起进攻的准备。为了这个目的，在卢布林方向、在波列西耶以南，由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强大的快速兵团组成一个突击集团。参加突击集团的有近卫第 8 集团军、第 47 和第 69 集团军。波兰第 1 集团军为第 2 梯队。在科韦尔地域还集结了坦克第 2 集团军、坦克第 11 军、近卫骑兵第 2 和第 7 军。空军第 6 集团军从空中掩护突击集团的行动。

突击集团的任务是突破科韦尔以西的敌人的防御。突破成功后，诸兵种合成集团必须保证两个坦克兵团进入交战，并同他们协同动作，以开展对谢德利策和卢布林的进攻，尔后进到维斯拉河。

突击集团的对手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坦克第 4 集团军。该集团军是由步兵第 8、第 42 军和坦克第 56 军组成的。7 月初，法西斯分子在我方没有实施任何攻击的情况下，放弃了楔入我防御纵深的科韦尔凸出部。这样，他们就压缩了自己的战线。

敌人构筑了三条防御地带。第一条防御地带纵深为 6 公里，均为标准堑壕，并有交通壕相连接。敌人在自己的前沿阵地设置了地雷场和 2—3 列桩铁丝网。在敌人的阵地上还有一些高地，其中一些高地能俯瞰到我方相当深远的阵地。各高地都建立了环形防御，并形成用火网互相连接的支撑点。

我们计划中的突破地段两侧的居民点马采尤夫和托尔戈维谢，也被敌人改变成了强大的支撑点。支撑点的侧射火力覆盖着通往敌人前沿阵地的接近地。

希特勒分子沿着普雷斯卡河右岸建立了第二条防御地带。这条地带距离第一长防御地带前沿 12 公里。他们在这里挖了一条堑壕、有的地方两条堑壕。但我们的主要障碍是那条河，河不宽，但却横亘着无法行走的河滩淤地。

第三条防御地带，即集团军防御地带，它沿西布格河右岸修筑，距离第 2 条防御地带 35 公里。它由几个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内有堑壕）组成。各土木质发射点都保持了火力联系，许多支撑点的前方和两侧都有障碍物作掩护。

这样一来，敌人修筑的防御工程总纵深达 50 公里。此外，敌人还急速地沿维斯拉河修建了一个防御地区。但是，法西斯分子不可能在所有这些地区内驻扎军队，更不可能在离前沿阵地 200 多公里的维斯拉地区驻扎军队。敌军只能占据主要防御地带以及第二道防御地带的一部分。集团军防御地带则空着，计划由后撤的军队或赶来支援的预备队前往占领。

近卫第 8 集团军面临的任务是强渡西布格河。这条河曲曲弯弯，河宽达 80 米，水深 2 至 4 米。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困难。甚至像普雷斯卡这样

不起眼的小河也给我们造成许多麻烦，因为河的两岸尽是沼泽地。公路很少，况且多数是土路，一路上都是被破坏的桥梁、很久没有重铺的泽间小径和土埂。

集团军部队驻扎在离前沿阵地 120 公里处，等待进攻的命令。他们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和补充部队。

方面军司令员的作战训令终于下达了。训令规定近卫第 8 集团军突破帕里杜巴、托尔戈维谢地段敌人的防御，并在歼灭敌人防守部队后，于战役开始第一天的日终前，占领波恰佩、赫沃斯托夫和南赫沃斯托夫地区。

一俟进抵戈罗德诺和马舍夫（预定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后，C·A·波格丹诺夫坦克兵上将指挥的坦克第 2 集团军即投入战斗。

空军第 6 集团军担任空中掩护，保证进攻的顺利实施。第 47 集团军在我们的右边发起进攻。它应在 5 公里的地段上突破敌人的防御。第 69 集团军在 4 公里地段的左边实施突破。

近卫第 8 集团军位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右翼战役配置的中心，负责保证方面军的快速集群（坦克第 2 集团军）进入突破口。

给我们作进攻的准备时间是 8 个昼夜。

我们同各兵种首长、各军军长和各师长一起，勘察了突破地段的地形。

许多事情在定下决心之前，都要经过反复考虑、斟酌和查对。我们是靠步调一致的集体的努力才定下决心的。

敌人在策略上会采取什么新的花招来对付我们呢？当时，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正在吵吵嚷嚷地赞颂所谓“弹性防御”。在这种防御中，希特勒统帅部利用自己军队的高度机动性和灵活性。

这种防御是以突然改变其行动为原则。先有计划地撤退，然后以快速预备队或从战线的其他地段迅速调来的部队作为加强力量，突然发起反突击。我们在德涅斯特登陆场已经领教过这一招。在德涅斯特，无论是集团军司令部还是方面军司令部，都没有预料到遭受失败、溃不成军的希特勒军队竟能组织起如此有力的反突击。争夺德涅斯特登陆场普加乔内、舍尔佩内的战斗，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

在这里，希特勒分子可能在感到我们进攻的威胁之后，又会急忙撤到下一个地域，以期保存实力。森林和沼泽会有利于他们悄悄地进行机动、组织防御，给我进攻部队以突如其来的打击。

不，决不允许敌人以狡猾的撤退和奸诈的反突击来哄骗我们。应当以最小的代价来破坏其“弹性防御”。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要知道，敌人现在若无其事地让我们集中部队，而一旦我们的进攻前的炮兵准备开始，他们就会悄悄地撤退。让我们白白地消耗几列车弹药，得到的是遗弃的战壕，而我们的步兵只要再往前推进，敌人就会从新的地域向它发起蓄谋已久的打击。结果，我们还得一切从头开始：耗费时间，耗费几十万发炮弹进行新的炮兵准备，将部队从一种队形变为另一种队形等等。

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应当寻找这样一种战役战术手段，这种手段能给敌人以突然的、强有力的打击，而打击又是如此令人震惊，如此具有毁灭性，使得敌人一下子就土崩瓦解，来不及将兵力调往新的地域。

为了更准确地弄清敌人的部署和实力，我们进行战斗侦察。但有时战斗侦察会给我们带来损失。敌人猜测，战斗侦察后过一天，至多过两天就会

发起坚决的进攻。在这段时间里，它完全来得及改变自己的战斗队形，将预备队调往受到威胁的方向，或从第一批堑壕撤出，躲避我军的打击。

经过紧张的思考及分析收集来的有关敌人情况之后，我们有了解决办法。这一办法靠的是过去的经验。在南方，在乌克兰的一些战斗中，我们采用了侦察发展为进攻的办法。这一手段的实质就是：我们不是在进攻前一天或前两天、而是在进攻的前 2、3 小时内开始战斗侦察，这样希特勒分子就来不及改变自己的战斗队形。

这种侦察，不是在一个地段进行，而是在即将进攻的整个正面地段进行，是实施短暂而猛烈的炮兵准备。步兵分队的散兵线（每团派出两、三个连组成）连同坦克在大炮、迫击炮的掩护下，向敌人前沿阵地发起冲锋，假如敌人占据着主要阵地，那么，侦察梯队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就在敌方防御的前沿阵地前停止前进。但是，在战斗过程中，我军炮兵将摸清敌人的火力网，以便在大约两小时后，就可以有把握地进行炮火准备，消灭已被我们弄清的目标。

假如敌人有意欺骗我们，布置在第一阵地的只是掩护分队，而其主力则已调往防御纵深，那么，我军的侦察梯队就夺取第一批堑壕，然后继续推进，直接逼近敌人的基本阵地。

无论那种方案，我们的弹药将消耗在真正的目标上，而步兵部队和坦克在运动中，也不会遇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一切侦察和观察器材均随侦察梯队行动，或紧随他们之后前进，准确地测定敌人步兵、炮兵连、迫击炮连的配置以及预备队集中的地点。各级指挥员都携带通信工具，一边观察，一边随侦察梯队前进，准备在必要时迅速组织炮火准备和向敌人的基本阵地发起冲击。进攻部队的主力根据指挥员的信号向前推进，并在各自的方向上展开战斗队形，向敌人进攻。形象地说，集团军主力部队这只举起的拳头，跟在进行战斗侦察的分队后面前进，它能在任何时候砸向敌人的脑袋。

采用这种战术要求从两个方面不断增强突击的威力：一是不断从纵深调集新锐兵力；二是不断扩展进攻地带。它要求配置一个特殊的战斗队形，这一队形既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跟随侦察梯队前进，又与侦察梯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集团军首长的领导下，各军军长和各师师长搞了野外演习和沙盘作业，研究了如何配置部队和编成战斗队形以及同诸兵种部队进行协同动作等问题。

3

我对集团军的命运、对编入新的方面军后近卫军战士们参加的首次进攻的命运反复思考，焦虑不安，这些我并不隐瞒。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获得了不朽的荣誉，它光荣地擎着近卫军的旗帜走遍乌克兰大地，它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解放顿巴斯，夜袭扎波罗热，夺取尼科波尔的锰矿和克里沃罗格的矿石，直至解放敖德萨的战斗和在德涅斯特的搏斗。现在，它编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后，应当保持它的荣誉，决不能因过去有功而有丝毫的懈怠。我们没有权利败坏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荣誉。

也许，每个人在新的形势中面临完成新的任务时，心头翻滚忐忑不安的不仅是责任感，而且也是自尊心。有些人表面上装得很单纯，说他们在这种时刻不考虑自己，不考虑自尊心，这种人我是不相信的。在战斗中缺乏自

尊感和自豪感，就会使人变得冷漠、无情。在新的形势中，我能对自己的团队的战斗荣誉无动于衷吗？当然不能！否则，我就会把集团军交给别人，退休回家了。我相信，我也知道：我们会打好这一仗，近卫第8集团军的团、师在这里会给自己的旗帜增添光荣，会成为其他兵团的榜样，这一些我们将能做到。尽管要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在防御战和进攻战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该方面军（过去是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有过领导大战役的出色实践。当时它组织歼灭了保卢斯的被围集团，光荣地进行了库尔斯克会战，在许多辉煌的战役中都获得了荣誉……。

这时，进攻的准备工作渐告结束。应当定下决心了。这个决心是基于下列的一些考虑。

敌人在我方没有施加压力的情况下第一次将部队后撤了20公里。假如敌人感到我军的打击即将来临，那么为了保存实力，它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轻易地决定撤到下一个防御地域去。森林和沼泽地非常适合于这种防御战术。

对我们进攻者来说，敌人的这种战术会使我们在情况不明的阵地上拖住手脚、拖延战斗，也可能使我们频繁徒劳地展开自己的兵力、特别是炮兵。

对我们进攻者来说，重要的是就在此时此地，抓住或更多地拖住敌人，迫使它投入战斗，不同我占优势的兵力决斗就不能脱身。

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行动、特别是战斗侦察迫使敌人丢开所占据的阵地。与此同时，我军的突击应当坚决，在突破敌防御后，应当迅速利用集团军进攻地带的扩展，将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交战，狠狠地打击敌人。

当时集团军的战役配置是一个梯队，三个步兵军都布置在一条线上。各军抽调一个师，共三个师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军的战斗队形为两个梯队：一个师作为第一梯队，另一个师作为第二梯队。

计划在进攻的头一天将坦克第11军投入战斗，并加强诸兵种合成兵团的突击，以便紧紧地咬住退却的敌军，甚至超过敌军，从行进间强渡西布格河，一举突破敌人集团军的防御地区。

为了保持突破和进攻的高速度，各军的第二梯队的各师，于进攻的第二天早晨投入战斗，即紧随坦克第11军之后投入战斗。

按照方面军首长的计划，坦克第2集团军应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突破地段上进入突破口，因此决定要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实施迅速、不停的进攻，以切实保证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纵深配置集团军各兵团的战斗队形。

根据已定下的决心，制定了战役计划，并附有部队行动的详细说明，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估算。

在定下实施突破的决心时，考虑了敌人会撤退到西布格河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在总攻开始前，即主力发动冲击前，进行战斗侦察。为此目的，要从右翼及中间的两个师中各抽调两个步兵营，从左翼的一个师中抽调一个步兵营，在集团军进攻的整个战线进行侦察。

抽调出来的部队的任务是：夺取第一阵地前沿的几处高地，在展开进攻过程中，一举占领特鲁布利、维久季地区（即突入防御纵深3公里处）的一些高地。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和扫雷坦克也随各侦察营前进。为了保证这

支强大的侦察梯队的行动，计划进行 30 分钟的炮火准备。

定下的决心规定：侦察梯队的行动一旦顺利的话，在不进行炮火准备的情况下，主力即转入进攻，一举突破敌人防御，直插防御地带的整个纵深。假如这支侦察梯队没有完成交给它的任务，即停留在敌人防御的前沿阵地的话，就应该进行 1 小时 50 分钟的炮火准备，然后，以集团军整个第 1 梯队的主力发起进攻。

在这个决心中还规定：进行如此强大的侦察，不仅是为了查明敌人的前沿阵地和兵力，而且是为了弄清是否有可能在无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将侦察梯队及主力的行动转为总攻。

这里必须谈一谈集团军当时拥有的实力。正如上面提到的，集团军在 6 月份补充了兵员。师的人员总数达 6700 人。

到战役开始时，集团军共有 9 个步兵师，另外，还有 179 辆坦克的坦克部队。

集团军炮兵司令 H·M·波扎尔斯基掌握着 2231 门火炮和 501 门近卫迫击炮。还给我们配属了统帅部预备队的摩托化工程兵第 41 旅（5 个营）；工程兵第 64 旅（4 个营）；

独立摩托化舟桥第 85 营。

为了搞好集团军各兵团和部队的协同动作，在进攻开始前，我们用了一天时间对当前的战役进行了演练。为此准备了精确的沙盘（地形模型）。沙盘上面标明了敌防御的全部情况、其预备队、炮兵和坦克的配置。参加演练的有各军军长、各师师长、各兵种首长和部门主任。出席作业的有：苏联元帅 I·H·朱可夫和 H·H·罗科索夫斯基、空军主帅 A·A·诺维科夫、通信兵元帅 A·T·佩列瑟普金、坦克第 2 集团军司令 C·A·波格丹诺夫上将。

指挥员们正确地理解了战役企图和战役计划。体现出早在伏尔加河的战斗及后来在乌克兰的战斗中就已形成的思想观点的一致。毫无疑问，人们已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这场战役中，发挥积极主动、坚定不移的精神，打好这一仗。

当然，不对我们制定的战役计划进行一番争论也是不行的。方面军司令部的了一位工作人员就有点困惑不解，说为什么我们计划的进攻速度比方面军首长制定的进攻速度还要快？方面军负责炮兵的同志也愤愤不平，问为什么在实施战斗侦察时使用那么多炮弹，而且还都是大口径的炮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我们打算把战斗侦察同对敌整个防御的突破结合起来。我们试图实行新方法，摒弃某些陈规旧套。

显然，这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理解和接受的。

谈话逐渐地发展成争吵。军人都知道，同上级首长争吵，不是那么愉快的事。但方面军司令员 H·H·罗科索夫斯基帮了我的忙。他大声地宣布：“你是集团军司令员，怎么办，由你来决定。是好是坏、成败如何，也由你来负责任。”这话非常符合我的心思。

飞行员们也困惑不解：为什么不是把他们派去突击敌防御前沿，而有派去突击位于敌防御纵深的炮兵阵地。

我只好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炮兵非常了解敌人的前沿阵地，以我们的炮兵火力，完全可能摧毁和压制那里的一切。而突击敌人的防御纵深，炮兵就不能取得象航空兵那样的效果了。这么一说，飞行员明白了对他们的要求。

1944 年 7 月 13 夜，集团军第一梯队各师进入了突破地段上的出发阵地。在我集团军各师前面占领阵地的，是原在本地段进行防御的第 47 集团军所属的步兵第 60 师。我军的炮兵十分谨慎地对已发现的敌发射点进行试射。看样子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要与敌人触发战斗了。最后的细致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战斗已迫在眉睫……

我们尽量做到不打草惊蛇，以防敌人不战而逃。

我接到通知，当我坦克第 2 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后，波兰第 1 集团军将紧随我军挺进。波军的首长很快就要抵达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指挥所，以便观看如何组织对敌人的防御进行突破。

我们认为，波兰集团军在我方面军的编成内开赴战场参加交战，是一个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的事件。

根据侨居苏联的一些波兰共产党员的倡议，1943 年春，成立了波兰爱国者同盟。1943 年 4 月，该同盟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允许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个波兰兵团，该兵团可以参加对希特勒军队的作战。申请获得批准。起初，波兰的爱国者们组建了一个师，取名叫“科斯秋什科”，随后扩编为一个集团军。集团军得到了精良的装备和现代化的武器，并进行了训练。现在也该是这支部队参加战斗的时刻了。

集团军司令员季格蒙特·伯林格中将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扎瓦茨基，在参谋人员的陪同下，于 7 月 17 日夜、即进攻开始前几小时，到达我的指挥所。

夜异常沉寂。沼泽地上弥漫着一层不很高但却是浓厚的雾气，它吞没了一切声响。间或从远处什么地方，从淹没在黑暗中的森林地带那里，不时地闪出火光，接着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这是我轰炸机群在对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轰炸。

波兰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看得出来，他们急欲投入战斗。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波兰的边界了。再去不远就是卢布林市和卢布林高地。形象地说，站在这个高地上，就可以俯视自由波兰的未来。卢布林的后面就是波兰的村镇、城市。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波兰人民，正盼望着解放者的早日到来。

七月，天亮得很早。但在森林中，黎明却姗姗来迟，甚至似乎有些勉强。起初，先从黑暗中露出苍劲的松树的顶端，随后，是云杉那齿状的树梢。黑暗从密林中退去，落满露珠的林间草地闪着微光，淡兰色的雾霭也渐渐地变得稀薄了……

指挥所位于 202 高地。各军、师的前进观察所的电话线都通向那里。有线电通信网就如神经一样，沿着预定实施突击的中线和各个方向铺设开来。所有无线电台仍保持静默，开机时间还不到。

我与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傍晚时就对过表。我盯着分针，又盯着秒针，5 点 30 分……

刹那间，各种口径火炮同时开始射击，有些地方在长 1 公里的突破地带上就集中了 200 多门火炮。我们感到大地都在脚下颤抖了。

起初，听到的是爆炸的轰隆声，随着大口径火炮开始射击，这种轰隆声越来越大。

前面敌人的阵地上一片混乱：尘土、火光、硝烟、冲天的泥土和沼泽

的泥浆遮天蔽日。

黎明时分的晨光已变得黯然失色。火炮发射着复仇的炮弹，飓风般地在怒吼……

后来得知，集团军炮兵在 30 分钟的急袭射击中，共发射了 77,300 发炮弹。

“太痛快了！”波扎尔斯基感慨地高声说：“真应该向我们的工人们致敬，深深地致敬！……这才称得上名符其实的炮击呢！”

各侦察支队紧随徐进弹幕射击之后，发起了冲击。6 时过后，我接到电话报告：我军各先遣支队尾随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和扫雷坦克，已突入了敌人的第一道堑壕，并控制了敌人的防御前沿和一些制高点。我下达了集团军主力转入进攻的命令。

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 H·H·罗科索夫斯基和苏联元帅 I·H·朱可夫来到我的前进观察所。与他们一同到达的还有炮兵司令员 B·A·卡扎科夫。

炮兵上将 B·A·卡扎科夫生气地责问波扎尔斯基：“你们的炮打得惊天动地，这是干什么？你们就是这样进行战斗侦察吗！？”

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看到我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便平静地回答：“请您去问一下集团军司令员吧！”

他会向您解释这次射击的目的的……”

罗科索夫斯基打断了即将发生的争论，说：“既然我们已将这次战役委托他们进行，那么，就让我们来问一下结果怎么样，至于他们怎样打炮，就别问了！”现在谈论结果还为时尚早，我们接到报告说，在敌防御内残存的各支撑点上仍进行着激烈的格斗。但主要的目的业已达到。敌人已被箝制在原地，夜间也未能撤离阵地。这就意味着，过几分钟，就会传来突破敌人第一防御地带的战报。

7 时过后，我向方面军司令员和大本营代表报告，敌主要防御地带的第一阵地已全部被我突破，集团军主力不需要实施基本的炮火准备和徐进弹幕射击，就已投入战斗。以这种方法突破敌人的防御，可为国家节省数十万发炮弹、数百吨航空炸弹和燃料。

第 1 梯队各师的主力部队投入战斗。德军妄图以炮火阻止其前进。我炮兵立即向敌军各炮兵连射击。随后，我航空兵也进行了猛烈轰炸突击。数分钟之内，德军炮兵就被压制住了。炮兵未能办到的事，航空兵办到了。

我军最初投入的部队，一举就深入了数公里。到 17 时，集团军各部队已进抵普雷斯卡河。这里已是德军的第二防御地带。德军指挥部再次企图在此阻止我军前进。但是，近卫军人并没有止步。B·M·舒加耶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47 师在行进间强渡了沼泽地上的小河，并且在对岸与敌人展开战斗。紧随该师之后，B·H·潘科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88 师，也在各渡口投入了战斗。在赫沃罗斯托夫地域，该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强渡了小河。

B·C·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27 师也抵达河边。

日终前，我军已楔入敌第二防御地带。

此刻，坦克第 11 军在奥库宁和诺沃谢尔卡地域占领了出发地位，并向普雷斯卡河右岸派出了侦察。

空军第 6 集团军的航空兵兵团继续对敌防御纵深内的战斗队形和指挥地点实施突击，共出动飞机 855 架次。

波兰的同志们看到这一切异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德军应得的报应。

他们要求到突破口附近的战斗队形那里去看看，我们好容易才劝止他们。

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间。侦察兵和炮兵查清了敌人的火器配置。工程兵部队坦克和火炮架设了桥梁和构筑了渡口，步兵第 88 师趁昏暗的夜色全部渡到普雷斯卡河右岸。

7 月 19 日晨，集团军炮兵又开始射击。部队再次投入冲击。截至 11 时 30 分止，部队已前出到戈罗德诺、马舍夫一线。

坦克部队下午出动了。坦克第 11 军此次渡过普雷斯卡河后，从斯基贝、马舍夫一线进入了业已打开的突破口。该军将退却之敌拦腰切断，从北面迂回至柳博姆耳市之后，直向敌后挺进。

根据战斗进程，我们可以作出判断，敌人在主要地区内的抵抗业已被粉碎。我军突击的突然性和在兵力上形成的优势已在整个突破正面产生了作用。第 47 和第 69 集团军在其进攻的各个地段上也获大捷。

我穿过树林，从一个观察所来到另一个观察所。在林中的道路上，我碰到了当时经常遇到的情景，也就是我军的几个自动枪手押送着一群群德军战俘。我不禁地在长长的队伍旁边停了下来。正巧身旁有一个德军翻译，他操着半通不通并带有很重口音的俄语，但还能很容易地听懂别人的话。

俘虏们挺直了身躯，并尽量将衣帽整理整齐。我当时想，我们的战士一旦被俘，决不会像他们这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德国将军面前。我对翻译说：“问问你们的人，有谁能解释眼前正在发生什么事？”

问话被准确地翻译了过去。那些军衔较高的人嚷着回答：

“希特勒完蛋了！完蛋了！”

士兵和下级军官默不作声，他们更理解问题的实质。

“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又重复问道。

他们相互嘀咕了一阵，翻译把他们的话译过来：

“我们在撤退，将军先生！我们的军官们不知道会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向我们进攻……”

与战俘们的这次谈话，告诉了我哪些东西呢？

首先，谈话证实，我军突击的强大威力对于德军统帅部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其次，我确信，敌人从心理上业已垮台。

这就为我们能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进攻创造了主要的前提。我一向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交战中，部队的士气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军人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敌人则毫无胜利希望地去作战。

据空中侦察情报，被击溃的敌军已退过西布格河，并企图依仗新的防线进行顽抗。

我们当前任务是，追击敌人，在行进中强渡该河，并将敌人从河右岸的阵地上击退。

各步兵军所属第二梯队在庫斯尼谢、柳博姆耳、维什涅夫一线投入了战斗。他们受领的任务是，尽快在宽大正面上前出至西布格河，并从行进间强渡该河。我各步兵军在进攻中采取双梯次配置战斗队形。

我们满意地注视着友邻部队的行动。他们的进攻也很顺利，并已与我部齐头并进。

战斗到夜里也未停止。7 月 20 日拂晓前，坦克第 65 旅和近卫步兵第 57 师的部队，在古希地域以猛烈的冲击前出至西布格河。他们利用徒涉场强渡过该河。开进到附近的近卫步兵第 47 师，于早晨 10 时前也渡河至右岸。近

卫步兵第 28 军所属的 12 个师于同一时候也赶到布格河地区。他们在格尼休夫、斯韦尔热地域强渡过河后，又将已占领的登陆场逐步地加以扩大。

这样，到 7 月 20 日午，我集团军以 2 个军的兵力，在宽达 15 公里的正面上，强渡过了西布格河。部队在继续向西发展进攻的同时，还在河上架设了门桥渡口。

我集团的主要突击力量和机动力量——坦克第 2 集团

军，尽管按计划应于战役开始的第二天进入交战，但直至目前为止尚未进入交战。它没来得及在各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后展开，并前出至布格河。我们暂时只好先将坦克第 11 军的兵力投入交战，以应付当时的情况。

7 月 20 日晨，我与参谋长 B·A·别利亚夫斯基来到 B

·A·格拉祖诺夫中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4 军的驻地。与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坦克第 2 集团军司令员、坦克兵上将 C·A·波格丹诺夫。从进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大家都知道他性情急躁，但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众所周知的。坦克集团军留下未加入战斗，就好像在铁砧上方高高举起但还未落下的铁锤。应该扫清一切障碍，以便使如此强大的兵团直接去突击已暴露的敌人的战斗队形。

我军炮兵从布格河左岸向敌人的发射点和炮兵阵地射击。波扎尔斯基及时地把大口径火炮调集到这里。格拉祖诺夫部队的近卫军人和坦克兵们，在炮兵的掩护和空中的支援下，架设了浮桥，并扩大了右岸的登陆场。

令人欣喜而值得庆祝的时刻到来了，虽然它是在普普通通的战斗环境中到来的，我军在追歼敌人时越过了国境线。正是这条国境线，三年前，敌人背信弃义地将其侵犯。可以看出，即使是战役间歇，我们也不会在此停留，而必须继续向西追歼敌人。这时，不用望远镜，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波兰的领土了。也就在此时，我充分理解我们的波兰同志们的激动心情！

看着他们，我自己也心潮起伏。这里有许多原因。此时此地，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国内战争时的一副副画面。那是发生在 1920 年初的事。当时，我指挥的第 43 团，从东方面军调往西方面军与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毕苏斯基军队作战。

按照协约国的作战企图，50 万人的波兰军队应当保证首先在西南方向上歼灭红军的部队。夺取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随后，向莫斯科发起新的进军。

2 月末，步兵第 43 团在乌拉镇以西占领防御。该防御有着独特的特点。不论我军的基本阵地还是敌军的基本阵地，均通过湖间的狭长地带。双方阵地之间留着一个宽 10—15 公里的敌我均未占领的地幅。有些小规模游击队在这个地带活动。有时敌人的侦察兵越过中间地带。但是，游击队的巡逻组远在敌人到达我军的步哨和阵地之前，就事先通报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做好痛击敌人的准备。

这种小型的“阵地战”，一直延续到 1920 年 5 月。

1920 年 5 月初，波兰军队在乌克兰转入进攻，并于 7 日占领了基辅。局势要求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西方面军指挥部决定实施反击。

第 43 团受领了在戈罗杰茨地域（现称扎斯洛诺沃）集结，并夺取列佩尔的任务。

据侦察情报得悉，敌防御阵地穿过博罗夫诺、格雷博奇察、波列维日三个湖泊（位于列佩尔市区南 3 至 5 公里处）。敌人的阵地由数条很深的堑

壕组成，周围有几排铁丝网。列佩尔市由诺沃格鲁的步兵团防守，并得到炮兵分队的加强。

在研究这些情报时，我特别担心的就是铁丝网，因为我团还是首次遇到它，由于我军火炮不多，炮弹数量也有限，所以不能指望用炮火摧毁铁丝网打开通路。就是炮兵最终能够打开通路，也将丧失宝贵的时间，使敌人有可能做好抗击我军冲击的准备。

我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清晨进行 5 至 10 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即突然向敌人发起冲击。我对诺维茨基型手榴弹寄予很大希望。这种 5 俄磅重的手榴弹，用一条一米来长的结实的细绳系着，绳的另一端栓着一个铅锤。这样做对我很有用。这种手榴弹落到铁丝网上时，绳索即缠绕在铁丝网的刺上，使它不在地面爆炸，而在稠密的铁丝网外爆炸。这种武器威力很大。团里曾领来一百多枚诺维茨基式手榴弹，但是，包括指挥员在内，没有一个人会使用它。因此，我只好亲自充任教官，我集合了大约 100 名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把他们带到一条叫做乌拉的小河岸边。大家在河岸上排好队，我向水中投了一枚手榴弹。轰然一声，震耳欲聋。总之，爆炸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但随后发生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水面浮起了一层被震昏了的鱼。我的战士们连衣服也未脱就跃入漩涡中去捞鱼。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给吓坏了，我耽心说不定有谁会在欣喜若狂之中被淹死。幸亏没有一个人溺死，而团的伙房却得到了不少鲜鱼。在当时粮食异常紧张的饥谨年代，每一块肉和每一条鱼都像金子一样非常宝贵。

当天，我准备进行侦察。计划很简单：悄悄地潜入博罗夫诺村或村南的高地，从那里对敌人的工事、分队的驻地和各支点接头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在敌人巡逻途经的路上设伏，力争抓获一些俘虏。

不久，一支由 15 名骑兵侦察员和一辆载着机枪的敞篷轻便马车组成的队伍出发了。这个侦察小分队顺利地来到博罗夫诺村。我爬上一间高草棚顶，用望远镜察看地形。突然，我发现了敌人的两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其中的一队 12 人左右径直向我们开来；另一队人数稍少在南面行进，穿过扎列西耶村向诺维内方向走去。

机会难得，刻不容缓。我们冲出村子奔向树林。我让 5 名骑兵带机枪留在林边，等第二组敌人进入诺维内村后，我们便从后方向其发起攻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战斗很快结束了。我们俘虏了两名敌兵。

俘虏向我们详细地供出了守敌在列佩尔的兵力和工事情况，并在地图上指出了堑壕、机枪巢、观察所的位置。总之，向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开头还算顺利。

发起进攻的日子定在 5 月 14 日。全团在夜间就已展开，进行了冲击前的准备，我与左邻部队——我旅步兵第 44 团沟通了联络。乌拉河将我团与右邻第 6 师隔开。

在第 43、第 44 团地段上，本应集中我师的几乎全部炮兵，以便以炮火支援我们。但是，我们在阵地上只看到一个由马特维耶夫指挥的炮兵连（早在东线时我们就经常与该连协同作战），其余的炮兵仍未到达其发射阵地。还有其它原因使我焦急不安。黎明来临了，天越来越亮，但与旅和师的指挥所仍未联系上。在我这个 20 岁的团长面前，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是等待炮兵到来并与上级联系上，因而坐失突袭的良机呢，还是不等炮火支援就立即将全团投入进攻呢？不管那个决定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已展开战斗队

形的部队，正等待着下达命令。而在某些地方敌人已发现我军的战斗队形，并已开始对射。

团政委伊万·卡塔列夫和副官涅斯戈沃罗夫这时就站在我的身边。他们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情况越来越紧急。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我们就会一清二楚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样就会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

我终于定下了决心，并通过副官向炮兵连连长马特维耶夫传达了立即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开火的命令。该防线几乎紧贴城市而过。然后又转身对政委说：“走，到散兵线去，去参加冲击！”我满意地看到：卡塔列夫和涅斯戈沃罗夫两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兴奋的火花。他俩人均松了一口气。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我和政委都站了起来喊道：“全团跟我来，向前冲啊！”伏在铁丝网前的红军战士迅速地向敌人冲去。我知道，每一个战士正是等待这样的命令：立即行动。因为拖延时间只能有利于敌人，并要自己付出很大的牺牲。

实施冲击的散兵线向着敌人及其工事扑去，它犹如汹涌的狂澜，荡涤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大威力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数也数不清！）还有步枪、机枪的射击声。

在战斗中，时间很难计算，因为它转瞬即逝。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红军战士至多只需要5分钟就可逼近铁丝网，并通过它冲向敌人的掩体。转眼之间，我看到从掩体中露出举起的手臂。看来，举手的敌人大约不少于300人。好啦！最危险的阶段总算过去了。冲击没有失去其突然性，敌人的第一阵地被我占领，守敌被俘。主动权操在我们手中。现在千万不能丢掉主动权！我向散兵线发出命令：“向列佩尔急速前进！”红军战士又像潮水般迅猛地向前冲去。俘虏被排成长长的纵队押往后方。

站在高地上已经可以看到列佩尔市。眼看从城里开出两队敌军，每队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敌人展开成散兵线，并向第2阵地运动。可是，真见鬼！我们的炮兵在哪里？现在多么需要它的支援！我正想着，突然听到马特维耶夫炮兵连的4门火炮发出齐射，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烟柱和尘土冲天而起。打得很准，直接命中敌散兵，敌人当即卧倒在地。紧随第一次齐射之后是第二、第三次齐射……红军战士们抢在敌人前面，终于夺取了第二阵地。随后，又不停步地对卧倒在地上的敌散兵线发起冲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迅猛而协同一致的冲击，仓惶地退向城里。敌人的军官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竭力阻止逃跑的士兵，但他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军的战士们追击着敌人，紧紧咬住他们，一举攻入城内。

敌人全线溃退。这时，伊万·卡塔列夫政委骑马来到我这儿。顺利的战斗进程使他非常激动，他兴奋地喊道：“冲啊！”我也喊道：“冲啊！”我跃上马鞍，抽出马刀，冲上前去追击溃退的敌军。大街上响起了胜利的呼喊声“乌拉！”我和卡塔列夫只顾向前冲，以致不知不觉地脱离了自己的战斗队形，冲到了埃萨河水闸跟前。与此同时跑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个多连的波兰兵，他们极力想经由水闸跑到河对岸去。

我们一边跑一边喊：“放下武器！”出乎我的意料，竟有100多支步枪扔到地上。我回头一望，我们只有4个人——我、政委卡塔列夫、连长科兹洛夫和政委的通信员。显然，其他人还在后面。突然，从退却的敌人人群中跳出七个军官，并用手枪朝着我们几个骑马的人射击。我枪法不错，第一排子弹就打倒了两名军官。可是我突然看到：政委从马上跌了下来，紧接着连长也掉下马去。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到跟前去，因为敌人会像打沙鸡一

样把我们都打倒。转眼间，我的马也噗通一声中弹栽倒在地上。政委的通信员被惊马驮着在街上狂奔。我紧贴在一所房子的大门上，一个人对付好几个敌军军官。我左右两手各持一支左轮手枪，右边挎着军刀。我决心拼了。敌人的军官们显然枪法不佳，我又打倒了他们两个。

起初，波兰士兵看着我们的决斗，就像在看马戏表演。后来，突然有几个人弯腰去拾枪。我脑子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这下完了！士兵会用步枪当即把我打死，因为我无处藏身。

就在这时，从拐角处飞跃出一队骑兵，为首的是队长古里亚诺夫。4 连连长安德烈耶夫率领战士们也出现在相邻的胡同里。政委躺在马路上，睁着眼仍在喘气，全身抽搐着，他快要牺牲了。我蹲在他面前吻了他。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了……

防守列佩尔的敌军波兰团被击溃，并被赶过了埃萨河。我们在行进中夺取了一个名叫斯泰基的大村庄，该村在城西 3 公里处。敌人仓惶向西溃退。

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又牵来一匹新马。当我抬起左腿要踏马镫时，感到马靴中有一片湿漉漉的可疑的东西，随后，膝盖上方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回到团部，脱下靴子一看，里面都是血。原来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我被扎了一刺刀。

原在波列西耶沼泽地以北作战的西方面军的主力，现在从德里萨、波洛茨克地域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发起进攻。敌人已经撤退到别列津纳河沿岸预有准备的阵地。

步兵第 43 团接到命令沿当时的主要交通大道列佩尔、佩什诺、别列津诺一线进攻，任务是强渡别列津纳河。

全团渡过莫斯科维察河，并沿公路左、右两侧各展开一个营后，随即转入进攻，同时仔细搜索莫斯科维察和别列津纳河之间的茂密森林。我们力图在行进间占领河上游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因为随后炮兵和辎重就可从桥上通过。

敌人也考虑到该渡口的作用，所以修筑了坚固的桥头堡准备固守。我团的散兵线向敌人进逼到 200 米左右的时候，就遇到步枪的猛烈射击，敌人还用大口径火炮进行支援。我团两翼侧被压向河边的沼泽地。

进攻桥头堡和夺取渡口的战斗未能取得战果。因此，散兵线停止前进，并卧倒在潮湿的森林中。这次进攻没有得到炮兵的支援。

后来得悉，炮兵未能占领阵地。因为要在密林中选择和修筑发射阵地、设立观察所并沟通联络，大约需要两昼夜的时间。

第三天，全部炮兵终于进入阵地，进行了试射并准备支援进攻。各炮兵观察所位于我的观察所旁，就在沿别列津纳河蜿蜒向南的森林边缘。我们定于次日凌晨发起冲击。

可是，到了清晨，我们的运气并不佳：河边沼泽谷地上大雾迷漫。浓雾一直延续到下午。到 3 点时雾散了，我们的“战争之神”进行了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散兵线协同一致地发起了冲击。

我走在前面的散兵线里。行进中，我跳过了一条沟渠，那里灌满了开春后融化的雪水。

跑了几步，忽然听到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叫了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他已经躺在沟边上。我明白，他受伤了。我跳到他跟前，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彼得喃喃地说：“团长，我不行了。”我蹲到地上。鲜血从受伤战

友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没说出半个字，就牺牲在我的怀中。又一个我亲近的人倒下了。一年半以来，他伴随着我南征北战、冲锋陷阵……

这时，我们的散兵线被敌人的火力阻止在铁丝网前，并开始缓慢地往后退。我抱起彼得的遗体，在坎坷不平的沼泽地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一直将他抱到观察所。四周弹片呼啸，但我全然不顾，我悲痛得喘不过气来……彼得被安葬在别列津纳河岸上，在观察所旁边的一片树林中。

我喜欢彼得，把他视为兄弟。他的死对我震动很大。别人对我说，我在梦中还呼唤着他的名字，让他到我这儿来。后来，来了新的通信员谢苗，但我很长时间还不习惯，经常把他叫作彼得。

这次战斗告诉我们，正面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采取别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得不沿岸重新开始侦察，无论如何要找到一个渡口和通向渡口的隐蔽接近地。

不久，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情况是这样的：第 2 营营长瓦西里·利托诺夫扎了一个木筏，他乘着木筏顺流而下，不断用杆子测量着河底。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对岸在敌人控制之下。但这并没有难倒利托诺夫。他成功地在距别列津诺镇南 5—7 公里处发现了一条林间小路，这条小路可直达河边，并一直向对岸延伸。这条路看来像是过往这个地方的牲畜踩出来的。小路穿过密林通向别列津诺和利普斯克之间的丘陵地。虽然这里遍布沼泽，但步兵仍可通过，并且可以随身携带重机枪。

我将自己的计划向代理旅长彼得·谢苗诺维奇·克列诺夫做了汇报。我还请他派一个工兵连加强我团，并让预备队第 44 团做好横渡别列津纳河的准备，以便共同作战。

克列诺夫同意了我的计划，不久就将旅属工兵连派到我们驻地。工兵连与利托诺夫营的战士们将小路加宽加固，一直修至河身，并扎好了一些渡河用的木筏。

利托诺夫在指定的日子里，带领自己的战士，在雾气的掩护下，一枪未发，悄悄地渡过了别列津纳河。他们于午前抵达河西 2—3 公里处的一个高地，并在那里设防固守。刚回到我们这里的政委伊万·普罗克希茨也在突击营里。（他是在政委卡特列夫牺牲后不久调回来的）。

我向旅长报告了二营作战取得成功的情况，并请他尽快将第 44 团派往已经夺得的登陆场。旅长答应我尽快将该团派往，并责成我担负组织第 44 团渡河和进入登陆场的工作。

傍晚，步兵第 44 团副团长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和现在在他的部队服役的副官纳扎尔金来到我的观察所。尼古拉·尼雷奇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人品出众，并且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在多次战斗中，我们都是友邻，我们患难与共、相互信赖。我们认真地分析判断了情况，并商定好共同作战。

指挥部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旅政委萨达科夫来到我团，以保障进攻的胜利进行。对于这位出类拔萃的人，我尽量简短地、但不能不说上几句。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俄罗斯式斜领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军用挂包，总是有说有笑，精神饱满。彼得·萨达科夫深受战士们爱戴。他不仅教育战士们怎样战斗，而且在战斗中总是以身作则。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相互只称呼名字。

我们与 H·H·普罗宁共同制定了主力渡河计划，并决定于次日到各部队去进行细致的勘察。然后，各团按计划于夜间渡过别列津纳河，以便于凌晨占

领进攻出发地区。

现地勘察进行得很顺利，也很隐蔽。老实说，当我们返回时已精疲力尽，混身上下也都湿透了。

随着黑夜的降临，我军各分队开始向河边运动。我命令伊万·阿尼西莫夫指挥的1营留下，去进攻别列津诺镇旁的桥头堡，其余所有部队则渡过别列津纳河。

各分队渡河顺利。黎明前，我军各部队已展开散兵线，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冲击。遗憾的是，由于沼泽地，团骑兵侦察队未能加入一线部队。他们不得不留在右岸。更令人不快的是，因地形不熟，在雾中极易迷失方向，因而不能马上投入进攻。好在敌人肯定没有料到，突击会来自这个地域。

5月19日下午，我们终于开始进攻了。机枪从各个方向一起开火。

在利普斯克至别列津诺的公路以西，是瓦尔德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指挥的一个营在战斗，该营迂回敌后，造成合围敌人的态势。位于该地域的敌炮兵观察所受到严重威胁。敌人的炮兵观察员丢下通信器材逃跑了。这样一来，敌步兵就失去了炮火支援，我炮兵则向敌人瞄准射击。敌人支持不住，开始溃退，急忙将部队从桥头堡工事撤到别列津纳河岸。所有这一切均暴露在我机枪的短兵侧射火力之下。敌伤亡惨重。阿尼西莫夫营及时发现敌人撤退，并开始追击敌人，使敌人未能炸毁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

尽管溃逃的敌人遭受伤亡，但是在退却了约5公里之后，得到了增援，重又投入反冲击。一场激战开始了，最后发展为一场白刃格斗。

由于营长多梅罗夫斯基巧妙地进行了机动，傍晚时，交战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营齐心协力，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击，终于将敌人击退到普斯托谢利耶村。只是由于黑夜到来和部队的疲劳，才停止了进攻。

在别列津诺镇，我们夺取了敌人的弹药和粮食仓库。自然，这很快就引起了师和旅的采购员们的注意。他们紧随战斗队形之后，想方设法为部队搞到粮食。当这些采购员来到仓库时，正好遇到我团司令部的管理股长安德列·西派洛夫在那里。他已将食品装满了司令部的几辆大车。采购员们和西派洛夫激烈地争吵起来。采购员们依仗“人数上的优势”，把西派洛夫抓了起来。我团司令部的以机灵著称的驭手、西伯利亚人祖博夫，看到这个情况，决定去解救管理股长。祖博夫迅速地将马从大车上卸了下来，取下套包，然后跨马冲向仓库，大声喊道：“股长！难道你没听见吗？那边仗打得很激烈，战士们的子弹快用完啦！崔可夫命令你立即向散兵线运送子弹！”祖博夫施展的小诡计果然得逞了，采购员们立即释放了股长。祖博夫当着股长的面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招法，一边用缴获的罐头款待我们。我们乐得哈哈大笑。

我们尽量从这次交战中汲取更多的经验。我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作战方法、战术和装备。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的战斗力、其中也包括战斗的顽强性，要比高尔察克军队强，这一点在次日清晨的战斗中得到证明。

前面我已提到，傍晚我们未能夺取普斯托谢利耶村，尽管我们已接近村边。夜里，我命令向村前派出整整两个连的兵力，彻夜加强警戒，而将团主力调往村东头约1.5公里处，进行休整，补充弹药。并沿大道左右两侧各展开1个营。还有1个营留作预备队。

这一次，敌人也决定采取突袭的方法。他们于清晨就以庞大的兵力转入进攻。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猛攻下，我派出的战斗警戒队，开始沿大道后撤，退向已展开成散兵线的二个营那里。此时，进攻的敌军陶醉于开始时取得的

胜利，压缩了自己的战斗队形，却遭到我两个营齐射火力的迎击。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波兰白军几次发起冲击，进行白刃格斗，但每一次均被我红军战士的机枪火力压制在地面。他们力图突破我战线。我识破了敌军的企图之后，将预备营连同骑兵侦察队一起从森林中调出，对敌翼侧和后方进行迂回，然后转入反冲击。突击是出其不意的。敌人一听到后方响起了枪声，便在混乱中冲向大道向多克希齐村逃窜。我们夺取普斯托谢利耶后，看到大队敌军已通过大桥向格林诺耶村退却。撤退的敌军约为我军的两倍。

战斗过后，我们用缴获敌人的储备品，充分地补充了部队。除辎重外，我们还缴获了约 20 匹纯种匈牙利马。有一匹马备有军官用的马鞍，这匹马我留给了自己用了。战士们立即称它为“毕苏斯基”

别列津纳河上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敌军遭受重大伤亡后，一面向西南退却，一面利用每一个有利于防御的地域，力图阻止我军前进。

红旗步兵第 43 团，在和一梯队编成内实施进攻，沿途轻易地击溃敌人的零星部队，经过 3 昼夜便进抵普列谢尼齐镇。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村镇，当时敌人用远距离火炮对该村镇进行了不间断的射击。我军没有伤亡，但当地居民却遭了大难，房屋着了火，许多人死在废墟中。

午夜，我们将一个骑兵侦察队派往南方。侦察队沿大道向洛戈伊斯克方向进发，但没发现敌人。可是，我们派往东面朝泽姆宾方向运动的一个骑兵侦察班，前进到 8—10 公里处就受阻，在索科雷村旁遭到敌人的步枪和机枪的火力射击。

波兰白军就是从这里开始向我军发起了反冲击。

到 5 月 28 日，敌人的所有正面冲击均被击退。但是，敌人依仗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开始迂回包围我军，并企图前出至我军的后方。要击退敌人的所有机动，我各团、旅、师以至集团军均感缺少预备队（集团军除 1 个师之外，其余全部兵力，早在进攻开始时，就按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斯基的命令，全都在第一梯队中展开）。从 5 月 28 日起，敌人从两翼侧不断进行突击，战斗很激烈，我军只好边战边退却。

第 15 集团军各部队进行的战斗尤为激烈。第 16 集团军试图前往对其进行支持，但为时已晚，未能奏效。

我们经常不得不突破敌人深入我后方的散兵线。在这些战斗中，我团打得都很艰苦，但一切都平安地顶过去了。我军齐心协力，同敌人进行白刃战，敌军四处溃逃，我们最终得以与自己的部队会合。

6 月 4 日，正当我团按照旅长的命令，从奥姆尼舍沃村向别戈姆利撤退时，下午接到命令，要我团在韦列捷伊村附近迅速地展开，并向东面奥特鲁贝村实施突击，消灭正要合围我两个旅的敌军纵队。不久，旅长 F·C·克列诺夫骑着马来到我这里，说明情况的严重性。

为此，我团应该击退敌这个纵队的突击。

红军战士因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原想夜间进行休息又无希望了。必须立即执行新的任务——与敌进行遭遇战，但更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如果发生什么失误，我们不仅使自己面临毁灭，而且也会危及其它许多部队，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我迅速集合了骑兵，更确切地说凡是会骑到马鞍上的战士都集合起来，用轻便民车驮了 5 挺机枪，便朝正在向我们迂回的敌军纵队冲去。我将团的主力委派给副团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列季金指挥。

人数约为一个旅的敌军纵队分成两队展开，一队向奥索维进攻，另一队向奥特鲁贝和卢斯季奇进攻。为了不让这两股敌人到达通向别戈姆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上去。我必须带领这 70—80 名骑兵和 5 挺机枪去阻击，直到我团主力赶到为止，因为，敌人如果占领了这条路，将对我各部队造成合围威胁。

以我现有的这点兵力来完成这项任务，显得特别复杂和困难。但是必须去冒险。我决定以智取胜。于是，我在奥特鲁贝村和奥索维村的东边各留下 1 挺机枪和 20 名骑兵，我命令他们要不惜子弹向敌人射击，并不断变换机枪阵地位置，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里有一支大部队。而我自己则带了 3 挺机枪和 30 名骑兵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机动，哪里情况比较危急，就向哪里开火。

我们的计策侥幸获得成功。我们“炮制出”这么多的武器，使敌人信以为真了。波兰白军用了 1 个多小时将部队展开成双纵队战斗队形，夺取奥索维村又花费了约 1 个小时。但此时我团已抵达鲁斯季村。这样，就使敌军翼侧受到威胁。

我团在刹那间就向奥索维村发起突击。敌经不住来自翼侧的冲击，向后朝森林方向溃逃，又遭到我机枪从后面射击。我团在行进中占领了奥索维村，但敌预备队赶到，并发起反冲击，我团又被迫撤出该村。我们的部队稍事休息后，又投入冲击，再次攻占该村。但是，傍晚过后，敌人从四面发起反冲击，我们有被合围的危险，我们又被迫向乌格雷、扎莫斯托奇耶一线后撤。

深夜，敌人进行了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射击。我军火炮则从北面进行射击。在黑暗中很难判断敌我炮弹的去向。因为敌我炮兵均从远距离向对方隐蔽目标射击。开始出现一些伤亡。我也被炮弹暗算，在前往扎莫斯托奇耶的路上，眼前突然爆发了一大片使人目眩的强烈闪光，随后我即失去知觉。

当我醒来时，急救马车已把我拉到别列津纳河上的一座大桥上。助理军医和一名骑兵侦察员护送着我。桥边的道路上停着很多大车、火炮和木箱。我认识的炮兵营政委走到我的大车旁边并说着什么。但我的脑子里嗡嗡地响，什么也听不出来。虽然感觉不到疼痛，但左半身不听使唤。显然是受了震伤。我用右手摸摸额头，觉得头上还缠着绷带，这才知道除此之外，我前额肯定也受了伤，因为额肿得几乎盖住眼睛。我用右手指着耳朵向政委比划着，让他明白我什么也听不到。政委从战斗记录簿下一页纸，写了些什么并交给我看。当我读着的时候，我曾好几次用手揪自己的头发，以便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政委写道：布琼尼的骑兵第 1 集团军占领了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之后，已经在乌克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前出至敌基辅集团的后方。波兰白军放弃基辅正向西溃退。这个消息使我高兴得忘记了一切。刚想微微欠身坐起来……却又无力地倒在急救马车的草垫上。

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又不想问助理军医。我一心想着前线。我回想起列佩尔附近的战斗和别列津纳河上的战斗，回想起那些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后撤的原因，是由于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敌人为了占有优势被迫从乌克兰抽调了部分兵力对我们进攻。这就使西南方面军有可能去获得巨大的胜利。我自豪的是，我们在历次战斗中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急救马车把我拉到扎科列维耶村。村里有旅的医院和我团的第二类辎重队。我坚决拒绝把我再往后撤。我不愿离开与我共同走过从喀山至奥姆斯

克的战斗历程的同团战友。现在，我仍旧在斗争的最前沿。

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萨菲罗夫对我简单地叙述了去扎莫斯托奇耶路上发生的事：当时在我身旁爆炸了一枚重型炮弹。马被炸死，我被气浪掀向一边。我被严重震伤，前额显然被弹片击中。大家在一个大弹坑旁找到我。我已经不省人事，满头是血。起初大家都以为我死了。但是当把我放到大车上时，我在昏迷中喊道：“为什么朝自己人开枪？”

.....1920年6月20日，我回到团里。我在第15旅司令

部遇到一个老熟人——旅长斯特曼加诺夫。他因患伤寒病在后方呆了很久。现在他重又指挥该旅。

当时，西方面军已经打过了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南部。部队正在准备实施决定性的进攻。部队昼夜都在进行补充工作，又新调来很多师。参加7月进攻战役的已不止是5月战役时的两个集团军和波列西耶 集群，而是4个集团军和莫济尔集群。

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的多林地带的名称。——译注。

看着新到达的部队，我们心里充满喜悦。“南方人”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们打败邓尼金之后，缴获了大批的战利品，并神气地穿上了崭新的英国军服，而我们的战士们，相当多的人穿的是在过去的历次行军中已磨损得很旧的军装，这使他们极为羡慕。应该指出的是，集团军的供应十分紧张。粮食特别缺乏。一俄磅面包加上煮干菜，既无鱼又无肉，这就是战士的一天口粮。当然，大家都明白：为供养部队国家已竭尽全力了，因为在中部的各工业城市里，人民也在挨饿。

有一种欧洲越桔，它使我们的菜食略为改变了一点花样。这种欧洲越桔在别列津纳的沼泽地上遍地皆是。红军战士们整连整连地轮流前往森林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去找，把行军锅装得满满的带回来。这种白得来的食物使我们免犯坏血病。

7月4日，西方面军部队开始进攻。我第15旅以出其不意的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别列津纳河对岸。但是由于没有渡河器材，我军未能在行进间强渡该河。

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凄惨的事。

我们几个指挥员，利用进攻受阻的时间，来到一间农舍吃午饭，并小憩片刻。女房东特意买来羊肉烤给我们吃。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政委萨达科夫、第44团团团长切尔尼亚夫斯基和我坐在桌旁和睦地谈着。女房东端来了鲜美的菜汤，随后又端来烤羊肉。正当我们动手吃烤羊肉时，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锅灶后面的房间里爆炸。房屋的墙壁如同一块硬纸板一样被击穿。旅长被弹片炸中头部，切尔尼亚夫斯基一只手臂被炸伤，作饭的女房东当场被炸死。被震昏的我和萨达科夫，勉强地爬到外面。幸免于难的我二人以疑惑的目光相互打量着：我们俩为何如此幸运？我们把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安葬在列佩尔。副旅长F·C·克列诺夫接替了他的职务。第44团由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指挥。

翌日晨，我们经过战斗强渡了别列津纳河，并切断了经由列佩尔通往多克希齐和别列津诺的道路。右侧，在普斯托谢利耶附近是第44团在作战。第13旅各团本应经由别列津诺方向发展进攻，但是在该镇方向上并未看到

这些部队，也未听到有何战斗行动。于是，我决定和通信员一起，穿过该镇，迎着敌人前往 13 旅。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该镇，穿过了别列津纳河大桥，突然碰到第 39 团战士的散兵线。他们惊奇地望着我们，仿佛我们从天而降。我请战士们把我带到附近的电话机旁，并与团长多蒙拉佐夫接通了电话。起初，他也不相信我是在他们团的前进散兵线与他通话。没过多久，他亲自来到这里。

我和多蒙拉佐夫一起，从维亚特卡河到额尔齐斯河，走过了共同的战斗历程，多次并肩战斗。现在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但却没有时间好好谈谈。我向多蒙拉佐夫说明了情况。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同时提醒我，在别列津诺北面河边，驻守着敌人约 1 个营的兵力，并请求我协助将其合围。我欣然同意，并从原路迅速回到团里。于是，瓦西里·利托诺夫指挥的左翼营立即转向别列津诺镇。此时，第 39 团已与退却之敌打响了。利托诺夫准时将部队展开，并对敌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波兰白军因而被击溃。我们俘虏了 100 多名士兵和两个军官。

过去，在西伯利亚与白匪作战时，我们曾成功地使用缴获的武器。但在这里我们只能使用手榴弹，因为敌人的步枪和机枪与我们的不是一个型号。

在别列津诺遭到惨败的敌人，一边后撤，一边进行顽抗。

我团在行军中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于 7 月 8 日到达别戈姆利西北的皮扬内列斯村附近。第 45 团在左翼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之间保持着目视联络，但后来两条路分开了。很快，从友邻方向传来了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于是，我决定到左边的一个不大的高地上去，察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新通信员谢苗喊了一声：“跟我来！”就骑上马飞驰而去。

我们走了约 2 公里，还是看不到左邻。一片树林将两个团的行军路线隔开，并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返回。就在这一瞬间，林边响起了一排枪声，枪声接二连三地越打越紧。我的马一头冲进灌木丛。忽然间听到谢苗叫了一声。我的马就驮着我飞奔越过灌木丛，回到我团 4 连。应该去救通信员。于是我带着全连朝敌人冲去。冲击异常神速，敌人尚未来得及把谢苗带走，在地上丢下两具尸体就仓惶逃窜了。谢苗被两颗子弹打伤，他那西伯利亚纯种马也被当场打死。

尽管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我团的散兵线仍协同一致地向前推进。由于进攻部队的突击异常迅猛，使得敌人的炮兵显然未能来得及变更表尺。刹那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敌人坚持不住。开始仓惶退却。

这时，营长多梅罗夫斯基的通信员骑马奔来，向我报告说，骑兵第 5 团正向这里突破。

团长基巴兹耶同志向我团致意，并要求我团从正面加紧向敌人进攻。

这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红军第 43 团巧妙地追击敌人。敌人已不是后撤，而是溃逃，在扎博里耶村附近的树林边上，敌人将 3 门火炮直接丢弃在发射阵地上。

波兰白军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到失败后，开始不停顿地往后撤，竭力摆脱苏维埃军队的追击。波兰的法西斯独裁者毕苏斯基感到其冒险政策即将破产，于是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求援。毕苏斯基的请求立即得到协约国首脑的响应。后者于 7 月 11 日向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红军的进攻，并要挟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协约国将向波兰军队提供一切援助。

7月17日，苏联政府拒绝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并声明：如果波兰政府愿意求和，那么，就让它自己向苏联政府提出类似建议！

当时的形势对坚持穷兵黩武主义的毕苏斯基元帅十分不利。在他的军队的后方，劳动人民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日益加强。根据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倡议，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E·捷尔任斯基、E·科恩和E·马赫列夫斯基等同志组成。

委员会着手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进行革命改造工作。在比亚威斯托克的波兰工人，组建了一个志愿团。但是，由于受到其盟国的鼓励，毕苏斯基仍顽固地坚持其冒险政策。协约国首脑在接到苏联政府对其最后通牒作出的断然答复后，开始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波兰加紧提供财政、武器和装备援助。协约国的傀儡弗兰格尔男爵在克里木也蠢蠢欲动。在此期间，魏刚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抵达华沙。波兰军队在战线北部地段退过布格河和纳雷夫河，同时，将其基本兵力部署在卢布林地域准备实施反突击。对这一情况，我方面军首长还未掌握。

法国的反动政治家和军事家。——译注。

对我集团军来说，形势开始变得异常复杂。加之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指挥部在组织红军第二阶段的进攻中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们对下列因素：团、师已严重减员；后方远离前线；粮食供应几乎中断；部队人员疲惫不堪；马匹因劳累而衰竭倒毙等，都没有加以考虑。想就地采购些给养，但也毫无结果，因为去年的粮食已吃光，而新粮还未成熟。西和西南方面军本应以其主力突击华沙，但西方面军却将所属集团军派往布格河和纳雷夫河以北，去对波兰首都进行迂回；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则向利沃夫挺进。这样，两个方面军即沿离心方向进攻。而直接进攻华沙的则是实力较弱的莫济尔集群和第16集团军。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那样，它们根本无力与集结在卢布林地域的敌军对抗。

第43团受领的任务是：沿西布格河右岸实施进攻，协同第16师的部队实施冲击并夺取马尔金铁路枢纽站。我团将两个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在一个炮兵连的支援下转入进攻。敌人的抵抗很顽强。敌装甲列车向红军战士的散兵线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我军的炮兵是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的，因此对敌装甲列车无能为力。但我们还是利用了地褶作掩护，终于攻至镇边。

我突然发现，有两辆马车拉着火炮，从我后方迅速地向我接近。一个留长髯的指挥员骑马跑在最前面。他带的这半个炮兵连在距我们的散线200—300米的地方展开了战斗队形，并非常成功地对敌人的装甲列车开火射击，使得敌人的装甲列车立即驶过布格河，退到桥后。

这就成了冲击的信号。我散兵线冲进镇内。我骑马奔向我们的炮兵，找到留长胡子的那位指挥员，我想问问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队的？此时，一个炮兵正在向胡子指挥员报告，称他为旅长。这时，我也不得不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并自我介绍道：“第43团团长。”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友邻来了，这太好了！”并马上补充说：“我叫法布里齐乌斯，是旅长。”

战斗过后，在去我团预备营的途中，我看到草地上有一队急急忙忙赶路的骑兵。我骑马来到近处，以便看看这是些什么人。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法布里齐乌斯。他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作为友邻部队和冲击的参加者，介绍给自己的师长梅德韦多夫斯基。梅德韦多夫斯基让我讲讲关于攻击枢纽站的情况。因为像往常一样，扬·法布里齐乌斯对自己的战绩总是闭口不谈。我

毫不夸张地如实讲述了被我当成炮兵的法布里齐乌斯，是怎样拖来两门炮向装甲车直接瞄准射击，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的胜利。随后，我又报告说，法布里齐乌斯连马都未下，就又带领本旅战士投入冲击。在我讲话时，法布里齐斯不断地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扬·法布里齐乌斯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异常勇敢的人。1921年5月1日，在波洛茨克卫戍部队阅兵式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当时是一所军事学校的校长，胸前佩带了3枚红旗勋章。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红旗第43团当着他的面行进在阅兵式的最前面，我们高举着在西伯利亚和波兰等战场获得的革命荣誉旗帜前进。这样，波洛茨克卫戍区的所有部队，就都要向我们这面旗帜致敬。

马尔金市的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匆忙退过西布格河和纳雷夫河。

渡河前夕，我遇到了我们师的第13旅旅长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萨宗托夫。他是我在东方面军时的战友，在那里他指挥步兵第37团。这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他的旅和我们的旅一样，正在为次日清晨强渡纳雷夫河做准备。

我们边喝茶边谈话，直到深夜。我们打赌，看看我们3人谁先到达河对岸。最后决定，各人亲自带领自己的战士渡过纳雷夫河。强渡定于凌晨3时开始。

谈完话，我们一同前往第39团司令部去找多莫拉佐夫。

3时整，第37、第39和第43团出敌不意地在行进间跃

入水中。几分钟过后，我们已游到右岸。显然，波兰白军对我未进行炮火准备就发起进攻毫无准备，他们仍在酣睡之中。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惊慌逃窜。进攻如此突然，使我师未经战斗就强渡了宽阔的江河障碍。

我师随后的进攻，发展得也很顺利。看来，再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夺取华沙。但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此。由于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没有进行协同动作，致使波兰白军的突击集团，未能像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那样，受到西南方面军的攻击，从而得以转入反攻，随后轻易地在莫济尔集群的地段上突破了战线，向布列斯特和比亚威斯托克方向发展进攻，并前出至西方面军整个部队的后方。8月17日，我们接到向纳雷夫河后撤的命令。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托洛茨基应对进攻的失利负责。当时种种征候已说明，我军各部队的处境很艰难，他却置之不顾，还断言，敌人已经被击败，我军已踏上胜利的坦途。

在这一点上，明显地暴露出他的冒险主义。

在撤退过程中，经过普乌土斯克时，团政治委员伊万·普罗克希茨受了重伤。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伤及骨头。必须把他送到后方。分手时，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

第43团一边掩护旅的主力，一边从普乌土斯克向维什库夫市撤退。该市是公路的重要枢纽。不出所料，该市已被从南面来的敌人占领。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白军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我团。当我们确信，敌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对付我团之后，我们决定不去攻打维什库夫。我们只以战斗警戒部队对敌人进行象征性的射击，全团则缓慢地摆开似乎准备冲击的架势，足足用去几个小时。当我估计我们旅的主力已完全脱离敌人后，就率领部队陡然向北挺进。此时天色渐暗，全团向东运动一路通行无阻。这天晚上，我们只好在林中过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线就显得更短了。当朝霞出现在天际时，我们继续向东进发，期望尽快摆脱被合围的危险。但是到了第三天，我们发觉，敌人正追踪而来。快到乌多辛村时，据侦察队报告，敌人已截断我军退路，并在该居民点北面的林边占领防御。在我后方还有波兰白军追击。我们被合围了。由于后方有敌人迫近，我团已无法展开，并投入攻击。在这种时刻，我这个刚刚年满20岁的团长，在前天才将负伤的政委送往后方，就必须一个人作出关系到许多人生命的决定。

敌我兵力相异常悬殊。拖延时间则有利于敌人，犹豫不决将把托付给我的这批人马带上绝路。我信赖我们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他们将会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但这不是出路。

我们最终将被消灭。我决定铤而走险。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挥员集合到一块儿，向他们宣布了我的计划。我将带领2名通信员去敌人那边，就说我们要投降。我团的各连由连长带领，枪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们后面。在我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时，各分队应尽量靠近敌人。当我挥动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时，各分队应立刻高喊“乌拉！”

投入冲击。

这个计划是十分冒险的。等到把这个计划通知到每个战士之后，我带着2名通信员已走出小树林。两个通信员打着白旗，高高地举地头上，我挥动着帽子。走了约一百米，我回过头去，看到战士们不成任何队形，三、五成群地走着。指挥员走在前面。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担心敌人会因距离远而开火。因此，我们向前急赶了300来米，以便让敌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

当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孤注一掷时，我的心境是难以形容的。如果计划破产，敌人是不会宽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

我们已来到敌人面前大约20步远的地方。从灌木林和庄稼的后面，有数十支步枪的枪口指向我们。有两名波兰军官迎面从掩蔽处走出来。我停下后，对他们喊道：“先生们，我投降！”并将手枪扔到地上。通信员也开始从肩取下步枪。（当然，我们还有武器：在我的马鞍右边的皮囊里有一支手枪，左边的皮囊里有两枚英国式手榴弹，通信员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弹。）

敌人的军官看到我把手枪扔到地上，决定向我们走近些。看来，暂时一切都还顺利。其中一个用纯正的俄国话问我是什么人。我的回答正确无误：第43团团长。我决定讲真话，因为我怀疑敌人可能已知道，他们要碰到的是哪个部队。

那个军官又问，为什么向前走来的士兵还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说：“为什么要把枪扔到田地里呢？让他们走过来把枪叠放好不是更好吗。”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人。我看到各连已不是成帮结伙，而接近于排成战斗队形在行进了。他们离还有300—400步的距离了。

敌人的这两个军官看到这种队形，都紧张起来。一再要我向士兵们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对他们一笑，说道：“怎么？先生们，害怕了吗？你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步枪处于战斗状态，让他们走近些，我就下令。”我看到，敌人的军官们神经已高度紧张，因为红军战士离我只剩150—200步的距离。我就对军官们说：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军帽，喊道：“放下武器！”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红军战士尽管很疲劳，但他们勇猛地向前冲刺，就是运动员看到这个情景也会羡慕。而当时的

战斗队形，也并非每次校阅时都能做到这样合乎要求。

军官们掉头就跑，士兵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逃窜。当时的场面实在激动人心。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冲出了合围。

在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到布罗克镇的公路上，我们与第 44 团会合了。我从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处得知：他与旅和师的联系都中断了，而半小时前，他从第 45 团团长沙尔尼雪夫处得到消息说，第 45 团正从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向东撤退。据他掌握的情报，敌人已经在我后方占领了扎姆布鲁夫公路枢纽和奇若夫火车站。这样我们两个团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们已经处于战役合围之中。当然，目前敌人还未向我们逼近。

我们在布罗克镇和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之间的树林中，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首先决定选出一个总指挥员。当时决定把指挥这两个团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拟定了一个突围计划。我们的突围路线是由西向东，其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华沙铁路，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扎姆布鲁夫——维什库夫公路干线，在一个 15—20 公里宽的地带内。我们认为，在这地带内，敌人不可能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钟，只能使合围圈缩得更紧。必须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尽快地传达给部队。

我们不想与敌人纠缠，只想尽量迂回过去。在没有道路的田野里（这里大片的庄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进，无论是人还是马匹都十分困难。特别是有一半的红军战士还赤着脚。尽管如此，在 8 月 20 日凌晨，我们还是接近了扎姆布鲁夫至奇若夫的公路。在距离公路约 2 公里的地方，两个团停下来休息。我们向公路线派出了骑兵侦察队。我站在一间草房的屋顶上注视着侦察队的行动。我生气地发现，侦察队非常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在灌木丛和树林后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贪生怕死。我对通信员彼得·索洛明喊道：“备马！”就从房顶上爬下来，跳上马朝侦察员奔去。由于侦察员的踌躇不前，我甚为恼怒，以致完成忘记了危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敌人的机枪开始哒哒地扫射，又响起了步枪的齐射声。子弹像一窝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响。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击。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阵发黑……我不愿相信我会被打死或被俘，因为马正驮着我飞奔。但是，我的马突然颤抖起来，步伐也乱了。如果马也受了伤，那一切都完。果然，过了 2、3 秒钟之后，它在急驰中倒在路上。我象马戏演员一样，从马的头部飞过，双脚落到了地上。左手像藤蔓一样晃来晃去。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远镜皮带的下面。我已跑不动了，我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队的方向走去。我口渴难忍，看到小沟里有一洼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来。这时，通信员骑着马赶到我面前。

我好不容易才爬到马上，急速地朝团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几次昏了过去。

终于来到我们的部队。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马，安置到马车上。这里不但没有医生，就连一个卫生指导员也没有。从袖子里渗出的血沾满了军服上衣和裤子。没过多久，我过去的副官伊万·纳扎尔金来到我身边，他决定

给我包扎。但是，当他们试图脱掉我的上衣时，我疼得大叫起来。这时，纳扎尔金拿来剪刀，把上衣和衬衣的袖子完全剪开。我看见了伤口，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被击碎的肱骨从伤口中露了出来。为了尽量忍住包扎时（用了好几个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头发，这样我觉得好一些。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还在后头。当马车一走动，我甚至似乎听到了伤口里的折断了的骨头在吱吱作响。我们蓄意在树林里和田野上行进，绕开居民点，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军。

我曾昏迷过去，也可能睡着了。黎明时，我们的队伍在缅热宁居民点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惊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时，在比亚威斯托克至华沙这一条用沙砾铺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却几乎完全没有来往车辆及行人。这就是说，东面公路的某个地段已被敌人截断。

我命令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们到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一下关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情况。几分钟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居民反映，该市已被敌人占领。

我身上带着一张地形图，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条经过奥索韦茨要塞向东去的道路。但是，我站不起来，无法测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时，侦察员把一个波兰公民带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军动员来搞运输的。他把自己的大车不知扔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正往家走。他是从比亚威斯托克来的，我立即问他：“现在什么人占领着比亚威斯托克？”

“波兰人。那儿正在打大仗。”农民回答后就赶路走了。

当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时，天已经亮了。路上站着几个妇女。看见我时，她们都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由于我这副模样十分可怜：青灰色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浑身沾满血污。她们告诉我，在比亚威斯托克方向，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久前还听到枪声。

我要她们给我指出那条是通向奥索维茨的路。她们都沉默不语，显然是相互间有顾虑。

但是，其中一名妇女，还是不易为人察觉地点了点头，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除了相信这个妇女之外，别无它法。于是，我命令驭手继续向前走。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听到前面有射击声。看来，经奥索维茨向东撤退到自己部队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切断了。斟酌了一下情况，我命令驭手不惜马匹疲劳，尽快赶到特科钦村和纳雷夫河上的大桥。我用受伤的手攥着手枪时，痛得难受，右手又紧抓头发。驭手甩响了鞭子抽打马匹。马车的剧烈颠簸给我带来的痛苦简直难以形容……突然，我听到护送我的侦察员们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过了一阵，骑兵侦察队长菲利普·古里亚诺夫骑马来到我跟前，他后面跟着桑尼科夫·亚库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战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相遇时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

傍晚，我们平安地到达戈尼奥兹市。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旅医院。医院的医生十分熟练地为我进行了包扎，胳膊下放了夹板，伤口也清洗干净。第二天，利用旅的运输工具把我送到了格罗德诺。

现在，撤退过了涅曼河之后，可以认为，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圈。

那是1920年在波兰土地上发生的事了。而现在，1944年7月份，我有幸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率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参加者们，来到波兰的土地上，为的是使兄弟的波兰人民摆脱希特勒的压迫。

白俄罗斯方面军左翼突击群，已经在其突破地带全线越过了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

这个行动导致了一系列最重大的历史决定的产生。

1944年7月21日，人民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波兰土地上合法地出版的第一期《大众论坛》报上（该报于7月23日在海乌姆出版）颁布了一项命令。命令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批准为该委员会委员的有：爱德瓦尔德·鲍列斯瓦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杰伊·维托斯（副主席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部长）、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批准任命米哈伊尔·罗利亚—日梅尔斯基上将为国防部长；批准任命济格蒙德·别林格将军为国防部副部长。波兰工人党在组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对政治时局和波兰人民所经历的事件作了评述，阐明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各项决议的意义。宣言着重指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由波兰人民的最广大阶层、农民党、以及其它各民主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它承认波兰人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波兰爱国者同盟和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宣言揭露了在伦敦的流氓政府，对其旨在分裂波兰人民的政治活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根据特别法令组建了波兰军队。编入波兰军队的有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柳多夫的队伍。前者曾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编成内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后者联合了波兰领土上的代表民主力量的各游击部队。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我们迅猛地发展进攻。政治形势和波兰人民的利益迫使我们这样做。

7月21日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H·H·罗科索夫斯基来到我们的指挥所。他费了一些周折才到达这里，因为集团军指挥所在这段时间内已向前推进了很远。

听取了有关进攻的发展过程的汇报后，元帅肯定了近卫军人的出色行动，并当即决定马上将坦克第2集团军投入突破口。该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向卢布林、登布林、普拉加（华沙近郊）方向挺进，以便迂回敌军集团，并切断敌向西撤退之路。

为了将坦克渡过河去，架设了3座60吨的大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架设了两座30吨和两座16吨的桥梁）。尽管道路拥挤，但是架设舟桥的纵列还是尾随战斗部队向前推进，从而使舟桥得以迅速地架设起来。

当我步兵部队继续战斗、向西挺进时，坦克部队渡过了西布格河，并于7月22日晨赶过我步兵部队，急速地驶向卢布林。我紧紧握住容光焕发的C·A·波格丹诺夫的手，祝成功并保证，第8集团军的步兵决不落在坦克兵后面。次日，坦克第2集团军与近卫步兵第28军一起，包围了卢布林市，并与该城守备部队展开战斗。

7月23日，我到达被围城市的郊区，从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处得知，波格丹诺夫负了伤。他乘装甲输送车随坦克向城市北郊行进时，被德国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他的肱骨被击碎。

波格丹诺夫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他的个性是：“必须亲眼看到一切，直接地在战场上指挥部队，而不是在深远后方。

我不责备波格丹诺夫。一个指挥员，只有摸到战斗的脉搏，才能正确

地判断情况，特别是在高度机动性的现代战争中，尤其是这样。诚然，有时也要冒险，但这样做却保全了更多战士的生命，从而使牺牲得到补偿，使成功所付出的鲜血要少些。应该考虑到指挥员在战斗中行动的巨大精神意义。在最紧张的时刻，如果战士们看到指挥员就在身旁，就会充满必胜的信念。战士们爱戴这样的指挥员，准备以自己的胸膛掩护他，并会跟他赴汤蹈火。因为，战士们看到：指挥员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我在卢布林北部的集团军医院里找到了谢苗·伊里奇。

当时正准备把他送往后方。我问：

“谢苗，感觉怎么样？”

他忍着巨痛，开心地回答道：

“不要紧，瓦夏。不久我就会回来的。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打柏林！”

瓦夏是崔可夫的爱称。——译注。

两个月后，他果真回来了，我们又共同向奥得河、尔后向柏林前进。

……我现在来谈谈那些讲起来令人心沉重的事。我原以为，关于法西斯罪恶行径再没有任何事情比我所见过的更能够使我惊讶的了！因为我见过的事不算少了：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乌克兰的被烧毁和被破坏的城市和村庄；德国士兵被投入这场毫无理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还有什么比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可怕的呢？而事实证明，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我们的部队在卢布林东南郊解放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囚犯。

现在，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马伊达内克”这个词。而当时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这个名字早在纽伦堡公开审判法西斯罪犯之前还没有轰动全世界。死亡集中营……不是集中营，而是杀人的工厂！它是用现代化的工程技术装备组建起来的。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个工厂在杀人方面达到极精巧的程度。现在在很多文献中均已详细地记述了所有的细节，我就不再重复这些。但是，坦率地说，当别人把集中营的情况告诉我，当我看到我们的军官拍摄的照片后，我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我的心在震颤。

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焚尸炉中被烧成灰烬。几百万啊！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他们把人挂在钩子上活活吊死，用棍棒打死，用毒气熏死……

当苏联军人将要进入德国领土时，听到看到这些法西斯罪行，又怎能束缚他们的手脚呢？

的确，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变得异常复杂。他们需要大量的工作，进行劝导、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战士的家庭成员被杀光，有些人可能就在这些焚尸炉里被焚烧，这又如何对他们作解释，又如何进行工作呢？我们担心：从现在开始，谁也不会抓活的俘虏了……

但是，真正的勇士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愤怒，精神上的强者不是单纯地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

解放马伊达内克后的第二天，一个被俘的德国军官被带到我这里。他是被近卫步兵第88师一个机枪班长尤希姆·列梅纽克上士俘虏的。

这个军人有着很不平常的遭遇。

1941 年，战争刚爆发，尤希姆就上了前线。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他在伏尔加河地区作过战。参加过多次战斗。从列兵成长为上士。因作战英勇曾 4 次荣获政府的最高奖赏：红星勋章、荣誉勋章、“勇敢”奖章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

在战斗间隙休息时，他常常对战友们说：

“快到我家乡啦，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去作客。我家里有妻子娅琳卡、女儿奥克桑娜，父母也在。我们那里景色可美啦，有养蜂场、树林，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原野。”

结果，尤希姆所服役的部队果真来到他的家乡。连队开始了夺取村庄的战斗。尤希姆第一个冲入村内，直奔自己的庭院。可是庭院已不复存在，农舍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果园已被烧光，只有一棵老苹果树还留在那儿，父亲被吊死在树上，母亲也被打死在树旁。

一个躲在地窖里侥幸生存下来的女邻居告诉他，他的妻子娅琳卡和女儿奥克桑娜被法西斯分子带走了。

战士们得知尤希姆的不幸后，发誓要为他全家报仇。从那天起，尤希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严酷无情，甚至不能听到“法西斯”这个词。

而现在这位战士却带来一个俘虏，还是活着，不过连用个指头碰他一下也没有。……

强渡布格河和解放卢布林标志着战役第一阶段的结束。

这次战役开始于 7 月 18 日。在 6 天之内，近卫第 8 集团军边战斗边推进了约 180 公里，强渡了西布格河、维普希河，并于 7 月 24 日清晨前，前出至帕尔切夫、菲尔列伊、克缅卡、彼得罗夫察、斯塔辛、格卢斯克、皮亚斯基一线。

近卫步兵第 4 军的先遣部队，紧随坦克第 2 集团军之后进攻，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并夺取了普瓦维和登布林。

近卫步兵第 28 军在卢布林周围占领了防御。

我军的友邻部队也顺利地向前推进：第 47 集团军已前出至洛马济、科马鲁夫卡、沃亨一线；第 69 集团军解放了赫尔姆市。

近卫第 8 集团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在已占领的地区内停留了一昼夜，任务是让炮兵和后勤部队跟上来，并补充油料和弹药储备。

由于坦克第 2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德军“中央”集团军和“北乌克兰”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和协同动作都被破坏了。

在北部的我友邻部队的行动，坦克第 11 军和近卫骑兵第 2 军占领了帕尔切夫和拉德曾两地，使敌军布列斯特集团的作战态势急剧地恶化。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是：强渡维斯瓦河。

马格努舍夫登陆场

在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已前出至维斯瓦河的那些日子里，我军已完成了对敌布列斯特集团的合围。

布列斯特有丢失的可能使德军统帅部深感不安。布列斯特丢失意味着我军将进入华沙，并从南面迂回东普鲁士。于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阻止我军在布列斯特附近发展进攻。为此，它将第 2、第 9 野战集团军的残部集结到该地。

为了加强华沙郊区普拉加的防御，德军也不断地向那里投入了部队。我坦克第 2 集团军则边战斗边向该地推进。

为了代替负伤的集团军司令员波格丹诺夫，坦克第 2 集团军由坦克兵少将 A·A·拉济耶夫斯基临时指挥。

这样，一方面是我坦克第 2 集团军实施决定性的进攻，波兰第 1 集团军进入了交战；另一方面是敌人在布列斯特以北和西北进行反冲击，愈益出现一种危险情况，即德军统帅部将把被割裂的“中央”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合并为一体。

方央军首长面对这种情况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从 7 月 24 日起，在 3 天的时间内，近卫第 8 集团军先后接到 4 道命令。

但在所有的命令中，均未提出强渡维斯瓦河的任务。

我真佩服 H·H·罗科索夫斯基的沉着和谨慎。而我们总不时地沿维斯瓦河右岸来回走动。集团军兵力已密集地集结完毕，炮兵也作好了战斗准备需要作多大的努力才能克制住自己想向左岸派出侦察队和开始强渡维斯瓦河的念头呵！

为了提防敌人从北面进行突击，集团军犹如马被套上缰绳，不令其走动。但是，我明白，我们迟早是要强渡维斯瓦河的。当然，还是越早越好。

我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 7 月 27 日，大本营才发出训令，命令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左翼的部队，在登布林、兹沃连、索列茨地域强渡维斯瓦河。

根据命令，已夺取的登陆场将用作在西北方面进行突击的立足地，以便沿纳雷夫河和维斯瓦河卷击敌人的防御，从而策应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强渡纳雷夫河、策应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各中央集团军强渡维斯瓦河。

我对地图研究了地形之后，得出结论：必须在塔塔尔奇斯科、斯库尔恰、达米鲁夫、多马舍夫各民点的地域进行强渡。在这里，北面有皮利察河，南面有腊多姆卡河掩护集团军的两翼。由于两翼受到这两条河流的掩护，我军即可穿过马格努舍夫实施主要突击。当前的任务是在维斯瓦河右岸夺取一个纵深至伐尔卡——腊多姆铁路线的登陆场。

7 月 29 日晨，我与 H·H·罗科索夫斯基通了电话。他平静地听完我的建议，并批准我们前往维斯瓦河进行勘察。我立即命令近卫步兵第 4 军军长 B·A·格拉祖诺夫，在 7 月 30 日拂晓前，将警卫部队派往河岸，以保障在那里进行勘察。集团军司令部受命制定勘察方案。参加勘察的有各军长、师长以及各加强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

黎明前，近卫第 4 军的部队在塔塔尔奇斯科、维利加、马热维采地段登上了河岸。部队在行军中及在警卫地点都周密地进行了伪装。

我已记不清那天是过一个什么节日，还是波兰农民庆祝从德国占领者手下获得解放。尽管敌人就在河对岸，但是在各个村庄里，还是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化了装，打扮成欢庆节日的和平居民的模样，来到河边，以便研究一下河床和河岸。

左岸比较空旷。仔细望去，有的地方可以看到抛土的铁锹在挥舞。显然，这是在挖掘堑壕。是谁在那里干活？这很难说，可能是德国人，或者是在德寇的自动步枪枪口逼迫下受难的波兰当地居民。

敌人是否料想到，我们将强渡维斯瓦河呢？我们并没有发现敌人在进行特别积极的防御准备。沿维斯瓦河左岸延伸的一条土坝，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无法向河岸纵深观察。

也看不到敌人的强大的工事。一切情况都说明，我们将实施的突击具备了必要的突然性因素。

当场我们给各军划分了突击地段和分界线，并分配了加强兵器。各军长受命组织对左岸进行观察，查明敌人的兵力和防御工事设施。我们决定不派我方人员到左岸去，所有行动都将隐蔽地进行，绝对不能暴露在该地段内有我们的部队。

工程兵主任 B·M·特卡琴科将军接受任务负责侦察出从东面通往河边的接近地，并选择比较隐蔽的接近路。

我回到当时设在热列胡夫镇的集团军司令部之后，就将勘察结果和有关强渡维斯瓦河的个人建议，用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做了汇报。H·H·罗科索夫斯基表示同意，但没有批准强渡。他答应考虑一下，于次日给予答复。

方面军司令员终于批准了强渡，但提醒我，在第 47 集团军进入谢德列茨、斯托切克地区之前，我集团军的两个师必须在原地待命。也就是说，仍然要我们监视北面，而不是维斯瓦河对岸。为此，我只能抽出 4 个师派往第 1 梯队。7 月 31 日，我们再次进行现地勘察，因为要制定强渡的组织指挥实施计划。随我一同前往的有以 B·A·别列亚夫斯基为首的司令部的作战组。各军长、师长也来到河岸上。他们与负责炮兵和工程兵的同志一起，在现地给所属各部队明确了任务、规定了渡场、通向渡场的接近地和装载地点。

当我正在视察未来的渡口地段时，我接到通知，要我紧急地返回集团军司令部去与方面军司令员通话。我们之间通过高频电话进行了如下对话（据回忆）：

罗科索夫斯基：“你必须作好准备，大约在 3 天之后，在马采耶维采、斯坚日夏地段，开始强渡维斯瓦河，以便夺取一个登陆场。最好将强渡计划于 8 月 1 日 14 时以前简要地用密码报来。”

我：“任务明白，但请允许在维利加河口和波德韦布热地段强渡，以便在登陆场的两个翼侧有皮利察河和腊多姆卡河作屏障。我可以在明天清晨，而不是 3 天之后就开始强渡，因为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尽早开始强渡，成功的把握大。”

罗科索夫斯基：“你们缺乏炮兵和渡河器材。方面军可以给你们调拨一些，但 3 天之内做不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对强渡维斯瓦河非常重视，并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保障完成这项复杂的任务。”

我：“我明白这些。但是我首先考虑的是行动的突然性。至于加强兵器，我认为，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用现有器材也可对付过去。请允许明天早晨开始强渡。”

罗科索夫斯基：“好吧！我同意。但是，请再详细考虑权衡一下，并最后将你的简要计划报告给我。请通知各级指挥员，对在强渡维斯瓦河的战斗

中立有战功的战士和指挥员，都将进行嘉奖，直至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我：“一定照办！明天早晨开始。我立即向您报告简要的计划。”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我立即将行动计划拍发给方面军司令部：5 时至 8 时进行试射，与此同时，各师派一个营进行战斗侦察。如果行动成功，则将侦察转为进攻，就象过去在科韦耳以西突破敌人的防御时那样。如果侦察不得手（敌人不让我们登岸，或登岸后无法在右岸发展战果），则安排间歇一个小时，以查明目标，并协调各方面的协同动作。此时，强击航空兵对敌前沿进行轰炸。9 时，开始炮火准备，全部兵力开始渡河。

重复使用由战斗侦察转为主力进攻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会不会成为一种危险的老模式？这一次敌人会不会预料到我们的意图？

我十分认真地对德军进行了分析，我懂得，敌人有可能已猜到我们会使用这种方法。那又怎么样呢？即使这个方法已被看穿，要采取某些对抗措施也并非轻而易举。有些战术方法是可以连续使用的。假设敌人已猜中我们的战斗侦察将转入全面进攻，它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在各种武器上均占有优势……。我们各侦察队发起冲击后，敌人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放弃前面的几道堑壕后撤？那太好了。我们消耗少量的炮弹即可占领敌人前面的几道堑壕，并立即以集团军主力加强各侦察队，进而可以用较小的损失摧毁敌人的第 1 道防御阵地。如果敌人与我侦察队进行战斗。这也是我们需要的。敌人要是在第 1 阵地的各堑壕内顽抗，我们将对它实施精密的炮火准备。我们把敌人钳制在原地，以全部兵力实施榔头般的狠狠突击。

敌人同样也将被击出阵地……

是的，这次也没有理由放弃使用这种方法。就是在这里，在维斯瓦河两岸，我们的战士把这种方法称为“侦察梯队”。

从傍晚开始至深夜，我们变更了部署，运送了渡河器材。虽然准备时间非常有限，部队还是在清晨 4 时以前占领了出发位置。

在这里，我们集团军使用的炮兵在科韦耳以西的进攻战斗中要少一半，因为炮兵第 4 突破军已调离集团军编成。但是，我们打算采用大量集中使用火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办法来解决。我把师属炮兵的大部、团属炮兵的全部、近卫加农炮兵第 43 旅的部分 152 毫米加农榴弹炮以及 3 个自行火炮团都部署在右岸，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我们已掌握的渡岸器材有：83 辆水陆两用汽车，约 300 艘各类船只和汽艇，总计可运载 3,700 人。

我就不说舟桥纵列了：它们少得可怜，甚至无法在维斯瓦河上架设一座桥。但这并没有难住我们。我们将全部希望寄托在突击的迅猛和突然性上。

2

战前之夜……这在近卫第 8 集团军指战员的生活中算是第几个这样的夜晚呢？7 月的夜晚是温暖的，甚至有些闷热……在我方的河岸上，万籁俱寂。紧张的工作虽看不见、但却正在完成。不仅仅是军队的某些最后的调动 - 而且每一个将在明天参战的人，也都在进行着思想准备。使自己做好突击的准备……。虽然大家都已身经百战，但每一次又都似乎是重新开始。

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分别前往各观察所。政治工作人员从傍晚起就下到部队里。分别召开简短的党的和共青团的会议。这些会议不拘形式，大家促膝谈心。对明天的战斗和横渡维斯瓦河的意义。每个人都是清楚的。但是，在战斗之前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完全是一些个人问题。政治工作人员就

在现场做好工作。军人们写入党申请书。应该在战斗开始之前，赶紧履行完入党手续……8月1日的早晨就要来临了。

维斯瓦河的河水静静地奔流着。乳白色的雾气弥漫在河面上和河湾里。几棵苍劲的松树在无风的、森严的寂静中巍然屹立。表针慢慢地指向那多少人都在期待着时刻。电话联络停止了，无线电通讯也中断了。开始时，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冲在各营前面的，是由一些有经验的侦察员组成的侦察小组。瓦西里·格拉夫奇科夫大尉指挥的近卫第79师的侦察员们应该在最前面第一批渡过河去。这个军官酷爱他那危险而又艰苦的职业，并有丰富的经验。他多次与战友们一起进行夜间搜索、抓“舌头”，搞到不少有关敌人的重要情报。他是斯大林格勒人。

但是，此次侦察却不同往常。展现在前面的是一片宽阔的水面，远处，敌人占领的河岸象一片灰色的细带。河对岸的情况怎么样？敌人兵力有多大？敌人准备如何迎击我们？

……一条条渔船趁黎明前的黑暗驶离了河岸。格拉夫奇科夫身先士卒在第1条船上。与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一些忠实可靠、经过战火考验的同志们。侦察员们划到对岸，就跑步冲向敌人的堑壕。希特勒匪徒的机枪开了火。但并未能阻止苏联军人前进。格拉夫奇科夫跑到一个土木发射点旁边，接连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其他战士也及时赶到，用自动枪和手榴弹把敌人两挺机枪和机枪手消灭了。侦察员们迅速地消灭了堑壕里的敌人。

“堑壕已被我们占领！”侦察员们用无线电报告。

在另一个地段，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杜纳耶夫大尉指挥的侦察员们第一批登上左岸。

据守在岸边堑壕内的希特勒匪徒拼命抵抗。但是，由于进行了巧妙的机动，侦察员们无一伤亡就突破了敌的防御。

各步兵分队跟随侦察员们之后渡河，有时也与他们一起同时渡河。在炮火的轰隆声中，几百艘船只满载着部队向左岸急驶。当E·I·齐托夫斯基大尉那个营的近卫军战士沿浅滩徒步涉时，德军观察员发现了他们。敌人的机枪开始扫射起来。炮弹爆炸掀起的水柱和淤泥，挡住了我们的战士们前进的道路。全营战士快步跃进接近敌人的阵地。这时齐托夫斯基发现，在一个长满柳丛的小土丘后面，敌人的一挺机枪正在射击。大尉带领近卫军战士朝着那机枪运动，几个战士从翼侧接近土丘，将敌人消灭，近卫军人冲入堑壕，将敌人逐出堑壕，片刻也不停留，就又向前推进了。

夺取小马格努什村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全营冲至村边时，希特勒匪徒进行了反冲击。

近卫军人卧倒在地准备反击。共青团员戈留诺夫带一挺机枪向前爬去。当希特勒匪徒接近时，戈留诺夫从翼侧向敌人打了一个长点射，全营一跃而起，协同一致进行突击，将敌人击退。

希特勒匪徒在随后的反冲击中使用了坦克。但是，齐托夫斯基及时地布置了反坦克枪手。当敌坦克刚一接近我阵地时，反坦克枪就开火了。反坦克枪手以准确的火力击毁了敌人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掉头就跑。

在这次战斗中，该营战功卓著的18名官兵被授予红旗勋章，据集团军首长的提名，营长近卫大尉叶菲姆·格里戈里耶维奇·齐托夫斯基根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敌人从受到突如其来的突击中恢复了元气之后，当天下午就转入反冲击，并投入了航空兵。但是，此时，我第1梯队各师已经占领河对岸。

经过8月1日的战斗，我军已经在河对岸夺取了正面达10公里、纵深5公里的一个登陆场。

8月2日和3日，我们继续扩大登陆场，将部队和加强兵器运送到登陆场。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架设桥梁的事很不顺利，桥刚刚架好，敌机马上就将其炸毁。

尽管如此，登陆场还是保住了，并且不断地扩大。各军军长受命在维斯瓦河左岸为自己构筑指挥所。

我们吃尽了敌航空兵的苦头。敌机无休止地攻击我渡河部队。由于敌人该地段的步兵不多，所以它就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航空兵。与此同时，敌人也向我军占领的登陆场调集预备队。法西斯的飞机成中队或以单机作超低空飞行。从树林后方突入至渡口，并投下集束小型炸弹。数十艘舟艇被炸坏。但是，我们的战士迅速将其修复，并重新投入水中使用。

高射炮部队战斗得很英勇。但是，仅靠集团军所属的一个高射炮兵团，要在25公里长的战线上掩护我军的阵地，能够胜任这样艰巨的任务吗？！后来，一个波兰高射炮兵师赶来增援我们。可是，战线在扩大，从空中进行掩护变得更加复杂。歼击航空兵无法帮助我们，因为它们要全力投入华沙附近的战斗，那里的战斗更为激烈。况且，飞机又缺乏汽油。在战争中，任何时候所有供给都十分充足，这种情况是没有的，特别是当战役接近结束，部队经过激烈的连续战斗，已经行进了500—600公里之后，情况尤其是这样。但是，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些困难。其它一些问题的解决更为复杂。

我已提到，集团军一直对北方保持着戒备，提防来自该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威胁。因此，集团军所属的3个师仍留在了右岸原来的阵地上。8月3日，正值登陆场上的战斗最炽烈的时候，集团军接到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下面是该命令的全文：

“在范格罗夫、斯坦尼斯拉夫（不含）、沃洛任战线有敌人的4个坦克师：党卫军‘北欧海盗’坦克师、‘人面蛾’坦克师、坦克第19师和在普拉加以东和东南地域的‘赫尔曼·戈林’坦克师。

敌坦克师企图向南突破的可能性并未排除。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突破的地段应认为是：卡鲁申、明斯克——马佐韦茨基。

第47集团军以全部兵力从特谢布卡、维斯涅夫、乌亚兹楚夫、扎列西耶地区向北进攻。

坦克第2集团军以2个坦克军的兵力在奥库涅夫、缅德济列西耶地区进行战斗，以1个坦克军占领拉德兹茨明、马尔基、奥谢乌夫、沃洛任地域。

为了扩大第47集团军的各战斗队形的纵深，我命令：

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应抽调1个步兵军（3个步兵师）

进行防御，这个步兵军至少要以炮兵第6师的3个旅予以加强，任务是在1944年8月4日清晨前，以两个师的兵力在图尔基、奥谢茨克一线占领防御，并保留1个师在比利亚瓦地域军的第2梯队内。”

接到这个命令后，我十分为难。一方面，应该发展维斯瓦河左岸的进攻，并扩大登陆场，在那里我们已经投入了6个步兵师。另一方面，又要求调转3个师，正面向北，并在距渡口30—40公里处进行防御。这项命令削弱了集团军在已占领的登陆场的兵力，并使我们陷入被动地位。

老实说，我真感到困惑莫解：敌人怎会有这样高的进攻积极性，在维斯瓦河以东它从什么地方调来那么多的兵力呢？在这个地域集结如此强大的坦克集团，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由于敌人在短期内已丢失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的大片土地，并遭到惨重的失败，我认为，它甚至不能考虑什么反攻或向南实施什么反突击。但是，方面军司令部的不安，想必是有根据的。因此，我们只好尽力执行命令。事实上，我们还是设法说服了方面军司令部，同意又将 1 个师（近卫第 47 师）派往登陆场，其它 2 个师则在加尔沃林以北占领防御。

事先曾告诫过我们，敌坦克部队可能出现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战线前面，没多久果真出现了，但不是在维斯瓦河右岸，而是在左岸。

一场恶战开始了。除了 2 个坦克师之外，德军又向我军登陆场投入了第 17 和第 45 步兵师。而我们在这几天向左岸派去的只有近卫坦克第 11 旅和 3 个非满员的自行火炮团。我们的 2 个近卫师根据方面军的命令正在准备正面向北的防御。

近卫第 8 集团军强渡过维斯瓦河，并在马格努舍夫地域夺取了登陆场，从南面对敌军整个华沙集团形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迫使德军将主力投入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战斗。

兵力上的优势，特别是坦克数量上的优势，目前是在敌人方面。敌人竭尽全力，力图将我赶入河中。由于我们没有桥梁渡河，这就使登陆场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敌人的航空兵在斯库尔恰村地域显然负有专门任务，即不让我们架起桥来。它们不断地在我舟桥兵的头顶上盘旋。8 月 5 日傍晚，我们终于架起了一座桥，并开始让炮兵和弹药通过桥梁。但是敌航空兵又将其炸毁，该桥只存在了大约两个小时。守卫渡口的波兰高射炮兵师奋不顾身地顽强战斗，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希特勒匪徒的反冲击不断加强。敌坦克第 19 师沿皮利察河实施突击，“赫尔曼·戈林”坦克师沿腊多姆卡河实施突击。

在它们之间进攻的是敌步兵第 17 和第 45 师。敌人一浪接一浪地发动反冲击。刚被我击退一次，另一次又接踵而来，仿佛要无休止地搞下去。在近卫步兵第 4 军的地段内，情况非常严重。该军的部队在“赫尔曼·戈林”坦克师和步兵第 45 师的突击下，被迫数次后退。

两个居民点（霍德库夫和斯图德江基）曾反复易手数次。

8 月 5 日傍晚，我们成功地将近卫步兵第 47 师的 3 个团运送到登陆场。他们与坦克旅一起，阻击敌人的坦克。

夜晚，集团军指挥所也迁到左岸马格努舍夫西南的一片树林里。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下到各连、营去，组织打敌人的坦克，因为敌人反冲击的主要突击兵力是坦克。他们向全体战士们说明，必须坚持住，首先要将“赫尔曼·戈林”坦克师消灭。我们的战士对这个名字深恶痛绝。掩体中出现了战士们手写的标语：“消灭大肚子赫尔曼·戈林的坦克！”战斗于清晨又激烈起来了。

近卫步兵第 47 师所属几个团刚一占领自己的阵地，敌人的坦克就向他们猛冲过来。有 19 辆坦克从翼侧向步兵阵地开来。阵地上配置着上士德米特里·扎罗夫精心伪装的反坦克炮。炮手让坦克驶到 300 米的距离上才开了火，第一发炮弹就击毁了 1 辆坦克。法西斯匪徒将坦克展开，企图从另一面进行迂回。瞄准手察连·卡斯帕良利用这个机会射出两发炮弹，又 1 辆重型

坦克瘫痪在地。而一分钟之后，第3辆坦克也燃起大火。法西斯匪徒企图以正面突击突破我阵地，但我军炮兵毫不动摇。他们又击毁敌人的两辆坦克。

瞄准手卡斯帕良、装填手库岑科和发射手马申金在战斗中负伤，但是他们都没有离开火炮。

步兵也勇敢地对敌人的坦克进行了战斗。当敌坦克冲到堑壕前面时，反坦克手亚历山大·祖耶夫对战友们说：

“没什么了不起！敌人厉害，我们比它更厉害！”

冲上来的坦克有8辆。坦克后面跟着自动枪手。近卫军人并不急于开火，因为他们想准确地打击敌人。当距离坦克只剩100米时，反坦克枪、机枪、自动枪、步枪同时一齐射击，猛烈的炮火排山倒海地向敌人倾泄而去。

亚历山大·祖耶夫仔细地瞄准后进行了射击。弹头击中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坦克现在已无法进行圆周射击。祖耶夫的第2发枪弹击中汽油箱，敌坦克燃起大火。希特勒匪徒钻出舱口，但是，自动枪手以准确的火力追踪射击，把他们消灭了。

祖耶夫用同样巧妙的打法，干掉了第2辆坦克。反坦克手的第1发枪弹击中了敌坦克的前甲板，坦克继续朝勇敢的反坦克手冲过来。祖耶夫把枪从胸墙上拿下来，并隐蔽在堑壕底部。当坦克刚一轧过堑壕，他跃起身来，开了一枪，然后跑到预备阵地上。坦克转身回来，重又向堑壕轧去。就在这一时刻，无畏的近卫军战士又从预备阵地上向敌坦克射出了第3发枪弹，将其击毁。祖耶夫身边的战友打得也很准。敌人溃退了。在燃烧着的几辆坦克旁边，留下了几十具希特勒匪徒的尸体。

在近卫步兵第79师所属的近卫步兵第220团的防御地

段内，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中尉弗拉基米尔·特里福诺维奇·布尔巴指挥的步兵连，在黑麦地里占领了防御。在战斗过程中，他得知这是师的最重要的防御地段，因为敌人在这里实施主要突击。

连长共产党员布尔巴巧妙的组织了防御。他指挥战士们用手榴弹和反坦克枪打敌人坦克，用步枪和机枪打敌坦克的瞭望孔，使敌坦克驾驶员无法进观察。

希特勒匪徒接连发起6次冲击，但都未能突破近卫军人防守的地区。

敌人的第7次冲击开始了。坦克紧密地驶到我步兵阵地的前面。中尉连长迎面冲向先头的坦克，并用集束手榴弹将其炸毁。但紧接着又冲上来第2辆坦克。布尔巴看到没有其它方法可以阻止敌人，就提起第2捆集束手榴弹，冲到敌坦克跟前，并将其炸毁。

这个共产党员军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忠实地执行军人誓言。他视死如归，以生命为代价，阻止了敌人前进。近卫军人在连长的不朽功勋的鼓舞下，誓死坚守阵地。没有一个人贪生怕死，每个人只有一个念头：坚守住阵地，战胜敌人，为自己心爱的指挥员报仇。列兵彼得·赫柳斯金是个个头不高的18岁小伙子。他谦逊而沉默寡言，家住斯摩棱斯克。当敌人的坦克开到他的面前，他从燃烧着的黑麦地里跳出，手里提着两捆集束手榴弹向装甲的庞然大物猛扑过去。他把第1捆集束手榴弹扔到坦克车体侧部。而敌人从坦克射出的一排机枪弹击中了英雄的胸膛。他倒下去的时候，又将第2捆集束手榴弹扔到敌坦克的履带下。坦克被炸得动弹不得了。

连长弗拉基米尔·布尔巴和战士彼得·赫柳斯金的功绩当天就传遍了整个集团军。后来他们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8月6日那天的战斗更为激烈。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格拉祖诺夫向来不把困难放在眼里，而那天却打电话给我：

“司令员同志！怎么也不能阻止住敌人的坦克，请给予支援……”

我们派去了增援部队。到中午时，我们成功地将一个约斯 重型坦克团和一个波兰坦克旅派往了登陆场。他们立即投入了战斗。

约斯重型坦克是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的坦克。——译注

我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回忆起那些与苏联军并肩地勇敢作战的波兰战友。早在强渡维斯瓦河之前，他们就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援，他们把我们守卫卢布林的一个步兵军替换了下来。我在前面已提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是波兰的高射炮兵调到了维斯瓦河。当时波兰高射炮兵师是由师长普罗科波维奇上校指挥，参谋长是索科洛夫斯基少校。这个师奋不顾身地掩护了我军横渡维斯瓦河。波兰高射炮兵冒着机枪扫射和轰炸，与敌航空兵进行了艰苦的搏斗。

在强渡维斯瓦河和扩大马格努舍夫登陆场的战斗中，由柳班斯基上校指挥的波兰工兵第1旅也起了卓越的作用。该旅的政治副旅长是泽利金斯基中校。工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航空兵的轰炸，两昼夜内在维斯瓦河上架设了900米的桥梁。虽然这座桥只存在两个小时，但是却从桥上运过去大量重要的物资。

正当在登陆场上进行激战时，由B·梅日灿将军指挥的波兰坦克旅抵达河边。坦克旅冒着敌机不间断的轰炸，经过几昼夜，才能过门桥渡河至左岸。波兰坦克兵特别勇敢，不管轰炸多么猛烈，他们一直留在门桥上。门桥被炸毁了，坦克兵们又去寻找其它渡河器材。不久他们就报告说，在登布林附近找到一条完好的驳船，一次可装载8—10辆坦克。夜里，驳船被弄到普舍武兹、塔尔诺夫斯基地域，于是，又继续将坦克运过河去。

运过河的坦克都集结在马格努舍夫附近。旅长即刻在这里组织了坚固的防御。法西斯军队头一次企图在这个方向上突破我防线，进至维斯瓦河便遭到失败。所有冲击均被击退，敌人伤亡惨重。

在连卡维察·特舍边地段作战的波军坦克兵表现得非常勇敢。战斗炽烈时，梅日灿将军也乘坦克加入了战斗行列……交战整日未停。整个战场堆满了燃烧着的德军坦克。敌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以楔入我防御阵地，但已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奥格洛布林中校的重坦克团和科布林上校的炮兵部队赶来增援波兰坦克部队。在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于夜间将敌击退。战场上留下了大量敌军尸体和近40辆坦克和装甲车。

此次战斗，波兰坦克旅的100多名坦克兵就在战场上荣获了苏联勋章和奖章。我记得在获奖的战士中，有第212号坦克的乘员：车长帕夫利茨基少尉、驾驶员雅科夫连科、军士列维克、列兵扎布尼茨基和斯维扬杰克。这5名勇敢的军人驾驶着战车数次进行侦察，用履带轧毁两个炮兵连的发射阵地，击毁3辆德军坦克。

旅长梅日灿将军，参谋长波利休克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根据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申请，被授予苏联政府的最高奖赏。为保卫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在其右翼战斗的波兰军队步兵第3师的军人们也非常勇敢。该师由斯坦尼斯瓦夫·加利茨基上校指挥。我在登陆场曾几次遇见他。这是一个既勇敢又勤

于思考的指挥员。他们承担的任务异常艰巨。

他们防御的扎列斯基、扎格舍夫地段，不知何故竟受到法西斯航空兵的特别“重视”。

“容克”飞机无休止地向着该师各团的战斗队形俯冲。仅一个早晨，就出动了400多架次。

在航空兵密集突击之后，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开始进攻。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很多波兰同志。但是，该师巍然不动，坚守了阵地，并打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当维斯瓦河对岸的形势稍有好转，波军步兵第3师和坦克第1旅就被调离登陆场，准备参加华沙附近的进攻战役。我们隆重地欢送了他们。我们的友谊是在同一战场上用鲜血凝成的。这种友谊将万世长存！

在争夺登陆场的战斗中，我每隔2—3小时即向方面军司令部汇报一次。方面军首长密切注视着战斗进程。

B·B·科尔帕克奇中将指挥的第69集团军，与我们一样，也在行进间渡过了维斯瓦河，并在登布林以西和普瓦维地区夺占了一个登陆场。

又配置给我们3个高射炮兵师，我们将这些部队用于掩护渡口。留在维斯瓦河右岸进行防御的两个师，也终于返回集团军，因为方面军准许将其撤离，并被派往登陆场。

新调到的高射炮师刚一占领发射阵地，敌航空兵便中止了对各渡口的袭击。从集团军指挥所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批批以九架为编队的轰炸机和以2架为编队的歼击机力图突破我高炮拦截火力。但是，由于在航线上遇到了密集的炮火，它们只得飞离。这是8月7日晚的情况，而到翌日凌晨，我工程兵部队在维斯瓦河上架设了两座桥，我军的新锐力量（炮兵、坦克、步兵部队）就如潮水般大批涌向登陆场。坦克第2集团军的1个坦克军也投入了登陆场。

敌人多次发动的新的反冲击都被我军坚决击退。8月10日，敌人将新调来的坦克第25师投入交战。战斗一开始，该师就遭到重创，并中止了进攻。

当天下午，H·H·罗科索夫斯基打电话给我：

“情况怎样？”

我报告说：敌军以新锐兵力对我实施冲击的企图未果。在争夺登陆场的所有地段上，敌人的进攻均被制止。

我在话筒里听到他轻松地喘了一口气。看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正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被拖得精疲力竭的时刻。而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总的看来，方面军司令员对于我的报告很满意。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问我：

“怎样找你？”我明白了，他打算到登陆场来。我很想见到他。但是，我能拿方面军司令员的生命冒险吗！我的指挥所离前沿不远，敌人可以发现汽车在运行而进行炮击。我生平不能容忍说假话，但此次却不得不撒谎。我知道H·H·罗科索夫斯基很关心他人，就对他说：

“司令员同志，我已定好浴室，想洗个澡。大概过2小时后，我就到对岸去。”

“老实说，你是不是不愿想让我到登陆场上？”他猜到了。

“不，真的不是。我是想洗个澡。澡堂都定好了！”我重复说。

“那好吧！”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同意了。

傍晚，我在集团军第2梯队的驻地见到了他。会见非常亲切、热忱。我们之间相互信任，谈话非常坦率。我们一直谈到天快亮。当我谈完强渡维斯瓦河的过程和关于登陆场的争夺战之后，我们一同回忆起伏尔加河上的会见和斯大林格勒的会战。我们也谈了目前的战况和下一步的计划。关于进攻战役的下一步发展的前景，我们之间在看法上是一致的。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十分健谈。在这个夜晚，我们彼此之间更加深了解了，而从此之后永远成为挚友。我们的会见，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我更清晰地理解这位真诚可爱的人和卓越的统帅的性格、观点和思想。临走时，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不让我送他。他就是这种性格：平易近人，不喜欢强调自己很高的军衔，这种优秀的品质，说明他内心的充实和智慧的深邃。

与方面军司令员分手时，我向他保证，在登陆场地域，敌人休想再向维斯瓦河前进一步。结果也是如此。由于遭到反击，数天后，希特勒匪徒最终放弃了要把我们挤入维斯瓦河的企图。

3

方面军司令员考虑了我们已夺取的登陆场的重要性之后，命令我集团军转入顽强的防御。还从坦克第2集团军编成内抽出坦克第16军，以作战隶属关系配属给我们，加强我集团军的实力。

至9月6日，集团军完成了第1防御地带的工程设施作

业。在两条全断面的连续堑壕的前面，建立起了绵亘的防坦克和防步兵地雷场和铁丝网障碍。堑壕之间相隔200—300米，并有交通壕相连接。机枪座和反坦克枪座构筑完毕之后，部队开始构筑避弹所和第2防御地带（第2梯队各师负责修筑该防御地带）。

在敌坦克和步兵可能进行集结的地域内，我们计划配置了火炮和迫击炮火力。炮兵学会了根据第一信号即进行准确的集中射击的方法。组织火力配系时，特别注意到要保障预备队快速部队实施机动。在易受威胁的方向上，每公里正面配置了30门火炮。在所有大居民点内，都组织了环形防御。

我的副职M·F·杜哈诺夫中将和工程兵主任B·M·

特卡琴科少将接受了指令，要沿维斯瓦河东岸对包括前沿在内的集团军防御地带进行勘察。此时，我们的态势已较为巩固。补充兵员也赶到了。我们在集团军后方接收了他们，并分配到各师，这些师准备轮流进入预备队。

现在，当我们在登陆场巩固下来的时候，情况已清楚表明，敌人已无力将我们挤入维斯瓦河。我们可以认真地思考一下以下的问题了：战役的过程如何？我集团军编成内的各部队和兵团的作战情况如何？各部队和兵团的指挥员又是如何完成任务的？

谁是卓越的英雄人物呢？

首先说说米哈依尔·帕夫洛维奇·杜哈诺夫中将。关于他，我能说很多。作为军事首长，他的才能十分出色地反映在多次的战役中。他一贯善于确定那里的困难最大。他举止安静，遇事审慎。他为部队的行动带来信心，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士，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最需要的人。

还有近卫第4军军长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格拉祖诺夫。他曾一个空降兵，早在1941年，就与部队一起不止一次地深入敌后。空降军改编为近卫步兵师后，他被任命为副军长。副职，这是一个在战斗报告和命令中

经常不被提到的职务。作战胜利时，荣誉首先归于正职指挥员。但是，必须讲一讲格拉祖诺夫，他精力充沛，遇事果断，总是出现在关键性的地方。在掩体里，在攻击中，都可看到他与战士们在一起。前进指挥所也离不开他。

不久，他被任命为军长。在维斯瓦河的战斗中，要求指挥员表现出特别高超的组织能力、行动神速和具有坚强的意志，而他全面地施展了自己的才能。格拉祖诺夫清楚地懂得：迅速地准备机动和突然地采取行动，这是最主要的。他的部队最先和最好地执行任务，迅速而坚决地渡过维斯瓦河，并在对岸取得优异的成果。

该军在强渡维斯瓦河中，起了主导作用的是以阿法纳西·德米特里耶维奇·舍缅科夫将军为首的近卫步兵第 57 师。他善于隐蔽、准时地集中各团，实施强有力的突击，这次突击从根本上保证了全军的胜利。

在集团军战役布势的中心、靠右侧、强渡过维斯瓦河的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雷若夫中将指挥的近卫第 28 军。他的任务是实施纵深分割突击。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胜利地完成了这项复杂的任务，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勇敢精神。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瓦金少将指挥的近卫第 79 师，是军的第 1 梯队，该师与格拉祖诺夫的军所属各师一起，在同一时刻开始渡河。师属各团协同一致地强渡过维斯瓦河之后，立即跃过防水坝，将敌人打回西边，从而使敌人无法对河面和通向河边的接近路进行观察。

B·C·格列博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27 师在集团军的右翼强渡了维斯瓦河。该师所属各团起先未能准时前出至河边，但随后将损失的时间补回，并准时抵达登陆场。

这些指挥员善于鼓舞和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大无畏精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战役取得了成功。B·A·格拉祖诺夫、N·A·瓦金、B·C·格列博夫、A·A·雷若夫和 E·I·齐托夫斯基都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强渡像维斯瓦河这样又宽又深的河流时，工程兵和工兵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由于他们的奋不顾身的精神和高超的技能，才有可能不仅将人员，而且也把坦克、火炮、弹药、给养和其它物资渡过河去。这项即困难又危险的工作是由集团军工程兵处领导的。他们那个团结一致的集体，善于在最短的期限内，将强渡所必需的一切器材隐蔽地集中起来。他们基本上是在夜间做准备工作，以便不让敌人发现。渡河的组织工作是冒着枪弹、炮弹和航空炸弹的袭击进行的。当主力部队和技术装备还未渡河至左岸时，工程兵和工兵部队在体力和精力上的紧张状态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领导这项巨大工作的是集团军工程兵主任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维奇·特卡琴科将军。

他待人心平气和，谈话做事都不慌不忙，但却善于准时地完成一切任务。

特卡琴科将军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好当家。他手里总是掌握一些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机动数，因此，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难不倒他。

对以炮兵司令员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参谋长弗拉基米尔·福米奇·希日尼亚科夫和其他军官为首的集团军炮兵也应该加以赞扬。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伏尔加河伟大交战的参加者。炮兵们以炮火和车轮巧妙地进行了机动，对敌人实施了多次强有力的、准确的突击。

起初，我们在登陆场上只有很少可以与希特勒的“虎”式和“斐迪南”

式坦克相匹敌的重型坦克。对付这些坦克所使用的是火炮，主要是大口径火炮，我们把火炮拉到暴露阵地上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敌人为了破坏我登陆场，从华沙附近调来“赫尔曼·戈林”坦克师和其它坦克部队，但他们的进攻，被我大口径炮兵和反坦克兵歼击步兵所阻止。战斗是按斯大林格勒方式进行的。

我们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投掷集束手榴弹、加上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而最主要的则是苏联人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阻止了法西斯精锐部队的前进。

我步兵和坦克兵在战场上的密切协同，相互补充，共同开辟前进的道路。每攻下一地，就肃清当地的敌人，并一劳永逸地加以固定。他们善于利用炮兵和航空兵火力突击的效果，并立即发展业已取得的战果。

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像维斯瓦河的其它登陆场一样，已成为我军部队前去解放全波兰所必经的一座大门。

在巩固登陆场防御的日子里，我有机会到过很多部队，会见了强渡维斯瓦河的战斗英雄们，并授予他们以应得的奖赏。我将一枚一级光荣勋章挂在近卫上士内斯特·格里戈里耶维奇·莫辛炮长的胸前。他过去是顿涅茨煤田的矿工。这已是他荣获的第5个奖赏，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他获得了第3枚光荣勋章。他和自己的兄弟上等兵列昂尼德·莫辛和红军战士装填手库利诺夫·内斯特·格里戈里耶维奇一起，在过去的一年里，击毁了4辆德军坦克、3门自行火炮、2辆装甲运输车、12门火炮和15挺机枪，并消灭了300多名德寇。

在军士的军装（套头服）上，与军功奖章并列的还有一枚“忘我劳动”奖章，这是内斯特·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平时在顿巴斯矿井中忘我劳动的见证。莫辛性格倔强，做什么事都很慎重、牢靠。不管情况多么困难，他总有办法应付。

有一次，军士莫辛的炮班和一个步兵群深入敌驻地纵深。敌人紧紧地包围了勇士们。

炮手们毫不畏惧地进行了战斗。

他们以直接瞄准射击，击毁了敌人的3门火炮和2辆装甲运输车。当希特勒匪徒接近到300米时，炮手们才开火，他们消灭了200多名法西斯匪徒。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终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回到自己人那里。

在通往卢布林的接近地上，莫辛的炮班以直接瞄准射击消灭了敌人的3个土木发射点、几个机枪巢。他们的火炮紧随正在冲击的步兵之后向前推进。

在强渡维斯瓦河的战斗中，莫辛炮班的炮兵将火炮装到船上后，第一批到达登陆场。刚一踏上陆地，近卫军人立即以炮火支援步兵进攻。

3枚光荣勋章获得者、共产党员内斯特·莫辛参加过许多战斗。他没有辜负父亲、老矿工格里戈里·叶格罗维奇·莫辛对儿子们的叮嘱：象矿工那样无情地打击敌人。

在这个炮兵连里，我将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授予了红军战士维克托·舍尔斯秋科夫。

早在北顿涅茨河时，他就被任命为驭手。

“我哪些方面没被指挥员看中呢？”这个战士过去总感到困惑莫解。

尽管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但舍尔斯秋科夫工作起来却是极端努力。他对心爱的两匹强壮的重挽马——普什卡里和普季克爱护备

至。他为人机灵、仔细。这个过去的集体农庄庄员很喜欢养马工作，但总是想往能到炮班去消灭敌人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真正名符其实地进行战斗。

一次，分队里进行马匹大检查。他喂养得肥胖的、皮毛刷拭的闪闪发亮的普什卡里和普季克，被评为部队中最优秀的马匹。舍尔斯秋科夫受到队前嘉奖。当指挥员向自己的避弹所走去时，舍尔斯秋科夫追上了他，问道：

“请告诉我，让表现不好的战士去当驭手，这是不是真的？”

指挥员留心地看着他一眼，回答说：

“不，让你当奴手，正因为你是优秀的战士。你自己也很清楚，一名优秀机智的驭手在战斗中是多么的重要。”

在维斯瓦河对岸的登陆场上，炮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斗不分日夜地进行着。有一次，敌军的坦克出现在翼侧。必须变换发射阵地，以便以直接瞄准射击打击敌人。炮兵试图用手将火炮推出来，但因炮车的轮子陷在沙里未能成功。正在这时，舍尔斯秋科夫赶着马运来了炮弹。当得知同志们的困难后，他立刻就把自己的马赶到火炮前，灵巧地拉起火炮向前飞奔起来。炮兵开始从新的阵地上向敌人开火了。舍尔斯秋科夫又去拖另一门火炮。就这样，他将3门火炮全部拉了出来。炮兵的准确射击，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为了奖赏舍尔斯秋科夫的功勋，他被授予了勋章。

在我们这里都是一些极为优秀的人。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们都能创造英雄的业绩。我非常高兴地将列宁勋章授予了卫生指导员米哈伊尔·洛边科。他为人质朴，并不引人注目，但同志们一对我谈起他来，总是无比自豪。大家都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反冲击后，战士们回到自己的堑壕，猛然发现，少尉尼古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没有回来。很快，大家发现，少尉受了重伤躺在中间地带。敌人的机枪正在向他射击，在他周围溅起滚滚的泥沙。近卫军人们向希特勒匪徒猛烈地开了火，使敌人无法击中伤员。但下步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从掩体中跃出一个身材不高但很壮实的战士。他跑了几米之后，卧倒在地，并向军官爬去。

这就是洛边科。勇敢的卫生指导员将伤员背到背上爬回堑壕。尼古拉得救了。

近卫准尉洛边科从战场上救出了许多伤员。被他救出的军官斯特列利尼科夫、红军战士科瓦廖夫等许多人，至今仍给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信中充满感激之情。洛边科自己也在战斗中4次负伤。每次痊愈之后，他都回到自己部队，又为同志们包扎伤口，从炮火下抢救受伤的战士和指挥员。

在我们的集团军里，还有1位被授予列宁勋章的卫生指挥员。他是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参加者、准尉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西多连科。早在保卫“红十月”厂区的战斗中，准尉就从炮火下救出了80多名受伤的战士和指挥员。整个集团军都知道他是一个勇敢无畏的军人。团长B·A·图尔钦斯基说：

“只要费奥多尔·西多连科在，就不会有一个伤员留在炮火下。”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上，有一次，他从中立地带同时救出两个人：炮兵营长和无线电员。他把他们俩紧靠在一起，放在雨布上，匍匐着拉拽到安全的地方。

西多连科牺牲在战斗岗位上：法西斯的坦克将他连同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一名受伤战士一起轧死了。

我们的党培育了多少优秀的人啊！他们无所畏惧、孜孜不倦，为了人民，准备去建立任何功勋……这样的人不是十个、二十个、而是成千上万！

看着他们，心里就充满自豪！感谢你，祖国母亲，是您在您的土地上抚养了这样勇敢无畏的军人！

4 过平静的防御生活，或更准确地说，是过掩体生活的时候到来了。在这种条件下，警惕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长时间的防御中，人们已习惯于静止的战线，与敌人相处，也习以为常了。有时甚至心照不宣地相互不妨碍对方过正常人的生活。比如，双方都不射击野外送饭的炊事车，不干预到河边去打水的人，等等。

显而易见，这是由于：无论炮弹、迫击炮弹还是子弹，提供给防御部队的均比发给进攻部队的要少，因为此时正在为应付关键性的事件积蓄兵力和器材。战士会这样想：“我要是射击那些拿着锅到炊事车去打饭的德国鬼子，那是消耗子弹，敌人在盛怒之下，会同样地还击我们，火力可能更猛烈，这样一来，令人厌恶的掩体生活就会使人更烦厌。”

掩体内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没有必要去多谈。没有经历这种生活的人，只要下到带有窄小窗口的潮湿地窖或者地下室里去，体会一下就懂得了。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白坐着等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地窖或地下室随时都有可能受到炮弹或迫击炮弹的袭击而倒塌，满是泥土而且发了霉的圆木头会向你压过来。

除此之外，战士们还不得不冒着倾盆大雨、顶着灼人的太阳、或在寒冷的暴风雪中，几小时几小时地站岗放哨或潜伏不动。

很多蹲过防空洞的人都知道，洞里潮湿、寒冷和寂静是多么折磨人。但是，在防空洞里，比在第1防御阵地的掩体或避弹所内要强得多。士兵们不仅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而且也要经受单调无味的生活的折磨。因此，对每一件新事，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高兴起来。如果在掩体之间跑过一只野兔，就会引起他们的欢跃。听到音乐或歌声，士兵们就会安静下来洗耳恭听，一时忘记世上的一切。

无所谓的态度，这是一种可怕的病症。不能任其蔓延下去。不能允许人们松懈警惕性。

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懂得这一点。他们尽量关心同情每一个人。我在视察分队时，对各党小组长的工作很感兴趣。我特别赞赏近卫步兵第220团一个连的党小组长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维博尔诺夫少尉的工作，他有坚定的目的性和孜孜不倦的精神。

夜晚的时间变长了，这使他很高兴。因为只有借助夜色的掩护，才能在前沿活动，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他踏着暮色来到掩体中，到处都受到工兵们的热烈欢迎。大家向他提出很多问题。党小组长有时开小组会，与小组的战士谈话，有时与单个的战士谈心。他们对所有的事都感兴趣，但首先感兴趣的，当然是苏联情报局的最新战报。谈话总是从战报开始。然后，不知不觉地把话题转到了今天分队中发生了什么事，哪些同志表现突出，某个战士在一天中做了什么事等。同战士谈心，这是很重要的事：因为战士会感到精神更加饱满，工作起来更加快活，并越加警惕地注视着当面的敌人。

党小组长不仅同战士们谈话，而且也检查战士们的武器。有一次，他检查了列兵斯克沃尔佐夫的机枪，发现枪机框上沾满了砂子。他说：

“像这样，你的机枪会在战斗中出故障的。它既会使你、也会使同志们陷入困境。”

维博尔诺夫告诉他，关于机枪有毛病的事，他对谁也不说，但是一小

时之后，必须把机枪修好。这种同志式的提醒，要比惩罚的效果更好。后来有人告诉我，斯克沃尔佐夫爱护机枪，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前线的指战员们喜欢生动的语言。党小组长不仅亲自与战士们谈心，而且也要求共产党员们经常与群众在一起，积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

前沿的战士们想不起来有哪个夜晚党小组长没到他们那里来过。他们时刻都感觉到他的关心。他深切地注意着一切事情。掩体内没有煤油灯，他便建议人们自制一些油灯，而且使每一个避弹所都使用上。

战士们说：“我们距离敌人只有 400 米，但党小组长说，就是在这里也可以很好地休息一下。你看，我们这些土掩体多么温暖啊！在这儿你可以找到报纸、小册子、杂志、书籍等。对这些事，我们党小组是很关心的。

实践证明，“掩体里闹情绪的事”并不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要出现的。如果在各连、排里真正开展党政工作，正如我们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所作的那样，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党政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防御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使战士们不要忘记敌人。因为敌人可以随时转入进攻，利用我们的疏忽大意和漫不经心的态度，迅速地和突然地以少量兵力取得重大战果。经常提醒战士们要注意的是，最可能发动进攻或实施突击的，将不是敌人早已进入防御的部队，而是从预备队调来的生力部队。进入防御的部队往往只起屏障作用，掩护准备实施突然突击的主力部队集结。

不要认为，近卫第 8 集团军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进行防御的暂时平静的日子里，是在无所事事之中打发漫长的秋夜。当大炮沉默的时候，侦察兵在进行侦察，工兵忙得满头大汗，而各级司令部的人员都忘记了休息。

侦察在不间断地进行，及时地去获取有关敌军的情报。应该了解第 1 堑壕内的敌人正在做些什么；他们的意图是什么。这些情报使人很感兴趣，也非常重要，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进行纵深侦察，以便更好地了解从敌前沿至 10 公里、30 公里、50 公里的敌后方的敌人的行动。这并不是说，连长或营长应该进行如此纵深的侦察。他们没有进行这种侦察的兵力和手段。但是，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更远地观察敌阵地和当面的地形。只有这样，敌人的攻击，对他们来说，才不会是突然的。纵深侦察由各师长、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进行。

他们进行这种侦察的能力更强些。

部队在构筑工事，登陆场应加固到使敌人无法迫使人们后退 1 米。我们建立了两道防御地带，每道地带由 2—3 条带有掩蔽部和避弹所的堑壕组成。在维斯瓦河上架设了 8 座载重量达 60 吨的大桥。每座桥的前面都构筑了桥头堡。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各阵地和预备队的所有部队进行紧张的劳动。

我们猜测：方面军的部队有朝一日将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发起主要突击。因此，进行防御施工时，就考虑到将来大部队实施进攻行动时的需要。

在登陆场内有很多沼泽地。以特卡琴科将军为首的集团军工兵部队在进行施工时不得不精心计划。他们修筑了约 200 公里的道路，其中有 130 公里车辙路和 30 公里窄路，都是穿过沼泽地和流沙的。

为了节省兵力，并使部队保持高度战斗准备，我们定期更换防守前沿的部队。第一次换班是在 9 月 8 日夜里进行的：9 个师中有 4 个师留在第 1 梯队；其余的师划归第 2 梯队，这些师到那里得到了补充，并进行战斗训练和休息。

现在，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我近卫第 8 集团军加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

军编成之后，在新的条件下，胜利地经受了当前的战斗考验，并在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去争取完成更艰巨、更重要的任务。

维斯瓦河——奥得河

1

11月12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签署了任命苏联元帅 I·H·朱可夫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同一命令还任命苏联元帅 H·H·罗科索夫斯基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

11月19日，H·H·罗科索夫斯基与方面军司令部和指挥机关的领导人员告了别，方面军由 I·H·朱可夫接收过来。

I·H·朱可夫一上任，就积极准备新的进攻。他首先来到马格努舍夫和普瓦维登陆场，就地了解了方面军主力部队转入进攻的条件和能力。

这时，部队、技术装备、武器、弹药正源源不断地运往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各野战移动医院已经在登陆场上铺开，维斯瓦河上建立了渡口，而且在不断地扩大。进攻前，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上集中了23个师和5348门火炮。突破地段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达282门。划分给近卫第8集团军的突破地带正面为7公里。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要求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后勤机关作出巨大的努力。他们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将数万吨各种物资运到登陆场。

12月，维斯瓦河上开始出现流冰。这给集团军各部队、尤其是工程兵部队带来很多麻烦。不仅水面上高速浮动的冰块威胁着桥梁的安全，而且冰块还沉在水下面几乎贴近河底流动，这使维斯瓦河变得险恶。由于冰块不断地撞在樁桥墩上，于是形成了看不见的堰堤。这样一来，水流的速度和推力也就迅速增加。河水冲刷着河岸和桥墩附近的河底。于是，不得不动员全部工程兵和道路部队去保护桥梁。每座桥都配备了3个爆破连和1个道路营，还成立了抢修小队。各渡口的指挥员管辖着多辆汽车、拖拉机和1个120毫米迫击炮连，以便炸毁大块的流冰。

人们在桥上不分昼夜地工作，终于战胜了流冰，保住了各渡口，使各种车辆源源不断地通过。

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准备实施的如此密集的突击有其特定的特点。大量部队（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及坦克集团军）的供给，都完全取决于渡口、转运站、铁路、在维斯瓦河上架设桥梁以及修复铁路线路等。而所有这一切都对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后勤部门提出了一大堆极为复杂的问题，有些甚至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因为红军目前是在友好的波兰领土上作战。

方面军后勤部门和铁道兵各有各的困难，而进攻的组织，实施战斗行动的逻辑，有时却要求作出完全出人意外的决定。

此时，我集团军不仅要为即将发动的进攻作好物质技术器材的供给工作，而且还面临另一项任务、即为方面军和其他集团军进行周密的纵深侦察，查明现在就要与其交战的敌人的兵力部署。对敌人防御前沿的部队，我们已了如指掌，但这还不够，我们仍需了解敌人的第2梯队和整个防御纵深内有

哪些部队。我军侦察人员必须深入敌后，抓些俘虏来审讯，并通过他们对已获得的情报进行核实。

早在乌克兰时就已接替格尔曼上校而担任集团军情报处长的格拉德基上校，制定了一份组织纵深侦察的计划。他向敌人的驻地派出了几个侦察组，这些侦察组在距前沿 25—40 公里的地方监视着敌军的调动和后勤工作。侦察员们主要是步行穿过战斗阵地渗入敌后的。夜间使用无线电和波—2 飞机与他们保持联系。

第 1 个侦察小组是由两名侦察员组成的。他们是中士彼得·博切克和列兵瓦西里·贝奇科夫。我和他们谈了几次话。这个小组于 10 月初出发前往敌后。他们的任务是：在采齐柳夫卡以北地域越过战线，抵达瓦尔卡镇西南 12 公里处的树林里，查明那里的敌军是什么部队，并沿途记下他们所遇到的敌人的全部防御目标。为此，给了他们 3 个夜晚 2 个白天的时间。

侦察员报告说，树林里没有发现任何敌军。于是他们决定在这个地域内组织一个固定的侦察行动小组。支撑基地设在树林的中央。在林边构筑了阵地，以便对环绕林边道路运动的敌军进行监视。

新的侦察小组由 7 人组成，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基斯塔耶夫中尉领导这个小组。他早些时候曾被授予列宁勋章。他的小组神不知鬼不觉地渗入到树林，在那里进行了伪装，并十分成功地工作了两个多月，向集团军司令部发回了他们通过观察和审讯俘获得的极宝贵的情报。他们查明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六管火箭炮和坦克部队的阵地。侦察员们特别注意敌军的日常生活和作息时间表。我们掌握了法西斯士兵吃饭的时间、他们是如何休息、以及潜伏哨和警戒队换班的时间。所有这些在实施突然突击时都要考虑到。

为了对地面侦察所得的情报进行核实和检查，我们广泛地进行了航空侦察。由于采取了这种重复的侦察方式，我们对敌防御纵深内的工事以及预备队、步兵师、坦克师的驻地和编成等，均掌握了可靠的情报。我满意地指出：我集团军侦察机关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他们获取的情报受到方面军司令部和友邻集团军司令部的高度评价。

随着进攻日期的迫近，登陆场内的部队越来越密集。这里集结了 3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近卫第 8 集团军、突击第 5 集团军和第 61 集团军。登陆场后边还有两个坦克集团军，即近卫坦克第 1、第 2 集团军，加上 1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预定从南向拉瓦——马佐维次卡、斯凯尔尼维策、沃维奇方向实施强大冲击，以对华沙进行迂回。此次突击将切断整个华沙集团与大后方的联系，而我坦克集团军将前出到敌人的交通线上。

方面军将从普瓦维登陆场向腊多姆、托马舒夫——马佐维次基方向实施第 2 次突击。将向那里进攻的是：得到 2 个坦克军和 1 个骑兵军加强的第 69 和第 33 集团军。波兰第 1 集团军和第 47 集团军将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向北沿维斯瓦河占领战线。

根据作战企图，此次战役应彻底粉碎敌军，但要保住华沙和波兰的其它城市不被摧毁。

为了具体研究战役计划，苏联元帅 I·H·朱可夫召集了一次会议，应邀到谢德列茨参加会议的有各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各集团军参谋长以及各独立军军长。方面军参谋长 M·C·马利宁将军简要地讲述了此次战役的企图，更确切地说，是此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企图。按计划，进攻速度应该是：

在进攻的第 10—12 天，我军应前出至佩特尔库韦克、日赫林、罗兹一线，随后向波兹南发展战果。

这个企图仅规定了 10—20 昼夜的进攻任务。考虑到部队应该到达的指定地区为 150—180 公里，这就意味着，每昼夜向前推进的速度应是 15—18 公里。

在白俄罗斯第 1、第 2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实施深远的、直接的分割突击的同时，还进行其它一些较为重要的战役。比如，在右翼 A·C·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部队，从东面对东普鲁士的“中央”集团军群实施突击。在左翼，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对科希策实施突击。

方面军参谋长作了简短报告之后，朱可夫元帅开始向我们详细地询问情况，并征求我们对当前的战役的看法。他首先询问那些已带部队占领了登陆场并驻扎在那里的将军们。

因此，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

我的发言持续了约 30 分钟。我报告了敌情：敌人的部队和防御工事、预备队的数量和配置。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敌人预备队的配置情况，可以预想，敌人会调动防御纵深的坦克师和步兵师实施猛烈的反冲击和反突击。为了对敌人进行抗击，我们应该拥有反坦克预备队和诸兵种合成预备队，并使甲航空兵去破坏敌人快速战役预备队的机动。尽管我们与敌人的防御有较长时间的接触，但我们仍未能准确知道敌人将在哪个阵地上同我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我说出我的推测：

敌人将不会在我们已了如指掌的第 1 阵地上进行顽强的抵抗。敌人了解我炮步的威力。

他们只是利用第 1 阵地作为掩护主要防御地带的屏障。

鉴于这种情况，我提出了一个曾在科韦耳战役中行之有效地进攻作战方案。一切将从战斗侦察开始，只不过现在给侦察梯队的每个步兵营配置加强兵器，即配置一个坦克连或一个自行火炮连。

我相信，侦察梯队定能占领敌人的第 1 道防御阵地，因为其防御兵力很薄弱；而在第 2 道防御阵地，我们将遇到敌人的主要抵抗，这样，进攻第 2 道阵地，将由我军主力的第一梯队进行。

我们研究了敌人第 1 阵地的状况。夜间，敌人在第 1 堑壕内部署的生动力量和兵器要多于其它时间。在莫斯科时间早晨 10 时左右，他们便将多余的人员后撤，第 1 堑壕只留下观察员和值班员分队。因此，我建议：我军的 25 分钟的炮火准备，不应迟于早晨 9 点开始，以便在敌军士兵还未撤到后方的时候，第 1 次急袭射击就将其消灭。我们并不怕在黑夜中进攻。我步兵和炮兵已经充分研究了敌人的第 1 阵地，各侦察营不会搞错进攻方位物和方向。

对第 2 阵地的攻击，应在 1 个半至 2 小时之后进行，此时天已亮，我们的炮兵和航空兵已不会选错目标，而进攻部队也不会迷失方向和搞乱队伍。

为了使我军的准备工作不致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建议拟定一个在出发阵地上逐渐结集兵力和器材的计划。人员和技术装备的运动，只能在夜间实施，要计划好数量，以便天亮前将一切掩蔽好并进行伪装。白天，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在堑壕内的部队，应积极进行土工作业。这样，敌人会认为我军由于兵员和技术资源的消耗，正在准备牢固地防御，而不是准备进攻。同时，

我们尽量使用无线电扩音器进行广播，在阵地上放音乐，一方面以鼓舞我军战士，另一方面松懈敌人的警惕性。

这些建议全部被采纳了。方面军司令部没有向各集团军下达书面命令，全部号令均严加保密。代替下达命令的办法是，方面军司令员在地图上进行了军事导演。在导演过程中，明确和熟悉了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各项任务，并对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坦克集团军、航空兵、炮兵之间的协同动作也大体上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方面军各部队的作战行动时，部队弹药、燃料和粮食的供应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方面军后勤部长 H·A·安季片科中将提出，战役所需的全部储备品，其中包括 30 昼夜的粮食储备，各集团军可以从方面军供给基地领取，并集中在各登陆场上各自的进攻地带内，尽可能接近前线。

根据进攻战役的计划，方面军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发起主要突击，从普瓦维登陆场发起第 2 个突击。从这两个登陆场投入进攻的部队计有：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两个坦克军和两个骑兵军。为了增强打击力量，还有 1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作为预备队。这个强大的突击直指罗兹、波兹南，从南面对敌人华沙集团进行迂回。在方面军右翼，留下对敌人华沙集团作战的是第 47 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波兰第 1 集团军，他们将视在主要方面上的战斗进展情况，在数天之后转入进攻。

德军在阿登的进攻使英美联军陷入极端困境。为此，英国首相向苏联政府求援。丘吉尔在信中强调指出，他认为，他在信中提出的建议：要求苏军迅速地发起进攻，以支援盟军，乃是“刻不容缓的事”。1 月 7 日，A·B·斯大林答复丘吉尔说，红军准备“不迟于 1 月后半个月在整个中部战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发起的进攻，定在 1 月 4 日开始。

1 月 12 日，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发起了进攻。

1 月 13 日，我和其他集团军的司令员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各集团军已作好执行任务的准备，我各兵团已占领出发阵地。

根据方面军的计划，近卫第 8 集团军的任务是：在马特利德津、什马耶利尼克地段突破敌人的防御，向利帕、维日雷维内方向发展突击，并攻占卡利努夫、弗兰齐什库夫、布尔托瑟戈伦一线。随后，集团军主力应向新米亚斯托、拉瓦—马佐维茨卡、叶茹夫、斯特雷库夫、奥佐尔夫这一方向上发起进攻。我们应于进攻的第 12 天前出至阿斯塔霍维策、捷尔宗日纳、兹杰什一线。

根据方面军所交给的任务，我集团军司令部制定了战役计划。1 月 8 日，我批准了这个计划。在制定这个计划时，既严格地考虑了我军的能力，又准确地测定了敌军的兵力。

我们将要突破是坚固的野战式筑垒阵地。希特勒军队的主要防御地带的前沿通过下列各居民点：格列努韦克、格列努夫、根雷库夫、布罗尼斯拉武夫、列热尼策、莫斯德基、科泽尼策森林的北部边缘以及斯韦热古尔涅。

第 2 防御地带通过克萨尔努夫、诺夫斯坦尼斯瓦维策一线。

敌人在其防御纵深内建立了下列的中间地区：马特利德津、穆沙雷、迈斯卡多姆布罗瓦、波德姆瑟策、布茹扎。

敌预备队部署在多别申、弗兰齐什库夫、布茹扎地域和利泽尼策以北的森林里。

我们还不得不考虑到总兵力达 3 个师的敌人的战役预备队其中 2 个坦克师部署在敌防御纵深。

在制定集团军的进攻战役计划过程中，维塔利·安德烈耶维奇·别列亚夫斯基少将和他领导的全体工作人员工作得特别准确协调。就在不久前给他授予了将军军衔，他成为集团军里最年轻的一位将军。他是我们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如果说在布列斯特——卢布林战役中，他还有点畏首畏尾的话，那么，在强渡维斯瓦河的战斗中，他在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时，却表现出必要的果断精神和自信心。他那卓越的作战才能以及善于组织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共同工作的能力，使他在集团军内获得很大威望。他与集团军司令员、各兵种首长和勤务主任以及方面军司令员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 月 13 日夜，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所有兵团均已作好进攻的充分准备。马格努舍夫和普瓦维两个登陆场上的一万余门火炮都已指向敌人的工事。在每公里正面上，火炮和迫击炮平均密度达 200—250 门，这就足以保证突破取得成功。数千辆坦克和自行火炮集中在各阵地上，时刻准备启动投入战斗。数千架飞机已挂弹完毕停在机场上准备起飞。我们的无线电扬声器依旧大声地播送着音乐和歌曲。在敌人看来，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我们大家都盼望着能有一个好天气，以便使集中起来的兵力能充分发挥威力。工兵和侦察兵预先在我军堑壕前方开辟了通路之后，共同排除了敌人掩体前沿的地雷障碍。

从后半夜开始，晴朗的星空开始被乌云遮住，并且还下大雾。越是接近早晨，雾越浓，最后变为一道遮天盖地的帷幕。

莫斯科时间早晨 7 时，炊事车送来了热饭热菜，给战士们分发了早饭。大家情绪都很高涨。但是雾却浓得使人在 10 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早 8 时，我与各友邻集团军（第 69 集团军、突击第 5 集团军和第 61 集团军）的司令员通了电话。事先取得他们同意：尽管有雾，我们仍按计划准时行动。之后，我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准备发起进攻。方面军司令员 I·H·朱可夫回答说：“可以”。8 时 25 分，向炮兵下达了“装填！”的口令，8 时 29 分，下达了“准备射击！”的口令；8 时 30 分，集团军炮兵司令员 H·M·波扎尔斯基将军发出命令：“放！”

于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的部队的生活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如果说，在此之前，每个人都专心于作好战前准备的话，就象一个即将出远门的人，检查了有无忘记带什么东西之后，还可回过头去，再次考虑添补点什么。而现在，在下达了“放！”的命令之后，大地由于数千门火炮的齐射而颤抖，再往回走已经不行了，甚至回头看一下都不可能了。所有人都将意念和注意力集中于前方。

进攻的最初阶段，战斗特别激烈，伤亡也很大。为了到达敌人的第 1 道堑壕，并摧毁其防御阵地，部队必须进行激烈的战斗。这一点决定我们能否前出至广阔的战役地区。现在，就象驱车开足马力那样，应立即高速推进，不断增强突击兵力，这是最重要的。作为一名将军，在进攻时最使他忐忑不安的就是这一点。

过去，象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进攻之前，准备工作延续了数星期乃至数月，但进攻开始的第一天，就由于各种原因而使进攻无法实施，结果部队仍在原地止步不前。

在 1945 年 1 月 14 日的一次进攻中，我们在兵力和技术

兵器方面都占有很大优势。我们的进攻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是每个人都明白，要取得胜利不仅单方面依靠兵力上的优势，而首先需要本领。无疑，我军指战员的本领和经验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敌人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研究我军的作战方法，并作出对策；他们布设各种圈套陷阱，诱使我军上当。目的是使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甚而破坏我军的进攻。

我们决定冒险。我军的特别侦察梯队 在 25 分钟的炮兵急袭射击之后，而不是在原计划的 2 小时 35 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即转入进攻。我们企图以出其不意的突击使敌人陷入混乱。但是，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尽管我们已采取预防措施，而敌人还是识破了我军的企图，于是变换其战斗队形，在我们意料不到的地方迎击我们。

清晨，笼罩有维斯瓦河宽阔河谷上的一层浓雾，使我地面及空中观察员都无法进行观测。同时，炮兵也无法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以发挥其全部火力优势。

8 时 55 分，集团军的侦察梯队协同一致地投入进攻。步兵和坦克在行进间进行射击。

几分钟后，敌人的第 1 堑壕被我占领，随后，第 2 堑壕也被我占领。没过多久，敌人的第 1 阵地就全部被我占领。由于我军炮兵的突击，敌人的观察所和指挥所均失去指挥能力。在大雾之中，他们对我军的进攻束手无策。但是雾散之后，我军很快觉察到，希特勒部队开始增强其抵抗力。

11 时许，我各炮兵观察所已移动到我先遣部队附近。在实施了强大的炮火急袭射击之后，集团军各部队又对固守在第 2 防御阵地的敌人发起攻击。敌人将预备队投入战斗，疯狂地进行抵抗。敌第 6、第 45 和第 215 师编成内的步兵和赶来增援的坦克第 19 师所属几个坦克团，对我近卫第 4 军左翼不断发起反冲击，妄图破坏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6 集团军两翼的会合。因为一旦会合，我军即可完成对敌各师的合围。

当然，使用航空兵去轰炸从纵深赶来的敌预备队是比较容易的，效果也最好。但由于气候原因，航空兵无法升空作战。1 月 24 日，我航空兵全天都未出动。因此，与敌预备队、特别是与坦克预备队作战的任务，就落在炮兵身上。但是，由于在大雾中转移到新阵地，大部分炮兵也未能加入战斗。这次机动消耗了我们好几个小时的宝贵的白昼时间。夜晚来临时，我左翼第 4 军地段上的战斗，实际上已在敌人的第 2 和第 3 阵地之间平息下来。

在右翼，近卫步兵第 28 军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并夺取了斯特罗梅茨——波德列谢。当夜的任务是：将第 2 梯队前调；调集炮兵；运送弹药；让部队吃上热饭，并进行休息。而到黎明时分，部队在实施强大的炮火准备之后，又立即转入冲击，以便在日终前在整个纵深突破敌人的防御，并确保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从伐尔卡——腊多姆铁路线进入突破口。

由于减少了炮火准备的时间，从而节省了大量弹药。这样，我们便可以在战役第 2 天对已查明的敌军集团进行强大的火力突击，从而保障部队的进攻。

我们通过个别的指令下达了具体任务：近卫步兵第 28 军攻占比亚洛布热基、谢克柳基地区；第 29 军攻占谢克柳基、叶德良卡地区；第 4 军攻占叶德良卡、M·叶德林斯克地区；集团军坦克群与近卫步兵第 4 军共同作战，并在腊多姆附近与第 69 集团军部队会合。

使人欣慰的是，我友邻部队——突击第 5 集团军和第 69 集团军，也都

完成了昼间的任务，并与我们齐头并进。

虽然 1 月份的白昼时间很短，但部队仍然非常疲倦。主要原因是精神特别紧张，战斗的第 1 天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随着 1 月 15 日黎明的到来，开始了 40 分钟的炮火准备。9 时，部队重又开始向前推进。敌人利用夜间调集了预备队，并对其第 3 阵地的战斗队形进行了补充。在皮利察河和腊多姆卡河之间的地带内，敌人将坦克第 19 和第 25 师投入战斗。但是，我军强大的炮火突击和步兵、坦克兵协同一致的冲击，粉碎了敌军的抵抗。敌人开始从第 3 阵地向伐尔卡——腊多姆铁路线退却。我们追击敌人以及将炮兵作必要的阵地转移，就用了大约 3 个小时。

中午，我军对敌人占领的铁路路基发起了冲击。在这个时刻，如果有航空兵从空中实施突击，给我们支援，那该是多么好啊！但是，由于有雾，航空兵仍然无法起飞。

15 日晨，我与突击第 54 集团军和第 69 集团军司令员通了电话（他们的进攻也很顺利），又将形势和自己的决心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汇报。随后，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A·M·普罗宁将军与一批参谋一起，前往近卫步兵第 4 军。

我们在大雾中乘车前进，沿途堵满了车辆，好不容易才抵达格拉祖诺夫中将的指挥所所在的伊格纳楚夫卡村。他报告说，第 47 师的战果最大。该师是由瓦西里·米纳耶维奇·舒加耶夫指挥的。这是一名刚毅而富有主动精神的将军，其勇敢精神使人钦佩。他战斗的足迹遍及整个乌克兰。他多次与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舒加耶夫现在在铁路边的观察所内指挥战斗，那里正处在事态发展的中心。

我决定到他那里去一趟。路上格拉祖诺夫将军让我去看在村里缴获德军的 12 门完好的 6 管火箭炮。这些炮放置在战斗阵地上，炮口朝东。敌人还未来得及用它们发射 1 发炮弹。

我军就以突然的冲击打乱了法西斯匪徒的战斗部署，他们丢弃了一切，甚至没来得及将火箭炮炸毁。

我们在舒加耶夫的指挥所里观看了该师的冲击。该师的部队已冲上了奥利绍夫村北的高地。我们确信进攻发展顺利，又驱车向北，穿过卢卡夫村向哈尔内卢格驶去。在这里我们遇到集团军装甲兵、机械化兵司令员 M·I·魏因鲁布。他正率领一个坦克群，并和第 29 军步兵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指挥着争夺铁路路基的战斗。他正在组织坦克与步兵之间的协同动作。

敌人依托车站的建筑物和毗连的一大片森林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敌反坦克炮和机枪火力拦阻着我军的前进道路。在业已展开战斗队形的各步兵团以及魏因鲁布将军的坦克部队的后面，是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纵队。这是 M·E·卡图科夫将军的坦克集团军的前卫。他们正等待着部队打开前边的通路。必须将敌人从铁路路基上击退，只有这样坦克集团军才能冲入广阔的战役地区，并割裂敌人的防御正面。如果立即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随后步兵和坦克一鼓作气进行冲击，那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时太阳已经西落了。大约还有 1 个小时的白昼时间。在这一个小时内，无论如何要将敌人的支撑点摧毁。我们很走运，在哈尔内卢格村东南的树林边出现了一大队汽车。定睛细看，我们认出是“卡秋莎”火箭炮来了。

整整一个旅的新式火箭炮，一共 36 辆发射架车，弹药已装填完毕，准备发射。旅长立即接受了下达的任务。20 分钟过后，进行了一个威力巨大的齐射，炮击之后，侥幸活下来的希特勒匪徒在很长时间内仍惊魂未定。

我军部队开始向前推进。又过了 20 分钟，我军部队粉碎了敌军已经减弱了的抵抗，开越过铁路路基。紧随部队之后，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前卫纵队也向前推进。

至此，对敌战术防御整个纵深的突破业已完成。集团军如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斗任务。集团军与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一起，前出至广阔的战役地区。

在这种时刻，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就在不久前还在困惑着你的所有争论和委屈。这才是真正的胜利的喜悦呵！

我匆忙往回赶，想尽快回到指挥所。回到日日夜夜与之共同进行战役准备的战友们身边。迎面而来的是预备队的纵队，在月光下，我看到一张张愉快的微笑着的面孔。《士兵通报》已经报导了消息，说突破业完成，我们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在指挥所里，我与方面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我报告了战斗详情及战果。听筒里响起了兴奋的话音。我注意到，电话兵们紧盯着我，留心倾听着每一个字。

报告结束了。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一切都很清楚。

几分钟后，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是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司令员 C·A·波格丹诺夫上将打来电话。我们是在卢布林分了手。在那里，他负了重伤，现在又重返部队。

波格丹诺夫向我祝贺了胜利，我也向他表示了祝贺。他希望我与他在新的地区会师，并告诉我，他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的指挥所与坦克部队一起进入广阔的战役地区。需要他处理的事极多，但他们未忘记打电话向我告别和祝贺胜利。战友的关心，使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

我也祝他一帆风顺。2

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将，此时正在我的指挥所旁边的掩蔽部内。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动身。他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胸前挂满奖章和勋章，似乎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参加检阅。我握着他的手，祝他成功。

我军部队已经可以迅猛地向前推进，而无后顾之忧了。重要的是正确地组织燃料、弹药和给养的前送。我们把集团军后勤部长波卡兹尼科夫少将，后勤部参谋长布罗茨基上校，军械部长布卡列夫上校、油料处长阿基莫夫上校、给养主任斯帕索夫上校、卫生部长博伊科夫上校等人召集到军事委员会。

我向大家介绍了已经出现的情况和当前行动可能具有的特点，并提议要制定一个部队所需的、首先是燃料、弹药和药品的供应计划表。

向各兵团下达了个别战斗命令，根据命令，在未来的几天内，我们应以每天 25—30 公里的速度前进。正如我预想的那样，进攻的时间比预定的期限大为提前了。

过去的 3 昼夜，战斗频繁，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以致抽不出时间休息。3 昼夜过后，到 1 月 15 日夜晚，一切都已变得十分平静了。

清晨，集团军指挥机关的第 1 梯队开始向新的指挥所前移，以便不致落在部队后面。在伐尔卡——腊多姆铁路附近，我和普罗宁将军、别列亚夫斯基将军让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往前先走，我们顺便到近卫第 4 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叶德林斯克走一趟。

此刻，在我第 69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接合部作战的敌步兵第 45

师已经被我包围。

我军各分队从两翼和后方发起突击，敌军开始投降。

有两名被俘的德军中校被带到我这里。其中一个德军总参谋部的军官。

“你们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见解？”我问。

“你们目前的攻势将使德国彻底垮台。”总参谋部的中校回答。

“不是德国的彻底垮台，而是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彻底垮台！”A·M·普罗宁加以更正。

“反正是一回事！”德国俘虏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们与德军俘虏一边喝茶、吃着夹肉面包，一边谈着话。此刻，他们已不再担心盖世太保会偷听他们的谈话，各人都坦率地发表着意见。总参谋部的那个军官说，德军在伏尔加河以及随后在库尔斯克遭到惨败之后，很多德国将军和军官已经不再相信德国能够在战争中取胜。希特勒和戈培尔应对此负责，因为他们并未设法与苏联政府取得联系以便在任何条件下与苏联媾和。

“你们为什么认为，苏联人民在惨遭希特勒匪徒的蹂躏、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会轻易地进行和谈？”我问。

“不仅德国人需要和平，俄国人也需要和平。你们的盟军是靠不住的。我们德国人可以与你们达成协议，并成为可靠的邻国，也还可能成为对付你们现在盟国的盟邦哩！”

“德国人为什么于1941年撕毁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对我们这个没有威胁任何邻国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发起进攻呢？”

“苏维埃国家的崛起，引起我们的恐惧，我们担心你们会首先进攻我们。希特勒决定先发制人。却因此铸成大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是，苏维埃国家如此强大，我们的总参谋部和希特勒都失算了。”

从谈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希特勒的军官对形势作了正确的判断：他们已经看到无可挽回的失败，并企图通过缔结和约寻求出路。

离开叶得林斯克后，我又匆忙赶往比亚洛夫布热基，前往我军右翼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中将处。参谋长马姆钦上校向我汇报了情况。该军所属地带内的进攻发展顺利。近卫步兵第79、第88师已前出至普希贝舍夫、列德林、科茹霍夫地区。我们得悉，军长已前往第88师。我们决定去追赶他。在博尔基村的磨坊附近，我们看到一大群波兰农民，听到喊叫声和妇女的哭泣声。我们走下汽车。人群中让出一条路。我们看见前面躺着二具尸体，一个是45岁上下的男人，另一个是大约16岁的少年。我们脱了帽致哀。人群中的所有人都跟着我们摘下了帽子。

那个上了年纪男人的前胸满是弹孔。男孩的脸上也有3处弹伤。

“这是谁干的？”我们问道。

人群中发出一阵嘈杂声，大家都抢着回答，但我什么也听不懂。我让其中一个人慢慢对我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用俄语回答说，大约2—3小时前，溃退的法西斯匪徒冲入磨坊。他们抢了几袋面粉就要装上车运走。而这两个农民——父子俩人抓住自己的面袋死死不放手。于是一个希特勒匪徒举起自动枪，将一梭子弹射向孩子父亲的后背，另一梭子弹朝男孩的脸上打去……就在这时，苏军战士从林边赶来。

希特勒匪徒跳上农民的雪橇，仓皇逃跑了。

就在这时，从西面出现了一大队人。我还未来得及细看，这群波兰人就已经向队伍冲去。边走边咒骂。我立刻明白了，原来押来了一群俘虏。一名苏军中士带领两名战士押解着足有 80 个德国鬼子。这群俘虏样子怪可怜的。他们穿着薄薄的人造呢军大衣，个个都冻得发抖，步履艰难地走着。只有走在前面的两个军官态度傲慢。

我们本以为这些波兰人会扑向俘虏，猛揍他们。我们已打算进行适当的劝阻。以停止私自进行惩罚。但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男人、女人和少年们只是挥动拳头，大骂这帮法西斯匪徒。

“该死法西斯！”人群中响起一片怒骂声。

我们继续往前赶路。可是，两个被死的波兰人以及那个少年脸上的鲜血，久久地无法从我眼前消失。我想到成千上万、几百万死于希特勒匪徒之手的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中午，我们到达了集团军新的指挥所，它设在距比亚洛布热基 3 公里处的苏哈——什利亚赫茨卡村中。这时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不断有机群飞过，它们从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往返飞行。适合飞行的天气到底还是来了，我们的战鹰飞上了天空。

午饭后，我们摊开地图，用圆规和尺计算起来。进攻的发展越来越迅猛。这是由于我各坦克集团军已突入广阔的战役地区，并在多处楔入敌军的部署以及对其进行分割。今天，我们向前推进了大约 30 公里。而明日，即 1 月 17 日，我们计划向前猛进 40 公里。我们必须这样做。很明显，敌人力图突出包围，从华沙地域向拉瓦——马佐维次卡退却。而我们夺取拉瓦——马佐维卡这个大型的公路枢纽，便会破坏敌军有计划的退却，并使我军有可能将敌人各个歼灭。

十分清楚，目前最重要的是迅猛地向前推进。我们的进攻现在已经变为分路追击。这要求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将大部分兵力和器材保留在第 2 梯队之内，以防在与敌预备队遭遇时能够从纵深不断加强突击。我命令第 1 梯队各师均拨出强大的先遣队，各先遣队之间应保持 20—30 公里的距离。前卫部队应在主力纵队前方 10—15 公里处行动。各部队没有必要拥有过多的配属炮兵，应该让炮兵与第 2 梯队各纵队共同行动，并随时准备前往需要实施强大火力突击的地方。

傍晚，波卡兹尼科夫少将带着几名后勤人员来到我这里。他们提出要我们组建两个后勤纵队，每个纵队由大约百辆满载燃料和弹药的汽车组成。这两个纵队将在主要方向上行动，只有集团军司令员本人才有权支配这些储备品。

军事委员会委员 C·F·谢苗诺夫将军动身前往方面军后勤机关，要求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审议，并坚持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运送弹药的工作，应由方面军后勤部门负责实施，因为方面军后勤部门更有能力进行此项工作。

1 月 17 日凌晨，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A·B·普罗宁、炮兵司令员 H·M·波尔斯基将军及几名参谋人员前往第 1 梯队所属各师。在皮利察河渡口，我们赶上了近卫步兵第 39 师的部队（属于步兵第 28 军第 2 梯队）。该师第 120 团和配属给他们的一个炮兵营已渡过河去。这时从格日米翁察村开来一个坦克纵队，约有 20 辆坦克直朝渡口方向驶来。突然，我们发现，坦克装甲上漆着法西斯的十字符号。我炮兵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炮手们等敌坦克开到 400 米的距离上才开了火。第一排炮弹射出后，近半数坦克中弹燃烧，其余的坦

克一面回击，一面向村里退去。但这时第 39 师所属第 117 团已进入该村。团属炮兵发现敌坦克之后，立即展开并一齐开火射击。结果敌坦克纵队仅剩下 2 辆完整的坦克。被俘的坦克兵供认，他们属坦克第 25 师，该师经过 3 天战斗后，与上级司令部失掉联系。由于靠近新米亚斯托的皮利察河的渡口已被苏军占领，法西斯匪徒决定从其他道路突围。但却陷入了火袋。

我们渡过皮利察河之后，乘车沿堤行进，走了约 3 公里，在维维德诺村遇到近卫第 79 师所属第 220 团团长 M·C·舍伊金上校，他正指挥的团（属于师的第 2 梯队）带往萨德科韦采。上校报告说，近卫第 79 师司令部已前移，目前正在莫格利尼察——新米亚斯托公路线上。我们赶上拖得长长的行军队伍，迅速地驶到斯特雷库夫村附近的一个酒厂。我们注意到，酒厂工人和村民的行动有些奇怪：他们躲在墙后惊恐朝着同一方向张望着什么。我们仔细地看去，才发现那是一队德国人。他们在距我们半公里的地方，展开战斗队形。明明是在我们的后方，从哪里来的希特勒军队？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多想。敌人的机枪已开始扫射。

我们冒着弹雨跑向舍伊金团。我们的战士们散开队形，用机枪朝着法西斯鬼子猛扫。随后全团发起迅猛的冲击，并截断敌人的向西南的退路。此时，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坦克正在附近的森林里加油。坦克兵立即炮口对准希特勒匪徒，用炮火迫使敌军缴械投降。被我们俘获的德军官共约 1,500 人。他们来自不同部队，与指挥机关失去联系之后，正在向西退却。他们既无撤退路线，又迷失方向，更无任何指挥。

我们继续向新米亚斯托前进，途中遇到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所属近卫坦克第 11 军军长 A·X·巴巴贾尼扬上校（后来他成为装甲兵主帅）。他率领的坦克兵已经于夜间渡过皮利察河，白天就参加战斗，粉碎了正从华沙附近退却下来的敌军。现在，坦克军正与近卫师步兵第 79 师一起向萨德科韦采进攻。没过多久，我们又见到该师师长列昂德·伊万诺维奇·瓦金将军。他报告说，他的部队正在顺利地推进，各侦察队已经进抵萨德科韦采、特列姆巴切夫、柳巴尼亚一线。

我们在途中看到，我军官兵、主要是各后勤分队的战士和军官，押着很多德军俘虏从一些村镇里走出来。德军从维斯瓦河两岸撤退后，本来指望在自己阵地的后方稍事休息，但此地却变成苏军部队的后方。到处都是辎重、炊事车、军需仓库。希特勒匪徒有如丧家之犬，他们分散成小的团伙，有的拿着枪、有的连枪也没有。他们躲在牲畜棚、草垛、灌木丛中。

他们感到前途已无望，便投降了。

在新米亚斯托东边的一座小房子里，我们遇到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员卡图科夫上将。当时他正在了解自己部队的情况。我们互相交换了情况之后，决定一块儿沿通往拉瓦——马佐维茨卡的公路前往近卫步兵第 29 军，该军的部队正与卡图科夫的坦克部队协同作战。在离公路不远的的一个农庄里，我们发现了司令部的许多辆汽车停在那里。我们调转车头朝这些汽车驶去。在一幢二层楼的房子旁边，停放着各种样式的车辆，有俄国式和波兰式的马车、敞篷马车、大型带篷运货车和汽车。我们走进房里，看到餐室里有很多波兰人在用餐，其中有 7、8 个是我军的战士。餐桌上摆着罐头、面包、牛油、菜肴，酸黄瓜等食品，还有一些水果，两个军用水壶和两瓶酒。“你们好啊！”我向在场的人打招呼。

我们的几个战士一下子就站起来，身体挺挺笔直。

我故意装出严厉的样子问道：

“怎么，要把我们的战士灌醉？”

没有一个人答话。波兰人全都惘然不知所措。只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想必是从我们脸上发现了没有隐藏好的笑容，大胆地回答说：

“不是这样，将军先生，本来我们邀请您的战士顺便到这里来吃点东西，可是，您的战士却带来了这么多吃的，现在不是我们招待他们，而是他们招待我们！”“莫非你们是一家人吗？”我问。

“不，我们是从邻近的村庄来看望你们的战士的。”妇女回答说。

我们不想妨碍他们，因为在这种气氛中，我们的战士用不着将军的帮助就会找到话题的。波兰人一再请我们坐下来尝一尝农民们做的，汤、菜肴和自制的烧酒，但我们还是急于赶路。

我们在普基宁村赶上了近卫步兵第 29 军司令部和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所属机械化军的司令部。该村以南的拉瓦—马佐维次卡正进行着战斗。我军正在那里向分散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逐渐减弱，因为敌人已全线溃退。

我向近卫步兵第 29 军军长 A·C·舍缅科夫少将下达

了预先指示，要他向布热济内进攻，随后，我转向新米亚斯托，因为我的指挥所已迁往那里。指挥所已与部队沟通了联系，但还未铺设好与方面军司令部的有线通信。我与右邻突击第 5 集团军司令员通了电话。他的部队进展顺利，夺取了比亚瓦——拉夫斯卡，并准备继续向前进攻。而只有左邻第 69 集团军进展缓慢，目前，其先遣部队已远远落在我们的后面，但这对我们来并没有什么影响。

总的来说，情况是好的。1 月 17 日日终前，方面军中央突击集团（突击第 5 集团军、近卫第 8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1、第 2 集团军）在顺利发展进攻同时，已经进抵华沙至柏林的主经交通线和公路干线。我军没有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抵抗。

在该方向上，敌人的基本兵力已被粉碎，敌人在这里并无强大的预备队。我方面军的右翼集团（波兰第 1 集团军和第 47 集团军）在攻克华沙之后，正顺利地追歼残敌。方面军左翼集团（第 69 集团军和第 33 集团军）稍稍落后。确切地说，他们是在方面军中央集团之后成梯队行进。但并没有因他们的落后而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敌人已经没有预备队，已无法对我左翼构成威胁。

苏联元帅 A·C·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和苏联元帅 H·H·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进攻都发展得很顺利。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在 1 月 16 日日终前攻占了腊多姆斯科、琴希托霍瓦、扎维尔切三个城市，并从北面迂回西里西亚工业区。1 月 19 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部队攻占了普夏斯尼希、姆瓦伐、普洛次克、莫德林等城市，正沿维斯瓦河岸向托伦、但泽（格但斯克）等城市发展进攻，切断在东普鲁士的德军集团与外界的联系。

我们现在用不着特别担心两翼，就可继续开展迅猛的进攻。但与方面军司令部接通电话之后，我们接受了新的任务：1 月 18 日应切断从华沙至琴希托霍瓦的铁路，派出先遣部队夺取格卢夫诺、布热济内。为了加强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11 旅抵达了拉瓦—马佐维次卡。

为了不分散我集团军兵力，并形成一個有力的拳头，以进行机动，我决定把近卫第 4 军调到第 2 梯队，并部署在集团军的左翼。

进攻于 1 月 18 日凌晨开始。我们力图尽量充分利用白昼时间。集团军指挥所，确切地说，是司令部的整个第 1 梯队，已变成部队的移动指挥所。它沿新米亚斯托—拉瓦—马佐维次卡—布热济内公路干线向前移动。

近卫坦克第 1、第 2 集团军的坦克兵，不断加快进攻速度，已前出到通往柏林的汽车路干线。集团军司令部的第 2 梯队留在新米亚斯托，任务是与方面军司令部和集团军指挥所保持联系。集团军司令部的大部分军官和将军都随先遣纵队向前推进，就地对指挥员进行指导和帮助，并定期向我汇报战果。因此，我对局势总是了如指掌的。

指战员的士气甚为高涨，没有一个人抱怨行军速度太快。相反，大家都想尽快打到德国去。近卫第 28、第 29 军的纵队已于 13 时前抵达华沙—皮沃特勒库夫铁路，而侦察部队已进抵德莫辛、布热济内、加尔库夫地区。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大城市的轮廓。通过望远镜已看到林立在那里的工厂烟囱。这就是罗兹！罗兹是波兰的大型的工业中心，就人口来说，它仅次于华沙，居全国第二位。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已从此面迂回罗兹。我右邻突击第 5 集团军已夺取沃维奇市。此刻，我们与方面军司令部还没有联系上。我们必须单独作出决择：是继续前进，把驻有敌人大量守备部队的城市留在我军的后方；还是停留在该城城下等候命令？这两种方案，对我们都不可取。我决定对城市发起进攻，并立即制定了攻城计划。

我们要把部队停留在德莫辛、布热济内、加尔库夫地区，让部队吃好，并休息一昼夜。

在夜里 2 时前，师侦察部将查明敌人在城内和郊区的兵力部署。此后，近卫步兵第 28、第 29 军的第 1 梯队所属各师（共 4 个师）将开到城市附近，以便在黎明前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第 28、第 29 军的基本兵力将参加攻城，突击将同时从东部、东北部开始，并从西部穿过兹杰什向康斯坦丁努夫实施。近卫步兵第 88 师在宽大的正面上进攻，前出到皮翁捷克、奥佐尔库夫地区。在魏因鲁布将军的统一指挥下，由坦克第 11 旅和 3 个独立坦克团组成的坦克群，迅猛地实施机动，前出至城市的西郊，并截断敌人的退路。把近卫步兵第 4 军从预备队移动到集团军右翼。

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分别乘汽车前往各军、师司令部。他们带去了初步的、简要的预令。我们不打算在市内进行战斗，因为会使城市遭到破坏。因此，根据攻城企图，我们决定从城市北部和西部进行迂回，即从后方进行迂回。司令部当时就紧张地拟制战斗文书。

突然，接到方面军司令部下发的指令。它命令我们于 1 月 19 日前出到我们实际上已于前日占领的地区内。这使我们十分为难。

是方面军司令部搞错了，还是指令的内容由于经过几个通信枢纽部的传输而被曲解？这些我们已无法调查清楚。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们必须按原计划行动，并承担某些风险。

于是，我们向部队下达了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签署的攻打罗兹的命令。午夜，各军、师开始执行命令。

早晨，集团军司令部第 1 梯队向前进攻，在距主力部队不远的别日齐镇安置下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带领司令部的一组参谋和将军，前往刚刚占领的罗兹城东郊。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们一行人站在铁路交叉点附近。从北面传来了步枪、机枪的对射声，间或还能听到火炮的射击声。我侦察队未能获

得有关罗兹城守备队兵力的完整情报，但是，从枪战的性质判断，敌人无意固守该城。尽管我炮兵已经展开，可是我仍发出命令，没有特别号令炮兵不得射击。

此时，东方出现了数十架由歼击机护航的我军的“伊尔”式强击机。它们飞临城市附近时，在我第2梯队上空展开战斗队形，准备轰炸和俯冲扫射。我们为此焦急不安起来。飞行员们不了解敌我兵力配置，怎么能对城市实施强击呢？我们与航空兵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络。

我们急忙地将雨布、床单铺在地上，向飞机发信号。同时，向天空发射了绿色信号弹示意：“自己人”、“自己人”。这一切都产生了效果。强击机群离开了，很明显，我们的进攻速度出乎航空兵司令部意料之外。

在侦察分队的掩护下，我们又前移了一段距离，在一个公园里停下来。公园靠近教堂，教堂座落在一座高的小山丘上。从这里望去，整个城市几乎尽收眼底。我们看到，波兰居民正帮助我军侦察员捕捉希特勒匪徒，并要他们缴械投降。

午前，射击声从市中心移向城南。我们明白，这是近卫步兵第28军和魏因鲁布的坦克群发起了进攻，并把敌军赶向西南。突然，我观察所遭到德军炮火袭击。30发炮弹在炮兵侦察员附近爆炸。有2名军官被炸死，3名受伤。为了避免损失，我命令撤离该地区。

在铁路交叉点附近，我通信兵与集团军司令部第1梯队恢复了联络。

我要集团军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夫将军接电话。他报告：魏因鲁布将军的坦克群已前出至罗兹市西郊；第28军的部队已占领奥佐尔库夫、亚历山大鲁夫、罗多戈希；我集团军侦察分队已前出到罗兹—康斯坦丁努夫公路。敌仓皇向西南方向撤退。我军俘虏了大量的敌军，缴获了大批的战利品。别利亚夫斯基停了片刻，然后悲痛地补充说：

“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魏因鲁布胸部被子弹打穿，应尽快将他后送。”魏因鲁布将军受伤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难过。我们大家都高度评价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他勇敢、诚实、富有人道精神。这是战争以来他第3次负伤。他在战争中经历了白俄罗斯西部地区至伏尔加河的战斗历程，经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考验，尔后又与我一起，从伏尔加河跨过整个乌克兰直至波兰。这样的同志受伤，使我内心异常悲痛。

幸运的是，不久通知我说，马特维·格里戈里耶维奇没有生命危险……近卫第8集团军与坦克第9、第11军和空军第16、第18集团军的兵团协同作战，共同解放了罗兹城。我们乘车沿各街道走了一趟。法西斯匪徒曾想将这里的一切都按他们的格调进行改造。市内的主要广场从前叫自由广场，法西斯分子把它改名为“日尔曼”广场。希特勒分子企图通过这些作法强调，波兰不再是自由的波兰，今后德意志将是这里的统治者，波兰人只是无权的奴隶。在街道拐角处的房屋上，挂着写有德国街名牌子。所有商店的招牌都是用德文书写。在咖啡馆和餐厅的门上写着：“只对德国人营业，严禁波兰人进入。”最近，不再给波兰人配售粮食，波兰人应该饿死，以便给殖民者让位。这伙贪婪他人财富的占领者，就象一帮饿狼一样扑向城市。德寇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架设了一座小桥，犹太人只能通过这座小桥从犹太人区的一头前往另一头。犹太人无权上街。罗兹在希特勒刽子手的压迫下长达5年多时间。但是，城市并没有屈服，它铭记着1905年的罢工，它保留着自豪的自由精神。德军巡逻队经常发现征服者被暴尸街头。这是波兰爱国者无情的

正义审判！

占领者的兽行是没有止境的。当地居民告诉我们：有一天，一个波兰少年哈伊尔·沃隆斯基看到一具被打死的德国宪兵的尸体，他偷偷地笑了一下，被过路的一个法西斯军官看到了，这个年轻的波兰人当场就被打死。一个叫约瑟夫·潘夫斯基的只是因为给德国人指路没有指对，就被打死。另一个叫斯捷凡·普里贝茨基的由于在街上说了被禁止说的“俄国”一词。竟在盖世太保那里受尽酷刑。

罗兹机车库的一位工人对我说：“波兰人知道，只有俄国才能解放我们，才能把我们从必死无疑的法西斯刑讯室里拯救出来。全城的人都知道，罗兹城外有一座可怕的集中营。集中营划分为几个区，外面围有铁丝网。就在这里，斯坦尼斯瓦夫·波托茨基在经受了4个月的严刑拷打之后被打死。一个名叫约瑟夫·维钦斯基的，在这里受尽折磨，原因是他晚上上街了。按规定夜晚9时以前可以上街，但希特勒匪徒从晚上8时起，碰到人就逮捕或打死。”

工人的妻子补充说：

“就这样整整熬了5年，仿佛我们的生活已毫无希望了……”

“这不，红军来了，”工人继续说道：“法西斯刽子手狼狈逃跑，把什么都丢下了，他们丢下装满别人财产的房间和装满抢来的赃物的皮箱。”

当我们的部队开进城里时，楼房的屋顶、阳台和窗子上，到处都飘起了苏联和波兰的国旗。这是妇女们在漫长的冬夜冒着生命的危险缝制好的。现在，她们满怀解放的喜悦，用这些旗帜为自己的解放者装饰着胜利的道路。

由于我军对罗兹城实施迅猛的攻击，占领者未能将城市破坏掉。没有一座楼房被炸毁，电厂、水厂都在继续供电供水。

成群的居民夹道欢迎行驶在街上的坦克、大炮和满载步兵的车队。这是全民的节日。长达5年的黑暗日子终于结束了。自由的太阳在罗兹上空升起……

在长长的看不到头的汽车纵队中，有一辆载着一群战士的卡车在前进。你看，中士乌先科和下士韦尔季列茨基笑得多么开心。虽然他们身上被硝烟熏黑，脸上露出疲劳的神色，但心里却充满胜利的喜悦。谁也没有猜想到，这是两位英雄。

有人给我讲了他们的战斗事迹：

在战斗中，敌人在两座毗连楼房的窗户内架起机枪，阻碍着我步兵的前进。

“马克沁”重机枪射手近卫中士伊万·乌先科当即判明了情况。他同副射手韦尔季列茨基下士一起，将机枪拉到离我正在进攻的散兵线前方约100米处，把机枪架在一个高地上。

他打了一个长点射，便叫敌人的大口径机枪成了哑巴。再打两个点射，又消灭了盘踞在楼房地下室的敌自动枪手。这两位勇敢的机枪手还压制了敌人的3个发射点。受到鼓舞的步兵们投入了冲击。他们逐个楼房肃清希特勒匪徒。

但是，敌人调来了生力部队。德军1个营的兵力向着乌先科中士带领的机枪组的勇士们扑来。当敌人接近到200米的距离时，乌先科的机枪开了火。法西斯鬼子都卧倒在地上。他们匍匐前进，企图包围我们的战士。乌先科和他的战友们扔出了手榴弹，狠揍敌人。我军坦克此时也赶到了。经激战

后，德军这个营被我军全歼。机枪手伊万·乌先科将 34 名俘虏（带头的是一个德军中尉）押到司令部。

有多少这样的英雄进在我军的行列中啊！

我军的战士们用微笑回报罗兹城的居民们的欢呼。坦克、火炮和汽车都没有减速，它们隆隆作响驶过街道。因为战士们急于继续向西前进。前方还许多新的城市正待他们去解放。

傍晚，我们得到消息，在莫斯科，为了对解放罗兹的部队表示祝贺，鸣放了礼炮。

2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 1 月份从维斯瓦河发起的进攻，已作为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载入史册。

战役计划规定，我军应于战役的第 10—12 天前出至罗兹。而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突击第 5 集团军，只用了 6 天时间就前出至该地区。原计划每昼夜推进 10—12 公里，而我们则推进了 25—30 公里以上。

这种前进速度不能不对部队的供给产生影响。在制定后勤工作计划时，一个微小的误差此时都会酿成巨大的灾难。无论是弹药、燃料和给养，均未能按应有的数量满足部队的需要，而当时，后勤部门的能力又很有限。并且，罗兹解放之后，方面军指挥部又向我们下达了任务，令我集团军：当所有的供给基地能满足部队需求的时候，应以高于战役开始阶段的进攻速度向前推进。

1 月 23 日，集团军所属部队抵达波兹南、斯卢普察、岑任地区。先遣支队已前出至格涅兹诺和符热希尼亚。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有可能在敌人占领瓦尔塔河沿岸的阵地之前，就突破了这些阵地。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进攻速度，以便不落在坦克兵之后。就在这时，电话中突然传来了方面军下达的使我们大出意外的命令。

鉴于波兹南的守敌已被合围，攻城又可能拖延时间，方面军司令员命令我：把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行动和刚赶到的第 69 集团军部队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务必在 1945 年 1 月 25 日前攻占领波兹南。

在此之前，波兹南并不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作战界限之内。第 69 集团军本来应该进攻波兹南。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该集团军会落到如此之远，以至我们必须掩护自己的翼侧，防止敌人从集结了大量守备部队波兹南向我实施突击。这时必须立即调转我集团军的进攻方向，但这远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集团军按先前预定的方向向西前进，已成了惯性。

我立即与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这才知道，原来坦克兵已进抵瓦尔塔河河岸，甚至还夺取了登陆场。可见，他们的突击，像投出的一把梭镖，深深地楔入了瓦尔塔河防御地区。他们甚至打算从行进间突入波兹南，但由于在城市东部受阻才停了下来。

坦克兵侦察证明，夺取波兹南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方面军的训令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吗？解放波兹南已经成为一项复杂的军事任务。

通过侦察和审讯俘虏得到证实，波兹南城内的全部堡垒以及该城整个要塞的防御中心——核心堡均已做好防御准备。

从军事科学的角度看，波兹南是一座典型的要塞。它是根据著名的筑城家沃班建造要塞的蓝图修建的。位于防御中心部分、即防御核心的堡垒群，形成了核心群。不论堡垒还是核心堡，都建筑在地下，其内部可容纳大量守备部队。

至于法西斯军队的利用了多少旧式的工事，后来要塞又得到哪些兵器和工事加强，这些我们当时均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要在在一昼夜内拿下这样的要塞是不可能的。

我各侦察队已前出至沃博尼基、波兹南地段的瓦尔塔河。集团军司令部立即给他们下达了紧急任务：查明防守波兹南要塞和瓦尔塔河岸的敌人兵力部署。侦察员很快就报告说，在沿岸预先构筑好的防御阵地上，只有少数地段有敌人防守，而且兵力薄弱。但是，波兹南城市和各要塞工事，则配备着威力强大的火炮，并有重兵把守。他们多次设法突入城内，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所有情况说明，我们有可能在波兹南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并使敌人赢得时间。敌人将把被击溃的部队撤到德波边境上预先构筑好的筑垒地域，我们则被迫再次突破，并摧毁其防御地区。

我右邻突击第 5 集团军司令员 H·S·别尔扎林上将通

知我，根据他们的侦察得悉，敌人正在施奈德米尔（今名皮瓦）市构筑坚固的环形防御。南方的弗罗茨瓦夫（今名布雷斯劳）要塞也在构筑环形防御。

与别尔扎林通过话之后，我对自己的看法深信不疑，即敌人已经决心坚守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并正在那里部署大批守备部队。只要能够阻止我主力前进，以便赢得时间对被击溃的部队进行整编，并占领有利的防御地区，敌人是在人所不惜将这些部队置于注定被包围甚至被全歼的境地。

过去，我们在北顿涅茨进行过激战；我们攻陷了扎波罗热，那里的工事曾被德军指挥部建成第聂伯河防御体系中最强大的支撑基地；我们在尼科波尔地域的防御配系内进行过交战；我们的波兰的土地上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战斗。而所有这些战斗，都不能与我们在波兹南所面临的任务相比拟。一方面，这是由于这里有异常坚固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也由于法西斯匪徒们要在这里进行垂死挣扎。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会战的结局如何，反正只有死路一条。要塞的每一个保卫者都明白，只要他们举手投降，希特勒分子就会在大后方将其家眷全部消灭掉。

因此，方面军定下决心：我主力及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将不卷入夺取波兹南的战斗。同时制定了具体计划：以全部三个军的兵力强渡瓦尔塔河，然后，从南面和北面迂回波兹南，并朝西向奥得河进攻。这样，如果波兹南要塞的守敌按兵不动，无意撤离或企图突围，我们就对其进行封锁。下一步行动再视情况而定。

我动身前往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遇到集团军参谋长 M·A·沙林将军，随后又遇到 M·E·卡图科夫。我们共同分析了形势，对已下定的决心——近卫第 8 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主力不加入夺取波兹南的战斗，而对该城进行迂回，并以主力继续向奥得河实施进攻等等，从细节上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我用电话将这些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汇报。

1 月 25 日，集团军司令部第 1 梯队在波兹南以东 12 公

里的斯瓦任兹镇展开。约在 12 时得到消息说，我军已在波兹南南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段强渡了瓦尔塔河，夺取了几处登陆场，并在向西挺进的同时，不断将其扩大。我军多次试图攻占波兹南东部堡垒的外廓，发起了新的冲击，但未取得任何战果。因为正如侦察队所报告的那样，在那里进行防御的部队，兵力十分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波兹南要塞予以严密的封锁。因为敌人可以突出包围，并从后方对我进攻部队实施突击。最佳方案是歼灭守敌。因此，当天就决定，让已经在城北夺取了登陆场的近卫步兵第 39 师（师长 E·T·马尔琴科上校）对城北的堡垒实施突击并将其占领。

命令正在坚守波兹南以南登陆场的近卫步兵第 29 军军长，用两个师的兵力从南部和西南部对要塞的堡垒发起攻击。集团军的坦克群将在波兹南以南渡过瓦尔塔河，并前出至尤尼科沃地域，在那里作好战斗准备，一旦敌人从市内向西撤退就将其歼灭。近卫步兵第 4、第 28 军的主力继续沿瓦尔塔河岸向西进攻，其当前的任务是：在行进间夺取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并前出至奥得河。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任务是：其主力应在波兹南城南全部渡过瓦尔塔河，然后实施高速进攻，不让敌人退守预有准备的防御地区。

这时，从东面封锁波兹南各堡垒和工事的只有近卫步兵第 82 师一个师，而且是在宽大正面上展开的。第 69 集团军的部队还未到达波兹南附近。统帅部预备队炮兵成纵队尾随部队行进。该炮兵分成两个强大的炮兵群，即北群和南群。数百门火炮直指要塞。总攻时间已经确定在 1 月 26 日晨。

正当我们准备攻打波兹南的时候，我友邻第 69 集团军的部队还落在后头，距我们尚有两昼夜的行程。这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敌人的抵抗是十分顽强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各坦克兵团和步兵兵团实施了复杂的机动：一部分部队准备攻打波兹南要塞的工事；另一部分部队准备向奥得河突进。无论如何都要赶在敌人前面。大家都明白，在战役开始阶段，以迅猛的进攻速度所赢得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异常宝贵的。

1 月 26 日，当我强击部队在波兹南城内与守敌展开战斗的时候，近卫步兵第 4 军和第 28 军的部队从北面绕过波兹南，迅猛地向前推进，两天时间前进了 60 余公里。至 1 月 28 日傍晚前，他们已前出至谢拉库夫（今名季尔恩巴乌姆）列维察地区。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在波兹南以南顺利地渡过了瓦尔塔河（渡河指挥是集团军副司令员 A·N·格特曼将军），并成功地向布克、梅德日涅茨发展进攻。

当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敌人正匆忙地从西线和国土纵深将部队调往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同时，被我各集团军进攻部队击退的敌军也退向该地域，企图在奥得河一线集结。1 月 27 日，方面军司令员在下达的命令中提醒我们对此加以注意，并要求我们尽快地向奥得河推进。

正是此时此地，首次在作战文书中，作为现实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了“柏林”这个词。方面军司令员在 1945 年 1 月 27 日的命令中强调说：“如果我们能夺取奥得河西岸，那么，在攻打柏林的战役中，我们将稳操胜券。”在军内，谁都知道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从不迷恋于毫无根据的幻想。在他的命令中，“柏林”这个词作为当前任务对我们下达。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读完这项命令后，我们是多么的激动。

在辽阔的疆土上，我们冒着炮火，跨过了千山万水，渡过了酷暑严寒，克服了无数的江河障碍，攻克了一座又一座的堡垒要塞，现在，我们已经直接接近战争的最终目标……

方面军颁布了命令：每个集团军抽出一个加强的步兵军，配以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箭炮部队，并立即将其前调，以加强已接近奥得河的坦克部队。

我们懂得，如果敌人赶在我军攻克梅泽里茨筑垒地域之前，就在通往奥得河的接近地占领了防御，那么，我军将要在那里消耗大量的兵力。现在，争取时间就是关键！

我军右邻突击第5集团军正在迅猛地向前突击。

第69集团军的部队终于赶到了。

该集团军所属的1个军（第91军，由两个非满员、装备也差的师组成，军长是E·A·沃尔科中将），于1月27晚抵达波兹南附近，划归我指挥，以便对波兹南的要塞工事实施进攻和强击。

此时我们得知，城内守敌连同后备军的一些营在内，总计达6万人。后来，据波兹南城防司令马特恩将军供认，当时城内守备部队的组成是：两个士官学校、1个强击炮预备教导营、11个内卫营、机场维护部队、1个航空兵教导团、两个军官学校、两个工兵营、当地党卫军分子组成的1个“伦采尔”战斗群，还有由休假士兵和在上几次战争中被歼灭的摩托化第10师、步兵第251、第6、第45师的散兵游勇组成的17个连。整个集团由克内尔上校指挥。他是从警察少将马特恩手中接过守备部队指挥权的，后者由于没有作战经验而被停职。

当时马特恩仍留在波兹南协助新任要塞司令的工作。在我军接近波兹南筑垒地域的前一天，克内尔被授予将军军衔。

波兹南城的环形防御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地段。东部地段由克内尔亲自指挥，南部地段由霍尔德费尔德少校指挥，西部地段由曾任第5军官学校副校长的埃贝雷斯特少校指挥，北部地段由施雷茨少校指挥。

守备部队指挥部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决定坚守该市，直至最后一个士兵。除了利用堡垒、永久火力点、土木质发射点之外，敌人还利用住房和其它建筑物进行巷战。

城内有许多物资仓库，库里装满武器装备、各种弹药和给养。这样，守备部队即使在城市被完全合围的条件下，也可以长期坚持作战。

德国军事专家在使要塞适应现代战争的战术要求的同时，还在城市周围易受坦克威胁的方向上，挖掘了防坦克壕，构筑了野战发射阵地，以便对通向防坦克壕的接近地和各条道路进行射击。沿道路两侧还修筑了星罗棋布的发射点。在发射点内配备了反坦克炮和重机枪。

例如，仅在库尔尼克至波兹南全长4公里的公路上，我们就发现了多达40个机枪散兵坑。

散兵坑后面是可供反坦克炮进行圆周射击的发射阵地。

所有野战工事都通过一个总的火力配系与遍布城市周围的要塞堡垒进行联系。堡垒是地下工事，他几乎不露出地面。每座堡垒周围都挖有宽10米、深3米的壕沟。堡垒用砖砌墙，并有直射和侧射的发射孔。

从我军在波兹南南郊和西郊所占领的堡垒的结构来判断，不论在工事附近、还是在工事内部的全部射击手段，敌人都可以用来对付我们。波兹南最大的一个堡垒称之为核心堡。它呈不规则的五角形，位于城市的东北部。核心堡的守备部队多达1个师。

核心堡的墙壁和顶盖厚1.8—2米。核心堡的四周围着壕沟和土墙。每个角上都构筑有要塞工事——多面堡和三角堡。要塞内部有很多地下室和坑道，有单层和双层的作仓库的掩蔽部用的建筑物。

城市的防空设施由 18 个钢筋混凝土平台组成。台上有高射炮，并筑有坚固的便于炮手掩蔽和存放弹药的掩蔽工事。

敌人还将城里的一些砖砌建筑物进行改建，使之能够进行防御。这些建筑物具有良好的环形视界。半地下室和楼房的第一层窗户全都用沙袋堵死，只留射孔和观察孔。在楼房的上面几层配置了机枪手、自动枪手和长柄火箭弹发射手。

德军几乎将市内的全部空地和公园都用作炮兵阵地。

我们根据已掌握的侦察情报制定了攻城计划。1 月 26 日晨，总攻开始。近卫步兵第 27、第 74 师从南面实施主要突击。正如俘虏们供认，此次突击是出人意料的。结果，在瓦尔塔河西岸、城南面的两个堡垒被我军占领，这就使我们得以将部队和坦克投入堡垒圈，并从敌后攻击敌人。确切地说，是从敌人堡垒群的内侧攻击敌人的。在城南地段内取得成功，使坦克集团军安全地渡过瓦尔塔河，并掩护了近卫步兵第 29 军的交通线。

近卫步兵第 39 师从北面发起的攻击未获得重大的战果。

我们没有从西部发起攻击。我们有意在此处留下一个出口，并期望敌人利用它退出要塞。但是，我们的打算落空了，因为敌人并不打算放弃该市。这时我们才明白了，夺取波兹南，必须进行长时间较量，决非几日之功就能得逞；必须重新调整战斗队形，再次使用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曾使用过的强击群和强击队。

编入强击群的步兵、工兵、喷火器手、侦察兵、坦克兵和炮兵，各自受领了专门的任务，他们密切协同消灭敌人的任何一个抵抗基点。

1 月 28 日，我们再次攻城。除了近卫第 8 集团军的 4 个

师和加强兵器之外，参加攻城的还有从第 69 集团军调来配属给我的两个师。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给希特勒匪徒下达了一道最后通牒，其内容如下：

“波兹南城被围的守军官兵们：波兹南城已经被合围，你们已经没有出路。我，崔可夫将军，奉劝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并在战争结束后遣送你们返回祖国。否则，你们将被歼灭，波兹南市的许多居民，也将因为你们的罪行而无辜牺牲。

举起白旗，勇敢地向我军走过来吧！

崔可夫将军。”

我们没有看到白旗。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迫使敌人折服。炮兵航空兵对要塞工事实施了突击（我们没有攻击城市的建筑物）。坦克和各步兵分队协同作战。我们毫不吝惜地使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炮弹、储备品，核心堡的所有地面工事均被我彻底摧毁。堡垒的守敌纷纷躲入地下工事。

我强击群和强击队得到 152 毫米加 203 毫米重炮连的加强。

大部分战士，尤其是工兵，都学会了使用缴获敌人的长柄火箭弹。这种武器不论用在巷战中，还是用在消灭抵抗基点的战斗中，都很成功。在攻打一个堡垒时，我们的工兵将长柄火箭弹射入它的通风孔。一声爆炸就毁坏了通风管道的隔板。随后战士们向通风孔内灌入了混合燃烧并将其点燃。由此而引起的熊熊大火迫使堡垒内的守敌投降了。

攻打“博宁”堡垒的战斗，是由一个强击群进行的。这个群由下列分队组成：1 个非满员步兵连、1 个 82 毫米迫击连、1 个工兵连、1 个发烟兵

班、2 辆 T—34 坦克和 1 个 152 毫米炮兵连。

在对这个堡垒进行精密的炮火准备之后，强击群在烟幕的掩护下冲入中央入口。他们成功地占领了两个中央大门和一个控制通向这些大门的射击室。但敌人从其它射击室用步枪、机枪猛烈射击，还使用了长柄火箭弹和手榴弹，结果，我发起的冲击被击退。

我们立即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原来，我们仅从主要入口一侧攻打堡垒，而忽视了从其它方向牵制敌人。这样敌人就可以将全部兵力和火力集中于一处。除此之外，实践还证明，攻打这样的堡垒，152 毫米火炮的口径还是远远不够的。

第 2 次冲击是在我重炮兵使用混凝土破坏弹对堡垒进行了精密的炮火准备之后才开始的。强击群从三个方向接近敌人。炮兵在攻击过程中继续对敌人的射击孔和未被摧毁的发射点进行射击。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敌人放下武器投降了。

当时有一座强大的永久火力点严重地妨碍着我军前进。瓦西里·普罗斯库林上尉指挥的一组工兵受领了消灭这个火力点的任务。工兵们带着手榴弹和炸药向火力点爬去。一个步兵连进行掩护，他们用反坦克枪和轻机枪向敌人的射孔射击。

普罗斯库林和他的部属迅速地接近了火力点，但是火力点内的敌人招来了火炮和迫击炮的炮火支援自己。我们的战士毫不踌躇，他们冒着雨点般的弹片，爬到火力点跟前，并在射孔旁安放了 50 公斤炸药。爆炸波将敌人震得呆若木鸡。工兵们冲入火力点。经过短暂格斗之后，火力点的守敌被消灭了。

我军在战斗过程中对敌人在市内用来进行防御的建筑物，是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攻击的。

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大楼的攻击可以认为是最典型的方法。该大楼工事坚固，并由一伙希特勒的亡命徒固守着。进行巷战时，强击群隐蔽地接近秘密警察大楼，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该楼的一部分。大楼内的战斗打响了。由于守敌疯狂地抵抗，我多次试图攻占楼房都未获成功。

强击队队长命令炸毁楼房。强击群的 6 个工兵，用他们现有的炸药捆成一个重 75 公斤的集团装药，把楼房的底层炸毁。爆炸破坏了地下室的顶板和底层的内墙。但是，躲在地下室和上层的敌人，不顾这些破坏，仍继续拚命顽抗。于是决定再次进行爆破。工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将 175 公斤炸药分成两个集团装药运到楼房内，并分别安放在底层不同的房间内，然后进行同时爆破。爆炸摧毁了楼房，并彻底消灭了党卫军的亡命徒。

该强击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在步兵与工兵以及其它兵种的分队之间，组织了良好的协同动作。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近卫步兵第 83 团的一个强击群要在敌人占领的一所楼房的墙壁上打开一条通路。而该楼房的门窗全被盘踞在相邻楼房上的敌人用火封锁。

有工兵参加的强击群，通过地下室潜入了相邻的一栋未被敌人占领的房子。工兵用 35 公斤炸药在这个房子的没有门窗的一面墙壁上炸开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位于敌人的射界之外。强击群通过刚刚炸开的通道在烟幕掩护下，接近了敌占楼房的没有门窗的一面墙，并用 40 公斤炸药将墙壁炸开。步兵迅猛地冲入刚炸开的通路，扔出了手榴弹。他们将敌人逐出了这所房子，

俘虏了敌军官兵 41 名。

由于采取了这些战斗行动，使敌人的火力协同遭到了破坏，我军得以渗入邻近的楼房，很快就将整个街区的敌人肃清。

截止 2 月 5 日，各强击群已彻底肃清了市内各居民区的敌人。核心堡、舒林格区东部、赫瓦利谢沃和格洛夫诺仍然处于被围状态。这一天，我将近卫步兵第 39 师从攻打波兹南的战斗中抽出来，并将其派往奥得河方向去增援第 28 军，该军正在奥得河左岸为夺取登陆场而战斗。

当时得到消息，在我右邻第 61 集团军那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在施奈德米尔要塞地域内，被围的守敌突然于夜间以全部兵力向我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部队发起攻击。为了击退敌人的这次反扑，我从近卫第 8 集团抽调了坦克第 11 旅前往支援右邻；为了防止波兹南方面的守敌也采取类似的突围行动，我们加强了各强击群的夜间行动，并用火炮将敌人的堡垒和三角堡的出口严加封锁起来。

2 月 12 日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波兹南的敌守备部队的防御中心——核心堡上面。我军越接近这个中心，敌人的抵抗就越顽强。有人会说：为什么非要花大力气一味强攻呢？将其封锁起来，用绝粮的方法去夺取不是更好吗？这是因为：核心堡的旁边是一个铁路枢纽站，这个枢纽站对于方面军所有部队的供给运输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对核心堡的强攻一直继续到核心堡里面的敌人被彻底消灭为止。

核心堡内盘踞着以两个城防司令（前城防司令马特恩将军和怙恶不悛的纳粹分子克内尔将军）为首的约 1 万 2 千名官兵。

这个核心堡建在一个小山上，它控制着整个城市。堡垒和三角堡上面覆盖着 3 米厚的土层。

靠里面的一些堡垒和三角堡，由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隔开，从外面难以接近。从暗炮台可以用侧射火力扫射这条壕沟，而进攻者却看不到射孔。壕沟的两壁用砖砌成，高度 5—8 米。坦克无法通过这个障碍。为此，我们调来重炮支援坦克。从 300 米的距离上用这些重炮轰击核心堡。但是，即使 203 毫米的炮弹击中堡垒的外壁，也无法造成严重的损坏；而炮弹落在堡垒和三角堡的土质覆盖层上，爆炸后也仅留下一个弹坑，就像用铲子挖掘已耕耘过的土地一样。

我曾经说过，德国士兵不管怎么样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我们亲眼看到，纳粹分子是如何镇压那些企图恢复理智的人。有一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我，因此，我不能不在这里谈谈。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观察炮击核心堡的效果和强击群的战斗行动，我们将自己的观察所向前推进到紧靠战斗地点的市立大剧院的最上层。随我一同前往的有军长舍缅科夫将军和我的副职杜哈诺夫中将。我们看到，壕沟后面的要塞内墙上出现了一大群举着白旗的德军。他们将武器扔到地上，表示要投降。我军弄清了事态之后，停止了射击。就在此时，我们发现站在围墙上的那群德军士兵越来越少，他们纷纷倒下，三三两两地滚到壕沟里。不久，整个围墙上已空无一人。

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确实，准备投诚的士兵是被他们的军官击毙的，子弹是从暗炮台射出来的。

这件事说明，要塞里的守敌是一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将要长时间地顽抗到底。我把各部队的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命令他们准备好对核

心堡进行最后的攻击。

我集团军已经向西挺进的部队此时已在奥得河边展开战斗。我和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每周要在波兹南和奥得河之间往返二、三次。

我部队进行巷战已有多日，我们不得不逐个房子地去肃清希特勒匪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伏尔加河战斗中积累的经验对我们大有帮助。

我各强击部队和分队楔入波兹南城越深、距离核心堡越近，敌守军的防御就越顽强，战斗也越激烈。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配属给近卫第8集团军的坦克部队，特别是A·C·伊万诺夫少校指挥的坦克独立第259团。从攻打波兹南开始，坦克兵就与步兵和炮兵密切协同作战，他们勇敢、顽强、机智。坦克兵创造并运用了新战斗方法。例如：在巷战中，坦克双车进攻，即行驶在街道右侧的坦克，对位于街道左侧的目标进行射击；左侧的坦克则向街道右侧的目标射击。

当我各步兵分队需要在敌炮火之下进行转移时，坦克停下来排成两列，用车体形成一条直廊，步兵沿该走廊运动。这样，坦克以其装甲和火炮掩护了步兵，使后者能以较小的损失通过敌人的火力网。

这样的作战方法，在任何一本条令中都是没有的。它是我军官兵依靠智慧在战斗中直接产生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参谋人员迅速地推广军人的这些智慧成果，使新的斗争方法变为所有分队的财富。为此目的，宣传员进行了宣讲，还出了战斗快报和报纸。

据已掌握的情报，核心堡的守敌拥有1个半至2个月的水、食品和药品储备。如果我们对堡垒频繁的攻击，只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因此，我们决定让部队休息一下，给炮兵和航空兵运送弹药，并将炮兵和重型坦克部署在可对射孔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地方。

为越过壕沟而需用的云梯、跳板和束柴都已准备就序。炮兵使用国产的大口径炮弹对敌人进行了猛烈的急袭射击。他们成功地在要塞的砖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随即下达了命令，要火炮对缺口边缘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以扩大缺口。很快，这里被打开了一条宽5米的通道。工程兵在这里、在壕沟外侧安放了大威力的应用地雷，以便把壕沟壁炸塌，填平壕沟，使坦克和自行火炮通过它进入核心堡。

2月18日开始的总攻，昼夜不停地持续了4昼夜。

我们还使用了喷火器。但是，背囊式喷火器未能压制住敌人的发射点。因为喷火手无法爬近沟边，而从20—25米远的距离上喷出的油柱又不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于是，我们决定使用炸药桶。在步兵火力掩护下，5—6名工兵匍匐前进，将炸药桶推到沟边，点燃了导火管后，使劲向射孔推滚过去。火药桶的爆炸将法西斯的机枪手们都震聋了。乘敌人火力减弱的机会，工兵将云梯放入沟内，架设过沟的跳板。步兵顺着云梯攀爬上要塞的围墙，并在它的南坡挖好了掩体，有些地方在围墙顶上也挖了掩体。

2月19日16时，工兵部队受领了任务要在要塞的壕沟上架桥，以便团属炮兵通过。架设固定桥脚的桥梁的地点，选在被我大威力炮兵打开的沟墙和围墙的缺口对面。

随着夜晚的来临，工兵将事先准备好造桥用的材料运到沟边，但不久架桥作业即告中断。因为敌人用长柄火箭弹和机枪不停地向破口射击。我们迅速地采取了新措施。由于我们进行了大威力的爆破，敌人的1号多面堡暂时沉默了。士兵们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在黑夜中架设桥梁。黎明前，一座

长 12.5 米的桥梁将壕沟两岸连接在一起，虽然它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半小时后，敌人用长柄火箭弹直接射中了它。这座桥便被摧毁了。但这并没有使我突击部队停止前进。

2 月 21 日清晨，这座桥又被重新修好了。在烟幕的掩护下，我军把 14 门火炮运过桥去，其中一部分火炮立即向敌人工事的射孔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

中午，开始架设可通过坦克的 30 吨桥。这座桥建在供炮兵使用的大桥旁边，是木垛桥墩桥。

我认为，只有将坦克投入核心堡，才能迅速消灭被合围的敌军集团。因此，我催促尽快架桥，这项任务交给了工程兵第 261 营。营长亲自进行了侦察，并决定对土围墙和要塞壕沟墙进行爆破，以造成一条坦克可以进入的斜坡通路。半夜，响起了剧烈而巨大的爆破声。壕沟外墙和土围墙被彻底摧毁。为了减小斜坡的坡度，又补充进行了 3 次爆破。2 月 22 日夜 3 时，坦克第 259 团、重型坦克第 34 团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突入了核心堡。只是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匪徒才成群地、从 20 人到 200 人不等，开始向我投降。

在所有地段上，都在进行激战。核心堡西面三角堡被我步兵第 27 师的近卫军人与坦克第 259 团和第 34 团的坦克兵封锁。副师长 M·A·杜卡将军命令三角堡的守敌投降。法西斯军官拒绝了，敌人继续抵抗。杜卡将军过去曾任白俄罗斯某游击兵团的副司令员，他采用了当年游击队惯用的方法来对付敌人。他们将装满重油的大桶燃烧着后顺着斜坡滚向三角堡内的主要入口。灼热的、令人窒息的浓烟将法西斯匪徒从他们的巢穴中呛了出来，他们爬出三角堡，高举着双手投降。

要塞及其守敌存在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投降的敌军告诉我们，在要塞的地下工事内，已挤满了伤员。水管被炸坏，士兵们正在遭受口渴之苦。我不想让他们白白地流血，因此，再次通过无线电敦促被围的敌人投降。但是，敌人此时仍不接受我们的呼吁。他们毫理智地集中了最后的兵力，投入枉然的反冲击。

这是红军建军节的前一天。虽然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但大家的心里都充满节前的欢乐。由于预感到胜利已为期不远，这种心情就变得更加强烈。2 月 22 夜，在市立大剧院的一个房间里，各军军长和师长正在举行会议。

这时，近卫步兵第 74 师师长巴卡诺夫将军被叫去接电话。他回来后报告说，电话是从核心堡中央大门打来的。敌军的谈判特使到了那里。巴卡诺夫请求允许他回去接待他们。不久他报告说，要塞的守备部队准备投降，前要塞司令马特恩将军就在他的身旁。一刻钟过后，马特恩少将像火车头喷气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几乎是使尽全力才勉强地进我们正在开会的房间。这是一个体重 130 多公斤的大胖子。他喘了一口气，然后将要塞司令克内尔将军写的一张纸条交给我。克内尔请求苏字军当局对伤员给予帮助。

“克内尔本人在哪里？”

“自杀了！”

当我问马特恩将军自己有何感想时，他耸了耸肩说：“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纳粹党员，既然知道进行抵抗已无希望，那么，就不想白白流血。希特勒完蛋了！”

马特恩说，在波兹南的 6 万德军官兵当中，尚有战斗力的仅有 1 万 2 千人左右。他们现在准备无条件投降。

1945年2月23日，在苏联红军建军28周年的光荣节日里，我国首都用224门大炮齐鸣20响，以示庆贺我军在波兹南所取得的胜利。

波兹南的浴血奋战持续了整整30个昼夜。这场战斗是残酷的，它使士兵们疲惫不堪。

看来，参战的战士们不能不因此而丧失诸如对敌人也讲点同情怜悯的这种人类的本性。然而。苏联军人的人道主义者的高尚形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有一次，我有机会读到西德的一个叫托尔瓦尔德的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书名是：《这发生在维斯瓦河》。作者在书中说到苏联解放波兹南的战斗情景时，竟硬说什么苏军战士占领了德军医院后，虐待了被俘的伤员，苏军医生还拒绝给他们治疗。

就这个问题，我访问了当时积极参加了这些事件的人、现波兹南市荣誉公民、历史学博士、教授M·A·谢里亚加上校。他是这样答复我的：

“确实，在近卫步兵第27师的进攻地带内，在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有一所德军医院。根据师长的命令，我参加了一个接收医院的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医院全是收容受伤的德军战俘。作为这些事件的参加者。我要坚决地驳斥西德历史学家的无耻诽谤。德军医生移交给我们的数百名伤员，他们挤在又潮湿又阴暗的地下室内，处在没有食品和饮水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而我们却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当时的战斗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

应该指出，托尔瓦尔德的书问世之后，有关在波兹南的德军伤员命运的问题，在1962年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西德曾公布了希特勒大本营作战会议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出版者和注释者G·盖贝尔，在引用那个托尔瓦尔德的话，并为希特勒1945年2月召开的一次例会作注释时，写道：波兹南要塞司令马特恩将军，似乎是由于苏联当局在最后通牒中威胁要枪毙所有被俘的德军伤员，才于2月23日投降的。

当时，我的工作是用扩音器向波兹南要塞的守备部队广播我军最后通牒的内容。因此，我有充分根据揭露资产阶级诽谤家的这种欺骗宣传。况且，在这个问题上，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大约在2月初，崔可夫将军向德军被包围的守备部队发出最后通牒，建议他们停止抵抗。经过几天之后，即2月11日，在对要塞发起决定性攻击的前夕，朱可夫元帅又向被围的守敌司令官发出新的最后通牒。在两次最后通牒中，均未进任何威胁。不但如此，还强调，停止抵抗将使数千名官兵的生命得救，如果哪个苏联军人破坏了苏联人民所固有的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战俘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那么，根据战时的严厉措施，他将受到惩处。”

3

正当马尔琴科的近卫步兵第39师、近卫步兵第29军和步兵第91军攻打波兹南的时候，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后来还有第69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在坚决向西挺进的同时，前出至德国边界，并越过边界径直地向敌人领土纵深迅猛突进。

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我进攻的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我第8集团军进抵德国边界的日期是1945年1月28日。战士们按

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欣喜心情。在国境线的界桩上，我看到这样的字迹：“这就是法西斯德国！”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个时还不可能在战士们思想上将国家、人民和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占领者在我国及波兰领土上的兽行，他们还记忆犹新。我凝视着这些字句，就回想起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也引起自己的顾虑；我们俄罗斯人会不会将愤怒发泄在德国这块土地上！

我集团的政工人员早已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以便使战士们正确地对待当时的时局，防止发生任何过火行动。

红军政治机关对些问题异常重视。《红星报》在2月9日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的父辈曾这样说……当然，我们完全不应该简单地理解这个提法……不能将事情想像成这样：比如，两条腿的法西斯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强奸我们的妇女，或者进行抢劫，而我们为了报复，也干他们那种事。”

越过第三帝国的边界线，不能不使我军士气大振，不能不对他们的进攻锐气产生影响。

所有的人，从士兵到将军，都在奋勇向前挺进！

执行航空侦察任务的飞行员回来说：德国境内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难民的队伍；铁路运输受阻，道路边沟被许多小汽车塞满了；成行成列的难民涌进柏林，又从那里朝四面八方散去；人们惊惶失措奔逃。

我们的无线电截听员有时让我们看柏林广播电台播发的一些很有趣的材料。记得，柏林电台以极简短的形式报道前线的局势时，是这样评述当时的战局的：“东线局势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

希特勒企图以神秘主义来消除人民的不安和忧虑。他在1月30日对德国人民进行了最后一次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是：“上帝在7月20日保全了我的生命之后表示，他希望我仍然是你们的元首。”希特勒在这里所说的7月20日事件是这样的：1944年7月20日，曾经有人对希特勒进行了一次谋杀。但由于偶然的原因未获成功，希特勒侥幸活了下来。从此之后，他便开始残酷地镇压对他的统治心怀不满的人。

我们毫不怀疑，他作为元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要塞守备部队的垂死挣扎、元首的恳求、秘密外交和政治阴谋……所有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不知何故，我常常回想起青年时代的很多往事。

……1919年10月，托博尔河上的顽强战斗达到激烈化。白匪疯狂地进行抵抗。敌人将精锐部队、其中包括所谓高尔察克最优秀的伊热夫斯基师投入了反冲击。该师由莫尔恰诺夫将军指挥。由于参加了9月的战斗，高尔察克授予该师一面乔治旗。但是现在，该师也无法阻止苏军的进攻。它在格利亚金斯克耶、波克罗夫卡、达维多沃地域陷入了合围，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托博尔河粉碎了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之后，我各团的侦察队和骑兵连大胆地脱离本团，深入到敌后。他们在日利诺村进行了一次袭击。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个团的白匪军在村中驻守，当我骑兵从敌后冲入村中时，白匪的团司令部当即失去指挥，一个团的白匪四散而逃。

攻打巴特列沃村的战斗更是有趣。当时我在亚罗沃伊村边靠风磨旁的观察所里，根据发射的闪光，我发现敌人的火炮位于教堂旁，正向我方射击。

我立刻拿定主意，要在夜晚或清晨袭击敌后，夺取这些火炮。我把侦察员古里亚诺夫和桑尼科夫叫到跟前，我们共同确定了路线。在谈话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亲自参加这次出击。我们派苏哈诺夫带一个骑兵侦察班在天黑之前布置好路标。

古里亚诺夫的全队人马，在苏哈诺夫的骑兵侦察班出发之后，作好了出发准备。为了以防万一，我命令第1连也做好战斗准备。这个连是由机智勇敢的沃尔金指挥的。我委托副团长（他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在黎明前带领全团作好发起进攻的准备。进攻的信号是向敌驻地射击。当时我们还没有信号弹，电台就更谈不上了。

这是一个月夜。我们顺着一个又一个的路标前进。走在前面的是40多名骑兵，随后是沃尔金连。至夜里一时前，我们来到奇斯托耶湖地区，苏哈诺夫在那里迎接了我们。他报告说：在两条路（分别通往洛帕特基和苏赫缅）的叉路口那边，在一片大树林中，发现有篝火，看样子像是敌人的辎重队。

我决定由古里亚诺夫率领20名骑兵和1挺机枪前往叉路口；沃尔金连隐蔽地接近小树林，并争取尽量不打枪就收拾敌人。1挺机枪和20名骑兵留下由我掌握作为机动。

夜里约2时许，两支队伍出发了。大约在4点钟，看见了小树林。林中有三堆阴燃着的篝火。沃尔金向每堆篝火派去了一个排。他们要隐蔽地爬到跟前，一弹未就俘虏敌人。

这时，月亮已接近地平线，地面上的阴影拉得长长的，篝火发出的火光显得越加明亮。

小树林中确实有团的一类辎重队、两箱炮弹、3辆炊事车、3辆双轨卫生车、20辆大车，约100名士兵和两名军官。军官里有一名是军医。这个树林里的全部守敌被沃尔金连不费吹灰之力、也无任何伤亡就俘获了。

沃尔金立即向我报告，俘虏中有2名炮兵，他们带着电话和电线。

“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我说。

带来的是两个来自托木斯克的小伙子。他们俩人的肩章都已撕掉了。

“为什么你们急于撕掉肩章？”我问他们。

“我们是被抓来的。我们再也不想跟我们自己的俄罗斯人打仗了。”“你们把电线拉到这个小树林里干什么？”

其中一个回答：

“详细情况不知道，但听上司说，天亮前要把两门炮拉到树林边，并进入阵地。”

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队伍已经来到敌人的炮兵阵地上。敌人的火炮马上就可能到来。

因此应该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我们把全部俘虏都押到树林的东边。沃尔金换上了敌人军官的军大衣。他带领被俘的两个电话兵来到树林边。他的1连人也在那里展开，骑兵则布置在两侧。

拂晓来临了。从巴特列沃村出现了一个跟一个地缓缓而行的敌人的辎重队。有两辆六套马车分别拉着炮和炮手，它们赶过了辎重队。他们朝已被我们占领的小树木径直地奔来。说实话，当时我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因为没有把握，战斗的结局会怎样呢？

沃尔金和被俘的两个电话兵都佩带上敌人的肩章。他们开始挥手，引

导炮兵如何展开。

跑在炮兵连前面的一个军官向右转了半圈，将火炮引向林边。这正是沃尔金所希望的。我步兵根据他的哨声唰地站了出来。

“站住！”

敌人的炮兵乖乖地站住了。只有那个军官，当他明白了是中了埋伏之后，调转马头飞驰而去。雅科夫·亚库波夫和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追了上去。他们想对他进行两面夹击。枪响了，是那个军官在用手枪射击。他打了7枪后。子弹没有了。亚库波夫用刀背朝军官的头部砍去，但是因为用力过猛，军官摔下马就死了。

侦察员们带着白匪中尉的马、武器、带肩章的军大衣和文件回到我这儿。

根据缴获的文件得知，敌该炮兵连属于步兵第11师的炮兵营。此时，在巴特列沃村的西面。响起了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随后又传来炮声。枪炮声离我们很远，约有5公里。我们知道，这是我团转入了进攻。我决定赶去支援。

我将被俘的敌人炮兵召集到火炮跟前，对他们说：

“在这之前，你们为高尔察克将军和反革命效劳。现在，你们将为俄罗斯劳动人民为革命服务。把炮架好，瞄准村里的团部，准备向你们的白卫军军官射击……”

火炮很快地作好了准备。我在红军训练班里学到的炮兵知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从小树林向西到巴特列沃村，地形象桌面一样的平坦。可以用普通炮弹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随后，当敌人的步兵出现在村东时，再使用榴霰弹射击。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起初，向教堂方向发射了10发炮弹。据俘虏口供，那里有敌人的团观察所，不久，野战电话（村里的炮兵连观察所与我们这里的发射阵地进行联系的电话）嗡嗡地响了起来。

我去接电话。听筒里传来了骂声：

“为什么朝我们的指挥观察所开炮？叫中尉来接电话……”

“这么说，炮弹打得很准。谢谢您的校正，”我回答：“再挨一排炮弹吧！”于是，我当即命令向敌人进行急促射击。

几分钟后，辎重队开始向村外移动，白匪的散兵线也在撤退。我骑兵前往将其拦腰切断，并将他们赶向小树林。古里亚诺夫带着几十名骑兵向敌步兵奔去，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他们举起双手投降，对不想投降和进行还击的人，白卫军士兵自己就把他们消灭了。

遭到前后两面夹击的白匪第44团被彻底粉碎了。我们俘虏了约600人，其中有8名军官，还有两门3英寸口径的火炮，7挺机枪和其它许多物资。团长及他的副官不愿投降，并用左轮手枪还击，直到子弹耗尽，我骑兵追上去，将他俩劈死了。

这次战役结束之后，我团便开向洛帕特基。

我军的进攻速度日益加快。高尔察克的师团，象融化的蜂蜡一样，逐渐被消灭干净。

我们亲眼看到高尔察克的哥萨克部队是如何被消灭的。夏天和秋天，

他们隐藏在森林地带，经常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10月中旬过后，天气变冷而且下了雪。这样，敌人就无处可藏了，因为树叶脱落，雪地上可以留下清晰的脚印。我们过去掌握了对付敌人步兵的方法，现在又学会了对敌人骑兵斗争的有效方法。

我团成立了几个轻装雪橇队。雪橇队由1个步兵排或1个步兵连组成，配备2挺机枪和15至20名骑兵。这些雪橇队在与团的其它分队保持目视联络的同时，在宽大的正面上，对现地进行仔细搜索。当发现树林中的敌骑兵后，他们就合围并用机枪扫射敌人。

如果遇到大股敌人，他们则绕到敌人的翼侧或后方，等主力到达后，再一起去消灭敌人。

我军进抵伊希姆河后，得知哥萨克兵由于不愿远离自己的家园，不愿继续撤退，他们纷纷逃离高尔察克，藏身于干草垛中。在这些地方，我军侦察员要用长枪和马刀刺探草垛和粮食堆，看看是否藏有敌人后，才从其旁边通过。经常发现有人拿着枪支和马鞍，而这些东西是红军特别紧缺的。

这样，在进攻托波尔河的红军部队的打击下，白匪军的一些精锐的团队再次被粉碎。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我军且战且进约250公里，10月末已前出至伊希姆河。

在这些日子里，战斗在白卫军后方的游击队，也加强了活动。他们炸毁敌人的仓库、辎重和司令部，并与红军部队会合。

第43团来到伊希姆河后，各营都分来了很多来自库斯坦奈的年轻的游击队员。这是一些身体强壮而且十分勇敢的人。他们把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和严寒看作是最得意的境界。他们为遭受抢劫和屠杀的无辜的人们报仇，他们无情地狠打白匪。他们在冲锋中一往无前，在弹雨下也不弯腰，就是炮弹也不能阻止他们前进。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展开肉搏战，而肉搏战则是高尔察克白匪最害怕的。

这些年轻人补充进来之后，增强了团的战斗力。

我军各部队的士气日益高涨，而白卫军则恰好相反。无论前线后方，敌人的士气都明显地下降了。不仅士兵、军士、哥萨克兵，就连军官也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在我看来，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甚至简直是在寻找无条件投降的机会。

当然，不能说高尔察克军队在1919年11月就已丧失了抵抗能力。当我军对他们发动的进攻并不十分坚决，而他们仍有可能保持战斗队形时，白匪军尚可保持战斗能力。但是，当他们失去既定目标，并变得优柔寡断时，只要勇敢地行动，即使是以小部队去突入其战斗队形，也是完全可能的。

有这样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11月4日，在布格罗沃耶村地域内。该村位于彼德罗巴甫罗夫耶克东北40公里处。我们得知，村子已被白匪的两个步兵团占领。

早晨，我带领部队从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基村向布格罗沃耶村出发时，途中遇到第237“涅维尔斯科”团团长。我们商量好进行协同动作。

预定第237团穿过梅特利希诺村从南面对布格罗沃耶村进行迂回，我团则从北而进攻，以便共同突击粉碎敌人。

于是，我们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出发了。

在距布格罗沃耶村3公里处，我碰到了侦察员们。

“村子已被大股敌人占领。”他们向我报告。

就在此刻，南面传来了射击声。这是第 237 团进入了战斗。根据事先的约定，我将 1 营和 3 营展开，他们立即向村北发起进攻。同时，骑兵对敌翼侧和后方进行深远迂回，2 营则留作预备队。

第 43 团地段内的战斗按计划发展正常。我们占领了村西北边缘。这时，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湖。该湖从村中央向西延伸约 3 公里。我们应该在湖的后面与第 237 团会合。但是要各营从湖面上通过是危险的，因为冰还很薄。

没过多久，我发现了一队人马绕过村子和湖泊从东南方向向西北进攻，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一队步兵。所有队伍又都与骑兵侦察群和单个骑兵混杂在一起，一时很难分清这是哪方的部队。如果是敌人，那么，我团翼侧将遭到突击的威胁；如果是自己的部队，那么，他们简直是迷路走错了方向，正在向不该进攻的方向进攻。

不能再犹豫了。我命令预备营做好与那支队伍作战的准备，自己带着彼得·亚库舍夫向前奔去，以查明情况。

此时，暴风雪骤起，它尤如一面白色的布幔，将我们面前的地带时而遮上，时而显现出来。由于在队伍的前方和旁边有一些小股的骑兵侦察队在疾走，我们得以悄悄地接近了他们。这时我才看清，那支进攻的队伍是白卫军，而向村子行进的纵队，则是被解除了武装的第 237 团的红军战士。

现在，我和通信员已处在白卫军的战斗队形内。幸好暴风雪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混杂在敌人的队伍里。

看来，敌人的队伍现在处在麻痹大意之中。这就提醒我应该立即行动。但是如何行动？朝自己的部队往回走，那是危险的。敌人将会认出我们，会朝我们背后开枪，把我们结果了。不，不能向后转。

我们穿过淡淡的雾气，跑到敌人队伍的尾部。风卷着雪花在白匪队伍的后面上下飞舞。

在敌人的队伍后面，有军官缓步走着。我当时有两支左轮手枪。我先拿出一支；有选择地射击。我骑马跑到近前打了 5 枪，5 个军官应声倒地自己的士兵后面。那些士兵竟连头也没回。因为，在如此混乱之中，有几声枪响是不足为奇的。

随后，我赶到被俘的红军战士那里。他们由哥萨克匪兵押送着。我拿出另一支左轮手枪射击。3 个哥萨克兵相继摔下马鞍。此时，我的通信员却开始自作主张，他不但没有从后面掩护我，反而去收集那些被击毙的哥萨克兵的带马鞍的马匹。

这时，被俘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哥萨克兵是被击毙掉下马的，于是立即扑向其它的押送兵，夺了他们的武器。听到我的口令：“向后转！从后面射击白匪！”之后，红军战士们信心倍增，他们把那些失去指挥的白卫军士兵俘虏起来。

这时，有两个哥萨克骑着马朝我奔来，大概是想弄清我是什么人。

我将其中的一个击毙，另一个则掉转马头朝村里飞奔，在激愤之中，我向他直扑而去。

赶上之后，我一把抓住斜挂在他背后的步枪。劲用得如此之猛。以致他从马上掉下来之后，头撞在冻得硬梆梆的土地上，便一动不动了，

我朝四周一看，才知道原来我已处在白匪四面包围之中。

我的通信员彼得落在后面。怎么办？突然我发现，那不是我们团的勇

猛的侦察兵吗？就是要有这样的敏感，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侦察兵们举着红旗，从东面疾驰而来。他们推测得那么准确！正是此时此刻在我们急需援兵的时候，他们高举红旗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似乎告诉敌人，他们后面至少有 1 个团的红军骑兵。这准是古里亚诺夫想出的好主意，其实他只带领着 14 名侦察员。

我们趁白匪惊慌失措，自己一无伤亡就俘虏了 300 名敌人，其中有 6 名军官。

11 月 5 日清晨，我第 43 团接到旅长斯特罗加诺夫的命

令，要第 43 团朝红洛格村方向进行侧敌行军，去增援步兵第 45 团。从布格罗沃耶村至红洛格村的距离是 25—30 公里。而从简短的命令中又无法弄清，第 45 团出了什么事，需要对它进行什么样的支援。

我们之间没有电话联系。我们只好改变原定的方向，沿战线向北前进，去解救友邻。11 月份的白天很短，我们行军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前才抵达红洛格村。根据推测，我旅第 45 团应该在这里。但是侦察员刚一接近村边，即遭到枪击。为了防止误伤自己人，我停止了进行间的攻击。我派出侦察员沿村子四周再次进行侦察，他们又遭到射击。真见鬼！如果这里驻着白匪，那么，我们的人又在哪儿呢？最后，终于传来了大队人马行进的嘈杂声。这支队伍是从伊希姆河朝着村子开来。侦察员判明，这支队伍是我第 45 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见到团长 F·T·克列诺夫，他向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

“11 月 3 日晚，我团从西面抵达红洛格村。白卫军第 45 团也在同一时刻从东面朝村里开来。红洛格是个大村。村子被满是树木的沟壑分隔得十分零散，夜间就更不容易辨清方向了。

11 月份的夜晚又长又寒冷，越下越浓的雾使夜晚变得更长更黑。战士们急于找住房和取暖。双方都减少了行军警戒，人们摸着黑朝各个农舍走去。农民们没有油灯。他们把马铃薯挖空，放上一块炼过的脂肪，再放进一支棉灯芯，点燃起来光冒黑烟，灯光却很微弱。这就是当时的灯。就是这样的灯也不是每家都有。

冻得发抖的人们，一踏进屋门，就躺在地上进入梦乡。在某个角落里还进行着大致是这样的对话：

‘你是哪个连的？’

‘你问的是我吗？我是 9 连的。’

‘我是 8 连的。劳驾挪一挪，让我躺在这儿。’

或者是这样的对话：‘你是哪个团的？’

‘我是 45 团的。’

‘我也是。先睡觉吧！明天再去打听我们连在哪儿。’

白卫军的警戒设在村西，我们的在村东。白匪 45 团的司令部设在牧师家，红军的团司令部则设在教堂执事的家里。人们又累又冷，匆忙吃上几口东西，就都睡着了。寒冷的大雾之夜，将敌对双方同时收容在同一屋檐之下。

清晨，当晨曦开始透过结满冰霜的小玻璃时，农舍中又进行着这样的谈话：

‘你是哪个连的？’

‘3 连的。你呢？’

‘我也是 3 连的。怎么，你还带着肩章？’

‘你的肩章呢？你是什么人？你是红军吧？’

于是，展开了一场肉搏，还有一些人跑到屋外，动用了武器。

我军的哨兵下岗时在街上抓到一个白匪军官，可糊里糊涂地把他押送到白军司令部。刚一迈进牧师的家门，我们的人看到茶炊后面坐着的都是一些白匪军官，于是，开始了一场枪战。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枪战也越来越激烈，并很快席卷全村。当时的惊慌混乱的情况是难以描述的。最后，白匪开始从村内向东撤退，红军则向村西撤退。

在一段时间内，村子无人占领。白匪首先察觉这一点。中午，他们就折了回来，没放一枪一弹，就将村子占领。我团则向东撤到伊希姆河上的一些居民点。”

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捧腹大笑了一阵，就提议从正面、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合力消灭白匪第 45 团。克列诺夫表示赞同。1919 年 11 月 5 日夜，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机动。

白匪被彻底击溃。士兵们躲藏在村子里的农舍和草棚里。

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们才将他们全部抓获。

这是我在东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战斗。尔后，我们几乎是不停顿地进攻。

不久，第 5 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高尔察克将军本人和部长会议主席佩佩利亚耶夫也在伊尔库茨克被俘并被枪毙。

当时我觉得，我们已经接近决胜点，接近我们一生中的最后的一次交战。当然，当时我还不能预测到，我和我的同胞还将在与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再次经受更艰巨的考验。现在，当我回首半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并可以骄傲地说：是她，是战斗的青春带领我去参加战斗，并使我学会了如何去消灭我们的敌人。

4

在强攻波兹南的日子里，我过了 45 岁的生日。

在这段时间里，在方面军的地段上，即在我近卫第 8 集团军及其左、右邻的活动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夺取波兹南的战斗，仅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军的前进，而最糟糕的则是供给问题。燃料和炮弹的缺乏，是勇敢和果断精神无法弥补的。

我们的苏联铁路员工，为了保证前线源源不断的供给，奋不顾身，努力工作。军用物资的运输规模是巨大的。当我遇到身穿铁路员工制服的人时，看着他们就象看到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

2 月，敌人为了加强柏林方向的部队实力，从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陆军总部、西线、苏德战场的几个地段上，抽调了大量各种编成的部队和 18 个师，其中包括 3 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

此外，我们已经进入敌人构筑有最强大的筑城工事的防御地带内。只有威力巨大的炮兵，才能给我们带来胜利；只有步兵和装甲兵的协同动作，才能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就是需要炮弹！炮弹呵……军事行动的逻辑是无情的。如果在战斗中，后勤部门不能保障供给战士所有的必需品，那么任何辩解，任何正当的理由，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后勤，也仅仅是后方勤务、是遵循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行动而已。正如我们已经知道，方面军司令部原计划实施的 1 月进攻战役时间是 10～12 天，其进攻纵深也比实际的进展情况要小得多。

要使后勤部门的工作重新适应部队的进攻要求，也就是速度更快、纵深更大，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几天的时间内，部队的供给距离显著地拉

长了。汽车运输的行驶里程也加大了，行驶时间成倍增长使燃料的消耗也加大了。总之，前线和前线的战斗均要求后勤供给人员坚决履行其职责，任何疏忽和任何差错都将使数千名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总之，不管任何情况，进攻要求这样做。而我们越接近奥得河，越深入德国的核心，供给问题也变得越复杂。

尤其是加强兵器（炮兵、工程兵和航空兵）已落在进攻部队的后面。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必须操心，这就是要保管战斗中缴获的物资。我指的是德国占领者从苏联掠夺、运走、现在在溃逃时又沿途抛弃的物资。这是人民的财产，应该将它们收集保管起来。负责物资供应的同志们看到缴获的饲料、服装和其它物品装满了许多仓库时，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为了使所有运输工具不再往前线运送不需要的物资，以此来加强燃料和弹药的前送，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在瓦尔塔河的各个渡口上都布置了阻截队。他们对往返于前线的全部车辆进行检查，只放行部队作战所必需的物资。其它一切物资都必须卸下车，在渡口就地储存起来。

为了节省汽油，凡是从前线返回的空车有半数要牵引拖回来。缴获的全部燃料都进行登记，并严格控制使用。我们把缴获的酒精，再加上其它成份，混合在一起作为燃料使用。我们还将缴获的火炮，炮弹和所有完好能够使用的武器，都收集起来，用来同敌人进行斗争。

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时，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决不能让进攻速度放慢。当前主要任务是：攻克奥得河前面的筑垒地域，尔后强渡该河。这就是为什么当波兹南还在激战时，我就决定将集团军司令部迁至普涅维，以靠近进攻部队的原因。

指挥员们都有这种体会，司令部要是总跟在你脚后，你就会感到好象有人在督促你，使你不由自主地尽力向前推进。

1月28日—29日，近卫军第8集团军所属4个师，近卫

坦克第1集团军所属2个军进抵奥布拉河。根据侦察情报，我们想像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我坦白承认：将我们的兵团投入攻打敌人的坚固工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我们的炮弹储备已消耗殆尽。而等待其他部队到来，并运来弹药再行动是不行的。丧失时间就等于失败。我详细地分析了情况，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从行进间攻击梅泽里茨筑垒地域。近卫坦克第1集团司令员M·E·卡图科夫也作出同样的决定。

尽管当时夺取波兹南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我仍得以两次到达在第1梯队内进攻的近卫步兵第4军第35师。师长U·F·格里戈里耶夫上校是一个勇敢果断的人。我在1939年就认识他，为了发现各支撑点之间和各防御地域之间的接合部和间隙地，他正确地组织了隐蔽而细致的侦察。侦察员们还抓回几名俘虏。通过审问，了解到了有关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发射点配置的某些情报。

侦察说明，敌人正匆忙地通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调来几个新锐师。果然，1月31日清晨，其中1个师穿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前出至奥得河，而那里已有我军部队。这样，在奥得河和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尚未被我全部占领）之间的地带内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我们没有掌握敌人的永备防御工事配置的详细情况，因此在与敌军进行遭遇战的过程中，不得不寻找敌人各工事之间的迂回路和间隙地。幸好，

刚开到的希特勒的满员师是新组建的，他们显然也并不熟悉自己的工事配置，因此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火力威力和利用有利的阵地，虽然作战顽强，但不够得力。如果德军这个师熟悉该防御地区，并再有哪怕两昼夜的时间分析情况、组织火力配系和协同动作，那么，我们的处境，就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持久战，并遭受重大的损失。现在敌人被我们的突袭打得措手不及。应该说，天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利。当时是阴天，能见度不好，蹲在永久火力点内的敌人有时也无法搞清敌我位置。

在敌人的筑垒地域内与敌人刚赶来的生力部队进行这场遭遇战，充分地反映出我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在战役战术方面的成熟程度。他们巧妙地组织和各兵种间接协同动作，对敌人的纵队和战斗队形从翼侧和后方进行包围、迂回和突击……。德军这个师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消灭了。

1月31日，我军仅用1天的时间，就几乎彻底地攻克了筑垒地域，并歼灭了勒贝将军的15,000人的生力师。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仅击毙的敌军就不少于15,000人，约20,000人被俘。

现在，距奥得河仅剩40公里了，而距柏林大约有100公里。不仅指挥员经常看地图，就是战士们也都争着看地图。

我左右友邻的行动也很顺利。我右邻突击第5集团军已大大地向前推进，并向科斯钦（屈斯特林）方向发展进攻。左邻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攻占了曼济热次市，并已与我齐头并进。3个集团军的进攻正面已经拉平了。翼侧不再受威胁，这使我们非常高兴。尽管部队已很疲惫，可是2月1日清晨，我军又开始向前推进了。

这里是茂密的森林地带。防守之敌可以轻易地隐蔽、伪装，并向我进行突然袭击。如果对森林进行搜索清剿，那么，我方的兵力和时间均显不足。应该说，广阔的森林现在对德国士兵极富吸引力。他们在第聂伯河、布格河和维斯瓦河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现在又脱离了自己的被击溃了的部队，所以他们已完全不想再去听任纳粹军官的摆布，不想在没有被打死以前再去进行反冲击了。就这样，在奥得河前面的森林中，就隐藏了数万名等候事态发展的德国士兵。

对他们怎么办？将如此之多的德军士兵留在自己后方，我们实在不放心，因为有朝一日，法西斯军官会不会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重新投入战斗呢？在这里，斯大林格勒的作战经验又被我们采用了。我们向森林中派出了许多小型的强击群。也象在巷战时那样，他们独立行动。敌人的士气，已不是三年前的样子了，他们看到形势已无希望，看到他们的上司正把他们引向死路。现在德军士兵已经不再叫喊：“希特勒万岁！”而是经常叨唠：“希特勒完蛋了！”我各强击群大胆地行进在林间小路上。德军士兵远远看到他们后，就从自己隐藏的地点走了出来，扔掉武器举手投降。战士们将俘虏编成组，每组150—200人。派出押送俘虏的人员很少，一般每组4至5人。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我们开玩笑地说，这与其说是警卫，还不如说是向导。他们给德国人带路，以免他们再次迷失方向。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即强击群不得不与一些德国士兵进行战斗。因为他们企图与他们的部队会合，并有组织地从森林中突围，向道路干线靠拢。于是，近卫军战士们就切断敌人的退路，驱散已纠集起来的队伍，用武力迫使他们投降。

我们已接近奥得河。这是一条大河。它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从

南向北蜿蜒 725 公里。从拉蒂博尔（现拉齐博日）市到波罗的海，全河道都可通航，是重要的交通动脉。冬季结冰期只有 1 至 2 个月。

中游从奥波莱市至科斯钦的河面宽 100 至 225 米不等，深 2 米有余。下游，由于有诺特奇河和瓦尔塔河注入奥得河，河面宽度加大到 300 米，平均水深 3 米。春汛时，水深可达 8 米。

奥得河，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然，法西斯指挥部也非常重视这个地区。

在奥得河与其支流瓦尔塔河的汇合处，是德国东部最大的筑垒地域，这里筑有科斯钦要塞。在这两条河上架设了几座桥梁，几条最大的铁路干线和公路干线汇集在这里。科斯钦要塞封锁着直接通柏林的道路。因此，称它是通向德国首都的大门是当之无愧的。

奥得河上的第 2 个筑垒地域是布雷斯劳，改称弗罗茨瓦夫，按古斯拉夫语则称作布拉季斯拉夫。这是一座古老的要塞，曾在奥普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德意志帝国从凯撒皇帝对东方进行掠夺战争时起，到其后的法西斯德国，都对古老的工事加以现代化，并且构筑了大量新的工事。布雷斯劳筑垒地域是阻塞通向布拉格和通向萨克森的主要中心——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屏障。

在布雷斯劳筑垒地域和科斯钦地域之间，有一个格洛高要塞，它控制着四周的平原。可以预料，对此要塞敌人势必拚死固守。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市，也被法西斯分子改造成为坚固的筑垒地域。而且，希特勒总参谋部对它特别重视，认为它是柏林的第二道大门。

1945 年 2 月 1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直逼奥得河

边。不等加强兵器的到达，我即命令近卫步兵第 4 军从行进间强渡该河，以便于 2 月 2 日傍晚前、在攻占左岸的一个登陆场之后，占领科斯钦南郊基茨、曼什诺夫、拉特什托克等地。

近卫步兵第 28 军受领了强渡奥得河并攻占哈坚诺夫、波杰利齐格、克列辛地段的登陆场的任务。左翼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也已经前出至河边，但因没有渡河器材无法渡河。右翼突击第 5 集团军于 2 月 1 日使用就便器材开始渡河。

各强渡地段都需要空中掩护。根据我的请求，方面军司令员将高射炮兵第 16 师配属给我们，该师由 A·M·谢列金将军指挥。该师本应于拂晓前抵达各渡口。但是，由于没有燃料，高射炮兵晚到了 1 昼夜多。

2 月 2 日上午 10 时，我到达近卫步兵第 4 军军长格拉祖

诺夫中将的观察所。该观察所位于科斯钦以南扎比采村附近的一座堡垒的废墟中。该军所属部队已经在科斯钦和古日策之间的堤坝上展开完毕，正准备渡河。我用炮队镜观察奥得河。这是一条被两岸堤坝围在中间的大河。我近卫战士集结在右岸。这是多么重要而又困难的时刻呵！冰很薄，不用说是技术兵器，就是步兵踏到上面也很危险。当时我们没有制式的渡河器材。尽管如此，近卫军战士还是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登上右岸。他们带着杆子、木板和一束束的干树枝。他们边走边铺铺板和渡板。某个地方还成功地将反坦克炮渡过河去。战士们把火炮的轮子放在自制的滑橇上。用手将火炮从冰上推过河去。

遗憾的是，部队的渡河没有持续多久。在近卫军人的头顶上空出现了德国的“福克·符夫”式歼击机。这些飞机以每批 9 架或 7 架地从低空向渡

口扑来，进行轰炸扫射。现在多么需要谢列金将军的高射炮师啊！但是他们不在这里，我歼击机也没有来，因为他们转移到奥得河附近的新机场去了，这些飞机也缺乏燃料。我们只好将反坦克枪连和机枪手们投入了战斗。敌机被打中了多少弹孔不得而知，但我亲眼看着两架“福克·符夫”起火燃烧，坠落在我军占领的区域内。被我俘虏的飞行员供认，德国航空兵的任务是破坏俄国人横渡奥得河。

应该坦率地说，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在夜晚到来之前停止了渡河。夜里重又恢复渡河。但是渡河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本来就不牢固的冰面有许多地方已被炸弹炸穿。

虽然在白天只有小规模部队渡到左岸，但他们还是夸取了几个不大的登陆场。

我已经提到，在梅泽里茨筑垒地域由勒贝中将指挥的师被我击溃并几乎被全歼。将军本人当了俘虏。他被押到我的前进指挥所（当时设在斯隆斯克市以南的塔尔图夫村内）。他肩部受伤。我叫来医生，给他的伤口换了药。勒贝将军喝着茶，吃着夹肉面包，对我讲了下面的事情：

在措森的总参谋部内，没有任何人认真地把前线的情况告诉他。显然，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的师尽管满员，但缺乏训练。该师任务是：占领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前沿，并与永备发射工事内的守备部队共同进行防御；阻止苏军前出奥得河；收容所有从华沙溃退下来的部队，并将他们重新编成战斗部队，然后派去参加筑垒地域的防御。他说，他的师通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前出至筑垒地域，但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没能抵达前沿，就与苏军遭遇，并被击溃。倘若该师提前1昼夜前出至筑垒地域，并占领防御的话，那么，苏军就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将其突破的。

2月2日，渡过奥得河的我方侦察员，渗入到塞洛—科斯钦公路，俘虏了两个德国军官。这两个军官是在希特勒的总参谋部工作。他们的供词证实，连德国武装力量陆军总参谋部也不了解柏林这个主要方向的情况。

在接近奥得河时，近卫第79师师长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瓦金受了重伤。事后，该师侦察连连长维克托·利西岑上尉将事情经过告诉了我：

在接近奥得河的森林中，还流窜着成群的德军步兵的散兵游勇。瓦金将军转移到新的观察所。与他一同前往的有该师和配属部队的一组参谋人员。侦察员们乘坐的卡车在前面行驶。突然从树林中冲出一群法西斯匪徒。他们人很多，约有1个营。侦察员们首先向敌人开了火。听到射击声后，将军停下汽车，朝自己的战士们跑去。瓦金师长用驳壳枪打完一弹夹子弹后，又开始重新装填，就在这时，一排机枪子弹击中他的前胸。

师的另外一个侦察组赶到现场。他们协力猛攻，解决了战斗：希特勒匪徒逃走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当了俘虏。伤势很重的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瓦金被送往医院。幸好子弹没有伤到心脏，他活了下来。

2月3日黎明前，高炮师终于赶到了。渡河的速度开始加快。这回，敌航空兵遭到我高射炮兵浓密火力的痛击。敌机一次起飞就损失了3架飞机，以后再不敢以大编队轰炸我军。

这样，近卫步兵第35、第47和第79师的部队就几乎毫无损失地渡到左岸，并将各炮兵观察所也迁到对岸。我们逐渐扩大已夺取的各个登陆场。把它们合并为整个集团军的统一的登陆场。但是，我们仍无法加快向西进攻的速度，这是由于炮兵和坦克兵的基本兵力仍在右岸。要把重炮和坦克渡过

河去，就需要架设桥梁，或使用大型舟桥，而这些器材还在方面军的大后方，未能及时运至奥得河各渡口。

在夺取登陆场的战斗中，我军指战员表现了极大的勇敢精神和熟练的战术素养。

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6连，是第一批参加夺取奥得河左岸81.5高地的战斗。该连由近卫上尉阿法纳西·斯皮里多诺维奇·萨韦利耶夫指挥，他出身于阿尔泰地区的一个猎户。萨韦利耶夫巧妙地布置了兵力，于夜间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夺取了三座土木发射点，并把近1个营的希特勒匪徒打得狼狈逃窜。天亮前，敌人清醒过来后，随即转入反冲击。萨韦利耶夫将法西斯匪徒放入谷地，然后从已占领的土木发射点内，用机枪向敌人猛扫，用手榴弹朝着来回乱窜的希特勒匪徒投去。敌人进行了3次反冲击，可每次都在战场上留下数十个死伤者之后仓卒溃逃。在敌人向土木发射点猛扑的谷地里，遍地皆是敌士兵的尸体。萨韦利耶夫的腿部和肩部受了伤，但他仍继续指挥战斗。营部最先迁到这里，随后团指挥所也转移到这个阵地上。只是在此之后，他才肯前往卫生营。

团长M·C·舍依金上校向我报告说，在萨韦利耶夫连里，重机枪手近卫列兵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莫斯托沃伊表现得非常勇敢顽强。他过去是沃罗涅日省卡拉乔夫区的集体农庄庄员。当别人把他介绍给我时，我看着他，简直从心里喜欢：硕高的个子，宽阔的肩膀，大腰围，肯定是沃罗涅日大力士的后裔，当年那些勇士能肩扛造船用的粗大松木，并当着彼得一世的面，用肩膀将雪橇的滑木弄弯。在争夺81.5高地的战斗中，谢尔盖·莫斯托沃伊一直和连长在一起。在抗击敌人的反冲击时，他打光了8条机枪弹带。子弹打光了，他就扔手榴弹。手榴弹扔光了，可德国鬼子仍在进逼。于是，他就把机枪拆开，一手拿着枪架，另一手拿着铁锹，猛地站起身来向敌人扑去。德国人一看到这位俄国勇士，都魂飞魄散地向后逃回山沟。莫斯托沃伊追至沟边，停了下来，擦了一把汗。忽然，他发现了一个吓破了胆的德国上等兵。莫斯托沃伊一把将他抓住并挟在腋下。

“你们这些坏蛋，快从这里滚开！否则，我把你们的脑袋都拧下来！”他一边喊着，一边挟着被俘的上等兵，不慌不忙地来到连长面前。

就在当天，阿法纳西·萨韦利耶夫和谢尔盖·莫斯托沃伊被呈请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授予了他们这个崇高的称号。

不久前，我得知，金星勋章获得者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莫斯托沃伊正在沃罗涅日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而连长阿法纳西·斯皮里多诺维奇·萨韦利耶夫战后回到自己的故乡阿尔泰，也可能仍在继承父业。因为为了开拓这片盛产粮食、木材、毛皮兽、自然矿藏的富饶疆土，那里有很多工作需要人们去做。

在登陆场上，敌人防御中的一个核心阵地是哈坚诺夫镇。由于该镇有很多尖尖的瓦房顶、石头房子和砖围墙，看起来很像一座不大的要塞。德寇在房屋的墙壁上和围墙上设置了许多射孔。我们不打算对该镇进行正面突击。因为正面突击将使我们付出很大的牺牲。我们既不能浪费时间，更不能损失人员。我们的部队走过了从伏尔加河到奥得河的光荣的胜利之路。他们还面临强攻法西斯巢穴柏林的任务。

我将占领哈坚诺夫镇的任务交给了谢米科夫团。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谢米科夫中校参加了伏尔加河会战，因此我

对他很熟悉。他当时是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的一位参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顿河河湾的战斗中。他在一架被击落的波 - 2 飞机旁救了我。现在，谢米科夫指挥着一个团。尽管他非常熟悉巷战战术，但我还是担心：以一个团的兵力强攻一个工事坚固、驻有强大的守备部队的镇子，中校会不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可是，担心是多余的。谢米科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天刚亮，在哈坚诺夫镇东头、在敌人的防御枢纽中心，冒起了滚滚浓烟。这是谢米科夫团的工兵利用强击群的经验，进行坑道攻击，将敌人的一些较重要的目标炸毁。在同一时刻，炮兵和迫击炮手也相继开了火，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开始，我甚至有些后悔，觉得敌人已无路可逃，他们会不会因此而死守每一座房屋。但是，我们在观察所里很快就发现，镇中央有一大群敌军士兵举手投降。突击是如此突然和使人震惊，以致使敌人迅速地停止了抵抗。

近卫步兵第 57 师所属 172 团 2 营营长、近卫大尉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奥辛与全营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并与团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因为团部仍在右岸。奥辛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全营不是朝后向奥得河方向突围，而是朝前向西突围。突围的行动如此协调一致而且十分神速，使敌人抵挡不住，而开始后退。奥辛指挥的营在这种环境下，经过了一整天的战斗，俘获了 40 名敌军士兵，缴获了 8 辆装满物资的汽车。

根据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申请，С·В·奥辛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给他在古比雪夫的父亲拍了电报，电文如下：

“亲爱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感谢您培养了一个勇敢而坚强的儿子，培养了这样一位红军军官。”

我们终于在奥得河右岸巩固了阵地，登陆场也日趋扩大了。

5

1 月 26 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И·В·朱可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Н·С·捷列金中将和方面军参谋长 М·С·马利宁上将，联合签署了一份关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各部队下一步的进攻行动计划，报请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

该文件说：“1945 年 1 月 30 日前，方面军各部队的任务是前出到下列地区：瓦尔道、普赖斯、弗里德兰、腊策堡、希勃诺夫、弗罗伊德费尔、申兰克、鲁瑙、古尔奇、沙芬奥特、奥帕莱尼查、格列茨、维利霍夫、克吕契沃等地。

此时，各坦克集团军应攻占下列地域：

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别尔林亨、兰茨贝格、弗里德贝格；

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梅泽里茨、施维布斯、蒂尔施蒂歇尔；

在该地区内调集部队（特别是炮兵），调集后勤，补充储备品，整顿战斗车辆器材。将突击第 3 集团军和波兰第 1 集团军展开后，从 1945 年 2 月 1 日晨开始至 2 月 2 日，以方面军的全部兵力继续进攻。当前任务是，从行进间强渡奥得河；尔后，以主要力量从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对柏林进行迂回，向柏林发展迅猛的突击……”

这样，在这个文件中，对方面军的总的任务已作了明确的规定。接下来是对各集团军下达任务。关于近卫第 8 集团军的任务，文件中是这样写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向奥托罗瓦、凯米、普利蒂什、赫利茨方向实施进攻，并攻占下列地区：

(1) 第1日——加波施、高尔奇、阿尔迪尔、巴符鲁夫卡；
(2) 第3日——强渡奥布拉河，并攻占特莱波施、诺伊福威克、新多夫一线；

(3) 第6日——在科斯钦（不含）、维森地段强渡奥得河，并攻占根施马尔（不含）、旧托希帮、威尔德尔、马尔诺夫（不含）一线。

随后向塞洛、旧兰茨贝格、伯伊森湖方向发展突击。”

1月27日17时30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了这个战役计划，并特别提醒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指挥部注意，为确保方面军右翼免遭敌人可能从北面或东北面发起的突击，在方面军右翼以外，必须储备1个集团军。该集团军至少应得到1个坦克军的加强。

1月28日，苏联元帅A·T·科涅夫向最高统帅部大本

营呈报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役计划。计划规定粉碎德军布列斯拉夫集团，于2月25日—28日前出至易北河，并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协同动作，同时对柏林实施突击。

大本营于1月29日批准了A·T·科涅夫的建议。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于1月28日发布了命令。该命令更明确地规定了各集团军下一步由奥得河向西进攻的具体方向：突击第5集团军向柏林以北的贝尔瑙进攻；近卫第8集团军向布科夫、旧兰茨贝格、伯伊森湖进攻；第69集团军向法兰克福、毕森、赫尔菲尔德进攻。这就是说，所有3个集团军都向柏林进攻或者对其进行迂回。

上述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以及近卫坦克第1、第2集团军顺利地完成了方面军的当前任务。他们突破了梅泽里茨筑垒地域；渡过奥得河后，夺取了几个登陆场，并为扩大登陆场而进行战斗，具体情况是：突击第5集团军在科斯钦以北作战；近卫第8集团军在科斯钦以南作战；第69集团军正在攻打法兰克福。第33集团军也在法兰克福以南、奥得河左岸夺取了1个登陆场。

2月4日，我们接到方面军训令，训令已规定了进攻日期，训令是由I·H·朱可夫、H·E·捷列金和M·C·马利宁签署的。训令内容如下：

“一、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对垒之敌，目前尚没有集结成任何反突击集团。敌人也未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敌人目前正在对某些方向进行掩护，并在一系列的地段上企图以积极的行动完成防御任务。

我们初步获得的情报表明，敌人已从西线调来4个坦克师和5到6个步兵师，并正在将这些部队投入东线。

敌人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普鲁士地区调动部队的同时，看来将在最近7—8天内，把从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普鲁士地区调出的部队集中于施韦特、诺伊什切青一线，以掩护波美拉尼亚、加强什切青的防御，并阻止我前出至玻莫瑞湾。显然，敌人将把从西部调来的军队集群集中在柏林地区内，任务是防守柏林接近地。

二、方面军各部队的任务是：在最近6天内，以积极的行动巩固已取得的战果；把所有落在后面的部队调上来；补充储备品，把燃料补充到两个燃料储备基数、弹药补充到两个弹药储备基数；迅猛地推进，于1945年2月15日—16日占领柏林。

在巩固战果时，也就是从2月4日至9日，必须做到：

(1) 第5、第8、第69、第33集团军夺取奥得河西岸的一个登陆场。

此时，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69 集团军最好在科斯钦和法兰克福之间夺占一个共同的登陆场。如果得手则最好将第 5 集团军和第 8 集团军的登陆场合为一体；

(2) 波兰第 1 集团军、第 47、第 61 集团军、坦克第 2 集团军和骑兵第 2 军，必须将敌人赶过下列地区：腊策堡、法尔肯堡、施塔加德、旧达姆、奥得河。随后，在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到来之前，除留下屏护队之外，其余部队应向奥得河机动，准备进行突破；

(3) 2 月 7 日—8 日，必须完全歼灭敌人波兹南—南奈德米尔（皮瓦）集团；

(4) 主要是使用各集团军现有的加强兵器，作为突破的加强兵器；(5) 各坦克部队和自行火炮应于 2 月 10 日前结束小修、中修，并使兵器处于良好状态；

(6) 航空兵应展开作好战斗准备、各机场必须有 6 个油料基数；

(7) 方面军后勤部队、集团军后勤部队和军队后勤部队，必须在 2 月 9 日—10 日前作好充分准备，以便保障战役决定性阶段的胜利。”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此时，在我们敌人的营垒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古德里安写道：他说服了希特勒从波美拉尼亚、皮日伊策和霍什奇诺地域向南实施突击。古德里安说：“我曾希望通过此次突击能够加强德帝国首都和整个国土的防御，以此来赢得必要的时间，同西方大国进行停战谈判。当然，这种事并不新奇……所谓‘秘密武器’只是作为对人民和军队进行宣传的一种诡密手段。只有立即向英美同盟国求和，才是摆脱彻底失败的出路。”

我手里曾掌握有关法西斯谍报机关从事秘密活动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文件。他们这种活动是有长远打算的。1943 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失败之后，希特勒的外交活动就立即开始转弯抹角地向西方的敌国进行试探。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老朋友、西班牙独裁者、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充当了希特勒分子的代言人。他向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怀尔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战争进程不从根本上获得改变，那么，俄国军队将深入德国腹地。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的话，这难道不构成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的威胁吗？”随后，佛朗哥危言耸听地大谈什么“共产主义威胁”，恳求“仔细地考虑一下局势”，因为“形势万分严重”，如果出现希特勒德国遭到失败的情况，欧洲就再也不存在可以“阻止苏联继续推进”的力量了。

关于希特勒的外交讹诈，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些较早的事例。因此，对于德意法西斯用武力扶持上台的西班牙独裁者的“积极性”，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关于希特勒一旦失败之后，欧洲将处在危险之中的言论，在此之前我们就从戈培尔嘴里听到过。这里值得奇怪的，倒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我们的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友、英国大使怀尔，竟认为可以就此问题与佛朗哥通信。

塞缪尔·怀尔答复佛朗哥说：“我不能承认俄国战后将对欧洲造成威胁的理论……”关于英国在欧洲的政策的目的和意图，这位英国外交官的回答也是毋庸置疑的。他说：

“·战·争·结·束·后，·庞·大·的·美·英·军·队·将·占·领·欧·洲·大·陆。·这·些·军·队·将·由·第

·一·流·的·士·兵·组·成，·它·们·将·不·象·俄·国·军·

队·那·样·溃·不·成·军、·疲·惫·
·不·堪。(文中黑点是我加的——B·崔可夫)

“我敢预言”，怀尔接着写道：“英国人将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英国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将象拿破仑失败时那样巨大。我们这种以军事威力作后盾的影响，将使整个欧洲都感觉到，我们还将参加欧洲的复兴。”毫无疑问，怀尔谈到“庞大的美英军队将占领欧洲大陆”、“这些军队将由第一流的士兵组成”，他们不象“俄国军队那样溃不成军、疲惫不堪”时，他说出的不仅仅是自己意见。英国的某些人士曾认为，俄国和德国由于互相在激烈的战争中耗尽了人力财力，如果不是永远，也将长期地成为他们垂手可得的猎物，这两个国家将不会作为强国而存在。

是什么原因促使怀尔这样开诚布公地向希特勒的盟友佛朗哥阐述英国战后重建欧洲的计划呢？

这些话归根结蒂是讲给谁听的呢？是不是对早在 1943 年就主张与西方谈判的德国的某些人士作某种特殊的表态呢？

在我们盟国的阵营里，有一些政治家曾指望看到：在战争结束时，俄国军队将损失惨重，大伤元气。

然而，我们的军队在进入德国境内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战后，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供尔：1945 年 2—3 月间，德军曾计划从波美拉尼亚登陆场对苏军实施反攻。为此，“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部队应在格鲁琼茨地域内隐蔽集结后，向南发起突击，突破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部队的战线，并穿过瓦尔塔河和诺特奇河河谷，从后方前出至科斯钦。

古德里安说：这次进攻本应于 2 月 15 日发起。

德军统帅部为进行此次突击，计划使用多大的兵力呢？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希特勒于 1 月 13 日出现在柏林。他听完了有关形势的汇报，但没有作出任何决断。他只是阻止了将坦克第 6 集团军投入西线的战斗。由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已发起进攻，希特勒来到柏林是惊恐不安的。1 月 14 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也接连发起突击。1 月 16 日，希特勒发布命令，要西线转入防御，并从西线抽调所有可以调出的兵力，以便投入东线战斗。可是，能抽出的兵力并不多。敌军在我军的突击下，一个师接一个师地相继溃散。古德里安竭力主张从巴尔干各国、意大利、挪威、波罗的海沿岸等国家和地区撤出全部军队，但希特勒没有批准这个建议，因为古德里安的建议，在实际上已无法执行。进行这样的军队调遣，需要时间、道路、铁路车辆和船只。不要忘记，当时同盟国的航空兵已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并且正从东向西，从西向东地对整个德国领土进行轰炸。

据古德里安供认：毕竟有些地方还是开始了军队运输，但是，“进行得极其缓慢。敌人航空兵的优势不仅使军队运输陷入瘫痪，而且也摧毁了统帅部的意志。”

苏联元帅 I·H·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写道：“2 月初，日益形成严重的威胁是，敌人从东波美拉尼亚方向对我前出至奥得河的方面军主要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发起的反突击……2 月初，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的中间地带内作战的是：德国第 2 第 11 集团军，内辖 16 个师、2—4 个坦克师、3 个摩托化师、4 个旅、8 个战斗群——除此之外，在什切青地域内，还有坦克第 3 集团军，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既可将该集团军使用于柏林方向，也可用来加强东波美拉尼亚集团，实际上也正是按后者做了。”

德军从阿恩斯瓦尔德（霍什奇诺）地域发起的进攻，开始于2月16日。

17日，敌人的全部冲击均被我军击退。

古德里安将军说服了希特勒而进行的这次进攻失败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出决定，在对柏林发起决定性的进攻之前，首先要粉碎波美拉尼亚敌军集团。同时把粉碎波美拉尼亚集团的任务交给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部队和包括卡图科夫、波格丹诺夫指挥的近卫坦克第1、第2集团军在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右翼。

这就决定了敌波美拉尼亚集团的命运。红军部队于3月4日前出至波罗的海，3月9日在什切青附近前出至奥得河。

6

我们天天都在扩大奥得河登陆场。

在我集团军右翼，在奥得河和瓦尔塔河的汇合处，矗立着科斯钦要塞。这个要塞貌似用石块和水泥筑成的小岛，它高高地耸立在缓缓流过的两条河之间。没有大口径火炮和重型轰炸航空兵，要夺取这个要塞是很困难的。科斯钦要塞妨碍着我们与右邻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的部队会合，妨碍着与其组织协同动作。

在我集团军左翼，敌人已抢先占领了一些高地，即从莱茵特文村沿奥得河延伸至法兰克福的一些地。这些高地控制着整个河谷，敌人可以用火炮从高地对我登陆场上的部队进行侧面射击。德军从西线匆忙调来的部队，其中包括“大日尔曼”摩托化师，不仅在塞洛高地这个有利的地区内固守下来，而且开始转入局部的反冲击。

我和别尔扎林将军面临的任务是复杂的。为了扩大登陆场，必须做三件事；第一，必须强渡旧奥得河；第二，必须攻占科斯钦要塞，或至少使其守备部队失去作战能力；第三，必须夺取法兰克福以北和古日策西南群山之间的高地，特别是我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还应攻占波杰利齐格和克列辛的一些制高点和居民点。为此，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大口径火炮的弹药和舟桥渡河器材。但是，这两样东西我们都没有。我们继续扩大已夺取的一些登陆场，并肃清被围的敌守备部队（当时我们仍在歼灭敌人在波兹南的守备部队）。

我们只好使用现有的器材来完成扩大登陆场的任务。我集团军的运输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保障了强击波兹南的部队的弹药供应。当时从国内运来的一切物资都要运往方面军右翼、运往波美拉尼亚。

战斗在登陆场的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雷若夫将军和该军的炮兵司令员季莫申科上校负责收集和利用缴获的武器和炮弹。应该说，这些战利品帮了我们的大忙。缴获的火炮立即就用上了。在扩大登陆场的斗争中，我炮兵发射了缴获来的105毫米的炮弹约65,000发。真是在希特勒匪徒的头顶上飞来了他们自己制造的“礼品”。

敌人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抗击我军在登陆场的突击，便将其全部技术兵器用来对付我军，其中也包括装有自动驾驶仪的飞航式导弹。在奥得河，我第一次见到了戈培尔多次宣扬过的这种“秘密武器”。那是在2月上半月。当时我工兵部队在日古策村附近的奥得河上架起了第一座桥架。我与波扎尔斯基将军正在离桥不远的观察所内。那天天气很好。有一架双引擎的飞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从西低空飞来，刚刚飞过81.5高地，就发射了一枚飞航式导弹。可是飞到距离河边约300米时，飞弹来了个俯冲，撞到地面上爆炸了。敌机一共向桥上发射了4枚这种飞弹。但无一命中。爆炸形成的弹坑

却非常巨大，但并未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

我们在想：敌人这样干值得吗？用如此昂贵的武器攻击正在建造中的桥梁，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但是，希特勒的统帅部已无法顾及经济核算。只要能阻止我军渡过奥得河，他们会动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武器来对付我们。

我军各部队步步进逼波杰利齐格，攻占了该地后，又牢固地控制了 81.5 制高点，还占领了科斯钦的郊区——基茨和居民点曼什科夫、哈坚诺夫。

现在，我军在奥得河左岸的登陆场的面积已十分可观——宽 12 公里，纵深 8 公里。与右邻会合时刻临近了。但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然科斯钦市及其要塞已经落在我友邻手中，但是有一座象波兹南要塞那样强大的核心堡还在进行抵抗。

距离柏林只剩下 70 公里了。虽然进攻暂时受阻，但是，我们知道，不久我们将在柏林大街上进行战斗。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让部队作好巷战准备。每个师、每个团都组建了预备营，更确切地说是教导营。刚刚由波兹南赶来的近卫步兵第 27、第 74 师各抽出 1 个团，派在登陆处的近卫步兵第 4、第 28 军部队之间的接合部。这样一来，两个军的军长都可以抽出预备队，并将他们从登陆场派往右岸。上述调动已于 3 月 5 日、6 日两个夜晚完成。I·A·赫塔古罗夫将军指挥的第 82 师，从波兹南开来后，全部留在奥得河右岸。该师在那里进行补充，并进行战斗训练。

3 月下旬，我们进行了多次的局部战役，目的是使我军翼侧与我右邻——在科斯钦要塞以西的突击第 5 集团军的部队会合。在这里，两个集团军之间，确切地说，是奥得河左岸两个登陆场之间的缺口约达 3 公里。敌人通过这个走廊与位于奥得河主河床一个岛屿上的科斯钦核心堡保持联系。核心堡本身就是分割我各登陆场的一个楔子的根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在科斯钦以西某个薄弱环节上砍断这个楔子，然后，使两个集团军的翼侧会合。这样，敌人在要塞的守备部队就会处在被隔绝状态。

要塞的部分堡垒，早在我军开始夺取登陆场时就被我占领。现在，我们将从南面对敌防御实施突击，并将前出至基茨—杜希林铁路。别尔扎林将军的部队将与我们同时从北面发起进攻，以期以戈利措夫火车站地域内与我们会合。

我们对战役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并于 3 月 22 日开始行动。在战役开始之前，我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有计划地、不分白天黑夜地对敌人实施了连续 4 个昼夜的突击，破坏了敌人的防御配系和指挥，摧毁了一个个的目标。炮兵按计划对各地段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冲击开始前（冲击开始时间定于早晨 9 时 15 分），炮兵还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急袭射击，以便为步兵清除道路上的障碍。在同一时刻，突击第 5 集团军的部队也转入了冲击。

由于采取了这些协调行动，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在指定的地域内会合了，科斯钦要塞的守备部队与残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堡垒以及那座核心堡就彻底地与外界隔绝开来。

在连接科斯钦和塞洛高地的走廊内的全部敌军，都被我军击溃了。其中部分被我俘虏，部分退到岛上残存的一个核心堡中。

现在，我们的两个登陆场已经连成一片。后来，在柏林战役中，它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宽广的登陆场中心，还剩有一个由众多的敌军防守着的

核心堡。

核心堡本身座落在岛屿上。岛屿是由奥得河、瓦尔塔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通向岛屿的接近地已被春汛淹没。只有堤坝和路堤将核心堡与陆地相连起来，路堤和堤坝成扇形指向不同方向——柏林、法兰克福、波兹南、什切青。毫无疑问，敌人将竭力严密封锁这些道路，并在堤坝和路堤上修满野战工事——掩体、土木发射点、避弹所、暗堡、铁丝网和地雷障碍。我各小分队离敌人的工事如此之近，以至手榴弹的爆炸声和长柄火箭弹的对射声几乎昼夜不停。然而，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大的兵力，因为1辆克就可将堤坝的道路完全堵住。

如何进攻？我们让炮兵担任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角色。它应该摧毁在堤坝道路上修建的掩体、避弹所及土木发射点。航空兵的任务是摧毁核心堡及其周围残留下来的筑城工事。

要摧毁避弹所和土木火力点只能用重炮和大口径迫击炮。但是，我们不能用大口径火炮越过我方战士的头顶进行射击。因为他们距离敌人太近。必须想出另外一个比较可靠、安全的办法。我和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和近卫步兵第35、82师师长共同进行了详细的勘察。

我们直接在部队的出发地区熟悉了地形。当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将3个重炮连拉到这里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敌人没有一座土木发射点可以顶得住我203毫米火炮的轰击。我们将1个炮兵连隐蔽在郊区基茨附近、奥得河左岸的堤坝内，向右岸的土木发射点射击。将第2个炮兵连隐蔽在岛屿以南400米处、奥得河右岸的堤坝内，让它瞄准左岸的土木发射点和堤坝。这样的配置可以保证对可见的近距离目标进行交叉射击。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在河两岸堤坝上的我军前沿，都设置了明显的标志。

我们把第3个炮兵连部署在扎布钦车站附近的堤坝上。它从这个地段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核心堡的围墙，并对它瞄准。

从奥得河右岸对要塞实施冲击的任务，由近卫步兵第82师担任；从左岸冲击要塞的任务，由近卫步兵第35师担任。

第35师的1个团，准备从南面登上岛屿。

为了便于沿堤坝和路堤向核心堡实施进攻，每师均以1个连为单位展开。其战斗队形纵深比冲击正面要大，这在战术上是不寻常的现象。

强攻计划是这样的：进攻前夕，即3月28日，我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对核心堡和其它永备工事进行瞄准轰炸。航空兵通过其突击迫使敌人从这些工事内撤向野战工事。在这一天，除指定对要塞的围墙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炮兵连之外，其他炮兵不进行射击。

3月29日晨，我航空兵对同一目标再次进行突击，使敌守备部队无法返回核心堡，继续留在野战工事内而自以为得计。但是，当我们投向核心堡的炸弹的最后一声爆炸刚停止，即在上午10时正，各种口径的火炮（其中包括用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重炮）就一齐对野战工事进行射击。急袭射击的持续时间为40分钟。在炮兵火力的掩护下，登陆的步兵和自动枪手乘舟艇渡过河去在岛上登陆。10时40分开始总攻。

在进攻的前一天，我和刚刚伤愈出院的集团军装甲兵、机械化兵司令员魏因鲁布将军一起前往出发阵地，检查是否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中午，我们乘车来到扎布钦车站西北的一个水塔附近。我们在这里停了下来，观察重型炮弹直接命中核心堡围墙的情况。

我们的前面是一个大贮水池，看样子是水塔的沉淀池。我们的副官（我的副官费奥多尔·和魏因鲁布的副官阿廖沙·库连佐夫）并排地站在水池的栏障前。突然，一颗炮弹在右面爆炸，随后在左面也爆炸了一颗。几秒钟后，我们前后都响起了爆炸声。好一个窄夹叉射击！我们紧紧地倚靠在墙上。显然，敌人发现了我们，正用重型迫击炮弹进行射击。现在打的是近弹和远弹。但是看得出来。瞄得很准。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往哪儿奔走都十分危险。如果附近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那就应站住不动。有一堵墙壁从一面掩护着我们，我们就紧紧地贴在墙上。可是，随之而来的一声爆炸，将我们摔倒在地上，推在一起。

费奥尔多是 V·A·崔可夫的亲兄弟——原书注。

我的脑子里长时间嗡嗡地作响。等我清醒过来时，觉得我被人压在下面。魏因鲁布的胸部压着我的头，而他上面躺着费奥尔多，最上面又躺着曾用身体掩护我们，现在竟浑身是血的阿廖沙。魏因鲁布受了伤，弹皮嵌入他的膝盖上方。我和费奥尔多没有受伤。当我们发现阿廖沙已被炸死，心里万分悲痛。甚至无法相信，刚刚还站在我们身旁的这位英俊的小伙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天，我们悲痛地掩埋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我亲自将魏因鲁布将军送往最近的一个卫生营。

但是，夺取要塞的战斗还是按计划发展。3月28日，我航空兵对要塞的永备工事实施了瞄准轰炸突击，将敌人的工事变为一大堆废墟，迫使敌人转入野战工事，或者隐蔽在更深的地下工事内。

29日早晨，我航空兵又再次进行了同样的轰炸。随后，开始了炮火准备。我从观察所里看到，我军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重炮炮弹，不断地摧毁敌人的筑在堤坝上的土木发射点和避弹所。当时的景象是令人难忘的，许多石块和圆木被炸得飞向空中。

10时30分，乘船的登陆兵在岛上登陆了。10分钟后，机枪和自动枪声响成一片，手榴弹和长柄火箭弹和爆炸声也此起彼伏。

强击要塞工事技能，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一个总体。它包括要掌握好近战武器，要巧妙灵活地克服障碍物。当然，首先是每个战士的个人勇敢精神。近卫步兵第82师所属第271团5连，由少尉米哈伊尔·切帕诺夫指挥的一个排的近卫军人们，他们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素质。他们一次猛冲就攻克了布满堑壕、掩体、弹坑和沟渠的400米的宽的地带，越过了满是避弹所和机枪发射点的堤坝；发起冲击的信号响了之后约7—8分钟，他们就已冲到被破坏了一半的核心堡围墙跟前。在这里，德军的机枪手向近卫战士们开了火。切帕诺夫本打算带领全排通过围墙的缺口，但遭到敌人猛烈的机枪侧射火力的阻击。此时，全排很有可能葬送在这里，而无法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迟疑不决就等于死亡，因为敌人已经发现了这一排战士。切帕诺夫当机立断改变了方向，带领全排沿围墙冲向另一个缺口边。此时，他们的战士们已处在射击死角，敌人无论是用机枪还是用自动枪都已无法向他们射击。切帕诺夫把带绳的锚钩抛到围墙上。他象杂技演员那样，敏捷而迅速地爬了上去。他把手中的红旗挥动起来。红旗象一团火，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其它分队的战士也向这里冲了过来。

而切帕诺夫指挥的排已经在围墙的这一面、在要塞的庭院里进行着战

斗。

米哈伊尔·切帕诺夫两次受伤，但他始终没有退出战斗。他冲入了大三角堡。看到一些德国军官正在堡垒平台上指挥着战斗，有一条通往这个平台的通道，于是顺着这狭窄而有阶梯的通道往前冲，用自动枪和手榴弹扫清道路，消灭了 9 个希特勒匪徒。又过了几分钟，红旗已在大三角堡的上空飘扬。红旗是由切帕诺夫排的战士们升起的。排长本人却第 3 次受伤，伤在胸部，牺牲在红旗下。

愿居住在乌里扬诺夫省阿罗诺夫卡村的亚历山德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切帕诺娃知道：她的儿子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死后被授予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生前战斗在距离柏林 70 公里地方，他在被我们摧毁的法西斯的科斯钦要塞上升起了红旗，他以自己的英勇行为为自己树立了一座丰碑。在那里，还有另一位苏联英雄的灵墓，他是格鲁吉亚人民的光荣的儿子，是来自祖格迪迪区的恰克维吉村的近卫军中士绍特·普拉东诺维奇·季布。

塞洛高地

1

柏林战役的准备作业已展开。大量的补充兵员增添到部队。数万吨燃料运抵奥得河。

这些燃料或被埋入地下，或在森林地带内伪装起来。数十万发各种炮弹、炸弹已安放在发射阵地附近或机场上。

战役企图是：在宽大的正面上，尽可能同时实施数个强大的突击，合围并分割柏林集团，尔后将其各个歼灭。

到 1945 年 3 月末，在粉碎了波美拉尼亚的法西斯军队、苏军的几个师已前出到波罗的海岸之后，大本营为了进行这最后的战役，动用了 3 个方面军的部队：即由 H·H·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由 I·H·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由 A·T·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

拥有大量加强炮兵和加强航空兵的这 3 个方面军，准备在 3 个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御。

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部队。准备在什切青以南至施韦特市的地段上，突破敌人的防御。其第 1 梯队含 3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3 个坦克军、1 个机械化军和 1 个骑兵军；其任务是强渡奥得河，粉碎什切青的敌军集团，并迟于战役第 12 日至 15 日前出到安克拉姆、德明、维滕贝格地区。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面临的任务是：在格利岑、科斯钦、勒布斯地带内作战。其第 1 梯队由 8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组成。方面军将以 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 2 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从科斯钦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他们将同时以强大的突击在宽约 70 公里的正面上，突破敌人的防御地区，粉碎敌柏林集团。攻占柏林，并在战役的第 12 日至 15 日，前出到易北河。

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突破地段是福斯特和木斯考，其第 1 梯队含 7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主要突击由 5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 2 个坦克集团军实

施。其任务是：强渡尼斯河，粉碎科特布斯敌军集团，至迟于战役第 10 日至 12 日前出至贝利次、维滕贝格一线，然后沿易北河至德累斯顿。如果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部队攻占柏林一旦受阻，科涅夫则应派自己的坦克集团军增援他们。

3 个方面军实施 3 个主要突击和一系列辅助突击的目的是：粉碎防守德国东部的经过重建和补充了兵员的敌人的 4 个集团军（坦克军第 3、第 4 集团军和野战第 9、第 17 集团军）和歼灭敌人在纵深的预备队。

任务是清楚的，但又是十分复杂。大家都明白，战争发展到这个阶段，法西斯将会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因为清算他们罪行的时刻到来了。

希特勒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预感到大难临头，于是来到各个集团军里对官兵们大声疾呼：

“要坚持住！不要让俄军再向西迈进一步！”

法西斯德国统帅部采取了一切措施为柏林准备纵深的牢固的防御。地理条件对柏林的防御也很有利。这里湖泊密布，其间又有许多河流和运河相贯通，还有很多不便于坦克和其它技术兵器通过的地区，所有这些都给组织庞大的兵力进攻造成了困难。防御战线的缩短，使敌人能更好地利用天然屏障，不需要更多的部队便可进行防御。

希特勒匪徒在奥得河左岸和从施韦特至古本的尼斯河上固守下来。这里，天然防御地区和人工防御地区的总纵深达 30—40 公里。而且，在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进攻地带内的通往柏林的东部接近地，其防御又最为牢固。在这里，预先构筑的防御工事从奥得河开始一直到柏林筑垒地域才结束。敌人在柏林方向上的兵力是在 2 月、3 月和 4 月上半月内集结的。在防御纵深内，还有从西线调来的、由摩托化师和坦克师组成的强大预备队。步兵师的人员编成扩充到 7 千至 8 千人，坦克师则为 8 千到 1 万人。

敌人集中了柏林集团的大约一半的兵力和兵器，用来对抗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敌人还特别地集中了大量部队对付我军在奥得河的几个登陆场，而占领了这些登陆场的是我突击第 3、突击第 5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

截至 1945 年 4 月 16 日我军开始进攻的前夕，希特勒统

帅部在柏林方向集结的兵力计有 48 个步兵师、9 个摩托化师、6 个坦克师、37 个独立步兵团、98 个独立营和很多独立炮兵部队和兵团。此外，柏林守备部队有 20 余万人，德国陆军总部的预备队还有 8 个师。

但是，优势毕竟在我方。在肃清了敌人的波美拉尼亚集团、击退了敌人在巴拉顿湖地域内的反攻、并解放了维也纳之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得以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方向上、即在柏林方向上，造成了兵力和技术装备方面的压倒优势。

我们以 193 个师对敌人的 85 个师；250 万人对 100 万

人；41,000 门火炮和迫击炮对 10,400 门火炮；6,25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对 1,500 辆；7,500 架作战飞机对 3,300 架。

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使我们增强了作战的信心。即使敌人其它战线（例如西线）再次抽调新的部队，优势也仍旧在我方。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司令员在 1945 年 4 月 12 日颁发了

局部战役训令中指出：我近卫军 8 集团军应在霍尔措夫铁路车站和萨克森多夫村的地段突破敌人的防御，并向塞洛、特雷布尼茨、加尔策伊、达尔维茨—西里西亚火车站、沙尔勒滕堡方向发展突击。

炮火准备开始后，强击航空兵第9军（军长是A·V·克鲁普斯基将军）和掩护它的歼击机一起，作为作战隶属关系配属给我们。

当集团军前出到古佐夫、塞洛、杜希林、阿里特、马列什一线时，曾计划将得到坦克第11军加强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投入交战。另一方案是：如果我左邻第69集团军在其地带内的进攻发展得更顺利的话，那么，各坦克部队将在那里、在杜希林、德贝林地段内投入突破口。

方面军司令员要求，战役准备工作应隐蔽地进行，要采取一切伪装措施，力求做到行动的突然性。

方两军规定，突击集团各集团军的进攻速度为每昼夜20公里。初看起来，这个速度很平常。其实不然，过去历次战役证明：在战役初期和突破敌人有准备的防御筑垒地带时，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只有在战役发展过程中，在突破筑垒地带后，前出到广阔的战役地区时，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当时，环境对我们也不利。4月份是大小河流的汛期。从奥得河主河床至塞洛高地一段宽约10—15公里的河谷里布满沟渠，水淹没了低地和草地；耕耘过的土地和种了马铃薯的种植场变得泥泞不堪。奥得河至塞洛高地的道路干线寥寥无几。在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地带内，只有4条可通行汽车和技术兵器的道路，稍微拐向路旁就是沼泽地。如果没被陷住，能爬出来继续向前走，就算你走运。

塞洛高地高耸于河谷之上，河谷被许多河流与沟渠纵横分割。敌人从高地上可以俯瞰我军的整个登陆场。敌人在我方面军突击群的主要方向上，沿科斯钦至柏林的运动轴线，建立了5个防御地区。在明赫贝格之后，这些防御地区又与柏林城的3道防御围廓相连接。

在30公里的突破正面上，敌人共布署了10个师：步兵第9、第303、第309、第169、第712师和“库尔曼”师；摩托化第20、第25师、“明赫贝格”师和“元首”坦克师。这些部队又得到统帅部预备队炮兵第5、第403军、反坦克第292、第770师的加强。在主要方向上集中这样的军队密度，使敌人得以同时占领2—3个防御地区。

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敌人在第1梯队，塞洛高地和奥得河河谷内，有3个师，并拥有大量的加强炮兵兵器；在第2梯队也有3个师。

方面军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诚然，我各集团军拥有足够数量的加强兵器。例如，近卫第8集团军在炮兵进攻中，在7公里的突破正面上，就投入了77个炮兵团、10个坦克和自行火炮团。这样，在每一公里长的正面上，就有266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近40辆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但是，这些加强兵器不能同时摧毁敌人的两个防御地区。

占领第1个地区之后，必须将数千门火炮和数百个观察所往前移；要在各进攻部队之间建立联系并组织协同动作。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

我们拥有强大的航空兵，但它突击的也是我炮兵已标定的那些阵地。在没有得到侦察情报的情况下，飞行员无法判明森林地带内敌人经过周密伪装的防御地区。

根据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我们在排列战斗队形时，考虑到了要使各军、师的炮兵能参加炮火准备并能支援进攻。全部3个军被排成一线。近卫步兵第4、第29军的第1梯队由2个师组成，第28军的第一梯队由1个师组成。每个军的第2梯队都各有一个师。第28军近卫第39师留作集团军预备队。第1梯队每个师（共5个）的突破地段宽1400米。各师的第1梯队

由 2 个团组成，第 2 梯队由 1 个团组成。

为了查清敌人防御前沿的真实位置，方面军决定进行战斗侦察。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敌人预料到我军会发动进攻后，会将其主力从前沿撤向第 2 阵地或塞洛高地。战斗侦察于 1945 年 4 月 14 日总攻开始前 2 天进行。每个师都派出有坦克和炮兵的一个加强营参加了战斗侦察。

方面军司令员在训令中对进攻的准备工作要求绝对在完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只有在临冲击之前才允许通知战士。

在科韦耳和维斯瓦河地区作战时，战斗侦察是在进攻开始前两小时进行，随之发展为全面进攻。现在，方面军指挥部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

方面军司令员这次又提出了新的方案：在突破地段上集中大量的探照灯，在夜间发起冲击之前，打开探照灯照射战场，使敌人目眩。

朱可夫元帅在进攻之前一星期组织了一次专门的演习。在演习中，我们这些集团军司令员和军长们亲身体验了探照灯的效果。我们试验了进攻中探照灯从后面照射时的效果，也试验了防御中迎面照射时的效果。两者都令人十分满意。

全线战斗侦察于 4 月 14 日进行。4 月 14 日 7 时 40 分，在

进行 10 分钟的炮火急袭射击之后，各侦察营一齐向敌人第 1 阵地发起冲击。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攻地段上，各侦察营向前推进了 2—4 公里之后，占领了第 1 阵地。在右邻突击第 5 集团军的地段上，进展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遭受伤亡后，撤向第 2 阵地。

在进行战斗侦察时，我们从敌摩托化第 20 师和步兵第 303 师那里抓了一些俘虏。其中有一个是步兵第 303 师的军士。在审讯中他说：

“德国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垮台啦！”

“为什么？”审讯的军官问。

他沉思片刻后，回答：

“你们 4 月 14 日进行的进攻，不是主要的进攻。这只是侦察。大约过 2、3 天，你们将开始总攻。打到柏林将需要 1 个星期左右。这就是为什么 15 至 20 天之后，希特勒要完蛋的原因。”

看来，这个德军军士要比许多法西斯将军们更清楚地分析了形势。他没有说错，14 日确实是进行侦察。他也没有说错，2 至 3 天之后，我们将开始主攻。他还准确地预测了其结局。

由于敌人控制着塞洛山岭上的制高点，敌人可以对集结着我军部队的整个山谷进行观察。因此，我们隐蔽地进行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我们打算不为敌人查觉地把部队、尤其是炮兵和坦克调到出发阵地上。但是，敌人不仅清楚地看到我军登陆场上的阵地，而且也清楚地看到河东岸我军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行动？就是夜晚的黑暗也没能帮我们摆脱困境，敌人不断用探照灯对这个地区照射。我们没有向探照灯开火，因为炮兵受命不得暴露自己，保持沉默直至最后一分钟。

探照灯刚一熄灭，侦察机投下的照明弹又亮了起来，整个谷地清晰地暴露希特勒匪徒的眼前。

部队进行伪装也很不容易，因为当时树木还未发芽；由于春汛和地下水位高，又无法挖壕隐蔽。刚挖一铲土，坑内就立即充满混浊的泥水。

同往常一样，政治机关、党组织在进攻之前就积极开展工作。刚一受

领战斗任务，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就召开了集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军长、各师师长及各军、师政治部主任，同志们交换了意见，研究了如何在部队中开展工作。会上提出了很多建议。党的积极分子一致通过了这样的一项提议：在开始进攻的前夜，所有部队和兵团都要将近卫军的战斗旗帜带到前沿的第1堑壕内，使每个战士都看到，与他一起参加战斗的有自己的同志、战友和指挥员，还有部队最神圣的物品——红色的战旗。这面战旗象征着革命的理想，象征着地球上所有正直的人们对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进行神圣的追求。

我们与各级（包括连和炮兵连在内）的参谋人员和指挥员在地貌图上就进攻的过程进行了演练。我们对各部队的指挥和第2梯队投入战斗等问题，也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练。

我似乎觉得，4月15日的夜晚特别漫长。每当等待决定性的事件到来的时候，总是这样。

黎明前，I·H·朱可夫乘车来到我设在莱茵特文镇附近的指挥所。此时，集团军各部队都已占领了出发地域。各团团长和政治副团长带着近卫军的旗帜来到前沿。战士们在战旗下宣誓，保证一定要光荣地完成战斗任务。照明弹升上了天空，在它的光芒的照耀下，列宁仿佛活着一样，从鲜红的战旗上，检阅着军人们，犹如在召唤他们，坚决同万恶的敌人进行最后的战斗。

莫斯科时间早晨5时，柏林时间早晨3时……

方面军司令员表上的秒针即将指向这一时刻。刹那间，天地一下子就变得如同白昼一般。凭着火炮射击的耀眼的闪光，我们看到，一面面招展着的战旗在战壕上面向前移动。这是带到出发阵地参加强攻的旗帜。

威力强大的轰鸣声，如同火山爆发般响成一片又滚滚而去。40000门火炮齐射并持续地进行轰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整个奥得河的沿岸平原仿佛都在颤动。一团团浓密的烟尘直冲云天。

在我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炮弹射出的闪光是如此的明亮，以至尽管探照灯已经开始照射，而我们在指挥所内却还没有察觉到。由于没有看到探照灯光，我和方面军司令员甚至开始追问，为什么还没有打开探照灯？当答复我们探照灯已经打开时，我们都感到非常惊奇……

应该说，我们当初在演习场观看探照灯的作战效力时，谁也不能准确地想像到，在战斗情况下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对方面军的其它地段上的情况，我很难去评论。但我在我们近卫第8集团军的地带内看到，探照灯的强大光束，照射在从敌人阵地上升起的团团焦土和烟尘上，可就是无法穿透这层烟幕，以至我们难以对战场进行观察。加上风又迎面刮来，仿佛也在故意地难为我们。结果，指挥所所在的81.5高地，很快被密不透光的烟尘所包围。这时我们已完全无法进行观察，对部队的指挥只能依靠无线电话和通信员。

浓密的烟云也给我进攻部队的行动造成了困难。

进攻开始后的最初半个小时，敌人几乎没有还击。其观察所和指挥所以及发射阵地均被我炮兵和航空兵压制。只有隐蔽在石头房屋和某些掩体内的少数未被摧毁的机枪、自行火炮和火炮进行了抵抗。我步兵部队和坦克，在炮兵的徐进弹幕射击这后实施进攻，最初的2公里进展顺利，虽然其速度不快。但是在这之后，小河和沟渠阻碍了前进的道路，坦克和自行火炮开始落在步兵的后面。炮兵、步兵和坦克之间的协调动作遭到破坏。原规定按准确时间实施的徐进弹幕射击不得不停了下来，并使炮兵改用逐次集中射击的

方法来支援步兵和坦克。在黎明时分，敌人未被摧毁的火炮和迫击炮恢复了火力并开始对着道路进行射击。当时我部队和技术兵器正以密集的队形在道路上行走，有几个团和营失去了指挥。

所有这些都对进攻的速度产生了影响。

敌人在豪普特运河上的抵抗异常顽强，这条运河绕过塞洛高地的山脚，流经整个河谷。

由于春汛，水势猛涨，我坦克和自行火炮无法通过。为数不多的几座桥梁，遭到塞洛高地上的火炮和迫击炮的射击。隐蔽在地下、经过周密伪装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也对这些桥梁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在这里，我军的进攻速度变得更为缓慢。当工兵建立渡口的时候，部队只好原地等待。

汽车与坦克无法进行任何机动，因为道路已经堵塞，径直地开向多沼泽的河湾洼地和地雷场也不可能。

应该感谢我们的航空兵！带红星标志的轰炸机、歼击机和强击机掌握着战场上空的制空权。它们成功地压制了敌人配置在防御纵深内的炮兵。

豪普特运河最终被攻克。我军各部队开始强攻塞洛高地。

中午 12 时前，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突破了主要防御地带，并接近到第 2 防御地带，但无法在行进间将其占领。塞洛高地的山坡非常陡峭，我坦克和自行火炮无法攀爬上去，不得不寻找比较平缓的斜坡。顺着通向塞洛、弗雷德斯多夫、杜希林的道路有一个上坡比较平缓。但是敌人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防御支撑点。要压制并占领这些支撑点，需要准确和强大的炮火。为此，炮兵应转移到塞洛高地附近的新的阵地上去。

我立即下令调集炮兵，组织步兵、坦克和炮兵之间的协同动作，要在 20 分钟的炮火急袭射击之后，于 14 时向塞洛、弗雷德斯多夫、杜希林实施冲击，并占领塞洛高地。

前面已经讲过，方面军司令员 I·H·朱可夫元帅这时在我的指挥所里。他在这里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与大本营保持联系。

我方面军的进攻速度略缓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这是由于我对垒之敌军集团兵力最多，防御工事也较为坚固，尤其是塞洛高地的防御工事更为牢固。这一点使大本营十分不安。但是不能不考虑到，我们不得不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作战，而且要击溃希特勒匪徒的激烈抵抗。部队极其艰难地穿过沼泽和泥泞地之间的道路向前进攻。春汛使当地的很多地段变得难以通行。我们的进攻在塞洛高地面前停了下来。

为了加快进攻的速度和尽快突破敌人在塞洛高地的防御，方面军司令员决定，将 M·W·卡图科夫指挥的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和 A·A·尤舒克指挥的独立坦克第 11 军，在我集团地带内投入交战。其任务是从行进间夺取塞洛高地，并向伯林方向发展进攻（按原计划，这些坦克兵在敌人的防御被突破之后才投入战斗）。

当坦克兵团开始通过我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战斗队形时，道路变得更加拥挤，但又无法退到路两旁。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坦克，简直是顶在我炮兵牵引车后面，结果使各师、军的第 2 梯队的机动受到限制。应该指出，近卫第 8 集团军自己也拥有数量不少的坦克兵。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克服各种困难。步兵和坦克兵相互帮助，勇敢地消灭希特勒匪徒，并将他们逐出防御地区。

下午，在集团军右翼，即在近卫步兵第 4 军的地段上，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由舒加耶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47 师，在科斯钦至柏林的公路以北进攻，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在塞洛市以北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切断了从塞洛市通向波格多夫和古佐夫的一条铁路和两条公路。傍晚时分，由 F·A·扎利久克将军指挥的近卫第 57 师，正为夺取塞洛火车站进行战斗。

近卫步兵第 29、第 28 军向塞洛市南侧实施进攻，其部队已进逼到塞洛高地，但无法组织全部兵力对敌人的支撑点实施同时的突击。由于天黑无法发展进攻。集团军未能完成当日的任务。塞洛高地仅部分地段被我攻占。投入交战的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面对此种情况也无能为力，因为它们无法展开，即停留在奥得河河湾洼地的道路上。

右邻由别尔扎林将军指挥的突击第 5 集团军，于日终前前出到旧奥得河。

左邻由科尔帕克奇将军指挥的第 69 集团军未取得进展。

尽管我们在兵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而我们只好满足于战役第 1 天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战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敌人显然已经汲取了以往的历次战斗的经验，改变了其防御布置的原则。以前，敌人将主要兵力部署在第 1 防御地带内，虽然也在纵深准备了第 2 和第 3 防御地带，但并不是经常都以第 2 或第 3 梯队的部队加以占领。预备队、坦克师或摩托化师通常也不占领防御地区，而是部署在浅近后方，以对突入之敌进行反冲击。我们摸清了这种战术，就在敌人的主要防御地带上将其粉碎。与此同时，我航空兵和远战炮兵对其预备队实施突击，使其无法组织反冲击。击溃了第 1 防御地带、即主要防御地带内的敌军部队之后，我们再将快速预备队（通常为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它们粉碎敌预备队，并前出到广阔的战役地区。我军过去在乌克兰是这样，在科韦耳附近和在维斯瓦—奥得河战役中，也都是这样。当时在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突破敌人的主要防御地带后，由 C·A·波格丹诺夫、M·E·卡图科夫指挥的坦克集团军当即进入已被打开的突破口。这些强大的坦克兵团突入敌人的深远后方，将突破口向两翼扩大了数公里。

现在，敌人以新的方法部署了防御。它不仅占领了第 1 防御地带，而且也占领了第 2 防御地带和第 3 防御地带，并在那里部署了大量步兵、坦克和炮兵、此外，敌人尚在防御纵深内拥有强大的预备队。我军部队在突破旧奥得河和豪普特运河沿岸的第 1 防御地带之后，在已有敌军防守的第 2 防御地带内，遇到了有组织的防御。

还要注意的，希特勒军队实际上已经把奥得河至柏林的整个广阔地区，变成为一个绵亘的筑垒地域。在这个地域里，除了强大的野战防御工事地区外，还利用了各居民点的无数的楼房、大片的森林和水上障碍作为防御。

我们对当地的地形特点、到处遍布沟渠、河流和湖泊等天然障碍估计不足。由于道路缺乏，限制了我军的机动，无法在实施冲击时投入大量的兵力。况且，这里有大量的居民点，夺取每一幢房屋都要经过强攻。

进攻第 1 天的情况表明，敌人将顽强地固守每一地区。敌人的部队里增添了大量党卫军特别分队。据俘虏口供，他们受命就地枪毙所有企图后退的人或不积极抵抗的人。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通过战斗夺取每一座掩体、每一个步兵散兵坑，而对各居民点的街区，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利用 4 月 16 日的夜晚，转移了炮兵、变更了兵力部署，并且进行了强攻塞洛高地的准备。

翌日，在 30 分钟的强大的炮火准备之后，我军于莫斯科时间上午 10 时 30 分开始进攻。炮火的密度是相当可观的。在每公里的正面上，就有 200 余门火炮和迫击炮。

在集团军右翼，近卫步兵第 4 军已踏上古佐夫——塞洛公路，并受命向格尔斯多夫方向发展进攻。在日终前前出到弗里斯河并进行强渡。与步兵第 4 军共同实施进攻的是坦克第 11 军。

近卫步兵第 29 军应突破敌人的防御，并攻占卢德维希卢斯特、弗雷德斯多夫居民点，随后也应前出至弗里斯河，并进行强渡。为了保障此次突击的成功，第 2 梯队的近卫步兵第 29 军第 82 师也投入了战斗。该师从第 4 军的左翼向沃林、扬斯菲尔德方向实施突击。

近卫步兵第 28 军应攻占杜希林地域，随后通过里岑向马克斯多夫进攻。

强击航空兵在夺取塞洛高地的战斗中和在强渡弗里斯河时，对集团军各部队进行了支援。

此次炮火准备是在白昼实施，其效果比进攻第一天的效果要好得多。

4 月 17 日，我们在与右邻的接合部上取得了重大战果。

在那里，突击第 5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所属的部队，在突破敌人的防御、并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之后，前出到旧罗森塔尔、盖尔斯多夫和维茵台尔格湖一线。我军在左翼、在与第 69 集团军的结合部上进展缓慢。在那里，第 28 军和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部队，不断抗击敌人的反冲击，结果只攻占了杜希林和利伯尼肯地域。

敌人把两个师（从预备队抽调来的摩托化第 28 师和步兵第 168 师）和负责柏林城市防空的一个航空兵军投入了保卫塞洛高地的战斗。

仅是到进攻第 2 日的日终前，集团军才攻占了第 2 防御地带，在自己的进攻地带内占领了塞洛高地，并摆脱了奥得河沿岸的河湾洼地。

右邻突击第 5 集团军强渡了弗里斯河，并攻占了普罗特科瓦地域。

左邻第 69 集团军夺取马尔科瓦地域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两昼夜的战斗，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同整个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一样，仅完成了进攻第 1 日的任务。我们毕竟未能料到敌人会如此顽强地抵抗。我们感到，希特勒匪徒在这场殊死的斗争中，已决心固守距离柏林的每一米土地。敌人已无法利用其领土向纵深进行机动。只要能够阻止我军进攻，它就会把所拥有的一切都投入战斗。我们知道，敌人的兵力即将消耗殆尽，而且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有利于我方的根本性转折。因此，4 月 18 日各部队受领的任务是：不追求占领广大的区域，而要尽量在战场上和在敌人防御的浅近纵深内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早晨，我们按照各军长的计划，再次进行了强大的炮火准备。

当天，敌人将两个新锐的摩托化师（“库尔曼”师和“明赫贝格”师）和由蔡塞尔特将军指挥的 1 个党卫军步兵师投入了战斗。一场激战开始了。敌人的反冲击接连不断，特别是在集团军左翼尤其如此。

在迪德斯多夫地域内，敌人力图切断科斯钦至柏林的公路，因为近卫步兵第 29 军和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主要技术兵器 and 后勤物资正沿这条公路行进。为消除这一威胁，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受命将近卫步兵第 39 师（在此之前属第 2 梯队）投入战斗。

这个师的近卫步兵第 117 先遣团（由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格里岑科上校指挥）与敌人的各军官分队和人民冲锋队展开了激烈的格斗，敌人

力图以全部兵力取得某种战果。他们预先埋伏在塞洛高地西部的缓斜坡上，突然投入反冲击。他们在我部队通过了他们周密伪装的掩蔽工事后，突然用机枪射击，还从路边和道口旁的房屋及各种建筑物内扔手榴弹和发射长柄火箭弹。格里岑科上校找到了办法去对付敌人的这种战术。他放弃了对居民点和防御枢纽部的正面攻击。指挥团属各营以连和排为单位，携带迫击炮和轻型火炮，穿过小树林，绕弯路迂回到敌人各分队的后方和翼侧，迫使敌人进行一场对其不利的战斗。

精神优势是在苏联军队一方，尽管在这个地段上，以兵力对比来说，并不总是有利于格里岑科团。希特勒匪徒经受不住强大的突击，或举手投降，或仓惶溃逃。仅在一天的战斗中，全团共缴获了约 100 挺机枪、107 辆满载各种军用物资的汽车，俘虏了 315 名士兵和军官。

近卫步兵第 79 师所属第 227 团的年青勇敢的团长亚历

山大·伊万诺维奇·谢米科夫中校，也采用了这种战术。关于他的事迹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他的团在格里岑科团左翼作战。在夺取杜希林的战斗中，谢米科夫指挥的各分队，攻克了在铁路交叉点和杜希林——法兰克福公路上的敌人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抵抗枢纽部。有 5 辆掩蔽在地下的坦克挡住了该团的前进道路。无论是用重炮还是用“卡秋莎”火箭炮齐射，均无法将其摧毁。因为这些坦克的装甲用一堆堆的铺路用的鹅卵石掩护。谢米科夫派出了几名有经验的工兵，携带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和炸药，插入敌后。几声爆炸之后，敌坦克停止了射击，坦克乘员四散而逃。

不久，谢米科夫团遭到猛烈的炮火突击，紧接着，乘汽车和装甲车疾驰而来的敌步兵开始了疯狂的反冲击。从柏林机场起飞的德军歼击机也突向这里。它们向交战双方军队最稠密的地方投下炸弹，不分敌我地用机关炮和机枪扫射。谢米科夫团在友邻 A·E·德廖莫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机械化第 8 军的坦克兵的支援下，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成功地将敌人击退。战场留下了几百具敌军官兵的尸体，8 辆被击中的装甲车在燃烧，还有两架被击落的飞机残骸。

我方也遭受了损失。特别使我们悲痛的是，谢米科夫中校身受重伤。当德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在附近爆炸时，他正在 1 营的战斗队形里。大块的弹片击碎了他的右胯股，打断了他一只手臂，肩膀被击穿。值得庆幸的是，医生们成功地将他抢救活。虽然他未能参加攻克柏林的最后一战，但是他活了下来，直到现在还继续留在军队中工作。

根据我们的推荐，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谢米科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经过战斗，集团军部队 4 月 18 日已经占领了特雷布尼茨、扬斯菲尔德地区。右邻已前出到马克斯瓦德、沃尔科夫一线。但左邻第 69 集团军进攻的第 3 日仍止步不前，因此，我们集团军的左翼被拉长，敌人则频繁地实施反冲击，力图将我们赶往南面，远离柏林。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并掩护集团军的左翼，我们将近卫步兵第 28 军所属的两个师留了下来。

进攻的第一天，遵照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投入交战的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和坦克第 11 军，仍继续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内推进。这当然不能使指挥部满意。方面军司令部多次拍来表示关切的电报。其中的一份电报写道：“方面军司令员命令：1. 应立即发展迅猛的进攻。如果柏林战役发展缓慢的话，那么，在攻克柏林之前，部队就已疲惫不堪，并且耗尽所有

的物资储备。

2. 所有军级指挥员都必须就位于在主要方向上作战的各军长的观察所内。绝对不允许留在部队的后方。

3. 所有炮兵、其中包括大威力炮兵，均必须调到第 1 梯队，不得远离作战的梯队 2—3 公里。炮兵的行动应集中在可以完成突破任务的那些地段上。

要注意到：在我军抵达柏林之前，敌人将为每一幢房屋和每一片灌木进行争夺和顽抗。

因此，坦克兵、自行火炮部队和步兵不应等待炮兵将希特勒匪徒全部肃清、并提供一个没有敌人的场地才向前推进。

4. 要无情地打击敌人，并昼夜兼程不停地向柏林挺进，这样，我们将很快拿下柏林。”

4 月 19 日的进攻于中午开始了。在此之前，整个方面军的部队都在调集炮兵和弹药，进行侦察，查清明赫贝格防御地区的敌人的火力配系。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员卡图科夫将军，力图从这一地区突向广阔的战役纵深。

12 时 30 分，集团军各部队全线向前推进，半天内就攻占了达姆斯多夫、明赫贝格、贝伦多夫等支撑点。这个地区内的敌人被击溃，其残部后撤了。

在夺取明赫贝格的战斗中，由近卫上校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苏霍鲁科夫指挥的近卫步兵第 82 师第 242 团战绩突出。苏霍鲁科夫是伏尔加河会战的参加者，是经验丰富的军官。

他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命令全团沿着从奥得河延伸过来的道路前进，并接近了明赫贝格。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很多防御工事。苏鲁科夫在这个地段上只留下了 1 个连后，就煞有其事地在敌人观察员的眼皮下，把团主力后撤。随后，让部队神速地突入明赫贝格以北的树林，再从那里以协同一致的冲击，从翼侧和后方突入市内。步兵分散成小组，随同坦克和自行火炮行动。苏霍鲁科夫本人和各步兵分队在一起，行进在团的中央。巷战持续了几个小时。根据团长的意图，战士们竭力设法切断敌人的退路。他们突到街上的十字路上，突然开火，以此造成全围敌人的假象。希特勒匪徒四处乱窜，寻找逃生的出路。苏霍鲁科夫的目的达到了。他带领全团主力进行协同一致的冲击，彻底粉碎了敌人。我军用微小的代价，就将明赫贝格这个城市攻克。

夺取明赫贝格的战斗结束以后，我从团里的军医那里得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苏霍鲁科夫的胸部和腿部都受了重伤。我命令立即将上校送往医院。根据集团军首长的提议，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集团军各部队继续发展进攻，于 4 月 20 日日终前前出到加尔岑、金巴姆、爱尼肯多夫一线。

树林中有很多雷场和障碍物。敌人在道路和桥梁上都布了雷。他们不惜施展奸计，大量布设“意外的礼物”。他们在道上、水沟中的田野里，到处乱放着似乎是丢弃的摩托车、脚踏车和武器。但是只要轻轻一碰这些东西，它立即就会爆炸。我们还碰见过一种“狡猾的”地雷，这些地雷让装有扫雷器的坦克过去之后，将跟在它们后面的车辆炸毁。

这种情况要求部队格外谨慎小心，要求工兵进行紧张而忘我的工作。

最后，终于使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从明赫贝格、贝伦多夫地区进入交

战。坦克兵成功地突向菲尔斯腾瓦尔德和金巴姆，但无法独立地继续发展战果。因为河流、沼泽、湖泊和树林限制了坦克部队的机动。隐藏在树林和各居民点中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发射手又对我坦克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显然，我军的坦克部队只有与步兵部队密切协同才能取得战果，于是，我命令他们重新进入近卫第 8 集团军的界限以内，以便向柏林挺进。

明赫贝格被攻克之后，敌人的抵抗有所减弱。在我军的突击下，被打得狼狈不堪并遭受损失的德军部队被迫后撤。但是，在我前方还面临着我侦察员事先没有发现的新的防御地区。必须从行进间将它们突破。

进攻战斗 5 天以来，方面军各部队歼灭和消耗了大量德军部队。敌人的生动力量和装备遭到重大的损失。敌人防守 5 道防御地带的部队和投入战斗的预备队（约 5 个师），或被歼灭，或被迫向柏林方向后退。在夺取居民点、森林地带和道路交叉点的战斗中，连、营这样的分队进行机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渗入敌后，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点攻击敌人。像明赫贝格市这样的支撑点，就是小分队进行机动渗入该市的西部，才将它攻克的。

步兵的战斗队形得到加强，它们最大限度的配置了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火炮、自行火炮、坦克和工程兵分队。这样就可以对敌人的防御实施不间断的强攻，消灭其抵抗枢纽部及主要是进行伏击的自行火炮和坦克。

4 月 20 日日终前，形势已经变得有利于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С·А·波格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在 В·А·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第 3 集团军的进攻地段上，突入了贝尔瑙地域；突击第 3、第 5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突破了敌人的第 4 道防御地带后，顺利地发展进攻；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部队已前出到卡格尔、菲尔斯腾瓦尔德、爱尼肯多夫地域；同时，近卫步兵第 28 军的部队也突入到该地域。这就迫使希特勒匪徒无法进行反冲击和反突击。现在，敌人已经将其全部兵力都集中在柏林的防御上了。

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进攻，其部队前出到巴鲁特、卢肯瓦尔德、尤登堡地域，迫使敌人放弃了对奥得河的防御，放弃了对诸如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和菲尔斯腾贝格这样一些支撑点的防御。敌人企图从此地将全部兵力向西调往柏林，但未得逞。因为他们被 А·А·卢钦斯基将军和 А·В·戈尔巴托夫将军的集团军部队合围在弥尔罗泽、吕本、措森、巴德—萨罗夫地域之内。这就使我左邻第 33 和第 69 集团军得以向前推进，从而使近卫第 8 集团军左翼的情况得到缓和。

由 Н·Н·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俄罗斯第 2 方面军

的部队在施韦特地域内顺利地强渡了奥得河，并向普伦茨劳不断发展进攻。

综上所述，3 个方面军实施的战役发展顺利，尽管速度有些缓慢。奥得河已被抛在身后，敌人的战线已被冲破。敌人的庞大兵力正被合围在柏林东南。

在攻打柏林的日子里

我军于 4 月 21 日在贝尔瑙、彼得斯哈根、吕德斯多夫、埃尔克纳、乌斯滕豪森地域前出到柏林的环城高速公路，这为彻底合围法西斯的首都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近卫第 8 集团军遵照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把部队转向柏林的东南郊和南郊，以便从南面对柏林进行合围并实施总攻。

集团军这样的军团，在市郊的条件下进行急转向，并非轻而易举。其复杂性在于，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已经楔入市区，并且正在进行巷战。突然调转方向，这意味着把压缩的敌人放开。而刚一松开，敌人就会一跃而起，对你背后猛然一击。

为了不至产生这种情况，同时又执行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我们尽量使转向变得平缓些，并尽可能使敌人不易察觉。我下命令：近卫步兵第 4 军继续实施进攻，并在彼得斯哈根、嫩斯多夫、西登德方向攻击柏林；近卫步兵第 29 军在科佩尼克、布科夫方向实施进攻；近卫步兵第 28 军在缪尔特海姆、旧格里尼克、鲁多夫方向实施进攻。

如果观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近卫第 8 集团军部队从柏林东南和南面迂回柏林，向前挺进，并迫使敌人向北退却，其目的是使敌人无法对我翼侧进行突击，或使敌人无法与被合围于首都东南森林中的敌军集团会合。

集团军各部队一面变更部署，一面继续不停地进攻，同时也在做强渡施普雷河和达米河的准备。因此，各师师长也将渡河器材随部队一起调来。

到 4 月 22 日终前，集团军各部队已占领了柏林郊区的达尔维茨、舍诺伊希、菲赫滕瑙、兰斯多夫、弗里德里希哈根、威根施罗斯等地，为自己开辟了穿过柏林东郊的道路。当日，近卫步兵第 4 军的部队，在考尔多夫和卡尔斯霍斯特地域内，遇到异常顽强的抵抗。在此方向上，进攻实际上已停止。而在左翼和中央，特别在近卫步兵第 28 军的地段上，部队每昼夜则推进了 12—15 公里。就城市进攻而言，这种速度可以说是高的。

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坦克兵所面临的任務非常艰巨。因为在巷战中，广场和街道空无一人，敌人躲在建筑物、房屋顶层和地下室内组织防御。坦克看不到敌人，又无法进入建筑物、房顶和地下室。同时，坦克又是反坦克手的活靶子，他们用燃烧瓶、尤其是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对付我们的坦克。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城市的战斗不需要坦克和坦克兵，或坦克不适宜进行城市战斗。我远不是这个意思。坦克是需要的，但不应作为一种独立的兵力，而应在各强击群内与其它兵种的分队共同作战。

只有与步兵分队、炮兵、工兵和化学兵协同协作，坦克乘员才能发现哪里潜伏着危险。

强击群里的战士们会提醒他们哪里有危险，会指出在哪幢楼房、在第几层、在哪个顶楼或地下室埋伏着敌人，需要共同努力加以消灭。在这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中，坦克通常更多地被当作火炮来使用，坦克就是带有履带的火炮。坦克兵则是有装甲防护的炮手。

我们在柏林郊区一面不停顿地进攻，一面在行进中按强击群和强击队的原则，变换了我军战斗队形。4 月 22 日夜，在集团军里谁也没有休息，因为迫切要办的事实在太多。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前出到施普雷河，随后前出到达米河。按集团军司令部的计划，4 月 23 日晨开始强渡施普雷河，同时进行 30 分钟的强大炮火准备。各师应前出到河边，随后用配属的水陆两用汽车（我们共有 87 辆），将先遣部队运过河去，并夺取渡口。

强度计划制定得很周密。我们觉得，所有的细节似乎都考虑到了。但是，在战争中，计划与实际执行情况常有出入。

事态的发展总是要对原有计划作出修正。4月22日夜里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当我们将命令复制多份，并分别送出的时候，近卫步兵第28、29军各部队已前出到施普雷河岸边。战士们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供运动用的划艇和摩托艇，还有几艘载重量很大的驳船。各分队指挥员未等接到命令和指示，就让战士们登上这些艇只。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强渡了施普雷河，然后，又强渡了达米河。由B·H·潘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部队率先渡过了河。黎明前，他们占领了郊区的法尔肯堡。

这个成绩应归功于近卫步兵第88师所属第269团步兵第2营营长近卫军大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谢马金的主动精神。作为一个现役军官，他身经百战。就在这里，在柏林的接近地上，他表现出了优秀指挥员的品质：在完成战斗任务时勇敢、坚定和富有创造性。该营从柏林环城高速公路穿过森林地带向前挺进，途中遇到了敌人的中间防御地区。这时营里没有火炮和迫击炮。谢马金没有等待火炮和其它加强兵器的到来，因为那样敌人就有可能退却，或在对其最为有利的情况下展开战斗。必须立即从行进间以出其不意的冲击将敌人击退。谢马金大尉正是这样做的。先是各连展开，然后从不同的方向冲出茂密的森林，向敌人猛扑过去。协同一致的冲击，使敌人惊慌失措，无法实施有组织的抵抗。经过短暂的搏斗，全营俘虏了100余名敌军士兵，击毁了3辆装甲输送车。

后来查明，这些敌人原是一支屏护队，他们防守在通向施普雷河一个渡口的道路上。该营向前又推进了数百米后，来到岸边。苏军战士肃清了岸边的为数不多的敌军后，随即跟着营长，有的泅水，有的使用就便器材渡过河去。突然，在施普雷河对岸的德军前面，出现了俄国人。他们光着脚，很多人只穿着一件衬衣，但精神饱满，勇往直前。

“他们像天兵一样出现了！我们不得不后退！”人民冲锋营的一个被俘的中队长后来这样说。

谢马金大尉正是这样做的。不等敌人清醒过来，他就率领几名自动枪手投入追击。暮色时分，他的营又接近了一个新的水域。这就是达米河。谢马金带领战士们在夜间强渡了该河。在这些勇士之后，师属其它部队也紧跟了上来，巩固并发展了战果。

右翼，在科佩尼克地域内，是近卫步兵第39师的部队在作战。格里岑科中校的团在前出施普雷河时，左翼遇到敌人的强大的火力的抵抗。敌人切断了通向一座完好的公路桥的道路。格里岑科决定夺取该桥。为了不致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里来，中校将1个营调到一侧，并在科佩尼克地域内组织了佯动射击。机智的军人们造成了要在那里进行主要战斗的假象。科佩尼克确实也在进行巷战。但那里仅有一个连分成数个小组在作战。格里岑科确信桥梁的警卫部队已放松了警觉之后，就将步兵第5连连长尼古拉·巴拉金上尉召来，命令他天一黑就利用就便器材渡过河去，随后，隐蔽地渗到守桥的警卫部队的后方，并对其发起冲击。

巴拉金连分成几个小组作战，于夜间对敌人后方发起了攻击，消灭了守桥的希特勒匪徒。格里岑科利用这一时机，将全团基本兵力投入战斗。该桥完好无损地落到我们手中。安装在桥桁支架下的地雷和应用地雷被排除。全师除留下一小部分兵力，以便彻底歼灭在科佩尼克被围的敌守备部队之

外，其余部队与炮兵和坦克一同渡河去。

当夜，近卫步兵第 29 军的部队，在阿德勒斯霍夫地域内消灭了铁路桥上的警卫部队之后，也渡过了施普雷河。他们成功地在河西岸夺取了一个大面积的登陆场，并攻占了达米河上的一座公路桥。

我要在这里讲一讲第 82 师师长米哈伊尔·伊里奇·杜克少将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在强渡施普雷河时，他与各先遣分队到达岸边。当侦察员们看到必须泅水过河时，他们不免有些胆怯。杜克脱去军服和鞋，第一个跳入河中，春天冰冷的河水没能使他停步。他游到对岸后，解下两条小艇并划到我方河岸。侦察员们紧跟杜克少将，迅速过了河。不久，全师都渡河去。

由于近卫步兵第 28 军和第 29 军所属各分队、部队和兵团的各级指挥员的主动精神，他们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仅消耗了少量兵力和兵器，就提前完成了集团军司令部的任务。

为了把坦克、炮兵和辎重渡河去，他们架设了辅助舟桥。4 月 23 日，两个军的全部部队迅猛地向柏林挺进。日终前，集团军所属各团攻占了柏林的城郊，并在达米河以西进行战斗。敌人在这个地段上的抵抗被粉碎。

在城市战斗中，敌人经常神出鬼没地出现在我们预料不到的地方。敌人在我军的后方留下了专门的破坏小组，他们隐藏在地下室内，先将我们进攻的先遣部队乃至预备队放过去，然后向我军人员发动袭击。这样做是为了在我军后方造成混乱，并以此牵制或阻挠我先遣部队的行动。为了同敌人的这些破坏小组作斗争，我们成立了后方警卫队。

4 月 24 日，集团军各部队继续在全线进攻，不断把敌人逐向市中心。这一天，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在舍纳威德机场地域内会师。至此，敌柏林集团即被分割成两个部分：柏林集团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这使希特勒军队的指挥遭到破坏。

近卫步兵第 4 军的部队在右翼强渡了施普雷河之后，占领了舍纳威德、达姆—福施塔特、尼格尔等地。近卫步兵第 28 军的部队在左翼前出到特尔托夫运河，攻占了市区布利茨、布科夫、鲁多夫等地。近卫步兵第 29 军的部队肃清了约干尼斯塔尔地域、阿德勒斯霍夫机场地域内的敌人。在特尔托夫运河附近，我各兵团也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会师。敌人在柏林东南作战的由野战第 9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共 30 个师组成的强大的古本集团，已陷入我军的合围之中。鉴于这种情况，我近卫第 8 集团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转向西北，即转向柏林市中心。在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攻地带，有已渡过河去的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各兵团在作战。

两个方面军的部队会师以及对柏林的合围，意味着柏林战役的一个重要阶段宣告完成。

法西斯德国的正规军被击溃，敌人绵亘的防御正面在很多地段上被突破，其庞大的兵力被合围，并被各个歼灭。

位于措森地域内的德军总参谋部被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占领，敌人的指挥从而遭到彻底的破坏。

苏军迎着西方各盟军向易北河挺进。第三帝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从士兵到将军、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4 月 25 日，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地域，乌克兰第 1 方面军所属近卫步兵第 58 师的部队与美国第 1 集团军步兵第 69 师的巡逻队会师。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两个盟国的军人——美国和苏联的官兵们相互握手。

剩下的还有最后一步，这就是攻占柏林，从而结束战争。而这一步将由苏联军队迈出。

这是既艰难又极端重要的一步。因为在柏林集结着纳粹的全部妖孽。法西斯帝国的头子——希特勒及其大本营还在这里活动。当前我们需要使用武力迫使敌人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

无条件投降——这在反希特勒同盟几个大国所签署的“雅尔塔宣言”中就是这样写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柏林发起强大而果敢的攻势。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光荣地担负了这一使命。

在我和我的同志们面前，曾多次出现过的那个问题，现在又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德国的统治者还寄希望于什么呢？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目前，任何一种秘密的超级武器也不能挽救残余的德国军队——不久前还是残酷而实力强大的第三帝国的一支残暴力量的失败命运。

敌军的基本集团已经被分割和打得七零八落。敌人仅在最后的一道防御地区内进行着抵抗：即在一些要塞、永久火力点、地下掩蔽所、楼房的地下室和城市的街区内抵抗。我军通过当时所有可以沟通的渠道，向德国政府转达了如下的消息：结束战争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无条件投降！

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德国士兵的生命（命运把他们投入这场对他们来说是漫长的、毫无出路的战争中）还是可以拯救的。在天平的一边是，数十万德国人的生命和许许多多新城市的安全；在天平的另一边是，一小撮冒险分子的性命。

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希姆莱、鲍尔曼，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保命，不惜一切……法西斯制度及其元凶们在作垂死的挣扎。这在全世界面前彻底的暴露了他们的残忍和怯懦，暴露了他们的利己主义和卑鄙的行径……

我是个军人，我已渡过了人生的漫长岁月，并已步入晚年。我从参加国内战争开始，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我得以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如今，在我垂暮之年，从纯粹军事的、职业的观点出发，我对1945年春天在柏林附近发生的一切能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我的结论是：当时不管敌人进行任何抵抗，要想获得成功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面前摆着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本作战日志。该日志是根据约德尔上将的指示从1938年写起的。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日志中有关法西斯德国覆灭前的末日景况的记载。

1945年4月22日15时左右，在帝国办公厅内正在举行

最后的一次大型的作战会议。会议是希特勒亲自主持的，在这次会议上，他首次公开承认，战争是输定了。

苏军此时已经由南面、北面和东面进抵柏林环城公路。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他采纳了负责作战指挥的参谋长约德尔的建议：从西线撤回全部部队，将它们投入坚守柏林的战斗。

为了执行这一决定，约德尔4月24日向各集团军群的司令发出一项特别训令，要他们把现存力量的全部投入与死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斗。同时，他还指示各集团军群司令，要他们不必考虑英军和美军可能会在西部战场占领大片土地。

据作战日志记载，希特勒曾在4月22日的作战会议上大发雷霆。在这之后，此时看来已经恢复常态，他在19点15分发了一封电报给海军元帅邓

尼茨，他在电报中将柏林之战称之为“保卫德国命运之战”。

他命令邓尼茨元帅放弃海军面临的所有任务，全力通过空中、水上及陆地将部队调往柏林。他认为，其它所有的任务和别的战线现在均居次要的地位。

作战日志中还记载，希特勒于4月22日曾表明决心，他决定要采用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说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去做。一些渺茫的、难以描述的希望，象幻影一样浮现在这位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那些跪倒在他面前发狂地鼓掌和每隔两句话就要呼喊一次他的名字的人群，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曾发誓要全世界拜倒在他脚下，而他们则发誓要为他而死……如今他们又都消失在何方？难道今天就找不到一百万为挽救元首生命而愿意在篝火中自焚的德国青年吗？于是，希特勒就残忍地将无数天真幼稚的青少年和中学生派去打仗，让他们在炮火中和坦克的履带之下丧命。

尽管希特勒整日呆在掩蔽部中，但他不能不知道柏林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能不知道，近日的惊慌和惶恐已使德国国内所有的道路和公路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数百万柏林市民已无法撤出城市。但是，这位独裁者除了担心自己的生命之外，他什么也不考虑……

然而，德军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第三帝国的军团、它的残部现在在哪里呢？

布谢的第9集团军与首都的联络已被切断。该集团军的部队部分被歼，部分被俘。

陆军元帅凯特尔和约德尔上将与希特勒一起又开始了战争犯罪行为。他们唯命是从地寻找消失的部队，企图通过电台和派出的通信联络员找到他们。他们象保姆一样，守候在床前，护理着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病人，通过不断地拍发电报来安慰他。而很可能，他们是不是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慰他们自己呢？这个时候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们已经向第三帝国各集团军下达了冲破柏林封锁线的命令……他们通过手中剩下的电台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一命令，还通过电话不断地向各地传达这项命令。

温克的集团军正在从西面向柏林进发。我已经进攻到易北河的部队在柏林近郊迎战了集团军，并将其击溃。

4月28日，希特勒手中只剩下很小的一块地盘——蒂尔花园区和国会大厦。法西斯政权已经奄奄一息。

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上将向凯特尔元帅转达了元首的命令。

“元首要求您尽快给他援助，我们最多只剩下48小时了。如果在这之前得不到援助，那就为时已晚了。元首让我再次向您说明这点。”凯特尔打算进行安慰……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元首呢？在此时来说，这已无关紧要。他们全都陷入了一厢情愿的梦幻之中……他们仍然在玩弄骗局。

凯特尔在回电中答复：

“温克的集团军和布谢的集团军正在进攻，向北面实施突击可望取得成效……”

他们还在梦想进攻，而且在地图上用工整而漂亮的笔体勾画出各种彩色箭头……

凌晨5点，布谢将军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送来了战报：

“突击未获成功。显然，各先遣坦克分队没有坚决执行命令，他们已突

向西线，或已被歼灭。突击群的其它部队伤亡惨重，已停止前进……”

这个令人不快的战报，把事情全都说得言过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我军采用各个击破方式，歼灭了布谢集团军中拒绝投降的部队，并俘虏了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士兵。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还不够。他此时掌握的已经不是政权，而是政权的幻影！但是，他还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他从办公室里又发出了新的命令。他命令在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作战的部队，刻不容缓地从各个方向向柏林转入进攻，向已冲入柏林的我军后方实施突击。但是，在奥得河和易北河之间能够听从元首召唤的部队已不复存在了。那里只残存着被击散流窜的小股部队和党卫军的士兵。这些家伙由于罪恶累累，害怕我们复仇，丧失了人性，在我强大的打击下被枪炮声、火光和鲜血吓得失魂落魄，四处逃窜……

4月29日23时，希特勒询问约德尔上将：

“温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现在何处？他们将在何时重新开始进攻？第9集团军现在何处？第9集团军应从哪里突破？”

约德尔此时对自己的元首已无言可答。就连他本人也不知道：各集团军现在何处？出了什么事？目前的处境如何？他只是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4月30日18点35分，海军元帅邓尼茨收到柏林发来的

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海军元帅邓尼茨：

元首已收回原先对帝国元帅格林的任命，现重新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元首的继承人。委任状已发出，您应根据当前的情况，立即采取一切相应的措施。

鲍尔曼”

这封电报对另一些人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戈培尔和鲍尔曼角斗的最后一步棋。

希特勒已不在位，他正在被停止行使职权，或已被停止行使职权，政权正在转入将军们的手中……也许，各盟国会同这些军人们举行谈判吧？刹那之间会出现奇迹吗？

希特勒知道，各同盟国正在成立审判他和他的同伙的法庭。他明白，他将被迫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回答：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有权”灭绝千百万人民和民族，“有权”消灭为数众多的国家、城市和房屋，“有权”肆意烧、杀、毁灭……他曾宣扬过：所有这一切都受褐衫队员和国家警察的保护，受军队的保护，受德国将军们的保护。为了让希特勒在人类文明制定的法律面前对这一切都作出交待，历史已为他提供了讲台。

可是，他却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我们苏联军人来到柏林，不是为了破坏和屠杀。我们走过了艰难的道路，将祖国的土地和兄弟国家的人民，从法西斯侵略者的手中解放出来。我们现在来到柏林是为了在德国消灭法西斯制度，从而永远消灭发动侵略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在战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和他的同伙能考虑到国家的安宁和民族的幸福，那么，牺牲就会小些……

在攻打柏林的头几个小时内，如果法西斯头目们能够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这样，炸弹和炮弹就会留在仓库里。数十万居民就能得救。

现在，能够讲述第三帝国覆灭前最后几天及最后几小时的真实情况的目击者已经没有了。第三帝国的头目们没有一个人还活在人世。众所周知，4月下旬，戈林和希姆莱开始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谈判，他们甚至企图以干掉希特勒为代价，去达成单独媾和或停战的协议。他们是自愿作为“使德国免遭共产之祸的拯救者”去参加谈判呢？或是受希特勒本人之托去参加谈判呢？现在是很难做出回答。这已成为一个秘密。有人对我说，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已弄清了第三帝国末日的部分情况。但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在开庭审判之前已经死去，而戈林在提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供词之后，也自杀而死。完全有可能，有关第三帝国头目们的末日景况的秘密，已被他们带入坟墓。

现在有希特勒临死前留下的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已将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确实有这样的一份遗书。我是第一个从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手中得到这个文件的。我掌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签名的最后一封书信。但是，我得到关于希特勒已经死亡的口头报告和书面通知之后，直至我军战士在帝国办公厅院内看到他那具被烧焦的尸体之前，我一直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死去。根据克莱勃斯的供词、戈培尔以及鲍尔曼的信，希特勒是在4月30日自杀身亡，当即被裹上毛毯并浇上汽油烧掉了。希特勒的副官兼司机肯普卡中校，在他写的《我焚烧了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也描述了这一情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埃·肯普卡提供了关于鲍尔曼是在一群法西斯分子企图向西突围时，被轧死在坦克履带之下的供词曾受到怀疑。战争结束后，许多刊物曾不止一次地报导：鲍尔曼还活在人间，他作了整容手术，隐藏在南美的某个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证实，鲍尔曼是在随同一小队匪徒向波茨坦方向突围时被打死的。几年之后他的尸体已被找到，经军事专家验尸，确认是鲍尔曼本人。

2

1945年4月25日，对第三帝国首都的最后一次强击开始了。

还在强击开始以前，柏林已经遭到美国和英国空军的轰炸。

我们明白，在柏林市中心，隐藏在废墟中的，不仅仅是德国士兵，那里还聚集有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罪犯，他们双手沾满了无辜受害者的鲜血。他们对死在什么地方——是在柏林城里被苏军的枪弹打死，或是由被告席押赴刑场被绞死，都无所谓。这一伙将自己的生命誓死与法西斯制度拴在一起的狂人，当时在德国还占有相当的数量。各火车站、石头房屋、113个地铁站以及数十座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都配备有大量的各种轻重武器。

在强击开始前的一天夜里，我来到炮兵发射阵地。炮兵们正在进行炮击柏林的准备工作。我想看一看试射情况，并将我军对第三帝国实施最后一次突击的第一排齐射的情景留在自己的记忆里。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中将陪我到了一个重炮连阵地。

一团团乌云缓缓地在头顶上移动，下着小雨。大地仿佛在沉睡，又时而被远处传来的爆炸声惊醒。

重炮连的阵地位于森林边的一块草地上。炮兵们已将重炮展开，等待着射击命令。炮口向柏林。战士们冒雨站在炮架旁，两眼盯着前方，仿佛透过蒙蒙的雨水可以看到那一伙点燃这场战火的罪犯。炮兵连的战士们胸前都配带着“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

优秀瞄准手库普里扬·库切连科下士和德米特里·拉普申下士，一个是连的党小组长，另一个是团小组，站在队列中间。红星勋章和三级光荣勋章获得者炮长伊万·塔拉索夫中士站在火炮旁……这个被希特勒匪徒杀害了亲生兄弟的人，此刻会想起什么呢？射击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目标，向万恶的柏林堡垒工事，放！”一枚枚重型的炮弹飞出炮膛，划破夜空呼啸而去，天空中留下了一道道弹迹！

清晨，我登上了自己的观察所。观察所设在约干尼斯塔尔机场附近的一座五层高的大楼里。在这座楼房的拐角，有一个房间的墙壁被炸开了一道裂缝，通过这道裂缝可以看到柏林。准确地讲，可看到柏林的南部和东南部。由于柏林市是沿施普雷河西岸各延伸数十公里，因此，无法一眼看清柏林全城的面貌。只见到处都是屋顶，无边无际；处处都是倒塌的房屋——爆破弹留下的痕迹。远处工厂的烟囱和教堂的尖屋顶林立。已经披上绿装的公园和街心花园。从远处望去，仿佛是一团团绿色的焰火。大街上弥漫着晨雾，它与夜间炮击时扬起的灰尘交织在一起。在一些地方，晨雾又与黑色的浓烟融合在一块。在市中心的某个地方，一团团黄色的羽毛状烟云直冲云天。这就是说，重型轰炸机已经开始袭击将要进攻的主要目标。

忽然，脚下的大地震动了一下，接着地板便晃动起来。数千门火炮宣布强击开始。

我通过墙壁上的缺口向外望去，看到了城防工事的轮廓，它们是沿特尔托夫、哈费尔和特戈尔三条运河以及环绕市中心的各条铁路而修筑的。这里的每一栋房屋都是一座堡垒。古老的柏林，城墙高耸，纳粹分子最强固的防御线就在这里。兰德维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的陡峭的弧形地带，修筑有高大的混凝土岸壁，掩护着所有的政府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的国会大厦。

我从观察所看到，射向敌人阵地的火力是多么强大！那些已将窗户改为射孔的房屋相继倒塌；把街道隔开的鹿砦和街垒飞上了天空；数千名德国士兵白白地送了命。希特勒发给他们武器，强迫他们冒着致命的炮火，走上绝路。

4月25日，近卫第8集团军开始从南面进攻柏林市中心。部队全部改编为强击群和强击队。这些强击群和强击队装备有坦克、包括大威力火炮在内的各种口径火炮，并配备有工兵分队和迫击炮分队。需要克服江河障碍的强击群和强击队，还配备了渡河器材。近卫军战士们一步一步地攻占了法西斯德国首都的一个又一个街区。

进攻昼夜不停地进行，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这正是强击的主要用意。我军沿兰德维尔运河向蒂尔花园区推进。看看地图便会知道，我集团军的进攻地带正在逐渐缩小，它象一把插向柏林中心的锋利长矛。合围柏林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直接参加强击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所属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突击第3和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他们的进攻地带均呈圆锥形。即对敌人实施向心突击。在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地带内作战的，还有卡图科夫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出一套在城市作战中使用大规模的坦克部队的战术。最初，坦克成纵队沿街道向前推进。但这只能导致不良的后果。沿街道拉开的坦克纵队会造成堵塞，遭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后就立即起火燃烧。只要第1辆坦克起火，其余的坦克便无处机动躲藏。因为车身侧面暴露，在敌人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打击之下，中弹后立即起火。因此，在强击柏林

的第一天，我们的坦克就改变了队形。他们与步兵、炮兵及工兵密切协同作战，使装甲车辆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卡图科夫将军指挥的光荣的近卫军战士们，在蒂尔花园区和柏林市中心走完了自己的胜利道路。真正的战斗友谊使坦克兵和步兵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城市作战，特别是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中作战，要比在野外条件下作战复杂得多。在城市内，大兵团司令部和指挥员对作战进程的影响比在野外要小得多。因此，许多事情取决于分队的下级指挥员和每个战士的主动精神。城市作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城市战斗是火力近战。在战斗中，进行近距离射击时，不仅使用自动枪，而且还使用大威力的火炮和坦克炮，这些武器要在可数的数十米距离内进行射击。敌人隐藏在地下室和建筑物里。只要我们一露面，立即就会听到枪炮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在城市作战中，进攻是采用跃进方式，占领一个建筑物后向另一个建筑物跃进。但是，这种战斗行动是在宽大的正面上、在每条街道上进行的。

对防御者来说，重要的是，把最坚固的、适于防御的建筑物和街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个设施的失守，即意味着整个支撑点或阵地的丢失。

在这种战斗中，部队的指挥主要建立在充分相信各分队的指挥员的才智的基础上。这些指挥员知道全团的总任务，要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以及其参谋人员的位置，应尽量靠近作战的目标，他们主要通过电台保持通讯联络，并负责协调各强击队间的战斗行动，组织收集情报，认真地监督弹药和给养的供给情况以及确定昼夜间的统一的信号标志。指挥员和司令部在城市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在排、连、营这样一些单位里，组织各兵种的最密切的协同动作，因为强击群和强击队正是由这样的一些分队组成的。

可见，发挥中等编制单位的部队指挥员的作用，发挥列兵及军士的主动战斗精神，在城市作战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完成的各种战术任务，有时会发展为战役任务，而整个交战的成败，则完全取决于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敢，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和极大的信任。

在强击柏林的第1天，我集团军部队向市中心推进了3公里，在个别地段上推进了4公里。在右翼作战的部队已进抵布里策尔——茨维格运河，这条运河在特莱普托夫公园附近汇入施普雷河。在左翼和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的部队，占领了布利茨和马里恩多夫两个市区，沿特尔托夫运河继续向前推进。

几乎每个方向的战斗都进行得非常激烈。每个街区布设的发射点和长柄火箭弹发射巢，其数量都已达到极度饱和的状态，敌人的这些发射点和发射巢，通过楼房的阳台和窗户，可居高临下地攻击我坦克和密集的人群。

柏林市内有许多铁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市区，是很合适的防御阵地。所有通向火车站和桥梁的接近地以及道路交叉点，都变成强大的支撑点。每条运河都已成为敌人妄图扼制我军进攻的防线。

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是相当困难的。

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瓦西里·切尔尼亚耶夫少尉指挥的强击队领受的任务是，将盘踞在阿尔特——马肯大街与塔肯多夫大街交叉路口的一座高大石头建筑物里的敌人驱赶出去。法西斯匪徒拼命加强这所楼房的防御。

他们在地下室里配有小口径火炮和自动枪手，在二楼配备了步兵重机枪。

此外，这栋楼房的守敌还与相邻的楼房保持着火力联系。

切尔尼亚耶夫少尉命令重机枪指挥员尼古拉·弗拉先科和两名反坦克枪射手向这栋楼房的窗户射击。同时，命令彼得·瓦西列夫斯基中士用 45 毫米火炮去消灭敌人的机枪和随后重新出现的发射点。

我们的反坦克枪、机枪及火炮开始向敌人射击。希特勒匪徒隐蔽在大楼的后面，暂时减弱了火力。我们的战士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伊万·特鲁巴切夫中士指挥的强击群边射击、边向前冲击，首先接近了楼房。战士们向地下室的门内及窗内扔了几颗手榴弹，随后冲进楼房，打死了敌人的炮手和所有的自动枪手。尼基金中士指挥的巩固胜利小组的战士们，紧跟着特鲁巴切夫的强击群冲入楼内。在进入一间房间之前，尼基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并向屋里扔进去一颗手榴弹。几个希特勒匪徒当即被炸死，其余的全部溃逃。近卫军战士们用手榴弹和自动枪为自己开辟道路，终于把其余房间内的法西斯匪徒全部赶了出去。

这时，米哈伊尔·别利亚夫斯基中尉和维克多·罗曼诺夫少尉指挥的两个强击队与迫击炮兵和炮兵协同作战，占领了座落在街角的第二栋楼房。

巷战的胜负取决于小股的强击群能否发扬顽强的作战精神以及作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几个装备有手榴弹、自动枪及步枪的战士，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下，迅猛地向敌人发起冲击，经常能够获得成功。只是应该注意，在向前推进时，应避免笔直的街道，要利用房屋被打穿的缺口、后门、篱笆门、庭院以至偏僻的窄巷。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会在一些建筑物内以及建筑物之间的空地布雷，街道上一般布设应用地雷，房屋内布设地雷和诡雷。我们是这样教战士的：在向前推进之前，应进行周密的侦察，摸清情况，然后稳扎稳打地勇敢前进。

对于结构建筑物，敌人防守时是非常顽强的，因此，应使用迫击炮的火炮将它摧毁，再用手榴弹消灭里面的守备部队。

如果各分队冲击一个街区，则必须将这个街区分割为若干个部分，将守敌隔离开来。冲击一栋房屋或一个街区时，应同时从几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分队配属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首先应当以直接瞄准射击压制那些妨碍我强击群前进的敌人发射点。

对于我集团军的近卫军战士们来说，强攻城市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他们利用以往积累的作战经验，勇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

在向泰姆泊尔霍夫机场前进的路上，我军要强渡特尔托夫运河。德米特里·涅斯捷连科中尉率领近卫步兵第 39 师的强击分队，第 1 批冲到河岸。大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着岸边的建筑物，以致很难看清对岸的情况。涅斯捷连科心想，既然我们看不到对岸，对岸的敌人也看不到我们。于是中尉命令第 1 强击群首先强渡过河，攻占对岸的一座高层建筑物。这时，运河上的桥已被炸毁掉入水中，即使如此，如果不是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手和阻击加强防守，用火力的严密压制，还是可以沿着完好无损的桥桁架强渡过河的。

于是，涅斯捷连科命令炮兵向对岸的各建筑物进行急袭射击。准确的炮火射击迫使敌人的发射点不得不停止射击。安德列·阿尼西耶夫上士率领强击群趁机向河桥冲去。强击群的指挥员第 1 个冲到楼房的近旁，当时，法西斯分子的一挺机枪，正从窗户里向外猛烈射击，他立刻朝窗户内扔进一枚手榴弹。敌人的机枪立即变成了哑巴。阿尼西耶夫又向窗内扔了两颗手榴弹，

紧接着冲进楼房，消灭了三个房间内的法西斯匪徒。

近卫军战士们的行动迅猛，战术机动灵活。在进入每个房间和通过每条走廊之前，自动枪手们首先猛烈地扫射一遍，然后向前冲去。法西斯匪徒经受不住如此迅猛的打击，全部溃逃。巩固胜利小组趁机向这些溃逃的敌人猛烈开火。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阿尼西耶夫率领的战士们冲入并攻占了旁边的一栋楼房。

在近卫第 8 集团军战士的功勋史册上，还有另外的光辉的一页。这光辉的一页是通讯员阿列克塞·布尔马舍夫准尉谱写的。我非常了解阿列克塞·布尔马舍夫。我在第聂伯河、维斯瓦河和奥得河曾多次见过他。他是一个宽肩膀、高颧骨的西伯利亚人。是他在施普雷河望着混浊而寒冷的河水，对同志们说。

“我们渡过了无数条比这条河要险恶得多的河流，这条河又算得了什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渡过这条河！”在靠码头的岸边和水上，漂着一些德军撤退时未来得及毁掉的船只。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的通信排利用了这些船只。

敌人还在进行顽强的抵抗。一颗颗炮弹和炸弹落入水中，掀起了一条条水柱，弹片在空中呼啸而过，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和电话员科舍廖夫划着的小渔船眼看就要被掀翻。但是，这条小船终于冲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布尔马舍夫和科舍廖夫手持步枪和线轴跳上岸，立即开始架线。德军发现他们后，立即向他们射击。科舍廖夫中弹牺牲了。布尔马舍夫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跑步前进，冒着敌人疯狂的扫射向前铺设着线路。不久，指挥所听到了他的声音：“‘雄鹰’！‘雄鹰’！我是‘花楸果’！我的声音怎样？”……此后，全团进入柏林。争夺泰姆泊尔霍夫中央机场的战斗异常激烈。在电线杆上、在燃烧着的屋顶上以及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内，人们都看到过近卫军准尉布尔马舍夫的身影。他与战友们一起，可靠地保证了各分队的通信联络。一个人只有具备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才能在枪林弹雨中爬到电线杆顶上架设线路！布尔马舍夫手里夹着线轴沿街奔跑，德国鬼子用自动枪和迫击炮从各个方向不停地向他射击。

他距我军强击群正在进行战斗的建筑物只剩下 10 米了。这时，一块弹片打入了近卫军战士的胸膛。布尔马舍夫用一只手按住伤口，跑到建筑物跟前，高喊了一声：“保持联络！”然后，便倒在马路上。

这是布尔马舍夫在战争年代里架设了数千公里的电话线中的最后几米。这最后的一条线路是沿德首都的街道架设的。不久，正是通过这条线路传来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机场已被全面包围！”应该说，占领泰姆泊尔霍夫机场对整个柏林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机场是柏林市剩下的最后一块可供飞机起飞的场地。显然，敌人企图竭尽全力将这唯一的通往空中的窗口控制在手中。守卫机场的部队有高炮部队、党卫军分队以及坦克部队，这些部队由南、东两个方向沿跑道边缘配置，形成了一个 U 字形。大部分坦克被隐蔽在地下，变成了固定的发射点。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柏林的守备部队已无燃料贮存供坦克使用。后来据被俘的坦克兵供认，所有汽油都被收走供飞机使用了。

根据俘虏们的供词，在地下机库内停着加满了油的飞机，随时准备起飞。机组人员昼夜在机旁值班。在机组人员中，包括过去深受重用、多次将希特勒、戈培尔、鲍尔曼以及第三帝国的其他头目空运到德国各地的飞行员

和领航员。可以断定，希特勒和他的同伙现在还在柏林。决不能让他们从这唯一的空中窗口溜走！包围并占领机场的任务交给了近卫步兵第 39 师和第 79 师。炮兵的任务是用炮火控制跑道。由于我们不知道地下机库出口的准确座标，因此，配备有坦克的各强击队的任务是，用机枪火力切断通向跑道的各条道路。这样，就将敌机堵在地下。

这个计划实施是非常成功。从 4 月 25 日晚开始，这里一架飞机也没能起飞。到 4 月 26 日中午，机场和整个泰姆泊尔霍夫航空港，包括机库和通信枢纽以及“弗吕哈芬”主楼，已全部掌握在我军手中。

但是，与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一起，还传来了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近卫步兵第 39 师第 117 团团长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格里岑科牺牲了。这是一个足智多谋、意志坚定和非常勇敢的人。此人宽宽的肩膀，身材匀称，少言寡语，两眼炯炯有神。他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他是 4 月 25 日夜里牺牲的，但我在第二天才接到通知。显然，同志们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牺牲，我也是这样……当《青年近卫军》杂志发表了 my 回忆录时，我收到了 E·C·格里岑科的妻子尤利亚·马卡亚罗夫娜的来信。她是新西伯利亚省马斯良尼诺工人新村的中学教师。他在信中写道：乡亲们至今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着英雄。

攻打柏林已经第三天了。被围困的柏林守备部队的防线愈来愈短了，但敌人的顽抗仍在不断加强。我们战斗队形的密度的增大，火力机动已缩减到了极限。一切都被挤到拥挤的街道上，部队向前运动时，真可以同矿井坑道的挖煤工在工作时的情景相比。只有穿过一道一道的厚厚的石头墙上的缺口，越过大堆大堆的废墟和大块大块连带着炸断的钢筋混凝土块，才能从一条街冲到另一条街，从一个街区冲到另一个街区。当希特勒匪徒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是，不顾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炸毁了城市的建筑。

在选帝侯大街教堂前的广场上，党卫军的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抵抗。1945 年 4 月 26 日夜间，强击群与独立重型坦克第 34 团的坦克一起，大胆跃进，拿下了横贯城市南部的两条铁路线。在教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一辆坦克触了地雷，履带被炸坏。

党卫军分子看到苏联的这辆坦克停住了，马上切断了这辆坦克的乘员以及协同坦克作战的自动枪手的退路。

党卫军约有 100 人，而我们只有 12 个人。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开始了。在这场战斗中，近卫军中士、坦克驾驶员格尔曼·彼得罗维奇·沙什科夫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的良好战斗素质。他出生在高尔基省伏尔加河流域。当装填手在坦克牺牲后，沙什科夫立即代替了他。过了一会儿，炮长也牺牲了，可是坦克仍然在射击。沙什科夫这时既是装填手，又是炮长。火箭弹的爆炸，又夺去了车长的生命，现在，只剩下沙什科夫一个人了。他坐在操纵杆旁，操纵着坦克在原地转动。又一发火箭弹击中了坦克，发动机部分起火了，沙什科夫挂上倒档，让坦克的尾部向一堵快要倒塌的墙撞去，这样，墙倒塌时的碎砖碎土一下子就把火熄灭了。

沙什科夫用炮和机枪轮番地向法西斯分子进行射击。但很快炮弹和子弹都打光了，只剩下一些手榴弹。这位近卫军战士很珍惜自己的坦克，他不愿意让它落在敌人手里。他的手榴弹一会儿从炮塔口、一会儿又从驾驶员窗口，一颗按一颗地飞出去。而手榴弹最后也扔完了。沙什科夫的胸部第二次受伤。希特勒分子开始敲打坦克的装甲，叫沙什科夫投降。但近卫军战士是

不会投降的！格尔曼·沙什科夫一直呆在坦克里。

当战友们赶到这里时，看到在坦克的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 30 多个穿着秘密警察制服的德军自动枪手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手的尸体。沙什科夫躺在坦克里，他自己多处被烧伤，满身是弹伤，手里还拿着刀子。他用最后的气力向同志们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位英雄牺牲前说的话是：“谢谢同志们，你们没有使我的躯体落在敌人的手中。”

3

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 A·A·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说：在亨里赫·冯·克萊斯特公园后面的一座已变为强大支撑点的拐角大楼里，被包围的敌守备部队，仍在用大口径机枪不停地进行射击。据情况判断，那里盘踞着敌人的敢死队队员。他们向想穿过街道的卫生员、伤员、妇女和孩子们射击。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所有进入机枪射程的人开枪，他们打长点射……应该怎么对付他们呢？在这之前，我很久拿不定主意：是否动用集团军现有的喷火器分队呢？我一直将这些部队作为预备队。而现在下决心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命令独立工兵第 41 旅的背囊式喷火器分队调到前沿阵地。

喷火手们悄悄地来到紧靠着拐角大楼的地方，他们向据点的所有射孔和地下室的窗口喷射出一束束火焰。但敌人的机枪很快又射击起来。这就是说，一定要冲入这个巢穴，将这些法西斯分子就地消灭干净。主动要求执行这一决定的是喷火手列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波波夫，他是来自赤塔省阿尔贡村的一个勇敢的西伯利亚人。他先将一捆手榴弹扔向大门，把门炸开，然后冲进了一楼。走廊里的纳粹分子，有军官，也有士兵，还没有来得及放一枪，就被波波夫的喷火器喷出的火焰吞没。但敌人的主力躲在地下室里。波波夫向地下室扔了几颗手榴弹后，便顺着楼梯跳了下去，出现在法西斯分子最密集的地方。波波夫后来说，法西斯分子大约有 30 人。

“举起手来！”他大声喊道。

回答的却是一连串的自动枪射击。他只好隐蔽在隔墙后面，用喷火器向那伙法西斯分子猛烈喷射。

整个房子马上燃烧起来。幸存的纳粹分子企图逃命，但我们的战士正在街道上等待他们。

这就是一个战士的主动精神和高超的本领！在这场战斗中，实际上是一个人解决了战斗。应该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城市战斗中，士兵的机智和优良的军事技术是主要的。

当敌人盘踞在有坚固墙壁的石头建筑物内时，仅使用步兵去攻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时，就需要使用各种武器的军人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步兵应得到炮兵不断的支援。城市作战的经验表明：每个强击群除了步兵自身的重型武器之外，至少还应有 2—3 门火炮的支援。

在这种情况下，炮兵承担什么任务呢？他们围绕被我攻击的目标，在两翼和纵深进行拦截射击，切断被攻击目标与近邻的联系，从而使敌人得不到外援。与此同时，炮兵压制已暴露的敌人发射点，使敌人不能发起反冲击。

在巷战中，炮火射击的最远射程为 300—400 米。这就要求炮手的动作准确协调，出敌不意地突然开火，用 1—2 发炮弹击毁目标，否则，敌人一定会把火炮消灭。

上士弗德尔·契尔帕琴科指挥的炮班，受领的任务是支援强攻大楼的步兵。上士对目标进行了侦察。发现将要进攻的楼房的第二层配有一挺机枪，

地下室内集中有自动枪手和火箭筒手。上士把阵地选在所攻击的建筑物对面的一座房子的院内，离目标约有 100 米。他们在院墙上打开了一个通道，把足够多的弹药运到阵地上。契尔帕琴科事先同强击群指挥员商定好开火信号和火力转移信号以及指示目标的方法。

夜间，他们将火炮推到预先已选好的阵地。天刚亮，他们就开始了射击。用两发炮弹就消灭了敌人的机枪。又立即将火炮的火力转向地下室的窗口。在火炮、配属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步兵发起强攻。他们冲进了大楼，在楼内与敌人展开了战斗。而这时，炮兵又开始向附近的楼房射击，使敌人无法援助被围的守敌。

契尔帕琴科的炮班曾多次在暴露的阵地上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争取在天破晓前将火炮推到阵地上，并把炮弹也运到那里。射击之前火炮旁只留两个人，因为他们两人能够较容易地隐蔽在火炮的防盾后面，其余的则进入近旁的房子里，从那里观察敌人的情况。这样，在火炮一旦遭到敌人炮击的时候，敌人不可能使整个炮班失去作战能力。

顺便指出，由两名炮手操纵火炮时，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素质，熟知炮班各炮手的职责。

在巷战中，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所以炮长不应该等待步兵为他们指明射击目标。上士契尔帕琴科自己寻找和消灭妨碍步兵行动的目标。步兵也应及时通知炮兵有关敌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出现情况以及机枪、自动枪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配置位置。

在城市里，经常要把火炮挪到楼房旁，并通过窗口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炮班是无法搬动重型火炮的，他们需要步兵的帮助。

在城市作战中，步兵、炮兵、工兵、通讯兵、坦克兵和侦察兵之间的战友友谊、相互帮助和协同动作，对取得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象强击城市时各兵种的战士之间所表现的这样的亲密的交往关系。战斗中他们随时都会感到战友的相互支援，他们肩并肩地共同作战。

特别要讲一讲侦察问题。在每一次冲击和强击之前均应进行侦察。进行不间断的侦察的目的，是要了解敌人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而在此基础上，对敌人进行有把握的攻击。这就要求侦察兵具有勇敢无畏、积极主动和随机应变的素质。

在整个柏林战役过程中，维克多·利西钦上尉指挥的侦察组表现得非常出色。利西钦的侦察兵不止一次地潜入敌驻地，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侦察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

4

4 月 26 日夜，我把自己的指挥观察所迁移到贝勒—阿利安大街，这里离前沿较近。这条街道现在叫做梅林达姆大街。我们选择了一幢座落在离弗吕哈芬航空港主楼不远的五层大楼，这座楼位于维多利亚公园前一个三角形街区的岔口。楼房的墙壁已呈深灰色，看样子不只一次被大火烧过，窗户的玻璃全被打碎。在大门入口的上方，用水泥雕塑成的带有 X 这个德国法西斯标记的一只鹰已被熏黑，这只鹰的爪子抓着第三帝国的国徽。一楼是一个面积不大、但有黑色大理石圆柱的高高的大厅。这是一个既黑暗又不舒适的房子。这里的一切都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镶着暗色窗框的窗户，黑色的窗间壁和令人沉闷的灰色的天花板。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因为这间房子正好是与战争结束的事件

有关。

当我来到新指挥所时，那里已架好了电话线。我接到报告：几分钟前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个从三楼的楼梯转弯处用手枪向我们的通讯兵女战士们开枪射击。这些女战士没有惊慌失措，因为她们身后总背着步枪或自动枪。他们向上冲击。这个身着便服的人，一边还击，一边急忙地顺关楼梯逃跑。在瓦利娅·托卡列娃的带领下，通讯兵战士们紧追不放。这个法西斯分子躲入楼房的顶间里。姑娘们跟着他冲了进去，用自动枪向角落和黑暗处连连射击，然后用德语喊道：“举起手来！”没有任何人回答。姑娘们开始仔细地搜查楼房的顶间。突然，她们发现了这个敌人，他面部肌肉在抽搐，脸上一副失去理智的表情。他手里握着手枪，从角落里跳了出来，用脚踢开顶间的窗户，喊了一声“希特勒完蛋了！”便一头冲马路栽了下去。

女通讯兵们让我看了这家伙的尸体。他躺在院子里，被一块蒲席盖着。这是法西斯分子应得的下场……

4月27日，我军继续对旧柏林的各街区进行强击。将近傍晚时，我基本兵力已开始向蒂尔花园区——希特勒军队的最后防御地区进逼。

突击第3、第5集团军顺利地向柏林市中心——蒂尔花园区进攻，这附近设有第三帝国的主要的国家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大本营以及国会就隐藏在帝国办公厅内。这两个集团军行动坚决，战术灵活，为我军在历史性的柏林战役中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沙尔勒滕堡地域作战。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并肩作战。在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左翼作战的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

部队企图于行进间强渡兰德维尔运河未获得成功。蒂尔花园区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被施普雷河和运河环绕着，这里由党卫军的几个精锐部队和警卫营守卫。希特勒匪徒们隐藏在坚固的建筑物里，从里面便于向外观察，并能对所有通向水障碍的接近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傍晚，我听完各军军长和各独立部队指挥员的报告，并亲自进行了地形勘察之后，我决定让进攻部队休息半昼夜。但同时不能放松牵制敌人的行动：对各支撑点加强侦察，加强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控制所有的广场和街道。

休息一直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休息而休息，也是为了给各强击群扩充人员，并为部队输送弹药。摆在炮兵和迫击炮兵面前的任务是：使自己的行动与从东面、北面、西面进攻政府街区的友邻集团军的炮兵协调一致。包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弹着点稍有误差就会造成我军部队的伤亡。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在对各强击队的人员进行补充和变更部署时，特别注意到指挥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配置情况。任命新的指挥员代替失去战斗能力的指挥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指挥员应富有主动精神，并且行动果敢。如果战士们十分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如果他在党员和团员中有深厚的基础，这样的指挥员就能完成任何任务。负责选拔工作的领导，在任命谁担任强击群或强击队的指挥员之前，应听取党的工作人员的意见，并应该与普通的党员交换意见。

重要的是，指挥员要接近战士，善于找到打开战士心灵的钥匙。能正确提出任务，这只是事情成功的一半。要使每一个战士对面临的任務都很清楚，要使战士们情绪激昂、得到鼓舞，以便他们深刻地理解自己要冒着敌人

的炮火去执行的那些任务的意义，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完成指挥员的勇敢的决定。仅凭命令和指示是不能获得这种效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支持指挥员。要有能够打动每个战士心灵的语言，要作出勇敢和自我牺牲的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胜利充满信心。

生活本身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十分重视党政工作。在巷战中，党的政治工作应做得特别灵活和讲求实效。在这种条件下，用一般的命令和抽象的谈话是达不到目的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该接近战士，和战士谈话应谈具体事。例如：如何更好地保养武器；怎么机智地消灭敌人；问问战士是否清楚自己在进攻中的职责，是否记住了信号，有没有带个人急救包和应急储备食品。谈话既应严肃认真，又应无拘无束，其目的是使战士们充满必定完成任务和必定取得胜利的信心。

当我写这几句话时，近卫步兵第 79 师第 220 团第 1 营政治副营长 H·B·卡普斯强斯基上尉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外表平常，身材矮小，消瘦，不爱讲话。

战士们对他的评价是：“政治副营长不喜欢多说，却喜欢多听。但是，一旦他开口讲起来，每句话都讲到点子上。”在攻打柏林的日子里，卡普斯强斯基从不总呆在一个地方。谁也没有看见他休息过一会儿。刚才还在营长这儿了解情况，一会儿就又不见了。如果到某一个强击群去打听他的情况：“你们见到副营长了吗？”

“刚才还在我们这儿，给我们讲了一些优秀战士的事迹，安排了战斗快报的出版，后来就到邻近的队去了。”

“谁跟他一起去的？”

“就他一个人。”

“要是被敌人的狙击兵在什么地方打中了他，或者被倒塌的墙埋住了，那你们就没有政治副营长了！”

“我们也很担心，但他不让别人陪着他，他说‘没有尾巴’也对付得了！”

他是一个谦虚、勇敢的人，他从不考虑自己。仅是为了给战士们带去好消息、或用语言和实际行动去鼓舞和帮助战士们，他钻入一个个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一条条街道。卡普斯强斯基在战斗的第 1 天，就指定营党小组长、团小组长负责第 2、第 3 强击队的工作，他自己去指挥第 1 强击队。第 2 天，党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互相交换了位置，而卡普斯强斯基仍留在准备攻击泰姆泊尔霍夫火车站的强击队里。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能经常看到自己的领导。在深夜或者在暂时停火的时刻，卡普斯强斯基召集积极分子进行一天的总结，下达指示和提出建议，然后重又回到最困难地段的战士们身边。这样一来，营里的每一个战士，无论是自动枪手或是工兵，无论是炊事员或是通信员，都能了解到形势和自己的任务，都能知道刊物上刊登的和电台广播的最新消息。第 1 营和 1 营的各强击队在战斗中总是取得胜利，这里面有着这位政治工作人员的很大功劳。

1 营是第 1 批进抵兰德维尔运河的部队之一。

“政治副营长现在在那里做什么呢？”我问向我介绍卡普斯强斯基情况的一些同志。

团里有人很快通过电话向我报告：

“他在帮助战士利用就便材料制造浮游工具。”

“什么浮游工具？”

“因为明天我们要……”

已在进行强渡河的准备工作的同志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

“明白了，明白了。你们准备去捕鱼和游泳啦！”

“两者兼顾。而他在我们这儿，这方面他是大能人。他用普通的帐篷可以做成一条小船，他扎的这种筏子，样子很好看。战士们现在正在围着他跟他学呢！”“他做的很对。谢谢，再见！”

在开始实施最后的突击之前，在这场战争结束已为期不远的时刻，几乎每个战士都会想像自己将来的和平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疑问：这会不会影响军队的斗志呢？最后都想活着看到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领导战士们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呢？况且，在巷战中，师长不可能象在野外作战那样，亲眼看到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这里没有连续的堑壕和掩体，也没有供观察所利用的制高点。四周全是房屋、墙壁和废墟。各分队隐蔽在地下室内、在有结实墙壁的院子里以及在僻静的小巷和废墟中，所以是看不见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各团和各营能够按“冲击”的信号协同一致地投入总攻呢？

能够做到的，过去能，现在能，将来也能！指挥员们，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他们以身作则，在自己同志的面前，在自己的良心面前，在自己的祖国面前，他们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就是集团军永恒的、永不枯竭的斗志的源泉，这是做任何事情取得成功的保证。

应事先说明的是，在军事委员会和各部队、各兵团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做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进入结束阶段的总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下进行的：有时，出于对战士们的爱护，我们甚至不得不阻止战士们的一些不必要的冒险行动；

没有1个营或强击队胆小和不坚决执行命令而受到通报。

当然，提出关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在攻打蒂尔花园区过程中起带头作用问题，并不是说，在没有做好周密的保障和火力掩护之前，以及对要冲击的目标尚未进行猛烈的炮火突击之前，就让他们冒着机枪的侧射火力或通过地雷场，去渡过运河和冲向敌人的工事。

曾经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不要吝惜炮弹，不需要节省各种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可以敞开打！这些东西我们有大量储备，因此，从反坦克炮直到最大威力的火炮，其中包括远程重型加农榴弹炮，都要用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甚至各种类型的“卡秋莎”火箭炮，也在烟尘和硝烟的掩护下，直接驶到运河岸边，展开之后，对敌人的工事直接进行轰击。

我们认为，在炮兵可以开路并能压制一切目标、其中包括那些有碍于渡河的发射点的地段上，以小规模部队强渡运河是合适的，而以整团、整师的全部兵力同时强渡是不合适的。

我事先把选择强渡地段的权力交给了部队指挥员。直接位于出发阵地的指挥员，对于炮兵射击的效果看得最清楚，他们也最了解在哪些地段强渡可以不受损失地顺利地达到目的。

对于一些特别地段和运河上的大桥，例如波茨坦大街拱桥，我都置于亲自控制之下，因为从那里可以对帝国办公厅发展最有成效的突击。

在讨论有关进攻蒂尔花园区的准备工作的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注意保护属于德国人民的财产问题。我们把保护银行、书库、科学研

研究所、医疗部门的任务交给了集团军后勤部队执行警备勤务的特别分队。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承担了保护驻柏林的外交使团、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受侵犯的任务。各军、师的政治机关首长受命亲自负责监督保护在其兵团作战地带内的外交使团驻地的安全事宜。

还要考虑柏林市平民的供给和医疗工作等问题。此时在德国首都的仓库和食品基地内，只剩下有数的几吨面粉和少量的肉鱼罐头。肉、米和奶制食品已经没有了。人民在挨饿。孩子们爬到坦克旁，或者冒着弹雨和炮火，走到我们的炊事车来要一小块面包、一勺汤或一包勺粥。

是的！这就是俄罗斯士兵真正善良的心肠！战士们把自己饭盒内的食品拿出来送给德国孩子们，把罐头和糖塞在孩子们的手里，说：“拿着，回家去吧！”我们收到了集中配给柏林居民的定额食品，并特地为当地居民派出了许多炊事车。

最麻烦的是医疗工作。我集团军部队所通过的柏林地区，还在冬季就被美国空军炸毁了。自来水管和下水道都已损坏。照明使用油灯。取暖是靠煤油炉和铁火炉。卫生间、厨房、走廊甚至卧室都堆满了垃圾。到处散发着臭味，满目都是污秽和肮脏的景况。流行着伤寒、疥疮和胃病……人们身上长满虱子，被咬得满身伤痕。

怎么办呢？这里需要大量卫生员和数十个医院。

集团军卫生勤务主任接到了指示，要寻找足够数量的消毒器材，并与各区的管理处一起，动员德国的医药卫生工作人员，来控制流行病的蔓延。

我命令集团军后勤部长把所有库存的肥皂发给市民。各区的管理处组织了恢复水塔供水和清理下水道的工作。

各兵团的政治机关挑选了懂德语的军官向居民解释，现在该是着手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的时候了，因为战争即将结束。

总之，所有这些都是与战役的政治保障有关的问题。

……离重新发起强击只剩下几小时了。天已蒙蒙亮。我整整一夜没有合一下眼，也不想睡，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两盒“卡兹别卡”牌香烟全都抽完。大脑在紧张地工作着。明天、后天以及全世界人民的节日“五一”那一天，我们将用什么消息向祖国、向全世界汇报呢？阿道夫·希特勒的狂妄行为将怎样告终呢？在我们如此强大的兵力突击下，他能藏到何处呢？无处可藏！无论他躲在什么地方，苏联军人都会把这个刽子手找到，使全人类从他的手中解放出来！

经过4昼夜的战斗，我部队越过了一座座高墙和一道道石头鹿砦，向柏林市中心逼近。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向前推进了12公里。保卢斯集团军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时曾拥有比我们现在更有利的阵地，但是他们用了100多天时间向前推进的距离，还不到我们4天推进的距离的一半。

在炮火准备开始前1小时，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的旗手尼古拉·马萨洛夫中士，持着团旗开始向兰德维尔运河前进。随同他一起前往的，还有两名副旗手。近卫军战士们知道，在他们面前是法西斯首都的主要堡垒，希特勒和他的主要通信枢纽部就在这里，第三帝国的头目们，通过这个通信枢纽部，仍在继续指挥自己的军队，强迫他们去参加无谓的流血战斗。

南面通向蒂尔花园区中心的道路，被一条很深的运河拦腰截断。运河两岸是陡峭直立、用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堤岸。所有桥梁和通往桥梁的接近地

都布置了地雷，并有密集的机枪火力掩护。只有实施迅猛而协同一致的突击，才能突破这个威胁力很大的危险地区。

突击第 5 集团军的部队从兰德维尔运河向帝国办公厅进行了冲击。希特勒就躲藏在帝国办公厅的地下室内。负责守卫帝国办公厅接近地的部队是“阿道夫·希特勒”侍卫队特别旅的几个营。指挥该旅的是希特勒的忠实走卒纳粹死党蒙克。

近卫军人们开始分成小组向冲击地区推进。有的小组的任务是利用就便器材强渡运河；有的小组则要冒着枪林弹雨，用迅猛跃进的方法冲过布满地雷的拱桥。到达对岸后，只要能占领第 1 栋房子即可。此后，任何力量也都阻挡不住近卫军人前进。他们将通过残墙断壁和地下室向前推进。他们已经具有丰富的巷战经验。

离冲击开始还有 50 分钟。四周一片寂静，仿佛暴风雨就来临前一样。静得令人感到紧张和不安。忽然，这寂静被一场大火发出的噼啪声打破。这时，传来了小孩的哭叫声。这哭声仿佛是由地下的某个地方传出的。声音嘶哑，听了使人坐立不安。这个孩子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呼唤着所有人都听得懂的一个词：“妈妈，妈妈……”

“好象是在运河对岸，”马萨洛夫对同志们说道。

他把军旗留给两名副旗手，自己回去向指挥员报告。

“请允许我去救这个孩子，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机枪开始射击。马萨洛夫向前爬去，像一张树叶，紧紧地贴在柏油路面上，不时隐蔽在不深的弹坑内。他没有忘记摸索地面上的每个凸起处和每道裂缝，以防碰响地雷。他已经越过过河沿岸的一条街道，隐蔽在混凝土岸壁的凸出部后面。这时，他又听到了孩子的哭声。那孩子在苦苦地呼唤妈妈，呼声是那样的凄惋和执拗。他仿佛是在催促马萨洛夫。这时，马萨洛夫挺身站了起来，他是那样高大，那样威武。

尼古拉·马萨洛夫的战斗历程清晰地反映了近卫第 8 集团军的历史。马萨洛夫是在克麦罗沃省季苏尔地区军事委员部应征入伍的，当时我们已组建了第 62 集团军。入伍后，他与我们一起，战斗在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马萨洛夫在马马耶夫岗战斗中是列兵；在北顿涅茨河作战期间是机枪手，在强渡第聂伯河的战斗中任班长；在敖德萨解放之后，他被提升为警卫排副排长；在德涅斯特河登陆场战斗中负伤；4 个月后，在强渡维斯瓦河时再次负伤。但是，这个近卫军人始终没有离开战斗的行列，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登陆场的整个行军途中，他的头上一直缠着绷带。

马萨洛夫已经越过了兰德维尔运河岸边的拦障。又过了几分钟。一瞬间，敌人的机枪停止了射击。近卫军人们屏住呼吸，倾听着孩子的声音，但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们等待了 5 分钟……10 分钟。难道马萨洛夫白白地冒险了吗？几个近卫军战士不约而同地准备冲上前去。就在这时，大家听到了马萨洛夫的声音：

“注意！孩子在这里，火力掩护！敌人的机枪在右边带圆柱的楼房的阳台上。让它变成哑巴！”但这时炮火准备的时刻已到。集团军炮兵司令员 H·M·波扎尔斯基将军已经下达了命令：“预备……放！”数千门火炮和迫击炮开始轰击敌人。无数枚炮弹仿佛是在掩护这位苏联军人抱着 3 岁的德国女孩撤出死亡区。

中士马萨洛夫将小女孩交给卫生员生，重新又站在团旗下，准备向前

冲击。

对蒂尔花园区的炮击越来越猛，大约持续了 1 个小时。我从观察所内看到，政府办公街区上空升起了浓密的烟云和红色的砖灰。这时正刮着北风，一团烟云向我们的观察所飘来。依稀可见和模糊不清的太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周围变得一片昏暗，只是时而能看到运河对岸沿岸街的高墙。

根据炮弹爆炸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炮兵已经把火炮推出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正在对数量非常有限的目标开火。很可能，他们正在沿各街道摧毁那些阻碍通向各广场的街垒。但是，我军的炮火对隐藏在小巷内和十字路口拐角后面的机枪发射点仍然不能发挥威力。步兵刚一冲进去，敌人就立即开火。为此，我预先通知各部队指挥员：

“不要着急。改用小分队从我军炮击的地段冲过河去。”

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各部队指挥员开始向我报告，在许多预定强渡的地段上，敌人正在以猛烈的侧射火力射击，其中主要是使用大口径机枪和高射机关炮。

这就是说，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战斗侦察，你们要继续摸清敌人的发射点。”

我这样回答是使他们明白，必须拟定新的作战方案，而不是去白白送死。

侧射火力……这就是说，敌人将发射点隐藏在某些地方的牢固的工事中，而且占据着非常有利的阵地。究竟在何处呢？我查看着地图。原来在我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兰德维尔运河成圆弧形弯向敌方，从有慢坡的转弯处发挥侧射火力非常方便。此外，敌人可以在 3 座铁路桥和 6 座电车桥的桥墩上部署机枪。这样，只要水上有人出现，立刻就可以向运河射击。

采取哪种作战方案呢？我们的炮兵此时正集中在各条狭窄的街道上，不能对敌发射点进行压制。敌发点是设置在街道对面、桥下的岸边低凹处，以及运河转弯处。只有将火炮推到岸边，并沿运河走向进行射击，才能压制敌人。这就是说，应尽快攻占通往运河的接近地、首先是运河转弯处。应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使用炮兵也从翼侧突击敌人的侧射发射点。

同时，炮兵的另一项任务是：摧毁紧靠运河的各街区纵深入的目标。由于中间地带过于狭小，因此无法使用航空兵。用炮火击穿墙壁，然后通过缺口盲目射击，这也未必可行，而且需要几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武器是迫击炮。迫击炮可隔着房屋射击，在很狭窄的小巷中命中目标，正如迫击炮手们开玩笑时说的那样，炮弹可沿弯曲的弹道通过烟囱直接进入房内。

夜幕降临了。炮兵明确任务后，开始准备新的突击。各步兵营与坦克兵和工兵一起，继续肃清通往运河的接近地上的敌人，并占领更有利阵地。

为了准备对蒂尔花园区进行最后的总攻，其它集团军也作了短时间休整。特别是突击第 3 集团军，它为冲击国会大厦又投入整整一个新锐的军。

我听取了侦察兵们的汇报，他们在考虑是否有可能通过地铁干线潜入蒂尔花园区。由于柏林南部市区的地铁站大多都设在地面上，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还没有利用这些地铁隧道。而那些设在地下的干线会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此外，柏林的地铁与莫斯科的地铁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车站狭窄、拥挤，隧道深度仅有 3—4 米，飞机轰炸后，许多路段已堵满泥

土或已被水淹。

但是，有两条平行的从泰姆泊尔霍夫通向蒂尔花园区的隧道，它们从地下穿过兰德维尔运河。这两条隧道能否利用呢？

下面是侦察兵亚历山大·扎姆科夫说的一段话：

“我们的任务是尽能更远地深入隧道，侦察通向市中心的道路。我们下到地铁车站内，里面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凭借听觉判定着各自的方位。我们沿着铁轨向前走了300米左右。一个人也没有。忽然，前方出现了一线亮光。我们决定匍匐前进。我们发现，墙壁上有一个避险洞，洞里有一块蓄电池，并有一盏发光的小电灯。不远处传来德国人的谈话声，同时闻到股香烟味和肉罐头味儿。他们打开了第二盏电灯，并将电灯对准我们这个方向，然后，他们自己却在暗处隐蔽起来。我们伏在地上向前观察着。前边的隧道已被一堵中间有一座大铁门的砖头墙堵死……我们又向前移动了几十米。忽然，枪声大作。我们躲入避险洞。稍候片刻，我们向敌人发射了几枚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并扔了手榴弹，然后向前冲去。我们又向前走了200米左右，眼前又出现了障碍，还是一堵同样的墙。看来，德国人在地铁隧道内修筑的防御工事是隔墙式的：隔一段空旷地段，设一堵墙；然后又隔一段空旷地段，又设一堵隔墙。”

是的，通过地铁隧道干线投入大量兵力向蒂尔花园区进攻是不可能的。我们派出了一些加强侦察小组进入地铁隧道侦察。这些侦察小组的任务是通过隧道抓回几个俘虏。

这一夜是在不停的对射中度过的。我军各分队佯装主动进攻，以便进一步弄清敌人的火力配系。在强击队已抵达运河的那些地段上，我军佯装泅渡，向水中抛入了一些装满刨花并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麻袋。果然，敌人的所有机全部开火，而我们近卫军人的任务，只是标记下机枪发射点的位置。

清晨，我军的炮兵和迫击炮兵开始猛烈轰击已被我侦察到的敌人的发射点。运河各转弯处的房屋及其它设施都遭到彻底的破坏。强击队开始强渡运河。

配属于强击队的坦克只有通过运河桥才能进入蒂尔花园区。因此，我们竭尽全力首先攻占桥梁。争夺拱桥的战斗最为激烈。工兵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成功地排除了桥上的地雷，并拆除了悬挂在桁架下的两束大威力的炸药包。我们从进行间冲过桥去的首次尝试未获成功。

坦克目标很大，只要它刚一出现在桥前的广场上，立刻就遭到敌人疯狂的射击。隐蔽在蒂尔花园区纵深某处的“虎”式坦克也在进行射击，这些坦克的炮塔以下部位全部埋入地下。

傍晚，坦克兵们从危险区拖回来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之后，请求加强该地段的炮火，并施放烟幕。

在烟幕的掩护下，近卫第220团第1营强击队的几名自动枪手得以冲过桥去，并夺取了运河对岸拐角处的一所房屋。但是，只要坦克一出现，敌人的发射点就立刻开始射击。一辆坦克已经接近拱桥，但被一枚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毁。这枚火箭弹是一个幸存的德国鬼子从机枪巢里发射的，他隐藏在一所已被我军的机枪手们占领的楼房三楼阳台上。

看来，坦克兵部队到此为止不会试图用其威力强大的战车去冲击蒂尔花园区了。但是，战士们所固有的聪明智慧又使他们摆脱了困境。他们在坦克上挂上了很多发烟罐，当坦克接近拱桥时将发烟罐点燃。希特勒匪徒见此

情景后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起火的坦克向拱桥猛冲，并不停地射击。而敌人惊慌失措的这几秒钟，就足以使坦克冲过拱桥，并在靠拐角处一座房屋的院子里隐蔽起来。坦克兵从这里与强击队的自动枪手们协同作战，开始肃清这个街区的敌人。此后，这个街区就被我军作继续发展进攻的登陆场。

在争夺拱桥的战斗中，这个团的党小组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多基英夫大尉表现极为突出。子弹一次也没碰到他。他是第一批冲过拱桥，并两次返回带领团里的战士冲过桥去。金星勋章获得者叶夫多基莫夫在维斯瓦河战役中战功卓著，获得光荣称号，在这里他又为大家作了出了勇敢和大无畏精神的榜样。

该团另一位苏联英雄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祖边科中尉，他是迫击炮排排长。他以自己的党小组长为榜样，迅速地出现在运河对岸，带领部属爬上屋顶，并将迫击炮拖了上去，然后开始用炮弹慰劳党卫军匪徒。由于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和发射点，因此每一发炮弹都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

在这一天，近卫步兵第 74 师的几个强击队也克服了水障碍。开始强渡前，亚历山大·尼基托维奇·古达诺夫上尉的强击队，攻占了运河转弯处尽头右侧的一个街区。古达诺夫和战士们在浓烟的掩护下向岸边冲击，他们迅速地消灭了隐藏在岸边一些楼房的地下室中的敌人的自动枪手。

他命令部分机枪向运河方向射击，另一部分机枪向被围的敌守备部队射击。然后，他一直在等候其他分队赶到。这些分队在营长的率领下正赶来准备强渡运河。但这时敌从后面向他们开了火。营长牺牲了。古达诺夫接替了全营的指挥任务。几个分队被派去消灭被围的敌守备部队，其余的分队则准备强渡运河。不久，被围困的一个街区的上空升起了红旗。这时，古达诺夫指挥的几个强击群已经渡过了运河，并在对岸站稳了脚跟。这样，全师的一个翼侧就受到了掩护，而敌人所有的可沿运河向我射击的机枪发射点，均处在我军炮火和机枪的两面夹击之中。这一情况立刻减轻了渡河部队的压力。

步兵第 4 军近卫步兵第 47 师步兵营营长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诺维科夫少校经历了一场复杂而艰巨的战斗。他在蒂尔花园区域强渡过运河之后，和战士们进入了党卫军分子的防御地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 6 个小时。战斗中使用手榴弹和短刀。党卫军分子盘踞着预有准备的阵地和掩蔽所，而诺维科夫和战士们则依靠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早在伏尔加河河畔巷战中积累的经验。近卫军人取得了胜利。蒙克的党卫军分子被粉碎，部分被俘，虽然他们曾立下誓言，说在被俘之前，要把最后的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头颅。但子弹还剩下很多，他们却举起了双手投降。

近卫步兵第 28 军第 29 师的一位 22 岁的连长尼古拉·比麦诺维奇·巴拉金上尉，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他对下水道进行侦察之后，作出决定：派一些战士沿下水道前进到运河，游至对岸，然后再次通过污水管潜入敌后。这次机动完成得非常出色。巴拉金的步兵连消灭了敌人的两股守备部队，俘虏了“冲锋营”的 68 名自动枪手和机枪手。巴拉金在战斗中负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增援部队到来。

师长叶菲姆·季莫费耶维奇·马尔琴科上校是这样向我报告的：

近卫步兵第 39 师第 120 团上尉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

奇·克里姆什金指挥的强击队所属的几个强击群，也是采用同样的方

法渡过了运河。他率领战士们沿着污水管和地下通讯管路来到梅克林——布吕克火车站附近的桥下，从那里发起迅猛的冲击突入车站。不久，苏联英雄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卡尔纳乌先科大尉率领全营来到运河对岸，并开始强击邻近车站的街区。

就在这一天，勇敢的团小组长列昂尼德·拉德任科上尉又立了新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集团军。这是一个具有惊人勇敢精神的人。在以往的一些战斗中，他总是带着一把口琴参加冲击。当看到战士们在敌人的射击下被迫卧倒后，他总是把口琴放入口中吹奏起欢快的乐曲，并第一个向前冲击，战士们也就挺身站起，跟着他冲向敌人。他身材高大、机智灵活，在战斗中从不知什么是畏惧。在北顿涅茨河、扎波罗热近郊、维斯瓦河、奥得河登陆场，他都是这样做的。在这里，他在夜间游过兰德维尔运河时，也不停地吹着口琴，以便告诉战士们他所在的位置。天亮前，口琴声停止了。当同志们赶到他身边时，拉德任科指了指血淋淋的面颊。原来他的面颊被子弹打穿了。但是，团小组长没有撤出战斗，直到第二次负伤。这一次他的伤势很重，弹片击中了他的脊椎。

向柏林进军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夺取了兰德维尔运河对岸的几个小型登陆场后，集团军各部队开始由南面对蒂尔花园区发动强攻。所有部队，其中包括由北面、西面及东面进攻的各部队的锋利的突击矛头，都直指帝国办公厅所在的岛中心——153 号目标，而那里仍不断地下达着要部队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抵抗的命令。

蒂尔花园区的所在地象是一个拉得很长的椭圆体，长 8 公里，宽 2 公里。这就是法西斯帝国剩下的所有一切——一个被炮火紧紧地包围的孤岛。

蒂尔花园区的西部是一片宽阔的园林和动物饲养区。园林中心矗立着两座高大的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掩蔽部，每座掩蔽部的下三层位于地下，上三层位于地上。墙壁厚 2 米，设有射孔和带钢门的了望孔，它可靠地保护着设在内部的通信枢纽部、指挥所和柏林防空司令部。掩蔽部顶上配备有几个高炮连。

在蒂尔花园区东部的大型建筑物群中，有一座有棱角的建筑物，它有很多又沉重又高大的方柱作支撑，显得十分阴森可怕。这座建筑物占了整个的福斯大街。这就是帝国办公厅。

在它的地下隐蔽部内，有希特勒的最后一个藏身之地。据俘虏供认，元首自 3 月份起，就未在任何地方公开露过面。我们此时才得知，与希特勒一起隐藏在帝国办公厅地下室内的，还有戈培尔、鲍尔曼、取代古德里安出任总参谋长的克莱勃斯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官员，共 600 人左右。第三帝国军队的指挥网全部聚集在这里。柏林市内乃至德国全境战斗的结束，均取决于这座巢穴——希特勒的最后一座堡垒能否很快被攻陷。

帝国办公厅北边靠近勃兰登堡大门附近，就是国会大厦——一座圆顶的高大建筑物。

这座建筑物多次遭到炸弹的直接破坏，现在已成为一个便于进行防御的空荡荡的庞然大物。

歌剧院、宫殿、博物馆也都被希特勒匪徒改变成支撑点和强大的抵抗枢纽部。

在这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攻打第三帝国这个最后的防御地域的战斗，显示了苏联军人的集体英雄主义。德国首都这

个废墟中的每块石头和砖瓦以及每个广场和街道的沥青路面，都洒有苏联军人的鲜血。正是他们，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去参加殊死的战斗。他们渴望生活，但为了生活，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他们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从伏尔加河一直打到柏林。

5

4月29日和30日两天，方面军各部队克服和敌人不断加强的抵抗、特别是党卫军冲锋营的抵抗，逐渐深入到柏林市内政府办公的各个街区。

近卫第8集团军和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南面，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突击第3集团军和别尔扎林将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由东部和北部，波格丹诺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由西部，科涅夫元帅的部队由西南部，开始了全面的进攻。

4月30日傍晚，我从观察所回到约干尼斯塔尔地域的集团军司令部后，接到方面军司令员I·H·朱可夫元帅打来的电话。他问道：

“五一节前全部占领柏林，有希望吗？”

我回答说：“根据敌人的情况来看，尽管抵抗有所减弱，但我不认为敌人会很快投降。”

我们就此结束了谈话。朱可夫元帅没有作任何指示，因为他知道，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部队的士气很好，非常活跃，因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集团军政治部的同志们请我去吃晚饭，同时谈谈当前的工作。在政治部作客的有：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作曲家基洪·赫连尼科夫、马特维·布兰特。当同志们摆桌子准备开饭的时候，基洪·赫连尼科夫坐到钢琴前，他一边弹琴，一边唱起了电影《养猪姑娘与牧人》中的一支插曲。马特维·布兰特唱起了电影《在靠近前线的树林里》中的插。大家正准备入座，这时，政治部的值班员走到我跟前说，有我的紧急电话。

我走进值班室，拿起听筒。电话是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B·A·格拉祖诺夫中将打来的。他情绪激动，用略高的声调向我报告：

“有一个手持白旗的德军中校来到近卫步兵第35师第102团前沿，他带来一封给俄国军队统帅部的信。这个德国人要求立即将他送到上级司令部，以便转交这个重要文件。他是在吊桥地段越过运河的。这个中校名叫蔡费尔德。现在他在师司令部。他带有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全权证书。他请求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规定越过前线的地点和时间。”

“清楚了，”我回答道，“请告诉那位中校，我们准备接待军使。让他通过他来时走过的原路把军使领过来。”“我马上将您的指示转告师部。”格拉祖诺夫说。

“命令该地段停止射击，准备接待军使，将他送到我的前进指挥所，我马上就到那里去。”我说。

然后，我立即给集团军参谋长B·A·别利亚夫斯基打电话，命令他给我保证可靠的通信联络。我打电话将全部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汇报后，就与波扎尔斯基和魏因鲁布将军一同前往指挥所。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谈判代表将带些什么东西来，但我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

我刚刚迈进工作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话筒内传来作家弗谢

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熟悉的声音，他早在奥得河战役时就一直与近卫第8集团军一起。当他得知我正在指挥所等待军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后，便苦苦央求我，甚至把我称作亲生父亲，只要求我允许他来指挥所参加谈判。我决定，这样的事件不能没有我们的作家参加。因为他们一直与部队在一起，并在竭尽全力帮助我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战士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让作家、还让谁知道我们军人生活中的所有这一切重大的事件呢！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到指挥所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别利亚夫斯基将军，命令他与集团军情报处的几名参谋和翻译人员立即到我这里来。

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开始了。房间内只有我和副官。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虽然已是深夜，但我一点困意也没有。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伏尔加河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它是那样的遥远，但又是那样的亲近；水面上漂浮着燃烧着的石油，猛烈的大火焚烧着水面上的一切——驳船的小船；眼前又出现了戈培尔宣传机器的传单，希特勒匪徒在传单中通告我军战士，说“那些在伏尔加河西岸不投降的人，将被认为是逃兵，所有逃往伏尔加河东岸的人，也将被列入可恶的逃兵名单……。”还有扎波罗热、夜间的强击、尼科波尔、敖德萨、卢布林、罗兹相继出现在眼前。现在终于来到柏林。苏联军人在伏尔加河保卫了神圣的疆土，现在他们已站在施普雷河河畔。他们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等待着被击溃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那些不久前还深信苏维埃国家即将灭亡的人派来的谈判代表、第三帝国元凶们的军使。这些头目们是不是在想：我们的记忆力不佳，我人已经忘记了几百万被杀害的人，忘记了几千万寡妇和孤儿，忘记了绞架和毒气车，忘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其它死亡集中营。

副官也没有睡觉。他一言不发，我也沉默不语。但我们彼此都是理解对方的心情。我们等待着。兰德维尔运河河畔的近卫军战士们也在等待着。他们没有休息，他们时刻都准备着，如果敌人不同意放下武器，他们就立刻重新开始强攻……

门被推开了，发出一阵声响。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出现在门口。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因为作家们从不单独行动。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紧跟着走了进来。这位诗人还在伏尔加河河畔就与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熟悉了，他是还健在的伏尔加河大会战和保卢斯集团军投降的目击者。作曲家马特维·布兰特也来了。早在奥得河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莫佳”——这个称呼是我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里学来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谈话不同往日，很不投机。每个人都在思索，都在想对即将发生的事件作出估价。大家都拼命地吸着烟，时而走到那黑色圆柱的大厅里，用脚步来数出那消逝得过慢的分分秒秒。

已是凌晨3点……3点半……天已经开始破晓。“五一节”的清晨来临了……柏林到处都是一片阴森森的景象，而在祖国，在祖国的东部地区，已开始了五一游行。中欧地区的时间比我国的晚，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伯利亚、乌拉尔、莫斯科，人们已经醒来。他们很快就要得知，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国会大厦的上空，这旗帜是突击第3集团军勇敢的侦察员M·A·叶戈罗夫军士和M·B·坎塔利亚军士插上去的……

3点56分，门终于打开了。一位脖子上挂关铁十字勋章的德国将军走进房间。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此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剃得精光，脸上有几道伤疤。他右手按照法西斯的习惯作着敬礼的手势，左手将一份证件——军人证递给我。此人是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随同他一起走进来的还有坦克第 56 军参谋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杜弗文格和一名翻译。

克莱勃斯没有等我们向他提问题，开口说道：

“我将告诉您一件非常机密的事，”他声明：“您是我通知的第一个外国人。4 月 30 日希特勒已经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愿离开了我们。”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稍停顿了一下，仔细审视着这条新闻对我们发生的作用。看来，他预料我们大家会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会对这一惊人的消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我却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此事！”

然后，我沉默了片刻，要求克莱勃斯讲出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时间。

克莱勃斯显然感到难堪。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他这令人震惊的消息竟放了空炮。

“事情发生在今天 15 点，”他回答道。见我在看手表，马上又纠正说：“是昨天，4 月 30 日 15 点左右。”

然后，克莱勃斯宣读了戈培尔给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信。信中说：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莱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

我们通知苏联人民的领袖，今天 15 点 50 分，元首已自愿地离开人世。根据其法定权力，元首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将所有权力移交给邓尼茨、我和鲍尔曼。鲍尔曼授予我全权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取得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在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戈培尔。”

克莱勃斯还交给我两个文件：一个是与俄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一张党务办公室主任的公文用纸，盖有印章，是鲍尔曼于 1945 年 4 月 30 日签署的）；另一个是希特勒的遗嘱，附有新的帝国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名单（这个文件由希特勒和见证人签署，所注日期是：1949 年 4 月 29 日 4 时整）。

克莱勃斯仿佛是想利用这些文件来搪塞他意料到要回答的问题。他已感到此行作为一个不仅仅代表一方与另一方谈判，而且是要乞求对方宽恕的外交人员的羞窘和困难。当然，他企图利用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反希特勒盟国的不信任感，谨慎地试探我们，是否能够作些让步。同时，这个纳粹死党分子不会轻易地承认失败。要知道他曾亲自参加了东征。

为什么我对克莱勃斯说，希特勒自杀对我并不是新闻呢？

应当承认，当时我并不知道希特勒已经死去，也没有料到能从克莱勃斯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在进行谈判准备工作时，我已经作好不动声色地听完任何意外消息的准备，既不露出丝毫惊奇的神色，也不仓促作出结论。我知道，有经验的外交家（克莱勃斯正是这样的人），在谈话时总是不从他认为是主要的问题开始。开始时，他一定会试探双方的意图，然后极力设法扭转话题，让应该解决主要问题的一方首先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我和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来说，希特勒的死确实是一条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闻。但对克莱勃斯来说，这条新闻仅仅是用作掩盖其基本问题、最主要问题的外交伪装。因此，我立即制止了他扭转话题的企图，从而迫使他转入正题，说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这些文件所谈及的是柏林还是整个德国？”我问道。

“戈培尔授予我全权代表整个德国军队讲话，”他紧跟着回答道。

“涉及投降问题吗？”

“还有结束战争的其它方式，”克莱勃斯回答道：“为此，必须为组成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提供可能，这个新政府将与苏联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既然你们的元首已经自杀，从而承认了以他为首的政体的破产，那你们的政府还算什么政府呢！他死后，大概会在副职中留下某个有权决定是停止还是继续战争的副手，现在在谁代替希特勒？”

“现在代替希特勒的是戈培尔。他被指定为总理。但是，希特勒在临死前组建了以海军元帅邓尼茨总统为首的新政府。”

当我同克莱勃斯谈话的时候，我的副官、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和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努力记录着每一句话。当然，在这次谈判中，“秘书”是够多的了。

很幸运，对于那个夜晚的细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将尽力使现在所回忆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待克莱勃斯对我提出的头几个问题作了回答之后，我决定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我拿起话筒，要通了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

“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到我这儿来了，他通知说希特勒已经自杀。作为总理的戈培尔和纳粹党魁鲍尔曼授权克莱勃斯来同我们进行停战谈判。克莱勃斯请求在谈判期间停止军事行动，为组建以邓尼茨为元首的新政府提供方便。这个新政府将解决战争的尔后发展问题。” Z

朱可夫说，他要马上向莫斯科汇报，我应等候在电话机旁，可能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释。

过了一分钟，朱可夫问道：

“希特勒是什么时间自杀的？”

我又有意地第二次向克莱勃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他回答这个问题时，也不知是不大自然，还是故意说错。

我这次问他时看着表，当时是5月1日4时27分。

克莱勃斯急急忙忙地纠正说：

“昨天，4月30日15时50分。”

我把这情况报告了朱可夫，他报告了莫斯科。

又过了一分钟，电话里传来了朱可夫的声音：

“你问一问克莱勃斯，他们是愿意放下武器投降，还是故意玩弄和平谈判的花招？”

我直接了当地问克莱勃斯：

“谈判是否涉及投降问题？你的使命是否负责实现这一点？”

“不，还有另外的可能。”

“那是什么呢？”

“请你们允许帮助我们组建新政府。这个政府是希特勒在遗嘱中确定的，这个新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会对你们有好处。”

我把这个答复向朱可夫作了报告，他命令我继续守在电话机旁。

当时我心想：看，这个克莱勃斯真狡猾，他第二次的回答同第一次一样，这是外交官采用不同方式反复地重复同一想法来达到目的的惯用手法。

但是，现在他干得太过份了。在希特勒遗嘱的第5页上，我照着读：

“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作为民族领袖，我任命新内阁的成员……”

“什么样的新政府？”朱可夫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读着希特勒的遗嘱，正好读到这个新政府的成员部分，名单如下：

1. 总统——邓尼茨
2. 总理——戈培尔
3. 党务部长——鲍尔曼
4. 外交部长——赛斯——英夸特
5. 内务部长——格斯勒省长
6. 武装力量总司令——邓尼茨
7. 陆军司令——舒埃纳尔
7. 海军司令——邓尼茨
8. 空军司令——格莱姆
9. 党卫军全国总队长兼德国警察局长——汉克省长
10. 经济部长——冯克
11. 农业部长——巴克
12. 司法部长——席腊赫
13. 教育部长——席尔博士
14. 宣传部长——瑙曼博士
15. 财政部长——施维林·克罗西克
16. 劳动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17. 军备部长——绍尔
18. 德国劳工阵领导人和内阁成员及部长——莱伊

“克莱勃斯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朱可夫问道。

我把这个问题转告克莱勃斯。他只是耸了耸肩。于是，我向他解释说，我们只能就德国彻底向反希特勒联盟各国投降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个联盟有苏联、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

“为了能够讨论你们的要求，我请求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帮助在柏林这里组织新政府。”他强调说：“就是说在柏林，而不是在别处。”

“我们很清楚，你们的新政府想要干些什么。”我说道：“您的朋友希姆莱和戈林到我们的盟军那里去进行试探，其目的我们也是清楚的，难道这一点您不知道吗？”克莱勃斯警觉起来，看样子，他对我提的这个问题感到很突然。他显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开始在军装口袋里摸来摸去，取出一支铅笔，但他并不需要铅笔。

“我是合法政府的全权代表，这个政府是遵照希特勒的遗嘱建立的，”他终于回答说：“在南方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政府，但它是非法的。目前，只有在柏林才能有政府，这个政府是合法。所以我们请求停战，以便让全体政府成员集合起来，讨论局势和缔结一个有益于我们、也有益于你们的和约。”我郑重声明：“关于停战及和约问题只能在你们彻底投降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决定，你利用任何语言和许诺都不可能破坏反希特勒联盟的联合阵线。”

克莱勃斯的脸上一阵战栗，腮上的刀疤变成了粉红色。可以看出他用了最大的毅力从慌张中恢复了常态，但他在这里说漏了嘴：“我们认为苏联

将会考虑这个合法的德国新政府，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和合适的。如果你们占领了政府所在地并把我们全部消灭了，那时候德国人将再没有可能同你们合作和……”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消灭德国人，而是要把他们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而德国人，正直的德国人已经在与我们合用了。他们是为了避免再流血。”

克莱勃斯接着说：

“在全面投降之前，我们请求承认德国新政府，同它取得联系，并提供同你们的政府交往机会，这样做对你们只有好处。”

我重复了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即德国人必须彻底投降。之后，我走进隔壁房间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

我在向朱可夫元帅报告时，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看来，克莱勃斯此行不是来谈判投降的，而是想摸清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即我们会不会与新政府进行单独谈判？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同我们继续作战了。戈培尔和鲍尔曼决定拿出最后一招——开始同我国政府和谈。他们正在寻找各种摆脱困境的办法和寻找我们与盟军之间的裂痕，以制造我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克莱勃斯显然是在施延回答问题的时间，他想争取点时间，但这对他们并不利，因为我们的军队还在继续进攻，我们只是在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经过的地段上停止了战斗。”

朱可夫元帅又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对我说，他马上把全部情况报告莫斯科，并命令我继续谈判，争取让克莱勃斯同意彻底投降。

集团军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将军把 1945 年 4 月 30 日起草的第 2948 号命令草案递给我让我签字。我看了一遍，觉得一切都很正确。我默默地签署了这个文件。实际上，这个文件是给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最后一份战斗命令：“鉴于柏林被围守敌有可能投降或大量被俘，我命令：

一、集团军后勤部队作好接收 4—5 万名俘虏的准备，为此必须：

（1）1945 年 5 月 1 日前，在集团军进攻地带上的城市外围，但离城郊不得远于 5 至 8 公里，建立足够大的集团军战俘收容所（可设在达姆地区）；

（2）为了对战俘提供伙食，须调运必要的粮食储备。

二、各军军长：

（1）为了可靠地看管俘虏和将他们由集团军收容所押送到方面军战俘营，每个军均应抽出 1 个步兵营。

（2）为了适应柏林守敌投降时的需要，预先应确定解除敌部队武装的一些地点以及划定将战俘从城市押向集团军战俘收容所的行进路线。那里也将接收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俘获的战俘。

关于接收战俘的准备工作情况，应于 1945 年 5 月 1 日 18 时前报来。”

我又回到了谈判的房间，这时是 4 点 40 分。由于疲劳和失眠，脑子里嗡嗡地直响。做不习惯的工作，很容易使人感到疲倦。

我坐在克莱勃斯的对面。我感到，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里，他斟酌了情势并准备好了一些新的论据，替自己的建议辩护，确切地讲，是为了戈培尔的建议辩护。他首先开始讲话。

还是坚持要求暂时停战。

“我不能谈别的问题，”他说：“我只是一个全权代表，我不能替自己的政府负责。同德国新政府进行和谈对你们是有利的。我们知道，德国政府 Pass 啦！（译注：此处为英文，意思是完蛋。）（他自己也笑了笑）而你们是强大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你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出“皇后”了，克莱勃斯亮出了王牌。不能再让他死死地纠缠了。他显然是想把我拉入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去。

“您应该懂得，将军先生，”我说道：“我们知道您打算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您打算警告我们，你们将继续作战，准确地说，进行毫无意的顽抗。但这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我要直接了当地问您，你们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克莱勃斯默默地看了我几秒钟，不知说些什么好，然后说道：

“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抑制不住要发笑。我说：

“将军，你们还有什么？你们拿什么兵力来战斗？”稍稍停顿了一下，我补充道：“我们正等待着你们彻底投降。”

“不！”克莱勃斯叫了起来，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当彻底投降的时候，我们从法律上讲，将不再作为政府存在了。”

谈判越来越使人感到厌倦。很清楚，克莱勃斯的任务就是要说服我们承认其所谓的新政府。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同意，他不可能改变他所提的建议。他只会坚持这一点。在他的谈话中和一切行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失望，但他还是不走，等待着我做些什么。很可能是等着我声明，我是将他作为俘虏在同他谈话。

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信。信中，大使感谢苏军对使官成员给予的关照。

时针已指向早上 5 点。我忍耐不住了，于是对克莱勃斯说：

“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千上万地作了俘虏。而此时此刻您还在坚持停战和进行和平谈判。”

克莱勃斯的身子抽搐了一下。

他很快问：“在哪里？”

“到处都有！我说。

克莱勃斯惊奇地说：“没有命令他们就投降吗？”

“我们部队在进攻，因此你们的人在投降。”

“这可能是个别情况吧？”这位德国将军抓住这根稻草不放。

恰好这个时候，传来“卡秋莎”火箭炮齐射的轰鸣声。克莱勃斯的身子甚至卷缩成了一团。

我拿起报纸，大声地读首路透社的一篇关于希姆莱玩弄的一次外交手腕遭到失败的报导。他在瑞典王室成员贝尔纳多特的帮助下，急于同英国权威人士和不列颠政府进行谈判。

希姆莱通过贝尔纳多特转告，元首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个已经灭亡的人。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读着希姆莱的讲话，“我的双手不受束缚了。我希望德国的大部分领土免遭俄国的入侵，我准备在西线投降，以便西方大国的部队能尽快地向东线推进。与此相反，我没有在东线投降的打算。我过去是、并且将永远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对克莱勃斯说道：“听到了吧，希姆莱就是这样对英国人讲的。”并继续往下读：“由于苏

联政府的干涉，美国人和英国人拒绝和希姆莱进行单独谈判。关于这点已通知苏联政府。”

我看着这位军使。克莱勃斯显然很苦恼，他低着头喃喃地说：

“没有授权希姆莱这样做。我们曾经很担心这一点。希姆莱并不知道元首已经自杀。”

“但是，希姆莱曾通过无线电台指定了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地点，你们不是知道这件事吗？”

克莱勃斯说：“这是他个人出于其它考虑所采取的局部措施。”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补充说：“如果一旦彻底投降，我们就无法选举自己的政府了。”

此时，一个德国翻译人员插话说：“柏林决定着德国的命运。”

克莱勃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说：

“我讲俄语不比你讲的差，”然后，对着我用俄语很快地说：“我担心会建立别的政府，这个政府会反对希特勒的决定。我只是听了斯德哥尔摩的广播，但我觉得，希姆莱同你们盟军谈判一事做得过火了。”

克莱勃斯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第三帝国的领导集团早已知道希姆莱的谈判情况，并深信我们的盟国会被希姆莱的建议所诱惑，而苏联政府将会采纳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建议。据我们所知，戈林曾带着同样的使命去找过美国人，具体说是去见艾森豪威尔。但他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稍稍停顿一下后，克莱勃斯又重提建立德国新政府的必要性，说新政府的任务是同强大的战胜国、即同苏联缔结和平条约。

我又一次提醒克莱勃斯，美国 and 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与我国政府一致的，我认为希姆莱的行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外交讹诈。至于新政府，我们认为，对于德国人民、对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来说，最有威信的德国政府，将是同意彻底投降的政府。

“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我说：“不同意全面投降，是因为它要履行希特勒的遗嘱，决意继续进行战争。你们的‘新’政府、或者是‘新内阁’，正如希特勒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所讲的那样，要在将来完成他的意愿。而他的意愿是遗嘱中的这段话：‘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我把这几行字指给克莱勃斯看，我说：“难道从希特勒死前的这些话中，还不足以看出，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拒绝全面投降，而想继续进行战争吗？”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但不得不坐在这儿等待莫斯科的决定。于是我们把话题转入私人交谈。

我问：“古德里安将军现在在哪里？1939 年我在布列斯特见过他，那个时候他指挥着一个坦克师。”

“他在 3 月 15 日之前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后来他病了，现在在休养。那个时候我是他的副手。”

“他的病是外交手法、政治手段或是军事机巧吧！”

“对自己过去的上司，我不能讲坏话，但此类事情是有的。”

“您一直都在总参谋部工作吗？”

“我曾任军训部部长。我也到过莫斯科，1941 年 5 月以前，我一直在那任代理武官。

后来我被任命为东线的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

“这么说，您是在莫斯科学会俄语的，希特勒是在您的帮助下获取了有

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是吗？”“斯大林格勒交战时您在什么地方？您对这次交战是怎样看的？”

“那时我在中部战线，在勒热夫市附近。那个斯大林格勒，太可怕了！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您在斯大林格勒任军长，对吗？”

“不，我当时是集团军司令。”

“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和曼施泰因将军给希特勒的报告。”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又问：

“希特勒为什么要自杀呢？”

“战争的失败，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德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元首明白，人民遭受他多么巨大的牺牲，为了不活着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决定一死了之。”

“他明白得太晚了，”我指出：“如果5—6年前他就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我拿起希特勒的遗嘱高声地读道：

“虽然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去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给我们俩人带来的损失。”

我转身对克莱勃斯说道：

“爱娃·勃劳恩好象不是阿利安人血统，希特勒这样做，不是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吗？”

克莱勃斯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回答。

我不得不补充说道：

“真可惜！可能的话，能从这个房间给我和戈培尔架条电话线就好了。”我换了一个话题。

“那我会很高兴的。”克莱勃斯精神为之一振地说道：“那时候，您就可以和戈培尔博士讲话了。我准备派我的副官和您的电话兵一起去，这样将会有所帮助的。”

朱可夫元帅来电话了。我向他报告，克莱勃斯从3月15日起任总参谋长了。我通过电话向他读了关于戈培尔任命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的文件。

我们谈妥，让陪同克莱勃斯前来的上校和德国翻译回去，以便架设一条直通帝国办公厅的电话线。我们的两个通信人员（1名是军官，1名列兵），他们是集团军参谋长挑选出来的，同他们一起去。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普罗宁少将、我的第一副司令员杜哈诺夫中将、作战处长托尔科纽克上校、情报处长格拉德基上校、副处长玛杜索夫中校，和我们的翻译克利别尔大尉一起，来到我的指挥所。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这是一间用作食堂的房间。给我们端来了茶和夹肉面包。大家都感到饿了。克莱勃斯同样没有谢绝，他端起杯子，拿起了面包。我发现，他的双手在发抖。

我们坐在这儿，个个都感到疲惫不堪。战争即将结束，但这最后的时刻却使人烦躁不安。我们等待着莫斯科的命令。

但前线的生活还和往常一样。集团军司令部通知各部队、首先是炮兵

部队做好继续强攻的准备。侦察兵监视着敌人及敌人的预备队和供给情况。各分队补充了弹药和燃料。工兵修建并加固兰德维尔运河上的各个渡口。我时而离开克莱勃斯来到隔壁房间，关照司令部的工作，下达命令和作批示。

各军师指挥员已得到明确的通知，虽然谈判进展正常，但各部队应做好准备，接到命令就马上开始强攻。情况是这样的：戈培尔、鲍尔曼和克莱勃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想拖延时间，他们期待着俄国人或许会跟各盟国发生争吵了……而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作好准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一举攻下蒂尔花园区。

我和克莱勃斯的谈判又开始了。我想弄清第三帝国领导人的内幕以及他们的企图和希望。况且，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是不能够停止同克莱勃斯的谈判的。当然，克莱勃斯知道全部情况，但他什么细节都不会轻易讲。应当善于边谈话边将他的回答进行比较，从而探询出要知道的一切。

“赫尔曼·戈林现在在哪儿？”我问道。

克莱勃斯全身一抖，好象被从梦中惊醒似的：

“戈林？他是叛徒。元首现在无法再容忍他。戈林曾建议元首把国家领导权交给他。元首已把他开除出党。”他又马上改口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他把这一点写进了遗嘱。”

他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他一会儿说：“元首现在对戈林是无法忍受，”用的是现在时，一会儿又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了”，用的却是过去时。

我打算弄清这一情况：

“按您的看法，希姆莱是什么人？”

“希姆莱是叛徒！他反对元首，很早就想同西方大国单独缔结和约，并想分裂我们。元首得知了他的企图，而……”他停顿了几秒钟，又说：“这也是元首自杀的原因之一。元首很珍惜自己的战友们对他的忠诚。死前他寻找过出路……缔结和约，首先是与苏联。”

“这么说，希姆莱是叛徒了？”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地回答：“根据希特勒的遗嘱，希姆莱被清除出党。他现在不在柏林，他在梅克伦堡。”

“你们早就知道希姆莱向美、英彻底投降的建议吗？”（这里我当然是糊弄克莱勃斯，因为直到最后一天，我对希姆莱的建议几乎还是一无所知。）克莱勃斯想了一下回答说：

“正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怀疑他。但最后是从路透社的报导中确信这一点的。希姆莱没有通知我们。元首把他安排在柏林之外，就是为了让向他向柏林提供援助，将德国全部武装力量派到柏林。但他欺骗了元首，没有这样做。希姆莱是个叛徒，企图在没有元首同意的情况下去签订和约，他背叛了德国的利益。我始终都与元首在一起，我曾是他的战争问题的直接顾问。而在柏林之外，在梅克伦堡设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元首从柏林直接给他们下达命令。我当时是东线的负责人。”这时克莱勃斯说漏了嘴，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全部推测和假设。他说到希特勒曾下命令把德国武装力量的所有部队从那里、也就是从西线派往柏林、派往东线与我们作战，从而给西方大国的军队打开通向柏林的道路。这原来都是真实的事。

我抓住这个线索，紧接着追问克莱勃斯：

“谁是你们现在的总司令？”

“根据希特勒的遗嘱，现在是邓尼茨。舒埃纳尔是新任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是冯·格莱姆。戈林病了，古德里安也病了。”

“里宾特洛甫现在在哪里？”

“在梅克伦堡。赛斯·英夸特代替了他。”

“这么说，政府完全改组了。不过这次改组唯独没有涉及到您。您是希特勒当权时的身边人物，现在留任陆军总参谋长，对吧？”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回答。

“谁是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最后谈判的全权代表呢？”

“是戈培尔和鲍尔曼。他们现在都在柏林，唯独他们俩人是德国的唯一代表。”

“那么，其他政府成员将干些什么呢？”

“他们在执行元首的命令。”

“军队承认新政府吗？”

“如果有可能把元首的遗嘱通知各部队的话，各部队是会完成元首的意愿的。这事最好在另一个政府宣布成立之前完成。”

“你们害怕这个所谓的另一个政府，对吧？”

“希姆莱出卖了我们，他很可能成立新政府。希姆莱还不知道元首的死讯和他的遗嘱。”

“您是如何考虑同其它地区进行联系呢？要知道同这些地区的联系已被切断。”

“利用和你们临时停火的方法，我们会将一切都公布于世。”“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克莱勃斯更明确地说：

“在你们的协助下，我们将用飞机或其它方法同各地区取得联系。”“这就是说，你们建立新政府，其目的是在德国国土上行使权力，集结兵力，并继续进行战争，是吗？”

“不，我们的目的是开始谈判并结束战争。”

“但是，”我又一次抓住他不放，说：“在希特勒的遗嘱里讲得很清楚，他是要由‘那些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一个政府。你们同意先结束战争，而后再进行谈判，那不是更好吗？”

克莱勃斯支吾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我的政府，而不是我……”

街上天已大亮。柏林 5 月 1 日这一天的开始，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谈判持续了一整夜，但毫无收获。莫斯科指示等待答复，并时而来电询问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的进程。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将克莱勃斯带来的文件立即送去。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雷若夫中将打来电话找我。我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将克莱勃斯和波扎尔斯基将军、魏因鲁布将军以及作家们留在原来的房间里。

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4 点 30 分，德国的无线电台（似乎是柏林城防司令部的）请求我们派出一名军官到动物园的东北角去会见德军的一些军使。雷若夫中将和近卫步兵第 39 师师长马尔琴科上校指派了别尔谢涅夫少校为我军军使，他是该师司令部的一名参谋。

后来，别尔谢涅夫向我讲述了这次会面的经过和结果（ he 现在是退役

中校)。他说：

“我要向他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保证所有放下武器和停止抵抗的人的生命安全；我要向德国人宣布，如果拒绝投降，他们将在 24 小时内被全部消灭。

我清楚地知道，顺利地完成任务，将会保存我们许多官兵的生命。如果能使敌人停止无谓的抵抗，世界上又会减少很多残废人、寡妇和孤儿。我十分珍惜对我的信任，我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决、彻底地完成这项任务。

1945 年 5 月 1 日 5 时整，我带着一面白旗来到指定地点

——动物园东北角。我的汽车、传令兵和司机留在邻近一条街道的拐角后面，隐蔽起来。

我走指定地点，并在那里等待德军军使到来，在这大约 20 分钟里，德国人没有向我开枪。看来这个地段的德军已经接到通知，知道了我军指挥部的代表要来的事。

在等待的 20 分钟里，我想了许多问题，但只有一个想法特别使我感到不安，就是敌人方面的通知是不是假的呢？会不会是一种挑衅行为呢？但是，我十分清楚柏林的局势，敌人的军队已经处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了，于是我抛开了这个念头。但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头脑中出现。终于，我看到，在离我 200 米左右的一个拐角处，走出两个德国人，他们手拿着一面白旗向我走来。

我迎着他们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其中一个军使倒下了，接着传来了枪声，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采取预防措施，我的左腿和膝关节被击中，随即倒了下去，头部重重地摔在便道上。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已在自己汽车的旁边了。原来，传令兵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火力范围里拖了出来。他和司机一起把我抬进汽车。我的腿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搭拉着，但我没有感到特别的疼痛，只是头嗡嗡直响。我说：‘开车，去师长那儿。’就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时，医生已给我打完了针。马尔琴科上校和雷若夫中将站在我身旁弯着身子看着我。我看了看自己的双腿，我已认不出左腿的模样了。因为靴子和裤子已被脱掉，腿上绑着渗着血迹的绷带。我的双眼直冒金星，人们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不清。我按次序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当雷若夫中将向我报告了关于别尔谢涅夫事件的情况之后，事情完全清楚了。原来，柏林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官兵准备投降，而另一部分狂妄的纳粹分子，不但自己不投降，而且还用武力来阻止别人投降。他们之中谁能占上风，这要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纳粹分子利用我们同克莱勃斯进行谈判而出现的暂时平静，来扩大自己在被围守备部队中的影响。我们应该尽快地发动更猛烈的突击，敌人的反抗就会被粉碎。可能还可以借助那些准备投降的德军部队的力量。

方面军司令部来了电话。朱可夫元帅通知，他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已动身到我这里来了。司令员要求我弄清有关希姆莱的情况和里宾特洛甫现在在什么地方，查明现在谁任总参谋长、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等等很多问题。

我把从克莱勃斯口中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其它一些问题，还需要从他口中去找到答案。而克莱勃斯不是特别愿意谈及这些话题，他对每个问

题的回答总是很简短，并且支吾搪塞。他的处境也不轻松，他知道，要说服我们并迫使我们相信戈培尔和鲍尔曼是不可能的。

但是派他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因而他而努力达到这一目的。而我们呢，我们在谈判过程中能够自己决定的问题仅有一个，即要德军接受投降。我很想把克莱勃斯打发回戈培尔那里去，然后我们诉诸武力迫使德军缴械投降。但莫斯科指示我们等待答复。

我回到谈判的房间，向克莱勃斯提问：

“希特勒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在柏林。遵照遗嘱焚烧了。这件事是今天办的。”

“谁是你们统帅部的参谋长？”

“是约德尔。邓尼茨是现任最高统帅。他们俩人都在梅克伦堡。只有戈培尔和鲍尔曼在柏林。”

“为什么您原先一直没有讲邓尼茨在梅克伦堡呢？”

克莱勃斯不说话了。

我拿起话筒，要通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

“最高统帅是海军元帅邓尼茨，现在梅克伦堡，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戈培尔认为是叛判的希姆莱。赫尔曼·戈林好象是病了，现在南方。在柏林的只有戈培尔、鲍尔曼、克莱勃斯和希特勒的尸体。”

朱可夫元帅说，在柏林，德军向我们派来了军使，而在西线和南线，他们又向盟国派了军使，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妨碍着我国政府作出决定。但我们很快会得到答复，大概会提出包括全面投降的要求。

克莱勃斯听到了我和朱可夫的谈话，我不客气地当着他的面讲了自己的意见。我放下听筒，对克莱勃斯说：

“这就是说，主要的军事活动家都在梅克伦堡。而在柏林的戈培尔和鲍尔曼，是留下来完成元首意愿的，请问是什么意愿？”

“他们想停止战争，但是只有在你们承认了根据元首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政府之后。”

“是指那个既不要和平又不要战争的政府吗？”

克莱勃斯沉思一下说道：“我同意在那些没有停火的地段停火。”

“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们所谓的政府不准备投降吗？你们还想继续流血吗？”

“我想尽一切努力，尽快地使你们承认柏林只有一个合法政府，不再产生另一个非法政府。”

“如果你们不投降，我们的军队将发起强攻，到那时您再去分辨哪个是合法政府，哪个是非法政府吧！”

“所以我们请求停战。”

“而我们要求你们投降！”

我对克莱勃斯说道：

“您随身携带的除了已交出的文件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文件？”

“还有附件，就是政府成员组成名单，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这张纸上有希特勒遗嘱中指定的内阁成员。

“您来的目的只是同苏联谈判吗？”

“只同你们谈判。”

“您现在同我们谈判，而希姆莱和别的一些人又正同盟国谈判，为什么

你们不愿同时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谈判，而宁愿分别行动呢？”

沉默。克莱勃斯低下了头。然后抬起头说道：

“当授予我的权力范围扩大时，我们也将同其它政府、同你们的盟国进行谈判。”

“这取决于你们政府的决定吗？”

“是的，在政府完全组建起来的时候。这是政府的主要目的。”

“你们要在哪里组建你们的政府？”

“目前尚未决定，但最好在柏林。”

“但是，在柏林守备部队的残部还没有无条件投降之前，你们的政府是不可能在这里成立的。”

“而我深信，当柏林守军投降之后，我们的政府永远不会成立了。元首的遗愿将不能实现。我认，全面投降问题不可能在新政府被完全承认之前解决。”“这么说，政府仍在活动，拒不投降？”

“我到此为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和转达德国的声明。而全国投降问题可以在停战后和新政府被承认之后几个小时内解决。”

“这么说你们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了？你们知道彻底投降的条件吗？”

“是的，我知道，”克莱勃斯回答：“但谁来进行这个谈判呢？”

“你们有帝国总理，鲍尔曼和他在一起。既然他们委派您同我们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没有将所有情况通知邓尼茨之前，他们不可能做出彻底投降的决定。唯一的一部无线电台在希姆莱手里，我们的无线电台被炸毁了。”

“我们向你们提供无线电联络。你们通过电台公布希特勒的遗嘱。这样就可以停止继续流血。”

克莱勃斯皱起眉头说：

“这不合适。对于邓尼茨来讲，这将是一个突然的消息。他还不知道遗嘱的事。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苏联得到好处，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同意与美国和英国单独缔结和约的非法政府。我们认为同俄国谈判比较好。”

现在我才真正看透了他，我们既不能相信戈培尔，也不能相信他的使者。我只有坦率地告诉他：作为一个军人，我感兴趣的是首先是尽快地收拾毫无希望地防守着柏林的敌军。

克莱勃斯听完我的话之后，又重弹老调：

“如果柏林守军被消灭，德国的合法政府也就不复存在了……”

“荒谬！”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向您说明了我的使命，没别的了……”

“我已经通知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条件。”克莱勃斯将军和他的副官，表面上竭力装出沉着、不动声色的样子，但为此他们得做出多大的努力！

我再次强调说：

“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至于政府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你们没有军队，但你们却想拼凑一些兵力，这办不到！”

克莱勃斯连忙说：

“我提议暂时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会在适当时候下令停火。”

电话铃又响了。是方面军司令员打来的，他想了解谈判进展情况。我汇报说：德国人没有通信工具。他们不愿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遗嘱，担心希

特勒会借机作乱。看来，对邓尼茨也不放心。他们希望在暂时停火之后，由我们配合公布此事。希姆莱溜了。已被开除出党。

我搁下话筒。又对克莱勃斯说：

“希望别人承认新政府的人，其最好的出路就是投降。”

“彻底投降吗？”克莱勃斯问道。

“彻底。只有投降之后，我们才会同这个政府的成员对话。”

克莱勃斯否定地摇摇头：

“我无权宣布投降。如此一来，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消灭了……”他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又用俄语说道。

“但炮弹可不管谁是士兵、谁是政府成员。”我说道。

克莱勃斯又摇摇头，并用俄语说道：

“为了签定和约着想，我担心……”

“我们坚持我们和盟国的共同要求：无条件投降。”

此时，克莱勃斯已带有几分生气地抗辩：

“彻底有效的投降，只有合法政府才能决定。如果戈培尔同你们未能达成协议，那么，会出现什么后果？你们应当承认合法政府，而不是希姆莱这个叛徒的政府。战争大局已定。

其后果应同元首指定的政府共同处理……”

“向军队公布你们元首的遗嘱，”我提示说。

克莱勃斯激动了，他用俄语几乎喊了起来：

“变节者和叛徒希姆莱会消灭新政府的成员！”

好大的恐惧！我觉得好笑。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到屋外散散步该有多好啊！外面春光明媚，可我们却陷入了这令人疲惫不堪的谈判当中。这几个德国人正在低声地商量着。

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乘车来了。我向他汇报了谈判情况。索科洛夫斯基听完我的汇报后，亲自询问克莱勃斯。下面是我追忆起来的他俩的对话：

索科洛夫斯基（对克莱勃斯）：“有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事，你们何时宣布？”克莱勃斯：“当我们双方就新政府问题达成协议以后。”

索科洛夫斯基：“方面军司令员认为，首先应当宣布希姆莱是叛徒，以便打乱他的计划。”

克莱勃斯（活跃起来）：“非常明智的提议。这件事当下就可以做。当然，要征得戈培尔博士的同意。我再次请求派我的副官到他那儿去。”

“应当转告戈培尔，不投降就不会有新政府。”我说道。

克莱勃斯：“我们双方暂时停火。由我们组建新政府……”

“先得彻底投降。”

克莱勃斯：“不行。”

索科洛夫斯基：“戈培尔等人现在柏林。因此，你们可以宣布投降。”

克莱勃斯：“只有经过邓尼茨的同意才能投降，可他不在柏林。一旦宣布停火，我们就可能派鲍尔曼到邓尼茨那儿去。

我这里既无飞机，又没有电台。”

这时，气氛紧张起来。

“必须先放下武器，然后才能谈到下一步。”

克莱勃斯：“不，这不可能。我们请求在柏林停火。”

“你们有代号、密码和类似的东西吗？”我问道。

克莱勃斯：“都在希姆莱手里……”（这时，我不由地同索科洛夫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克莱勃斯接着说：“如果你们同意暂时停火，我们就会达成……”

“只有在你们投降的基础之上才能达成协议，投降之后，邓尼茨可以象您所做的那样，来找我们谈判。”

克莱勃斯：“应当把邓尼茨叫到这儿来，你们放他进来。”索科洛夫斯基：“投降吧！”

只要投降，我们立即放他进来。”

克莱勃斯：“我无权决定投降……”

“立即投降。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安排邓尼茨前来这里的行程。”我说。

克莱勃斯：“先得同邓尼茨联系上，然后再谈投降。没有邓尼茨允许，我不能投降。”

（他想了一下）但我还是可以就此问题请求戈培尔，如果你们能派这位上校到他那儿去的话。”

（他指着他的副官）

索科洛夫斯基：“这样，我们达成了下述的协议：德军上校去找戈培尔博士。问他同不同意立刻投降。”

克莱勃斯：（插话）“那么，是否可以先停火，还是在停火之前要戈培尔首先同意投降？”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许就停火一事询问戈培尔的意见。”

克莱勃斯：（再次强硬起来）“没有邓尼茨允许，无论我还是戈培尔都不能批准投降。”

“那样一来，你们就不能建立政府。”

克莱勃斯：“不，应当建立政府。然后再解决投降问题。”

索科洛夫斯基走进邻室，用电话要通方面军司令员，向他汇报道：

“克莱勃斯非常顽固，坚持说没有邓尼茨的允许，他们不能投降，而邓尼茨或许对战况一无所知。克莱勃斯请求向邓尼茨汇报，然后，好像才会作出决定。他还请求派副官到戈培尔那儿去，然后，可能派人去邓尼茨那儿。乘汽车到梅克伦堡，往返 400 多公里。他提出我们也派一个军官随行。邓尼茨可以在前线等候这位军官。而这一切会大大地拖延时间。

我们现在只允许派一个人到戈培尔那里。”

我们听取了朱可夫的指示后，又回到克莱勃斯那里。

克莱勃斯：“我可以出去一会儿吗？”

“可以。”

克莱勃斯和副官走了出去。他俩很快便又回来了。

克莱勃斯的副官要到戈培尔那儿去。我打电话给参谋长，命令他们保证德军上校通行，同时要求位于前沿的我们一个营同德军的一个营建立联络，以便使戈培尔能同我们进行对话。

“德国政府应当是有权威的政府”。克莱勃斯突然说道。

“在德国全面崩溃之时，您仍认为希特勒还会有什么威望吗？”我说。

“我们的痛苦，你们是看到了的，”克莱勃斯悲哀地说，“也许，元首的威望有些降低了，但他还是伟大的。他制定的方针政策永远不会改变，新的人选和新的政权将以希特勒的威信为基础。”

好一个狂热的信徒！说起话来郑重其事，外表也十分体面：穿着全副

军装——镶金的红色军领章，窄窄的肩章，1941 年冬季的绶带，胸前还挂着几枚勋章和一枚铁十字勋章……”兴许，基础会更广阔一些，更民主一些，”他继续说道：“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希望保存自己。而如果英国和法国硬向我们输入资本主义制度那一套，那我们会很糟糕……”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想消灭德国人民，但我们不会允许法西斯主义存在。我们不打算打死国社党成员，但应该解散这一组织。德国的新政府应当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克莱勃斯：“我认为并相信，只有一位领袖不愿意消灭德国，那就是斯大林。他曾说过，苏联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同样，德国也不能消灭。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我们担心英、美毁灭德国的计划。如果在对待我们的关系上，他们不受约束，那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

“那么，希姆莱呢？”

克莱勃斯：“能允许我直接了当地谈吗？希姆莱认为，德国军队还可以成为对抗东方的一支力量。他向你们的盟国汇报了这一点。而我们则清楚这一点，完全清楚！……”

“如此一来，将军先生，您的固执态度就更令我无法理解了。现在柏林还在进行战斗，这是不必要的流血。”

克莱勃斯：“克劳塞维茨说过，耻辱的投降是下策，死于战场是上策。希特勒自杀了，为的是保留德国人民对他的尊重……”

这是自杀者的逻辑。我们向这位德国将军询问了希特勒自杀时的详细经过。

克莱勃斯：“当时有几个见证人：戈培尔、鲍尔曼和我。根据遗嘱，尸体洒上汽油烧掉了……元首死前同我们诀别，告诫了我们。我们劝过他，但他决心去死。我们建议要他向西方突围……”

9 点 45 分，电话铃响了。苏联政府作出了最后的答复：要德军全面投降或是柏林守军投降。如果拒绝投降，我们将在 10 点 40 分开始对城市实施新的精密的炮火准备。我把这些告诉了克莱勃斯。

“我未被授权这样做。”他答道：“要继续作战，而这一切的结局会很悲惨。柏林也不可能投降。戈培尔没有邓尼茨的允许不会同意投降的。这是很大的不幸……”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会停战，也不会进行单独谈判。

为什么戈培尔自己不能作决定呢？”

克莱勃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果我们宣布柏林彻底投降，那人们都会知道，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我们想组建政府，有组织地来进行这一切。”

索科洛夫斯基：“就让戈培尔宣布……”

克莱勃斯（打断他的话）：“但邓尼茨是一个非党人士。他作决定比较容易。为了不招致无谓的牺牲，但愿他也投降吧！”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投降之后，就宣布新政府。为此，我们将在柏林把一部电台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同我们的盟国取得联系。”

克莱勃斯：“是的，看来此事得由戈培尔作决定了。我可以不可坐车到他那儿去？”

索科洛夫斯基：“可以。我们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你们已陷入绝境，就连戈培尔和邓尼茨之间也断了联系。柏林投降之后，我们为你们提供飞机或汽车，并安排电台联络。”

克莱勃斯：“不会逮捕我们吧？所有负责指挥投降的军人能否得到自由？会不会把我们都当战俘呢？”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知道，盟国政府会做出什么决定。”

克莱勃斯：“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投降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保证新的临时政府的成员有权同盟国政府进行完全官方的接触。

盟国三方政府会做出决定。我再重复一遍，到时会通知你们……”

克莱勃斯：“我必须知道戈培尔博士的意见，应当将柏林投降的方案告诉他。”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要在三大盟国面前表明态度，因为希特勒已死，你们拥有全权。”

克莱勃斯：“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沟通联络？”

他焦躁不安起来。10 时 40 分。我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飞机从头顶飞过。

这时，德国翻译回来了。他是和冯·杜弗文格上校以及我军的一些通信人员一起去沟通帝国办公厅的直通电话的。

他很激动，说：“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喊：‘别开枪，我们是军使！’我们的人没有回答。俄国少校拉着电话线。他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拐角处遭到德军的射击。头部受伤。我高喊不要开枪，亲自拉起线轴。上校冯·杜弗文格脱掉大衣，摘下武器，手拿白旗走在前面。扫射还在继续。有几个俄国土兵和一个军官（是个连长）受了伤。当时我们站在不远的地方等候接通联络。但电话联络直到现在也未接通。俄国人这头已经安好，而我们那头还没接上。很可能，战斗群尚未接到通知。现在怎么办？是等待沟通联络还是等待上校回来？俄国人说，他们方面军将保证上校顺利返回。”

“立刻回去，保障上校安全返回，”克莱勃斯命令道，又问：“谁开的枪？”“也许是个狙击兵。俄国少校看来活不成了。真遗憾……”

我们在地图上寻找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仔细地察看着。

“这儿是，‘埃克斯策尔西奥’饭店”，翻译指着地图说：“我们就在这儿高喊，我们的狙击兵就在这儿向我们开枪，在这整个地段上，俄国人一枪未发。”

我们在地图上给 3 个街区作了标记。从我军的一个营打来的电话说：德军上校已经回到德国人那边去了，但联络尚未接通。

“去吧！”我对翻译说。

他要求给他一个喇叭筒和一面白旗。

接过东西，他“啪”地一转身，左手一举，给我们行了个礼，就出去了。

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下达了不对 35 号地段射击的命令。这地段包括从湖泊到动物园，一直到弗雷德里希大街的大片区域，军使们将途经此地。

过了一会儿，克莱勃斯说：

“5 月 1 日是你们的重要节日。”

“今天我们怎么不好好庆祝庆祝呢？战争结束了，俄国人进了柏林。”“1941 年的今天，我在莫斯科。我已经说过，我曾荣幸地当过大使馆的副武官。在阅兵式时，我站在观礼台上，旁边就是列宁墓……”

早饭后，同帝国办公厅接通了电话。克莱勃斯将军精神振作起来，请求准确地记下苏军统帅部公布的要求德国投降的全部条款。他拿起话筒开始讲话。他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点，即要在电台上公布希姆莱的背叛行为。戈培尔回答说，要求克莱勃斯将军回去，以便亲自同他商谈。我们同意了。

接着，克莱勃斯把自己方才抄写了下来的我们提出要德国投降的条款又读了一遍：

- “1．柏林投降。
- 2．所有投降者须交出武器。
- 3．按照一般惯例，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
- 4．对伤员给予治疗。
- 5．为用电台与盟国进行谈判提供方便。”

我们做了详细解释：

“我们将使你们的政府有可能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希姆莱的背叛，并向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宣布彻底投降。

这样，我们更部分地满足了你们的要求。我们是否会帮助你们组建新政府呢？不会的。

但我们将给你们权利去拟定一个你们不愿被看作战俘人员的名单。投降之后，我们将允许你们向各盟国发表一个声明。你们政府今后的命运将取决于它们。”

“我们将提出的关于在柏林的人员名单，不会被看作是战俘名单吧？”

“这一点我们保证不会。军官可以保留军衔、勋章和冷兵器。我们给予你们权力去拟定政府成员的名单，并同邓尼茨联络等。但这一切只能在投降以后。”

“目的是为了建成一个合法的、公认的德国政府吗？”

“这仅仅是为了发表声明以及同我们的盟国政府联系。至于今后怎么办，将由它们作决定。”

“这样的话，投降之后，苏联电台会通告希特勒的死讯、通告有关新政府的事和希姆莱的背叛吗？”

他保证尽快就所有各款商量妥当。

13时8分。

克莱勃斯走了。第三帝国领导人派来的军使不同意投降，不愿意停止毁灭柏林，也不愿意结束双方包括和平居民在内的无谓牺牲。

他想从我们苏军统帅部和苏联政府这里得到什么呢？克莱勃斯行前不知何故耽搁了好一会儿，甚至两次从楼梯处返回来：第一次是忘了拿军帽一起搁在窗台上的手套，但他明明戴着帽子，却根本没拿手套；第二次返回借口忘了带军用挎包，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带来。他认定公文包里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信件，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是从侧面的口袋里掏出文件的。

从他的眼神和举止看得出来，将军在犹豫：是返回到地狱里去呢，还是率先无条件投降？可能他期待我们宣布他为俘虏，大概，他对这一点是十分愿意接受的。

但我们要这么一个俘虏有什么用呢？让他回去还是比较明智的，因为他回去后，可以施加点影响，使流血得以停止。

克莱勃斯从我们这里获得了什么呢？无疑，他履行了戈培尔、鲍尔曼、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意愿。他们曾指望用希特勒的死讯来缓和苏联和法西斯德

国之间的矛盾。好象德国以战争的首恶元凶的被焚就已抵偿了数百万人的牺牲似的。但这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希特勒的党魁们，包括希特勒自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企图加深我国和盟国之间的矛盾。

我们和盟国之间有过某些分歧，这决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他们正在极力尽快地消灭这些敌人。

关于这一点，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和西方的某些人是不理解和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在反希特勒同盟内部寻找裂痕，但没有找到。

克莱勃斯将军在我们这儿呆了将近一天，他没有发现我们在忠诚地承担盟国的义务方面有过丝毫的动摇。相反，我们却向他表明，我们决不从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后退一步。戈林和希姆莱同样没有从我们的盟国那里捞到任何好处。

克莱勃斯将军无疑是一个卓越的侦察员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他这次却两手空空地回去了。看来，这是他们想在盟国间制造不和的最后一次尝试。戈培尔和他的一伙人尝到了失败的苦头之后，肯定会采取某种决策。

6

命令下达了：以全部强大的火力进行射击！尽快把敌人消灭干净！成千上万发炮弹向着政府街区、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倾泻。

强大的、经过充分准备的突击，很快取得了效果。我军各部队的胜利捷报不断传来。

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 A·A·雷若夫将军报告，他的部队已占领动物园中心，并顺利地向北发展进攻，准备同 C·A·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合。

近卫步兵第 74 师师长 C·E·巴卡诺夫将军报来令人

喜悦的消息，他的部队已攻占了波茨坦火车站。

后来接到报告说，克莱勃斯将军安全通过前线。现在，他大概正向戈培尔和鲍尔曼汇报呢。

午饭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请求到前线去，准确地说，他想闯到政府楼区去。

我开玩笑地对他说：

“弗谢沃洛德，你要是一家伙被打死，你倒无所谓，可为了你我得关 20 天禁闭。索菲娅·卡西扬诺夫娜会骂我一辈子。你呀，还是给我坐着别动！”

此时有人报告：动物园内的障碍墙已被炸掉，我军正穿过缺口向沙尔勒滕堡进攻，以便同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合。德国人从楼房和掩体的顶部用高射炮对我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我军炮兵也以直接瞄准射击把敌人从那里清除出去。

又有人报告说，部队已突至跑马场墙下。我提醒说：要小心一些，应当保护珍贵的马匹。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进来报告说：

“我命令部队只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应当朝易于观察的目标进行射击，应当保存房屋，因为它们对于居民是用得着的。

不断送来报告：许多德国士兵和军官自愿投降。

22 时 20 分。

这一天转眼就过去了。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们还是坚持挺住。

谁都不想离开。桌上推满了各种行动计划，旁边放着一个香烟头已经满得不能再满的烟灰碟。

入夜，战斗渐渐地止息。街上断续地传来自动枪的射击声。大家都困得很，但又不能睡觉。神经处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人都无法入睡，因为这是战争结束的前夜啊！”我还是仰靠在沙发上，眼睛闭着。但大脑却没有打盹，还在思考着各式各样的问题。电话铃响了，我又拿起了话筒。雷若夫将军报告：“我军在动物园北面进入瑞典使馆区。大使请求给保护，那怕只给几个士兵也可。瑞典人盛赞红军的勇敢。使馆全体人员躲在避弹所里，他们对一切都很满意。”我命令说：

“要瑞典人放心，给予保护。要绝对讲礼貌。”

1945 年 5 月 1 日，我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没有睡觉，也没有休息。但苏维埃人，亲爱的莫斯科和我国的其它城市和乡村，都沉浸在欢乐里！

战士的幸福

1

5 月 2 日 1 时 25 分。战斗尽管不是到处都有，但还在某些地方进行着，自动枪的连射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时有所闻。我用斗篷蒙住脑袋极力想睡着。但电话铃又响了，我又拿起话筒。

第 28 军司令部报告：0 时 40 分，近卫步兵第 79 师的电台截获了来自德军一个司令部用俄语发出的无线电呼叫：

“喂！喂！我是德军坦克第 56 军，我们请求停火。柏林时间 0 时 50 分我们将派军使到波茨坦桥。识别标志是一面白旗。听候回答。

德军报务员把这一通告重复了 5 遍。

我师电台回答：

“明白，明白。我们立刻把我们的请求转报上级首长。”

德军报务员立即回答：

“俄军电台，听到你们的话了。请你们向上级首长报告。”

我立刻下令：停火只限于与军使会见的地段；转告德军坦克第 56 军司令部，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军使的通行和会面将得到保证。我派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马图索夫中校和翻译卡利别尔格大尉前去参加会面。我指示：除了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外，不进行任何谈判，要他们立刻放下武器。

有人送来了一份公文。上面有印鉴：“瑞典王国使团”

（瑞典文）接下去是用俄文写的：

“司令员将军：

谨提请您注意，瑞典王国使团的所在地地址是：罗赫大街 1 号、3 号、25 号和蒂尔花园区大街 36 号；瑞典教堂的地址是：柏林、威廉迈尔多夫、郎豪斯大街 27 号。

谨请苏联军事当局提供可能使瑞典使团继续执行其保护瑞典公民和瑞典财产的使命。

如能同主管部门的红军代表会谈，本人将不胜感激。

期待着您的美好回音。众所周知，瑞典王国使团迄今为止是苏联在德国权利的保护者。

代办 胡戈·埃里法斯特

1945 年 5 月 1 日于柏林 ”

我派了一名参谋前往瑞典使团，对他们表示：我集团军指挥部对代办的来信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保证全力协助使团执行其公务。

战斗仍继续进行，但间歇的次数和时间都显著地增加。B·C·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来隔壁房里休息。我也累得站不住了。

电话铃又响了。近卫步兵第 47 师报告：受命前往波茨坦桥的我司令部的几名军官在那里见到了德军军使（一个上校和两个少校）。德军坦克第 56 军参谋长冯·杜弗文格上校说，他们受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的全权委托，向苏军统帅部宣布魏德林将军已作出的关于坦克第 56 军各部队停止抵抗和缴械投降的决定。同时，冯·杜弗文格上校出示了下列一份文件。内容是：

“总参谋部上校冯·杜弗文格系坦克第 56 军参谋长，他受我和我指挥的部队之托，转达我们的说明。

坦克第 56 军军长

炮兵少将魏德林

1945 年 5 月 1 日指挥所 ”

近卫步兵第 47 师代理师长谢姆钦科上校问冯·杜弗文格上校：“坦克军指挥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部队放下武器、并有组织地把各部队的全体人员和装备转交给苏军司令部？”

冯·杜弗文格回答说，需要 3 到 4 个小时。他们打算在夜间进行，因为戈培尔曾下令向一切企图倒向俄国人方面的人开枪。

我命令：

“让冯·杜弗文格上校返回魏德林将军处，并带去一份声明，告诉他投降已被接受。其余两名少校留下来。”

在等候结果时，我打起盹来。5 时 50 分我被叫醒，告诉我说，戈培尔的一个代表团来了。我从沙发跳起来，急忙用冷水洗了个脸。

代表有三个人，穿着便服，有一个戴钢盔，拿着白旗的士兵随同。我吩咐要那个士兵出去。来人中有一位是宣传部的政府顾问海纳斯多夫。

我问：

“你们想要做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什么？”海纳斯多夫将一封玫瑰色封皮的信交给我。我开始读信。维什涅夫斯基、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钦科也从我身后边看着信。

“正如克莱勃斯将军告知您的那样，原帝国总理希特勒已升天国。戈培尔博士也已不在人间。我，作为幸存者之一，请求您将柏林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我的名字尽人皆知，宣传部长弗里契博士。”

我边读，也为最近几天甚至最近几个小时以来的事态发展到吃惊：戈培尔在希特勒死后不久也死了，谁会步戈培尔之后尘呢？不管是谁吧，这已是战争的尾声了。我问：

“戈培尔博士是什么时候自杀的？”

“晚上。”

“尸首呢？”

“烧掉了，是他的私人副官和司机烧的。”

真有意思……希特勒也是烧掉的。第三帝国的头目们选择了火作为清洗他们在世上所犯罪恶的一种手段……

“昨天受戈培尔全权委托同我们谈判的那位总参谋长克莱勃斯现在何处？”

“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新的参谋长——艾因斯多夫将军。”

（后来得知克莱勃斯也自杀了。）

“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条件：我们只能同你们谈无条件投降的问题？”“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为此而来，并提供帮助的。”

“你们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什么帮助呢？”

“弗里契博士请求让他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发表演讲，以便停止不必要的流血，并接受无条件投降。”

“军队会执行弗里契的命令吗？”

“他闻名全德国，尤其是柏林。他请求允许他在柏林用电台发表演讲。”

电话铃响了。格拉祖诺夫将军从近卫步兵第47师指挥所报告：“前线报告，我军部队看见德国军队在集合队伍。”

我们派军官C·A·格鲁申科带两名侦察员前往德军一个军的司令部。这是格鲁申科一昼夜间第三次到德国人那边去，他接送过杜弗文格和我军的通信兵，他被一颗子弹打伤过，但他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此刻他正在魏德林处。

5月2日6时，德军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

在司令部的两位将军陪同下，穿过战线向我军投降。他证实，他还兼任柏林城防司令。

他是6天前被任命担任此职的。

近卫步兵第47师师长谢姆钦科上校问，坦克军投降一事戈培尔是否知道，魏德林答道，他决定投降事前未经戈培尔同意。

我命令格拉祖诺夫将军停止向该军所在地段射击，并把魏德林将军送到我这儿来。

我对弗里契派来的代表说：

“你们和弗里契是否知道。柏林的守备部队已开始投降了？”

他们回答说，他们出发时没听到任何消息。

“此刻德军正在全线各地段上投降。鲍尔曼在哪儿？”

“他好像曾呆在希特勒的办公大楼里。那儿发生过一次瓦斯爆炸。鲍尔曼和戈培尔的全家都死了。”

我要通了朱可夫元帅的电话，向他汇报了弗里契派来的代表的来意。

“能否相信弗里契博士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发表的演说会符合我们的要求？”朱可夫问。

我回答说，可以相信，但要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我们能保证这一点。

过了几分钟，朱可夫的电话来了。同他交谈之后，我向全体在座的人，主要是弗里契的代表们宣布：

“第一，苏军统帅部接受柏林的投降，并下令停止军事行动。

第二，现存的一切德国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应向所有士兵、军官和居民宣布：一切军用物资、建筑物、公用设施和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均应妥善保管现状，不得炸毁和消灭。

第三，请您、海纳斯多夫先生，会同我们的军官一起到汉斯·弗里契博士处，带他到电台发表演说，然后回到这里来。

第四，我再次强调：我们将保证士兵、军官、将军和居民的人身安全，并尽可能对伤员提供医疗救护。

第五，我们要求德国人方面不要进行任何挑衅行动，如射击或其它破坏活动，否则，我军将被迫采取还击措施。”

海纳斯多夫请求保护宣传部的人员。

我说：“一切自愿放下武器并无敌视苏联人民行为的人，可以放心。他们的一根毫毛也不会被损伤。”

上校瓦伊加契夫和他的翻译茹拉夫廖夫准尉来了。我向瓦伊加契夫布置了任务：

“你们同海纳斯多夫去找汉斯·弗里契博士。弗里契将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命令军队投降及将装备和技术兵器有秩序地移交给我军。让弗里契通过电台发出公告，说明苏军统帅部已经接纳他们的投降，并已将柏林及其全体守备部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你们要保证弗里契顺利地到达我们的电台，并就我所说的各点对其讲话进行监督。演讲之后，弗里契和他身边的同事应当回到这里，我们将在这时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明白吗？”

瓦伊加契夫上校和茹拉夫廖夫准尉同德国代表团一齐向出口走去。

在门口他们意外地撞上了魏德林，魏德林恶恶狠狠地斜视了他们一眼，说道：

“早就该这么做！”

同魏德林的谈判没有占很长时间。

魏德林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消瘦精干。

我问他：

“柏林守备部队是由您指挥吗？”

“是的。”

“克莱勃斯在哪儿？他对您说过什么？”

“昨天我在帝国办公厅见过他。当时我料想，他恐怕会自杀。起初，他责备了我，不该昨天就已非正式地开始投降。今天，我给坦克军各部队下达了投降的命令。克莱勃斯、戈培尔和鲍尔曼昨天拒绝投降，但克莱勃斯本人很快就弄清被合围的密度很大，于是决定违反戈培尔的意见，停止毫无意义的流血。我再重复一遍，我已向我的坦克军下达了投降的命令。”

“整个柏林守备部队呢？您的权力能管到他们吗？”

“昨天晚上我向所有部队下达了抵抗的命令，但……后来下达了另一个……”

我感到德国人那边非常混乱。魏德林在德国地图上指出了自己的司令部、坦克军各部队、冲锋营及其它部队的位置。

所有这些部队均应在清晨 6 时开始投降。

索科洛夫斯基将军走了进来。我们三个人继续交谈：

“希特勒和戈培尔怎么样了？”

“据我所知，戈培尔和他的全家肯定已自杀了。元首已于 4 月 30 日服毒……他的妻子也服毒自杀了……”

“您是听说还是亲眼所见？”

“30 日傍晚，我曾在帝国办公厅。是克莱勃斯、鲍尔曼和戈培告诉我的……”

“这么说，这就是战争的结束，是不是？”

“据我看，增加每一个无谓的牺牲都是犯罪、发疯……”

“对，您在军队里很久了吗？”

“从 1911 年起。从当列兵开始。”

“您应该下令彻底投降，”索科洛夫斯基说。

“我无法向所有部队下令投降，因为没有联络工具。”魏德林解释说：“因此，在许多地方个别部队还会进行抵抗。许多人不知道元首已死，因为戈培尔博士严禁泄露他的死讯……”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已完全停止了军事行动，甚至航空兵也停止了轰炸。您对局势不了解吗？您的部队已开始投降，紧接着弗里契派来的一个非军事代表团宣布了投降。为了帮助该代表团完成任务，我们已经停火。”

“我很愿意为促使我军各部队停止军事行动出力。”

他在地图上指出了党卫军残部的所在位置。

“他们想向北突围，”魏德林说道：“我无权指挥他们。”

索科洛夫斯基：“请下达彻底投降的命令吧！以便使个别地段也不出现抵抗。”

“我们已经没有弹药了。因此抵抗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索科洛夫斯基：“这个我们知道。请您书写一道彻底投降的命令，这样您也就问心无愧了。”

魏德林在草拟命令。在场的人在低声交谈。魏德林写着……

“您也许需要您的助手帮助？”我问他。

噢，对，对！那就太好了！”将军高兴了。

我下令叫德军坦克军参谋长来一下。进来的是一位高个黑发男子，梳着很整齐的分发，戴着单柄眼镜和灰色手套，显然是一个纨绔子弟。德国人在相互商谈。魏德林一手扶着头，边思考边在写。我仔细端详着他。他的头发光滑地梳向脑后，典型德国式的整洁打扮。

魏德林默默地递给我一张纸。我读着……用词也许不一定都很好。但他此刻已顾不得用词的准确性了。下面就是他写的内容：“4 月 30 日元首已经自杀。这样，他就抛弃了我们这些曾经宣誓效忠于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军队，尽管弹药已快消耗殆尽，尽管整个局势正在使我们的继续抵抗失去任何意义，仍应继续为坚守柏林而战。

现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原柏林防区司令

炮兵少将魏德林。”

“不必写‘原’字，您现在还是司令嘛！”索科洛夫斯基纠正说。

“有必要提宣誓的字眼吗？”波扎尔斯表示怀疑。

“不必修改了，”我说：“这是他个人发布的命令。”

魏德林感到很为难，他不知道写个什么标题好：是“呼吁”还是“命令”？“写‘命令’，”我说。

“印多少份？”翻译问。

“12 份。不，尽量多印一些……”

“我的司令部人很多，”魏德林说：“我有两个参谋长和两位退休的将军。他们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来我这儿为我工作，并听命于我。他们会帮助安排投降的事宜的……”

茶端了上来。德国人被领到一个单间就餐。我们——索科洛夫斯基、特卡钦科、普罗宁、魏因鲁布、波扎尔斯基和我又开始评述最近几天和近几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事件。

“魏德林神经有些不正常，你们看见了吗？”我问道。

“要知道，他也很难哪！”索科洛夫斯基说。

“当然啦！”普罗宁赞同地说：“但他的命令很狡猾。他既巧妙地指出了誓言，又提到了职责……他不是政府的人，所以不过是个‘招牌’而已……”

此时，有人报告，命令已经印完毕。我对集团军参谋长别利亚斯基将军说：

“让我军的一名军官和一个德国人一起带着命令，坐车沿街行驶，向德国军队和居民宣读。”

灰暗、清冷的早晨。我们边开玩笑，边抽着烟，回忆着斯大林格勒会战时的情景。

11 时 30 分。

副官报告：弗里契搭一辆自行火炮来了。弗里契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穿灰大衣，戴着眼镜。边走边看文件。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身旁带着一位翻译。

弗里契也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不管他愿意与否，这是我们谈判的必然结果。

索科洛夫斯基（对弗里契）：“我们十分关切柏林的安宁。一切担心自身命运怕不安全的人，我们可以为其提供保护”。

弗里契：“德国警察机构都已四散逃跑了。但可以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对警察不感兴趣。他们将被列入战俘之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行政官员，我们将保证为他们提供保护，不让他们受到伤害。明白吗？”弗里契：“不明白。是谁，会在什么地方进行伤害活动？”

“推敢搞越轨行动？”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的个别战士和德军居民，都可能因为盖世太保过去作恶多端以及其它缘故，而对你们实行残酷的报复……”。

弗里契：“对，有可能。”

索科洛夫斯基：“这些我们全都预见到了，并已发出声明。现在柏林已有警备司令——苏联将军别尔扎林，各区的警备处亦已建立。他们会采取一切措施。你们还有其它的要求吗？”

弗里契：“我作为政府的最后一名负责代表，曾给您写过一封信。我写那封信是为了制止流血。”

索科洛夫斯基：“您那次迫不得已作出的姿态，我们是理解的。”

弗里契：“我想扩大文件的散发范围，为此，我须同邓尼茨取得联系。”

“上午 10 时，”我告诉他：“邓尼茨已向德国军队和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接管了领导权，他将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继续斗争到底，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出面干涉的话，也将同他们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怕这个邓尼茨！”

弗里契：“我不知道这事。”

最后确定了投降的条件之后，我们和他分手了。所有的人都在默默沉思：这个人会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尽管敌人已经失败，但对他们仍然不能轻信。我大声议论说：

“邓尼茨已经宣布希姆莱为叛徒。柏林也单独投降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打垮他们了。如果戈培尔想在我们身上打什么主意的话，那就等着瞧吧！……”大家全都听懂了我的话的意思，顿时笑了起来。

电话铃声响了。集团军参谋长报告，柏林已经安静下来了。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指挥所里的所有人。

“战争就要结束了，”瓦里西·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激动地说。

“是啊！让我们抽一袋和平烟吧！”

中午，柏林守备部队投降完毕。我们来到街上。周围是一片我们已如此不习惯的宁静。

由于不习惯，所以觉得在寂静中似乎还有嗡嗡的声响。突然，我听到不远的某个地方传来了队伍列队进行的清晰的步伐声。这是我们的近卫军战士们。他们的步伐是如此的庄重，简直使我无法相信。近卫步兵第79师的一个连正从蒂尔花园区走出来。近卫大尉H·A·克鲁齐宁带领着这个连。他们刚刚肃清了躲藏在东面一个掩蔽部内企图顽抗的德国人。就在哪里，响过了近卫第8集团军在进攻地带内的最后一枪。这最后的枪声响过后，近卫战士们撤出战斗，迈着正步来到柏林中央大街上。多么威武的军容！在这些胜利者的脸上，洋溢着多大的欢乐！

不！我仿佛从未见过这样的队伍。他们步伐整齐，肩并着肩。来自俄罗斯大地的勇士们阔步行进在柏林！突然间响起了歌声——浑厚的歌声，动听的歌声，我们俄罗斯的歌声。这歌声在仍旧弥漫着硝烟的街道上空回荡，在第三帝国的党魁们曾经拟定过统治世界计划的城市上空回荡！

我望着战士们的脸孔，这是一张张疲倦而又欢乐的面庞。

这就是一个战士真正的幸福！

2

战争结束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结束了。如果把战争年代迈过的所有堑壕、掩体、交通壕和强行军、迂回机动所走过的路线都加起来，合成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线可能会绕行地球赤道一圈。而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同集团军的军人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了无数的激流险滩，穿越了数不尽的地雷场，终于走完了这条漫长的道路。

我们的军人们和全体苏联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承受的重担和考验，是任何人都没有承受过的。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流血最多、破坏最严重的一场战争。我们这些经受过这场战争考验的人能够和应该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说些什么呢？这些回忆中的每一行文字，都是我个人的观察、体验和思考的结果。某些章节或许有失之于主观的地方，但我自始至终是出于一片诚挚之心。谈到战争，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要毫无隐讳地说出我所想的和使我的心灵感到不安的一切。

已成为过去的这场战争的凶焰是从希特勒德国、欧洲的中心蔓延开来的。各国人民遭受了多大的灾难、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将它扑灭呵！数千万人被杀害和蹂躏，数万座城乡被破坏和梦毁。

苏联人民遭受了最大的牺牲，因为希特勒战争机器的主要打击重点是我们苏联各族人民。

战火在我国国土上从西部边界一直燃烧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伏尔加河下游，然后又从这里反烧过去。我们在道义上有充分的权力审判侵略者和那些为侵略者开脱的人。

反希特勒同盟的各国人民经过共同的努力终于在战火的发源地扑灭了这场战火。

思考过去，目的在于展望未来；谈论未来，就不应忘掉过去。饱经许多战火，我深知战争的痛苦。我不愿这种灾难再次降临在各国人民的头上。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被排除了。

理智要求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且让那些现在还在炮制新的侵略计划的人也记住这一点吧！

我的戎马生涯已有 62 年，我要完全负责地说：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不受任何侵略者的侵犯，我们，苏联军人，将竭尽全力；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将在一切事业中站在最前列！

